

前 言

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是中外关系史的组成部分，也是整个历史学科的重要分支。中外关系史是研究中国与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交通和交涉的历史。

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存在都不可能是孤立的、与世隔绝的，它必然要和其他国家和民族发生接触和交往，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各国之间的接触和交往越来越扩大，越来越频繁，在这种频繁的交往过程中，各国人民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从而促进了各自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研究中外关系史，就是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历史中来考察，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探讨中国与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通过中国对世界历史的贡献和世界各民族对中国的影响，证明中国在世界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所要研究的就是1840年以前中华民族同世界各民族间进行的政治关系，以及物质和文化交流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我们的祖先创造过人类最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中国的落后只是近三四百年的事情，两千年来，封建统治者一直以“天朝大国”自居，全面维护“朝贡体系”，不热心支持民间对外经济活动，在近代欧洲的资本主义崛起之后，中国的封建主义就相形见绌，显得落后了。如今，我们要把中国建设成政治民主，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一个先决条件便是对外开放，广泛接触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成就，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点和长处，促进我国走向世界的进程，以加快民族前进的脚步。

学习中外关系史，首先遇到的是如何来区分“中”与“外”

的问题。由于历史上我国疆域范围的变迁，“中”与“外”的概念也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化，在某一历史阶段属于“外”的民族和地区，在另一历史阶段又融合到中华民族之中；反之，一些曾经属于“中”的民族和地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又以“外”的面目出现。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种特殊的现象，有些国家在一定时间内作为藩臣与中国的封建王朝建立了朝贡关系，但也有一些并不是藩属而是通过友好交往与中国发生关系，但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又往往不分主次，一概称之为“朝贡国”。对这些复杂的现象应按时代的不同情况，予以历史主义的评价。

在我国历史上除了代表正统的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王朝外，在某些时期，尤其在动乱分裂时期，各地区还出现过一些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区域性王朝。它们都是历史上中国的组成部分，我们不能以历代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王朝、更不能以汉族王朝与历史上的中国划等号，因为历史上的中国，不但包括占统治地位的中原王朝，也包括中原王朝以外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或政权。要打破以历代正统的中原王朝即代表整个中国的观念，必须站在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立场来看待中国的历史。在中国的版图内，中央王朝与边区政权、部族的关系都是国内民族关系，而不是中外关系。以怎样的一种时空标准来划定“中”与“外”的界限呢？我们认为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作为历史时期中国的疆域范围是比较合适的。自秦汉以降，我国多民族的国家就已逐渐形成，尽管历史上在此疆域范围内各民族间有过多次的分裂和组合，但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文明也在这一版图内融合，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这一文化统一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我国56个民族形成了团结、和睦、平等、友爱的民族大家庭，研究中外关系史以此作为界定的标志是符合实际的。综观世界历史的进程，把中国放在其中来考察，这也符合整个世界历史潮流发展的总趋势。

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随着奴隶制的出现，建立了国家，中国古代对外关系进入了萌生时期。中国古代典籍中有许多关于周边各族的记载，《山海经》中的《大荒西经》、《穆天子传》对葱岭（今帕米尔）以东的山川风物描绘较详细，而且还记录了中国西北边境的犬戎和大月氏的一些情况。但是，由于当时人类的生产能力还十分低下，这一时期中国对外交往的范围还很狭窄，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也是模糊的，因此在记载中有些虚构和失实的部分。

降至秦汉，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生产力获得进一步发展，逐渐繁荣起来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为扩大对外交往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政治的确立，为对外交往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和军事保证。张骞于汉武帝年间两次出使西域，成为中国对外关系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强大的西汉王朝从此与他的西邻建立了关系，并同大秦（罗马帝国）建立了间接联系。东汉时班超投笔从戎，出使西域，还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但因故只到达西海（估计为波斯湾）而返。公元166年，大秦商人来中国，以安敦王名义向汉桓帝赠送礼物。这样，中国与西方各国经济、文化往来的步伐不断加快，规模也越来越大。丝绸之路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国际商路之一。与此同时，中国同外部世界的海上交往早在秦汉以前也已开始，而有记载的官方往来则始于汉武帝。当时的中国商船由广东的港口出发，前往马来半岛，缅甸，印度次大陆和斯里兰卡等地。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虽处于动乱分裂之中，但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并没有中断，中外关系处于一种区域性发展的状况。公元226年，大秦使者秦论到建业，受到孙权接见。西晋初年，大秦又派使者来中国。中国的养蚕术于6世纪末经波斯传入大秦。西汉时传入中国的佛教虽历经磨难，这时有了新的传播和发展，以

后又从中国传到朝鲜、日本。

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变化阶段，这种变化的最明显特征是唐代在西域军事失利后，传统的陆路交通受到阻隔，而唐中叶以后，海上对外交通日渐突出，最多时与唐交好通使的达70多个地区和国家。唐王朝中央政权设立专门接待外国使者和客商机构——鸿胪寺，又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大量输入亚、欧各国，深受外国人喜爱。唐与罗马（时称拂菻）、阿拉伯（大食）建立密切关系，景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得以传入中国。而早已传入的佛教，此时经玄奘等高僧译传佛经的努力，对唐代高度发达的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新罗留学生和日本的遣唐使等则把唐代文化传播到国外，出现了文化交流的繁荣局面。

宋辽金时期，国内各区域性王朝出现，在对外关系上表现出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宋与辽、夏、金时战时和，丝绸之路时断时续，对外交往主要在东南海路进行，其时与中国通商的亚非国家仍有50余个。至元朝，由于蒙古人的不断远征，疆域庞大，横穿欧亚大陆的陆路交通更加畅通无阻，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更紧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极其繁荣。著名旅行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和摩洛哥人伊本·拔都他的中国之行都在这一时期。

明初，虽然因“海疆不靖”，“明祖定制，片板不许下海”，禁止私人对外交往，但是永乐时期派郑和于1405—1433年间七下西洋，与亚洲各国以及非洲东岸诸国的官方往来则又进一步扩大了中国的影响。

从郑和下西洋以前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简略史实看，中国从秦汉以降至明朝初年，这段时间的对外关系基本上是逐步发展的，中华民族对外部世界采取积极主动的开放态度，中外关系犹如江海波涛，逐浪推进。中国使节、商人、僧道的足迹几乎踏遍

亚洲以及东非、北非和欧洲的部分地区。中华民族在世界古典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河文明及希腊、罗马文明）荟萃地区所展开的一系列对外交往活动，给世界文明史的发展增添了光彩，促进了中亚等地游牧民族和东南亚地区相对落后民族的文明发展。中国的四大发明经阿拉伯人传到欧洲，极大地推进了欧洲历史的进程。诚如马克思所说：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欧洲资产阶级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火药炸毁了封建骑士的堡垒，指南针为欧洲的大帆船装上了“眼睛”，使它在茫茫的大洋中远航，不会迷失方向。而造纸和印刷术的传播对欧洲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的形成作出了卓越贡献。加以包括马可波罗、伊本·拔都他等人的记述，中国的声望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与此同时，中华民族也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加以改造，为自己所用。自张骞通西域以后，外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大量输入，封建统治阶级虽然有时加以排斥，但主流还在于吸收和利用。异民族物质、文化的引进，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以至社会风俗等各方面，丰富和促进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

但是，从明中期以后，直到鸦片战争以前的三四百年间，中国社会的发展逐步落后于西欧各国，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对外部世界的态度由开放交往趋向闭关保守。明代统治者重行禁海之令，但这种做法并没有起多大作用。葡萄牙、荷兰等老殖民主义者不断从东南沿海伺机侵略，陆上长城也被满族冲垮。继明亡而兴的清朝，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实质上一直采取束缚中华民族自身发展的闭关自守政策，处于消极被动地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挑战的地位。而西方各国正积极发展资本主义，努力向外扩张殖民地和掠夺财富，中国成为他们的进攻目标，因而南有英、法等西欧殖民主义者的进攻，北有沙俄的侵略，在强大的外敌面前，闭关自守的清王朝终于被彻底打败。1840年以后，中国逐渐

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的对外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是以一系列的被动挨打，屈辱和为标志，也就是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需要研究的主要内容。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范围广阔、涉及欧、亚、非、美各大洲；内容丰富，既涉及经济和政治，又涉及科学和文化，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许多门类，如地理学、宗教学、民族学、考古学、社会学以及其它科学门类。面对这样广阔的范围，这么纷繁复杂的内容，我们应该如何把握这门学科的主要脉络，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关系呢？

我们认为，作为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必然有它自身的规律。从古代对外交往的范围来看，陆、海两路是主要的孔道。中国对外的陆路交往形成较早，即人所熟知的“丝绸之路”。它又分为南、北二路，南路从长安出发，经敦煌、鄯善、于阗、莎车，越葱岭后抵达大月氏和安息；北路经敦煌、车师、龟兹、疏勒，越葱岭后经大宛、康居到安息。丝路最终的目的地是大秦（罗马帝国）。由汉至唐，历代统治者经营西域的结果，使丝路畅通，官旅、客商络绎不绝，中国和西方各国的物质、文化交流日益繁荣昌盛。封建统治者也利用这条道路，将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以求得边境的安宁，保护同西方各国的往来。陆路之中，还有一条少为人注意的“草原之路”，主要是西北民族的迁移路线，也成为中国同西方来往的通道之一。海路的交通开始虽早，真正的繁荣是在隋唐及以后，至明成祖遣郑和下西洋而达于极盛，使通往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和非洲东岸国家的海路贸易迅速发展。人们有时也称海上的对外交通为“海上丝路”或“陶瓷之路”，可见其具有与陆路交通同等的重要性。在海外贸易中，华侨对南洋诸国的开发以及在传播中华民族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方面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我们应

从中外关系史（有别于华侨史）的角度加以探讨。

从古代对外关系史的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交往来看，不难发现，它主要通过民间的对外交往和官方的对外交往这两大渠道进行。任何国家的对外关系，皆有民间的和官方的两种方式。按一般规律，中外关系的建立，总是先从民间的相互接触开始，然后才有官方的往来以及对这种民间往来的认可与规定。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中华民族同西方各民族间的交往已经存在，这在《史记》卷一二三，张骞上书汉武帝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张骞说：“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在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同时，民间交往又往往是官方交往的继续，当国家间的关系因这样那样的原因中断以后，人民之间的交往却仍在继续不断地进行。这样，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交通路线的开辟和经济、文化交流——官方外交关系的建立——更广泛的民间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就呈现为一种带规律性的趋向。陆上交通线的开辟，人民群众起着先驱者的作用，同样，海上交通的开辟，也是先由人民群众闯出来，从民间的自由交往开始。由民间进行的对外活动表面上看来是松散的、无组织的，但这与交往双方的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所以这种交往活动常比官方关系具有更广泛的范畴，在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和融合（如异族通婚等）中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在中国分裂动乱时期以及封建统治阶级闭关自守的年代，民间的对外活动甚至成为中华民族对外关系的主流，因之，民间交往是中外联系的一条重要渠道。

与民间的对外关系相比较，官方的对外交往即由统治集团进行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对外活动，一般都有鲜明的目的性和较强的组织性。张骞出使西域，其目的是联合大月氏

夹击匈奴；郑和下西洋是为了联络各国，扬威异域。封建王朝派出的使团是有组织的，而且有一系列对外交往的原则和策略。他们要建立的是国与国（或地区）间正式的官方关系，这种外交活动明显地体现着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是，其成败不仅取决于国家权力是否强大，统治集团是否采取了正确的外交原则与策略，而且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其目的是否符合整个民族的整体利益。由于官方的对外关系往往是对民间交往的肯定和规范化，因而应该是和整个民族的切身利益相符的，违背了这一基本原则，统治集团的对外交往就往往不会成功。

民间交往和官方交往这两种组织形式虽不相同，但二者之间有着有机的内在联系，它们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一般地说，如果没有民间的对外关系，官方的外交活动就不大可能发生，即使建立了关系，由于缺乏广泛的民间接触作后盾，也不可能持久，最终会导向萎缩。相反，由于官方外交频繁，同样会促进民间往来的繁荣和活跃。因此，在研究中外关系史时，对这两方面的内容都不能忽视，只有全面加以研究，才能完整、正确地再现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真实面貌。

既然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是指整个中华民族的对外活动，那么，除了中原王朝以外，各个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些区域性政权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交往同样是中外关系史的组成部分，因为这时中华民族仍以其共同的文明形态和外部世界发生关系。对各个区域性民族政权的外交活动，只要有利于中华民族，就应加以肯定。大量的异国物质、文化产品通过边疆移植到内地，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我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因为躲避战乱、被流放等原因导致大量人口的流迁，又将中原文明更多更广泛地传播到边远地区，并流向外国，所以各个历史时期边疆地区的区域性政权在促进中外交往方面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不容忽视。

中外关系的发展并非孤立演进的，而是与中外历史的发展进程同步进行的，它深受中外双方社会发展水平和基本社会经济形态的制约。在这种交往关系中，存在着一个平等或不平等、是友好往来或侵略的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与外国的地位是有变化的。然而，中国的统治集团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观念出发，历来以天朝上国自居。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历代统治者往往把中华民族与外部世界的友好往来记录成君臣之间的朝贡关系。对此我们应慎重地具体分析。历史上“朝贡贸易”确实存在，而且封建帝王大多是厚往薄来，以显示自己的“仁义”与富足。但对历史上确实并非藩臣而是来进行友好交往的外部各族一律记述为“朝贡关系”那就有违于史实了。因此，对于朝贡问题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作客观细致的分析，不能单就历史资料的记述一概而论。

因受历史条件的制约，中国的统治阶级从本集团的利益出发，曾对外发动过许多次战争，如元朝时对日本的战争，存在着侵略动机，对这样的战争应加以批判和否定。同样，历史上中华民族也对外国侵略中国的战争进行防御和抵抗，如郑成功收复台湾、反对沙俄在东北的侵占等，这些是中国人民抵御外侮的正义之战，应当加以肯定。对于各式各样的战争应作为中外关系史的一部分加以研究。当然，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主流是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族人民的和平友好交往，同时，也必须研究交恶时期的战争关系。此外，即使在战争时期，中外各族之间的交往一般也仍未间断，总以不同的方式（主要在民间）进行着。所以中外关系史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采取全方位，多层次的方法来研究。

最后，在学习和研究中外关系史时，我们应该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外各族，避免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在中外交往中，既要肯定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和影响，也要承认其他国家对中国

影响。任何交流都是双向的。各民族的物质、精神文明是互相滋润的，通过交流达到融合与发展。应该承认，每一个民族对整个世界文明的进步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当然，各个民族由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活动不尽相同，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很大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在经济形态、生活方式、国家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宗教、民俗等方面总会与其他民族有差别。受物质生产水平的影响，文化的发展是由低到高渐进的，在这一进程中，与社会经济形态相适应的文化历史类型也在变化，因而，文化的发展水平有高有低。但是，这种差别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在历史各个阶段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保持绝对的、永远的先进。何况一个民族的文化即使在总体上相对落后，却并不能排斥在某些局部方面是先进的；同样，有些民族的文化从总体来看是先进的，但也不能否认其中仍有落后、愚昧的东西存在。中国的古代文明曾经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它在和其他民族的接触中，通过政治交往、商业贸易、文化交流，把自己的先进文化传播到周围的地区和国家。丝绸、陶瓷、冶铁术、养蚕术、井渠法以及四大发明等等传入中亚，西亚及欧洲，丰富了外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促进其物质和文化产品的发展。而我国也积极地吸收和利用外来文化，从宗教到科学技术，兼收并蓄，结果是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古代文明，从而使之更具活力和影响力。所以，总起来说，没有一个民族不从文明的传播中接受其惠泽。因此，研究中外物质、文化交流史，应持平等态度，否则就有违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则。我们要谨记周恩来总理告诫史学工作者的一段话，他说：我国有的史学家受了封建史学的毒，思想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没有外交观念，把历史上封建统治者对邻国的错误态度作为正面的东西写进了历史，这是错误的，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1978年2月25日《光

明日报》)

上面论述到的几点，是我们在编书工作中考虑和遵循的几条原则，在这里作为提醒读者在学习本课程时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下面简单谈一点学习本课程的意义。

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作为一门研究中国与外部各族物质和文化交流发生发展的专门史，作为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对促进中国古代史的整体考察与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象研究汉代历史而不研究汉代通过丝绸之路与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关系；研究明清史而不研究耶稣会传教士的来华以及西方文化的东渐，都是不全面的。凡是想要全面地研究和掌握中国古代史，就不能忽视这一部分内容。

研究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还具有现实意义，它将为我们的改革开放和外交活动提供借鉴和启迪。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和参加国际交流日益增多的情况下，结合我国目前的状况研究中外关系史，总结一些带规律性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启示我们更好地借鉴和吸收外国的先进事物和科学技术，保持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通过反思，有鉴别地批判民族文化中的糟粕，加强我国人民与世界各族人民的友好交往，为世界人民的和睦团结作出贡献，都有重要的意义。

* * *

关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我国较西方各国要早得多，中国正史中的外国传是最早记录中外交往的典籍，为今人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欧美东方学与汉学的兴起，大致由元代东来西人之游记所引起，而新航路的开辟，资本主义的地理大发现，使欧美对东方的研究逐渐有了兴趣，他们研究的目的之一在于掌握情况，协助统治者制定殖民政策，故不论在研究的态度上或立

论的观点上都明显地带有西方殖民的色彩，这是中西关系史研究的历史烙印。17世纪以后，明末西方传教士的东来，从开始对沿海地区的考察到清初进入内地，传教活动的扩大，传教士寄回欧洲的信函、著述，欧洲在华各教会对总会的会务报告以及商务的、军事的报告等传往欧洲，这样便逐渐扩大了中西交往史的研究范围和影响。因此，从本世纪30年代起，前辈学者们研习这门专史，便习惯地采用了“中西交通史”这一名称。其实从我国学者研究的地域范围和研究的内容来看，名实并不相符，而对于今人来说，继续使用这个名称更容易造成人们的误解，以为“交通史”似应着重在交通运输和通讯邮传方面的研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交通路线只是这门专史研究的一个方面，如果仅仅研究中西交通路线是无法正确反映中外关系的历史全貌和本质的。其次，用“中西交通史”的名称，把地域范围限定在“中”与“西”之间，对于今人来说也容易误解为着重在对今日所指的西方即欧洲方面的研究。事实上，从冯承钧、张星娘、陈垣、向达、方豪等前辈学者的研究情况来看，并不只限于欧洲一隅，而是把中亚、南亚、西亚和非洲一概包括在内，几乎是作全方位的研究。再则，从中西交通史这门专史的英文名称看叫做“The history of Sino-Foreign relations”，直译应是“中外关系史”。因此，为使课程内容与名称更加一致，今天有必要将“中西交通史”正式正名为“中外关系史”。

然而，尽管我们的前辈学者们从30年代起便在这一领域里做了许多拓荒耕耘工作，可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门专史至今仍属历史科学中的一个冷门，人才不多，成果亦少。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难度大，要求高，政治性强，在已往的岁月里还受到许多人为的干扰。因此使许多学者望而却步，建国40年来没有写出一部适应大学历史学科的专史教材。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国家教委为了扶植这一新兴的老学科，于1982年批准由郑鹤声、张维华两位老先生领导，在山东大学成立了中西交通史研究室，几年来，已先后培养出一批研究生。为了补充历史学科中外关系史教学中的教材空白，我们几位年轻教师在张维华先生带领下，接受了教委下达的“七五”规划中编写《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教材的任务。张先生从事中西交通史研究数十年，造诣精深，见解独到。在他的带领和指导下，我们与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有关同志一起合作，提出了教材的大纲，经几次讨论并由张先生修改，按以下分工执笔编写：前言，张志宏；第一至三章，齐涛，马新；第四、五章，马小鹤；第六章1、2节、第七章及第八章的海路交流诸部分，姚大力；第六章3至5节及第八章陆路交流诸部分，魏良骏；第九、第十一章，晁中辰；第十章1、3节，第十二章1节及第十三章，陈尚胜；第十章2、4节及第十二章2、3节，孙西。附录的参考书目录由陈尚胜、张志宏整理提供。

正当我们殚精竭虑投入教材的编写工作时，不幸张老先生溘然长逝，这对于我们编写组来说委实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我们抱着完成张先生未竟事业的愿望，兢兢业业地前后花了二年多时间，完成了编写任务。在整个编写过程中，原编写组成员黄靖在组织力量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后因出国深造，才停止继续从事此项任务。以后由张志宏具体负责组织、联络并主持全书的统稿工作。但是由于我们接触的材料有限，尤其是理论和业务水平不高以及时间上的不甚充裕，教材中定然会有许多错漏不当之处，我们怀着诚恳学习的态度，祈求专家和读者的批评和指正，以便将来有机会再作出进一步的修改和提高。

本书的编写工作至1991年春最后完成。在整个编写过程中，曾得到各位史学前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国内著名学者、中国历

史研究所所长陈高华先生、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王剑英先生在百忙之中为本书作了认真细致的审稿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使书稿的质量有很大提高。山东大学历史系葛懋春先生、蔡凤书先生对本书大纲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季羨林先生为本书封面题写了书名。对以上各位先生给予的关心和支持,编写组全体同志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教材中的部分地图采自《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等著作,谨此致谢。

《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编写组

1988年11月

目 录

第一章 先秦、秦汉时代中外关系的萌生与发展

- 第一节 先秦时代中外关系的萌生**(1)
- 一、早期中外居民的陆上往来(1)
- 中国青铜文化的影响与魅力 春秋攘夷及其影响 斯基泰文化的传入
- 二、早期中外居民的海上往来(4)
- 上古航海的起源与百越部族的对外联系 早期中日海上往来
- 箕子的传说与早期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交往
- 三、早期丝绸贸易与中外居民相互间的认识(5)
- 第二节 中西陆上交通线的开通**(8)
- 一、秦与西汉初年的西部形势(8)
- 秦与西汉初年西域诸国 匈奴的强大及其对西域的控制
- 二、张骞出使西域与陆上交通线的开通(11)
-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 河西走廊的打通 张骞再次出使西域 张骞以后的中西交通
- 第三节 秦汉王朝与葱岭西及南亚地区的交往**(15)
- 一、中亚、西亚诸国(15)
- 大月氏与贵霜王朝 大宛 康居 安息
- 二、大秦与南亚地区(18)
- 大秦 身毒与天竺 缅甸地区
- 第四节 秦汉王朝与海东、南海地区的友好交往**(21)
- 一、朝鲜半岛(21)
- 卫满入朝与两国人员往来 西汉武帝与卫氏朝鲜 辰韩、弁韩、马韩与东汉王朝

二、日本列岛(23)

徐市东渡的传说与秦汉时代的归化人 两汉王朝与日本的交往

三、秦汉与东南亚地区的关系(24)

铜鼓文化的流传与南海洋流 秦汉与越南地区的关系 秦汉与马来
半岛、印尼列岛的交往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外关系的区域性发展

第一节 陆路交通的艰阻与西北游牧民族对中外关系的

影响(28)

一、陆路交通的艰阻(30)

东汉末以来与西域的阻绝 魏晋重开陆路交通的努力 北魏与西域
关系的兴衰

二、西北少数民族与中西交通(31)

挹娄、勿吉以及中原与西伯利亚地区的交往 柔然汗国的扩张与中外交
往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与葱岭西诸国的友好关系(33)

一、中亚地区(33)

大宛与粟特 者舌、悉万斤与柁密 厥哒汗国

二、波斯与大秦(35)

萨珊王朝与南北朝的友好交往 大秦与东吴、西晋的交往 东罗马
与中国北朝的友好往来

三、印度半岛与师子国(37)

笈多王朝 犍陀罗与乌菴国 罽宾与尼婆罗国 师子国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与海东、南海诸国关系的迅速发展(39)

一、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40)

高句丽 百济与新罗 邪马台与大和国

二、南海诸国(42)

占婆国 扶南国 诃罗单、干陀利与婆利国

第三章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第一节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中外贸易往来	(44)
一、中外贸易的主要通道	(45)
西域道 南海道 永昌路 东海路	
二、中外商品的流通	(47)
中国丝织的大量外销 中国纸张与钢铁的外销 毛皮与毛织品的输入 马匹等动物的输入 奇珍异宝的不断输入	
三、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外贸易往来的特点	(51)
第二节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中外科学技术交流	(52)
一、中外经济作物的交流	(53)
中国农作物与种植技术的外传 外来经济作物的输入	
二、中国科学技术的外传	(54)
凿井术与农业灌溉技术 铸铁炼钢术 育蚕与织绸技术 数学、 历法与医学	
三、西方科学技术的东来	(58)
玻璃制造技术 医学及其他	
第三节 中外文化艺术的交流	(60)
一、中国文化艺术的外传	(60)
汉字与汉文学的东渐 中国传统思想的东传 中国建筑与艺术的影响 中国生活方式的影响	
二、西方文化艺术的东渐	(63)
音乐与舞蹈 建筑、绘画与雕塑 语言文字 杂技与其他	
第四节 佛教的输入与传播	(67)
一、佛教的输入与流传	(67)
佛教的输入 佛教在中国北方的迅速流传 东晋南朝君臣的佞佛	
二、中外佛教僧侣的往来	(69)
早期来华僧人及译经 早期中土僧侣的西行取经 法显及其后继者的西行取经 鸠摩罗什等人的东来传译	

三、佛教输入对中国社会的影响……………(73)

佛教的中国化趋势 南北朝的反佛与灭佛 佛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第四章 隋唐五代中外关系的迅速发展与收缩

第一节 边疆各族与中外关系……………(77)

一、突厥汗国与中亚、波斯、拜占廷……………(77)

突厥破柔然 突厥与波斯瓜分嚙哒 突厥与萨珊波斯 突厥与拜占廷 突厥与隋、唐

二、后突厥、突骑施与中亚、大食……………(83)

后突厥西征中亚 突骑施与大食

三、吐蕃、南诏、渤海对中外交通的影响……………(85)

吐蕃与南亚、中亚、大食 南诏与东南亚 渤海与对外关系

第二节 隋唐与西域诸国的关系……………(88)

一、中亚……………(88)

隋朝韦节、杜行满出使 唐朝裴寄生、王名远设羁糜府州 诸国请唐援助以抗大食 唐朝在中亚封王

二、波斯……………(94)

隋唐与波斯的通使 卑路斯 泥涅师

三、南亚……………(96)

戒日王与唐通使 唐朝李义表、王玄策出使 诸国受唐册封以抗大食

四、大食……………(98)

唐与白衣大食 怛逻斯之战 唐与黑衣大食

五、拂菻……………(101)

唐与拂菻

第三节 隋唐五代与朝鲜、日本的关系……………(102)

一、隋朝与高句丽、百济、新罗……………(102)

隋文帝征高句丽 隋炀帝三征高句丽 隋与百济、新罗

二、唐朝与高句丽、百济、新罗……………(104)

唐太宗征高句丽	唐高宗灭百济	唐高宗灭高句丽	唐与新罗	
三、五代十国与新罗、后高丽				(107)
后唐与新罗				五代十国与后高丽
四、隋唐五代对日关系				(108)
遣隋使				遣唐使
前期遣唐使				唐日白江口之战
后期遣唐使				吴越与日本
第四节 隋唐五代与海南诸国的关系				(113)
一、安南				(113)
隋灭万春国				唐置安南都护府
南汉攻灭曲氏				南汉与吴朝、丁朝
二、其他中南半岛国家				(115)
占婆				真腊
骠国和堕罗钵底				赤土和盘盘、丹丹
三、海岛诸国				(117)
何陵				室利佛逝
婆利、殊禁、甘棠				

第五章 隋唐五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第一节 丝绸之路	(119)
一、交通路线与主要城市	(119)
裴矩所记之路线	贾耽所记之七道
长安	敦煌
广州	
二、陆道贸易	(127)
丝路	银道
胡商、珠宝与铜镜	绢马贸易
三、海道贸易	(131)
陶瓷	海舶
市舶使	
四、侨民	(134)
昭武九姓	波斯人、大食人、天竺人
新罗坊、日本人与昆仑奴	
侨民的管理	
第二节 佛教与汉文化的影响	(138)
一、译经师的东来	(138)
隋代译经师	唐代前期译经师
开元三大士与后期译经师	

二、求法僧的西行.....	(140)
玄奘 义净 慧超与悟空	
三、佛教东传.....	(144)
鉴真 入唐学问僧	
四、隋唐佛教诸宗的外传.....	(145)
三论宗 天台宗 法相宗 华严宗 律宗与净土宗 禅宗	
密宗	
五、边地佛教.....	(143)
吐蕃佛教 西域佛教	
六、佛教空前巨大的影响.....	(150)
佛教对中国的影响 东亚佛教圈的形成	
七、汉文化的对外影响.....	(151)
汉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汉文化对朝鲜、安南的影响 大食、拂菻对	
中国的了解	
第三节 西亚、中亚文化与宗教的影响.....	(154)
一、粟特文化对突厥、回鹘的影响.....	(154)
粟特人与突厥 粟特人与回鹘	
二、拜火教.....	(156)
隋以前拜火教的传入 隋以后拜火教的流传	
三、景教.....	(157)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景教经典及景教遭禁	
四、摩尼教.....	(159)
摩尼教传入汉地 摩尼教与回鹘	
五、伊斯兰教.....	(161)
第四节 科学技术的交流.....	(162)
一、天文与数学.....	(162)
天文 占星术 数学	
二、炼丹术与医药.....	(164)
炼丹术 医药	

三、技术交流	(167)
纸的外传 造纸术传播 制糖法 建筑	
第五节 艺术交流	(170)
一、佛教美术	(170)
西域佛教美术 中原佛教美术 龙门、敦煌、吐鲁番 朝鲜、日本	
二、其他美术	(175)
波斯美术 其他外来宗教美术	
三、音乐、舞蹈及娱乐	(176)
乐器与乐人 苏祇婆七调 燕乐 健舞与软舞 百戏、幻术与娱乐	
 第六章 宋、辽、金、喀拉汗及西辽等王朝的对外关系 	
第一节 10至13世纪的中国形势	(181)
一、北方的割据局面及其对辽、金、宋诸国的对外关系的影响	(181)
辽、金对漠北控制的加强 漠北草原路概况 宋代海路交通的发达	
二、喀喇汗王朝	(185)
回鹘西迁 喀喇汗王朝的建立 分为东西两王朝	
三、西辽帝国	(186)
耶律大石西征 西辽帝国的形成	
四、大理和吐蕃与西邻各国的关系概述	(188)
大理国 吐蕃	
第二节 宋朝与亚洲各邻邦的关系	(191)
一、与高丽、日本的关系	(191)
高丽 日本	
二、与东南亚诸国的交往	(193)
安南 占城 真腊、罗斛 三佛齐 阇婆 勃泥、蒲端 蒲甘	
三、与南亚和西亚国家的关系	(197)

注鞞 天竺 大食 层楛 拂菻

第三节 辽、金与高丽、日本、波斯、大食的关系(199)

一、辽、金与高丽的关系(199)

辽与高丽的关系 金与高丽的关系

二、辽朝与日本的关系(200)

三、辽朝与波斯、大食的交往(201)

第四节 喀喇汗王朝与中亚诸王朝的和战(201)

一、与萨曼王朝的关系(201)

与萨曼王朝的战争 归并河中地区

二、与哥疾宁王朝的和战(202)

哥疾宁王朝的兴起 与哥疾宁王朝的战和

三、与塞尔柱王朝的关系(204)

与塞尔柱王朝争夺河中 沦为塞尔柱王朝的附庸

四、与花拉子模的关系(205)

与马蒙王朝的关系 与花拉子模突厥王朝的关系 花拉子模归并西

部喀喇汗国

第五节 西辽王朝与中亚诸王朝的关系(206)

一、与塞尔柱王朝会战、归并河中(206)

向西扩展，占领忽毡 与塞尔柱王朝会战

二、与古儿王朝的战争(207)

古儿王朝的对外扩展，西辽与古儿的战争 支持花拉子模，战败古儿

王朝

三、与花拉子模的关系(208)

降服花拉子模 花拉子模独立，怛逻斯河会战

第七章 元代对外关系的高度发达

第一节 蒙古西征(212)

一、蒙古西征前的亚洲大陆(212)

黑衣大食 基督教势力 印度 康熙及其西邻 花拉子模	
二、成吉思汗西征.....	(214)
征服河中 进兵呼罗珊和哥疾宁 哲别远征 成吉思汗班师	
三、拔都西征.....	(217)
窝阔台时期的波斯 灭不里阿耳国 征服钦察 征服俄罗斯各公 国 兵侵孛烈儿、马札儿	
四、旭烈兀西征.....	(220)
平灭木剌夷 灭黑衣大食 大马士革得而复失	
第二节 元朝与钦察汗国、伊利汗国的关系.....	(222)
一、与钦察汗国的关系.....	(222)
钦察汗国的独立 钦察诸汗与忽必烈朝的疏远 钦察汗重新“附顺” 元朝	
二、与伊利汗国的关系.....	(225)
伊利汗国的形成 元与伊利汗政府的外交关系	
三、与察合台后王的关系.....	(228)
第三节 与亚洲及非洲各国的关系.....	(229)
一、与高丽、日本的政治关系.....	(229)
高丽 日本	
二、与南海诸国的通使和战争.....	(231)
安南 占城 真腊 暹、罗斛 麻里予儿 爪哇	
三、与缅甸和印度的关系.....	(235)
缅甸 元与印度的通使 德里王朝与察合台后王的战争	
四、与非洲国家的交往.....	(237)
密昔儿 吊吉而 马合答束	
第四节 与欧洲基督教世界的联系.....	(238)
一、蒙古国时期西欧教士的东行.....	(238)
普兰诺·卡尔毕尼出使贵由汗庭 鲁布鲁克访问蒙哥汗庭	
二、马可波罗在中国.....	(240)
尼哥罗兄弟的中国之行 马可波罗来华 留居中国17年	

三、列班扫马出使欧洲	(241)
西行朝圣 西欧之行	
四、天主教士的东来	(242)
孟特哥维诺 鄂多力克 马黎诺里	

第八章 宋元时期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

第一节 中外贸易的发展	(245)
一、北宋、喀喇汗朝及元朝与西部各国的陆上贸易	(245)
北宋与西方的陆路贸易 喀喇汗朝与邻国的贸易往来 元朝同西方 的陆上经济交流	
二、宋元与西方国家的海路贸易	(247)
宋元政府对海路贸易的重视 管理机构 海上商业交往的范围	
三、与日本、高丽的商业往来	(251)
两宋与日本的贸易 日、元间的商业交往 辽、金与高丽的贸易 宋与高丽的贸易往来 元与高丽的贸易	
第二节 禅宗、儒学及中国制度文化的向外传播	(254)
一、对高丽的影响	(254)
官制 其他仪文法度	
二、禅宗东传日本	(255)
南宋时代 元代	
三、对交趾的影响	(256)
四、蒙元制度文化的西传	(257)
对伊利汗国的影响 对钦察汗国的影响	
第三节 西方宗教在中国的传播	(259)
一、伊斯兰教的传入及其影响	(259)
传入喀喇汗朝 西辽时期的伊斯兰教 宋元时代的伊斯兰教和回回 人	
二、基督教及其他宗教的传播	(262)
基督教再次传入中国内地 犹太教的东传 宋元摩尼教的活动	

中外佛教的交流

第四节 科学技术的交流(264)

一、中国科学技术的外传(264)

印刷术 火药和管形火器 罗盘针 药物 天文历算 棉纺
技术

二、西方科学技术的东传(267)

天文历算 数学 医术、回回炮术及其他

第九章 明代对外关系

第一节 对外政策及明初与帖木儿帝国的关系(271)

一、明初的睦邻政策(271)

二、海禁政策的确立及其演变(272)

明初实行海禁的原因 海禁的实施 永乐年间对海外朝贡国家实行
较为开放的政策 隆庆部分开放海禁

三、明初与帖木儿帝国的关系(277)

帖木儿帝国的兴起 向明王朝“纳贡称臣” 帖木儿称兵东犯
重归于好 陈诚出使

第二节 郑和下西洋(280)

一、郑和下西洋的背景和目的(280)

历史背景 下西洋的目的

二、郑和下西洋的经过(284)

郑和下西洋前期 郑和下西洋后期 郑和下西洋的尾声

三、郑和下西洋的成就和影响(291)

亚非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加强 亚非人民友好相处的榜样 促进
亚非国家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第三节 明代与安南和东亚诸国的关系(296)

一、与安南的关系(296)

与安南的友好交往 明成祖对安南的征服 黎利领导的反明独立战争

二、与朝鲜和琉球的关系(299)

朝鲜 琉球

三、与日本的关系(300)

中日两国的友好交往 明初的倭寇问题 嘉靖的“倭患” 万历年间的援朝抗倭

第四节 明中期以后与西方的关系(306)

一、明中期以后世界形势的变化(306)

新航路的开辟 殖民者东来

二、与葡萄牙的关系(308)

初通中国 中葡冲突 侵占澳门

三、与西班牙的关系(312)

四、与荷兰的关系(314)

早期交往 侵占澎湖 侵占台湾

第十章 清代对外关系的扩大和变化

第一节 清朝与周边邻国的关系(317)

一、清朝与东亚诸国的关系(317)

入关后的后金政权与朝鲜 清与朝鲜友好关系的发展 清与琉球的友好关系 清朝与日本

二、清越和战(320)

清前期与安南的关系 乾隆安南之役 阮氏越南与清朝的关系

三、清朝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关系(322)

清缅和战 清朝与南掌的往来 清暹友好关系的发展 清与苏禄的交往

四、清朝与南亚、中亚和西亚邻国的关系(326)

清兵反击廓尔喀 清与浩罕关系的变化 清朝与阿富汗地区的联系

第二节 鸦片战争前的中俄关系(328)

一、清初中俄冲突(328)

中俄两国的早期交往 顺治年间沙俄侵入黑龙江地区 清初两次来华使节 康熙初年的中俄外交关系 雅克萨之战 中俄《尼布

《尼布楚条约》的缔结	义杰斯使华	准部叛乱与中俄关系	
二、清中叶的中俄关系			(337)
土尔扈特西迁与图理琛出使	伊兹玛依诺夫出使中国	中俄《恰克图条约》	
中国使团两次赴俄	土尔扈特回归祖国		
三、中俄贸易关系			(341)
中俄贸易的发展	《恰克图条约》签订后的中俄贸易	乾隆中三次停市	
四、中俄宗教、文化关系			(343)
东正教会的建立	俄国传教士团来华	清代俄国留学生	东正教会在中国的活动
第三节 清朝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346)
一、清朝与荷兰关系			(346)
郑成功收复台湾	清荷关系		
二、清朝与英国关系			(348)
中英早期接触	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国	马戛尔尼使华	澳门事件
三、清朝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			(352)
法国与清朝关系	早期中德关系	早期中美关系	清朝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
清政府对澳门的管理			
四、朝贡体制与中西关系			(355)
朝贡体制的外交模式	明清王朝对西方知识的缺乏	清朝对西方的反应	
第四节 西方传教士在华的传教活动			(359)
一、16世纪耶稣会士来华			(359)
耶稣会士来中国	耶稣会决心改变传统传教政策	罗明坚到肇庆传教	利玛窦的知识传教法
二、天主教在华传教的兴盛时期			(362)
耶稣会士在北京传教	汤若望的传教活动	杨光先事件	南怀仁与康熙
法国耶稣会士来华	各省教会的建立		
三、礼仪之争			(368)
礼仪之争产生的背景	关于中国礼仪的前期争论	其他会派参加争	

论 康熙与罗马教皇的较量 礼仪之争的结束 深远的影响	
四、传教活动的衰落时期	(372)
雍正禁教 教皇解散耶稣会 明清传教士活动的作用和影响	

第十一章 华侨——中外友谊的桥梁

第一节 华侨出国历史概观	(375)
一、明代以前的海外移民	(375)
一个久远的历史现象 唐代的海外华侨 宋元时期华侨的增多	
二、明代海禁开放前的华侨	(379)
明初南洋一带华侨的增加 郑和下西洋后的华侨出国 明中期南洋 华侨的激增 隆庆开放前华侨的特点	
三、隆庆开放至鸦片战争前的华侨	(383)
隆庆开放后华侨的激增 抗清势力余部散居海外各地 西方殖民者 在中国掠卖华工 隆庆开放至鸦片战争前华侨的特点	
四、明清统治者对华侨的态度	(389)
明代封建统治者对华侨的态度 清代封建统治者对华侨的态度	
第二节 华侨对侨居地的贡献	(391)
一、华侨在经济上的贡献	(392)
农业 工矿业 商业	
二、华侨在文化上的贡献	(397)
先进技术的传播 学术文化的传播	
三、华侨和当地人民一起抗击西方殖民者的斗争	(399)
林凤和吕宋人民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斗争 潘和五起义 对吕宋华 侨的第一次大屠杀和华侨的英勇反抗 明清之际西班牙殖民者对 吕宋华侨的多次屠杀 荷兰殖民者对华侨的严酷统治 红溪惨 案	

第十二章 明清时期中外文化交流

第一节 明清时期中国与亚洲国家的文化交流	(408)
----------------------------	-------

一、科学技术的交流	(408)
农业技术 手工业技术 医学交流 天文数学	
二、学术交流及其影响	(412)
朱舜水与日本学术 中朝学术交流的繁荣 越南学术的中国影响	
四夷馆与《华夷译语》 中国书籍的对外交流	
三、文学艺术交流及其影响	(415)
明清小说在亚洲 日、朝、越汉文学创作的繁荣 戏剧 音乐	
书法、绘画	
四、社会生活	(420)
日本禅宗与隐元隆崎 服装与饮食 官室建筑	
第二节 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	(422)
一、17、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	(422)
中国文化大量西传 欧洲出现“中国热” 洛可可艺术 中国园林之风行	
二、中国思想对西方的影响	(425)
1. “百科全书派”宣传中国思想	(425)
“百科全书派”宣传中国思想 霍尔巴赫论“德治” 孟德斯鸠与《论法的精神》 伏尔泰对中国的极端赞美	
2. 中国经济思想与重农学派	(428)
重农学派的基本政策 魁奈——欧洲的孔子 杜尔阁的经济改革	
3. 中国哲学思想在西方	(431)
孔子与儒教 莱布尼茨与易经 崇尚老子哲学的托尔斯泰	
三、中国文官制及文学对西方的影响	(434)
西方各国争相建立文官制 中国文学对西方的影响	
第三节 西学东渐及其影响	(436)
一、西方天文、历法知识的东传	(436)
传教士介绍西方天文、历法 明廷设历局修历 传教士供职钦天监	
天文仪器的制造 传教士对中国天文学的贡献	
二、数学、地理学知识东传	(441)

传教士对西方数学东传的贡献	西方地理知识东传	西方测绘学的传入	
三、西方物理、机械、兵器的传入			(444)
《远西奇器图说》	西方水利学的传入	西方钟表制造术的传入	
“佛郎机”传入中国	《火攻挈要》与《神威图说》		
四、西方生物、医学、建筑、绘画、音乐、语言、哲学思想的东传			(447)
生物学著作的翻译与研究	西医、西药的传入	西方建筑形式传入中国	
西方绘画艺术的传入	西乐传入中国	语言学的交流	
西方哲学思想的传入			

第十三章 明清时期中外经济交流

第一节 中外经济交流状况	(454)			
一、中外交通路线的变化与发展	(454)			
中国对外贸易港口的变化	太平洋航线的发展	印度洋航线的扩伸		
陆上交通线的变化				
二、中外经济交流的曲折发展	(458)			
“朝贡贸易”的衰落	西方对华贸易的扩大	中国商民出海贸易的艰辛发展		
三、中外贸易管理体制的变化	(461)			
明代市舶司制度的变化	明后期漳州督饷馆	清代海关	清代行商制度	京师会同馆
第二节 明清时期中外经济交流的影响	(465)			
一、中国物品对外国的影响	(465)			
丝绸	陶瓷	棉布	茶叶	中国物品与世界市场
二、海外作物的输入及其影响	(470)			
粮食作物：玉米和番薯	经济作物：烟草与花生	果菜作物：马铃薯、辣椒、番茄等		
三、海外贸易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473)			

海外物品与中国社会生活	白银的输入及其影响	关税收入与政府
财政	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成分的出现	
四、鸦片战争对中外关系的影响		(477)
鸦片贸易与走私	鸦片贸易对中外的不同影响	鸦片战争与中外关
系的改变		
附录 主要参考书目		(481)

第一章 先秦、秦汉时代中外关系的萌生与发展

先秦、秦汉时代，是中国国家的形成与发展阶段，也是中外关系的萌生与发展阶段。在秦统一前的漫长岁月里，由于地理、交通以及经济发展的种种限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往往通过众多的中间环节层层延伸。而且，这种交往本身也不一定是人们有目的的主观要求的实施，交往的主要内容则多囿于民间往来。中国与外部世界尚未建立起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这是中外关系史的萌生阶段。秦汉王朝建立后，随着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发展，西通西域，南入南海，东连海东，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起日益频繁的交往与联系，中外关系进入到初步发展时期。

● 第一节 先秦时代中外关系的萌生

中国的先秦时代，世界各国，各部族间存在着较多的中间地带，其交往过程呈现出间接性与偶发性两大特点。与之相联系，则是中外相互间的认识十分模糊。至秦统一前，西方文献中尚无准确的有关中国的记载，而中国文献中对外部世界的记述也多流于传闻与臆测。

一、早期中外居民的陆上往来

【中国青铜文化的影响与魅力】 远在石器时代，中外居民就间接地产生了一些接触与影响。中国国家建立后，这种联系与影响得以增强，中国青铜文化与外部世界的交融吐露出中外关

系史的初曙。

中国商王朝时代，经济与文化都取得较大进步，成为古代世界的文明中心之一。青铜冶炼技术与青铜器制造工艺的高度发展是其重要特色。无论是铸造工艺还是形制造型都远居于周边地区之上，对外部世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向东北方影响到了朝鲜半岛与西伯利亚，西北方向的影响更远至伏尔加河流域。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以及苏联境内的外贝加尔湖地区、叶尼塞河流域的卡马河沿岸发现的青铜文化中都可以找到中国青铜文化的痕迹。在苏联外贝加尔湖地区发现的卡拉索克文化遗物中，出土了陶鼎和陶鬲，多达三十余件，与安阳商文化器形几乎完全一样，与这些鼎、鬲同时出土的器物，有卡拉索克文化中最典型的品物——青铜刀和半圆形装饰品，由这些标本中，可以看到中国青铜文化影响的痕迹。在叶尼塞河流域的卡拉索克文化遗物中，受中国青铜文化影响的痕迹就更重了，其中的青铜刀与弓形器与安阳出土物的形制完全一致，还有一种青铜矛与青铜镞，也和安阳的材料相同，只不过矛的箝部只一侧有环，而安阳出土的是两侧都有环。中国青铜文化外传的同时，外部世界的一些文化如塞伊姆文化等也对 中国青铜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安阳遗址中出土的青铜矛、柄端饰有野马的刀、空釜斧等就与伏尔加地区发现的属于塞伊姆文化的同类器物比较接近，其不同处是较微小的，如塞伊姆文化的青铜刀柄端的装饰是整匹野马，而商代青铜刀柄端的装饰是马头；塞伊姆文化空釜斧的纹饰较简单，而商代铜斧上则是饕餮纹等。塞伊姆文化大约处于公元前16世纪，略早于处在公元前14—11世纪的安阳文化，因此，可以认为安阳文化中的某些青铜器物受到了塞伊姆文化的一定影响。^①

^① 参见 C. B. 吉谢列夫：《苏联境内青铜文化与中国商文化的关系》，《考古》1960年第2期。

【春秋攘夷及其影响】 有史以来，中国的北部与西北部一直分布着众多的游牧民族。至春秋时代，以中原为中心，北方有北戎、北狄；西方有大戎、小戎、骠戎、犬戎、姜戎、茅戎，又有白狄、赤狄等部族，其势力不断向内地发展，与中原的春秋诸国产生了比较频繁的联系与接触。在春秋诸强争霸中，齐、晋等国纷纷打起“尊王攘夷”的旗号，向戎、狄部族展开攻势，齐桓公曾联合燕国打败山戎（北戎一支），又纠合宋、曹等国制止了北狄的南下。晋献公也先后战胜骠戎，北狄。秦穆公乘戎族“莫能相一”的有利形势，进军戎地，“益国十二，开地千里。”^①这场攘夷运动使春秋时代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大迁徙，大交流。一部分游牧部族移居内地，密切了华夏族与其它各族经济文化的联系，也有一部分戎、狄部族势力西移，带动了欧亚草原上众多的游牧民族相继移动，促进了各部族间的交往与联系，也给西方亚述帝国带来沉重压力。

【斯基泰文化的传人】 上古时代，在欧亚大陆的农业文明之间，分布着幅员广阔的草原文明与游牧民族。公元前8到4世纪活跃于黑海北岸以至西伯利亚的斯基泰人即是重要的一支。斯基泰人分布广泛，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受到亚述文化，古伊兰文化，古希腊文化以及殷商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斯基泰文化。这一文化又通过中国北方的匈奴等游牧民族传入中国内地，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实际上就是间接由匈奴接受了斯基泰文化的影响。斯基泰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动物纹艺术也由匈奴传入中国内地。如服饰中的带钩，本非我国所有，内蒙古地区已出土有春秋时代的动物纹带钩，与传世的斯基泰带钩十分相象。至战国时代，动物纹带钩的分布已十

^① 《史记》卷五《秦本纪》。

分广泛^①，山西长治与侯马战国墓葬以及南方的楚墓中均有较多的动物纹带钩出土。中国文献中关于带钩的记述也日渐丰富。不过，带钩与动物纹艺术在这一时代已具备了浓郁的中国风格，汇入至中国古典文化的大潮中。

二、早期中外居民的海上往来

【上古航海的起源与百越部族的对外联系】 我国有漫长的海岸线，远古居民早在石器时代就开始了“剡木为舟，剡木为楫”，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就有船桨出土。百越地区（今中国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暨越南北部）是上古时代东方的航海重心。百越居民“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可北抵燕、齐之地。公元前468年，越王勾践灭吴后曾率“死士八千，戈船三百”由会稽迁都琅琊，更取得与海外交通的方便。百越新石器时代的特型器物有段石铤广泛分布于东南亚及南太平洋诸岛。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越王曾向北方的魏国献犀角，象齿等物品，这些物品很可能是东南亚转运而来。至秦统一时，百越地区已成为海外“犀角、象齿、翡翠”的重要转输地，这表明百越地区与海外的联系与交往已比较频繁。另外，中国远古居民还零星星地由海上漂泊至冲绳、日本列岛以及更遥远的美洲大陆。

【早期中日海上往来】 日本在大理冰期时代（约10万—1.2万年前）基本上与东亚大陆连为一体，居民与动物均可自由移动。日本旧石器的许多特征与中国大陆的旧石器十分相近，如山西许家窑旧石器晚期的狩猎手球，在日本鹿儿岛遗址中也有发现。大理冰期结束后（约1.2万年前），日本成为列岛，它与中

^① 参见萧兵：《犀比、鲜卑、西伯利亚》，载《人文杂志》1981年第1期。

国大陆之间逐渐产生了海上交往，《国语·齐语》中就有“倭人贡鬯”的记载，其中最典型的是中国稻作技术的东传。日本本无野生稻，但在绳纹时代却出现了经过改良的短粒稻，绳纹晚期至弥生时代出土的摘稻石刀与中国华北等地所出石刀形制十分相近，日本的稻作技术及稻种应是由中国华北，或由华东经台湾、冲绳传入。

【箕子的传说与早期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交往】 中国、朝鲜同处亚洲大陆，既有便利的陆路交通，又有近捷的海上通道。远在文献记载前，中国居民已与朝鲜居民发生了接触与来往，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都发现有相同类型的石棚就是最好的说明。史籍上讲西周武王克殷后曾“封箕子于朝鲜”。^①箕子至朝鲜“教其民以礼义”。^②当时与朝鲜半岛的交往主要有二条路线，一条是陆路，由华北过辽宁、吉林入平安北道和咸镜北道地区；一条是水路，由山东半岛抵辽东再沿海岸至朝鲜西北海岸，或直接渡海至朝鲜。中国的农业文明与青铜文化就是缘此两途陆续传入朝鲜，尤其是秦始皇兼并六国时期，又有大量的燕、齐居民不断迁入朝鲜，直接促进了两地经济、文化联系的发展。

三、早期丝绸贸易与中外居民相互间的认识

我国是最早发明养蚕织丝的国家，现已发现的最早的丝织品实物是五千多年前的浙江钱山漾出土的残绢片。从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可知，商代已发明简单的提花装置，可以织出绮、纱、罗纹组织的高级织物；到周代，锦、绣、罗、纨、绮，黻等织物均已出现；春秋战国时代，丝织业得以进一步发展。因此，早在先

^① 《史记》卷三八《宋微子世家》。

^②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秦时代，丝织贸易就构成当时中外交流的重要内容。

公元前5世纪，中国丝绸已传入前苏联阿尔泰地区。位于阿尔泰山北麓的巴泽雷克古墓群中（前苏联戈尔诺阿尔泰山乌拉干区乌拉干河畔），不少巨墓都有中国织物出土，其中“有用大量的捻股细线织成的普通平纹织物，这类织物，有小块的、也有整幅的（铺盖在皮衣服的上面）”^①出土丝织品不仅数量多，而且品种也多。如第3号墓出土有用红绿两种纬线斜纹显花的织锦；第5号墓出土一华丽的丝绸，上以彩色丝线绣有开着花朵的树枝，神鸟凤凰飞舞其间，质地和构图都非常精致高雅。

在西亚地区，公元前6世纪中叶兴起的波斯帝国，经数十年的征伐，其国境东达帕米尔高原，西至小亚细亚，地中海东岸。大流士（前521—485年）修筑了从小亚细亚沿岸至帝国首都苏撒的“王道”及其它许多驿道，这对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必然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也为中国丝绸的西传打开方便之门。据说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中国产的丝已见于波斯的市场。^②“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前484—425年）以及另一位希腊史学家塞诺芬（公元前430—354年）都多次提到帕提亚（古波斯）人穿着米底亚式衣裳（Medic dress）。普罗科匹厄斯（公元500—565年）解释说：“这种东西是指古希腊惯用来叫做 Medic 长上衣的绢，如今他们叫 Serie（赛里斯）”^③。由此看来，此时丝织品已经传到了西亚。

在南亚地区，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东征时曾侵入印度，公元前327年渡印度河，次年，其部将乃阿尔科斯在印度旁遮普地方，见到了又轻又软的绢，他误认为这是用印度所产的一种树

① 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② 王治来：《中亚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7页。

③ 理查德·吉斯拉：《希腊的丝绸》载《美国考古杂志》1929年33期第33页。

皮制成的。^①当时印度尚不产绢，乃阿尔科斯所见应是自中国传入的。另外，在公元前4世纪腓力所著的《治国安邦术》一书中，也曾提及中国的丝织品。可见中国丝织品在公元前4世纪前后已流传于印度。

在欧洲地区，早在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古典著作中，已见赛里斯之名。西德考古学家在西德南部斯图加特的霍克杜夫村，发掘一公元前五百多年的古墓，在墓中人体骨骼上发现有中国丝绸的残片^②。此外，克里米亚半岛的刻赤附近也有公元前3世纪左右中国丝绸出土。

以上都表明先秦时代中外丝绸贸易的初步发达。这一时代的中外居民也主要通过这种交往与联系，开始了相互间的认识与了解。外部世界的人们大多是先由丝绸进而了解中国人。古希腊的许多史学家、诗人如希罗多德，阿里斯托芬，亚里士多德都提到或描述过丝绸与蚕绢。希罗多德《历史》一书中出现的伊塞顿（Issedon）人就居住在楼兰和敦煌一带的地方，这表明它对中国的西北部已经有了较清楚的认识^③。与此同时，中国先秦时代的居民对外部世界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与认识，《穆天子传》中既记载了周穆王携带大量绵组西行的故事，也包括了人们对当时的中亚与西亚的认识与了解。其它如《吕氏春秋·古乐篇》以及《逸周书·王会解》等先秦典籍中，也出现了对西部的一些认识，大夏、月氏已见于记载。不过在这一时期，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相互间的认识与了解还十分有限，神话和荒诞的成分还占有很大比重。比如，克泰夏斯（Ctesias）所描绘的赛里斯人“男

① 麦及达：《关于印度加尔各答的古代记载》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252—253页。

② 美国《地理杂志》1980年3月号。转引自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29页。

③ 参见孙培良：《斯基泰贸易之路和古代中亚的传说》刊《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一辑。

高十三骨尺（中指之端至肘为一骨尺），寿逾二百岁。”^① 中国人对西部世界西王母的记述则是：“其状如人，豹尾虎齿。”^② 这种讹传与误解是文化交流中的自然现象，中外居民相互间认识的加深，有待于双方联系与交往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节 中西陆上交通线的开通

西汉武帝以前，中西经由西北陆路的交往已经萌生，中国丝绸的外传，西方珍异的东来多本此路。但这一时期的西北陆路小国林立，部族众多，又加以匈奴的控制，十分艰险，还未形成一条畅通的交通线。至西汉武帝时代，由于张骞的西行以及西汉王朝对河西走廊与西域的控制，使西北陆路出现了若干条交通干线，对以后历史上的中外交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秦与西汉初年的西部形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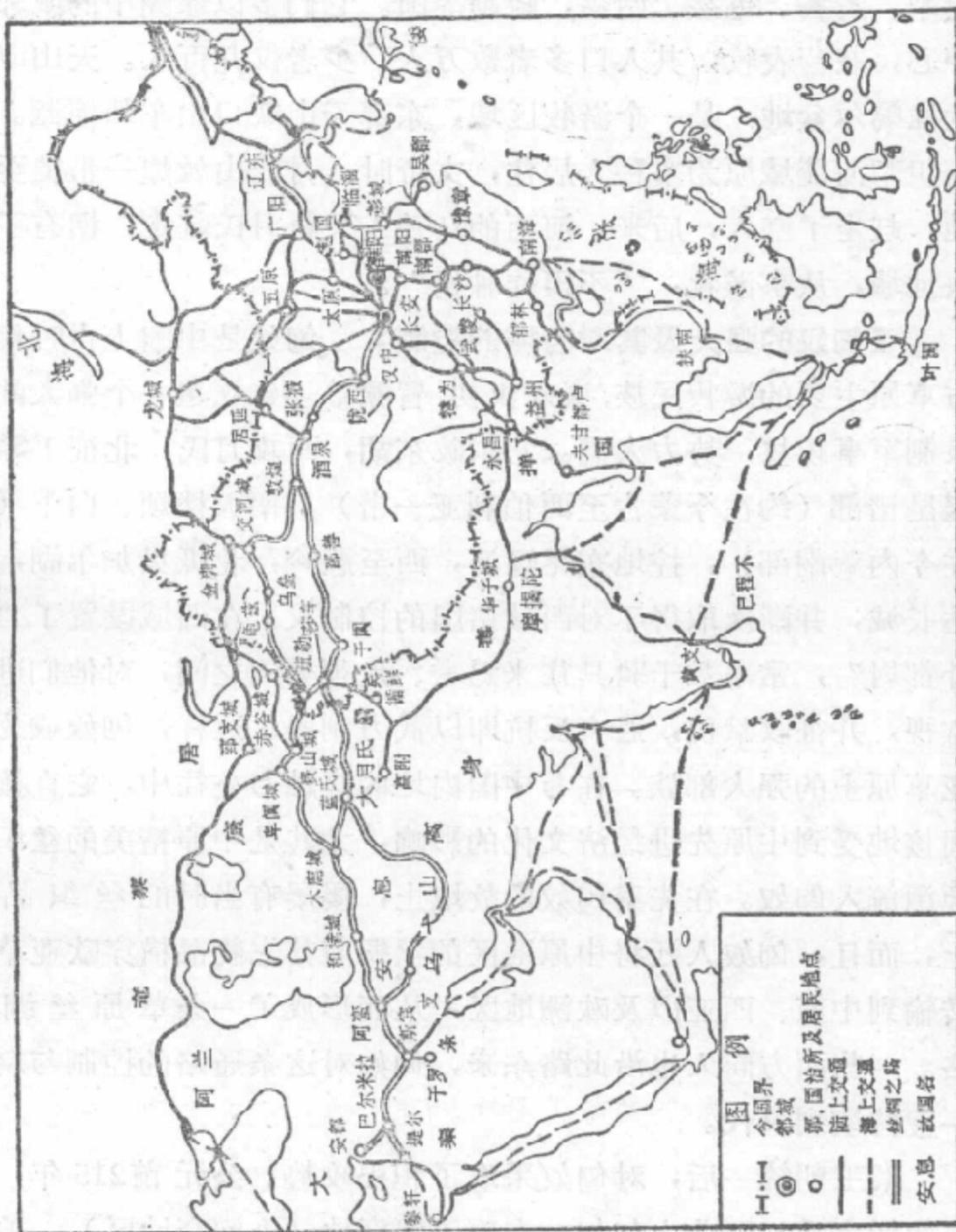
【秦与西汉初年西域诸国】 阳关，玉门关以西的广大地区，我国古代统称西域。狭义上的西域指葱岭以东，天山南北路地区。广义上的西域则泛指敦煌以西，包括中亚细亚、印度、伊朗高原及阿拉伯半岛，小亚细亚乃至更西的地区。本书中的西域采用前一种意义。西域是古代中国与西方世界陆上交往的必由之路。

秦与西汉初年，封建王朝刚确立不久，尚无力顾及西方边陲，而这时希腊帝国已经瓦解，罗马帝国的势力也还未达到东方，因此这一时期的西域及西部地区小国林立。至西汉初年，西

^①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17页。

^② 《山海经·西山经》。

汉代中外交通示意图



域范围内约有36国，大多数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的绿洲上。南缘有楼兰、鄯善、且末、于阗，莎车等国；北缘有尉犁、焉耆、龟兹、姑墨，疏勒等国。它们多以绿洲中的城郭为中心，兼营农牧，其人口多者数万人，少者仅几百人。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是一个游牧区域，东部天山缺口由车师控制。西部伊犁河流域原为塞种人居住，文帝时，月氏由敦煌一带徙至此地，赶走了塞人，后来，河西的乌孙人又将月氏赶走，据有了这块地域，从事游牧，“不田作种树”。

【匈奴的强大及其对西域的控制】 匈奴是中国上古时代北方草原主要的游牧民族，秦末汉初，冒顿单于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军事政权，势力大盛。它东破东胡，西攻月氏，北征丁零、坚昆诸部（约在今蒙古至西伯利亚一带），南灭楼烦、白羊（约在今内蒙南部），控地东尽辽河，西至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并渐次取得了对西域诸国的控制权。在西域设置了“僮仆都尉”，常率数千骑具往来焉耆、危须等国之间，对他们进行监视，并征收赋税，遇有反抗即以武力制服。这样，匈奴成为欧亚草原上的强大部族。在与中国内地的接触与交往中，它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尤其是中原精美的丝织品源源流入匈奴。在先秦匈奴的故地上，屡屡有当时的丝织品出土，而且，匈奴人还将中原地区的丝绸与其它物品横穿欧亚草原转输到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地区，从而形成了一条草原丝绸之路。一些西方商人也沿此路东来，匈奴对这条通路的控制与利用一直持续到汉代。

秦王朝统一后，对匈奴采取了积极攻势。公元前215年，大将蒙恬率兵30万北击匈奴，夺取了河南地（今河套地区），追匈奴北却七百里，由于此时的秦王朝正忙于对东南的统一战争，加之修驰道，筑长城，建阿房宫，殚尽国力，无暇西顾，因此其势

力西止于临洮（今甘肃岷县），未与西域诸国发生直接联系。不过，这一时期，秦王朝与西域各国及匈奴的民间交往还是比较频繁，中原文化不断传入河套、河西及天山以北地区。秦汉之际，匈奴势力复盛，重新据有了河套地区，并屡屡南下。西汉高祖刘邦在公元前201年率30万众迎击匈奴，被困于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后通过向单于阏氏行贿方得脱险。此后，由于西汉国力有限，急需安定内部，休养生息，采纳了娄敬的和亲建议，把汉宗室公主嫁给单于，约为兄弟。此后，至汉武帝以前，西汉王朝一直奉行这一政策，不过匈奴骑兵仍不时南下，有时甚至逼近京城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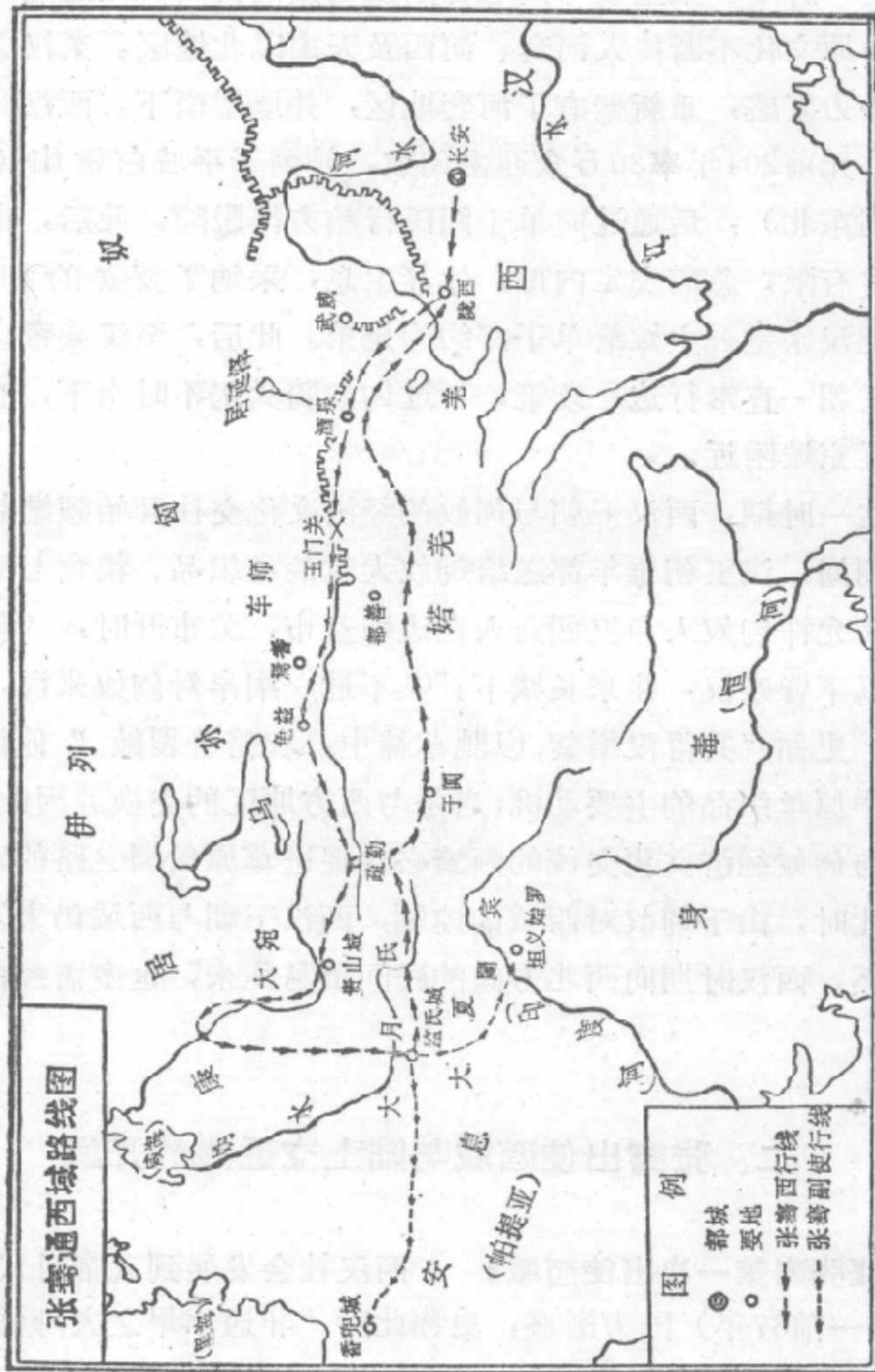
这一时期，西汉王朝与匈奴的经济文化交往开始频繁起来，和亲期间，汉王朝每年都送给匈奴大量的丝织品、粮食与酒。景帝时又允许匈奴人与汉朝商人在边地互市，关市开时，“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①不过，绢帛对匈奴来说，并不实用，史称“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他们大量贪图中原丝织品的主要动机，当是与西方地区的交换。因此，西汉初年与匈奴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必然促进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

此时，由于匈奴对西域的控制，西汉王朝与西域仍未发生直接联系，西汉时期向西北方向的民间贸易往来，也多需经由匈奴中转。

二、张骞出使西域与陆上交通线的开通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 西汉社会发展武帝时代（公元前140—前87年）国力渐盛，史称此时“非遇水旱之灾，则民人给

^①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



家足，都鄙仓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百钅万，贯朽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① 可谓“财力有余，士马强盛。”^② 武帝由是“动远略”，开始考虑伐匈奴，通西域，与外界交往。武帝即位的第六年（前138年、建元三年）获悉，被匈奴驱逐西迁的大月氏仍想复仇。武帝即派郎官张骞出使西域，寻找大月氏，欲使大月氏与汉配合，夹击匈奴。张骞率百余名随从刚出玉门关，即被匈奴抓获，匈奴单于大怒声言：“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③ 张骞在匈奴羁留十几年后，方逃出匈奴，重新西行。沿途跋涉沙碛，射猎充饥，先越葱岭到大宛，又经康居抵大月氏。不过大月氏所在（今布哈拉）水草丰美，土地肥沃，已无心远击匈奴。张骞在这一带流连年余，不得要领，遂取道塔里木盆地踏上归程，但又被匈奴所获。一年多以后，乘匈奴内乱，方得逃离。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至长安。虽然张骞此行未达到预定的出使目的，但他“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对沿途所经西域诸国当亦有一定了解，这使西汉王朝第一次系统地了解了西部世界的情况。

【河西走廊的打通】 河西地区是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但直到西汉武帝时期，这一地区一直为匈奴所控制，公元前127与前123年，武帝二次派卫青出击匈奴，使其王庭退居大漠之北。前121年，又命霍去病率军由陇西出击匈奴，深入千余里，在皋兰山下（今兰州黄河西）大败匈奴，斩其折兰王、卢侯王，并俘获浑邪王子，不久，浑邪王降汉，河西地全为汉所有。西汉在浑邪王旧地建酒泉郡，发关东饥民罪犯数十万口屯田，开水利。此后

① 《史记》卷三〇《平淮书》。

② 《汉书》卷九六《西域传赞》。

③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又分别设立武威、张掖、敦煌三郡，与酒泉合称河西四郡。河西的打通，使西汉王朝与西域及西方世界的交往有了可能。

【张骞再次出使西域】 河西走廊打通后，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武帝又派张骞前往乌孙，联络乌孙及其他国家。张骞率随员三百，牛羊万头，并携带钱币绢帛数千巨万，出河西向西域进发。至乌孙后，正逢其内部不稳，乌孙王想传位于长孙岑陁，次子不满，起兵相攻。其国内又素惧匈奴，故张骞未达到与之结盟的目的。不过乌孙派了专使带几十匹马到长安答谢，西汉王朝与之建立了正式联系。张骞在乌孙又派副使分赴西域诸国及安息、身毒、康居、大宛等，加以联络。前115年，张骞回国。不久，卒。他所派出的副使在张骞去世不久，也都先后完成使命，与各国使节一同回到长安。从此，中西交通线正式开通，西汉政府与西域及中亚、西亚以至欧洲地区的友好关系迅速发展，西行的“使者相望于途，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小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①东来的“商胡贩客”也是“日款于塞下”。^②这条中西陆路通途成为二千年中外友好交往的重要纽带。

【张骞以后的中西交通】 张骞再次通西域后，汉与西域诸国保持了百余年的和平友好关系，中西陆路交通一直畅通无阻。至西汉末王莽当政，妄自尊大，肆意挑衅凌辱西域君长，致使西域与内地王朝关系阻绝，匈奴势力乘机进入。东汉明帝时代，在班超苦心孤诣的经营下，西域与内地的关系复归于旧，中西陆上交通重新畅达。公元102年，班超在西域度过30多年后返回洛阳，其子班勇踵其后，继续经略西域。班勇在西域屡败北匈奴伊蠡王，使天山之南无匈奴足迹，有效地保护了中西陆上交通。但昏

^①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② 《后汉书》卷六八《西域传》。

贖的东汉政府很快又将班勇召回，以出师延期为由，投入狱中。西域渐渐脱离东汉王朝的控制。至桓灵之世，国内混乱，更无力西顾，灵帝末年，东汉在西域的统治遂告没落。

第三节 秦汉王朝与葱岭西及 南亚地区的交往

中国的秦汉时代（前221—公元220年），东方与西方分别矗立起秦汉与罗马两个强大帝国，秦汉帝国在秦始皇统一后，国势渐盛，至西汉武帝时代，通过一系列战争与外交，终于叩响了通往西部世界的大门。与此同时，罗马帝国的势力也不断向东扩展。不过，无论前后三头，还是安敦尼，都未冲破帕提亚人的阻碍而到达东方，当然也就不可能象亚历山大那样在东方广大土地上留下西方的印记。这一时代的中国与葱岭西地区的交往主要是发展了同中亚、西亚以及南亚诸国的关系，也就是与大宛、康居、大月氏贵霜、帕提亚、天竺等国家与地区建立了友好往来关系，与罗马帝国还未建立正式的官方联系，双方的经济文化往来，多由第三者中转。

一、中亚、西亚诸国

【大月氏与贵霜王朝】 大月氏人最初居住在中国西部的敦煌、祁连山一带。公元前二世纪初被匈奴击破，西迁至中亚阿姆河流域，有众40万，胜兵10万，并于前126年统有了大夏国，迁都阿姆河南的蓝氏城，成为中亚强国。在它攻灭大夏前二年，西汉使者张骞曾专程来访，但此后若干时期，大月氏与中国王朝来往不多。至公元前1世纪中叶，大月氏五翎侯之一的贵霜翎侯丘

就却攻灭其它诸部，建立了强大的贵霜帝国，它与中国王朝的接触也日渐增多。公元78年，班超到西域不久，就与贵霜建立了正式联系。嗣后六年，班超攻疏勒半年不下，康居国又派出精兵援救疏勒，贵霜在班超的要求下，劝康居撤回了援兵。贵霜并提出要以重礼聘娶汉朝公主，但未能如愿。公元89至90年，窦宪大败北匈奴，贵霜势力想乘机进入西域北部，取代匈奴的地位。90年5月，贵霜副王谢亲率七万大军越葱岭进入西域，为班超所败。此后，贵霜势力不断南下，很快便据有了恒河流域。但对东汉王朝却是“岁奉贡献”^①，保持着友好关系。

【大宛】 大宛为中亚古国，约在前苏联费尔干纳盆地，都城贵山城，即前苏联塔吉克加盟共和国的列宁纳巴德，是一个较发达的亦牧亦农国家，盛产稻麦，葡萄酒，且多良马，以汗血马为著。所属城邑70余，人口数十万，是中国通往西方的枢纽。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便到了大宛，沟通了两国关系，并且由大宛国王派专人引导至康居、大月氏诸国。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遣副使访问了大宛，并与大宛使者一并返回汉朝。公元前104年，汉武帝派专使到大宛，愿以千金和金马换取大宛的汗血马，被大宛拒绝。大宛又依附匈奴，劫夺过路汉使财物，杀戮汉使，武帝任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军大举远征大宛。第一次出征，未至大宛，便被郁成国击溃。公元前101年，李广利再次西征，围困大宛城四十天，大宛被迫求和。汉朝取其良马数10匹，中马以下3000匹，又杀旧王，改立新王，并使其遣子弟至长安为质，与之结盟而还。这次远征虽然保障了中西陆路交通的畅通，但也给大宛和汉朝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两汉之交，大宛一度被莎车所并，后复独立，仍与东汉有着比较频繁的往来。东汉后期，关系

^① 《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

渐渐疏远。

【康居】 康居，分布在锡尔河下游及其以北地区（前苏联撒马尔罕一带），为古伊兰人建立的中亚国家，其国在大宛西北约2000里，西汉时有户12万，口60万，胜兵12万人，亦有人认为它就是古代花刺子模或花刺子模的一部分。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也到达了康居国。第二次出使西域时，遣副使抵康居，并与康居使者返回汉朝。此后，康居与西汉王朝建立了友好关系。宣帝时代，匈奴郅支单于杀东汉使者，势力进入康居，康居王把女儿嫁给郅支单于。不久，郅支与康居王发生冲突，康居王女及诸贵人被杀，郅支控制了康居，并侵袭大宛、奄蔡等国，危及了西汉对西域的统治。公元前36年（元帝建昭三年），西域副校尉陈汤矫诏发西域诸国兵4万伐郅支。在康居土著酋长的协助下，顺利地攻下郅支城，斩单于。从此，康居国又恢复了与汉王朝的友好关系，西域都护常遣使节至其国中。成帝时，康居王又遣子入侍。至东汉时代，康居仍与汉频频往来。班超在西域的军事活动就曾使用康居军队。斯坦因在古楼兰遗址中发现了许多古塞利文木简，这种文字是“西元后起初几世纪流行于今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地方的古康居国一带的文字。”^①这说明东汉王朝与康居国有着频繁的交往。

【安息】 汉人谓今伊朗一带为安息。秦汉时代，正是伊朗历史上的帕提亚时代，这一王朝的建立者阿尔萨息（Arsace），被当时的中国人译为安息，故又径称其国为安息国。汉武帝时，安息国在密斯利得斯二世（公元前123年—前89年）统治下，国势强盛，领有妫水之西，黑海之南的广大地区，是东西交往的枢纽。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便对安息作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已知道安息在大月氏西约千里处，拥有大小数百城，地方数千里，

^①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99页。

北接康居，西连条支，东面乌弋山离，商贾车船行于邻国。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遣副使出使安息，安息王遣将率二万骑迎于东界，又发使随汉使节至汉，并赠大鸟卵（鸵鸟蛋）及犁靬眩人于汉。^①此后汉王朝与安息帝国建立了正式联系，安息国在汉王朝与西方世界交往中充当重要媒介。东汉王朝建立后，继续与安息国保持着友好关系。公元87年（章帝章和元年）安息王佛罗格斯二世遣使到中国，并赠送狮子、符拔（独角兽）。公元97年（和帝永元九年），甘英西使大秦时，即至安息西界而返。公元101年（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满又遣使至中国，并赠送狮子及条支大鸟（时称安息雀）^②世传安息国太子安世清，曾长期居住中国（公元148年到中国），博通汉文与梵文，译出佛经三十九部，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由于中国与安息的友好关系，通过安息的丝绸之路就格外兴盛，许多商人沿着这条路把罗马帝国的青铜器、玻璃器、酒、油、特别是黄金，从高卢运到中亚、中国与印度，来换取丝绸、象牙、香料与宝石，促进了中西间经济交流。当时中国与安息只有陆上交通，海路尚未开通。

二、大秦与南亚地区

【大秦】 大秦即罗马帝国，它基本上与中国的东汉、魏晋同时并存。至图拉真（公元98—117年）时代，罗马帝国臻于鼎盛，其势力不断向外扩展。中国的东汉王朝此时发展也十分迅速，积极寻求同西部世界的交往。罗马帝国对东方及中国也有了一些了解，也想同东方进行交往。《后汉书·西域传》曾记载大

^① 《汉书》卷九六《西域传》。

^② 《汉书》卷九六《西域传》。

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由于此使所携物品“并无珍异”，多中南特产，后人颇疑是罗马商人假其王之名，而至中国。不过，这起码应是罗马与中国民间直接往来的开端。汉王朝也极力想打通与罗马帝国的关系，东汉班超经营西域时，曾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公元97年，甘英由丝绸之路西行，经安息、条支，抵波斯湾畔，正准备渡海，为安息西界船人欺骗恐吓的狂言所阻，中途而返。虽然甘英未完成使命，但它是汉使节西行最远的一人，所至“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使具珍怪。”^①甘英还将搜集到的有关罗马帝国的情况向汉王朝进行了报告，加深了东汉对罗马的了解。另外，据罗马史学家弗劳罗斯（Florus）称，前27年（西汉成帝河平二年）奥古斯都即位时，“万国来朝，中有赛来斯国使者”^②。此事未见于中国史籍，不知是汉朝使节还是中亚其它地区人假借汉朝名义往使罗马。

【身毒与天竺】 身毒与天竺都是秦汉时人对印度半岛的称谓，实际上它主要指印度北部的统一王朝。在公元前324—前185年，印度处在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的统治时期，它盛极一时，统一了整个印度北部，公元前185年左右，巽加王朝取代之，但统治范围仅限于恒河流域。公元前75年左右，甘婆王朝建立，较之巽加更加衰落。至公元前30年，为安达罗所灭，印度陷入四分五裂局面。约在公元2世纪上半叶，印度的恒河、印度河流域处在贵霜帝国的控制下。但无论哪一王朝时期，印度半岛南部都是小国林立，未相统属。中国与印度半岛的交往就有了南北两条路线。

北线即由陆路与印度北部的交流，亦即中国史书中出现的同

^①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② 转见方豪《中西交通史》第十二章，第164页。

身毒与天竺的交往。武帝以前，与身毒的民间交往早已存在，至张骞于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第二次出使西域时，曾分遣副使至身毒国，身毒国使节亦随汉使至长安，两国开始了正式往来。以后，随着西汉王朝对外联系的加强，汉与身毒的交往日渐增多。武帝时，身毒国使节赠以连环羈，“以白玉作之，马瑙石为勒，白光琉璃为鞍。”这影响到长安风气的改变，史称“自是长安始盛饰鞍马，竞加雕缕。”^①西汉自张骞之后，特“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身毒国。”^②东汉前期，汉与天竺的往来仍十分频繁，明帝曾“遣使天竺问佛法”。和帝时，天竺“数遣使贡献。”近几十年来，在新疆陆续发现有许多古佉卢文与婆罗谜文本简，这两种文字是公元初流行于印度的文字，可以验证秦汉时代与天竺交往的频繁。不过，进入2世纪后，随贵霜势力的南下，中国王朝与天竺的交往被与贵霜的交往所取代。

印度南部一直是小国林立，其中一些国家通过海路与中国发生了直接联系。据中国史书记载，印度南部的建志补罗，中国称之为“黄支国”，西汉武帝时就与中国有了海上往来。中国使者也由海路抵印度南部进行贸易与联络。黄支国是一个重要的中转与货物集散地。除印度南部地区外，汉朝还与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发生了友好的往来关系。^③

【缅甸地区】 缅甸地区在中国的秦汉时代尚未建立统一王国，境内分布着众多的部落联盟与国家，汉王朝与缅甸境内的许多王国及地区发生了友好往来关系。秦与西汉前期，滇缅古道已为商人所用，成为两地交往的重要孔道。汉武帝以后，双方交往日益频繁，当时的中国使节与商人已缘海路抵达缅甸境内的谶离国与夫

① 《西京杂记》卷上。

② 《汉书》卷九六《西域传》。

③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太平御览》卷七八五。

甘都卢国^①。公元94年（永元六年），永昌境外的敦忍乙王莫延曾派遣使者来访，双方互赠礼物。公元97年（永元九年），北部的掸国国王雍由调遣重译赠东汉王朝珍宝，东汉回赠以金印；公元120年（永宁元年），雍由调复遣使者“献乐及幻人。”次年，东汉安帝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彩缯^②”。

第四节 秦汉王朝与海东、南海地区的友好交往

中国的秦汉时代，正是朝鲜与日本地区的国家产生与形成时期，朝鲜半岛上先后出现了卫氏王朝以及马韩，辰韩，弁韩等部落联盟。日本列岛上也形成了倭奴国等百余个小国或部落联盟。中国大陆居民与这些地区频繁的民间往来对它们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些地区的国家建立后，都与中国王朝发展了双边友好关系，进行着密切的接触与交往。这一时期中国与南海地区也进行着一定的民间交往。

一、朝鲜半岛

【卫满入朝与两国人员往来】 秦汉时代，朝鲜半岛正处在阶级社会形成与国家建立的阶段。朝鲜半岛北部有传说中的箕子后裔箕准称王，后被卫氏取代。公元前后，半岛东北部的咸镜北道居住着沃沮，东海岸的咸镜南道居住着涉人，半岛南部又有马韩、辰韩、弁韩三个部落联盟，它们都与当时的秦汉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与交往。

① 见上注。又，两地地望至今仍有争论，我们认为谶离应是今缅甸地那悉林，夫甘都卢为骠国一带的卑语。

② 《后汉书》卷八六《西南夷列传》。

自古以来，中国与朝鲜半岛地区间的人口迁徙就十分多见。至陈胜起义爆发后，“天下叛秦，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十万口，”^①朝鲜王准置之于西部，他们带去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与铁器等生产工具。西汉初年，燕王卢绾叛汉入匈奴，燕人卫满率千余人渡泃水往依箕准，准拜其为博士，封地百里，后满取而代之，自立为王，都王险城（即今平壤），史称卫满朝鲜。^②卫满朝鲜时代，它与汉朝的人员往来更加频繁，中国人依然不断地徙往朝鲜，史称卫满之孙右渠时，“所诱汉亡人滋多。”朝鲜居民亦不时有移徙中国地区者，公元128年（武帝元朔元年）涉君南闽就曾“率二十八万口诣辽东内属。”^③两地间的人口交流直接促进了中朝人民的经济交流与联系。

【西汉武帝与卫氏朝鲜】 卫氏朝鲜立国之初，与汉保持着密切的友好关系，汉惠帝与高后朝，辽东太守约卫满为外臣，并与之相约，使其“保塞外蛮夷，毋使盗边。”^④至武帝朝，愆卫满孙右渠为王，武帝以其“未尝入见，”于公元前100年（元封二年）秋，遣楼船将军杨仆，左将军荀彘分两路进攻右渠，右渠率兵抵抗，汉军屡败，最后由于卫氏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右渠为臣下所杀，卫氏朝鲜亡。武帝在其统治区内设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后渐以弛废^⑤。这一时期，中国王朝与卫满朝鲜的交往十分频繁，在故卫氏朝鲜范围内，多次出土西汉时代的铁器、铜器、漆器与丝织品，表明中国与朝鲜半岛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

【辰韩、弁韩、马韩与东汉王朝】 西汉时代，朝鲜半岛南

① 《三国志》卷三〇《涉传》，《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

② 《三国志》卷三〇《韩传》注引《魏略》。

③ 《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

④ 《汉书》卷九五《朝鲜传》。

⑤ 《汉书》卷九五《朝鲜传》。

部存在着辰韩、弁韩、马韩等部落联盟。至东汉时代，三韩开始向阶级社会过渡，并开始与汉王朝建立联系。马韩人此时已知道种田、养蚕、织布，住草室土屋，与汉人接触较多，受汉化影响较大，其丹支部酋长称辰王，名义上是三韩的大君长。辰韩又称秦韩，相传秦朝人逃避徭役，逃亡到半岛东南部，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在一起，经济文化水平较高，人民种五谷，养蚕，织缣布，能制造铁器。弁韩最小，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东汉初年，三韩廉斯人苏马谏曾至东汉乐浪郡贡献，光武封之为汉廉斯邑君。^①至灵帝末，诸韩渐盛，而东汉所制郡县之民，苦于战乱，多流亡入韩。在东汉王朝的强烈影响下，三韩没有向奴隶社会发展，而是模仿汉族的剥削方式和政治制度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

东汉时代，朝鲜半岛东北部与东海岸的沃沮人与涉人与东汉有着友好的往来关系。沃沮与涉人使节常至东汉朝廷，当地特产文豹，果下马及海斑鱼亦多由其使节携至，^②促进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二、日本列岛

【徐市东渡的传说与秦汉时代的归化人】 徐市东渡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一书，《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道：“齐人徐市（音fú）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各曰蓬莱、方丈、瀛州，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汉书·伍被传》则言：秦始皇使徐市“率男女三千人，五刑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大泽，止王不来。”但徐市东渡的终止地则史焉不详。唐宋以后，中日双方多认为徐

^{①②} 《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

市是抵达了日本，现在日本的和歌山县就保存有徐市之墓，还有固定的祭祀。近代以来，又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疑问。不过，不论徐市当年是否东渡日本，秦汉时代确有大量中国居民迁居日本。日本人类考古学中将这一部分人称为“归化人。”根据日本发现的上古金属器具遗物，考古学者们推断，从公元前3世纪起，日本已有汉族归化人。大正年间（1911—1923年），日本西南海岸出土了大量的铜铎、铜剑等，与中国大陆及朝鲜出土的极为相似，有的甚至完全一致，这是公元前3世纪至前1世纪时的器物，其制作者多是大陆归化人。1958年，日本九州岛东南的种子岛出土了一批陪葬物，其中一些装饰物上写有汉隶或刻有汉代爬虫纹样的图案，由此可以推言，从战国后期至汉代，一定有不少的中国人向日本列岛移民，成为当地的归化人。对于汉族归化人的活动，日本记载颇多。日本第一部史书《日本书记》记道：“应神天皇十四年（公元2世纪左右）融通王弓月君率秦人来归”，“应神天皇二十年，又有倭奴直祖阿知使主，其子都加使主并率己之党类十七县而来归焉。”9世纪成书的《姓氏录》甚至著录弓月君为秦始皇五世孙，阿知使主为汉灵帝三世孙等等，这皆可与地下出土文物相印证。大量的大陆居民移居日本，为当时的日本社会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劳动工具，其中尤以丝织技术的传入最为突出，并且，归化人的大量涌入也对日本国家的形成与建立产生了较大影响。

【两汉王朝与日本的交往】 西汉时代，即有了比较可靠的与日本交往的记载。《汉书·地理志》记道：“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两国始通时间当在武帝设置乐浪四郡后，故《后汉书·东夷传》称“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余国。”武帝以后，汉王朝继续与日本诸国（诸部落）保持着友好关系。新莽时代，中国货币已较多地流入日本。丝岛小富士

村海边遗址中就出土有王莽时代的货泉等物。^① 东汉建立不久，日本的倭奴国于57年（建武中元二年）“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此印1784年在志贺岛出土，印文为“汉委奴国王。”至公元107年（永初元年），“倭奴王师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这也是日本居民较早流入大陆的记载。桓灵之际，日本列岛战乱频仍，邪马台国兴起，东汉与之关系暂时中断。

三、秦汉与东南亚地区的关系

【铜鼓文化的流传与南海洋流】 公元前7世纪前后，居住在云南高原上的濮、僚等部落，汲取中原与蜀中地区先进的青铜铸造工艺，在过去的陶釜与铜釜的基础上开始制作作为乐器的青铜铜鼓。在战国秦汉时代，铜鼓制作迅速发展，铜鼓纹饰多姿多彩，既有形象的画面，又有抽象的几何图案，其中以太阳纹、云雷纹、水波纹、山形纹、舞纹、船纹最为普遍，铜鼓形制也出现了万家坝、石寨山、冷水冲、遵义、麻江、北流、灵山、西盟等8个类型。铜鼓不仅在国内扩大到东南的百越，西南的川黔，而且还传布海外。在东南亚、南亚与西南太平洋地区形成了一条铜鼓文化的传播带。

考古发掘证明，源于云南高原的铜鼓，发展为型制较为稳定的晋宁石寨山型以后，分北、东、南三路逐渐外传，其中以东、南二路最为重要。东路沿南北盘江入红水河（古牂牁河），直下广东入海；或经句町、夜郎地区，向东推至广东的云浮和阳江，东南达海南岛，南传越南等地。南路自云南往南，缘元江（红河）穿过越南北路入海。铜鼓南经具有青铜文化基础的红河三角洲，

^① 参见（日）中山平二郎：《从遗物上看古代北九州的文化》，载《历史与地理》3卷2号。

在骆越人手中获得较为充分的发展，出现了东山铜鼓。这一地区又成为中国铜鼓外传的重要枢纽。铜鼓文化又由此传播至柬埔寨、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甘尼安、土瓦等岛以及新几内亚的奎岛等地。

铜鼓外传的路径与这一地区季风洋流的活动规律一致。东南亚与中国南海介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两洋季风的交替区，冬十一月至十二月间多行北风、夏五、六月间多为南风，而南中国海与爪哇海底，又有完整的南北分流的河道系统，因此在这一水域就形成了单纯的季节性季风洋流。为这一地区的人们的海上交往提供了便利，使中国铜鼓文化有可能远播海外。西汉武帝时代由官方船只开辟的南海航线，大致与铜鼓文化流传的走向相似，也是利用了这一地区的季风洋流条件。^①

【秦汉与越南地区的关系】 越南地区与中国很早就产生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联系，秦汉时代进一步加强。秦统一过程中，就与越南北部的雒越人有了直接接触；秦汉之际，秦派往南海的地方官赵佗建南越国，把处于部落联盟阶段的雒越人分为交趾、九真两郡；汉武帝时，又分其地为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并分别委派太守，东汉时代，一仍其旧。这样，中国的先进技术与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入这一地区。南越政权阶段，就有不少铁器与牲畜传到越南；后汉任延为九真太守时，又传入牛耕，并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②促进了越南北部的进一步发展。不过，东汉王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与新兴的雒将等剥削者及当地人民存在着种种矛盾。公元40年，雒将诗索被交趾太守所杀，其妻征侧与妻妹征贰发动了“二征起义”，并自立为王，东汉政权派马援平息了这场事件后，一方面强化统治机

^① 参见《铜鼓研究学术讨论会述要》刊《思想战线》1984年3期。

^② 《后汉书》卷七六《任延传》。

构，另一方面又利用雒越的习惯法，对雒将也较为礼遇，并且继续兴修水利，穿渠灌溉，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越南北部地区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此外，越南南部以及柬埔寨等地区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中国经济文化的影响。

【秦汉与马来半岛、印尼列岛的交往】 马来半岛与印尼列岛在秦汉时代尚处在原始社会阶段，但当地居民已直接或间接地与中国居民产生了交往与联系。马来半岛上就发现有公元前3世纪以来的中国青铜器，有些学者还以为汉武帝的南海航线上中国船队的重要抛泊港皮宗，就是马六甲海峡中的“毗宋屿”，位于今新加坡西南。^① 今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内还陈列有一件典型的“汉代罐鼓”，这对中国与马来西亚半岛的交往具有重要的意义。

印尼列岛居民也是在公元前3世纪以来，与中国有了较多的联系，在爪哇等地发现过许多汉代的陶器，^② 中国青铜工具与铁工具技术也相继传入这一地区。印尼史学家卡连弗尔斯曾指出：“公元前数世纪，制造青铜工具的技术，从中国南部（尤其是云南）和印度支那传入印度尼西亚。”另一位印尼史学家维明也指出：“铁器加工技术从中国南部经过越南东京而传入印度尼西亚。”^③ 印尼列岛中的爪哇等岛屿，西汉以来一直是中国南海航线中官商船只的重要抛泊地。

① 参见李成林：《公元前后的中西古航线试探》《学术月刊》1980年第3期。

② 乌雷克：《印度尼西亚历史》，转见房仲甫：《我国铜鼓之海外传播》，《思想战线》1984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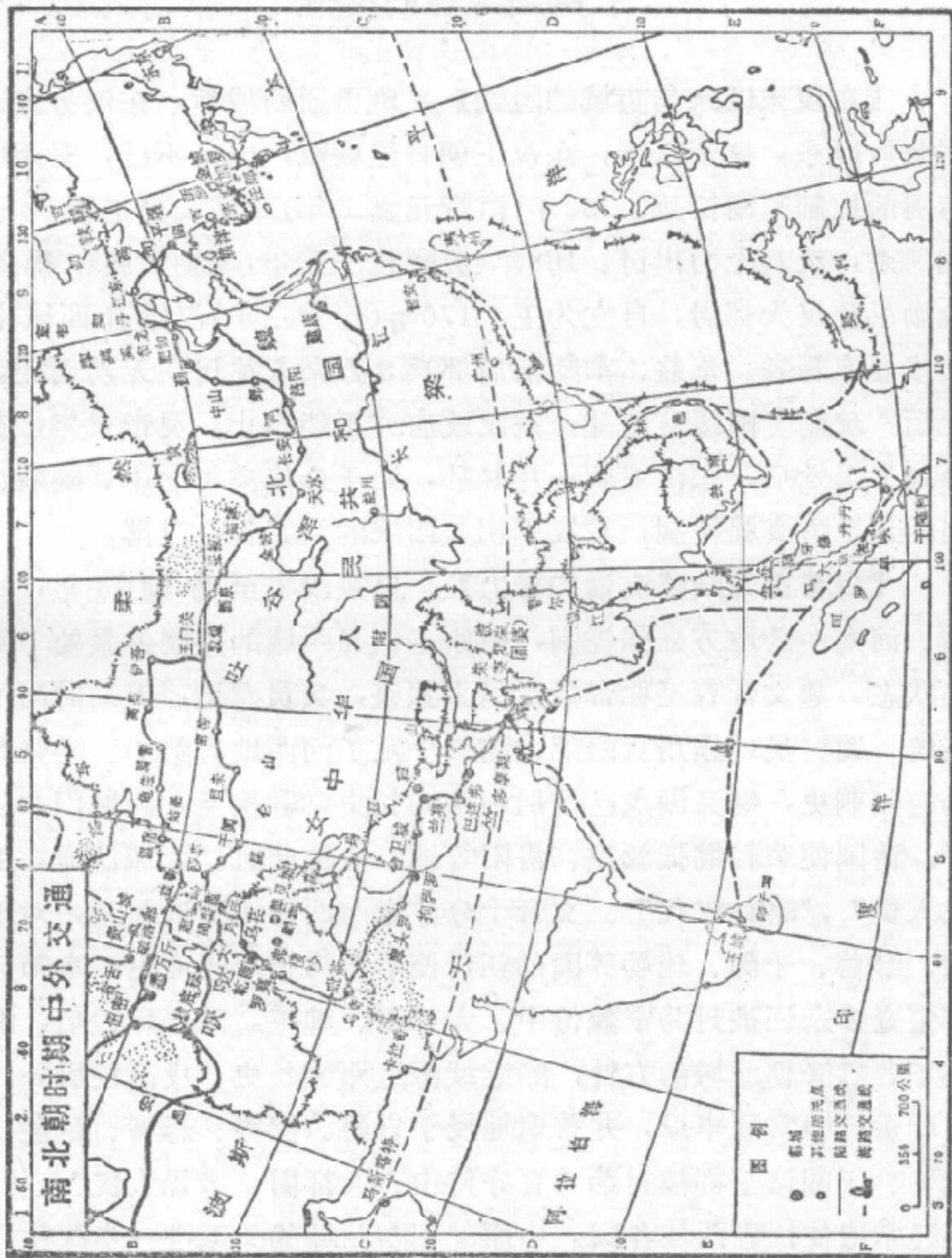
③ 转见房仲甫：《我国铜鼓之海外传播》，《思想战线》1984年，第4期。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外关系的 区域性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中国和西方都处在分裂动荡之中，这一时期的中外关系未能象前代那样全面展开，而是呈现出区域性发展的特征。由于东西方局势的动荡以及中亚地区强大的游牧民族的不断崛起，使作为秦汉时代中外关系主体的中西陆上交往时断时续、跌宕不定。与此同时，中国南、北王朝又都致力于海上交通的发展。尤其是南方王朝，政治地理与自然地理的限制，使它基本上失去了与外部世界交往的陆上通道，因此，它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海上交往与联系迅速发展，而且，它还通过南海航线与印度、东罗马诸国建立起较多的接触。

第一节 陆路交通的艰阻与西北游牧民族 对中外关系的影响

自公元2世纪后半叶至5、6世纪，东西方历史都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东方的汉帝国与西方的罗马帝国相继衰亡，欧亚大陆上出现的又一次游牧民族迁徙浪潮正猛烈地冲击着古老的帝国。中国自东汉灭亡后，先后经历了三国、两晋以及南北朝。罗马帝国的旧土上也正在兴起一个个蛮族国家。东西方陆路通途中则是众多的游牧部族在这儿角逐争雄。这一方面使中国与西部世界的陆路交通不断受阻，而另一方面，活跃于其间的各游牧部族又自觉不自觉地充当着中西交往中继者的角色。



一、陆路交通的艰阻

【东汉末以来与西域的阻绝】 班勇通西域后，东汉势力退居葱岭以东。桓帝以降，东汉王朝日趋腐败，内乱不已，对西域诸国的控制渐渐松弛。152年(桓帝元嘉二年)西域长史王敬为于阗所杀，汉兵无力出讨。168年(灵帝建宁元年)疏勒贵族和得杀疏勒王及汉大都尉，自立为王。170年(建宁三年)汉始遣西域长史张晏率焉耆、龟兹、车师前后部兵3万余人往讨，无功而还。此后，疏勒等国屡有内乱，东汉政府亦不能制止。灵帝末年，黄巾起义爆发后，东汉王朝一片混乱，处于分崩离析之中。陇右、河西为地方豪强控制，东汉王朝与西域的关系告一段落。

【魏晋重开陆路交通的努力】 自东汉末至曹魏初年，陇右、河西多为地方豪强控制，中原王朝与西域的直接关系处于阻绝状态。魏文帝曹丕称帝后，国力强盛，兵员充足，但一时尚不能统一蜀、吴，遂用兵西部，陆续平定了河西地方势力。委张既为凉州刺史，继又派戊己校尉与西域长史常驻楼兰，西域门户复开，诸国使节相继抵敦煌、洛阳等地。史称此时“西域流通，荒戎入贡”，“略如汉代”。文帝十分注意与西域诸国的关系，对龟兹、鄯善、于阗、疏勒等国的朝贡使节，均赏厚赐而返，车师后部王壹多杂还被封为宁魏侍中、大都尉、魏王。西晋嬖魏后，沿袭了曹魏管辖西域的方针，除继续派遣西域长史、戊己校尉外，对朝贡诸国赏赐丰厚，并普遍地授予官爵。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诸王都被封为“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①还经常遣使抚慰西域各国。中原王朝与西域的关系进一步深化，

^① 罗振玉、王同维：《流沙坠简·补遗》，《永慕园丛书》本，1914年版。

中国与西方世界的陆路通道复又通达。

【北魏与西域关系的兴衰】 魏晋王朝与西域建立起来的新的联系随着西北游牧民族的南下与西晋的覆亡而发生了变化。西晋灭亡后，北方陷入十六国纷争的分裂割据局面，此时的西域多受制于据有凉州的地方割据势力。前凉张氏、后凉吕氏、西凉李氏、北凉沮渠氏都曾领有西域。中原王朝要通过他们与西域及中亚、西亚、欧洲发生联系。当他们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时，对东西来往使节可出兵护送。前凉张骏曾派长史马诜护送高昌、鄯善、大宛等使节向石勒“献其方物”^①，北魏使者西去，亦常诏北凉“令护送”^②。但当凉州地方势力与中原王朝反目时，过往使节自然也就不那么安虞太平了。439年（北魏太延五年），北凉灭于北魏，3年后，北魏设沙州于敦煌，辖境西达伊吾（今新疆哈密），以李宝为沙州牧、西戎校尉、敦煌公。继在西域重镇鄯善、焉耆分别设镇，“赋役其民，比之郡县”，^③实施直接管理，强化了中原与西域的关系。北魏也因此与中亚、西亚及其它西方国家发生了频繁的交往。不过，由于柔然、高车势力的南下，加之南朝的压力，北魏无力过多地留意于西域。北魏后期，鄯善、焉耆镇兵相继撤回，不久又失伊吾。此后至隋统一，北朝势力再也未及伊吾，对西域基本上是失于控制，西域成为柔然、高车、突厥等游牧民族的角力场。

二、西北少数民族与中西交通

【挹娄、勿吉以及中原与西伯利亚地区的交往】 挹娄即上古时期的肃慎，汉魏时称挹娄，北朝称勿吉，隋唐时称靺鞨。两

① 《晋书》卷一〇五《石勒载记下》。

②③ 《魏书》卷一〇五《西域传》。

汉时期，它受夫余的役属，至曹魏时代，势力渐盛。其地“在夫余东北千余里，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极”^①。大致从今天的黑龙江省起，一直到达黑龙江北岸迤北的广大地区，东北至日本海沿岸与库页岛。西周时代，肃慎即与中原王朝有着密切的联系，曹魏时代，挹娄又“遣使重译入贡，献其国弓三十张……皮、骨、铁杂铠二十领，貂皮四百枚”，^②魏则回赠以锦罽、绵帛等礼物。此后至东魏、北齐时代，勿吉与之聘使不绝，互赠礼物。仅正史中记载的勿吉来使即达三十余次，最大的一个使团有500人之多。勿吉在与中原的交往中，促进了自身的发展与进步，而且还将中原先进的经济与文化传播到了黑龙江下游以及东西伯利亚地区，促进了两个地区的交往与联系。魏晋南北朝时代，除勿吉外，东北边地的其它少数民族如夫余、室韦、库莫奚等也都与中原王朝有密切的联系，对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产生着一定的影响。

【柔然汗国的扩张与中外交往】 柔然，又作蠕蠕或芮芮。

《魏书》称其为“东胡之苗裔”，当为鲜卑族的一支。4世纪末，开始形成部落联盟，居鲜卑拓跋部之上。5世纪初，在社仑统治时期，柔然由漠南推向漠北。社仑自号豆伐可汗（译义为驾驭开张之王）建廷鹿浑海附近（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西北）。柔然汗国的版图东起大兴安岭，西踰阿尔泰山，南自大戈壁，北至贝加尔湖以南，包有准噶尔盆地，成为当时亚洲东北部的一个强盛的游牧国家。其兵锋曾达哈萨克高原，又与北魏王朝屡有战争。因多次受挫，遂南下塔里木盆地，先后役属了高昌、焉耆、鄯善、龟兹、姑墨等北道国家，继又向南道扩张。但柔然汗国只是一个部落与部族的集合体，5世纪下半叶后，即日渐衰落。6

① 《三国志》卷三〇《挹娄传》。

② 《三国志》卷四《陈留王纪》。

世纪上半叶，阿那瓌汗统治时期，开始与北朝建立友好关系，多次与北魏、东魏、西魏及北齐联姻。与此同时，柔然与南朝也多有往来，刘宋曾派骠骑将军王洪轨“经途三万余里”，出使柔然。^①南北朝先进的经济、文化、政治对柔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予成可汗在位时，开始模仿中原，建年号，立典礼，其国内“渐知书契”，“颇有学者”。^②柔然汗曾遣使至南齐，求取锦工与医生，还要求指南车与漏刻的造法，以便仿制。南北朝先进的经济、文化通过柔然汗国向更远的地方传导，外部世界的文化也通过它传入中国内地。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与葱岭西诸国的友好关系

3至6世纪，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代，葱岭西的广阔地区也形成了新的地域格局。继罗马帝国、安息王朝、贵霜王朝之后，拜占庭帝国、萨珊王朝、笈多王朝分别成为各自地区的中心，间以众多的小国与大起大落的游牧部族的国家。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当时的诸王朝）都未能象往昔的罗马帝国与汉帝国那样威被四裔，因此，各国间的交往时而比过去更加频繁、活跃，时而又因动荡而走入低谷。这些国家与中国的交往在北魏时达到高潮，此后，便进入了一个低潮期。

一、中亚地区

【大宛与粟特】 大宛，北朝时又称破落那国。自西汉以

^① 《南齐书》卷五九《芮芮虏传》。

^② 《南齐书》卷五九《芮芮传》。

来，它一直与中国王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265年(曹魏咸熙二年)大宛主又遣使至魏并赠送名马。285年(西晋太康六年)，晋武帝派杨颢出使大宛，封大宛国主蓝庚为“大宛王”。北魏时代大宛王五次遣使来访，发展了双方的友好关系。

粟特即汉代的奄蔡，也是自西汉时与中国发生联系的国家，但当时过往不多。至北魏时代，始与中国建立了频繁的往来关系。粟特商业发达，粟特商人的足迹遍于中亚、西域，十六国之一的北凉国中就有许多粟特商人。北魏太武帝攻灭北凉时，这些商人多为北魏收容。457年(北魏太安三年)粟特王遣使聘魏，并与魏文成帝商洽这部分粟特商人的去留问题，北魏王朝将这些商人全部优礼送归。这一外交事件促进了两国间的友好往来。自北魏至北周时代，粟特先后8次遣使访问当时的平城、洛阳和长安等地，关系十分融洽。

【者舌、悉万斤与怛密】 者舌、悉万斤与怛密都是由大月氏中分离出来的中亚小国。三国均在前苏联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境内。者舌都于今塔什干，悉万斤都于今撒马尔罕，怛密都于今布哈拉。437年(北魏太武帝太延三年)者舌国使节来到当时的北魏京城——平城，此后两国使节往来不绝。稍后的473年(北魏孝文帝延兴三年)悉万斤国王也遣使至魏，至北魏末年止，悉万斤使节先后10次来访，有时甚至一年中两次来访。508年(北魏宣武帝永平一年)怛密国王的使者也来到洛阳，并向北魏王朝馈赠方物。北魏以后，为哒所征服。

【哒汗国】 哒，欧洲人称为白匈奴，中国南朝称为滑国，北朝称为哒。公元四五世纪之交，哒尚受柔然役属，5世纪中叶，他们游牧在乌浒河(即阿姆河)流域，随着势力的不断强大，哒逐渐向南发展，终于取代贵霜成为中亚细亚的头号强国。五六世纪之际，哒以拔抵延城为都(即贵霜都城蓝氏城)，

南以旁遮普地区为依托，逐步蚕食笈多王朝领地，西向也屡败波斯之众，东乘柔然汗国中衰之际，进兵塔里木盆地，役属了南道于阗、疏勒以及北道姑墨、龟兹、焉耆诸国。其盛时版图西界波斯，东抵塔里木盆地，北邻高车，南包北天竺，东西万余里，南北数千里。嚧哒与中国的南朝与北朝均有频繁的外交往来，曾10余次遣使访问北魏，3次遣使至梁朝之建康，对过往的中国王朝使节，嚧哒也以礼相送。不过，嚧哒人在中亚的霸权未能维持多久，在563—567年间，即被突厥、波斯攻灭。

二、波斯与大秦

【萨珊王朝与南北朝的友好交往】 公元前2世纪以来，统治伊朗高原的一直是安息王朝，它与汉王朝的关系十分密切。公元3世纪初，当中国出现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时，安息法尔斯省萨珊族头人阿尔达希尔举兵独立，于224年推翻安息王朝，建立了统一的萨珊王朝。自此时起，伊朗地区被称作波斯。萨珊王朝是古伊朗地区极盛的封建王朝(226—651)。它向西与罗马帝国争雄，向东与突厥联姻，共灭嚧哒，并与中国王朝始终保持着敦睦邦交。魏晋时代，值萨珊王朝初创，未见与中国官方交往的记载。进入南北朝时代后，萨珊与中国王朝的外交往来十分频繁，由于居于两大王朝陆路交通中间的突厥与波斯有着特殊关系，波斯使节可由陆路直抵中原，因此，萨珊王朝与中国北方王朝的往来多于南方王朝。北魏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452—527)以及西魏废帝(551—553)时代，萨珊共派出11个外交使团抵达北朝。北魏献文帝时代(466—470)，北魏王朝曾派韩羊皮出使波斯，韩羊皮返回时，萨珊国亦遣使送归，并带来驯象等礼物。南朝梁武帝时，波斯国王也2次遣使出访建康，并赠送佛

牙。估计是由海路经印度沿南海路抵建康。

【大秦与东吴、西晋的交往】 魏晋时代的大秦仍指罗马帝国。由于自汉以来，中国与罗马帝国渐有交往，魏晋时人对它开始有了比较确切的了解。据中国史书记载，魏晋时代(3世纪)的大秦国“有小城邑合四百余，东西南北数千里”，^①小国役属者数十，^②其国中“民俗田种五谷，畜乘有马、骡、驴、骆驼”。^③皇帝由选举产生，“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④“若国有突异，辄更立贤者，放其旧王。被放者亦不敢怨”。^⑤这已接近罗马帝国的实际情况。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王朝的动荡以及罗马帝国内部矛盾的不断激化，双方的外交往来比较稀疏。而民间往来发展较快。226年(东吴黄武五年)，大秦商人秦论由海路辗转至建康，向孙权介绍了大秦的“方土谣俗”，孙权则优礼相赠。^⑥284年(西晋太康五年)大秦皇帝遣使至西晋京师洛阳访问，并馈赠方物，这是魏晋时代史料中唯一的一次罗马使节来访。此后不久，罗马帝国与西晋王朝均陷入危机之中，双边关系暂告中止。

【东罗马与中国北朝的友好往来】 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陷入危机之中，戴克里先与君士坦丁的改革，未能挽救帝国的颓败，在内部隶农、奴隶、平民的起义和外部蛮族入侵的冲击下，罗马帝国走向末路，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西罗马仍都于罗马，不久即告覆亡。东罗马建都拜占庭，又称拜占庭帝国，它一直存在到15世纪中叶，与中国王朝建立了稳定的友好往来关系。中国人仍称它为大秦，后又称拂菻。在南北朝时代(4—6世纪)，东罗马帝国的注意力几乎完全放到了西方，因此，这一时期它与中

①③ 《三国志》卷三〇《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

②④ 《后汉书》卷八八《大秦传》。

⑤ 《晋书》卷九七《大秦传》。

⑥ 《梁书》卷五四《诸夷传》。

国王朝之间的官方往来比较稀疏，但双方民间的往来较为频繁。东罗马建国之初，中国人对它已有了比较准确的了解。《北史·大秦传》记道：大秦“地方六千里，居两海(地中海与黑海)之间”。“其地平正，人居星布”。中国的北魏定都洛阳后，洛阳十分繁华，吸引了大批的东罗马商人，其中有许多人“乐中国风土”，干脆长期侨居洛中。① 70年代河北赞皇县北齐墓中出土有东罗马金币三枚，一枚是狄奥多西斯二世(408—450)时期所铸，二枚是查士丁一世与其外甥查士丁尼舅甥共治时期(527年4月1日—8日)所铸。②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中国与东罗马民间往来的频繁，这为隋唐时代中国王朝与东罗马帝国间的友好交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印度半岛与师子国

【笈多王朝】 3世纪30年代后，贵霜王国衰落，印度半岛小国林立，至4世纪前半叶，摩揭陀的一个小国君旃陀罗笈多一世渐强，建立了笈多王朝，此时正是中国的东晋、十六国时代。笈多王朝建国不久，迅速征服了恒河上游、中游诸国，至超日王(旃陀罗笈多二世)在位时(约380—414)，其统治已从孟加拉湾扩展到阿拉伯海，成为印巴次大陆的泱泱大国。自超日王起，笈多王朝就与中国王朝建立了友好往来关系。381年(前秦建元十七年)，超日王遣使节到达前秦首都长安，并馈赠火浣布。428年(刘宋元嘉五年)超日王曾致书宋文帝说“愿两国信使往来不绝”。北魏宣武帝在位期间(500—515)，笈多使者曾5次抵洛京访问，并带

① 《洛阳伽蓝记》卷四。

② 参见夏鼎：《赞皇李希宗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考古》1977年6期。

来了骏马、佛牙等珍贵礼物。北魏以后，陆路通道十分艰阻，笈多王朝与北朝的外交往来趋于停滞，不过，通过海路与中国南朝的交往却一直十分频繁。南朝的宋、齐、梁、陈诸朝都与笈多王朝有着密切的外交往来。

【犍陀罗与乌菟国】 犍陀罗与乌菟国均位于北天竺。犍陀罗都富楼沙城(今巴基斯坦白沙瓦)，6世纪初的十余年间，北魏王朝接待了这个国家的五个使团。不过，此时吠哒统治着这一地区，这五个使团或者是吠哒派出，也可能是由吠哒役属的犍陀罗国王派出。

乌菟国在犍陀罗之北(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河流域)，“北有葱岭，南至天竺；……丰稻麦，事佛，多诸寺塔，极华丽”。^① 它也与北魏王朝有着友好的往来关系。自502至521年，19年间，乌菟国王即先后6次遣使抵洛阳访问，并馈赠方物。519年(北魏孝明帝神龟二年)，北魏取经僧人宋云曾到达乌菟国，受到乌菟国王的隆重接待，这说明两国关系之密切。

【罽宾与尼婆罗国】 罽宾是克什米尔地区的古国之一，两汉时代就与中国有了友好往来。魏晋南北朝时代，它都于善见城(今克什米尔斯利那加附近)，据《北史·西域罽宾传》记载，这一时期的罽宾“东西八百里，南北三百里”，“居在四山中”，“田地下湿，生稻。冬食生菜。其人工巧，雕文刻镂，织罽……”。北魏太武帝至孝明帝时代(5世纪下半叶至6世纪初)罽宾王先后6次遣使至北魏都城平城或洛阳访问，有时一年之中两次派出使节。

尼婆罗(今尼泊尔)是佛教圣地，中土取经僧人必至此地。两国间的民间往来一直十分发达。6世纪初，尼婆罗使节先后4次

^① 《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

到达洛阳访问，进一步加强了中尼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师子国】 师子国即今斯里兰卡，是巴利语 Sihaladipa (师子国)的音译。东晋僧人法显往天竺取经，曾在师子国居住2年之久。根据法显的记载，“其国和适，无冬夏之异，草木常茂，田种随人，无有时节”。其都城则“屋宇严丽，苍陌平整。”^①法显还曾在师子国见到中国的白绢扇，足见中国与师子国民间交往之悠久。405年(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师子国遣使至东晋首都建康，此后的宋、梁又先后数次遣使相访。当时师子国与中国王朝的交往主要依靠海路，师子国使臣要远涉印度洋、南海方可抵达建康，往往要“泛海三年，陆行千里”，异常艰辛。宋元嘉五年(428年)师子国王刹利摩诃写给刘宋皇帝的信中提到：“虽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说明两国间的友好往来并未因此而受阻。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与海东、南海诸国关系的迅速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海东与南海诸国包括在今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中南半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上建立起来的众多国家。这一时期，朝鲜半岛处在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局面下，日本先后有邪马台、大和等国家的更替。中南半岛与印尼群岛有新兴的扶南、占婆、诃罗单、婆利、干婆利等国家。中国与海东诸国的关系继秦汉之后仍不断加深与发展，中国与南海诸国的关系也由于中国南方政治、经济比重的增强与中国南方诸王朝的建立而迅速展开，在此之前，南海诸国多与印度地区有着频繁的交往与联系。

^① 法显：《佛国记》。

一、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

【高句丽】 中国的三国时代，高句丽逐渐强盛。244年(曹魏正始五年)高句丽王位宫乘辽东公孙渊新灭，想进兵辽东，为曹魏幽州刺史毋丘俭所破。高句丽王兵锋南指，攻下平壤，不久即定都于此，成为中国的邻国，此时的高句丽是朝鲜半岛上最强盛的国家。魏晋南北朝时代，除了与曹魏的偶然冲突外，在绝大部分时间内它与中国南、北诸王朝都保持着密切的来往与联系。仅访问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的高句丽使节就有90余次，有时一年有二三个使团到达，访问东晋南朝的使节也有近30次。高句丽是当时世界上与中国王朝关系最密切的一个国家，双方进行了多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它曾多次向东吴、刘宋等王朝赠送战马，439年(刘宋元嘉十六年)一次就运来战马800匹。在北魏太武帝时代，高句丽每年都赠送北魏王朝黄金200斤，白银400斤，北魏亦与之礼尚往来。北魏末年，中国北方动荡不已，许多中国人流亡到高句丽。552年(北齐天保三年)，北齐文宣帝遣使出访高句丽，“求魏末流人”。^①高句丽积极配合，一次就遣送了5000户。对于中国过往使节，高句丽也多为之提供方便，双方友好关系在这一时期一直比较稳定。

【百济与新罗】 百济本是朝鲜半岛南部马韩部落联盟中的一个部落，346年(东晋永和二年)建立国家后势力渐强，成为半岛上三个大国之一。其“地界东极新罗，北接高句丽，西南俱限大海”。^②百济建国后，即与中国南、北朝建立了友好往来关系。曾4次遣使出访北朝诸国，北朝使节与渔民海上遇难时，往

^① 《北史》卷九四《高丽传》。

^② 《北史》卷九四《百济传》。

往得到百济的救助。一次，百济国人在“西界海中见尸十余，并得衣器鞍勒”。^①经调查，知是北魏使者遇难，遂掩埋尸体并通报北魏王朝。与此同时，百济也常遣使抵南朝首都建康访问，自东晋至陈朝，共有11次之多。梁武帝曾册封百济王。百济王于541年（梁武帝大同七年），“遣使请《涅槃》等经义，毛诗博士及工匠、画师等，敕并给之”。^②梁武帝时，百济使节在建康遇侯景之乱，“见城阙荒毁，并号恸涕泣。侯景怒，囚执之。及景平，方得还国”。^③由此亦可见百济与南朝关系的非同一般。

朝鲜半岛上的三韩除马韩建立百济国外，辰韩与弁韩也在356年（东晋永和十二年）联合建立了新罗国。新罗在刘宋时或称斯罗，势力较弱。梁普通年间（520—527年），附于百济使者，和梁朝相通。陈朝时往来较频繁。

【邪马台与大和国】 公元3世纪前半叶，日本出现了一个势力强大的邪马台国，它的国王是个名叫卑弥呼的独身女子。邪马台的位置有人认为在本州的大和（今奈良），也有人认为在九州北部，至今仍未有定论。238年（曹魏景初二年），司马懿灭辽东公孙渊，这年六月，卑弥呼女王遣使者难升米等至洛阳，与曹魏互赠礼品，魏明帝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以后10年间（238—248），两国使者往返达6次之多。3世纪后，大和地方兴起了新兴的大和国家，大和“东征毛人”，“西服众夷”。至5世纪中，渐次统一了日本。它与中国的东晋、南朝保持着密切的友好关系。先后10次遣使与东晋、南朝通聘。宋武帝、文帝时册封为安东大将军倭国王。齐、梁时继续互有使节往来。在魏晋南北朝时代，除官方交往外，中国和日本地区的民间交往也较多见。大批中国人

① 《北史》卷九四《百济传》。

② 《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外臣部·请求》。

③ 《梁书》卷五四《百济传》。

经由朝鲜半岛流往日本，这一时期的“归化人”阵容比之秦汉时代更为庞大。这对双方友好关系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南海诸国

【占婆国】 占婆国在今越南中南部，中国史书又称之为林邑。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东汉日南郡象林县的占婆人区逵乘机起兵，自号占婆王，势力不断北上，248年(东吴赤乌十一年)，攻下东吴交州西卷县(今越南广平省高率下村)作为别都。东晋南朝时代，占婆与交州刺史屡屡发生战争，结果是“交州遂致虚弱，而林邑亦用疲弊”。^① 不过，尽管时有战争发生，占婆与中国王朝之间也存在着较多的外交往来。东吴时，占婆就遣使至建康，并赠送“金指环与吴王”。^② 西晋至隋统一前，占婆王先后20多次遣使至洛阳或建康访问。由于占婆地区受中国影响较深，加之中国人口的南移，双方的民间交往十分频繁，中国流往交州一带的人口存留在占婆的为数甚多，十分有利于双边友好往来。

【扶南国】 扶南约建于2—3世纪之交，3世纪初范蔓为王时，“开国十余，辟地五六千里”，^③ 成为东南亚地区的大国之一，范蔓也自称“扶南大王”。东吴交州刺史吕岱曾派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出使扶南等国，稍后不久，扶南王范旃遣使来东吴聘问，扶南与中国建立了正式友好往来关系。宋文帝元嘉十一、十二、十五年(434、435、438年)，扶南曾接连遣使送方物。自西晋至陈后主时代，扶南王先后20多次遣使至建康等地访问，与中国王朝互相赠答，关系十分密切。

① 《晋书》卷九七《林邑国传》。

② 《太平御览》卷七八一引《林邑记》。

③ 《南史》卷七八《扶南国传》。

魏晋南北朝时代，今泰国境内的金邻、顿逊、狼牙修等国，今马来西亚境内的婆皇、丹丹，罽罽等国也都与中国王朝有着频繁的往来关系。

【诃罗单、干陀利与婆利国】 印尼群岛的国家建立较晚，公元后几个世纪，大批印度移民进入这一地区，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出现了诃罗单、干陀利、婆利等国家，诃罗单当在今爪哇岛，又被称为“诸薄”，“闍婆”。干陀利，当为今苏门答腊岛的巨港，又称耶婆提。婆利，当为今巴厘岛。这三个国家都与中国南朝诸国有友好往来关系，都曾数次遣使至建康，并馈赠方物。中国僧人法显取经，返回途中，曾在干陀利居留五个月之久，加深了两国人民间的认识与了解。

第三章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初步发展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随着中外交往与联系不断加强，中国先进的经济技术以及发达的文化源源播向异邦，促进了当地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此时的中国王朝也还未产生那种“天朝之大，无所不有”的畸形心理，对于外来的先进技术与文化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使外来技术与文化不断输入中土，对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社会的发展以至盛唐气象的形成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第一节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 中外贸易往来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中外贸易可以划分为秦汉与魏晋南北朝两个时期。秦汉时期的中外贸易多经由西北陆路，这里，既有中国商人远赍货物，翻山越岭，“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①又有“不绝于时日”的西方“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这一方面的贸易额占据着同期中外贸易额的绝对重头。魏晋南北朝时期，海上贸易开始兴盛，孙吴时，波斯、天竺海舶就常舶于交趾，东晋南朝时代，广州番禺已是“舟舶继路、商使交属、”海舶“岁十数至”^②，交州等港口亦十分繁忙。这表明魏晋南北朝

① 《汉书》卷九六《西域传》。

② 《梁书》卷三三《王僧孺传》。

时代的中外海上贸易往来已初具规模，这一时期的中外贸易海陆两旺。

一、中外贸易的主要通道

【西域道】 西域道指经由西域地区通往中亚或其他地区的通道。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西域道主要有三条。南道：西汉时出玉门关西行，过盐泽至楼兰，经塔什拉玛干沙漠之南，沿昆仑山北麓西行，途中过且末、精绝、于阗、莎车，再西北行至疏勒与北道合，全长约1900公里。北道：西汉时亦由楼兰西行，经大沙漠之北，沿天山南麓西去，经尉犁、焉耆、龟兹、姑墨抵疏勒，全长1700公里。东汉时由于盐泽变迁，加之伊吾，车师都被汉朝控制，所以北道出玉门关后迳直北行，经伊吾、高昌、焉耆、龟兹至疏勒。南北两道交汇于疏勒后，即合为一道，西越帕米尔高原，到达中亚古国大宛。由大宛前进，西北行可至康居、奄蔡，南行可入大月氏、身毒，西去可抵安息、罗马。这两条道路至魏晋南北朝时代仍沿用不衰，唯线路稍有变动。北新道：即草原路或称戈壁路。此路自阳关北上，出伊吾到车师、高昌，由此穿越天山东麓缺口，取道准噶尔盆地，过卑陆、且弥，到乌孙，再西南行抵大宛。这条路萌生于先秦时代，但由于东汉以前匈奴势力一直控扼着沿途地区，此道也久为其垄断。至魏晋南北朝时代，北新道的利用率才渐渐提高，北周时，已是“商贾往来，多取伊吾路”^①（即北新道）。隋唐时代，它与原北道成为西域道的两条干线道路。

【南海道】 经中国南海西入印度洋的海上通道。西汉武帝

^① 《周书》卷五〇《高昌传》。

时代，已遣商团由广东之合浦、徐闻出发，沿越南海岸，经马来半岛抵印度。这些商人“赍黄金、杂纒而往”，航行一年余，途经都元、邑卢没、谶离、夫甘都卢，抵黄支国。^①虽然有些地名至今尚未定论，但黄支国为印度之建志补罗已为多数学者认同。武帝以后，南海路仍时被利用。《汉书·王莽传》有“东致海外，南怀黄支”之语，可见此时与黄支仍有密切往来。巴利文的《那先比丘经》弥兰王（公元前后）与龙军和尚的一段对答，龙军举的一个例子中就讲到印度运货的船曾远至支那等地。东汉时代，大秦、天竺等地的使节与商人亦时由此道而来。魏晋南北朝时代，随着造船与航海能力的提高，南海航线的续航能力大大增强，不需象过去那样只能沿岸近海航行了。因此，这一时期的南海航线，更加繁忙，许多取经僧人也道由南海。东晋高僧法显在师子国归国时，即随当地“商人大舶”而返，刘宋时僧人昙无竭等25人亦是由南天竺“随舶放海”达于广州。^②由此可见南海航线利用率之高。

【永昌路】 永昌在汉代为西南重镇，东汉设郡，领有今云南腾冲与缅甸八莫一带，处于中、印、缅古道要冲。《华阳国志》卷四称：本郡中有“闽、濮、鸠、獠、僮、越、裸濮、身毒之民”。身毒即印度，僮为缅甸，裸濮当为孟加拉湾沿岸的裸人国。书中又称：郡中有黄金、光珠、孔雀、犀象、水精、琉璃、蚌珠、蚕桑、绵绢、采帛、文绣等等，应有尽有，成为西南边境中外贸易的重要口岸。自永昌除可沿陆路（即中印缅路）抵印度外，还可缘水路到达更多的地区与国家。《后汉书》称“掸国西南通大秦”。^③东汉时代，大秦幻人已由海路抵缅甸，经永昌到达中国

①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② 均见《高僧传》卷三。

③ 《后汉书》卷八六《南蛮传》。

洛阳。魏晋南北朝时代，大秦一直“有水道通益州永昌郡。”^①此外，由永昌沿伊洛瓦底江入孟加拉湾，可由海路至南印度，亦可抵南海诸国。

【东海路】 东海路是由中国大陆或朝鲜半岛跨海至日本的路线。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中日间的人员往来多经由朝鲜半岛，直接由中国东部沿海往日本者比较少见。因此，朝鲜半岛南部的辰韩（百济）成为东海路的重要中继站。由此南下，可抵日本的山阴、北陆地区。这主要借助于日本海上里曼与对马两大海流所形成的沿周围陆地左旋的环流。在这一环流作用下，辰韩地区的船只多可自然漂流至日本列岛。此外，由辰韩或弁韩出发，还可中经对马、远瀛（冲之岛）、中瀛（大岛）等岛屿，抵达筑前的胸形（宗像）一线。至隋唐时代，中日间才较多地直接跨海往来。

二、中外商品的流通

【中国丝绢的大量外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绢的国家，丝绢是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主要的外销商品。秦统一以前，中国丝绢即辗转外运。秦汉时代，随着中外交往的日渐频繁，中国丝绢更加大量地销往各地。大宛、大月氏、安息都曾经是重要的转输地。西汉末期以后，罗马帝国成为中国丝绢的最大主顾，当时两国间的陆路丝绢贸易多由安息中转。虽然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但“安息欲以汉缯綵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中国丝绢贸易的海上通道多由印度中转。至魏晋南北朝时代，尽管罗马、波斯、印度等地区渐渐掌握了中国的养蚕与缫

^① 《后汉书》卷八六《南蛮传》，《北史》卷九七《大秦国传》。

丝技术，但中国丝绢依然畅销不衰。中国丝绢在西销的同时，还大批地越海输往日本、朝鲜等地。这些地区均有较多的中国丝绢出土。238年，日本卑弥呼女王遣使至洛阳，魏明帝赠以大量丝织品，此后，通过馈赠与人员携带等方式，中国丝绢继续源源东流。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丝绢的大量外销，对输入地区的社会生活与生产产生了较大影响。以罗马帝国为例：罗马共和末期（相当于中国两汉之交）凯撒身着绸袍出现在剧场时，罗马人尚认为奢侈之极。但此后不久，丝绸便风行罗马，以至皇帝梯皮留斯下令禁止男子穿着绸衣，这当然无济于事。公元后几个世纪中，罗马城内的托斯卡区开设了专售中国丝绢的市场，4世纪罗马史学家马赛里努斯宣称：“过去我国仅贵族才能穿著丝服，现在则各阶层人民都普遍服用，连搬运夫和公差都不例外。”^①罗马帝国的贸易中心泰尔、培卢特等城的丝织业亦多以中国绢缁为原料。有的史学家甚至认为，罗马帝国的灭亡同它与中国丝绢贸易中的巨额逆差而带来的国库空虚密切相关。

【中国纸张与钢铁的外销】 造纸是中国古代的一大发明，在汉魏南北朝时代，中国以外的国家尚未掌握这一技术，中国纸张是当时国际市场上的独家商品。105年蔡伦改进造纸法后，纸张率先传入西域各国，继由“相望于道”的使节及“日款于塞下”的商胡贩客转向更远的地区。近代以来，西域各国的城邦中屡屡出土这一时期的纸张残片。如斯文赫定就在楼兰遗址中发现大批古纸，有粗糙的、网状的，也有精致的微黄色信笺，书写内容有公牍、汉文典籍、私人贸易函件，可见纸张在西域地区已十分流行。斯坦因曾在甘肃西部古长城的一座烽燧遗址中找到几封2世纪中叶的粟特文纸信。粟特文是当时粟特、康居一带居民的文

^① 玉尔：《中国道程志》第一卷，203页。

字，这一地区的居民“善于商贾，诸国交易多凑其国。”^①可以想见，他们是中国纸张的最初外传者之一。魏晋以后，纸张更多地为其他国家所用。吐鲁番地区出土的西晋至隋朝古纸中，就书写着多种外国文字，其中有波斯文、粟特文、希腊文、吐火罗文等。在叶尔羌地区发现的一批纸写本残卷中，也有笈多天城体文字的纸张，这都足以说明中国纸张外传的盛况。

中国古代的钢铁生产，长期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钢铁外销也有一定的数量。中亚的木鹿是中国钢铁的重要集散地。罗马史学家普鲁塔克称安息骑兵所用的木鹿武器，就是因为安息刀剑多以木鹿转入的中国钢铁为原料制成。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钢铁还输往日本、朝鲜、南海诸国，这些地区都多少不等地出土有当时的中国铁制品。

【毛皮与毛织品的输入】 中国输入的毛皮不少来自中亚国家。康居、奄蔡等国都盛产貂皮，西汉时代，已从这些地区大量输入毛皮。当时长安大规模的毛皮商店中就往往有这些舶来品出售。自国外流入的毛织品更是形形色色。大月氏、大秦、天竺、安息、朝鲜、日本等国均有毛织品输往中国。大抵汉代以大月氏毛织物为优，班固曾致函班超，托他以白素三百尺，换取大月氏氍毹。信中讲到：“月支氍毹，大小相杂，但细好而已。”至魏晋时代，则以大秦所产海西布最为著名。海西布即呢绒，由羊毛与亚麻混纺而成。大秦的其它毛织品在中国也十分受欢迎。史称大秦“氍毹、氍毹、罽帐之属皆好，其色又鲜于海东诸国所作也。”^②毛织品的输入对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产生了一定影响。

【马匹等动物的输入】 中国自商周以来，即是以农业经营为主体的国家，畜牧业不很发达，尤其缺乏马匹等大牲畜。如西汉

^① 《隋书》卷八十三《康国传》。

^② 《三国志》卷三十《乌丸传》注。

初年因长期战乱，更造成“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将相或乘牛车。”自西汉武帝以来，随着边境和中外交往的发展，西北各游牧部族及其它国家的马匹源源输入中土。西汉时代，以乌孙马与大宛马输入最多，公元前105年乌孙王曾以良马千匹为聘，求娶汉公主。李广利伐大宛一次亦得良马数千匹。东汉时代大月氏马亦开始输入。至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马匹的输入地区更加扩大，康居、大宛、大月氏、大秦、波斯、朝鲜等地均有马匹输入。三国时，高句丽王一次就赠与东吴孙权战马800匹，北魏河间王元琛曾派专使到波斯“搜求名马”。除马匹外，这一时期还有其它多种动物输入中国，史称“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踰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①安息狮子、天竺大象、中亚骆驼、南海珍禽亦多有输入，西汉武帝专门建有畜养奇禽异兽的博望苑，北魏都城洛阳亦专门设有白象坊与狮子坊。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马匹的输入，有利于当时农业生产与国防的发展；奇禽异兽的流入，则虚耗民脂，仅满足了统治阶级的声色之乐。

【奇珍异宝的不断输入】 在输入中国的商品中，各种奢侈品是一大项。两汉时代，仅从大秦罗致的珍物就有象牙、犀角、珊瑚、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苏合等等，其它外国诸珍异亦大量流入。武帝时派出的唯一的海上外贸使团就是要去印度贸取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魏晋南北朝时代这一趋势仍盛行不衰，除西方珍异外，日本的白珠、孔青大句珠，南海诸国的火齐珠、象牙、沉檀香、玉盘等等亦相继流入。这些海外珍异都是帝王贵族所渴求的，而珍奇异物的大量输入又直接刺激了封建贵族的奢侈生活，西晋石崇，

^① 班固：《西都赋》。

王恺斗富可算一个典型事例。北魏河间王元琛更是以域外珍物示富。元琛家中各种珍宝，都是“中土所无”，舶自海外。他要以“大魏天王”的身分与晋室石崇比华侈，声言“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①统治者这种对奢侈品的需求不仅无益于社会发展，而且还给广大人民带来沉重灾难。

三、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外贸易往来的特点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中外贸易的发生与发展阶段，中国传统外贸的一些特征在此已初露端倪。“朝贡贸易”是这一时期中外贸易的主要形式之一。所谓朝贡贸易，就是通过两国官方使节的往返，以礼物赠答进行交换的贸易方式。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每一次官方使节的往返都伴随着礼物的“交易”。如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即率随员300人，牛羊万头，以及大批的钱币、绢帛，价值“数千巨万”，前往乌孙等国。这些国家也回赠了一批物品。曹魏明帝时，倭国女王遣使送来生口十人、斑布二匹三丈，明帝赠还锦五匹、毛毯十张、各色丝织物百匹，以“答所献贡值”。南朝刘宋时代，印度笈多王朝旃陀罗笈多二世专门致书宋文帝，提出“若有所须珍奇异物，悉当奉送……愿二国信使往来不绝。”其用意是要刘宋也同样对待，以达到交易的目的。除此之外，中外商人打着朝贡、奉使的旗号进行国际贸易者更是代不乏人。如张骞以后，西遣的使节多贫人子弟，与“妄言无行之徒”，他们只是要“私具官贖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这样凭借政府资本以使节名义出行的商人“一辈大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一年之中“使多者十余（辈）。”也难怪大宛对于这些人“非出币

^① 《魏书》卷一十八《元琛传》。

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①外国使节中也不乏冒名的商人。鬲宾“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币买，以献为名。”^②东汉时到洛阳的罗马安敦王的使节，后人也一致认为是大秦商人伪托。这一贸易形式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

朝贡贸易的特点表现在，政治动机大于经济目的，奢侈消费的需求大于对商业利润的追求。他们的根本动机是造就“四海宾服，八方来仪”的宏大场面。因此在初建交或他国来“贡”时，都回赠大量礼物。使臣外行，也是大量无端赠礼，赔尽钱物，甚至对外商也大加优惠。汉政府曾专门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③皇帝出游时也往往让他们陪同周游各地。对奢侈性消费的需求使官方外贸的着眼点放到了使用价值上，而不注重货币的增殖。西汉桑弘羊就主张“天下高我下，天下轻我重”。即低价出口，高价进口，使转口商人获取超额利润，而封建政府则得到使用价值的满足。既然东西进得多，出得少，外国的异物内流就算是“利不外泄”而怡然自得了。至于流出的大量黄金与绢帛，在他们看来都是“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④由于对外贸易的人超，中国黄金、铜币大量外流，形成了“府库之藏流于外国”^⑤的局面，这对中国古代国家的财政产生了不良影响。

第二节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 中外科学技术交流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一直处在世界

①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② 《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

③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④ 《盐铁论》卷一《力耕》。

⑤ 《盐铁论》卷四《地广》。

前列，更远居于周边诸国诸地区之上。因此，中国科学技术的大量外传，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外科技交流的显著特点。中国的凿井、养蚕、丝织、铸铁炼钢等技术以及天文历法、医学、数学等学科呈辐射状四向传去。其中，西传以应用技术为主，东传则是科学理论与应用技术的全面输出。这一时期，世界其它国家与地区的科学技术也渐次流入中土，最为突出的是西方经济作物及其栽培技术的传入。另外，西方玻璃制造术与印度婆罗门书的传入也对中国的科学技术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中外经济作物的交流

【中国农作物与种植技术的外传】 中国的农作物种类繁多，又有悠久、先进的种植技术，对周边国家与民族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中南半岛与朝鲜、日本诸地区所受影响尤大。早在先秦时代，中国稻种及稻作技术就传到了日本，继而又传入朝鲜、越南、泰国、缅甸等地，至今这些地区仍称稻为谷米或谷，均依汉语语音发音。中国又是粟的故乡，磁山与半坡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均出土有粟粒化石。至北魏时代，粟的品种已有86个。粟的栽培技术首先传到了亚洲各地，继又转引入欧洲。现在朝鲜称粟为“粟克”，苏联称“粟米子”，印度称“棍谷”。基本上保留了我国“谷”与“粟”的原音。除粟、稻之外，我国还有许多作物传往异邦，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影响颇大。如北朝时代，百济国中“五谷、杂果、菜蔬”等“多同于内地”。^①（指中国）新罗的“五谷果菜”也“略与华同”。^②日本、占婆等地也多如此。

① 《周书》卷四十九《百济传》。

② 《北史》卷九十四《新罗传》。

【外来经济作物的输入】 张骞通西域后，外来经济作物源源流入中土，不仅丰富了中国的农产品，而且对畜牧，工艺制造以及医药等方面都有较大影响。这些经济作物中的大部分至今仍被中国人民所习用。最早输入中国的是葡萄与苜蓿。葡萄盛产于中亚及西域地区，苜蓿产于大宛、罽宾一带，两物均在西汉武帝时传入。《史记·大宛列传》称“汉使取其种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葡萄肥沃地。”后来迅速推广，“离宫别馆旁尽种葡萄、苜蓿。”其后，中亚、南亚地区的石榴、红兰花、酒杯藤、胡麻、胡桃、胡豆、绿豆、胡瓜、胡蒜、胡萝卜、胡椒，西亚的橄榄，东南亚的草棉也都或早或晚地传入我国。从史籍中看，几乎所有的外来植物都挂在张骞名下，其实，这些植物中的大部分是在他之后输入的。如石榴，原产大夏、安息、印度一带，红兰花原产印度，胡椒原产波斯，这些植物都是在西晋以后才见于中国史籍。至于胡麻（即芝麻）、胡瓜（黄瓜）、胡萝卜所出史料更晚。草棉原产诃罗单一带，在三国的东吴时代渐渐移植于我国岭南一带。公元5世纪左右，高昌地区也开始引入棉花，这都表明中外经济作物的交流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

二、中国科学技术的外传

【凿井术与农业灌溉技术】 凿井术在中国出现很早。甲骨文中已有了“井”字。这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及人们生活带来莫大便利。大约在秦与西汉初年，凿井技术由流入匈奴的汉人带入塞北，后又随匈奴势力的伸张而向西方传播，公元前103年，汉武帝遣李广利率3万人围攻大宛，时“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于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但就在此时，匈奴人给大宛送来能打井的汉人水工，李广利“闻宛城中新得秦人、

知穿井”，遂与之议和。^①这表明中国的凿井法已传入中亚，而李广利所带水工，“徙其城下水空”的工程又是更先进的井渠法。井渠法是中国人的发明，武帝时所修龙首渠即用此法，此法是沿水脉间隔打井，“深者十余丈……井下相通行水”，用来控制水源和防止沿岸崩塌。这种技术随着西域屯田与征战的需要，由大批随军水工带至西域，并进而流传入中亚、西亚诸地。今苏联境内的伊塞克湖乌孙赤谷城遗址，就发现了汉代式样的灌溉渠道，当时“伊朗和中亚细亚人工灌溉典型的特色，就是修筑有汇集地下水用的地下渠道，为了进行有系统的清除，这些地下水渠均设有特殊的窥视孔，各孔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②这种灌溉方法应当是受到了中国井渠法的影响。

【铸铁炼钢术】 炼铁技术在我国出现较早，春秋时代的墓葬里已有铁器出土，战国时代已能生产渗碳钢，汉代则进一步发明了铸铁脱碳的百炼钢以及低硅灰口铁与球墨铸铁，钢铁的应用日渐普及。南北朝时代我国又出现了灌钢法，可生产出优质的高碳钢。至此，除合金钢铁外，我国的铸铁已基本达到现代的基本品种，炼钢技术也十分先进。这种先进的冶炼技术对其它国家产生了显著影响。据《汉书·西域传》汉通西域之初，“自宛以西至安息国……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这具体证明了古代中亚的冶炼技术是由汉人传过去的。此后汉人先进的冶炼技术仍不断地输入这个地区。至公元36年，张汤到西域时，见到胡人武器远不如汉兵，“矢刃朴钝，弓弩不利”。后因“颇得汉巧，”“弓矢渐利”，亦即得到了汉代的先进技术。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的冶炼技术继续通过匈奴、柔然、突厥等少数民族影响着中亚地区，并通过中亚向更远地区辐射。苏联塔吉克

^①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② 阿甫基耶夫著，王以铸译《古代东方史》第582页。

语中的铸铁 (Чуял) 即出自汉语“铸”字音；印度古代药学家纳刺哈里1235—1250年间著《药典》一书中，就译钢为“中国生”，由此可见中国钢铁技术的影响。另外，中国的冶炼技术，也在两汉时期向海东的朝鲜、日本诸国以及越南北部传播，这种传播更加直接，往往是由中国工匠直接将技术带至彼方，使这些国家由新石器到铁器的过渡，发生了迅速的飞跃，促进了社会政治、经济的进步。

【育蚕与织绸技术】 我国的养蚕与织绸技术始于新石器时代末期，70年代，浙江绍兴距今4700多年的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盛在竹器夹层中的丝织品有丝帛、丝带、丝绳等。^①此后育蚕和织绸技术不断发展，对世界蚕织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我国的蚕织技术首先传向海东的日本、朝鲜等地，世传箕子被封于朝鲜后，就“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②事实上，正是大批的中国移民将这一技术带到了朝鲜。《后汉书·东夷列传》已称辰韩“知蚕桑、作缣布”，稍后不久，蚕织业亦传往日本。据《日本书纪·仲哀天皇纪》记载，仲哀天皇八年（119）有一个自称秦始皇十一世孙的功满王将蚕种由百济带到了日本，这与我国史书《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中的记载“产紵麻，蚕桑，缉绩出细紵缣绵”的年代大致吻合。曹魏时代，倭国人丝织术已有所进步，卑弥乎女王遣使至魏时，已能够献“倭锦、绛青缣、绵衣”等丝织品了。至雄略天皇时代（457—497），随着中国织工的不断流入，日本蚕织业有了长足进步，由中国江南引进了四眠系蚕种。雄略天皇在471年将分散居住的秦人92部18000余人，赐号“秦酒公”，令他们从事养蚕织绸，次年，又将他们分置于宜于

① 高玉汉：《出土文物追溯蚕丝业的起源》，《蚕桑通报》1981年1月。

② 《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

蚕桑的各国县，这极大地促进了日本丝织业的发展。^①

蚕织业的西传，略晚于东传，先是传至葱岭以西的西域地区。《魏书·西域传》已有焉耆国养蚕绵行及疏勒产锦绵的记载。吐鲁番出土北凉承平五年（447）文书中也有“龟兹锦”字样，说明五世纪以前，西域的蚕织业已有了一定的普及，其始输入当更早于此。藏文《于阗国授记》记载了于阗从中原得到蚕种的传说。相传于阗先无桑蚕，至其第十代王尉迟舍耶时，娶中国公主为后，公主带去蚕种，并缫出丝做出衣服。《大唐西域记》卷十二、《新唐书·西域传》均有类似记载。这个于阗王时代，有人认为是公元220年左右，还有人认为当在公元一世纪初。于阗国在张骞至西域前即已存在，以汉朝世系约略推之，第十位国王在位至迟在公元2世纪以前或者更早。蚕织技术约略在五六世纪经由西域传布到中亚、西亚、印度以及拜占廷。《梁书》卷五十四《诸夷传》所记：普通元年（520）滑国（唃哒）所献物品中也有波斯锦等物，可见至迟公元6世纪初以前，波斯人已掌握了织绫锦的技术。拜占廷帝国也在查士丁尼时代（483—565），从中国学会了养蚕缫丝。《北史》所记大秦国已是“其土宜五谷桑麻，人务桑田”，可见蚕桑已在当地普及。

【数学、历法与医学】 中国古代的数学、历法、与医学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尤其是南北朝时代，取得了巨大进步，对外交流十分频繁。以印度与日本两国为例，印度自5世纪著名数学家阿耶波多（Arya Bhata 公元476年生）起，诸家所治算学，除少数传自希腊者外，多与中国算学雷同，如求勾股、圆周率、弧田术、开立圆术等，皆与中算相合，阿耶波多的一次不定式解法，即用辗转相除，求最大公因数法的应用亦为求日月五星

①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4页。

交会之时期，与《孙子算经》“物不知数”解题法及历家求上元积年算法相同。

从天文历法看，我国二十八宿至迟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1977年发现的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公元前430年左右）已有完整的二十八宿之名。^①印度亦有二十八宿，但它不仅晚于中国，而且所取星座与中国大致相同，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印度的二十八宿传自中国。这些都表明，随着佛教文化的交往，中国科学技术也传入印度。6世纪初，中国历算学承姜岌、何承天、祖冲之诸家后，可谓盛极一时。在佛教自朝鲜传入日本后，中国何承天元嘉历法亦由朝鲜学者传入日本，并被使用。此后，中国算书《周髀算经》、《孙子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缀术》等九种，对日本人的数学与历法也产生了极大影响。

也是在6世纪末叶，我国医生杨尔与知聪抵日本讲授医学并带去大批医书与针灸图；公元552年，梁文帝赐日本《针经》一部。这些交流，对日本古代的科技进步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三、西方科学技术的东来

【玻璃制造技术】 我国自古代起，即掌握了玻璃制造技术。不过，先秦秦汉时代，自制玻璃均属于铅钡玻璃，不耐高温，色彩亦差，因此，秦汉以来，西方玻璃仍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土。中国的工匠汲取西方的玻璃制造工艺，使中国自己的制造技术得以不断改良。晋人葛洪所著《抱朴子·内篇》云：“外国水精碗，

^① 参见王健民：《曾侯乙墓出土的二十八宿青龙白虎图象》，《文物》1979年第9期。

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之者。”这五种灰即硅土、苏打、石灰、镁、氧化铝，由此制出玻璃属钠钙玻璃，这说明至迟在3世纪初，我国已掌握了西方的玻璃技术。至北魏太武帝时代（424—452），西方玻璃制造技术也传至北方平城一带。《魏书·大月氏传》称太武帝时，有大月氏“商贩至京师，自云能铸热石为五色玻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平城）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光色映彻，观者莫不惊骇。”这是十分成功的吸收外来技术的一例。

【医学及其他】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外国科学技术除玻璃术外，还有许多方面，随中外交往的深入而传至中国，限于史料，已难考求。唯印度麻醉术的传入尚有痕迹可寻。佛教传入后，许多僧侣既通佛经，又通医学、算学，他们在译经、求经的同时，也将印度的许多科学技术介绍到了中土。如安世高“志业聪敏，刻意好学，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医方医术……无不综达。”在东汉末，即以“学术有名”^①。

印度科学技术的传入，主要集中在婆罗门书的翻译上，婆罗门学的内容，据《四韦陀经》所述，有治病法、斗战法、星宿法等64种技艺，婆罗门书随佛教一道流入了中国。朱士行求法至于阆时，于阆和尚向国王告状，“汉地沙门，欲以婆罗门书乱圣典。”可见婆罗门书流传之广。至《隋书·经籍志》中，输入的婆罗门书已有天文、阴阳、历算、算经及药书达80余卷，其中天文类有《婆罗门天文经》二十卷、《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论》三十卷、历算类有《婆罗门算经》三卷、《婆罗门阴阳算历》一卷、《婆罗门算法》三卷，医学类有《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婆罗门药方》五卷等，这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① 慧皎：《高僧传》卷一。

第三节 中外文化艺术的交流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东方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西方的希腊罗马文化构成了世界文化的几个中心。这一时期的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以由西向东的层进传播为特征。一方面，中国的文化艺术大量地传向朝鲜、日本诸地区，另一方面，印度、希腊与罗马的文化艺术又源源地向中国传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希腊艺术与印度艺术结合体的犍陀罗艺术的东来，更给中国的传统艺术风格带来了重大影响。

一、中国文化艺术的外传

【汉字与汉文学的东渐】 汉字与汉文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与异常丰富的内涵，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结晶。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汉字与汉文学以黄河、长江两大文明区域为中心向四周辐射。海外日本、朝鲜地区都陆续吸收了汉字与汉文学。高句丽无本民族文字，建国后即大力倡导汉字、汉文化，并模仿中国在国都平壤设立太学，运用汉文书籍进行教授。因此，高句丽境内，汉文“五经（《易》、《书》、《诗》、《礼》、《春秋》）、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纪》）、《三国志》、《晋阳秋》”等典籍十分流行。^①百济也屡屡遣使到南朝求书，其国内士人爱好中国“坟史”，“其秀异者颇能属文”。百济王余隆（武宁王）墓中出土的墓志及买地券均以汉字写成，而且墓志文风、内容均与南朝墓志相似。由百济为媒介，中国文化又传

^① 《北史》卷九十四《高丽传》。

入日本，考古发掘表明5世纪前期，九州地方已开始使用汉字。^①到南朝时代，日本的汉文水平已相当出色。如日本学者木宫泰彦所称：“《宋书》、《南史》等所载倭王武（雄略天皇）上宋顺帝之表文，有六朝风韵，骈俪体裁，堂堂大文，毫无和臭。”^②

【中国传统思想的东传】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的儒家与佛教思想陆续东传，高句丽、百济、新罗都较早接受了儒家思想，并奉为正统。日本的儒家思想则由百济传入，285年（应神天皇甲辰年）寓居百济的汉人王仁东渡至日本，“献《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于是皇太子从学焉”。^③此后，日本“大阐儒风”。应神之子仁德天皇在位时，已能讲出“今百姓贫之，则朕贫也，百姓富之，则朕富也”的地道儒家语言。这完全是《论语》中“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翻版。仁德之后，更有一些经学博士远抵日本，促进了儒学的流行。继体天皇时，有五经博士段杨尔、高安茂自百济至；钦明天皇时，有五经博士马丁安、王柳贵、易博士王道良自百济至，儒家思想构成了日本传统思想中的重要内容。

佛教思想的东传，略晚于儒学。372年左右，高句丽由前秦输入佛教。384年，百济也由东晋传入了佛教，其国内“有僧尼、多寺塔”。梁武帝时，百济遣人至建康表请涅槃等经义。3世纪至4世纪初，日本已由中国江南地区输入佛教艺术品，主要是铜镜中的佛象图案。不过，佛教的正式传入日本，还是6世纪中叶经百济传入的。552年（钦明天皇十三年）百济将铜佛象及幡盖经论输往日本，577年，又有“经论若干卷及律师、禅师、比丘尼。

① 参见齐思和：《上古时代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关系》，载《历史教学》1964年1期。

② 转见李季：《二千年中日关系发展史》第二册，柳州学用社，1940年版。

③ 《大日本史》卷二一四。

咒禁师、造佛工、造寺工”抵日本。①此后，日本佛教渐盛，到隋唐时代，已可直接与中国进行佛教往来。

儒、佛之外，中国的一些其它思想也传入海东诸国，如百济建国之初就由辽东输入了五帝神，中国的蓍龟、相术及阴阳五行说也传入其国。②不过，这些都未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建筑与艺术的影响】 中国的建筑形制与风格早在上古时代就影响到了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至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随着双边关系的发展，中国工匠及建筑技术越来越多地流入这两个地区，朝鲜忠清南道公州郡守山里古坟出土有“梁官瓦为师矣”铭文的莲花砖纹，③正说明百济引入南朝工匠及工艺技术的事实。其建筑风格必然受到中国的较大影响。以武宁王（即百济王余隆）墓为例，此墓为带甬道的大型单室砖墓，墓室的左右两壁和后壁都砌有砖雕的直棂窗，窗的上部设灯龕，墓前方还有砖砌下水道。整个墓的形制、结构都与中国南朝陵墓酷似。地下陵墓是地上建筑的缩影，由此可以看到中国建筑风格的影晌。日本建筑也通过百济受到中国风格的影响。如大和时代的法隆寺，或以为是中国北魏式，或认为“属南朝派”。不论哪一说，都不否认受中国风格的影响。

除建筑外，中国艺术也源源流向朝鲜与日本地区。百济曾从梁朝邀去画师、雕塑工匠多人，其中有些人又辗转至日本，这必然对当地的艺术风格产生影响。百济武宁王墓砖画纹图案以及石雕神兽都明显带有南朝风味，石雕神兽与南朝镇墓兽几无两样。④在日本各地，也不断有这一时期的中国式铜镜出土，这些铜镜或

① 《日本书纪》卷二十。

② 参见《北史》卷九四《百济传》。

③ (日)轻部慈恩：《百济遗迹的研究》，吉川弘文馆，1971年版。

④ (日)永岛晖臣慎：《武宁王陵》，日本学生社，1974年版。

由中国直接输入，或由居日本之中国工匠制作，或为日本民间艺人仿制，均有浓郁的六朝风格。日本奈良新山古坟出土的铜带饰，其形制、花纹，均酷肖于西晋周处墓出土之物，这也可见中国艺术风格的影响所在。

【中国生活方式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生活方式主要对日本、朝鲜、占婆等地区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是对日本的影响。据《日本书纪》雄略天皇十四年的记载，当时日本曾向南朝求取织工与缝衣工，据此可认为日本服饰应当受到中国南朝的影响。据《魏书·倭人传》，3世纪时，倭人男子“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妇人“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南朝梁元帝时的职贡图中所绘倭国使上身赤裸，仅披结束相连的横幅，下面赤足无履，形象正与倭人传记载略同。到公元五六世纪，日本衣饰有了一个较大变化，以群马县伊势崎市八寸古坟出土的礼装男子埴轮与女子埴轮为例，男子所着已不是结束相连的横幅，而是上着交领衣，下着长袴，膝下以带结缚，很象当时中国流行的袴褶。妇人所穿也不再是贯头衣，而是近似中国长裙的衣着。^①这种衣饰习惯在日本存在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二、西方文化艺术的东渐

【音乐与舞蹈】 西汉武帝以前，中国音乐、舞蹈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尚不多见，中国乐器以钟、鼓、磬、钲之类的打击乐为主，笙、簧、琴、瑟等管弦乐为副，歌舞场面与乐队配署都比较简单。张骞通西域后，外部世界的乐器始大量输入，如箜篌，本为

^① 参见《日本原始美术大系》（3），讲谈社，1977年版。

印度乐器，西汉时传入中国，武帝曾令乐人侯调仿制，以祠太一后土。东汉时，又经由西域输入了一种竖箜篌，并出现了适合这种乐器演奏的《箜篌引》。又如琵琶，是古代印度与波斯的乐器，也是汉代传入，或写作“枇杷”、“枇把”，晋代方固定为“琵琶”。后经中国乐家的改制，成为中国的传统乐器。此外，其它如箜篌、箛、胡角、笛等许多乐器也在这一时期传入。乐器的大量输入构成汉代西方乐舞东渐的一大特点。魏晋南北朝时代，乐曲的输入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色。十六国时代，印度地区的天竺乐就输入前凉，后渐入内地。北魏与北周时代，先后从安息输入了安国乐，从康居地区输入了康国乐，又由朝鲜半岛输入了高丽乐与百济乐。南朝则传入了扶南乐。与乐曲传入的同时，弹奏乐曲的成套乐器与乐工的服饰衣着也一并传入。如高丽乐，即有“弹箏、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腰鼓、齐鼓、担鼓、贝等十四种”^①乐器同时输入，乐工都著“紫罗帽、饰以鸟羽、黄大袖、紫罗带、大口袴、赤色靴”^②，这在艺术交流史上颇具特色。

与乐曲传入的同时，异邦舞蹈也源源而来。传入的各国乐曲中都有舞曲若干。如安国乐中有“末奚”舞曲，高丽乐中有歌芝栖舞曲，天竺乐中有天曲舞曲。在这一时期画像石及铜镜中保留的舞蹈形态中也很容易发现外来影响的痕迹。与外部世界艺术交流的同时，周边少数民族的乐舞也不断内传。它与这一时期的中外艺术交流一道为唐代乐舞的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建筑、绘画与雕塑】 中国古代建筑所受外来影响一直不大，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唯佛塔建筑的传入值得一提。中国佛寺相传初建于东汉明帝时，佛塔之传入当亦与之同时。至魏

①② 《隋书》卷十五《音乐志》。

晋南北朝时代，佛塔建筑已十分风行。比较著名者如北魏洛阳永宁寺的宝塔，“举高九十丈，有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登临此塔“视宫中如掌中，临京师若家庭”。^①初期佛塔建筑，受到较多的印度、中亚建筑风格的影响，但以后渐渐揉合了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使之成为中国古典建筑艺术中的一支奇葩。

与佛教的传入大致同时，西方绘画艺术也大量传入。东汉明帝所建佛寺中就有佛教壁画。到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画已十分兴盛，中亚与五天竺的绘画技法自然也随之传入中国，为中国画家借鉴、吸收。南朝画家张僧繇即善画寺院壁画，受到较多的印度画法的影响。史称其“殊方夷夏，实参其妙”。他以前的中国画画面多受线条支配，凹凸不易显示，张僧繇吸取了天竺的晕染法，增加了画面的立体感。537年，梁朝曾建一乘寺，“寺门遍画凹凸花，代称张僧繇手迹。其花乃天竺遗法，朱及青绿所成，远望眼晕如凹凸，就视即平。”^②时人固称一乘寺为凹凸寺，这在中国画史上影响颇大。晕染法以后便成为中国画的基本技法之一。

雕塑与绘画相比，所受外来影响更大。汉代石刻艺术品中常可见到有翼神人及蛇身双翼的图案，一望便知这不是中国固有的风格，而是希腊艺术在中国的变体。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雕塑迅速发展，犍陀罗风格与中国传统雕塑风格汇合而成的石窟寺艺术，堪称中外艺术交融的典型。著名的云冈、龙门、麦积山、敦煌等石窟都建于此时或始建于此时。这一时期是中国雕塑艺术的繁盛时代。

① 《洛阳伽蓝记》卷一，永宁寺条。

② 许嵩：《建康实录》卷七，中华书局1986年版。

【语言文字】 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开始渗入外来因素。中亚、印度一带的语言词汇被移植入中国语言中。如琉璃、葡桃、琵琶等皆是。尤其通过佛经的翻译更丰富了我国的语言。现在流行的一些词汇如“世界”、“刹那”、“功德无量”、“五体投地”等都源于佛经，在语法方面则使汉语中增加了倒装句与提挈句。另外，梵音也对中国文字产生了一定影响。南朝永明体诗人以及《四声切韵》、《四声论》著作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梵音的影响。至唐末，有僧人宋温根据梵文字母的体系创制了三十六个字母，为中国声韵的发展树立了基础。

外来文化对中国古典文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以佛教文化的影响最为突出。两晋的玄言诗中往往掺杂着佛家思想与佛教典故，佛经中的寓言故事也很快汇入到中国古典文学的创作中，六朝神怪文学的发达即与此息息相关。

【杂技与其他】 杂技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西汉武帝以后，西方杂技艺术大量涌入，倍受朝野青睐。有“都卢寻橦”、跳剑丸，以及幻术中的“变化吐火、肢解、易牛马头”、“种树植瓜”等节目。观赏杂技已成为汉代一项普及性的娱乐活动。不过，这一时期的外来杂技艺术还往往由“外国客”表演，尤以大秦、安息人居多。至魏晋南北朝时代，杂技艺术中的外来部分已完全中国化了，而且在中国这块艺术的土壤上获得了更大发展。南北朝时代规模最大的“鱼龙烂漫之戏”，即西汉时由西方传来，后又得以发展与提高，梁朝演化为“变黄龙，弄龟伎”，北朝则为“鱼龙烂漫”。幻术方面，魏晋与刘宋时代的“画地成川”，梁朝的“吞剑伎”，北朝的吞刀，吐火，拔井，种瓜，杀马，剥驴等项目，均本于东汉传入之外国魔术而又多有改进与提高，已汇入中国魔术的序列。

第四节 佛教的输入与传播

印度佛教在阿育王时代（公元前273—前232年）迅速外传，它北入中亚、南入斯里兰卡，以后又渐次传入西域诸国以及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中国东汉至魏晋时代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为佛教的流传提供了重要前提，因此，这一时期，佛教势力也在中国迅速展开。佛教的迅速中国化，也为中国的传统思想注入了新的内容。

一、佛教的输入与流传

【佛教的输入】 佛教原是流行于五天竺一带的宗教，创始人悉达多·乔达摩，约公元前563年出生在今尼泊尔境内释迦部落建立的迦毗罗卫国中，本为王子，后弃家出走，创立佛教，在恒河流域上游传教40余年，奠定了佛教发展的基础，后来佛教徒称他为释迦牟尼。公元前3世纪中叶，摩揭陀阿育王在位时，大力弘扬佛教，使之迅速流传。至贵霜王朝迦腻色迦二世时代（2世纪初），又尽力宣弘佛法，使佛教随大月氏势力的扩张而不断伸展。公元前1世纪左右，佛教已传入中国西北部的龟兹、于阗等国，公元二三世纪，这些城邦的佛教已十分发达。关于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内地，至今说法不一。比较可信的说法是张骞出使西域时，自大月氏人那儿“始闻浮屠之教”。此后，随中西交往的日渐发达，佛教逐步输入中土内部。西汉哀帝时，佛教及其经典引起了中国士大夫们的注意，公元前2年（哀帝元寿元年）有“博

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①东汉时代，佛教流传广泛，光武帝之子楚王英即“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明帝的诏书中也称他“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②《洛阳伽蓝记》称：“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传入中国之始。”东汉末年，不仅桓帝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民间崇佛立寺者亦时有出现。灵帝时，丹阳人笮融就在徐州广陵之间“大起浮屠之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阁堂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象，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③可见至此时佛教已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宗教信仰了。

【佛教在中国北方的迅速流传】 东汉时代，政府尚禁止汉人出家为僧。到三国时代，由于政治动荡及不断的战乱，民众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佛教信徒迅速增加，东汉政府的禁令也随着它的垮台而告终止。曹魏甘露年间（3世纪中叶），颍川人朱士行是第一个往西域求法的僧人。此后，汉人为僧者日渐增多。尤其是西晋灭亡后，北方动乱不已，佛教迅速传播。后赵时，龟兹僧人佛图澄为石勒、石虎所信任，“有事必咨而后行，号大和尚。”并且“朝会之日，和尚开殿，……主者唱大和尚，众坐皆起。”因此，在后赵境内，“民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④。佛图澄“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⑤。佛教俨然成了后赵国教，这对佛教的流传意义颇大。此后的北朝时期，佛教之风行臻于顶点。477年（北魏孝文帝太和元年），北方僧尼人数不足8万人，到534年左右，已激增至200万。东西魏分裂与北齐、北周时代，两国僧尼人数达300万左右，约占当时北方

① 《三国志》卷三十《东夷传》注引《魏略》。

② 《后汉书》卷四十二《楚王英传》。

③ 《后汉书》卷七十三《陶谦传》。

④⑤ 《高僧传》卷十。

总人口的1/10，而唐会昌灭佛前，唐朝全国僧尼人数也不过26万，不足北朝的1/10，北朝佛教之盛行可见一斑。

【东晋南朝君臣的佞佛】 南方地区早在东吴时代即开始流行佛教，江苏江宁、吴县、南京等地东吴墓葬中出土的陶瓷谷仓上往往贴塑着佛象。湖北鄂城、湖南长沙与浙江武义等地还发现了许多佛象图纹的吴镜。此时南方的佛教，或由西北间接传入，或直接由海上输入。至东晋南朝时代，佛教得以继续发展。这一时期的君臣大多佞佛成性，梁武帝曾四次舍身同泰寺为奴，每次都由群臣出钱一亿万赎回。陈武帝也曾在建康大庄严寺舍身为奴，由群臣赎回。江南士族大家嗜佛的风气也不亚于封建皇帝。南齐竟陵王萧子良，身为宰相，屡次在府中大会僧众，亲自送饭送水，并抄录佛经71卷。在他们的影响下，一般百姓也往往“竭财以趣僧，破产以趋佛。”^①梁武帝时建康城中已有“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②不过，南方佛教较之北方还是略逊一筹，这主要由于南方比较安定且保留了较多的儒家与玄学的传统。

二、中外佛教僧侣的往来

【早期来华僧人及译经】 早期中土佛教的传播者都是异邦僧侣，见于史籍的第一批来华僧人是东汉明帝十年（公元67年）应邀前来洛阳的天竺僧人迦叶摩腾（一名摄摩腾）和竺法兰。他们两人住白马寺编译佛经《四十二章经》等，被认为是中国佛教传播之始，接着是安息国僧安清（又称安世高）。安清据说是安息国王之子。148年（东汉桓帝建和二年）来到中国，先后译出《安

① 范缜：《神灭论》。

② 《南史》卷七十《郭祖深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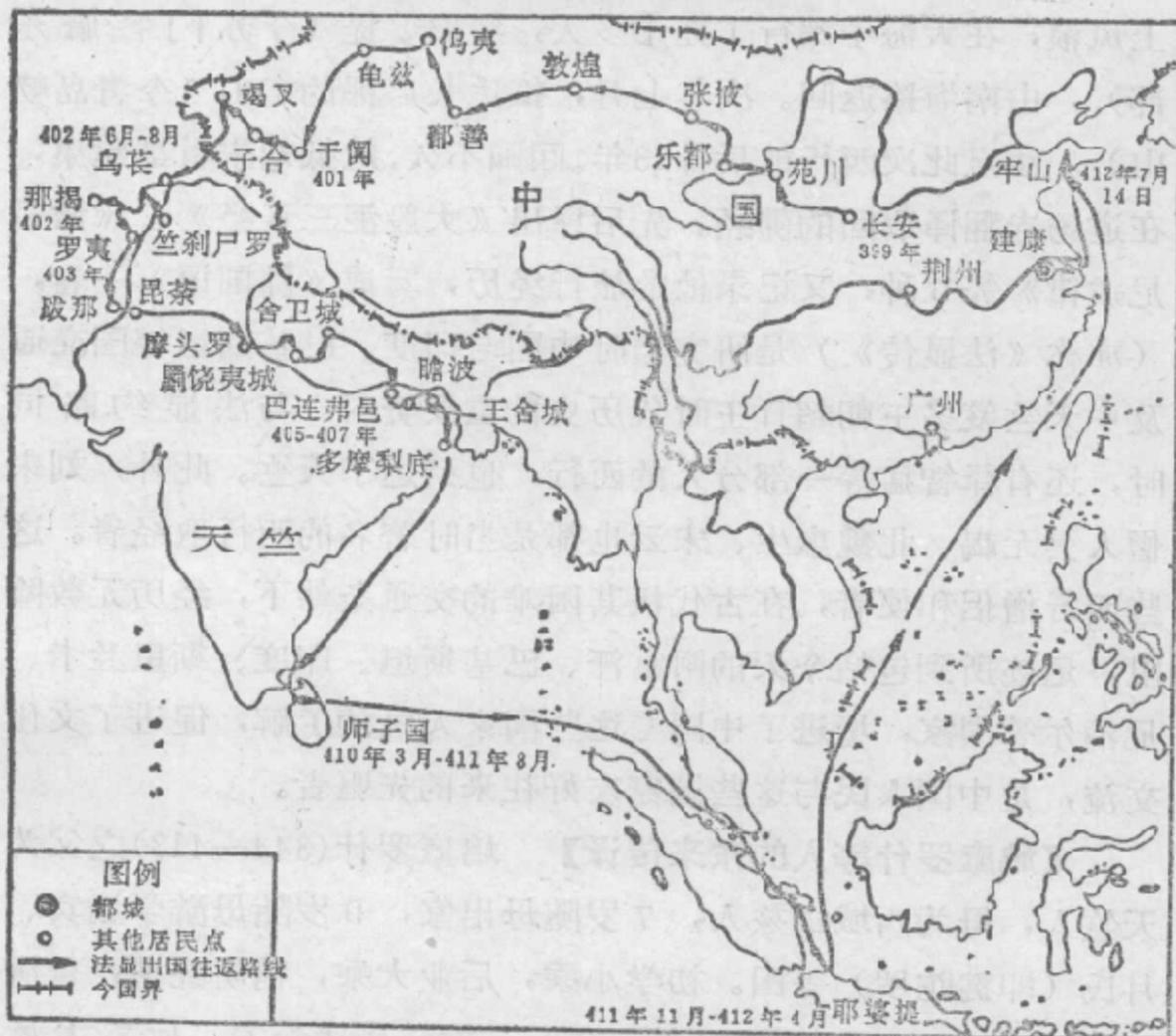
般守意经》等经典39部。继安清之后，又有大月氏僧人支谶于桓帝末年来到洛阳，译出《般若道行品经》等十余部经典。灵、献二帝间，译经师相继东来，这一时期共译出佛经292部，395卷。至魏晋时代，来华僧人日渐增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竺法护。法护，原名昙摩罗刹，其先大月氏人，后流寓敦煌。西晋时代，随师遍游西域诸国，归来时“丈赍梵经。”此后便专意从事将佛经“写为晋文”的工作。^①他“终身写译，劳不告倦”，前后译出佛经169部，为佛经翻译作出了重要贡献。早期来华僧人及其译经活动，既传播了佛教文化，又促进着中外人民的友好往来，并为以后的中外佛教交流打下了基础。

【早期中土僧侣的西行取经】 佛教传入初期，大多口口相承，极少经典。汉魏以来，经典渐多，但也往往间由西域而来。佛教僧徒对般若理解不一，而当时译经既少且又不能保证质量，因此中土僧人也开始西行取经。存于史籍中最早西去的僧人是颍川人朱士行。260年（曹魏甘露五年）朱士行西渡流沙，直赴于阗国。于阗当时流行大、小乘教，是南道岭东六国的名城，也是西域佛教中心之一。朱士行在这儿取得梵书胡本共90章，后由竺叔兰、无叉罗译出，称为《放光般若》。朱士行之后，西行僧徒渐众。如中山人康法朗，少出家，与同学四人从张掖出发，西渡流沙，遍游西域诸国。西晋安阳侯京声也曾西至于阗，从天竺三藏佛驮斯那习禅法。又有前秦僧人竺佛念、伽跋澄、昙摩难提等同行西去。这些先驱者们远涉艰阻，为佛教文化的输入殚精竭力，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们西行的范围多在西域诸邦，最远到北天竺，所取经典大受限制。

【法显及其后继者的西行取经】 法显，俗姓龚，平阳武阳

^① 《高丽传》卷七。

法显出国往返路线示意图



(今山西襄垣南)人。后秦初年居长安，为寻求佛法戒律，公元399年三月，法显踏上西去的路程。经由鄯善、于阗等邦，越葱岭，先后巡历北天竺乌长国、弗楼沙国以及那竭、罗夷、跋那诸国，渡印度河到达毗荼国。405年，抵笈多王朝都城巴连弗邑（又名华氏城，今印度巴特那）。此时正值超日王时代，崇仰佛教，国势强大。法显用了一年多时间在这儿“学梵书、梵语、写律”。406年，他又到释迦牟尼诞生地迦毗罗卫巡礼，是到达尼泊尔的第一个中国人。407年，法显到达恒河河口的多摩梨国，（今印度加尔各答西南）居留二年“写经及画像。”409年初，搭乘商

人船踏上归程。先至师子国，停居二载，411年，又搭商船，遇上风浪，在大海中漂行了九十多天，经耶婆提（今苏门答腊东部），由南海路返回。次年七月，抵达长广郡的牢山（今青岛崂山）。法显此次西行前后计13年。回国不久，就抵刘宋首都建康，在道场寺翻译取回的佛经。先后译出《大般泥洹经》、《僧祇尼戒律》等5种，又记录他的旅行经历，写成《佛国记》一卷，（亦称《法显传》）是研究当时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交通及中天竺笈多王朝超日王时代历史的重要资料。与法显约略同时，还有释智猛等一部分人的西行，也到达了天竺。此外，刘宋僧人昙无竭、北魏惠生、宋云也都是当时著名的西行取经者。这些西行僧侣和使者，在古代极其困难的交通条件下，经历无数险阻，足迹所到包括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家，增进了中国与这些国家人民的了解，促进了文化交流，是中国人民与这些国家友好往来的先驱者。

【鸠摩罗什等人的东来传译】 鸠摩罗什(344—413)之父为天竺人，母为西域龟兹人，7岁随母出家，9岁随母游学罽宾、月氏（即犍陀罗）等国。初学小乘，后业大乘，精研经典，誉满西域。公元401年（后秦弘始三年），辗转到达长安。后秦主姚兴辟逍遥园为译场，请鸠摩罗什担任译主，又命僧肇等八百余僧襄助翻译，直到409年鸠摩罗什病终为止，共译出佛经98部，425卷，仅次于后来的玄奘。但他所译的经、论范围之广却超过玄奘。尤其是由于鸠摩罗什精通梵、汉两种语言，他所译的佛经，水平远胜前代。他的译文典雅而又不损原意，既不流于生硬的直译，又保存了“天然西域之语趣”，^①受到当时僧侣的普遍欢迎。鸠摩罗什所译经论不仅对传播佛教文化起到了重大作用，而且奠定了

^① 《宋高僧传》卷三。

中国翻译文学的基础。与鸠摩罗什同时，迦毗罗卫国僧佛驮跋陀罗也在408年来到长安，后又至建康，先后译出佛经十余部。又有中天竺人昙无忏，在北凉玄始中（412—425）至北凉都城姑臧（今甘肃武威）译经，河西走廊一度成为佛经翻译的据点。此后约一个多世纪，在梁武中大同元年（546年）有西天竺优禅尼国（今印度阿麦达巴德一带）僧人拘那罗陀从海道来到中国，至陈朝时代，共译出《摄大乘论》等经典64部，278卷。此外，在魏晋南北朝时代，还有许多梵僧来华从事译经工作，使这一时期的翻译水平大有提高。而且由于译经有政府的支持，人力物力都有保障，计划性较强，所译出的佛经更加系统。所以这一时期无论是大、小乘，还是经、律、论，大体上都陆续译了过来。此后，中国的佛教进入吸收消化过程。至隋唐之际，便具备了形成各宗派的条件。

三、佛教输入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佛教的中国化趋势】 佛教传入后，渐渐地蒙上了中国色彩，出现了中国化趋势。魏晋南北朝时代，这一趋势以鸠摩罗什与法显的活动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相当于魏晋时代，这一时期由于清谈玄学之风盛行，而佛教初入，思想亦不系统，往往向玄学靠拢，通过玄学与士族接近，以传播佛教。佛经翻译中亦多借用玄学名词，安世高将“安般守意”译为“清静无为”。康僧会译“真如”为“本无”，甚至有的还把“涅槃”译为“无为。”东晋初名僧支遁更精通老庄，融玄学、儒学为一炉，汤用彤认为此时是“佛教在中国之玄学化。”^①

^① 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六章《佛教玄学之滥觞》。

后期为南北朝时代，这一时期随着佛教经典大量系统地流入与玄学本身的停滞不前，佛教思想渐渐脱离了玄学附庸的地位，佛教的中国化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佛教本身开始适应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从而产生了与印度原佛教教义的差异。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僧肇与竺道生的贡献尤为突出。僧肇为鸠摩罗什弟子，他从佛教大乘中观宗唯心主义立场上对当时般若六家七宗各派进行了批判，建立了中土中观宗的哲学体系。竺道生也是鸠摩罗什弟子，他发展了当时般若学者的理论，认为只要充分体会佛理，即可顿悟成佛。顿悟既省时，又省力，受到当时门阀士族的欢迎。除教义外，佛教形式也开始中国化，从教义到教规都日益与中国固有传统合拢。初时，佛门弟子“不拜王者，不报父母”，此时也“拜王者，报父母”。如北魏“法果每言太祖，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①连佛教内部头目也领官俸，有官阶，“自姚秦命僧契为僧正，秩同侍中，此则公给食俸之始也。”^②佛教成为“助王政之禁律”的自觉工具，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南北朝的反佛与灭佛】 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固有文化不断发生碰撞，佛道之争、儒佛之争从未间断。佛教本身势力的强大又与一些王朝的统治者产生了尖锐的对立。这在北朝主要表现为二次大规模的灭佛，在南方则以范缜的神灭论为代表，在思想界进行了尖锐的反佛斗争。北魏太武帝时代，拓跋氏初入黄河流域不久，对佛教不够了解，而佛教也与统治者不相融洽，公元445年（太平真君六年），太武帝下令全国沙门一概坑杀，所有经象都要烧掉，但并未杀尽沙门。不久，佛教又告炽盛。至北

①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

② 《大宋僧史略》卷中。

周武帝时代，面对佛教政治经济势力的日益强大，尤其是寺院经济严重地分割了政府的劳动人手和土地，于是在574年（建德三年）武帝下敕禁断佛、道二教，“宝刹伽蓝皆为俗宅，沙门释神悉作白衣”^①。周灭齐后，又继续在齐地推行灭佛政策，这次灭佛使得“民役稍息，租调年增，兵师日盛。”^②至杨坚秉政后，方下令复行佛、道二教。南朝统治者虽然也与佛教有一系列的矛盾，但南朝佛教势力远不如北朝强盛，尤其是寺院经济远弱于北方，尚在封建王朝能容许的范围内，因此，在南方主要是思想界的反佛斗争。其中以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最具代表性。范缜著有《神灭论》，旗帜鲜明地向唯心主义神学体系发难。他主张“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灭则神灭”，并以大量事实驳倒了“佛形相异、形神有二”的观点。而且他还直接指出了佛教流行的社会危害，“至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惰游，货殫于土木”，认为“浮屠害政，桑门蠹俗”，力主废除佛教。尽管未得到当时统治者的认可，但却在思想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佛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佛教输入中国后，为相当一部分人所信奉，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至人民生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代，诸朝君臣大多信佛，佛教几乎成为当时的国教，对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巨大影响，以致北周武帝灭佛时，也不得不对上层僧侣按排相应的世俗职位。寺院经济随佛教的发展而日益强盛，构成了中国中古封建经济的重要特色。佛教思想对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它的许多思想内容为儒、道所接受。随佛教的传

① 《历代三宝记》卷下。

② 《广弘明集》卷十《叙任道林辨》。

人，佛教艺术、东方印度艺术文化也大量地输入中国社会，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宝库。另外，佛教的输入对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也带来了较多的影响，时至今日，这种影响的痕迹还依稀可见。佛教文化是外部文化大规模输入中国的第一次，它进入中土后，很快便被中国固有文化所改造、吸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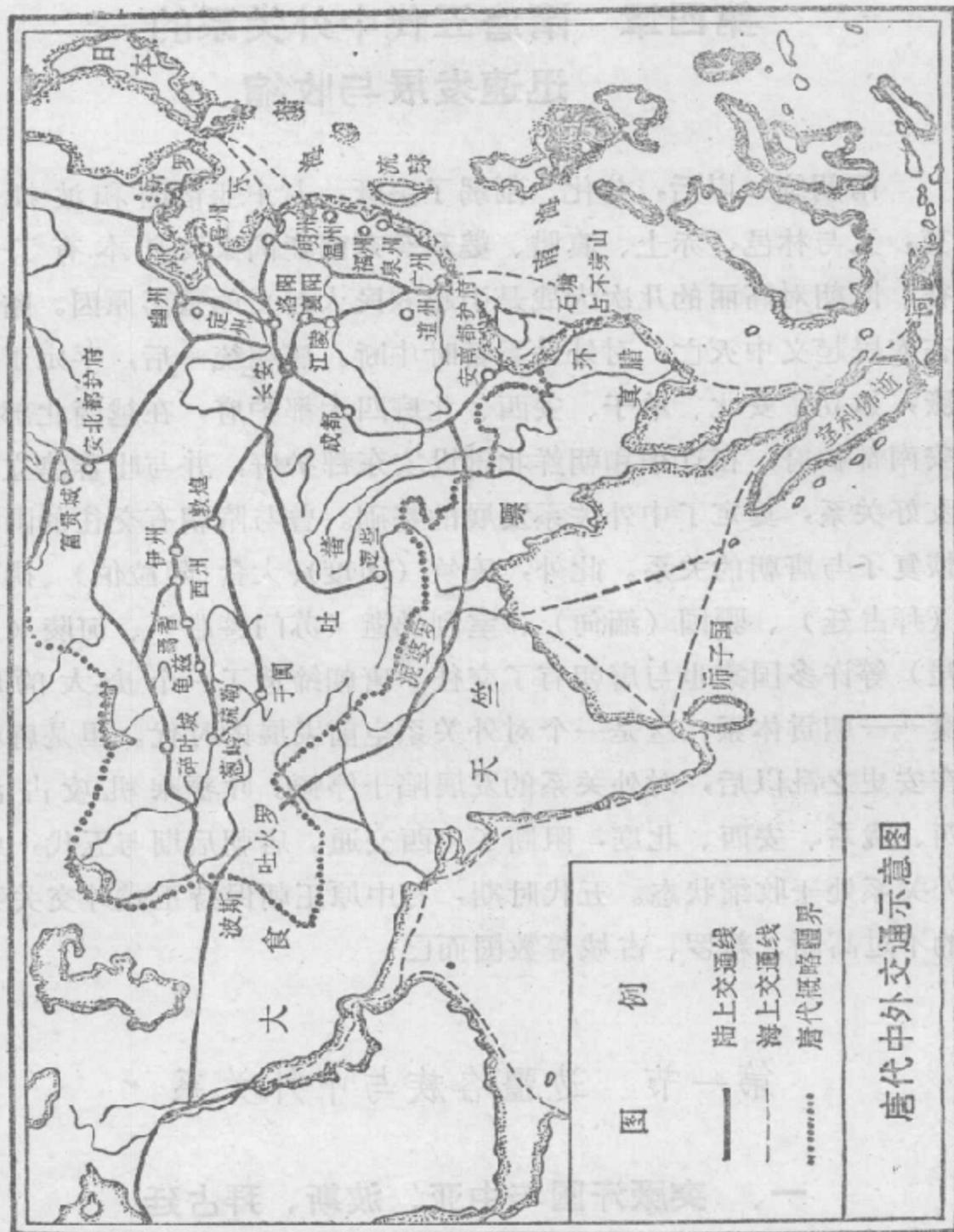
第四章 隋唐五代中外关系的 迅速发展与收缩

隋朝统一以后，分化、削弱了突厥，与中亚诸国和波斯建交，又与林邑、赤土、真腊、婆利等东南亚国家及日本有了交往。隋朝对高丽的几次大战是引起农民大起义的重要原因。隋朝在农民起义中灭亡，对外关系暂时中断。唐朝统一后，平定了突厥，建立了安北、单于、安西、北庭四大都护府，在越南北部设安南都护府，在辽东和朝鲜北部设安东都护府，并与吐蕃建立了友好关系，奠定了中外关系发展的基础。曾与隋朝有交往的国家恢复了与唐朝的关系。此外，天竺（印度）、大食（阿拉伯）、拂菻（拜占廷）、骠国（缅甸）、室利佛逝（苏门答腊）、诃陵（爪哇）等许多国家也与唐朝有了交往。唐朝缔造了一个庞大的羁縻——朝贡体系，这是一个对外关系空前发展的时代。但是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后，对外关系的发展陷于停顿。吐蕃乘机攻占河西、陇右、安西、北庭，阻断了中西交通。唐朝后期与五代，中外关系处于收缩状态。五代时期，与中原王朝保持正式外交关系的不过高丽、新罗、占城等数国而已。

第一节 边疆各族与中外关系

一、突厥汗国与中亚、波斯、拜占廷

【突厥破柔然】 突厥人公元6世纪时在金山（阿尔泰山）一带游牧，臣服于柔然，为其铁工。土门可汗时，（突厥文称布



民Bumin可汗)与西魏建立了关系。546年(大统十二年),土门击破铁勒,收其众五万余落,恃其强盛,求婚于柔然。柔然首领阿那瓌大怒,派人辱骂土门说:“你是我的锻奴,怎么敢说这种话?”土门大恚,杀柔然使者,转而求婚于西魏。551年(大统十七年)西魏将长乐公主嫁给土门。次年,土门发兵大破柔然,自号伊利可汗(IL qagan),建突厥汗国(552—582年),成为继匈奴、鲜卑、柔然之后蒙古高原上又一个游牧强国。

【突厥与波斯瓜分哒哒】 木杆可汗在位(553—572)时,突厥击灭柔然,西破哒哒,东败契丹,北并契骨(黠戛斯),其疆域东自辽海以西至西海(里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贝加尔湖)五六千里,汗庭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鄂尔浑河上游的于都斤山。突厥为了对付哒哒,与波斯联姻,可汗将一个女儿许配给波斯库萨和一世(Khosrou I 531—579年)。

直接征讨哒哒的是伊利可汗之弟室点密可汗(Istämi qagan,卒于576年),558年前与波斯瓜分哒哒。突厥占领了塔什干、费尔干纳、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地,波斯占领了喀布尔、吐火罗(阿姆河中游)等地,两国以阿姆河以北的铁门为界址。^①

【突厥与萨珊波斯】 突厥强盛,“有凌轹中夏之志”,或联北周以攻北齐,或联北齐攻北周。565年(周武帝保定五年),木杆可汗将女儿嫁周武帝,周人每年给突厥人十万段缁絮锦綵。579年(周静帝大象元年),北周还答应将千金公主嫁给他钵可汗(572—581年)。北齐也曾向突厥求婚,倾府藏之财以给之。他钵可汗曾对部众说:“只要我在南方的两个儿子(指北齐、北周皇帝)孝顺,何愁没有财物!”突厥每年得到大量丝绸织物,销售于波斯、拜占廷、中亚诸国。

^① 余太山,《哒哒史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103—113页。

历来从事丝绸贸易的粟特商人说服突厥可汗派一个使者到波斯萨珊王朝去，要求波斯允许粟特人在那儿向波斯人及西方商人销售丝绸。568年之前，突厥遂派粟特商人马尼亚赫(Maniach)出使波斯。^①库萨和一世收购了使团带去的丝绸而付之一炬，以示拒绝谈判。突厥又派第二个使团前去。波斯王下令将一些使节毒死，只有三、四人幸免于难。波斯谎称突厥使节是因气候干燥窒息而死的。

突厥转而与拜占廷结盟以对付波斯。569年，拜占廷、波斯使节同至突厥汗廷，突厥可汗向波斯人兴师问罪。571年突厥又遣使劝拜占廷进攻波斯。

579年，库萨和一世去世，他与突厥可汗之女所生的儿子继位，称霍尔穆兹四世(579—590年)，他虽与突厥汗族是亲戚，但仍与突厥为敌。588年，突厥进攻吐火罗，直抵赫拉特，遭到波斯将军巴赫兰·处宾(Bahram chobin)的抗击，突厥可汗(处罗侯?)被箭射死。^②随后，巴赫兰杀君篡位，霍尔穆兹之子库萨和二世(Khosrou II, 591—628年)借拜占廷军队之力进攻巴赫兰，巴赫兰投奔突厥，后被杀。突厥乘机侵占了吐火罗。

【突厥与拜占廷】 突厥为了对付波斯，寻求拜占廷的支持。567年突厥可汗派马尼亚赫出使拜占廷，他带着一封用“斯基泰文”写的信，拜见了查士丁二世(Justin II? —578)。^③查士

① 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205—207页，辑弥南《希腊史》残本，英译文；芮传朋，“粟特人在东西交通中的作用”，《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一辑。

② 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第130页。

③ 西诺：《中亚》，英文本，印第安纳大学，1969年第105页作“Justinian II”，王治来著《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80页作查士丁尼”。查《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译本第二卷，第222—223页，查士丁尼二世于669—711年在世，不可能接待567年来访的突厥使者，当为565—578年在位的查士丁二世(Justin II)。

了二世希望与突厥联盟，但为了使结盟条件有利于拜占廷，遂将拜占廷培育的蚕种拿给突厥人看，以示无求于突厥人。接着派遣蔡马库斯（Zemarkhos）为首的使团回访突厥，双方结盟。571年蔡马库斯返回时，突厥派第二个使团前往君士坦丁堡，请求拜占廷废除与波斯和约。拜占廷答应了这一要求，遂进攻波斯，攻战达20年（571—591年）。此后拜占廷又向突厥派遣了攸提开俄斯（Eutychios）、瓦伦丁（Valentinos）、赫洛店（Herodian）和西里西亚人保罗（Paul of Cilicia）等使者。

576年拜占廷皇帝提比留二世（Tiberius II，574—582年在位）^①派瓦伦丁再次出使突厥。达头可汗（Tardu，575?—603年在位）因拜占廷为自己的奴隶乌罗、浑等部族（假阿瓦尔人）提供居留地并与他们结盟很不满意，达头可汗对瓦伦丁极其冷淡。此后，达头可汗派波汗（Bokhan）指挥一支突厥骑兵去进攻克里米亚的拜占廷移民地。576年，在匈人首领阿纳盖（Anagai）帮助下，波汗围攻博斯普鲁斯（Bosporus）的拜占廷城市潘替卡配乌姆（Panticapaeum，今刻赤附近）。581年，突厥人开始进攻切尔松尼斯（Chersonesus，在今克里米亚），直到590年才离开^②

【突厥与隋、唐】 581年隋朝建立，对突厥各可汗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突厥内部矛盾激化，582年（开皇二年）以后，分裂为东突厥汗国（582—630年）和西突厥汗国（582—659年）。汗国间不断混战，势力大为衰落，隋朝得以向西伸展势力。608

^① 查士丁二世统治时期，提比留在巴尔干半岛对阿瓦尔人作战。约574年查士丁患精神病，皇后索菲亚和提比留接管政府。查士丁认提比留为养子，并于574年12月7日指定其为同朝皇帝，后又加冕为唯一的皇帝（578.9.26）。查士丁死（10.4）后，提比留成为唯一的统治者。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七卷，第732页。故576年的使者实系提比留派出。

^② 格鲁赛：《草原帝国》，英译本，新泽西1970年版第85页。

年（大业四年），隋占领伊吾（哈密）。次年，击败吐谷浑，设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控制了通向西域的门户，与中亚、西亚数十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隋亡，突厥重振。中原的李渊、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之徒，皆向东突厥始毕可汗（609—619年）称臣。颉利可汗（620—630年）时，“兵马强盛，有凭陵中国之志”，^①武德七年、九年（624、626）两次入侵唐朝，京师震动。

唐太宗积蓄力量，以待平定突厥。627年（贞观元年），薛延陀、回纥等部背叛突厥。次年，东突厥突利可汗降唐。颉利可汗任用诸胡（粟特人），内部多叛之。唐太宗遂于629年（贞观三年）派军队全线出击，次年灭东突厥汗国。至647年（贞观二十一年），设燕然都护府，669年（总章二年），改称安北都护府，管漠北各部。已于650年（永徽元年）设立的瀚海都护府，至669年改称单于大都护府，管漠南各部。

唐朝进而逐步从西突厥的势力范围里夺取天山南北。630年（贞观四年），伊吾归唐。640年，唐朝攻占高昌（吐鲁番），设安西都护府。648年，攻占龟兹（库车），迁安西都护府于此，以龟兹、于阗、疏勒、碎叶为安西四镇。649年，设瑶池都督府，以西突厥叶护阿史那贺鲁为都督，统西突厥各部。651年（永徽二年），贺鲁叛唐。征战数年，至657年（显庆二年）擒贺鲁。659年斩真珠叶护，平定了西突厥。在西突厥各部设崑陵、濛池二都护府，其所役属诸国，分置州府，都隶属安西都护府。到702年（长安二年），将安西都护府一分为二，另设北庭都护府，治庭州（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统辖天山、锡尔河一线以北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安西都护府则统辖这一线以南各绿洲

^① 《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上，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6册，第5155页。

的城廓诸国。^①

隋唐五代中外交交通的主要途径是中亚陆路。中国在文化方面所受的最大的外来影响来自南亚、西亚、欧洲，因此，安北、单于、北庭、安西四大都护府的建立，使唐朝基本上控制了蒙古高原与中亚的草原、绿洲，为唐朝发展对外关系奠定了基础。

二、后突厥、突骑施与中亚、大食

【后突厥西征中亚】 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年)，东突厥颉利可汗族人骨咄禄(682—691年在位)起兵反唐，称颉跌利施可汗(Qoutlough—Iltävis qagan)，重建东突厥汗国，史称后突厥(682—745年)，控制了大漠南北。其弟默啜可汗(691—716年在位，Qapagan qagan)开拓疆域，连岁犯唐。702年(长安二年)，入侵六胡州(今鄂尔多斯地区)。^②后突厥为了对付唐、黠戛斯、突骑施的合谋围攻，先发制人，于711年(景云二年)破黠戛斯，次年破突骑施，追击其残部渡过锡尔河，与大食军队发生冲突。随后东返，于714年进攻唐朝的北庭，被击退。^③毗伽可汗(Bilge)在位时(716—734年)与唐朝基本保持和平，经济交往渐多。此后国势渐衰，745年亡于回纥。

回纥汗国存在百余年间(744—840年)基本上保持着与唐朝的友好关系。唐朝从630年平定东突厥以后，没有再受到来自游牧民族的严重威胁，这是唐朝发展对外关系的重要前提。

① 关于隋、唐对西域的经营，可参阅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第一册第96—120页。

② [苏] 克里亚什托尔内：《作为中亚史料的古突厥卢尼文献》，莫斯科1963年俄文版，第89—91页。

③ 马小鹤：《七一二年的粟特》，《新疆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突骑施与大食】^① 659年西突厥汗国灭亡之后，西突厥十姓之一的突骑施势力渐强。其首领乌质勒（？—706年）为众所归，以碎叶（今苏联中亚托克玛克西南的阿克——贝西姆）为大牙，伊犁河畔的弓月城为小牙，被唐朝封为瑶池都督。伊斯兰史料记载大食夺取中亚时常与突厥人作战，可能即指突骑施人。乌质勒之子娑葛（706—712年）于709年（景龙三年）被唐封为钦化可汗，次年与唐、黠戛斯合谋欲围攻后突厥，712年（先天元年）为后突厥打败，被杀。

不久突骑施别种苏禄自为可汗，复雄西域，受唐册封。717年（开元五年），曾联合大食、吐蕃，谋取安西四镇，但不久与唐和解，被唐封为忠顺可汗。722年，唐以金河公主嫁苏禄。唐支持苏禄帮助中亚诸国反抗大食入侵的斗争。720年，苏禄派库尔苏勒（kursul）率军进入河间，帮助粟特人反抗大食。723年，突骑施军队击退进犯拔汗那（费尔干纳）的大食人。翌年，大食再犯拔汗那，苏禄派其子率军往援，大破大食军队，史称“渴水日之战”。727年，中亚人民大起义，苏禄率援军一度攻入呼罗珊，使大食人在阿姆河以北只剩撒马尔罕及两个小据点。729年，大食人夺回布哈拉。731年“山隘之战”，^②突骑施围攻撒马尔罕，12,000大食士兵只剩千余人。大食人惧怕苏禄，呼为“阿布·穆札欣”，意为“牴人者”（即象或牛）。^③

苏禄与后突厥、吐蕃有交往，娶其公主为妻。734年（开元二十二年）以后，突骑施与唐交恶，进犯安西、北庭。唐曾与大

① 参阅薛宗正：《突骑施汗国的兴亡》，《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第93—111页。

② H. A. R. 吉布：《阿拉伯人在中亚的征服》，伦敦1923年英文版，第61—62页、70页、74页。

③ W. 巴托尔德：《降至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伦敦1977年英文版，第187页。

食呼罗珊总督联络，打算合击苏禄。736年北庭都护盖嘉运大破苏禄，苏禄请降。

737年，大食人进攻骨咄（在阿姆河中游北岸），骨咄向苏禄求援。苏禄长途奔袭，追击大食人而南渡阿姆河，在喀里斯坦遭到大食人突然袭击，败归。次年，为部下所杀，其子吐火仙立。739年（开元二十七年），唐军在石国（塔什干）、史国（沙赫里夏勃兹）、拔汗那军队支援下，平吐火仙。突骑施渐衰，后臣属于葛逻禄。

三、吐蕃、南诏、渤海对中外交通的影响

【吐蕃与南亚、中亚、大食】 公元7世纪古藏族在青藏高原上建立了吐蕃国。松赞干布（629—650年在位）统一了西藏，定都逻些（拉萨）。泥婆罗（尼泊尔）国王鸯输伐摩（630—640年）于639年将赤贞公主嫁给松赞干布。^①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吐蕃一方面控制了泥婆罗，另一方面与唐联姻，开辟了从长安经逻些到加德满都的中印藏道。643、647、657年，唐朝派王玄策三次出使印度，都取道吐蕃，第二次还借吐蕃、泥婆罗军队以伸张国威。

器弩悉弄赞普（676—704年在位）时，吐蕃南境属国泥婆罗等皆叛，赞普亲自前往征讨，卒于军中。其子弃隶缩赞（704—754年在位）继位。吐蕃请婚于唐，710年（景龙四年），中宗把金城公主嫁之，唐蕃关系有所改善。但吐蕃始终打算从唐朝手中夺取西域。715年（开元三年），吐蕃与大食共立阿了达为拔汗那王，原拔汗那王奔安西求救，安西出兵逐走阿了达，重新控制

^① 黄盛璋：《关于古代中国与尼泊尔的文化交流》，《历史研究》1962年第1期第95—96页。

了拔汗那。^①717年，吐蕃与突骑施、大食一起谋取安西四镇，未成。722年，吐蕃围攻小勃律（克什米尔的吉尔吉特），欲假道攻安西四镇，唐北庭都护张孝嵩派兵协助小勃律，大破吐蕃。732年，大食遣使至吐蕃王廷，^②可能共商夺取四镇。736年，吐蕃攻破小勃律，740年吐蕃又将公主嫁小勃律王。西北二十余国皆为吐蕃所制，无法与唐朝交往。747年（天宝六年）安西副都护高仙芝率一万兵马进军帕米尔，收复小勃律，置归仁军，唐朝声威大振。750年高仙芝破羯师。753年，安西都护封常清讨大勃律（克什米尔的巴勒提斯坦），一战而胜。从692年到753年，唐朝在与吐蕃争夺西域的斗争中基本上占了上风，控制着中西交通的主要道路。

中西交通的衰落与中断，源于安史之乱（755年）。为了平叛，将安西、北庭、河西、陇右、朔方的精兵大批内调，致使边备空虚。乾元（758—760年）之后，吐蕃逐步攻陷了河西、陇右，切断了安西、北庭与朝廷的联系，唐在西域势力渐衰。到790年（贞元六年），吐蕃终于攻陷北庭，以后又攻陷安西、西州，唐朝的陆上对外交通基本中断。

【南诏与东南亚】 南诏首领皮逻阁（728—748）年在位在唐朝支持下统一六诏，迁治太和城（大理）。南诏全盛时辖有今云南全部、四川南部、贵州西部等地。750年（天宝九年），南诏反唐，旋归附吐蕃。793年（贞元九年），南诏首领异牟寻（779—808年在位）决定归唐，遣使者经安南（越南北部）等地前往成都表示归顺^③。801年（贞元十七年），南诏与唐军联合进攻吐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开元三年十一月（715年12月）。

② 王尧译：《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青海民族学院，1979年版第83条。

③ [唐]樊绰著，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32—333页。

蕃，俘虏了吐蕃大酋及替吐蕃作战的康（撒马尔罕）、黑衣大食（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士兵。

南诏附唐，促进了唐与东南亚的交往。骠国（缅甸一部）王在贞元年间听说异牟寻归唐，很羡慕。802年，骠国王遣使经南诏入唐朝贡，并献其国乐12曲，乐工35人。804年，弥臣国（伊洛瓦底江口一带）与南诏、吐蕃都遣使入朝于唐。翌年，弥臣国王受唐册封。南诏还与大婆罗门国（印度），小婆罗门国（印度阿萨密南部）有来往。

但从829年以后，南诏走上了向外攻掠的道路。829年（太和三年），攻破成都，与唐交恶。832年，侵骠国，俘虏3,000多人，迁徙到拓东城（昆明）。835年，破弥臣、弥诺国，虏其族二三千人，发配到丽水（伊洛瓦底江）淘金^①。858年（大中十二年），师子国（锡兰）侵缅，南诏发兵救之。南诏还向昆仑国、女王国（都在今泰国）水真腊国、陆真腊国（柬埔寨）出过兵。

846年（会昌六年）。在东南亚方面，五代只与占城有过外交关系。分裂割据时期中外关系因道路阻塞而难畅通，处于低潮。

【渤海与对外关系】^② 渤海是以靺鞨粟末部为主，结合其他靺鞨诸部与部分高句丽遗民所建立的。698年（唐圣历元年），由高句丽旧将大祚荣建国。疆域包括今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东部，乌苏里江以东至海，朝鲜半岛北部高句丽旧地，南与新罗接壤。玄宗先天年间任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臣属于唐。渤海在唐僖宗时（874—888年）可能与新罗有过交往。10世纪初渤海王大谏谥害怕契丹，暗中与新罗结援，然终

^① 《云南志校释》第312页。

^② 关于渤海，可参阅金毓黻著《渤海国志长编》，《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印，王承礼著《渤海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为契丹所灭。

渤海与日本关系非常密切。据日本史籍记载，从727年到919年渤海曾34次遣使赴日。而727年到795年共68年间，渤海13次遣使赴日，有时使团人数多达300余人。日本也都遣使回访。795年以后，日本不再回访，企图将渤海作为藩属，渤海不肯。日本就规定准许渤海每12年遣使一次，否则拒绝入境。渤海通使日本主要为了贸易，对沟通中日交流起了一定作用^①。

渤海于926年（天显元年）为辽所灭，改称东丹，以辽太子倍为东丹王。930年，东丹遣裴璆出使日本，是渤海与日本关系的延续。东丹被废除后，970年前部分渤海遗民在鸭绿江畔建定安国，终为辽所灭。1017年，部分定安人出奔高丽。1029年，渤海遗民在王族大延琳领导下复国，国号兴辽。兴辽国曾几次向高丽求援，高丽本欲响应，但未及出兵，兴辽国已为辽所灭。

第二节 隋唐与西域诸国的关系

一、中 亚

【隋朝韦节、杜行满出使】 隋炀帝时（605—618），派侍御使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出使于西藩诸国，到罽宾（今阿富汗喀布尔河流域）得玛瑙杯；王舍城（今印度比哈尔西南的拉杰吉尔）得佛经；史国（今苏联中亚沙赫里夏勃兹）得十个舞女、狮子皮、火鼠毛；安国（今布哈拉）得五色盐而返。

当时西域各国商人多到张掖贸易，炀帝命裴矩在武威张掖间引导诸国进贡。裴矩了解了40多个国家的情况，写成《西域图

^① 金毓黻著：《东北通史》，《社会科学》杂志社印上册第275—280页。

记》三卷，献给炀帝，此书今已佚。裴矩给各国来使以重利，要他们转告别国也来朝贡。大业年间相率来朝的有30余国，炀帝设置了西域校尉接待各国使者。这些小国大部分在今苏联中亚：康国（撒马尔罕）、安国、石国（塔什干）、拔汗（费尔干纳）、米国（喷赤干）、史国、曹国（伊什特汗）、何国、穆国（查尔朱）^①。挹怛与吐火罗杂居，在阿姆河中游，跨苏联、阿富汗国界，乌那曷在阿富汗的安得胡伊，漕国在阿富汗的加兹尼。隋末中断了关系。

有几个国家与西突厥有关。石国曾背叛突厥，射匮可汗发兵攻灭，令特勤旬职摄其国事。挹怛曾发生内乱，突厥派通设字洁强领其国。^②康国王世失毕娶了达度可汗之女为妻，屈术支娶叶护可汗之女为妻，臣服于突厥。

【唐朝董寄生、王名远设羁縻府州】唐朝初年就与中亚诸国建立了广泛联系。武德年间（618—626）建交的有康国、安国、西曹国（隋时曹国）、东曹国（乌腊提尤别）、石国、吐火罗和劫国（今克什米尔的奇特拉尔）。贞观年间（627—649），史国、何国、火辞弥（阿姆河下游）、俱密（苏尔哈布河流域）、俱兰（科克恰河流域）、识匿（舒格楠）、帆延（阿富汗的巴米扬）都遣使来唐。永徽年间（650—655），康国几次遣使将自己为大食所攻、兼征赋税的情况报告唐朝。拔汗那（隋时拔汗）在贞观中为西突厥的阿瑟那鼠匿夺取了渴塞城（今卡散），形成了突厥人与本国王族的联合统治，显庆（656—661年）初遣使朝贡。

唐朝平定西突厥后，原在西突厥统治下的中亚就归附唐朝了。658年（显庆三年），高宗派果毅董寄生前往河中设立都督

①（日）白鸟库吉著，傅家勳译：《康居粟特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②《隋书》卷八三《挹怛传》。《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第1—2页认为“洁强”是人名，也可能是官号。

府、州。①情况如下：

大宛都督府	石国	今塔什干
休循州都督府	拔汗那	今费尔干纳
康居都督府	康国	今撒马尔罕
南谿州	米国	今喷赤干
贵霜州	何国	今kashania
佉沙州	史国	今沙赫里夏勃兹
安息州	安国	今布哈拉
木鹿州	东安国	kalkan-ata

康、安、米、何、史、石、曹诸国人来到唐朝，即以国名为姓，统称“昭武九姓”或“九姓胡”，以善于经商著称，在政治、军事、文化方面也有较大影响。

同年高宗派陇州南由县令王名远往吐火罗置州县。龙朔元年（661），王名远进《西域图志》六十卷，请于于阗以西、波斯以东16国分置都督府，以及州80、县100、军府126，并于吐火罗立碑以记此事。高宗同意。王名远设置的16个都督府如下②：

月支都督府	吐火罗	今阿姆河中游
大汗都督府	厌哒	今阿姆河中游
条支都督府	诃达罗支国	今阿富汗加兹尼一带
天马都督府	解苏国	今苏联杜尚别一带
高附都督府	骨咄	今苏尔哈布或白克什河与 喷赤河之间
修鲜都督府	颞宾国	今喀布尔河流域

① 吴玉贵：《唐代西域羁縻府州建置年代及其与唐朝的关系》，《新疆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② 参考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63—64页。《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第142—153页。

写凤都督府	帆延国	今阿富汗巴米安一带
悦般都督府	石汗那国	今科克恰河上游
奇沙州都督府	护时健国	今阿富汗希巴尔干南面
姑墨州都督府	怛没国	今苏联捷尔梅兹
旅獒州都督府	乌拉喝国	今阿富汗安德胡伊一带
昆墟州都督府	多勒建国	今阿富汗木尔加布河流域
至拔州都督府	俱密国	今苏尔哈布河上游
乌飞州都督府	护密多国	今阿富汗瓦罕地区
王庭州都督府	久越得健国	今苏联米高扬格勒一带
波斯都督府	波斯国疾陵城	今伊朗扎博勒

董寄生与王名远所设的羁縻府州绝大多数位于今苏联中亚地区与阿富汗，均以当地原来的首领为都督、刺史，可以世袭，贡赋版籍不上户部。唐朝并不干涉当地行政，不加重当地经济负担，只把这一地区作为安西都护府的外围。这一地带对唐抱友好态度，安西、北庭就比较稳固。

【诸国请唐援助以抗大食】 654年（唐高宗永徽五年），大食第一次渡过阿姆河，进攻米国、康国，康国曾向唐告急。以后五十年间，大食不断侵袭河中，但未占领其地。705—715年，屈底波任大食呼罗珊总督期间，占领了不少地方。屈底波死后，中亚诸国皆欲摆脱大食统治，纷纷向唐求援。

719年（开元七年，即回历100年），河中盛传大食只合一百年强盛，这年合满。康国王乌勒伽上表：“伏乞天恩知委，送多少汉兵来此，救助臣苦难。……如有汉兵来此，臣等必是破得大食。”^①同年，安国王笃萨波提也上表，“仍请敕下突骑施，令救臣等，臣即统领本国兵马，计会翻破大食。”^②俱密国王那罗

①② 《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延也上表，“伏望天恩处分大食，令免臣国征税，臣等即得久长守把大国西门。”^①

唐朝很难直接用兵河中，而大食也未严重威胁安西、北庭，因此唐朝只限于支持突骑施去援助各国反抗大食。

突骑施抗击大食，帮助河中诸国维持了半独立地位，但很少用兵吐火罗地区，吐火罗仍置于大食重税欺苦之下。727年（开元十五年），吐火罗叶护遣使上表，说：“又承天可汗处分突骑施可汗，云西头事委你，即须发兵除却大食，其事若实，望天可汗却垂处分奴身。”^②石国也曾上言请讨大食。其他国家也常向唐遣使朝贡。

【唐朝在中亚封王】 738年，突骑施可汗苏禄被部下所杀，其子吐火仙继立。唐朝决定直接出兵，联合中亚诸国，平定突骑施。739年（开元二十七年），安西都护盖嘉运率石国王莫贺咄吐屯、史国王斯谨提等共击吐火仙，抓住了他。疏勒镇守使夫蒙灵贇率精兵与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一起击斩突骑施黑姓可汗尔微特勤。唐军收集诸部散落百姓共几万人交给拔汗那王。744年（天宝三载），安西都护夫蒙灵贇击斩反叛的突骑施莫贺达干。唐朝完全平定了突骑施。正如659年平定西突厥一样，这次唐的势力又大为伸展。唐朝通过封王和加特进的形式确定了对中亚诸国的宗主权^③。

年代	王号	国名	人名	今地
739年	奉化王	拔汗那	阿悉烂达干	费尔干纳
740年	顺义王	石国	莫贺咄吐屯	塔什干
740年	可汗、拓羯王	史国	斯谨提	沙赫里夏

^{①②} 《册府元龟》卷九九九。

^③ 有关资料可参阅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19、91、113、89、85、95、115页，第六册第69页，第三册118页。

				勃兹
742年	怀德王	西曹国	哥逻仆罗	伊什特汗
744年	钦化王	康国	咄曷	撒马尔罕
744年	恭顺王	米国	默啜(?)	喷赤干
745年	归义王	安国	屈底波	布哈拉
745年	罽宾及乌菴国王			
		罽宾	勃匄准	喀布尔河流域
744年	恭化王	陀拔斯单	阿鲁施多	里海南岸
747年	归信王	陀拔斯单	忽鲁汗	
747年	顺德王	都盘	谋思健摩诃延	里海南岸(?)
747年	守义王	勃达	摩河涩斯	
747年	恭信王	阿没	俱那胡没	阿莫尔
747年	顺礼王	沙兰	卑路斯威	
747年	义宁王	罗利支	伊思俱习	里海南岸
747年	奉顺王	怛满	谢没	捷尔梅兹
747年	义宾王	岐兰	庐薛	吉兰

唐朝不仅重申了在河中的宗主权，而且影响及于里海南岸，一个重要原因是白衣大食（倭马亚王朝）已危在旦夕，势力退出中亚，唐朝与中亚小国进一步加强了联系。拔汗那与唐关系最密切，744年（天宝三载），唐改其国号为宁远，玄宗以外家姓赐其王曰窦，又封宗室女为和义公主，嫁给阿悉烂达干。754年，拔汗那派王子薛裕入朝，留作宿卫，学习中华礼仪。唐朝与史国、西曹国关系也很好，曾将史国改名来威国。西曹国王在天宝四载上表要求将自己的国土同为唐国小州。

751年（天宝十载），安西都护高仙芝举措失当，擒斩石国顺义王，石国王子奔走告于诸胡国，群胡激愤，与黑衣大食（阿

拔斯朝)联合,在怛罗斯一战,打败了高仙芝。但这一仗并未取消唐在中亚的影响。753年(天宝十二载),唐封石国王男那俱车鼻施为怀化王,并赐铁券。次年,东曹国王、安国副王及诸胡九国王一起上表,请同心击破黑衣大食。玄宗好言慰抚。各国一直朝贡不绝。

安史之乱以后,拔汗那、吐火罗与西域九国还发兵帮助唐朝平叛。唐玄宗在传位肃宗时说:“西北诸胡,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其用。^①”诸胡军队是唐收复两京的精兵的一部分。乾元(758—760)之后,吐蕃攻陷河陇,诸胡朝贡渐稀。790年(贞元六年),吐蕃攻陷北庭后,中亚诸国与中国的关系就断绝了。五代之世,中原与西域的交往,远不过于阗,与葱岭以西没有什么外交关系。

二、波斯

【隋唐与波斯的通使】 波斯萨珊王朝库萨和二世(591—628年)曾几次派使者出使隋朝,隋炀帝曾派云骑尉李昱出使波斯。波斯又派使者随李昱回访。

伊嗣俟(即叶兹底格德三世 Yasdegerd III 632—651年在位)在贞观年间几次派使者到唐朝来。同时萨珊王朝在西方遭到新兴的大食(阿拉伯哈里发国家)的不断进攻。伊嗣俟逃往东方,于651年在谋夫城附近遇害,萨珊王朝亡。

【卑路斯】 655年(永徽五年),伊嗣俟之子卑路斯(Perozes)逃到吐火罗,派使者向唐求救。唐高宗考虑路途太远,无法援救。不久,大食内部穆阿威叶与阿里发生争夺哈里发职位的斗争,无暇东顾。吐火罗派兵援立卑路斯,卑路斯回到了波斯东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唐纪》三四。

部。

唐平定西突厥后，于661年（龙朔元年）派王名远在中亚设羁縻府州。卑路斯上奏说常被大食侵扰，请兵救援。王名远即以波斯国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拜卑路斯为都督，次年立卑路斯为波斯王。卑路斯几次遣使朝贡。

白衣大食建立后，663—671年间完成了征服波斯东部呼罗珊的工作，把卑路斯赶了出来。673年（咸亨四年）卑路斯逃到了长安，被封为右武卫将军。677年（仪凤二年），卑路斯还奏请在长安醴泉坊设一座波斯寺。不久卑路斯死于长安。

【泥涅师】 卑路斯之子泥涅师（Narses）留在长安充当质子。677年（仪凤二年），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别帅李遮旬与吐蕃联合，进攻安西。唐朝决定以吏部侍郎裴行俭为安抚大食使，肃州刺史王方翼为副使兼安西都护，护送泥涅师回国，册封他为波斯王，打算以此为掩护，伺机平定都支。结果擒获了都支、李遮旬。裴行俭将他们押回长安，王方翼留在碎叶筑城，而让泥涅师自己回国。泥涅斯阻于大食势力，流亡吐火罗20多年，有部落数千人，后渐离散。景龙二年（709年），泥涅师回长安，授左威卫将军，不久病死^①。

泥涅师的波斯部众继续存在，从719—750年（从开元七年到天宝九载）十次遣使进贡。其中722年（开元十载）曾要求派一员汉官去，唐朝答应了。乾元（758—760年）初曾有波斯人跟着大食人从海上袭击广州，抢劫仓库，焚烧房屋后从海上退走。直到771年波斯人还遣使献真珠、琥珀等。以后不见记载，波斯部众完全散亡了。

^① 《旧唐书》、《唐会要》（波斯传）指裴行俭送者为卑路斯。据《新唐书》（波斯传）所记应为卑路斯之子泥涅师。今采《新唐书》之说。

三、南 亚

【戒日王与唐通使】 天竺（印度）未曾向隋朝遣使，炀帝引以为恨。

7世纪初，印度分为大小70多个王国。萨他泥湿伐罗国（Sthāneśvara）戒日王（尸罗逸多）606年继位，统一了北印度，定都曲女城（今卡瑙季），建立了曷利沙（Harsha）帝国^①。玄奘约于641年会见了戒日王，将唐朝与李世民的情况告诉戒日王^②。戒日王即自称摩伽陀王，派使者上书给唐太宗，唐太宗命令云骑尉梁怀敏持节慰抚。戒日王惊异地问周围的人：“自古曾有摩诃震旦的使者到我国来吗？”梵语“摩诃”意大，“震旦”即中国大家都说：“从未有过。”戒日王接受了唐朝的国书，又派使者随梁怀敏回访唐朝。

【唐朝李义表、王玄策出使】^③ 唐太宗因为印度使者远方而来，优礼有加。此后唐朝派王玄策三次使印，成为唐朝与印度关系的高潮。

第一次，唐太宗于贞观十七年（643）派卫尉丞李义表为正使，融州黄水县令王玄策为副使，经吐蕃、泥婆罗（今尼泊尔）赴印。李义表、王玄策抵曲女城，受到戒日王的隆重接待。645年正月，李义表等在王舍城（今拉杰吉尔）东北耆闍崛山凿石为铭，二月又立碑于摩诃菩提寺（今加雅城南郊）。李义表又至东印度迦摩缕波国（孟加拉北部和阿萨姆），其国童子王（尸鸠摩）

① [印度] R.C. 马宗达等著，张澍霖等译：《高级印度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69—176页。

② [唐]玄奘撰，章巽校点：《大唐西域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9页。

③ [法]烈维撰《王玄策使印度记》，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

要求唐朝将道教经籍译成梵文送给他们。李义表等回国报告了唐太宗，太宗即命玄奘等将《道德经》译成梵文，交给王玄策，让他再次出使时送给童子王。

戒日王复派使者向唐献火珠、郁金香、菩提树。

第二次，647年（贞观二十一年），王玄策作为正使前往天竺，以蒋师仁为副使。他们经吐蕃，入印度，戒日王刚刚去世，国中大乱，其臣阿罗那顺篡位自立，发兵包围王玄策。王玄策从骑30人矢尽被擒，各国贡物被抢劫一空。王玄策在夜间逃出，到吐蕃西南发文告召集邻国军队，吐蕃派来精兵1,200人，泥婆罗派来7,000多骑兵，王玄策重返曲女城，连战三日，攻破城市。阿罗那顺弃城逃跑，被蒋师仁擒获。翌年，王玄策押着阿罗那顺回到长安，太宗非常高兴，以王玄策为朝散大夫。太宗死，葬昭陵，玄阙所列石象之一即阿罗那顺。迦摩缕波童子王曾赠3万牛马及弓刀兵器支援过王玄策，还送给唐朝许多奇珍异物及地图，请赐老子象^①。

第三次，657年（显庆二年），王玄策奉命送袈裟到天竺。经过吐蕃，于659年至婆栗闍国（今尼泊尔以南、恒河以北），受到设乐招待。660年，送袈裟到摩诃菩提寺，十月归国。回国途经迦毕试（喀布尔河流域），从古王寺取佛顶骨一片带回长安，在宫内供养。

【诸国受唐册封以抗大食】 大食伊拉克总督哈加吉710年派其侄子穆罕默德·伊本·卡西木出兵印度，711—712年征服了印度河下游的信德，以此为基地攻打各地的印度王公。

720年（开元八年），南天竺王尸利那罗僧伽请以自己的战象及兵马征讨大食及吐蕃等，要求唐朝为其军队命名，玄宗表示

^① 参阅〔印度〕辛哈·班纳吉著《印度通史》，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221—230页。

嘉许，命名为“怀德军”。同年十一月，唐朝遣使正式册封他为南天竺国王。

乌菟（今巴基斯坦斯瓦特河流域）与大食接壤，开元（714—741年）中，大食几次引诱乌菟臣服，但其王与骨咄、俱位（今马斯图吉与乞特拉尔之间）二王都不肯，玄宗命使者正式册封为王。

南亚各国向唐遣使，主要通过陆路交通，吐蕃攻陷北庭之后，中印交通也随之中断。

南亚也可通过海路与唐朝来往。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王哈他达他（Hatthadata）于670年（总章三年）已遣使入唐。741年（开元二十九年），高僧不空^①从广州出发，附昆仑舶，经河陵国（今爪哇中部），未满一年，到师子国，受到师子国王的极大礼遇。746年（天宝五载），不空回到长安，呈上师子国王尸罗迷伽（719—759）的国书和方物。750年（天宝九载），师子国又献象牙、真珠。唐德宗（780—805年）曾自制钟铭，赐给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今巴特那北30里），很可能就是从海上送去的。此后唐国势日衰，与南亚的海上交通也不见诸记载了。

四、大 食^②

【唐与白衣大食】 阿拉伯人在穆罕默德（570—632年）及第一任哈里发阿布·伯克（632—634年）领导下统一阿拉伯半岛后，在以后几位正统哈里发时代（635—661年）向外扩张，征服西亚、北非，建立了版图辽阔的阿拉伯哈里发国家，史称大食。651年（永徽二年），大食国元首噶密莫米臧（即第三任正统哈

^① 赞宁：《高僧传》三集卷一。

^② 参阅〔美〕希提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7—245页。

里发奥斯曼，644—656在位）向唐派出了使臣，与唐建交。从此直到798年（贞元十四年），见诸记载的大食来使近40次，双方一直保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大食灭波斯，侵康国。早在永徽（650—655年）中，波斯王子卑路斯与康国就要求唐朝帮助他们抵抗大食，唐以路远不能相救。657年，唐平定西突厥后，在波斯国疾陵城、康国等地设立了波斯、康居等19个都督府及许多州县，建立了唐朝的宗主权，支持波斯王子卑路斯、康国等抵抗大食。

661年第四任正统哈里发阿里被刺杀，叙利亚总督穆阿威叶（Mu'awiyah 661—680在位）篡夺了哈里发之位，建立了倭马亚王朝（661年—750年），史称白衣大食。开元（713—741年）初，白衣大食使者见唐玄宗时平立不拜，礼宾官要惩办他们，中书令张说讲大食俗不同，不可治罪，就开了特例。以后使者再来，在礼宾官的坚持下，答应行跪拜礼。此事暴露了唐朝与历代王朝一样抱着天朝大国的自大思想。

白衣大食呼罗珊总督屈底波（705—715年）大力向东扩张，征服了河中。715年，大食与吐蕃共立阿辽达为拔汗那王，削弱了唐朝在西域的威望。唐军乘屈底波被杀，发兵反攻，逐走阿辽达，遏制了大食向东扩张的势头。719年康国、安国、俱密国，720年南天竺，727年吐火罗都曾请求唐朝帮助他们抵抗大食。唐朝厚加抚慰，支持突骑施去与大食作战。

735年，突骑施入侵北庭、安西拨换城，对唐朝的威胁超过了大食对唐朝西境的压力。于是唐朝曾经一度计划与大食联合，共同对付突骑施。738年，突骑施苏禄可汗被杀，白衣大食也日薄西山。唐朝通过将十多个中亚、西亚、南亚的小国统治者正式册封为王，确立了唐朝对这一广大地区的宗主权。唐在与白衣大食的斗争中占了上风。

【怛逻斯之战】^① 747年，阿拔斯党徒阿布·穆苏里姆在中亚起义，反抗白衣大食。750年，阿拔斯党首领阿布·阿拔斯推翻白衣大食，建立了阿拔斯王朝，史称黑衣大食，即以穆苏里姆为呼罗珊总督。

750年，拔汗那王与石国王不和，拔汗那王请唐帮助。安西都护高仙芝发兵讨伐石国，石国王请降，高仙芝假装同意，但突然攻破石国，杀老弱，虏壮丁，搜括财物。天宝十载（751年），高仙芝将石国王送往长安处死。石国王子求告于西域各国，各国皆怒，欲联合大食以攻安西四镇。六月，高仙芝率军数万，进至怛逻斯城（今江布尔），与穆苏里姆的大将济雅德·布·萨利赫的军队对峙5天。在战斗中，葛逻禄部叛变，与大食夹击唐军，高仙芝大败，只剩几千人撤回安西，2万余人被大食俘虏。

俘虏中有杜佑族子杜环，他在大食留居十余年，著《经行记》，今已佚，只在杜佑的《通典》中保存了若干片断。其中讲到在大食有画工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隳、吕礼。俘虏中也有造纸工匠，教会了撒马尔罕人以碎布造纸，造纸法由此传入了穆斯林世界。

【唐与黑衣大食】 怛逻斯之战的第二年，即752年十二月，黑衣大食即向唐遣使，与唐建交，此后使节不断。755年，爆发安史之乱，757年（至德二载）正月，大食派军队与拔汗那等国的军队随安西、北庭兵开进中原，加上回纥援兵，作为精锐部队，收复了长安、洛阳。758年（乾元元年），大食人与波斯人一起抢劫仓库，焚房屋、浮海而去，这恐非黑衣大食官方所为，而是商人或海盗干的。同年六月，黑衣大食酋长闹文等6人至京，并与回纥使者争地位高低，唐通事舍人乃分左右从东西门并入，

^① 参阅〔日〕前嶋信次：《东西文化交流的诸相》，《怛逻斯战考》，东京1971年版，第129—200页。

即承认大食与回纥使者并列最高地位。乘安史之乱，吐蕃攻陷河陇，一度攻入长安，成为唐朝的心腹之患。785—786年，吐蕃与大食在帕米尔、吐火罗一带进行了大战。786—787年（贞元二、三年），韩琬、李泌等曾提出北和回纥，南联南诏，西结大食、天竺，以制吐蕃的战略。798年，黑衣大食哈里发哈伦·拉希德（786—809年在位）遣使唐朝，共商对付吐蕃，但看来并未采取实际行动。806年，河中发生了拉飞·伊本·米斯领导的暴动，哈伦亲征，死于途中。其子阿明与马蒙进行内战。黑衣大食的势力逐步退出中亚，唐朝也无暇顾及外交，于是大食暂时中断了与中国的关系。

五、拂 菻

【唐与拂菻】① 拜占廷帝国在隋唐时代称为拂菻。隋炀帝常想通使拂菻，但未成功。

公元7世纪，大食兴起，从拜占廷帝国夺取了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643年（贞观十七年），拂菻遣使入唐，送来赤玻璃、绿玻璃、石绿、金精等，唐太宗致信抚慰，回送绫绮。大食强盛，于669年、674—680年、716—717年、782年四次围攻拂菻都城君士坦丁堡。667年（乾封二年），拂菻遣使入唐馈赠药物底也伽，701年（大足元年）、711年（景云二年）拂菻两次遣使来唐。719年（开元七年）正月拂菻王遣吐火罗大首领献狮子、羚羊各二。这年与742年（天宝元年）拂菻派大德僧（景教徒）入唐通使。以后中亚陆路交通阻绝，拂菻与中国的联系也就中断了。

①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93—103页。

第三节 隋唐五代与朝鲜、日本的关系

一、隋朝与高句丽^①、百济、新罗

【隋文帝征高句丽】 4至7世纪，朝鲜半岛上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高句丽领有今中国的辽东与朝鲜北部、中部，以平壤为都城。新罗占有半岛东南部，都城金城（今庆州）。百济占有半岛西南部，都城泗泚（今扶余）。

581年，杨坚建立隋朝，高句丽国王高阳^②就派使者前来，隋册封他为高丽王，以后每年向隋遣使朝贡。589年（开皇九年），隋平陈，高阳怕隋来攻，进行战备。597年（开皇十七年），隋文帝写信指责高阳“驱逼靺鞨，固禁契丹”，“数遣马骑，杀害边人”。^③高阳卒，子高元继位，文帝遣使册封高元为辽东郡公，不久封王。次年，高元率靺鞨之众万余进攻辽西，被隋营州总管韦冲击退。隋文帝大怒，以汉王杨谅为元帅，以30万人进攻高句丽。隋陆军开到辽水畔，高元惶惧，遣使谢罪。而隋水军船多漂没，陆军也粮饷不继，又遇疾疫，士气不振，隋文帝就罢兵了，待之如初，高元也每年遣使朝贡。

【隋炀帝三征高句丽】 炀帝继位，要高元亲自入朝，高元不来。炀帝决定征伐高句丽。于是开通济渠以运饷械，大造战船、戎车，征兵百万，四海骚扰。611年（大业七年），王薄在山东起义，作《无向辽东浪死歌》，号召人民反战。隋炀帝仍悍然发动

① 自称“高句丽”，北齐废帝封高句丽王阳始去“句字”，中国史书上因称高丽。

② 《隋书》《高祖纪》上作“阳”，卷八一《东夷传》上作“汤”。

③ 《隋书》卷八一《东夷传》。

对高句丽的进攻。

第一次出兵在612年（大业八年），陆军113万人，分二十四军，从涿郡出发。隋炀帝亲自节度，渡过辽水，进围辽东城（今辽阳市），久攻不下。其中九军30.5万人由宇文述等率领，渡过鸭绿江，进至距平壤30里处。高句丽大将乙支文德遣使佯装求和，乘隋军班师半渡萨水之际，攻隋后军。隋军全军覆没，逃回辽东城的只有2,700人。水军由来护儿率领，直逼平壤城下，被高元之弟高建武打败，听说宇文述等败，亦退还。

第二次出兵在613年（大业九年）。四月，炀帝到辽东，命宇文述等率陆军进趋平壤，来护儿统水军。在黎阳（今河南浚县）督运军粮的杨玄感以讨谋反的来护儿为名，起兵造反。炀帝大惧，赶快从高句丽撤兵。杨玄感之友，兵部侍郎斛斯政逃往高句丽，高句丽知道了实情，全力追击。隋后军伤亡颇重，“军资、器械、攻具积如丘山，营垒、帐幕案堵不动，毕弃之而去。”^①

第三次出兵在614年（大业十年）。镇压了杨玄感之后，炀帝又至辽东，来护儿率水军和平壤附近取得小胜。高句丽久战困弊，遣使求和，并将斛斯政引渡给隋朝。隋朝人多流亡，军多失期，炀帝遂答应议和，下令来护儿退兵。炀帝还京后拘留高句丽使者，仍要高元入朝。高元仍不肯来。炀帝还打算再次出兵，但已天下大乱，终至于丧身灭国。

【隋与百济、新罗】 百济王余昌在开皇（581—600年）初就遣使人隋，文帝封他为百济王。隋平陈时，有一条战船漂入海中，此船回国时经过百济，余昌厚给资粮，并遣使祝贺平陈。文帝很高兴，告诉百济不必每年入贡。598年（开皇十八年），百济遣使表示愿助攻高句丽，文帝已退兵，于是重赏和送回了百济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纪》六《炀皇帝》中。

使者。高句丽知道此事后，曾攻打百济。607年（大业三年），百济王余璋遣使入隋请讨高句丽，炀帝遂命百济窥探高句丽动静，其实余璋与高句丽暗通消息。611年，炀帝派尚书起部郎席律到百济去通报出兵征高句丽的日期。次年，隋攻高句丽，百济集中军队，声称助隋，其实首鼠两端，严军自卫。以后，百济常与新罗作战。大业十年（614），尚遣使入隋，后隋大乱，暂断来往。

新罗国王金真平于开皇十四年（594）遣使入隋，被册封为乐浪郡公、新罗王。大业以来，每年遣使朝贡。

二、唐朝与高句丽、百济、新罗

【唐太宗征高句丽】 高句丽国王高建武于619年（武德二年）即遣使来朝。622年，唐高祖与高句丽互相遣返流亡人口。624年，册封高建武为辽东郡王、高句丽王。626年，新罗、百济向唐朝控诉高句丽阻拦他们入朝，唐派员外散骑侍郎朱子奢前往调解。唐朝与高句丽保持着和平。

631年（贞观五年），唐太宗派人去高句丽，收葬隋时战死者的骸骨，毁高句丽所立京观。高句丽怕唐进攻，筑千里长城防备。

642年，高句丽西部酋长泉盖苏文杀高建武，立高藏为王，自立为莫离支，犹如中国兵部尚书兼中书令^①，联合百济攻新罗。唐派人劝高句丽罢兵，不听。唐太宗认为泉盖苏文弑君，又虐待百姓，侵略邻国，而辽东本中国之地，可以出师讨伐。虽群臣多上书劝阻，太宗不听。

^① 见新、旧《唐书》《高丽传》。

644年（贞观十八年），派张亮率战船500艘，渡海趋平壤，李勣以兵6万趋辽东。次年，太宗亲率六军赴前线督战。唐军相继攻克盖牟城（今抚顺）、辽东城（今辽阳）等，因遭高句丽的猛烈抵抗，深秋九月，“太宗以辽东仓储无几，士卒寒冻，乃诏班师。”^①这一仗，唐军兵员伤亡不多，但物资马匹损耗严重。以后唐太宗虽屡拟再次派兵进攻高句丽，终未成功。

【唐高宗灭百济】 百济国王扶余璋在621年（武德四年）就遣使献马，后被册封为带方郡王、百济王。当时百济与高句丽、新罗都有矛盾，唐朝抱劝和态度。

642年（贞观十六年），百济与高句丽和亲通好，共同对付新罗。新罗向唐求援。唐朝几次进攻高句丽未成，乃决定先攻灭高句丽的盟国百济。唐高宗于660年（显庆五年）命令苏定方率水陆大军10万，从成山（山东成山角）渡海，与新罗军队会师，打败百济军队，俘百济王义慈，灭了百济。分其地为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个都督府，立当地首领为都督、刺史、县令。命右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统兵防守。

百济王族福信等遣使往倭国（日本），迎取王子扶余丰，并向倭乞师，以与唐一新罗联军对抗。663年，唐军在白江口（今锦江口）打败了倭军与扶余丰的军队，最后平定了百济，对高句丽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

【唐高宗灭高句丽】^② 666年（乾封元年），高句丽大臣泉盖苏文死，其子泉男生代为莫离支，与其弟争权相攻，泉男生逃到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死守，派儿子向唐朝求救。唐高宗派契苾何力救出泉男生。十一月，派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薛仁贵等征高句丽。668年（乾封三年），薛仁贵攻克扶余城

^① 《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

^② 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172页。

(今四平市)、李勣攻下新城(抚顺北)之后,所向克捷,终于攻下平壤,灭高句丽。以其地分置9个都督府,42个州,100个县,以酋豪有功者为都督、刺史,都隶属于安东都护府,以薛仁贵为安东都护,治平壤(668—670年)。不久,因新罗侵略高句丽故地,上元三年(676),安东都护府迁至辽东郡故城(辽阳,676—677),不久,又迁至新城(抚顺北,677—697年)。696年,契丹攻陷营州,次年,改都护府为都督府。705年(神龙元年),又恢复了安东都护府。至上元二年(761),终于废除。

【唐与新罗】 新罗国王金真平在621年(武德四年)就向唐遣使朝贡。唐高祖遣通直散骑侍郎庾文素回访,自此朝贡不绝。624年,遣使册拜金真平为柱国,封乐浪郡王、新罗王。以后,世代受唐册封。645年,唐太宗将亲伐高句丽,命新罗接应。新罗派兵5万攻高句丽南界。648年(贞观二十二年),新罗王金真德遣其弟国相金春秋等入唐,唐太宗赐以新撰《晋书》等,特别优待。

660年(显庆五年),新罗王金春秋率军与唐军联合,攻灭百济。663年(龙朔三年),唐以新罗国为鸡林州大都督府,以其王金法敏为都督。668年,唐灭高句丽,朝鲜半岛上三国鼎立的局面结束。新罗逐步从唐朝控制下夺取百济、高句丽故地。674年(咸亨五年),金法敏收编了高句丽叛军,夺取了百济故地。唐高宗怒,削金法敏官爵,以留在长安的法敏之弟金仁问为新罗王,以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发兵进攻金法敏。金法敏被打败,遣使入唐谢罪。高宗恢复了他的官爵,默认新罗占领百济故地。676年,将安东都护府从平壤内迁辽东郡故城,将熊津都督府内迁建安故城(营口东南)。唐与新罗又恢复了友好关系。

686年(垂拱二年),新罗王金政明遣使来唐,求得唐礼一部并杂文章。733年(开元二十一年),渤海国越海入寇登州,唐派

留在长安的新罗王族金思兰回国发兵攻渤海以助唐。736年，唐明确将颶江(今大同江)以南之地移交给新罗治理。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的大部分。新罗与唐往来最密，甚至安史之乱，玄宗奔蜀，也未中断新罗与唐的关系，新罗派使者到四川去见玄宗。以后，双方一直保持来往。

9世纪初，新罗政局不稳，政变频繁，农民起义，会昌(841—846年)以后，就与唐朝断绝了来往。

三、五代十国与新罗、后高丽

【后唐与新罗】 新罗统治末期，国政大乱。西南海岸戍将甄萱在武珍州(今光州)起兵，于900年建立后百济国；903年，后高丽建立；新罗只保持朝鲜半岛东南一隅，史称后三国。

923年(后唐同光元年)，新罗王金朴英遣使朝贡，与中原恢复联系。933年(长兴四年)，权知国事金溥遣使朝贡。935年，新罗为后高丽^①所灭。

【五代十国与后高丽】 891年，僧侣弓裔加入农民起义，于903年称王，建摩震国。弓裔性残忍，918年，海军统帅王建推翻了弓裔，自立为王，改国号为高丽，史称后高丽，(王氏高丽)。935年，灭新罗，936年，灭后百济，统一了朝鲜半岛。

高丽于923年(同光元年)遣广评侍郎韩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岸到后唐来。932年(长兴三年)，王建遣使者入后唐，后唐明宗拜王建玄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封高丽国王。945年(后晋开运二年)，王建卒，子王武继位。951年(后汉乾祐四年)，王武之子王昭立。王氏三世一直向五代朝贡，每次继位都请中国册封，

^① 按朝鲜史，918年王建始建王氏高丽，中国史籍因称后高丽。

中国也总是欣然答应。后周世宗（955—959年）曾派尚书水部员外郎韩彦卿以帛数千匹到后高丽去买铜以铸钱。959年（显德六年），王昭遣使者送来黄铜五万斤以及《别集孝经》等书。

后高丽与南方十国也有来往。919年，遣佐良尉金立奇入贡于吴。938年（升元二年），后高丽遣使南唐，南唐烈祖甚加礼遇。吴越王钱弘俶（948—960年）曾遣使往高丽求取中国失传的佛经，高丽遣僧侣谛规送来。

四、隋唐五代对日关系

【遣隋使】^① 日本遣隋使共有四次。

第一次，600年（日本推古天皇八年），倭王遣使入隋。

第二次，607年（推古天皇十五年）圣德太子派大礼小野妹子赴隋。日本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②，炀帝因其不称臣，很不高兴，下令今后不必进呈无礼的国书。炀帝派文林郎裴世清于608年回访日本。裴世清在倭都受到倭王、圣德太子的隆重欢迎。隋国书称“皇帝问倭王”，圣德太子因隋不平等相待，很不愉快，但仍坚持日隋交往。

第三次，608年（推古天皇十六年）九月裴世清等回国，日本又派小野妹子为大使，送隋使回国，另派学生四人、学问僧四人随行，于年底到达隋都。日本国书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坚持了对等礼节。小野妹子于次年回国，留学生高向玄理、僧旻等长期在中国学习，后陆续回国，对大化改新颇有贡献。

第四次，614年（推古天皇二十二年）日本遣犬上御田锹等

^① 汪向荣、夏应元编：《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3—52页。

^② 《隋书》卷八一《倭国传》。

使隋。

【遣唐使】 623年（推古天皇三十一年，被派往唐朝留学归来的留学生、学问僧等奏称：“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须常达”。^①由此开始，不断派遣不定期的外交使团来唐朝。派遣遣唐使成为日本以后约两百年间的重要国策之一。从630年（舒明天皇二年）第一次派遣唐使起，至834年（承和元年）派出最后一次，894年正式决定停派止，共派出遣唐使19次。其中有四次或任命而未成行，或中途至百济返回，实际到达中国者共15次。其中有两次为陪送唐使返国和一次迎接遣唐使返国而派者除外，正式的遣唐使共有12次。^②遣唐使的活动大致可分为两期，即7世纪的前期和8世纪以后的后期。前期主要是在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动乱期内出自政治目的而派遣的；后期则是在东亚形势趋于稳定之后以移植唐朝文化为主要目的而派遣。^③

【前期遣唐使】 前期遣唐使共四次。

第一次，630年（舒明天皇二年）8月，以犬上御田锹、药师惠日由北道遣于唐朝。631年（贞观五年），唐太宗体恤日本道远，不要求每年入贡。又遣新州刺史高表仁随倭使回访。高表仁于次年抵日，与倭王子争礼，相持很久，未去倭都宣读国书就回国了。

第二次，已是大化改新之后，改革派于653年（孝德天皇白雉四年）5月，分南、北两道：北道由吉士长丹任大使，有121人组成使团；南道有大使高田根磨等带领120人同时赴唐。目的是确立新政权与唐的外交关系，多得文献，以便在改革中借鉴唐

^① 《日本书记》推古天皇三十一年条。

^② 关于遣唐使的任命次数，有19次说（木宫泰彦，《中日文化交流史》）。有的学者把667年仅至百济而还的一次除外，则为18次（森克己《遣唐使》）。

^③ 遣唐使活动的分期有四期说（木宫泰彦）三期说（森克己）和两期说（江上波夫），各期次数划分也不尽相同。

制。改革派不惜代价希望尽早向唐学习，一条船冒险走南道，不幸遇风沉没。另一条船走北道抵唐。

第三次，在走北道之船未返日前，改革派对第二次遣唐使的成败没有把握，654年（白雉五年）二月，又派大臣高向玄理为押节使率使团赴唐。改革派想借鉴唐制的心情是极其迫切的。高向玄理原为归化汉人的后裔，在中国留学33年，回国后致力于大化改新，这次又出使唐朝，积劳成疾，于同年底逝世于唐。日本使团完成使命后，于次年回国。唐高宗要使团带信给倭王，请倭国出兵助新罗抵抗百济。倭国没有答应，继续抱支持百济的态度。

第四次，659年（齐明天皇五年）赴唐。唐高宗决心出兵攻百济，救新罗，担心倭使会把军事机密泄漏给百济，遂幽禁了使团。660年，唐朝援助新罗灭掉百济后，方准倭使回国。

【唐日白江口之战】^① 唐与新罗联军灭百济后，以郎将刘仁愿等驻守百济王城等地。百济王扶余璋的从子福信据守周留城（今全州西），遣使赴倭迎取王子扶余丰回国即位，并向倭乞师。倭国久已觊觎朝鲜半岛，齐明天皇于661年正月率数万军队亲征，半途病死。太子中大兄继位为天智天皇，八月，另派将军统帅全军开赴百济。又派兵五千护送王子丰回国即位。

661年（龙朔元年）四月，唐军进攻高句丽。高句丽与福信联合抵抗唐军。福信等率军围困留守百济王城的刘仁愿军。刘仁轨率唐军与新罗军联合击退福信，解了刘仁愿之围。高句丽恐怕福信失败，于662年3月遣使赴倭乞师。

倭王政府命令在百济的倭军投入战斗。663年6月，倭军27,000人进攻新罗军，并威胁新罗与唐联系的通道。形势不利于唐军，唐高宗命令刘仁轨撤出百济，刘仁轨认为坚守观变更有

^① 张声振著：《中日关系史》卷一，第78—87页。

利，遂不奉诏。不出刘仁轨所料，扶余丰杀了骄横的福信，其力量因内讧而削弱。八月，唐派孙仁师统帅7,000援军，浮海而至，与新罗陆军及刘仁愿部从陆路进攻周留城，部分倭国、百济守军投降。刘仁轨率唐与新罗海军驶向白江口（今锦江口），打算溯江而上，进逼周留城。在白江口与倭国水军、扶余丰的陆军遭遇。刘仁轨以170艘大战船与倭船千艘作战，焚倭船400艘，倭水军指挥朴市田来津战死，扶余丰逃往高句丽，周留城的百济守军投降，倭军撤回本国，唐最后平定了百济。5年之后，又灭了高句丽。

【后期遣唐使】^① 白江口之战以后，唐日双方使节往返频繁，不下十次，但并不意味着关系友好，只是各怀疑惧，互相摸底。

672年，日本爆发壬申之乱。次年，天武天皇即位，镇压改革派，自行中断了与唐的外交关系，将原来的国名倭国改为日本。

697年，文武天皇即位，决心恢复唐日关系。后期遣唐使共11次，其中第一次至第四次是最盛大的。

后期第一次遣唐使于702年（文武天皇大宝元年）派出，次年抵唐。执节使粟田真人好读经史，举止文雅，朝见武则天，献上方物。武则天在麟德殿设宴款待，授粟田真人司膳卿。粟田在唐学习两年后回国。使团考察了唐制，以完善日本的律令制度。

第二次遣唐使于717年（元正天皇养老元年）入唐，留学生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玄昉等随行。使团将所得赏赐全买了文化典籍，泛海而还。

第三次，于733年（圣武天皇天平五年）入唐，其中第三船漂至林邑。玄宗闻知，命丞相张九龄作国书，将此情况告诉天

^① 张振声著，《中日关系史》，卷一，第84—130页。

皇。这是保存下来的唯一一份唐致日本的国书。因日不愿称臣，故遣唐使均无国书，日本对唐的国书也一概不录。

第四次，于752年（孝谦女帝天平胜宝四年）入唐。玄宗见大使藤原清河礼义周到，文质彬彬，特命画工为他画像。天宝十二载（753）元旦，各国百官朝贺，鸿胪卿引新罗使节站于东班首位，居大食之上，引日本使者站于西班第二位，居吐蕃之下。日本使节抗议，乃引新罗与日本易位。天宝十二载（753），任命阿倍仲麻吕为护送使，送使团返日。但阿倍、藤原所乘之第一船漂至安南，二人又回长安。后来阿倍还担任过安南都护。使团分乘的其他三条船回到了日本，鉴真即乘第二船赴日。

此后因安史之乱，日中交往也受影响。

第五次，于759年（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三年）派高元度为迎入唐使，出迎藤原清河等归国，肃宗以安史未平，道路不宁，坚留藤原清河不放。

第六次，唐因安史之乱，遣使要求日本送牛角以制弓。761年（天平宝字五年），日本任命使团，准备送牛角，但因遇难而未成行。

最后五次遣唐使，已是衰落时期。

第七次，777年（光仁天皇宝龟八年）入唐，恢复了一度中断的日唐交通。

第八次，779年（宝龟十年）护送唐使回国。

第九次，804年（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至唐，留学生桔逸势、学问僧空海、最澄随行。使臣觉察到唐“内疑节度，外嫌吐蕃，京师骚动，无暂休息”，日本更失去了与唐交往的热情。

第十次，为最后一次，已是勉强成行。834年任命后，筹资三年始出发，遇大风，返回。次年，再出发，又遇暴风，返回。副使畏惧风险，称病不上船。遣唐使已不复有前期的勇气与紧迫

感，延至838年（仁明天皇承和五年）才入唐。

此后60年间，未派使团赴唐。

第十一次，894年（宇多天皇宽平六年）任命，但正使上表请停派遣唐使，就取消了。因唐日民间贸易渐兴，遣唐使的经济作用减小。遣唐使筹措经费又甚困难。唐朝内乱，对日本无吸引力。于是唐日官方来往就中断了。

【吴越与日本】^① 五代十国中只有吴越与日本建立了半官方联系。日本朱雀天皇承平六年(936)，天庆三年(940)，日本左大臣两次写信交给吴越人蒋承勋带回吴越。村上天皇天历元年(947)，左大臣写了给吴越王钱弘佐的信，另赠沙金二百两，交吴越人蒋袞带回。从保存下来的后两封信中可以看出，这只作为日本执政与“大唐吴越公”的私交，并非日本与吴越的国交。957年，钱弘俶曾遣持礼使盛德言赴日，求取汉地失传的佛经。

第四节 隋唐五代与海南诸国的关系

一、安南

【隋灭万春国】 五六世纪，越南北部处于中国南朝统治之下。541年李贲起兵，攻克交州首府龙编（今河内东北），544年称王，建立万春国。后李贲败走，将兵权交给赵光复。571年，李贲族人李佛子掌权。602年（隋文帝仁寿二年），隋命李佛子入朝。李佛子要求到冬天才上路，不久就公开背叛了隋朝。隋文帝大怒，派刘方讨平了李佛子，灭万春国。刘方进而出兵讨伐林邑（今越南南部）。隋在越南北部设有三郡：交趾郡治所在今河

^① 张声振：《中日关系史》，卷一第137—138页。

内；九真郡在今清化；日南郡在今荣市。^①

【唐置安南都护府】^② 唐初622年（武德五年）在越南北部设交州，治交趾。679年（调露元年），改交州都督府为安南都护府。757年（至德二载），改称镇南都护府。768年（大历三年），复为安南。825年（宝历元年），徙治宋平。另设有爱州（治今清化）、驩州（治今荣市）等10个州，都隶属于岑南道。还有德化州（老街东南）、罗伏州（今海万东南）等41个羁縻州，隶属于安南都护府。唐朝统治稳固，给这个地区带来了和平，促进了繁荣，内部很少出现叛乱。较为严重的一次叛乱是722年（开元十年）当地人首领梅叔鸾在驩州起兵反唐，称“黑帝”，与林邑、真腊（今柬埔寨）联结，号称40万。唐朝募集10万大军，交给安南都护，出奇制胜，平定了梅叔鸾。

【南汉攻灭曲氏】 唐朝末年，国势衰落，越南封建主曲承裕为静海节度使，实际上掌握了安南政权。906年（天祐三年），加曲承裕同平章事。曲承裕死，以其子曲顛为安南都护，充节度使。911年（后梁乾化元年）十二月，以静海留后曲承美为节度使。930年，南汉王刘龚遣将李守鄜等攻交州，擒曲承美，以其部将李进守交州。爱州守将杨廷艺积蓄兵力，图谋反抗南汉，931年攻陷交州，逐走李进。^③

【南汉与吴朝、丁朝】 937年，交州守将皎公羨杀杨廷艺，取而代之。次年，杨廷艺旧部吴权从爱州起兵，进攻皎公羨。皎公羨向南汉求救，南汉王刘龚打算乘机收复安南，出兵援救。吴

① 《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0—101页、110—111页、119—120页、142—144页。

② 《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109、111—118、119—131页、144—147页。

③ 《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150页。

权已杀了皎公羨，占据了交州，并在白藤江之战中沉重地打击了南汉水军。南汉只得退兵。

939年，吴权自立为王，史称吴氏王朝（939—965年）。吴权死后，其子昌岌、昌文相继为王。954年（乾和十二年），吴昌文遣使称臣于南汉王刘晟，南汉以吴昌文为静海节度使兼安南都护。965年（大宝八年），吴昌文死，吴朝亡。

吴朝亡后，交趾大乱，史称“十二使君之乱”。以前杨廷艺任命的驩州刺史丁公著之子丁部领及其子丁璉也起兵，南汉王刘鋹任命丁璉为交州节度。南汉不久被宋朝所统一（971年）。稍后，丁部领建立的丁氏王朝（968—979年）也灭亡。^①

二、其他中南半岛国家

【占婆】^② 占婆又称林邑、环王、占城，位于越南南部。隋文帝平陈后，林邑曾遣使献方物，其后朝贡遂绝。602年（仁寿二年），隋文帝遣大将军刘方为驩州道行军总管，率步骑万余进攻林邑，于605年（大业元年）打败林邑王范梵志，进入林邑国都，得到金庙主十八枚，佛经千余部并昆仑书（占婆文），将其地分置荡、农、冲三州。隋兵班师，梵志复得故地，遣使谢罪，自后朝贡不绝。

623年（武德六年），范梵志遣使入唐。625年，又遣使献方物，高祖设九部乐，宴请使团，回赠锦綵。贞观时，遣使献驯犀等。使臣未守朝贡礼节，群臣欲兴师问罪，太宗反对黷武，不加追究。其王范头黎不断遣使。太宗死后，唐朝还刻了范头黎的石像，放在昭陵的玄阙之前。永徽到天宝年间，曾三次遣使入唐。

^{①②} 《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第150—156，142—147页。

元和（806—820）初，不遣使朝贡。安南都护张舟于809年打败环王军队，遏制了环王向北扩张之势。唐与环王断绝了关系。

930年（南汉大有三年），南汉派梁克贞等攻克交州，擒获曲承美之后，又进兵占城，掠其财宝而归。

958年（后周显德五年），占城王因德漫遣使者萧河散等至汴梁，进贡猛火油（石油）84瓶，蔷薇水15瓶，据说得自西域。后周给以厚赐。

【真腊】^① 真腊本扶南属国，后兼并扶南，占有今柬埔寨北部和老挝南部，建都伊奢那城（今磅同市北）。617年（大业十三年），遣使贡献，炀帝礼之甚厚。其后，中断了联系。

唐武德至圣历年间（618—700），四次来朝。神龙（705—707年）后，真腊分裂为二：南方近海低地，称水真腊；北方多山，称陆真腊，又称文单国。

陆真腊717年曾遣使入唐，753年文单王子入唐，拜为果毅都尉，随唐军进攻南诏。大历（766—779年）中，副王婆弥及妻来朝，献驯象11头，封婆弥为试殿中监，赐名宾汉。

水真腊于813年（元和八年）遣李摩那等入唐。

【骠国和堕罗钵底】 骠国^②在今缅甸，首都室利差咀罗（今卑谬）。贞元中，其王听说南诏异牟寻归唐，也很羡慕。802年，派悉利移入唐，又献其国音乐十二曲，及乐工三十五人。乐曲都是表现佛教经论词意的，很受唐朝重视。唐朝遂以悉利移为试太仆卿。

堕罗钵底^③，又作杜和钵底、堕和罗、独和罗，在今泰国湄

① 冯承钧著：《中国南洋交通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121—125页。

② （缅）貌丁昂著，贺圣达译：《缅甸史》，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1983年版，第七页。

③ 中山大学东南亚史研究所编：《泰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南河流域。638年（贞观十二年），堕和罗国遣使入唐。649年（贞观二十三年），又遣使献象牙、火珠，请给好马。太宗答应赐给好马。

【赤土和盘盘、丹丹】^① 赤土，在今马来半岛南部。隋炀帝征募能出使远方的人，607年（大业三年），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请求出使赤土。炀帝备了一笔厚礼让常骏去送给赤土王。常骏等漂洋过海来到赤土。赤土王以非常隆重的礼节接待了使团。赤土王派王子那邪迦带着金叶国书，随常骏回访隋。610年春，常骏与那邪迦在弘农（今河南灵宝县）见到了炀帝，炀帝赏赐了使者。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赤土王遣使来朝。

盘盘国，在今泰国南部万伦湾沿岸一带。曾遣使入隋。贞观九年（635），遣使入唐。

丹丹国，也作单单，在今马来半岛，曾向隋遣使。唐乾封、总章（666—669）时献方物。

中南半岛上还有陀洹（泰国西部）等一些小国，曾遣使入唐。

三、海岛诸国

【诃陵】 诃陵又称社婆、阁婆，在爪哇岛中部。贞观中就与堕和罗、堕婆登一起遣使入唐。太宗写了回信。大历（766—779年）中，曾三次遣使入唐。815年（元和十年），遣使送来僧祇僮及五色鹦鹉等，以其使者李河内为左果毅都尉。818年，又遣使进僧祇女及玳瑁等。僧祇僮、僧祇女当为葛葛僧祇人。^② 葛葛僧

^① 中山大学东南亚史研究所编：《泰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② 有的著作认为僧祇即桑给，僧祇僮、女是东非黑人。

祇是今马六甲海峡南部不罗华尔群岛中的一个岛。大和、咸通（827—874年）年间，诃陵继续通使于唐朝。诃陵后为夏连特拉王朝所并。

堕婆登国东与诃陵接，当在爪哇岛西部。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其王遣使献古贝（棉布）、象牙、白檀，太宗写了国书回答，并送了礼物。

【室利佛逝】 室利佛逝又作尸利佛誓，在苏门答腊岛上，以今巨港（巴邻旁）为中心。咸亨至开元（670—741年）间，几次遣使入唐，上表控诉其来唐商船被唐的地方官吏所掠夺。朝廷下令广州处理此事。又送来侏儒、僧祇女各二。唐封其使者为折冲都尉，封其王为左威卫大将军，赐以紫袍、金钿带。后来室利佛逝派王子入唐，朝廷又在长安曲江池设宴款待。室利佛逝后也受夏连特拉王朝控制。

【婆利、殊禁、甘棠】 婆利即今巴厘岛，616年（大业十二年）曾遣使入隋。630年（贞观四年）遣使入唐。

婆利东面即罗刹，隋炀帝派常骏使赤土时，罗刹与中国建立了联系。630年与环王、婆利使者一起入唐。

从赤土西南入海有一个婆罗，又称婆露，在苏门答腊岛西北角。669年（总章二年），其王遣使者与环王使节一起入唐。

环王南有殊禁，一作殊奈，从交趾海路要走三个月方到，与婆罗风俗相同。628年（贞观二年），遣使献方物。

甘棠在海南，635年（贞观九年）遣使入唐。

这些岛国应当都在今南洋群岛的范围内。①

① 有的著作根据《唐会要》认为殊奈习俗文字与印度（婆罗门）同，认为殊奈在索马里南部。有的著作认为甘棠在非洲东海岸。但《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将婆罗、环王、殊禁、甘棠放在一起，这些国家都与中国有朝贡关系。目前还很难确定非洲的某些国家与中国在唐代已有朝贡关系。

第五章 隋唐五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丝绸之路在陆上交通继续繁荣的同时，海上交通也渐发达。外来文化对中原影响最大者首推印度佛教，佛教逐渐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外来科技（天文、历法、医药）与艺术（绘画、雕塑、俗讲）也往往与佛教有关。外来文化对中国周边各族的影响，主要是粟特文化影响突厥、回鹘，印度佛教影响吐蕃、西域。中原文明对周边各族各国的影响因地制宜。儒家文化与汉地佛教结合在一起，对朝鲜、日本、越南影响巨大，形成了远东汉字文化圈。中原文明对西方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物质—技术方面，如造纸技术的西传。

第一节 丝绸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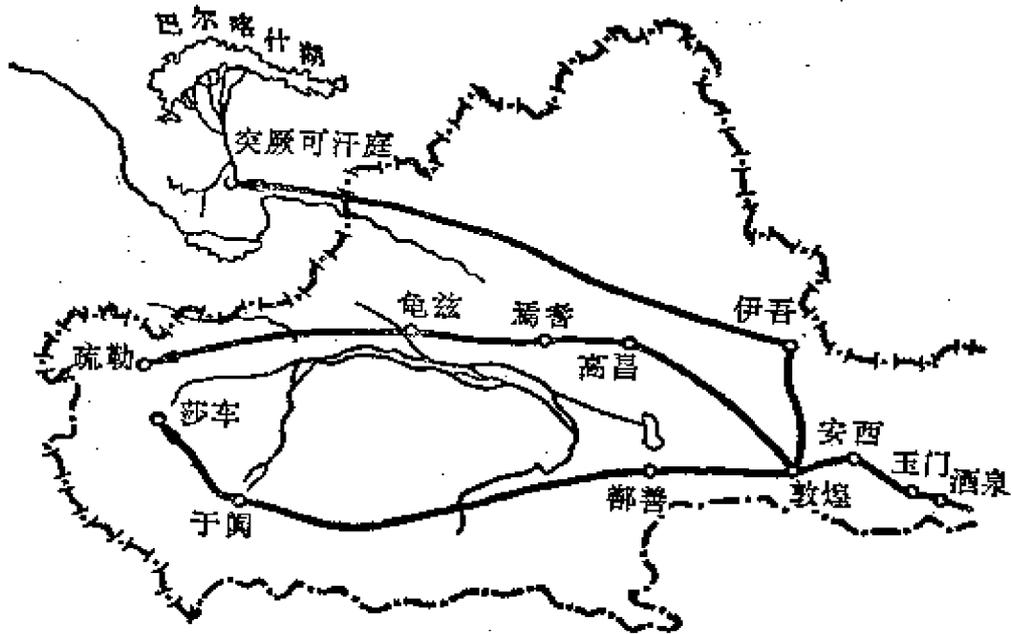
一、交通路线与主要城市

【裴矩所记之路线】^① 隋炀帝命裴矩管理到张掖一带贸易的胡商，裴矩从胡商处了解各国风俗，山川险易，写成《西域图记》三卷，已佚。关于中西交通路线的记述尚见于《隋书·裴矩传》所载裴矩《西域图记》自序中。从敦煌出发，直到西海，分为三道。

北道：从伊吾（哈密）经蒲类海（巴里坤湖）、铁勒部（准

^① 《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579—158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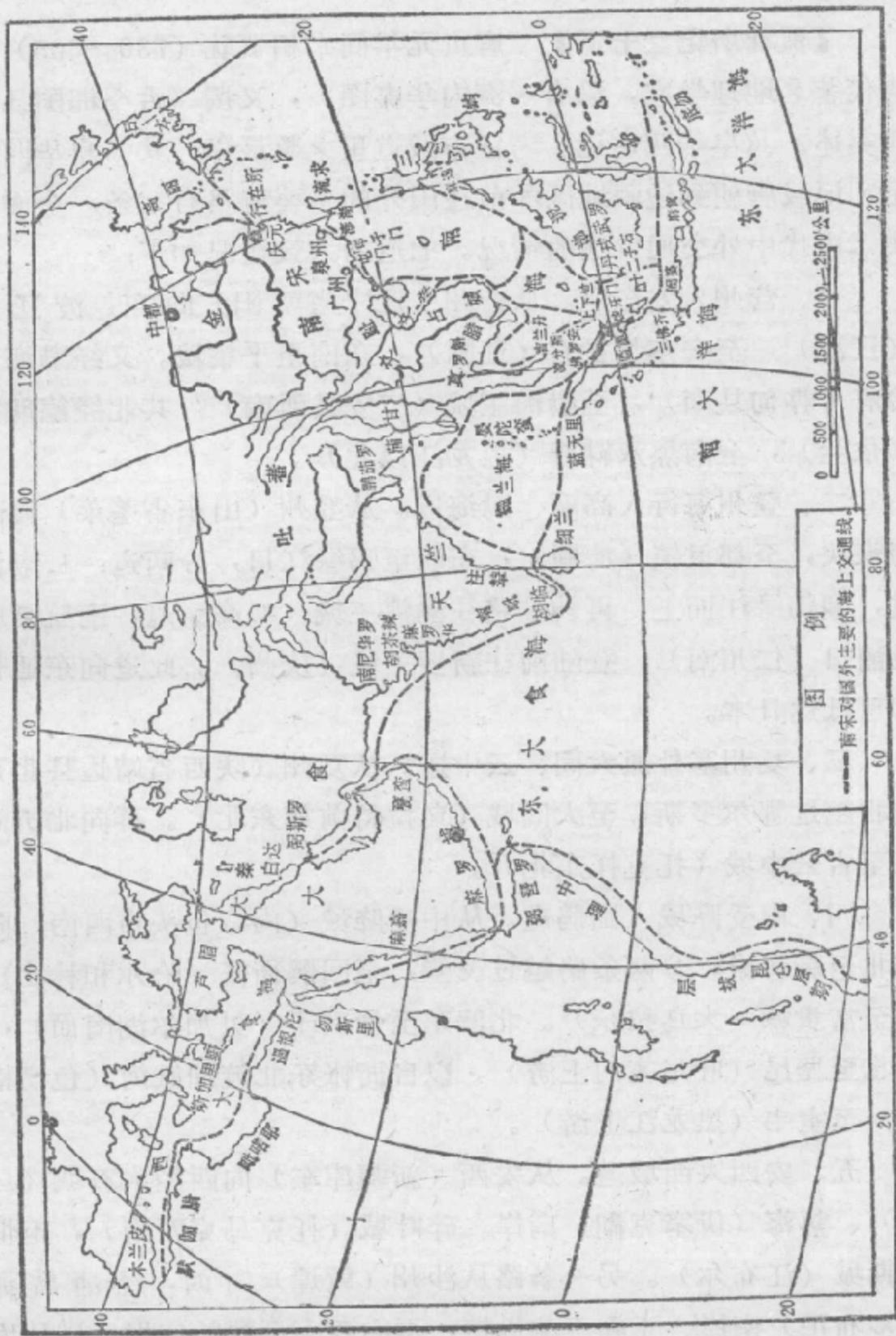
噶尔盆地一带)、突厥可汗庭(伊犁河流域),渡北流河水(楚河),至拂菻国(拜占廷),达于西海(地中海)。这是一条天山、锡尔河、咸海、里海以北的草原之路。



中道:从高昌(吐鲁番)、焉耆、龟兹(库车)、疏勒(喀什),度葱岭(帕米尔),又经跋汗(费尔干纳)、苏对沙那(乌腊提尤别)、康(撒马尔罕)、曹(伊什特汗)、安(布哈拉)、穆(查尔朱)诸国,至波斯,达于西海。

南道:从鄯善(罗布泊南)、于阗(和田)、朱俱波(叶城)喝槃陀(塔什库尔干),度葱岭,又经护密(瓦罕)、吐火罗(阿姆河中游)、挹怛(与吐火罗杂居)、帆延(巴米安)、漕(加兹尼),至北婆罗门(北印度),达于西海(阿拉伯海)。

裴矩未记海上航路,但可从其他记载中看出:南方从南海郡(广州)出发,可航抵赤土(马来半岛南部);东方可从东莱郡(山东掖县)直航平壤,或航抵百济(朝鲜半岛西南部),再转



航日本。

【贾耽所记之七道】 唐贞元年间宰相贾耽（730—805）是唐代著名地理学家，绘有《海内华夷图》，又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皇华四达记》考证方域道里之数最详。其《皇华四达记》记载唐朝到边疆地区和前往国外的主要道路有七条，全面反映了唐代中外交通发达的情况。七道的大致情况如下：

一、营州入安东道。从营州（辽宁省朝阳）向东，渡辽水（辽河），至安东都护府（辽阳），东南至平壤城。又经渤海长岭府（桦甸县南），至渤海王城（宁安县西南）。其北经德理镇（依兰），至南黑水靺鞨（黑龙江以北）。

二、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从登州（山东省蓬莱）渡渤海海峡，至都里镇（旅顺），东航至鸭绿江口，分两道：1. 渤海道，溯鸭绿江而上，再转陆路往渤海王城；2. 高丽道，南航至唐恩浦口（仁川南），登陆前往新罗王城（庆州）。此道向东延长即可抵达日本。

三、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从夏州（陕西省靖边县北）向北越过鄂尔多斯，至大同城（乌拉特前旗东北）。再向北折向东至古云中城（托克托东北）。

四、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从中受降城（内蒙包头市西南）向西北至瞻鹑泉，分两条路越过戈壁，至回鹘衙帐（哈尔和林北），北至富贵城（大乌拉东）。北偏东至骨利干（贝加尔湖南面），西北至坚昆（叶尼塞河上游）。以自衙帐东北渡仙娥河（色楞格河）至室韦（黑龙江上游）。

五、安西入西域道。从安西（新疆库车）向西经大石城（乌什）、热海（伊塞克湖）南岸。碎叶城（托克马克西南），至怛逻斯城（江布尔）。另一条路从沙州（敦煌）向西，经蒲昌海（罗布泊）南岸、子闾至疏勒镇，再向西南至葱岭守捉（塔什库

尔干)。向西通西域诸国。

六、安南入天竺道。从安南都护府(河内)溯红河而上至汤泉州(云南省屏边)，北至拓东城(昆明)，向西经羊苴咩城(大理)，渡怒江，至诸葛亮城，分两路。西南路至骠国(缅甸，都城在卑谬)，向西经迦摩波(印度阿萨姆邦)、奔那伐檀那(孟加拉博格拉)，至摩羯陀(印度巴特那)。西路渡丽水(伊洛瓦底江)、弥诺江(亲敦江)，经大秦婆罗门国(阿萨姆邦东部)、箇没卢国(即迦摩波)，至奔那伐檀那。

七、广州通海夷道。从广州航海，西南至海峡(新加坡海峡)，向西经伽兰洲(尼科巴群岛)、师子国(斯里兰卡)，至没来国(印度奎隆)，转向西北经拔爬(布罗奇)、新头河口(印度河口)附近的提爬，向西至提罗卢和(伊朗阿巴丹)，溯弗利刺河(幼发拉底河)而上至末罗(巴士拉)，陆路至大食首都缚达城(巴格达)。西面最南的是三兰国，可能已在东非境内了。

【长安】 贾耽所记七道实际上的中心是长安。长安是隋、唐两朝的首都，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心。周边各族与外国人以各种方式参与长安的政治活动。东突厥汗国归唐后，突厥人入居长安者近万家，五品以上百余人，几乎占了朝中高官的一半^①。回鹘与唐关系特别密切，留京师者常至千人。波斯王族卑路斯、泥涅斯曾先后留居并客死长安。拔汗那、护密等国曾有王族至长安留宿卫。一般外交使节前来长安者不胜枚举。长安有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有大批昭武九姓胡人、波斯人、大食人的商人在长安从事贸易活动。长安佛教兴盛，国立翻译机构——翻经院即在长安。三论宗的吉藏，法相

^① 林干：《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6页。

宗的玄奘，华严宗的智俨，南山律宗的道宣，密宗的不空，禅宗北宗的神秀，净土宗的善导等人都在长安或其附近寺院中从事过宗教活动。长安还有祆教、摩尼教与景教寺院。儒家文化自然以长安为中心，日本、朝鲜有不少人留学长安，学习儒学与佛学。长安设有司天台，印度天文学家瞿昙氏四代人 在此服务过。长安大云经寺，菩提寺、安国寺、福严寺等有过精美的塑像壁画，在外来凹凸晕染画法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画风，影响及于敦煌、高昌、朝鲜、日本。长安的宫廷音乐十部乐大多出自外国或西北少数民族。拂菻、柘枝、胡旋、胡腾等舞蹈也来自外国。长安在开元、天宝年间流行胡音、胡骑、胡妆，说明在京城 中，外来文化影响已波及到较多城市居民。

【敦煌】 隋唐五代陆上中外交通的最重要的门户是敦煌。中国所受外来文化影响主要来自西域，而通西域的北、中、南三道皆以敦煌为咽喉。敦煌早在汉代即为河西四郡之一，形成了汉文化的基础。隋设郡，唐称沙州。781—848年处于吐蕃统治之下。848年沙州张议潮起兵归唐，称归义军。以后直到1054年被西夏并吞之前，归义军一直隶属于唐朝与五代中原王朝。敦煌最重要的文化遗存有 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经卷。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道士王圆箓在莫高窟发现了一个藏经洞（即第十七窟），这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古文献发现之一。洞中藏有大量古代的写本、印本和文物。大部分被英、法、日、俄等国的探险者掠走。其中，经卷约有四至六万卷，除以汉文经卷为主外，还有藏文、梵文、和阗文、龟兹文、粟特文、古突厥文和西夏文等文字写的文书。经卷中90%以上是佛经，也有祆教、景教经典，儒家、道家经典，历史地理资料，社会经济文书等。这些经卷的刊印时间大体始于魏晋，终于五代末，最晚的题记为北宋咸平五年（1002年）。

另一方面是石窟艺术。① 现尚存从十六国至元代的492个石窟，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400余身，唐宋木构建筑5座。在492窟中，隋唐五代占了320余个，是主体部分。壁画、彩塑均以佛教为内容，是罕见的佛教艺术宝库。早期作品可以看出犍陀罗艺术的影响。但敦煌艺术不是直接移植印度与中亚的佛教艺术。印度与中亚的佛教艺术传入中原之后，为汉地美术所吸收，形成了新的汉地佛教艺术。敦煌艺术是汉地佛教艺术的集中表现。

【广州】 隋唐五代海外交通以广州为主要门户。广州海外交通始于秦代，隋设南海郡，唐为广州，是岭南道的治所。港口中常停泊着婆罗门（印度）、波斯、昆仑（东南亚）、师子国（斯里兰卡）、大食（阿拉伯）等国的商船。当时有人言：“舶交海中”，“不知其数”，港口呈现“大舶参天”、“万舶争先”的壮丽景象。每年从南海等地输入的商品不下几十种，以致出现“珍货辐辏”、“瓊宝山积”的现象。部分商品转销朝鲜和日本，部分则北上转卖。进口商货要纳进口税，名曰“舶脚”，或称“下碇税”，税率不详，苏莱曼称取商货3/10，恐不确。对珠宝、犀象等珍异之物禁自由买卖，有的以“进奉”形式卖给宫廷，也有归地方政府收购专卖，称“收市”或“榷”。商舶为广州带来大笔收益，出任此地长官者甚易致富。684（文明元年）七月，广州都督路元睿因放纵下人对商舶敲诈勒索，引起胡人公愤，被昆仑人所杀。商舶对国家财政收入关系亦大，8世纪末，光禁榷商货的专卖收息即相当于当地的两税收入，“榷其利，所得与两税相埒”。②

①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一~四卷，（图版）文物出版社，1987年。《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达译，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② 《旧唐书》卷一五一《王锬传》。

二、陆道贸易

【丝路】 唐代的丝织业更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开元至元和年间，仅江南东道（江浙一带）进贡的绫就有緋绫、纹绫、白褊绫、交梭绫和小绫等。据《新唐书》记载，这时期江南道还进贡吴绫、水纹、方纱、鱼口、绣叶、花纹等品种。此外，还进贡吴绢、轻容兰縠、花宝罗、衫罗和花纹罗。而四川进贡的织物则有蜀锦、单丝罗、樗蒲绫、盘缘绫、水波绫、鸟头绫、重莲绫、交绫纱和鹅溪绢等，尤以蜀锦为最精美。更有一种叫縠绫的织品，唐代诗人白居易特为之作诗赞颂。唐代丝品不仅运用绣花、织花技艺，且在印花技术方面也发展到成熟阶段。

丝绸在隋唐五代仍是最重要的外贸商品。丝路沿途的敦煌、吐鲁番、巴楚、和田东面的丹丹乌里克都曾有丝织品出土。有的丝织品上的图案是波斯萨珊王朝所特有的，这些产品可能是特为向西方出口而生产的。

中国丝绸西传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中国官方的赐予。各国使团到中国，唐代皇帝常以丝织品赏赐外国使节。中国使节也常以丝织品作为礼物赠送各国；另一种是民间贸易。这一种形式不大见于正史，但见之于出土文书与私人记载。吐鲁番阿斯塔那514号墓中有一份“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①记载：成交的丝共有200斤，每10斤丝约值银子一斤，每成交10斤丝，要交纳成交税一文银币。最大的一笔交易是50斤丝。商人姓氏清楚的有50余人，几乎全非汉人，昭武诸姓（康、安、何、石、曹）共42人，

^①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317—325页。

占了84%。阿斯塔那墓还出土过一件“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残纸，讲到一个自称“身是胡，不解汉语的曹禄山，向西州长史控告‘京师汉’李绍谨。说李在弓月城（伊犁附近）举取275匹绢而未付款。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讲到波斯人泛舶汉地，直至广州，取绫、绢、丝、绵之类。

为了保证丝路的畅通，唐代从河西走廊的凉州（甘肃武威）直到天山南北各条大道上，凡称军、镇、城、守捉的地方都驻有军队。部队兼事屯垦，不仅保护商旅安全，并且开发土地，生产粮食。各地驻军加上官员、家属及当地居民，形成众多的繁华城镇。岑参有诗曰：“梁（凉）州七里十万家，胡儿半解弹琵琶。”当时的北庭都护府所在地庭州，安西都护府所在地高昌（吐鲁番县西），及龟兹、弓月城等都是人口众多的大城镇。《资治通鉴》天宝十二年（753年）条记载：“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唐张籍《凉州词》曰：“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①生动描绘了当日的骆驼丝队穿越丝路的情况。

【银道】 在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王朝银币有三十多批，千枚以上。出土地点大致与七道中的几条有关。东北方有河北定县出土41枚，北方有陕西耀县3枚，太原1枚。向南有广州北面的英德3枚，曲江9枚。主要出土于丝路干道：洛阳16枚，陕县2枚，西安12枚，西宁76枚，吐鲁番63枚，库车1枚，乌恰947枚，因此这条路又被称为“银道”^②。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乌恰947枚波斯银币与13根金条（1330克）一起藏在山间道路旁的石缝中，可能是从事国际贸易的胡商遇到危险时临时掩藏起来的，后来商

^① 《全唐诗》卷三百八十六。

^② 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人被杀，未能取走。①史料记载，玄奘西行途经高昌，高昌王赠以银币三万。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多份提到当地以银钱为货币，有一次使用的数量多达几万文。唐朝对于“诸国蕃胡内附者”上户征收丁税银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可见波斯银币是在西域及胡人中广为流通的货币。

中国还出土过一些东罗马金币。东北方有河北赞皇县出土3枚，北方有内蒙呼和浩特市郊1枚，西北方有西安2枚，咸阳1枚，武威1枚，吐鲁番9枚。史料记载河西诸郡通用西域金银之钱，当即拜占廷金币与波斯银币。

中原的铜钱出土于吐鲁番、焉耆、库车、和田、丹丹乌里克等地，还少量出土于阿克伯申（碎叶）、喷赤干（米国钵息德城）、米努辛斯克、库杜尔吉等地。粟特与突骑施还仿照中国铜钱而制造他们自己的圆形方孔钱。②

把丝织品与钱币情况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推断丝绸贸易的大致情况。商人将中原的丝及丝织品运往高昌、龟兹、弓月等市场，部分丝出售给当地织工，加工成丝织品。胡商从中亚、西亚运来香料、药材、石蜜等商品，出售换成货币，或带着金、银、金币、银币，在这儿收购丝与丝织品，然后西运。银币是主要的国际通货，铜钱则基本上在各国国内流通。

【胡商、珠宝与铜镜】 《太平广记》等书中记载了许多胡商轶事，大部分与珠宝贸易有关，价值有时高达数千万贯。胡商所到之地有长安、洛阳、广州、扬州、凤翔、永修、南昌、宝应、睢阳等。③

唐的铜镜也是出口品。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1915年出土过唐

① 李遇春：《乌恰县发现金条和大批波斯银币》，《考古》，1959年9期。

② [苏]斯米尔诺娃：《粟特钱币汇目—铜币篇》，（俄文版）莫斯科1981年。

③ 叶德禄：《唐代胡商与珠宝》，《辅仁学志》第十卷，一、二合期。

镜；苏联塔吉克的加尔姆州（Garm）哈伊特（Khait）在1946年，喷赤干（pyanjikent）在1947年发现过海兽葡萄镜，哈萨克的乌尔贾尔（Urjar）发现过八稜花朵四鸟镜，镜面有突厥文字；吉尔吉斯的克拉斯那雅—雷奇卡（Krasnaya—Rechka，碎叶附近）1939年发现过瑞鸟四神镜；西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中游的米努辛斯克（Minusinsk）近郊发现过七、八件隋唐铜镜；库杜尔吉1924年也出土过铜镜。伊朗境内不少地方也出土过唐镜或唐式仿制镜。日本正仓院、高松塚、大山祇、香取神社等处也有唐镜，正仓院的平螺钿镜、金银平脱镜尤为引人注目。

【绢马贸易】 唐强盛时在西北有大片牧场，饲养大量马匹。731年（开元十九年），有马44万匹。不过开元年间尚须向突厥购马三四千匹。736年（开元二十四年）买了两次，共1.4万余匹马，十退一、二，酬物50万匹绢，每马合价40余匹绢。安史之乱后，吐蕃攻陷河陇，牧场尽失，唐骑兵战马来源枯竭，遂与回鹘进行大宗的绢马贸易。

754年，回纥助唐收复两京，肃宗答应每年送给回纥两万正缣。不久唐与回纥和亲，回纥献马500匹。乾元（758—760）后，回纥动辄赶来几万匹马，以一匹马换40匹绢。回纥对绢帛贪得无厌，而送来的马多病弱不可用。^①回纥曾遣使追索唐所负马值绢达180万匹。782年（建中三年），德宗曾下诏以帛十万匹及金银十万两偿其马债。790年（贞元六年），赐马价绢30万匹。八年（792年），给市马绢7万匹。元和年间（806—820年），白居易曾在诗中说明回鹘每匹马要五十匹缣，马来了死伤十分之六、七，而唐的丝织品也偷工减料。822年（长庆二年）到829年（大和三年），赐马价绢55万匹以上。8世纪中叶以后，吐蕃占据河

^① 《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

西走廊，唐朝的丝绸无法经此西销，回鹘及依附于他们的粟特人就成了丝绸贸易的最大中介人。回鹘除了以马易绢外，也将香料、玻璃器、琥珀、象牙等商品运往中原出售。

840年回鹘西迁以后，分成三支：一支南下到河西走廊，在那里建立“河西回鹘”政权；一支西去新疆以高昌为中心，称为“西州回鹘”；另一支远移喀什和中亚，建立强大的黑汗王朝。西州（吐鲁番）回鹘、河西回鹘同中亚、西亚、南亚及罗马交往频繁。他们仍常向中原输出马匹，以及西域传统产品药物与香料。不同的是，回鹘西迁后定居化，掌握了丝织技术，因此也向中原输出丝与衣料。^①

三、海道贸易

【陶瓷】 唐与五代瓷器已大量销往国外，有的走陆路，有的走海路。

陆上陶瓷之路见之于记载。呼罗珊总督阿里·伊本·伊萨曾向哈里发诃论·拉希德进献过30件精美的中国御用瓷器，以及数达2,000件的中国民用陶瓷。呼罗珊的重要城市内沙布尔出土的唐瓷虽然数量不多，且多残件，但种类俱全。德黑兰南10公里的赖依也出土过唐瓷。巴格达北面120公里的萨马腊在836—892年是阿拔斯帝国的首都，出土过唐三彩式的钵和碗、盘子，绿釉、黄釉罐的破片，白瓷片，青瓷片。巴格达东南60公里的阿比尔塔也发现过9至10世纪制作的褐色越州窑瓷和华南白瓷破片。这些出土古瓷证实了中外陆上陶瓷贸易的繁荣。

海上陶瓷之路的存在由实物得到了确证。唐朝“登州人高丽

^① 《册府元龟》卷九七二。

道”，“广州通海夷道”上几乎随处可见唐瓷遗迹。

日本、朝鲜曾出土唐长沙窑瓷器和三彩陶器，日本并发现过唐邢窑白瓷，越窑青瓷。

“广州通海夷道”上，在东马来亚沙撈越的河口诸遗址中，在印尼的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斯里兰卡中部的达迪伽摩，印度东南海岸本地治里以南的阿里卡曼陀，巴基斯坦印度河口卡拉奇附近的旁浦尔，溯印度河而上，海得拉巴东北的布拉明纳巴德等地都出土过唐、五代的瓷器。当时印度河下游由阿拉伯人占据，这儿应为唐瓷运往大食帝国本土的重要中转地。巴基斯坦西部的莫克兰，伊朗古代著名海港希拉夫遗址都出土过唐瓷。

从印度西海岸向西航行，除了进波斯湾以外，还可以前往东非沿海与红海。东非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岛上也出土过越窑青瓷。这个岛是重要的中转站，在这里贮存的瓷器分批运销到东非大陆各地。

进入红海的运瓷商船在今苏丹的阿伊札布卸货，今天这个港口仍然经常出土中国陶瓷碎片。瓷器从这儿由陆路运往埃及尼罗河畔的库斯和阿斯旺，一部分溯尼罗河而上运往南方，大部分顺流而下运往北方。尼罗河下游开罗南郊的福斯塔特是642年兴建的首府。这儿在1964至1965年出土过中国陶瓷片12,000，年代最早的有8—9世纪唐代的三彩、邢州白瓷、越州窑瓷、黄褐釉瓷和长沙窑瓷，数量最多的是越州窑瓷。出土中国瓷片数量之大，为其他遗址所望尘莫及。而且质量极佳，超过其他遗址，甚至超过日本的收藏品，可见当年进口的是精选的优质品，价格肯定很高，这儿要比其他地方富裕，有很强的购买力。

【海舶】 晚唐五代大量瓷器外销主要通过海路，这与外国船大量来华与中国海舶的进步有密切关系。

隋唐时代，来往于中国的有日本、新罗、百济的船，有南海

船，昆仑舶，婆罗门舶，师子国舶，大食船，波斯舶等名称。师子国舶最大，高几丈，开船后以信鸽与港口联系。昆仑舶、高丽舶也很大，能装万斛。隋唐以前的法显和唐前期的义净及其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所记的大批高僧东来西往多取海道，附夷舶，看来直到唐代中期，外国船在中国海运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中唐以后，中国商船也出远洋，至唐末有后来居上之势。大船长达20丈，可载六七百人。驶入波斯湾后在希拉夫（尸罗夫，Siraf，今曼特河口东）装货起程，所有货物都事先从巴士拉、阿曼等地运至希拉夫以备装入中国船。在南印度的故临（Kulum）要完纳过口税，每条中国船交一千第尔汗（dirham），其他船则纳税一至十第纳尔（dinar）。第纳尔为金币，重4克，第尔汗为银币，一个第纳尔合22个第尔汗。中国船交的过口税要比其他船多4.5—45倍，可见中国船之大。

【市舶使】 唐政府为加强对外贸易事业的管理，首次在广州设立市舶使，市舶使初创于何时有待进一步考证。^①但《册府元龟》卷五四六明确指出：“开元二年（714年）……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广造奇器异巧以进”，^②可见市舶使之设，不会迟于此时。唐时市舶使官职又称“结好使”、“监舶使”或“押蕃舶使”。市舶使掌管海外贸易事宜，实际担负外交之责，故唐代充任市舶使者多系皇帝宠幸的心腹宦官，名为“中使市舶”。市舶使虽非军政要职，但其权势甚大。8世纪下半叶，柳宗元指出，广州府内部事务由节度使掌管，外部往来则统于市舶使，所谓“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广州”^③。官吏的贪廉对市舶使贸易影响极大。如官

^①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三〇《唐代市舶》中说此官设于贞观十七年（643年）以前。

^② 并见《新唐书》卷一一二《柳泽传》。

^③ 《柳河东集》卷二六《岭南节度使隼军堂说》。

吏按舶来商货规定抽取，舶商有利可图，则来之众；官吏贪取苛索无度，舶来必少。即所谓“缓之斯来，扰之则去”。769年（大历四年）进广州港的商舶只四五艘，而第二年出任岭南节度使的李勉既廉洁又不暴征，来舶就多达4,000余艘。又如848年（大中二年）韦正贯就任岭南节度使时，因前任对舶来商货诸多抽取，“来者殆绝”，而韦“悉变故态，一无所取求，问其所安，交易其物，海客大至。”^①唐中央政府下令地方官员除按规定征取商货外，其它货品“任其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税率”，对情节严重的贪官严加惩处。8世纪初，广州节度使刘巨麟、彭杲均因“坐赃矩万而死”。

四、侨 民

【昭武九姓】^② 昭武九姓指的是中亚的粟特诸国。粟特人聚居在乌浒水（Oxus 即阿姆河）和药杀水（Yaxartes 即锡尔河）之间的那密水（Nāmik，今译拉夫珊河）流域和独莫水（疑为今Kashka河）流域，在那密水流域的若干绿洲上，建立起许多城邦国家，有康国、安国、曹国、石国、米国、何国、大寻国，戊地国和史国。《北史·西域传》康国条记载：“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国，校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昭武九姓之称即由此而来。古代粟特人以善于经商出名，利之所在，无远弗届。至唐代，粟特人的商业活动达到极盛，在

① 《全唐文》卷七六四，萧丛：《岭南节度使韦公神道碑》。

② 白鸟库吉著，付家勳译：《康居粟特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R.E.艾默里支：“帕米尔以东的伊朗族人移民地”，《剑桥伊朗史》英文版，伦敦1983年第3卷①，第263-275页。

长安、洛阳等许多大城市中，侨居着大批昭武九姓人。他们对唐代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昭武九姓沿着东来中国的交通要道，在草原内地建立了许多移民聚落。唐时，葱岭以东的昭武九姓移民聚落在蒲昌海（罗布泊）地区、播仙镇（且末）、西州（吐鲁番）、伊州（哈密）、敦煌、肃州（酒泉）、甘州（张掖）、凉州（武威）、长安、兰田、洛阳、灵、盐、夏和后来的云、朔等州，范阳（今北京）及营州的柳城等地。对唐代政治生活影响最大的昭武九姓移民聚落首推六胡州。^①东突厥汗国亡后，汗国中由粟特人组成的胡部，随突厥人迁移至河套以北，后移居灵（灵武）、夏（靖边）二州南部，唐在此地设六胡州。六胡州大首领安善（600—664）在唐击破突厥后，领衙帐百姓归唐，受封为定远将军。其子安金藏则在天武后载初（689—690）中，得侍皇嗣李旦左右。693年（长寿二年），李旦被告发潜有异谋，金藏以刀切腹剖心，证明李旦（睿宗）不反，他的举动惊动了武后，也挽救了睿宗，受到玄宗及以后唐朝君王的赞美。后突厥曾与唐争夺六胡州。721年（开元九年），六胡州康待宾等起事，被镇压。同年，康愿子再反，又被平定，遂将胡人5万余口迁往江淮地区。后多逃回关内。唐设宥州等加以管理。786年（贞元二年），六州胡东走石州（山西离石），后迁云州（大同）、朔州（朔县）。809年（元和四年），沙陀部也迁至河东，与六州胡杂处。沙陀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有不少后妃、文臣、武将都出自康、安、石、史、何、米诸姓。

696年（万岁登封元年），曾大发六胡州精兵赴营州（朝阳）以平契丹之乱。717年（开元五年），河北支度营田使宋庆礼在营州招辑商胡，为立店肆。742年（天宝元年），北蕃的康阿义屈达

^① 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于举族归唐，仍充部落都督，居营州柳城。天宝初，又曾在范阳县界（河北涿县）置凜州，安置降胡。安禄山、史思明皆营州杂胡。安禄山谋反前就利用商胡，每年输异方珍货百万数。叛唐后派人劝诱六州胡数万，拟袭击肃宗的行在，被击破。武威九姓胡安门物也起兵响应安禄山，被平定。安史部下有不少九姓胡人。粟特人后裔在唐军中也有重要将领，如康日知、李元谅（本姓安）。可以说，昭武九姓胡人是唐代最有影响的外来移民。

【波斯人、大食人、天竺人】在唐王朝中较有名的波斯人有阿罗喊、李珣、李珣、石处温等人。阿罗喊（615—710年），官至右屯卫将军，曾充任拂菻国诸蕃招慰大使，并于拂菻西界立碑。李珣随唐僖宗入蜀，以卖香药为业。其兄李珣有诗名。其妹李舜弦被蜀王衍纳为昭仪。石处温仕前蜀为利州司马，仕后蜀曾任宁江军节度使等职。

大食人有李彦升，848年（大中二年）中进士。

天竺人，除了许多高僧外，知名的有罗好心。他在783—784年泾原兵变朱泚围逼之际颇有战功，受德宗重用，官至神策军正将。^①

波斯人、大食人的主要聚居地在广州、扬州。879年黄巢攻陷广州，杀回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拜火教徒，死于是役者十二万人。760年（上元元年），扬州长史刘展叛唐，淮南节度使邓景山引田神功助讨，攻入扬州，杀商胡波斯人数千人。

【新罗坊、日本人与昆仑奴】日本高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提到扬州、楚州（淮安）、泗州（盱眙）、海州（连云港）、密州（诸城）、登州（蓬莱）、青州（益都）都有新罗坊。其中登州的新罗馆（寓商旅店）尤为重要。说明新罗人已在江苏、山东沿海不少城市中形成了聚居区。

① 【日】桑原隲藏：《唐代西域人华化考》，中华书局1939年版。

日本侨民人数不多，似未形成聚居区。但他们汉文化修养之高，恐非其他侨民可比。最著名者为阿倍仲麻吕（701—770），他于717年（开元五年）抵长安，入太学学习，改名晁衡，中进士，取得官职。擅长诗文，与王维、李白等交游。753年，以护送使身份回日，王维曾赋诗送别。遇风暴飘至安南，李白等以为他遇难了，曾赋诗悼念。755年，晁衡重返长安。766年，出任安南节度使。770年，卒于长安。

《旧唐书》一九七《林邑传》载：“自林邑以南，皆卷发黑身，通号为昆仑。”唐宋时代，称黑人为乌鬼，通称昆仑奴。有些唐人小说将昆仑奴描写成本领高超、勇敢而能牺牲的角色。昆仑人有的为水手、商人、海盗，也有被卖为奴，随使入献。

【侨民的管理】 唐代对于侨民的管理，可分两类。一类是归化。凡化外人归朝，所在州镇要供给衣食，向上汇报，于宽乡附贯安置，可免除租税徭役十年。

另一类是仍为外侨。他们中如同类自相犯法，则各依本俗之法处理；如果异类相犯，则以唐律论处。他们可在唐的“宾贡科”应试。628年（贞观二年），规定外侨在中国娶汉人妇女为妾者，不得带回蕃国。779年（大历十四年），下令禁止回纥诸胡在京师诱取妻妾。836年（开成元年），下令禁止中外通婚。外国海商去世，由官方代管财产，满三个月，无妻子儿女认领，即没收充公。后放宽期限，凡妻子儿女前来，即可认领。

第二节 佛教与汉文化的影响^①

一、译经师的东来

【隋代译经师】 隋代著名外来译经师有六、七人。

那连提耶舍（517—587），北印度乌荼国人，陆行经突厥入北齐。582年（隋开皇二年）七月入长安，住大兴善寺译经，后移住广济寺为外国僧主。前后译经论15部，80余卷。毗尼多流支为其同乡，也于582年在大兴善寺译经二部。后至越南，住龙编古法寺，弘传佛教。但译经质量不高，音义乖越，遂从突厥中迎阇那崛多主持翻译。

阇那崛多（523—600）^②，北印度犍陀罗人，经迦毕试、厌怛、于闐、吐谷浑到长安。周武帝灭佛，他避入突厥。585年，应邀入长安大兴善寺。从此，每有翻译，必以他为主。共译经37部，176卷。他还与若那竭多一起译梵古书及乾文200余卷。当时还有中天竺国人达摩般若译出《业报差别经》等。

长安大兴善寺之外，隋朝另有一个译馆是洛阳上林园，由隋炀帝设置。达摩笈多（？—619）是南印度罗罗国人，由陆路来华，住兴善寺。炀帝时转住上林园译经。共译经7部，32卷。

隋代主持译事的彦琮根据笈多的游历，著《大隋西国传》一部，今佚。彦琮精通梵文，以汉人佛学大师亲自主译，开创了译经史上的一个新时期。当时有王舍城沙门将还国，请《舍利瑞图经》、《国家祥瑞录》，隋炀帝命彦琮译为梵文，合成十卷，赐之西域。

^①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编》，中华书局1982年版。慧皎、道宣、赞宁、如惺四人分别撰写的《高僧传》初、二、三、四集是基本史料。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六册，第25—343页《印度佛教之传入中国》作了较完整的汇编。

^② 《高僧传二集》卷二，《阇那崛多传》。

【唐代前期译经师】 唐代译经基本上由国家主持，从629年（太宗贞观三年）到811年（宪宗元和六年），历时近200年，前后译师20多人。

第一个主持译经的是波罗颇迦罗蜜多罗（翻译年代629—633年），他是中印度人，初至西突厥传教，626年（武德九年）入京住兴善寺，译经3部35卷。

645—663年间，译经即以玄奘为主。同时代外国译经师有中印度人无极高（阿地瞿多）于652—654年在长安慧日寺译出《陀罗尼集经》12卷，并在长安设坛传授灌顶。又有中印度人那提^①，由海道来华，携大小乘经律论500余夹，1500余部。玄奘声望极高，那提很不得志，遂奉诏往海南采药。663年回京。原带来的经典已为玄奘拿去，无所凭依，只译了3部经。后往真腊，不知所终。稍迟有中印度人地婆诃罗，674—688年于两京东西太原寺译经18部34卷。北印度人佛陀波利，676年译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武则天执政，译事尤盛。南印度人菩提流志名声极大，唐高宗于683年（永淳二年）遣使迎来，武则天也很尊重他，693—713年间译经53部，尤其是《大宝积经》120卷的译出完成了玄奘未尽的宏愿。又有实叉难陀译出《华严经》，也很重要。这一时期僧人译经之最有名者，实为义净。

【开元三大士与后期译经师】 玄宗时译事又大盛，中心人物是善无畏、金刚智与不空，称开元三大士，将印度纯粹的瑜伽密教传入了中国。^②

善无畏（637—735），中印度摩揭陀国人，80余岁携梵本经素叶城突厥王庭，到达长安，被礼为国师。玄宗设内道场，尊为教主。716—735年间译出《大日经》等三种密宗要籍。

① 《高僧传二集》卷五，《那提三藏传》。

② 郭朋：《隋唐佛教》第576—584页。

金刚智（669—741年），南印度摩赖耶国人。经师子国、佛逝、广州至长安。720—741年间译出密典4部。死后敕谥国师之号。

不空（705—774），师子国人，幼年出家，14岁在阇婆国拜金刚智为师，随来中国，协助译经。741年奉金刚智遗命，欲往天竺。旋奉朝廷之命送国书往师子国，受到隆重接待。746年，带着师子国的国书与500余部佛经回国。后应诏入内立坛，为玄宗灌顶。安禄山陷长安，城中的不空仍常派人与肃宗联络。肃宗还都后，不空备受礼遇。他曾为肃宗灌顶。758年，将两京的全部梵文经夹集中到大兴善寺。代宗朝765年授试鸿胪卿，774年封肃国公，可谓中国佛教史上最有权势的僧侣。他自开元至大历年间译经77部，120余卷，与罗什、真谛、玄奘并称为“四大译师”。

不空以后，译事大衰。有北印度的智慧（般刺若，译经年代792年）、罽宾国人般若（译经年代781—811年）等相继译经，但不甚重要。此后，译事就寂然无闻了。

二、求法僧的西行

【玄奘】^① 隋唐西行求法的第一人为玄奘（602—664），俗姓陈，名祜，河南缙氏（今河南偃师）人。在国内遍访名师，但感到所说纷歧，遂决心赴天竺求法。629年（唐太宗贞观三年）出玉门关，得到高昌王麴文泰、西突厥叶护可汗的赞助，经率利、吐火罗、梵衍那、迦毕试等地区而入印度。接着一路东行，巡访了佛教四大圣迹（佛诞生、涅槃、初转法轮与成道处）。在那烂陀寺从戒贤受学5年。又先后游学东、南、西印度，回那烂陀寺，主讲《唯识抉择论》等，同一些学者展开辩论。戒日王在

^① [唐]慈立、彦棕：《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

玄奘西行求法路线图



曲女城开无遮大会，以玄奘为论主，大会18天終了，无人提出异议，玄奘名震五天竺。此后渡印度河，经迦毕试、吐火罗、竭盘陀、于阗于645年（贞观十九年）带着520夹657部梵本回到长安。回国后，于646年由他口授，辨机笔录而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将他在中亚、南亚亲历的110国与传闻的28国一一加以记叙，是研究苏联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尼泊尔等地古代历史地理及考古的重要资料。^①645—664年间，他夜以继日，殚精竭虑，译出佛经75部，1335卷。以卷数而论，超过了竺法护、罗什、真谛、义净、不空等人的总和，实为千古独步。其译经多用直译，笔法严谨，质量极高，世称“新译”。还将《老子》和印度失传的鸟鸣《起信论》译成梵文，送往印度。他译经风度博大，但其阐弘的主体则为法相。译出了法相宗的一本（《瑜伽师地论》）和十支中的八支（《成唯识论》等），并广收门人，随时讲解，奠定了法相宗的理论基础。

【义净】^② 名声仅次于玄奘的求法僧为义净（635—713），义净，本姓张，齐州（山东历城）人，14岁出家，有志西行求法。671年（咸亨二年），从广州经室利佛逝（苏门答腊岛巨港）、末罗瑜（占碑）、羯荼（马来西亚吉打）、裸人国（尼科巴群岛）而至耽摩立底国（印度加尔各答西南）。住一年，学梵语，习《声闻论》。674年（咸亨五年）到摩揭陀国，遍历圣迹，在那烂陀寺学习十年。求得梵本近400部，东返佛逝，译经二年。689年，回广州取得纸墨抄手后返回佛逝，抄补梵本。695年（证圣元年），他在外经25年，历30余国，归抵洛阳。他在佛逝时撰写

^① [唐]玄奘、辨机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② 《高僧传三集》卷一《义净传》。

《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记载了东南亚、南亚的佛教、地理、风俗，又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都是研究中外关系的要籍。回国后，先与实叉难陀共译《华严经》。700年后，自主译事，与吐火罗、罽宾、迦湿弥罗，天竺僧侣合作，译出经文56部，230卷，尤注重律部的翻译，名声盛极一时。

玄奘、义净的时代，西行求法者甚众。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仅在太宗、高宗、武则天三朝所记已有60余人。

【慧超与悟空】 慧超，新罗人，弱冠入唐。后泛舶南海，经师子国，前往东印度，溯恒河而上，至中天竺国王城葛那及（卡瑙季），经南天竺前往西天竺，又向北遍历迦叶弥罗（克什米尔）、健陀罗（白沙瓦）、罽宾（喀布尔河流域）、谢颯（加兹尼）、犯引（巴米安）、吐火罗，他在后来写的《往五天竺国传》中记述了波斯、大食（大食）、小拂临（叙利亚）、大拂临（拜占廷）、安、曹、米、康、史等胡国和跋贺那（费尔干纳）的情况，他向东经胡密（瓦罕）、播密（帕米尔）、渴饭檀（塔什库尔干）、疏勒，于开元十五年（727）至安西（库车）。著有《往五天竺国传》^①。

悟空^②，本名车奉朝，后魏拓跋氏的远裔。750年（天宝九年），罽宾遣使来朝，请唐遣使巡接。次年，玄宗派中使张韬光，左卫泾州四门府别将车奉朝等40余人，经安西，于753年至罽宾东都健陀罗国。其他使者完成使命回唐，车奉朝因病留在健陀罗，出家为僧，后巡游中天竺国，瞻仰佛迹，在那烂陀寺学经三年。悟空带着《十力》等三部佛经，经吐火罗至龟兹，请勿提提罽鱼译出《十力经》。他又经北庭，于789年（贞元五年）回

① 有罗振玉刊《慧超往五天竺国传》。

② 《高僧传》三集卷三《释悟空传》。

长安。圆照撰《大唐贞元新译十地等经记》中的《佛说十力经序》记载了悟空的事迹。悟空之后，西行求法渐成绝响。

三、佛法东传

【鉴真】 唐时中国僧侣至日本传道者，见于日本史籍的有二十余人，其中以鉴真最为有名。

鉴真（688—763），扬州江阳县（今扬州）人，14岁出家，708年受具足戒。云游名刹，遍访高僧，研习律宗。至733年，已成南方律学权威，尊为受戒大师。742年（天宝元年），鉴真在扬州应日僧荣睿、普照之请，拟赴日讲授律藏和传戒。前四次因官府干涉或遇风浪而未成行。第五次，748年，终于成行，但又遇风暴飘至海南岛。回扬州途中，荣睿与鉴真高足祥彦先后去世，鉴真也双目失明，但不改初衷。753年，鉴真与僧人女尼17人，胡人安如宝，昆仑国人军法力，瞻波国人善听及普照等，乘遣唐使返日船航抵日本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今九州鹿儿岛），带去佛经34种。鉴真被授以传灯大法师位，在奈良东大寺筑坛授戒，创立了日本律宗。759年，建成唐招提寺，他即迁入此寺讲律传戒。在传教之余，校勘经典，行医制药。鉴真去世后，日本淡海三船即真人元开据其弟子思托的《鉴真传》写成了《唐大和上东征传》。①

【入唐学问僧】② 日本赴唐的留学僧有百余名。最早回国的僧人是在大化改新中发挥作用，任国博士、与吉备真备同时入唐与回国（716—735）的玄昉，回国后也与吉备真备一起参予国

① 【日】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② 【日】村上专精著，秘曾文译，《日本佛教史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22页。

政。多数留学僧都在创立日本佛教诸宗方面发挥了作用。“入唐八家”中的最澄、圆仁、圆珍开创了日本天台宗；空海、常晓、圆行、慧远、宗睿开创发展了真言宗，合称“平安二宗”。

圆仁（794—864）俗姓壬生氏，15岁入京都附近比睿山天台宗的延历寺，拜最澄为师。随遣唐使于838年（开成三年）入唐。从扬州经青州登五台山学天台教义。又从青龙寺义真学密教，从醴泉寺宗颖习止观。847年（大中元年），带着经论、章疏585部由登州乘新罗船回日，重登比睿山。854年，任天台宗第三代座主。去世后授谥号慈觉大师。他把自己在唐的经历写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四卷。^①

四、隋唐佛教诸宗的外传^②

【三论宗】 三论宗主要研习龙树一系的《中论》、《十二门论》、《百论》，因而得名。着重阐扬诸法性空的理论，也称“法性宗”。开山祖师是鸠摩罗什，实际创宗者为隋唐时的吉藏。吉藏（549—623）俗姓安，因在会稽秦望山嘉祥寺大开讲筵，听众常达千余人，而称嘉祥大师。先后受隋炀帝、唐高祖尊崇。现存著述36部。高丽人慧灌、道登先后从吉藏受学，后赴日本在飞鸟元兴寺讲三论。福亮本中国人，在日本从慧灌出家，也曾入唐从吉藏学，后返元兴寺。其在俗的儿子也出家，名智藏。智藏的弟子道慈于701年入唐，从吉藏的再传弟子元康研习三论，718年返日，曾仿长安西明寺，在奈良营造大安寺。

【天台宗】 天台宗的实际创教者是隋朝天台山（浙江天台

^①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译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② 〔日〕镰田茂雄著，郑彭年译：《简明中国佛教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65—249页；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

县境内)智顓,因而得名。此宗教义以《法华经》为主,故又称法华宗。教观要领三谛圆融之说,据说出自龙树。此宗是中国佛教的精华,对中国哲学思想有过广泛影响。天台宗一度宗势不振,至九祖湛然(711—782年)有中兴之势。湛然传法道邃(十祖)、行满,道邃传宗颖,良谔。日本最澄和弟子义真于804年入唐从道邃、行满学天台教义,后至越州从善无畏再传弟子顺晓学密教,805年携经论230余部返日,在比睿山开创天台一宗,兼传密宗和大乘戒法。最澄的弟子圆仁也曾入唐兼学台、密二教。义真的弟子圆珍于853年入唐,从良谔学天台教义,从不空的三传弟子法全学密教,858年携经卷411部回国弘化。中国天台宗经会昌灭法和唐末五代之乱,教典多湮灭。第十五祖义寂请吴越王钱俶遣使赴高丽访求天台教典。高丽沙门谛观于961年送来一些教典。高丽人宝云义通(927—988年)于后晋天福(936—943)时来中国,从义寂受业,成为天台宗第十六祖。

【法相宗】 法相宗阐扬法相、唯识的义理,故称法相宗或唯识宗,又因其创宗者玄奘住大慈恩寺,又称慈恩宗。此宗崇奉印度佛教从弥勒、无著、世亲、护法、戒贤相承而下的学说。玄奘亲至印度从戒贤学,回国后创建法相宗。玄奘门人中有不少新罗、日本僧侣。新罗人神昉是奘门四上足之一。圆测(613—696年)是新罗王族,后从玄奘学,与窥基并驾齐驱。玄奘最著名的门人窥基(632—682年)是后魏尉迟部后裔,他的学生有慧沼和新罗僧道伦。慧沼传智周(668—723年)。日僧道昭于653年入唐受教于玄奘。日僧智通、智达于658年入唐从玄奘、窥基受学。新罗僧智风、智鸾、智雄于703年入唐受学于智周。他们均去日本,在飞鸟的元兴寺传习法相宗,称元兴寺传或南寺传。智风的再传弟子玄昉716年入唐从智周学,735年携佛像及经论章疏5,000余卷回日本,在奈良兴福寺传习,称兴福寺传或北寺传。

【华严宗】 华严宗所依主要经典是《华严经》，故名。因此宗高僧法藏称贤首法师，又称贤首宗。此宗的学统传承一般作杜顺—智俨—法藏—澄观—宗密。智俨的弟子义湘(625—702年)是新罗人，661年到长安从智俨学，671年回国在太白山创浮石寺，敷讲《华严》，称“海东华严初祖”。法藏(643—712)，字贤首，祖籍康居，为华严宗的实际创宗者。后法藏的弟子新罗僧审祥前往日本，于740年开讲《华严经》，为日本华严宗初祖，他授日僧良辨，以后《华严经》的讲习渐次弘盛。

【律宗与净土宗】 律宗以研习及传持戒律为主。隋唐时代分为三派：南山宗、相部宗、东塔宗，而以南山宗独盛。733年，日僧荣睿、普照入唐，由相部宗的定宾授戒。他们邀请唐东都大福先寺道璿于736年赴日讲解戒律，兼讲华严。但道璿不能授戒。遂又请南山宗的鉴真东渡授戒，鉴真即为日本律宗初祖。新罗僧慈藏于638年入唐，请得藏经一部回国，为朝鲜有大藏经之始，他回国后大兴律宗。中国南山宗祖师道宣门下新罗僧甚多，著作也盛传于新罗。

净土宗以专修往生阿弥陀佛净土而得名，又称莲宗。以东晋慧远为始祖，实际创宗者为唐代善导(613—681年)。此宗修行方法简便，专念“阿弥陀佛”名号，故深入民间。日僧法然依据善导《观无量寿佛经疏》，开创日本净土宗。

【禅宗】 以专修禅定为主，故名。以南印度来华僧侣菩提达摩(?—536)为初祖，经慧可、僧璨、道信，至五祖弘忍门下，分成北方神秀的渐悟说与南方慧能的顿悟说。南宗独盛，发展出曹洞、云门、法眼、洪州诸宗，洪州宗又发展出沩仰、临济二宗。唐末以后，禅宗长盛不衰，影响及于宋明理学。隋唐五代朝鲜来中国学禅的僧人相当多，相传新罗僧人法朗曾受学于四祖道信，其弟子信行受学于神秀的再传弟子志空。洪州宗西堂智藏

的法嗣中有新罗僧道义、慧哲、洪直。道义回国后为海东迦智山第一祖，慧哲回国后在桐里山传播禅宗，洪直为实相山初祖。新罗无染禅师于821—845年在唐学禅，回国后有弟子2000，成为圣住山派。为仰宗的仰山慧寂的法嗣中有新罗僧顺支，归国后为新罗为仰宗的初传。日僧道昭、道璿、最澄，圆仁和唐僧义安等曾将禅学传入日本。

【密宗】 密宗或称瑜伽密教，宣扬身、口、意“三密相应”和“即身成佛”。印度纯粹的瑜伽密教的传入，始于“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不空的弟子较突出的有6人，称六哲。新罗僧慧超即六哲之一。六哲中以惠果继承了不空的法脉，住长安青龙寺，称青龙寺和尚，弟子众多。外国学僧有：河陵僧辩弘，新罗僧惠日和悟真，日僧空海。空海804年入唐求法，回国后，在高野山建金刚峰寺，创立日本真言宗，后流为东密。世人称空海为弘法大师。中国密宗与日本真言宗的关系很是密切。

五、边地佛教

【吐蕃佛教】^① 吐蕃松赞干布(617?—650年)为初娶的尼泊尔尺尊(赤贞)公主修建了大昭寺，专门供奉带来的释迦牟尼佛像、弥勒转法轮像、旃檀度母像等。为641年娶的文成公主修了小昭寺安放带来的释迦佛像。佛教从南亚与汉地同时传入吐蕃。松赞干布派吞米·桑布札赴印学习，返藏后参照梵文字体创制了藏文，并与其他藏人及印度人、汉人学者一起把部分佛经译成藏文。此后佛教发展不大。墀松德赞(742—797)于770年迎来印

^① 王辅仁：《西域佛教史》，青海人民出版社第15—65页。

度高僧寂护，后又迎来印度邬仗那人、密宗大师莲花生，在首都逻些（拉萨）南面建桑耶寺，开始度藏人出家。以印度高僧无垢友为主，有许多印度与吐蕃僧侣用藏文译出了大量佛经。792—794年，在墀松德赞主持下，以大乘和尚为代表的汉地禅宗与寂护弟子莲花戒为代表的印度中观派展开了辩论，大乘和尚失败后回汉地，印度中观派在吐蕃占了主导地位。^①可黎可足（热巴坚，803?—838）极力发展佛教，支持译经，三藏经典大体完备。

【西域佛教】 于阗有于阗文，是以婆罗米字母记录的一种东伊朗语。现今发现的于阗文的文献年代属六——十世纪，出土地点以和田为主，还有巴楚、图木舒克、木头沟、敦煌等，内容以佛经为主。玄奘说：于阗“伽兰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并多习学大乘法教。”于阗有不少学问僧。提云般若689年来到中原，译出《华严经》的分品等。尉迟尸罗用诗歌体创作《佛本生赞》，长达600多行，甚为珍贵。最著名的是实叉难陀（652—710）带着《华严》梵本于695年到洛阳，主持译出八十卷《华严经》，另译有《楞伽经》等，共译经19部、107卷。戒法于789年曾译出《十地经》。

疏勒在玄奘时代有伽蓝数百所，僧徒万余人；焉耆有伽蓝10余所，僧徒2000余人；龟兹有伽蓝百余所，僧徒5000余人，都习学小乘教。龟兹僧木叉毘多曾游学印度20余年。勿提提犀鱼在789年曾译出《十力经》。

粟特人散居西域各地，粟特文是用阿拉米字母书写的一种东伊朗语。西域出土了大量用粟特文写成的佛经，多译自汉文，少量译自梵文和龟兹文。来华的粟特人高僧有法藏（贤首大师），僧伽（628—710，何国人），神会（720—794，石国人）。

^① 【法】戴密微著，耿昇译：《吐蕃僧诤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回鹘西迁后，也信佛教。西域出土了大量用回鹘文译的佛经，译自汉文、藏文、焉耆龟兹文等。

六、佛教空前巨大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的影响】 隋唐五代时，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外来文化是佛教。

佛教对政治有很大影响。隋文帝幼年受智仙尼抚养，即位后大力振兴佛教。炀帝也笃好佛教。长安大兴善寺是国寺。佛教有很浓厚的国教色彩。唐代设崇玄署管理佛教。唐中宗设龙兴寺，玄宗设开元寺，都具有官方寺院的性质。太宗、高宗父子对玄奘推崇备至。武则天为了改唐为周，利用奸僧薛怀义等编造《大云经疏》，在两京及各州造大云寺，拜薛怀义为梁国公。玄宗、肃宗、代宗三朝都极其尊崇不空。

佛教在经济上也有很大力量。寺院有寺田，由僧尼、奴婢、佃户耕种。武宗时，佛寺大约有膏腴上田数千万顷，奴婢15万。寺院还经营碾硃、邸店（仓库）、商店、车坊（出租马车店），设立无尽藏（金融业），以增加收入。大量僧尼免税，免徭役、兵役，成为很大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和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的灭佛。

佛教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佛教的传入、发展与中国化，弥补了中国宗教思想与宗教文化不发达的不足。佛教又刺激了道教的发展。道教一方面与佛教争论，另一方面不断摄取佛教教理来撰写道教经典。佛教深刻地影响了儒家的发展。一方面引起了儒家的反击。唐朝反佛者代有其人，而韩愈最为著名。另一方面，王维、白居易、柳宗元等少数士大夫已信奉佛教，深入理解其哲理。李翱的《复性书》已隐含着沟通儒佛两家思想的倾向。至宋

明理学，充分吸收了佛教哲理，使儒家面目一新，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大的转变之一。逐步形成了儒、佛、道三教并存，互相争辩又互相借鉴的局面。

佛教对民众影响甚大。寺院进行俗讲，向一般民众讲解经典。为了使民众易于理解，常讲一些因缘故事，这种俗讲的脚本就是变文。又有游化僧周游各地，进行传教。有的寺院还组织社邑，进行斋会、念经、抄经、俗讲等活动。佛教逐渐渗入中国文化的深层，成了大众信仰的一部分。

【东亚佛教圈的形成】 传入中国的佛经，几乎全译成了汉文。现在梵文佛经已多散佚，不足以构成全套正典。巴利文三藏还算完整。而汉文《大藏经》基本保存了佛教经典的全貌。

朝鲜、日本、越南深受汉文化影响，与汉地一起，形成了一个东亚汉字文化圈，与东亚佛教文化圈相辅相成。朝鲜的主要佛教宗派华严宗、法相宗、密宗和禅宗都传自中国。禅宗形成了九个派别——九山。日本的三论宗、成实宗（附在三论宗内）、法相宗、俱舍宗（附在法相宗内）、华严宗、律宗，合称古京（奈良）六宗，是奈良时代（710—784）的主要佛教宗派。天台宗（与密教结合，称台密）与真言宗（东密），称平安二宗，是平安时代（794—1192年）占优势的教派。这些佛教宗派都从中国传入。越南禅宗前、后派也传自中国。

七、汉文化的对外影响

【汉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隋唐五代佛教对日本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汉族固有文化也对日本有巨大影响。日本大化革新（646）按照隋唐集权国家的形式，改革日本的经济、政治结构。经济上，收土地、人民为国有，施行班田法，征收租庸调；政治

上，确定官制，削弱封建贵族特权，为吸收汉文化奠定了基础；教育上，中央设大学，地方设国学。大学以汉文教学，明经道为主科，研习五经、《论语》、《孝经》等；纪传道学习《史记》、《汉书》、《文选》、《尔雅》。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古汉文是官方文字，也是上层社会的书面语言。720—901年先后写成的《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总称六国史，记述了从神话时代至887年的日本历史，体裁格式全仿中国编年体史书。《怀风藻》、《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集子收录诗、赋、序文、策对，都用汉文。诗以唐诗为楷模，著名诗人有小野篁、空海等人。日本精英文化实可视为汉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日本的文字也吸取汉字的有益成分而成长起来。712年的史书《古事记》，稍晚的和歌诗集《万叶集》及一些天皇诏敕已用汉字作符号记录日语，称“万叶假名”。后以汉字草体或正楷的字头、偏旁作字母，形成了片假名与平假名。日文基本词汇、日常生活用语多为本族语言，但大部分词汇，即政治、经济、文化词汇是汉文借词。^①

【汉文化对朝鲜、安南的影响】 682年新罗在中央设国学，讲授五经、《论语》、《孝经》、中国史书、文学著作等。国王也常至国学听讲。788年，仿唐科举制，公布读书三品出身法，以儒家经典与汉学为主要考试科目，合格者分三等授官。唐朝的留学生中以新罗学生最多。有不少人在唐应试，中举做官，崔致远是最著名的。他874年及第，授溧水县尉，著有《桂苑笔耕集》二十卷。新罗以古汉文为书面文字，7世纪中后期创造了用汉字的

^① 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73—96页。陈志贵：《试论唐代中日关系》，载《中日关系史论丛》第一辑。

音或意标记朝鲜语的方法，称“吏读”，是以后朝鲜文“训民正音”的先导。^①

安南（越南北部）基本上在隋唐五代汉族王朝的版图之内。597年（隋开皇十七年），在那儿开设学校。754年（天宝十三载），因岭南颇习文儒，准其考试。比较著名的有姜公辅，爱州日南人（清化），中进士，很受唐德宗（780—805）器重，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②

【大食、拂菻对中国的了解】^③ 汉文化对西方影响不大，不过与中国有交往的国家，对中国都有所认识。大食留下的记载较为详实可靠。苏莱曼曾到远东游历，851年由无名氏写成游记^④，这是关于中国的第一篇阿拉伯文游记，收入阿布塞特哈桑的《中国印度纪程》中作为前部，后部系哈桑916年据传闻撰写，书中还附录了伊宾华哈勃在黄巢起义前从广州至京师觐见唐僖宗（874—888）的谈话回忆录。伊本·库达特拔约于848年写成《邦国道里志》，记载了大食通中国之海道。^⑤伊本·罗斯德约903年的著作中也有关于中国的记载。麻素提的巨著《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提及黄巢起义及此后中国与大食海上贸易的情况，又记869年有伊本·哈拔儿来游中国，留有记述。伊本·米撒尔在其游记中讲到中国使团941年到过萨曼王朝。11世纪初的祖拜尔，在其

① 朴真奭：《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46页。

② 《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第137—142页。

③ 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第198—240页，第一册第88—93页。

④ 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为我国《苏莱曼东游记》的第一次完整的中译注本。

⑤ 伊本·库达特拔：“唐代大食通中国之海道”，宋晁节译自《邦国道里志》，《中外关系史译丛》，第8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49—257页。

《珍宝录》中记载939年中国有使团至萨曼王朝，所指可能为同一事，遣使者可能为于阗王李圣天。^①

拂菻的席摩喀塔于628—638年间写成莫里斯皇帝时代(582—602)的历史八卷，其中讲到 Taugas 国，可能包括一些得之传闻的关于中国的情况。

第三节 西亚、中亚文化与宗教的影响

一、粟特文化对突厥、回鹘的影响

【粟特人与突厥】^② 汉地文化发达，粟特人对汉族的影响毕竟有限，突厥、回鹘文化较低，粟特人对他们的影响则得多。西突厥汗国始祖室点密可汗(562—576?)时代，粟特人马尼亚赫父子是重要使臣。突厥汗国木杆可汗(553—572)、佗钵可汗(572—581)时代有一位木杆特勤与他们联合执政，为了纪念他，580年前立了《木杆特勤记功碑》^③(1956年出土于蒙古布古特)，碑文是用粟特文写的，作者可能是不花达干，是懂粟特文的突厥人或有突厥名字的粟特人。此碑说明粟特文化对突厥汗国有重大影响。都兰可汗(588—599)时，粟特人安遂迦私通大义公主，干预汗国政局。始毕可汗(609—619)最重用史蜀悉胡，为隋朝劲敌。始毕曾遣特勤康稍利援助李渊起兵。颉利可汗

① 马雍：《萨曼王朝与中国的交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学习与思考》，1983年第5期。

② 护雅夫：《古代突厥民族史研究》第一卷，山川出版社，1967年，第61—93页。

③ 〔苏〕S·J·克略希托内，V·A·列夫什茨撰，龚方震译，《布古特粟特文碑铭补证》，《中外关系史译丛》第8辑，第35—53页。

(620—630)以统特勤主胡部，可见粟特人已可单独成部。颉利因“每委任诸胡，疏远族类”，引起内部矛盾，被唐乘机攻灭。安臯汗率所部5,000余归唐。史善应、康苏密率胡部迁居鄂尔多斯，为六胡州。后突厥默啜可汗(?—716)曾向武后索取六胡州降户，并出兵争夺。游牧民族尚无文字，至后突厥(682—745)始创制突厥文，有40余个字母，其中23个源自阿拉米文，是粟特人传人的。粟特人的祆教可能也影响了突厥人。

【粟特人与回鹘】^① 回鹘人人唐，常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居京师，多至一二千人，富有资产，开设第舍、市肆，大获其利，骄横不法。粟特人在回鹘有很大势力。葛勒可汗(747—759)在位时，粟特人与汉人在仙娥河旁筑富贵城。763年，登里可汗从洛阳带四个摩尼僧回国，后以摩尼教为国教。摩尼僧多为胡人，有很大权势。胡人跋扈，引起唐朝与部分回鹘人的不满。唐德宗即位(780年)，命令董突尽帅其徒(回鹘人、粟特人)归国，途经振武军(内蒙托克托)。当时回鹘国内亲唐的宰相顿莫贺达干杀死了听信九姓胡打算反唐的登里可汗及九姓胡2,000人。振武军留后张光晟乘机杀董突及九姓胡900人。可见粟特人数量之多。回鹘汗国沿用古突厥文。保义可汗(808—821)于820年建《九姓回鹘[爱]登里罗泊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通称《九姓回鹘可汗碑》)^②，用古突厥文、粟特文、汉文三种文字刻成。说明从580—820年这200多年间粟特文一直是突厥人，回鹘人的官方文字之一。840年回鹘西迁前不久开始使用依照粟特文字母创制的回鹘文。

^① 参阅山田信夫主编：《波斯和唐》第五章。此书为《东西文化的交流》丛书之二。《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第27—31页。

^② 参看程溯洛《释汉文〈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中有关回鹘和唐朝的关系》，载《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第706—719页。

二、拜火教^①

【隋以前拜火教的传人】 拜火教又名祆教、火教、火祆教、波斯教或琐罗亚斯德教，它是东伊朗人琐罗亚斯德（前628?—551?）创立的，因为崇拜火，通称拜火教。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前550—330）大流士一世（前558—486）将拜火教定为国教。安息王朝（前247—公元226）的宗教是同崇祀祖先、太阳、月亮混合起来的拜火教。萨珊王朝（226—651）以琐罗西斯德教为国教，有严格的教义和复杂的僧侣组织，对国家政治有巨大影响，“穆护”（Magus）系该教祭司的称呼。而流行于中亚地区的拜火教没有严格的教义，也没有强大的僧侣组织，渗进了当地的偶像崇拜。

南北朝时中国开始了解波斯、吠哒“事天神、火神”。北魏灵太后（516—527）废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北齐也事胡天。北周也有拜胡天制，鸿胪寺典客署设京邑萨甫二人，诸州萨甫一人。萨甫又作萨保、萨宝，意为队商首领，既是管理胡人侨民的首领，又兼奉祀胡天神的祭司。高昌、焉耆也俗事天神。康国也有祆祠。流传在高昌、焉耆及北魏、北齐、北周的祆教，当为中亚拜火教，而非萨珊波斯国教。

【隋以后拜火教的流传】 隋唐时代知道安、曹、史、米、毕诸国总事火祆。祆教已传入疏勒、于阗。隋管理祆教徒的官称“萨保”（唐称“萨宝”），雍州（即京师）萨保为视从七品，诸州胡200户已上萨保为视正九品。

唐长安城中祆祠有四处：布政坊者设于621年，祠内有萨宝府

^① 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03—328页。

官，另为醴泉坊，普宁坊，靖恭坊。洛阳之会节坊、立德坊、南市西坊。凉州也有袄祠。两京及碛西诸州火袄，每年让袄教徒参加祭祀，而禁止汉族民众祈祭。以上为中亚拜火教的传播。

631年（唐贞观五年），有传法穆护何禄将袄教诣阙奏闻，敕令在长安崇化坊立袄祠，号大秦寺，又名波斯寺。穆护即萨珊波斯国教祭司 Magus，崇化坊的袄祠当为波斯国教寺院，与萨宝主持的袄祠不同。^①

唐武宗会昌灭佛（845年），大秦、穆护，袄僧皆勒令还俗。穆护即波斯国教祭司，袄僧即中亚拜火教僧侣，两者同时遭禁。但袄教继续残存。862年（唐咸通三年）宣武节度使令狐绚曾给史怀恩牒文，准其担任开封城北袄庙的庙祝，从此史氏世代为祝，至北宋末，史世爽尚任庙祝。高昌、于阗等地则直至10世纪仍信奉袄教。

三、景 教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聂斯脱利在428—431年任基督教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在431年以弗所宗教会议上遭到亚历山大主教西里尔的谴责，被东罗马帝国朝廷罢免大主教职务，旋被放逐。早在424年已脱离拜占廷教会而独立的波斯基督教会承认了聂斯脱利学说，遂称聂斯脱利派。此派于635年传入中国，称景教。

1625年（明熹宗天启五年），在陕西盩厔县出土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现藏西安碑林。此碑建于781年（唐建中二年）。根据此碑及有关史料可较清楚地了解635—781年间景教的发展情

^①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1987年版）第91—92页，考证长安崇化坊实有袄祠，宋敏求《长安志》失记。

况。①

635年（唐贞观九年），大秦国上德阿罗本带经籍至长安，太宗派房玄龄迎入宫内，译经传道，称波斯经教。638年，下诏批准在长安义宁坊造波斯寺一所。高宗（650—683）时在诸州各置景寺，仍以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景教“法流十道”，“寺满百城”。677年（仪凤二年），波斯王卑路斯奏请于长安醴泉坊十字街南之东置波斯寺，景龙中迁至布政坊西南隅袄祠之西。圣历、先天年间（698—713）佛教、道教在洛阳、长安抨击景教，僧首罗含、大德及烈支则竭力维持。玄宗（712—756）令宁国等五王亲临景教寺院，建立坛场，景教复兴。744年，下诏命僧罗含、僧普论等17人，与大秦国大德佶和于兴庆宫修功德。次年九月下令：波斯教经出自大秦，两京及天下诸府郡波斯寺改称大秦寺。肃宗（756—761）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代宗（762—779）每于降诞之辰，赐天香，颁御饌。巴格达景教总主教蒂摩太（778—824）曾颁布文书任命大卫为中国大主教。德宗（780—805）也很支持景教。景教僧伊斯早先从王舍城（巴尔赫）至中国，在郭子仪麾下效力，作肃宗的耳目，官至同朔方节度副使。每年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并做了不少慈善事业。781年，由长安大秦寺僧景净口述，吕秀岩写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先叙基督教大义，次叙635—781年间景教流行情况，最后特别赞美伊斯的业绩。景净在786—792年间曾与迦毕试国高僧般刺若合译《六波罗密经》，德宗见译本理昧词疏，不准流行。

【景教经典及景教遭禁】 敦煌鸣沙山石室发现的景教经文有六种：1. 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分讚文、尊经、按语；2. 一神论卷第三，包括喻第二、一天论、世尊布施论第三；3. 序听迷

① 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21—38页。

诗所经；4. 志玄安乐经；5. 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讚；6. 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吐鲁番附近发现过粟特文景教经典残叶。

845年（武宗会昌五年）灭佛，七月，下令大秦、穆护等祠一律革除，其人勒令还俗，如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八月，勒令大秦、穆护、袄僧3,000余人还俗。景教（大秦）就与波斯国教（穆护）、中亚拜火教（袄）一起被禁。^①信仰这三种宗教的胡人未必马上离华。878年，黄巢攻占广州，驱杀诸胡后，景教在汉地大约已无信徒。但西域景教继续存在，回鹘西迁后接受了景教，用回鹘文译了一些景教经典（福音书，殉难记等）。伊本·奈迪木988年写成的《书目》，谈到他曾见过从中国返回的景教传教士。

四、摩尼教

【摩尼教传人汉地】 摩尼（216—277年？），波斯人，初信仰犹太化基督教派别洁身派，后持不同意见，去过印度，约242年返回波斯，萨珊王朝沙普尔一世（241—272）准其传播摩尼教。但瓦拉姆一世（273—293）谴责并监禁了摩尼，摩尼死于狱中。摩尼教在摩尼生前已传到波斯东部各省。黑衣大食哈里发麦海迪·哈迪和拉希德（775—809）都镇压摩尼教。10世纪摩尼教徒多逃往呼罗珊。其中心从巴比伦移往撒马尔罕。

据中亚发现的残卷记载，摩尼教于675年传入中国。据汉文《佛祖统记》卷三十九，“延载元年（694），波斯国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教来朝”。此人名叫密乌没斯，拂多诞是摩尼教僧侣的职位，低于慕阇。《二宗经》是摩尼教基本经典。719年

^① 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第57—92页。

(开元七年),吐火罗国支汗那王帝矚献一名懂天文的大慕闍,希望玄宗唤取慕闍,亲问诸教法,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敦煌莫高窟所出《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一卷,开头题目是开元十九年(731)六月八日大德拂多诞奉诏集贤院译。次年玄宗下令,“末摩尼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以其西胡等既是乡法,不须科罪者,”允许侨民信奉,但禁在汉人中传播。^①

【摩尼教与回鹘】^② 762年(唐代宗宝应元年),十月回鹘登里可汗(759—780年在位)助唐破史朝义军,收复洛阳,次年带着睿息等四个摩尼僧回国。起初摩尼僧、听众与胡商遭到回鹘贵族的压迫。登里可汗与摩尼信徒讨论了两天两夜,接受教化,不再信佛改宗摩尼教。由于可汗的支持,回鹘才普遍信奉该教。摩尼教(又称明教)成为国教后,“薰血异俗,化为蔬饭之乡,宰杀邦家,变为劝善之国”,回鹘文化发生了深刻变化。

回鹘对唐有很大影响,他们将摩尼教重新引入唐朝。768年(大历三年);代宗下令回纥信摩尼教者可以建寺,名大云光明寺。771年,回纥又请求在荆(江陵)、扬(扬州)、洪(南昌)、越(绍兴)等州各置大云光明寺一所,其徒白衣白冠。796年,回鹘又遣摩尼8人至长安。799年,因久旱,唐朝廷令摩尼师祈雨。806年,回鹘又遣使同摩尼教僧一起来朝。次年,回鹘使者要求在河南府(洛阳)、太原府置摩尼寺三所。摩尼僧在回鹘中地位很高,可汗常与共议国政,或充使者出使。摩尼僧借回鹘势力,积极传教。大摩尼几年一换,往来本国,小摩尼每年从长安转往江

^① [法]伯希和·沙畹撰,冯承钧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中华书局1958年版。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第329—397页。

^② 《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第34—36页。

南、岭南。外来宗教中，除佛教外，摩尼教流传最广。摩尼参与回纥与唐的重要交往。813年保义可汗请和亲，唐婉言谢绝，为此宰相接见归国摩尼8人，请他们去说服可汗。821年，保义可汗去世，崇德可汗继位，回鹘宰相、摩尼等573人人朝迎公主，唐以太和公主嫁可汗。

840年，回鹘国破。841年，唐通知回鹘，江淮的摩尼寺暂停活动。843年（会昌三年）二月下令，回鹘及摩尼寺庄宅钱全部没收，摩尼寺僧由中书门下条疏奏闻。京城女摩尼72人死。摩尼师配流诸道，死者大半。摩尼教在汉地遭禁。但依附回鹘归唐的摩尼教尚残存了一段时间。842年，归唐的回鹘王子温没斯封怀化郡王，赐名李思忠，其孙李彦图迁居太原，后梁太祖朱温（907—912）赐宅一区，宅边置摩尼院以安置摩尼师。

回鹘西迁后，高昌、于阗、甘州等地摩尼教兴盛，用回鹘文写过一些经，如《二宗经》、《摩尼教徒忏悔词》等。摩尼师仍出使内地。后唐闵帝应顺元年（934）正月，赐回鹘入朝摩尼8人物有差。后周广顺元年（951）二月，回鹘遣使并摩尼贡玉团等。

会昌年间，有呼禄法师将摩尼教传到福建。后梁贞明六年（920），河南陈州（淮阳）有末尼聚众造反，立毋乙为天子，旋被镇压。

五、伊斯兰教^①

穆罕默德（570—632）约于610年在麦加创立并传布伊斯兰教。

^① 陈垣：《回回教入中国史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第542—561页。

马启成：《伊斯兰教在中国》，《略述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明人何乔远的《闽书》卷七《方域志》记载：吗喊叭德（穆罕默德）有大贤四人，唐武德（618—626）中至广州、扬州、泉州传教。清咸丰二年（1852），长沙回教徒蓝煦著《天方正学》，卷七收录《旺各师大人墓志》，说旺各师是穆罕默德母舅，632年（贞观六年）到长安，获准传教，后卒葬广州。皆难确证。

中阿两国正式缔交始于651年（唐永徽二年）。是年八月二十五日，奉奥斯曼哈里发（644—656）之命，前来中国的第一个阿拉伯使者到达长安。会见唐高宗并介绍大食帝国情况和伊斯兰教教义。因此，史学界一般以这一年也作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标志。^①

《苏莱曼游记》讲到康府（广州）有回教牧师一人，教堂一所，但并无中国人信奉回教。此清真寺当即怀圣寺，寺后有光塔，高一百六十余尺。这是可靠的唐代伊斯兰教古迹。

杜环《经行记》说：“其大食法者，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这是我国关于伊斯兰教的最早的可靠记载。

第四节 科学技术的交流

一、天文与数学^①

【天文】 隋代印度天文著作中译本有《婆罗门舍仙人所说天文经》二十一卷，《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三十卷，《婆罗门天文》一卷，《摩登伽经说星图》一卷。均佚。

唐代，印度天文学家在司天监工作的主要有俱摩罗、迦叶、

^① 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二册，第115—123页。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4—187页。

瞿昙三家。《通志》收“西门俱摩罗秘术占”一卷，当系俱摩罗家的人所著。迦叶家有迦叶志忠，曾任右骁骑将军知太史事，中宗景龙（707—709）时，曾上《进桑条歌表》。瞿昙一家最著名。665年，颁行李淳风的《麟德历》，太史令瞿昙罗上《经纬历法》九卷，高宗下诏与《麟德历》相参行。698年，又命瞿昙罗作《光宅历》，但只用了3年。718年，瞿昙悉达受诏译印度《九执历》，又撰《开元占经》一百二十卷（《九执历》即其中一卷）。728年，下诏颁行一行所编制的《大衍历》，为中国历法上的一大进步。瞿昙撰因未参预改历，颇有怨意，733年与陈玄景合奏：“《大衍》写《九执历》，其术未尽”，于是下诏校验，灵台候簿，结果证明《大衍历》是当时最精密的历法。瞿昙谦著有《大唐甲子元辰历》。《九执历》仍有一定参考价值。建中时（780—783），曹士芳作《七曜符天历》，后晋天福（936—943）时，马重绩撰《调元历》，都参考过印度历法。吐火罗国719年曾进解天文大幕阁，罽宾国同年进献天文经一夹。不过总的来说，中国天文学自成体系，印度、中亚天文学在中国作用不大。

中国的天文历法对朝鲜、日本有重大影响。新罗在国学中讲授中国天文历法。674年到唐专攻历学的福德回去后就采用了《麟德历》。

日本大量求取唐代典籍，有天文著作400多卷，各种历法。604年开始采用中国历法，692年开始用《麟德历》（日本称《仪凤历》），764年改用《大衍历》，858年起兼用《五纪律》，823年起改用《宣明历》。

【占星术】 唐代印度占星术著作也有译成中文的。759年，北天竺沙门不空译出《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其弟子杨景风注释。书中说明七曜历的用途是卜取黄道吉日，术语用粟特语，日曜日（密或蜜，Mir）、月曜日（莫Māq），火曜日（云汉，Wn-

qān)，水曜日（暄，Tir），木曜日（温没司，Wrmzt），金曜日（那颡，Naqit），土曜日（鸡缓，Kēwān）。流传甚广。794年，西天竺沙门金俱吒译出《七曜禳灾诀》，提出了以节气为每月之首的阳历系统。《日本续记》天平十八年（746）己亥条记载，僧宗叡从唐带去的书中有梵本《都利聿斯经》一部五卷，都利即吐火罗，这也是一种占星术著作，贞元中（785—804）由璩公译成汉文二卷本。

【数学】 隋代译出的印度数学著作有《婆罗门算法》三卷，《婆罗门阴阳算历》一卷，《婆罗门算经》三卷。但总的来说，印度数学在中国作用不大。相反，印度数学的位值制、土盘算术都似乎受到过中国筹算法的影响。其他如分数、弓形面积、球体积、勾股问题、圆周率、一次同余式、开方法、重差术等方面，中国数学一般比印度数学领先，印度数学有可能在这些方面吸收过中国数学的成就。^①

新罗国学里有“算学博士若助教一人，以缀经、三开、九章、六章教授之。”缀经可能即祖冲之的《缀术》，九章即《九章算术》。

日本也从中国带去《周髀》、《九章》等十部算经及其他算书。大学中有算道，学习《九章》、《海岛》、《六章》、《缀术》、《周髀》等。

二、炼丹术与医药

【炼丹术】^② 中国炼丹术对阿拉伯、波斯有较大影响。波

^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中译本），第323—333页。

^② 参阅（美）约翰生著，黄素封译：《中国炼丹术考》，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斯裔的李珣以卖香药为业，晚年热衷于炼丹。其兄李珣著有《海药本草》。他们对科技文化的传播起了桥梁作用。炼丹所用的一些矿物、金属的汉文与波斯文名称有对应关系：礞（náo）砂（ NH_4Cl ）在波斯文中作nušādir或naušādir，密陀僧（ PbO ）作mirdāsang或murdāsang，输（tōu）石（黄铜）作tutiya，琥珀作Kāhrupōi（古波斯语）和Kāhruba（新波斯语）。中国人把波斯紫磨金作为外国金之首，把珊瑚看作波斯产物。这些资料说明在炼丹术方面中国与波斯——大食之间联系密切。

阿拉伯炼丹术的创始者查比尔追求的长生药“耶黎克色”类似中国炼丹家的丹精或神丹。其他关于水银的知识，关于金、银、铜、铁、铅、锡六种金属皆由硫、汞合成的学说，看来都受到过中国炼丹术的影响。一代名医拉齐（865—925）也是一位炼丹家。据说与中国学者有过接触。他写过12种关于炼丹术的书，其中的《秘典》在12世纪译成拉丁文，成为欧洲化学知识的主要来源。

【医药】 印度医学对中国影响较大。来华的印度高僧多兼通医术。隋代著录的印度医书有：《龙树菩萨药方》四卷，《西域婆罗〔门〕仙人方》三卷，《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婆罗门药方》五卷，《龙树菩萨养性方》一卷。唐代帝王几次向印度寻求长生药。王玄策648年带回印度方士那罗迩娑婆寐，他说婆罗门国有药叫畔茶佉水，“能消草木金铁，人手入则消烂”，可能是一种无机酸。唐太宗请他造延年药，据说服后暴卒。高宗从东印度迎来卢伽逸多，曾派他往印度求长生药材，但高宗听从了那处俊的进谏，不服其药，只加卢伽为怀化大将军。印度眼科比较先进。刘禹锡有《赠眼医婆罗门僧》诗，说“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748年，鉴真在岭南韶州（韶关）曾有胡人为他治眼疾。印度的胡椒、郁金香、天竺桂等药物曾传入中国。

中国医药也影响了印度。义净在印度常用中药为人治疗，深受

欢迎。中国的人参、茯苓、当归等药物传入印度，被称为神州上药。

唐朝知道拂菻（拜占廷）“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667年，拂菻向唐高宗赠送底也伽，这本是一种解毒药，后被欧洲人当成一种万能灵药。但中国人因此药实际疗效不大，并未盲目推崇。^①拂菻的白矾、阿勒勃（山扁豆）、齐墩、阿驛（无花果）、阿勒参、棕祇（水仙）等药物传入了中国。

大食、波斯、中亚的医药也与中国有交流。隋代著录了《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四卷。《千金翼方》等中国医药书中记载过一些波斯、大食药方。罽宾、吐火罗、迦湿弥罗都献过各种名药秘方。740年，康国献过宝香炉和水精眼药瓶子。中亚、西亚的没药、青木香、安息香、苜罗、阿月浑子、无食子、阿魏、巴旦杏、波斯枣、诃黎勒等药物传入了中国。^②大食名医拉齐曾向一位中国学者念希腊名医盖伦的16卷本巨著，让他用草书速记下来。

中国医学对大食医学也有影响。阿维森纳（980—1037）所著《医典》中记载的脉学，关于糖尿病的诊治，麻疹的预后和用水蛭吸毒等，都可能受中国药学影响。中国的大黄、黄连、莪术、无患子、庵摩勒（一种秘制药品）等药物传入了波斯——大食。^③

新罗国学中讲授医学，课程有《本草经》、《甲乙经》、《素问经》、《针经》、《明堂经》、《难经》等中国医学书。新罗的人参、牛黄、茯苓等药材大量输入中国。《新罗法师方》及高句丽医书《老师方》传入隋唐。两国医药方面交流甚多。

日本医学也深受唐朝影响。《大宝律令》中有“疾医令”，

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二分册，第451—454、489—493页。

② 参阅〔美〕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③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66页。

医生必须学习《本草》、《脉经》，针灸医生要学《素问》、《黄帝针经》等。鉴真带去不少医书，并亲尝草药，修改本草，帮助日本医学的发展。

三、技术交流

【纸的外传】 早在4世纪，中国纸已经传到外国。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373？）百济博士王仁献《论语》、《千字文》，这是中国纸经百济传入日本的最早记载。有可靠证据说明，650到651年和其后的707年，中国纸肯定已经输入撒马尔罕了。粟特地区出土的穆格山文书写成于722年以前，其中有17件纸文书。当时中亚粟特人使用羊皮纸或中国纸，阿拉伯人则使用皮革。①

波斯萨珊王朝（226—651）已经知道中国纸，不过中国纸在当时是很稀罕的东西，只供皇帝使用。埃及法雍等地出土过许多古写本，回历3世纪（816—912）的120件文书中，中国纸文书占了20%。伊斯泰赫里约950年写成的《省道志》中讲到波斯湾上的希拉夫港的重要进口货之一是纸张。

印度在7世纪已大量使用中国纸。647年王玄策使印，有迦摩缕波国请老子像及《道德经》，当为纸本。义净在印度时（671—695），已看到印度人把佛像印在绢纸上，随处供奉。

【造纸术传播】 造纸术在七八世纪传往各国。②

① [苏] 克拉契科夫斯基夫妇：《中亚最古的阿拉伯文书》，《克拉契科夫斯基文集》第1卷，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1955年，第182—212页。《唐代文献丛考》万斯年编译，开明书店1947年版。

②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323页说“在3世纪，……中国纸已经出现在伊拉克了。”转引希提：《阿拉伯通史》第414页。查希提书，说：“3世纪初，有些中国纸输入伊拉克。”此处“3世纪”，肯定是指回历3世纪，即公元9世纪，肯定是在751年怛逻斯战役后，造纸术才经中亚逐渐西传，不可能早在公元3世纪即传至伊拉克。

据《日本书纪》记载，推古天皇十八年（610），“高丽王贡上僧昙征、法定。昙征知五经，且能作彩色及纸墨。”中国造纸术通过高丽传到日本。

伊本·哈克尔976年说到：751年怛逻斯战役的唐军被俘者中有些是造纸匠，他们把造纸术传到了撒马尔罕，制造的纸张不仅能供应本地的需要，而且也成了撒马尔罕人的大宗贸易品，因而满足了各国的需要，得以造福于人类。比鲁尼1030年写的《印度志》中也有类似说法。伊斯兰作家衮希得普说：“西有埃及苇纸，东有撒马尔罕纸。”794年，伯尔麦克人法德勒·伊本·叶哈雅任呼罗珊总督，由于他的提议，在巴格达设了造纸厂，据说其中有中国工匠。他的弟弟哲耳法尔任大臣时，下令政府机关一律用纸张取代羊皮纸。后来大马士革设立了规模很大的造纸厂。9世纪末叶造纸术传入尼罗河三角洲。10世纪末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纸张已取代了纸草纸和羊皮纸。阿拉伯人造的纸张和掌握的造纸术后来又传入了欧洲，对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制糖法】^① 中国古代就已知道甘蔗。汉晋时代西方进贡的礼品中有沙饴、石蜜。沙饴当即红糖，石蜜当为甘蔗汁冷凝而成的片糖。隋唐时代，印度、波斯、火寻（花拉子模）、康国、安国、漕国都曾把石蜜进贡给中国，或作为商品出口给中国。

印度摩揭陀国于647年（贞观二十一年）遣使自通于中国，唐太宗遣使到那儿去取熬糖法。使者回来后，太宗就下令扬州送甘蔗来，按照摩揭陀工艺制糖，所得的糖颜色与味道都比西域的糖好得多。摩揭陀制糖法包括红糖与石蜜的生产方法。同时中国

^① 参阅季羨林：《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

李治寰：《从制糖史谈石蜜和冰糖》，《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

内地人民也托人到西域去向胡人打听印度制糖法，敦煌保存的一份残卷上就记录了熬割令（梵文śarkara，即石蜜）的制造法与种甘蔗的方法。

659年，苏敬在《新修本草》中写道：“石蜜用水、牛乳、米粉和煎成块，作饼坚重。西域来者佳，江左亦有，殆胜于蜀”。他的合作者孔志约也说：“石蜜出益州、西域”。8世纪初，孟诜《食疗本草》说：“石蜜自蜀中、波斯来者良，东吴亦有，不及两处者。”四川石蜜质量已不亚于西域。

【建筑】 建筑上中国所受的外来影响主要表现在宗教建筑方面。佛教盛行导致了佛寺的大量出现。佛寺的布局基本上仿照西周以来的宫室布局，只多了一个佛塔建筑。唐代一般将佛塔布置在大殿之前，或大殿之侧，形成殿塔并列的格局。塔源出印度。隋唐曾有许多木塔，今皆不存。只留下了砖石塔。唐代楼阁式佛塔多为四方形，著名的遗迹有西安大慈恩寺的大雁塔、香积寺塔等。慈恩寺是647年太子李治为追念母亲而建，后玄奘入寺译经，652年建塔，以安放带回来的经像，塔初为五层，仿照西域佛塔形式。武则天长安年间（701—704）重修大雁塔，高七层。八角形的塔10世纪才流行起来，遗址有福建泉州开元寺双塔等。唐代密檐式砖塔有西安荐福寺小雁塔等。荐福寺建于684年，义净曾住此寺译经。小雁塔建于707年。大理崇圣寺千寻塔高58米，共16层，与小雁塔相似，1978年，在顶部发现过一批大理国明治四年（1000）的文物。

中国的建筑对日本影响很大。708年元明天皇即位，命以唐长安为模型建筑新都平城京（奈良），以后70余年间即以此城为首都。桓武天皇794年迁入新都平安京（今京都），布局更接近长安。以后直到明治天皇迁都东京之前，天皇一直住在平安京。寺院也仿照唐代式样。如大安寺即仿西明寺。平城京的唐招提寺

是鉴真等照唐代寺院设计的。①

第五节 艺术交流

一、佛教美术

【西域佛教美术】 5世纪中叶犍陀罗艺术从其本土五河流域消失了，但佛教美术继续发展。在印度的典型是阿旃陀石窟，位于奥兰加巴德县西北60英里，有29窟，一群开凿于公元前后，另一群开凿于5—7世纪。保存了为数众多的浮雕与壁画。玄奘曾到过这儿。②

佛教美术在葱岭以西仍继续发展。阿富汗方都基斯坦保存有7—8世纪的壁画。苏联塔吉克的额斤纳达坂发现了7—9世纪的华美的佛教遗物。吉尔吉斯的阿克伯申（碎叶）发现了7—8世纪的僧院，有雕刻与壁画残存。费尔干纳出土过7—8世纪的佛像。③

天山以南、银山以西的主要佛教美术遗址，在古龟兹、焉耆境内。有库车周围的克孜尔、森木塞姆、玛札伯哈、克子喀拉罕、库木土拉等石窟，另外在焉耆七格星明屋也有美术作品。龟兹——焉耆佛教美术的发展，大致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模仿犍陀罗艺术，第二阶段是在吸收犍陀罗艺术的基础上，结合当地文化，反映出龟兹——焉耆特色。第三阶段，接受中原佛教美术的影响。

①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193—194页。

② 吴作人：《印度阿旃陀石窟艺术》，《美术》1955年，第7期。

③ 弗鲁姆金著、黄振华译：《苏联中亚考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1981年，第33，22—23，25—26页。

龟兹——焉耆佛教美术有自己的特点。石窟窟顶作直拱形，似陕、甘窑洞，无藻井，中心柱已不象塔，只作为前后室之间隔，在间隔前后凿成两个佛龕，在后室雕塑佛涅槃像。这种形制称“龟兹式”。龟兹佛画基本属小乘系统。尤多佛本生故事。又有较多的裸体画，是龟兹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①有些画上有龟兹文题记。著名的画师洞中有一幅画师像，另外又有供养人像。这些供养人与画师一样都断发齐项，这是当时龟兹人的特点。

龟兹佛教美术第三阶段受中原的影响。窟形变化较多，有方形、长方形穹庐顶等，有的有了藻井。用笔有了类似粗细相间的莼菜条，有的用色以土红、大绿为主，接近莫高窟用色。库木土拉有十几个窟是汉人开凿的。库木土拉与克孜尔都有汉文题名与题记。回鹘时代又有回鹘文题记，但艺术风格并无大的变化。^②

【中原佛教美术】^③ 正如译经僧东来，隋唐时代也有一些天竺、西域画师东来。历代名画记所举外国画家有僧金刚三藏（师子国人），僧昙摩拙叉（隋时天竺人）。来自康国的康萨陀善画异兽奇禽。唐末竺元标也是印度裔画家。比较突出的是隋时于阗人尉迟拔质那及其子尉迟乙僧。乙僧在长安奉慈寺普贤堂绘有壁画，其中变形三魔女，“身若出壁”，说明运用了凹凸画法，富有立体感。他在慈恩寺塔画千臂千钵文殊亦用了凹凸法。

也有汉人前往印度学画。王玄策有一个随员宋法智是画家，在印度时，“巧穷圣容，图写圣颜。来到京都，道俗竞模。”^④王玄策、玄奘、义净都曾把佛画雕版带回中国。

中原有雄厚的文化基础，印度佛教传入后形成中国佛教，犍

^① 吴焯：《克孜尔石窟壁画裸体问题初探》，《中亚学刊》，第一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6—144页。

^② 阎文儒：《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文物》，1962年，第7—8期。

^③ 参阅滕固：《唐宋绘画史》，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版。

^④ 《法苑珠林》，卷三十八，第22页，引王玄策行传。

陀罗、天竺佛教美术传入后，也形成了中原佛教美术。外来的以色彩浓淡表现立体感的画法与中国传统的以线条为主的画法有机结合，浑然一体，开创了新局面。晕染法也影响到佛画之外的题材。初唐人物画家以阎立本兄弟最有名。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采用了一定程度的晕染法，富于光的感觉。中原佛教美术的代表人物当推吴道子（700—760），他师承张僧繇，主要从事寺院壁画创作，称百代画圣。苏轼说画圣吴道子，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又有人指出他“行笔磊落挥霍，如莼菜条。人物有八面生意活动，方圆平直，高下曲直，折算停分，莫不如意。其傅彩于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缣素”、世称“吴装”。吴道子在京洛寺画仙人像，天衣飞舞，满壁风动，与静态的“曹衣出水”不同，把握了动态，世称“吴带当风”。

凹凸画法也影响及于山水画。唐代山水画有两大派，一派是以李思训为代表的重彩工笔画，以重彩表现山水的立体感。另一派是以王维为代表的水墨山水，充分利用画面空白，也富有立体感。王维之意境实受禅宗之影响，称为禅画，成为宋代文人画之祖。

雕塑方面最著名的是杨惠之。他初与吴道子同师张僧繇学画，后专攻雕塑，“遂为天下第一”，称“塑圣”。在南北寺观作过许多塑像。

中原佛教美术无论绘画还是雕塑，均已达到很高水平，但传世之作不多。吴道子据说作壁画三百余壁，存世的只有一幅“天王送子图”，尚系后人学吴道子风格画的，江苏吴江角直镇保圣寺现存九尊罗汉像，据说体现了杨惠之的塑法，但尚有争议。汉地佛教美术的现存宝库是敦煌、龙门、吐鲁番等地的石窟艺术。

【龙门、敦煌、吐鲁番】 犍陀罗、天竺雕塑艺术传入中国，出现了中国化的特征，如佛、菩萨面容渐似汉人，鼻子较低，服装渐汉化，完全没有裸体雕像。龙门石窟一期为北魏之作，与云冈石窟后期相衔接。二期为北齐。隋之作，有曹衣出水的风格。三期为唐的作品，占总数的60%以上，外来美术与汉地文化融为一体，本尊卢舍那佛似汉人帝王，二菩萨似妃嫔，迦叶、阿难似文臣，金刚、神王似武臣。人物形象以丰满健壮、雍容华贵为美。万佛洞的伎乐裙带飘扬，如吴带当风。

敦煌莫高窟是佛教美术的最大宝库。现存490余窟，彩塑2000多件，壁画4.5万平方米。^①

敦煌塑像是木胎泥塑，外面敷彩。题材较窄，但处于中心地位，壁画为其背景。早期作品亦受犍陀罗艺术影响。隋代塑像改变北魏以来“秀骨清像”的作法，追求雍容厚重的风度，是当时汉人士大夫形象的写照。唐代圆润丰满，比例匀称。五代渐趋文弱纤巧。唐代作品可谓中国佛教雕塑高峰，佛像庄严超然，菩萨秀丽宁静，天王威势逼人，力士刚毅有力，有的迦叶像如睿智的老僧，阿难如潇洒的年轻和尚。唐塑的不可企及，只要与有些窟中清代的平庸彩塑一比较，即可瞭然。

敦煌壁画制作画壁的工艺，使用粉本的方法，重要人物画得大一些。绘画中所用的凹凸画法，以及画面空间全部画满等特点，与印度阿旃陀石窟壁画均相类似。然而这并非敦煌一地的画师机械模仿印度美术的产物。外来艺术是与长安、洛阳为中心，包括敦煌在内的整个汉地艺术融合在一起，形成汉地佛教美术，而敦煌是现存的汉地佛教美术的集中体现。壁画中尚未发现西域画师题名，基本上是汉人画师的作品。包括敦煌在内的许多地方无名

^①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一至四卷，文物出版社，1987年。

画师的劳作是汉地佛教美术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了吴道子这样的名画家，而中原各画家的创作又大大提高了包括敦煌在内的许多地方的佛教美术的水平。隋灭陈后，敦煌壁画受到南朝艺术经长安西传的影响。唐平高昌后，敦煌表现出长安新画风。第220窟（642年）的维摩诘经变人物形象刻划大大超过前代水平，可能是以顾恺之的名作“维摩诘经变”为粉本的。初盛唐332、334、335、103等窟中维摩诘经变中的中国帝王的气派形象不亚于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盛唐323窟遍布全窟的重峦迭嶂有李思训一派的山水意境。晚唐、五代广泛应用焦墨痕中略施微染的“吴装”画法。①

吐鲁番地区有柏孜克里克、胜金口、雅尔湖等石窟，这儿的佛教美术基本上是敦煌艺术的向西延伸。回鹘高昌时期出现了回鹘文题记，但画风无多大变化。②

【朝鲜、日本】 汉地佛教艺术东传朝鲜。新罗寺院中雕塑了许多佛像。首都庆州附近的南山变成了雕刻之山。所有寺塔、佛像、金石，差不多都可以看出六朝遗风与隋唐形制。众生寺和柏粟寺的佛像是唐朝工匠塑造的。8世纪中期，景德王命工匠以沉檀木雕“万佛山”，送给唐代宗。

日本寺庙美术也深受唐朝影响。奈良法隆寺塔基东塑维摩、文殊对谈，北塑释迦涅槃，西塑八国王分舍利，南塑弥勒像，系和铜四年（711）制，与敦煌莫高窟332窟布局相似，都导源于洛阳敬爱寺、相国寺的布局。随鉴真赴日的雕刻师军法力（昆仑国人），曾为唐招提寺金堂塑卢舍那佛。鉴真弟子为鉴真塑的干漆

① 《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史苇湘：《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孙纪元：《谈谈敦煌彩塑的制作》，《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 阎文儒：《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

像为日本国宝。药师寺的吉祥天女画像，正仓院御物之树下美人图，当麻寺之极乐变相曼陀罗等，都类似唐人笔法。

二、其他美术

【波斯美术】 萨珊波斯工艺美术对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金银器式样和纺织品纹样方面。

波斯的八棱带柄杯、高足杯、带柄扁执壶、多瓣椭圆盘等器形都传入了中国。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的文物中，有乐工八棱金杯、舞伎八棱金杯、素面高足银杯、狩猎纹高足银杯，从器形上说是仿波斯的，花纹与图案是唐式的。^①

波斯织锦传入中国，其织法也传入中国，使波斯式的斜纹纬锦在盛唐时期成为中国西部的重要出品。波斯的织锦纹样也被广泛采用。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过联珠猪头纹锦和联珠立鸟纹锦，在库车克孜尔石窟壁画上，苏联布哈拉的瓦拉赫沙遗址壁画上，萨珊波斯银器刻纹上，都有过类似图案。日本东大寺正仓院所藏猎狮子纹锦、碧地狩猎纹锦、四天王锦等，也有波斯锦风格。

【其他外来宗教美术】^② 回鹘西迁高昌（吐鲁番）后，那儿摩尼教美术有发展。1904年11月，普鲁士调查队的勒·柯克在吐鲁番的哈喇和卓搬走了一幅摩尼教壁画，画高六英尺，中心是仪表堂堂，头上有光圈的摩尼像，四周有男女侍僧陪伴。约作于9世纪。信徒衣服几尽为伊朗式，绘画颜色鲜明，类似大食——波斯式的工笔画。部分花纹装饰亦是波斯作风。出土的摩尼教经典，不少有漂亮插画，以金、银、红、绿等绚烂色彩画成。

^① 《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第1期。

^② [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化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3—75页。

高昌回鹘时代也流行景教。普鲁士调查队在高昌发现过一幅壁画断片，描绘基督最后进入耶路撒冷，即圣枝节的情节。容颜、服饰有波斯特征，有写实画法的西方画风格。斯坦因在敦煌获得过绢本着色画片，其上人物的头饰有波斯式翼的王冠上带有十字架，或为基督画像，画法接近一般佛画。

袄教美术在中国无遗迹。据记载，伊吾（哈密）火袄庙中有素书形象无数，“素书”当为“素画”，指彩塑。^①

三、音乐、舞蹈与娱乐

【乐器与乐人】^② 西域伊朗系乐器传入中国的有箜篌、琵琶、箏箏等。

隋唐时代西域乐人继续东来。昭武九姓曹妙达594年在太乐教习清庙歌辞。唐有曹保、曹善才、曹纲祖孙三代，都擅长琵琶。白居易，李绅、元稹等分别有诗歌咏。其后又有曹触新，曹者素，也是曹国人。安叱奴是舞人，618年拜为散骑侍郎。安万善善吹箏箏，李颀有诗记其人。安善新是昭宗（889—903）时的长安舞胡。康昆仑是贞元（785—805）年间长安的“琵琶第一手。”大中（847—859）初有康迺，善弄婆罗门。李白的《上云乐》诗描写过一个姓康的西域乐人。安禄山也善为胡旋舞。元和、长庆（806—824）年间，有米嘉荣，善唱歌，刘禹锡曾为诗记其人。米嘉荣之子米和郎善弹琵琶。又有米禾稼，米万槌善弄婆罗门。五代有伶人米都知。元稹写过《何满子歌》，描写一位天宝

^① 斯坦因在敦煌所获文书中有唐先启元年书写的沙州、伊州地方的地志残卷，讲到伊吾火袄庙中有素书形象的记载。有关“素画”的判断见神田喜一郎《素画考》，载《东洋史研究》第五卷，第三号。

^②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第1—116页。

年间的女歌何满手子。

贞观时，疏勒人裴神符为太常乐工。代宗（762—769）时，有于阗人尉迟青善吹笙箎。尉迟章是太和年间（827—835）乐人善吹笙。龟兹人白明达为隋乐正。

日本仁明朝（834—850）有藤原贞敏来长安，从刘二郎学弹琵琶。

【苏祇婆七调】^① 北周武帝时，有龟兹人名叫苏祇婆，随突厥皇后入中原，善弹琵琶，精于音律，调有七种。隋开皇初，郑译以其七调勘校七声。当时万宝常做了不少实际工作，遂使中国传统的音乐，由传统的五声音阶，兼用了西域的七声音阶。苏祇婆七调源自印度，其梵文对音基本研究清楚，可表解如下：

苏祇婆七调	梵文对音	中乐七声	华音
娑 陁 力	Sadarita	宫 声	平 声
鸡 识	Kaisiki	商 声	长 声
沙 识	Sadji	角 声	质直声
沙 侯 加 滥	Saha-grami	变徵声	应 声
沙 腊	Sadja	徵 声	应和声
般 羯	Pañcama	羽 声	五 声
俟 利 篋	Ursa	变宫声	斛牛声

苏祇婆“就此七调，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调。”唐代演变成四旦二十八调。

^① 向达：《龟兹苏祇婆琵琶七调考原》，《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252—274页。

潘怀素：《从古今字谱论龟兹乐影响下的民族音乐》，《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燕乐】① 隋唐时代，汉族传统音乐之外，广泛吸收西北少数民族与亚洲诸国的音乐，形成了新的乐制。隋开皇（581—）初年，编为七部乐：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大业中复增为九部乐：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唐朝将天竺改为扶南，清乐改称清商，礼毕改称燕乐，另增高昌乐，形成十部乐。此外还有东夷百济，北狄鲜卑、吐谷浑、部落稽，南蛮南诏、骠国等乐。至玄宗时，分乐舞为二部，堂下立奏谓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谓之坐部伎。唐代燕乐乐曲之名，载于崔令钦《教坊记》的，大曲46种，杂曲278种，是揉合各地及过去的舞乐，归入唐宫教坊的一个目录，已经不分华夷的畛域了。这324种乐曲，有不少传入了日本，如《破阵乐》，《团乱旋》、《春莺啭》是遣唐使粟田真人带回去的，《玉树后庭花》、《北庭乐》等也东传日本。

【健舞与软舞】② 西域音乐传入中国大多乐舞不分。唐代乐府中盛行的乐舞，有健舞、软舞、字舞、花舞、马舞。

健舞曲有棱大、阿连、柘枝、剑器、胡旋、胡腾。胡腾舞来自石国（塔什干）。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诗中说：“石国胡儿人见少，蹲舞樽前急如鸟。……跳身转毂宝常鸣，弄脚缤纷锦靴软”。李端《胡腾儿》诗说到：“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扬眉动目踏花毯，红汗交流珠帽偏，……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胡旋舞因其主要动作是急促地旋转而得名。《旧唐

① 常任侠：《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二编，第89—94页。

② 常任侠：《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三编，第152—214页。

书·礼乐志》记载：“胡旋舞舞者立球上，旋转如风”。另有一种柘枝舞也出自石国。白居易《柘枝妓》诗说：“红蜡烛移桃叶起，紫罗衫动柘枝来。带垂钿胯花腰重，帽转金铃雪面回”。柘枝舞的舞姿矫健，节奏明快，变化较多，开始是单人舞，后又发展成双人舞。刘禹锡、张祜、薛能等都写有咏柘枝舞的诗词。胡旋舞出自昭武诸国，开元、天宝时，康、米、史、俱密等国屡献善胡旋女子。杨太真、安禄山都善此舞。元稹《胡旋女》诗说：“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中亚米国的喷赤干遗址出土过胡旋舞女的木雕象。

软舞曲有凉州、绿腰、苏和香、屈柘、团圆旋、甘州等。苏合香源出天竺，据说阿育王病脑，服苏合香而愈。因而作此乐。软舞曲凉州、苏合香、团乱旋、兰陵王等传人了日本。

【百戏、幻术与娱乐】^① 百戏、幻术有许多出自西域。出自天竺者尤多。隋高祖曾根据柳彧的奏文禁杂乐百戏。柳彧指责京邑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隋炀帝不仅予以恢复，而且总进四方散乐杂技，大集东都，每年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表演给各国使团看。唐高祖以隋失德，首禁百戏。但积习难返，未能完全禁绝。贞观廿年（646），有五个婆罗门来京师，善能音乐、杂戏、截舌、抽肠之类。高宗显庆元年（656）又禁胡人为幻戏者。高宗恶其惊俗，敕西域关令不令人中国。睿宗时，婆罗门献乐，“舞人倒行，而以足舞于极铎刀锋，倒植于地。”

唐代盛行泼胡乞寒戏。这种游戏出自波斯。在冬季十一、二月举行，舞者裸体跳足，挥水投泥。流行于两京及外州。因其不

^① 常任侠，《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四编，第215—256页。

雅，玄宗开元元年（713）下诏禁断。

波罗球是唐太宗时从西域传来的，是一种马球，打时分两队，玩者骑在马上，以杖击球，以先入网为胜。这种游戏源出波斯，西传拜占廷，东传中亚，又传入中国、印度，又由中国东传高丽、日本。

双陆源自大食，一说出自天竺，名为波罗塞戏，有盘以象牙、花石为之，或画地为之。黑白各15枚子，两人对奕，先用骰子掷采，再据此行子，先出完者为胜。唐代很风行，也传到了日本、朝鲜、越南等国。

第六章 宋、辽、金、喀拉汗及西辽等 王朝的对外关系

960年，宋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五代时期的结束；但它并没有结束中国疆域内诸多王朝和部族并立的局面。先后与两宋并存的政权和部族，主要包括辽、金、西夏、回鹘，喀喇汗朝、西辽、大理、蒙古。此外，在本时期的吐蕃，出现了很多割据一方的小王和王室。自10世纪中叶直到13世纪中叶蒙古统一全国为止，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国内各王朝和部族各自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独立地与中国周边国家发生着各式各样的关系。

第一节 10至13世纪的中国形势

一、北方的割据局面及其对辽、金、宋诸国的 对外关系的影响

【辽、金对漠北控制的加强】 在北方先后与两宋对峙的，是契丹及女真族建立的辽、金政权。它们所直接统治的领土，既包括了对其补充本族人力和保持本族文化渊源具有大后方基地意义的松漠草地及东北地区，也包括着华北的一部分以至全部，后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对辽、金国家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这是导致辽、金国家与它们之前少数民族政权的极大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契丹族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是“马逐水草，人仰镛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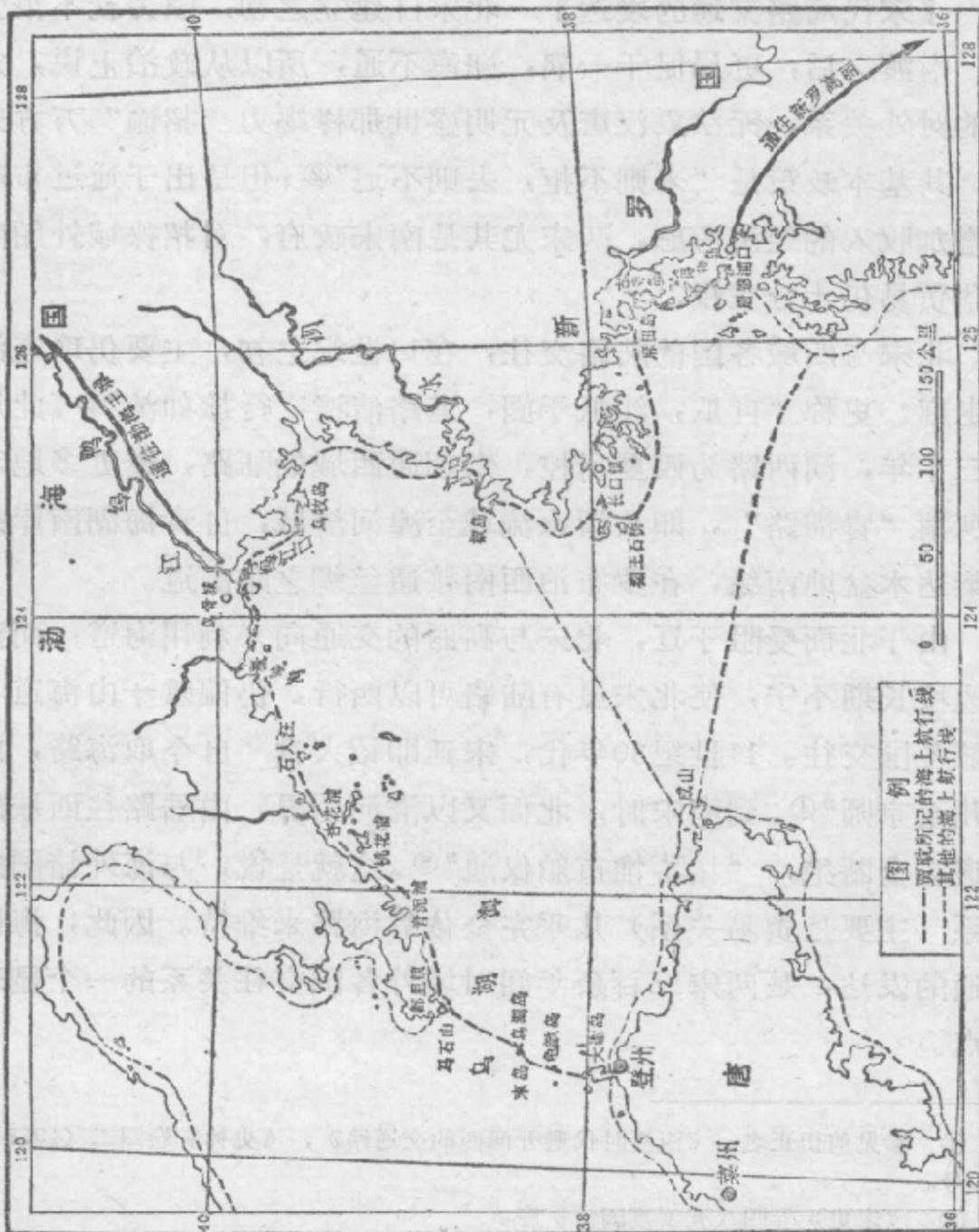
畜牧经济^①。所以，契丹建国后，非常重视，而且也有充分能力去加强对漠北游牧诸部的控制，置西北路招讨司负责治理蒙古高原游牧诸部，同时，它还继承了欧亚草原上的游牧部族之间及其与西域绿洲城邦之间密切交往的传统。金朝虽未正式设置专门的军事——行政机构管理漠北，但仍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辽对漠北的统治权，在其属部中享有很高威望。

辽、金统治下的中国北方边区与华北汉地之间联系的加强，是使本时期草原路在北部中国与其西邻交往关系中的地位与意义有所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10世纪以后，汉地关于漠北草原路亦所知日多，留下的记载比过去更多，更详实了。

【漠北草原路概况】 除以上所述，还有两方面的原因，使10世纪之后草原路的使用，具有若干新的作用。其一是由于西夏的兴起，尤其是11世纪30年代西夏据有河西全境之后，自东部经由河西走廊与西域联系的传统通道受到严重阻塞，于是，位于河西地区南、北两侧的东西交通路的使用，比之以前更加频繁。而其中的北侧通道，就是穿行漠北的草原路。其二是国际方面的原因。10世纪以往，阿拉伯帝国基本上停止了对东部世界的“圣战”，大批穆斯林商人前来东方经商。他们不仅在绿洲的城邦居民中间，而且也象粟特胡商那样，充分利用了草原路，在阿尔泰山东、西麓的草原游牧部落间从事贸易活动。

漠北草原路的大体走向如下：自鄂尔浑河流域向西至阿尔泰山，可在鄂尔齐斯河及乌伦古河上源一带逾岭南下，然后沿天山北麓继续西行；或自阿尔泰山向北，通往唐努山及其迤北。自鄂尔浑河流域西南行，还有一条草原路，逾杭爱山，穿过戈壁、阿尔泰，可直趋巴里坤地区，再取道西行。此外，自鄂尔浑河也可

① 《辽史》卷五九《食货志》上。



南宋對國外海上交通圖

以南下绝漠，至额济纳之地，或溯纳林河而上，取道河西走廊西行；或经由额济纳西去，至哈密，吐鲁番一带。不过此路须经由西夏控制地区，因而很难为其敌国所采用^①。

【宋代海路交通的发达】 北宋自建立之初，国力就不很强盛，南渡之后，更局促于一隅，朔漠不通，所以从政治上说，宋朝的对外关系，无法象汉唐及元明盛世那样竭力“招谕”万方来朝，其基本政策是“来则不拒，去则不追”^②；但是出于通过市舶税增加收入的经济考虑，两宋尤其是南宋政府，对招徕域外舶商来华贸易仍十分重视。

北宋与西域各国的陆路交往，在11世纪之初，主要仍取道河西走廊。史称“自瓜，沙抵于阗，道路清谧，行旅如流”^③。此后二三十年，河西路为西夏所控，宋朝通西域的陆路，遂更多地利用所谓“青海路”，即从渭水流域至湟河流域，自青海湖南岸绕行柴达木盆地南缘，在罗布泊西南接通丝绸之路南道。

由于北面受阻于辽，北宋与高丽的交通向来利用海道；而西北边境长期不宁，使北宋虽有陆路可以西行，仍偏重于由海道与西域各国交往。11世纪30年代，宋廷即诏大食“自今取海路，由广州至京师”^④。到南宋时，北面又以淮河为界，由陆路往西域的通道完全断绝，“诸蕃惟市舶仅通”^⑤。这就是说，与海外诸国的关系（主要是贸易关系）几乎完全依靠海路来维持。因此，海路交通的发达，是两宋三百余年对域外各国交往关系的一个显著特点。

① 参见前田正名：《西夏时代避开河西的交通路》，《史林》卷四二（1958）第1号。

②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序。

③ 《宋史》卷四九〇《于阗传》。

④ 《宋史》卷四九〇《大食传》。

⑤ 《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一史部、地理类之4《诸蕃志》提要。

二、喀喇汗王朝

【回鹘西迁】 9世纪30年代，回鹘汗国统治下的漠北草原，“连年饥疫，羊马死者被地，又大雪为灾”^①。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加剧，可汗屡更，政局不稳。840年，回鹘将军句录莫贺勾结黠戛斯，掩袭回鹘城。回鹘可汗被杀，诸部溃散，大致分为四支外迁；一支南走依附唐朝，三支西走，其中一支在庞特勤的率领下，西奔葛逻禄，这支后人称“葱岭西回鹘”。他们在中亚草原地区创建了喀喇汗王朝。

【喀喇汗王朝的建立】 根据14世纪初贾马尔·卡尔西的《苏拉赫词典补编》保存下来的一些资料记载，喀喇汗王朝的创建者毗伽阙·卡迪尔汗建都于巴拉沙衮（Balasagun今苏联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托克马克附近），先统治了七河地区，以后占领了伊犁河谷、费尔干纳地区和喀什噶尔地区。卡迪尔汗的孙子萨图克博格拉汗首先信奉了伊斯兰教，并在全国推广。他的继位者木萨可汗在960年正式定伊斯兰教为国教，这是历史上操突厥语的民族所建立的第一个穆斯林王朝。在10世纪末和11世纪初，喀喇汗王朝用武力归并了河中地区的萨曼王朝及和田地区的李氏王朝，建成一个大汗国，东至车尔臣河，西近咸海，南以昆仑山和阿姆河为界，北到巴尔喀什湖一带。

【分为东西两王朝】 1041年，这个统一的大汗国分裂成东西两大部，西部喀喇汗王朝以寻思干（撒马尔罕）为首府，基本领地是河中地区；东部喀喇汗王朝统治着忽毡以东地区，首都仍为巴拉沙衮，喀什噶尔是它的陪都、宗教和文化中心。11世纪30

^① 《唐会要》卷九八。

年代末，在呼罗珊兴起的塞尔柱王朝，积极向外扩展。1089年，西部喀喇汗王朝沦为它的附庸，东部喀喇汗王朝也表示归顺。喀喇汗王室得以塞尔柱藩属地位维持其原来的统治。12世纪30年代耶律大石西征，在中亚建立西辽帝国，东部喀喇汗王朝又沦为西辽附庸；1141年，西部喀喇汗王朝也沦为它的附庸。随着西辽王朝的衰亡，东部喀喇汗王朝在1211年亡于内乱，次年，西部喀喇汗朝被花拉子模攻灭。

喀喇汗王朝统治时期（840—1212年），是突厥语各民族历史上文明昌盛的时期。著名的《突厥语词典》和《福乐智慧》都在这一时期写成。喀喇汗王朝的统治者自称“桃花石汗”，戴着“东方与中国之王”或“东方与中国之苏丹”的封号。他们自认是中国的王或苏丹，西亚的国家和哈里发也承认他们的王朝是中国的王朝。喀喇汗王朝同中国领土上的其他几个王朝——辽、宋、西夏都有政治、经济关系，特别同北宋关系密切，往来频繁，称北宋皇帝为“汉家阿舅大官家”^①。

三、西辽帝国

【耶律大石西征】 1124年，金灭辽的前一年，契丹皇族耶律大石率铁骑200，北走可敦城（在今土拉河上游），另建政权，聚积力量，以图恢复辽朝。1130年耶律大石决定向外发展，在东方和南方受到金朝的遏止，于是率军西征。耶律大石从可敦城出发西北行，先进入叶尼塞河上游黠戛斯（吉利吉思）地区，遭到当地人民的袭扰。耶律大石率军继续西进，到达叶密立（今新疆额敏县），修筑城池，作为根据地；从这里假道高昌回鹘王国，沿

^① 《宋史》卷四九〇。

天山南麓西征大食，但1131年在喀什噶尔的边界上，为东部喀喇汗王朝的军队打败，退回叶密立。这时耶律大石在可敦城的留守部队凭借地理条件打退了金军的大规模进攻。1131年耶律大石在新筑的叶密立城正式称帝，根据当地人民的习惯，号称“菊儿汗”，群臣又上尊号“天祐皇帝”，建元“延庆”。这是西征的第一阶段。

【西辽帝国的形成】 耶律大石在叶密立休整之后，首先出兵归并了高昌回鹘王国，把它作为附庸。1134年东部喀喇汗王朝大汗伊卜拉欣困于康里人和葛逻禄人的抄掠，向率领大军驻扎在边境上的耶律大石求救，愿接受他的保护。耶律大石率军进入巴拉沙衮（虎思斡耳朵），“登上那不费他分文的宝座”^①，降封伊卜拉欣为王（ilig），让他统治喀什噶尔与和田地区。耶律大石把巴拉沙衮作为自己的首都，改元“康国”，并派出7万骑兵东征，以期光复旧土，重建大辽。但这支大军“行万余里无得，牛马多死，勒兵而还”^②。从此，耶律大石把兵转向西方。1137年占领了西部喀喇汗王朝的忽毡；1141年在卡特万会战，彻底粉碎了西部喀喇汗王朝苏丹桑扎尔组织的10万穆斯林大军，威震中亚。西部喀喇汗王朝和花拉子模沙都成为西辽王朝的附庸。至此，西辽帝国建成，除直辖领地外，属国有高昌回鹘、东西两喀喇汗王朝和花拉子模，属部有粘拔恩（乃蛮）、康里和葛逻禄，疆域东起扎不罕河，西临威海，南界昆仑山和阿姆河，北越巴尔喀什湖。

13世纪初，亚洲大地的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两支新势力的崛起。东方的成吉思汗、西方的摩诃末都向西辽帝国压过来。

①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何高济译汉译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18页。

② 《辽史》卷三〇。

正当西辽被它从前的附庸花拉子模沙摩河末打得精疲力尽时，被成吉思汗军队打败的乃蛮王子屈出律逃进西辽。他取得了菊儿汗的信任，招募了一支军队。1211年，当菊儿汗出猎时，他用伏兵擒获了这个西辽的末代皇帝，取代了他的统治，西辽王朝灭亡。1217年蒙古大军进入楚河地区，屈出律离开巴拉沙衮南窜，1218年在瓦罕河谷东部达拉兹山谷被追兵杀死。中亚历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蒙古时期。

四、大理和吐蕃与西邻各国的关系概述*

【大理国】 10世纪之初，南诏政权亡于内乱。此后三十余年，白蛮贵族在云南相继建立过三个地方王朝。最后，南诏时期就十分有名的白蛮家族段氏取得政权，创建了大理国。北宋初年，宋太祖曾在舆图上“划大渡河为界”^①，大理国不入宋朝版图。“正朔不加，车书不一”^②，大理国相对独立地维持着与四周邻邦的外交关系。

大理国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仍是南诏时通交趾、驃国及天竺的道路。10世纪下半叶，北宋遣僧人300取道吐蕃往印度求经，又自印度经大理回国。南宋绍兴年间，交趾郡王的嫡子与庶子相争，庶子奔大理国，改变姓名，自称平王。郡王死后，大理国遣返其庶子，后者回国后与嫡子争立，安南州郡一度“尽降智之”^③。

* 关于大理和吐蕃在本时期内与中国境外各邻邦的关系，因文献不足，插入此处，一并叙述，以下不再另拟节目。

① 《宋史》卷三五三《宇文常传》。

② 郭松年：《创建中庆路大成庙碑记》，《新纂云南通志》卷九二，《金石考》12。

③ 《宋会要辑稿》7735页“蕃夷四之四三”智之是一度出奔大理的交趾王庶子之名。

归宋僧人由印度至滇以及交趾王庶子往返大理，走的当即贾耽所记的安南通天竺道。

西南徼外与大理关系最密切的国家是蒲甘王朝统治下的缅甸^①，11世纪中叶，蒲甘王阿奴律陀（Anawrahta）在位时，缅甸实力大张。阿奴律陀为求佛牙，曾率师至大理。段氏闭大理城门不纳。阿奴律陀与大理言和退兵。12世纪上半叶，蒲甘几次遣使大理，另外有两次遣使与大理国使臣同赴宋廷（一次在北宋时，一次在南宋时）。12世纪下半叶，锡兰王进军缅甸南部的白古，大理遣兵助蒲甘王耶罗波帝悉都（Narapatisithu）击退锡兰军队。^②另据明代杨慎《滇载记》，波斯等国亦曾与大理国通使。这里的波斯，指缅甸伊洛瓦底江口的勃生小国而言，不是中亚的波斯。^③

【吐蕃】 7世纪初由松赞干布建立的吐蕃王国，在9世纪前半叶的彝泰赞普时代臻于极盛，此后即急剧衰落下去。842年彝泰赞普的继承者郎达磨遇刺，吐蕃之地被他的两个儿子分割控制，随即又在他们的各支后裔之间进一步分割。吐蕃境内小王林立，内乱不已。直到13世纪中，在萨斯迦派带动下，吐蕃各部先后投附蒙元政权而重归统一，分裂局面方告结束。发生在上述分裂时期的最重大的事件，就是被朗达磨取缔的佛教，这时在吐蕃又重新传播开来。

佛教在吐蕃之地的重新传播，从它的东西边地开始，逐渐向藏地中部即前、后藏推进。东部甘地（Khams，今四川西部及

① 缅甸文献称当时国家为 Paḡan Arimaddanaopura，译言蒲甘之国。“缅甸”之称，始见于13世纪的汉文文献。

② 参见哈威《缅甸史》，姚楠汉译本（上海1957年）第64，87至88页。夏光南，《中印交通史》，中华书局1938年版，第57至62页。

③ 参见费瑛，《南海中之波斯》，冯承钧汉译，文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二编。

西藏昌都地区)是残存佛教势力比较活跃的地区。10世纪,桑耶王从乌思、藏(Dbus-gtsang,即前、后藏)选出10人(一说6人)到甘地学习教法。978年,“乌思藏十人”学成后回到乌思,决定在中部藏地重兴佛教。自是,“从他们中间分化产生出乌思和藏地的无数伽蓝和僧伽”。这件事被视为吐蕃佛教后弘期的开始。^①

西部纳里(Mngah-ris)在教法后弘期中起了更重要的作用。自10世纪后期始,纳里的吐蕃小王们不断延请印度、尼泊尔和孟加拉等地的大德、译师到吐蕃译述经典,弘扬教法,同时也不断将本地人派往这些西邻国家中去求法。这些构成了本时期吐蕃与其西邻交往关系中的最主要的内容。

当时被延请入藏最著名的僧人,是印度班底达大师阿底峡(Atiga)。他于1042年到达纳里,后来还到藏地中部的逻些(拉萨)等处弘法。西去求法的最著名的吐蕃僧人,则是三至迦湿弥罗的大师纳里人仁钦桑波(Rin-chen-bzang-po, 958—1056)。吐蕃(尤其是纳里地区)与其西邻在教法方面的交流,这时十分频繁。西藏史籍写道,“无数的班底达前往吐蕃”,从律藏、般若多罗经和瑜伽经典中,出色地“翻译无数的经文”;“总之应当说,上纳里之地的这些王们对于教法的贡献,乃是其他地区所无法相比的”^②。

以1027年为纪元之初的藏历的产生,也是这时吐蕃与其西邻间佛学交往的一个结果。此种以60年为一轮的藏历的创制,与属于时轮学说(Kālacakra)的经典被译为藏文同时。时轮学说最

^① 稻田正就、佐藤长:《红史》日译本(东京,1964)99页,并参阅佐藤长:《达磨王子孙考》载《西藏中世纪史》(东京,1976)9至42页。

^② 《青史》,列里赫英译本(加尔各答1949—1953)第70至71页。

先发展于高昌地区的苦婆罗国，10世纪下半叶传入中天竺，11世纪20年代经迦湿弥罗而传入吐蕃。^①

第二节 宋朝与亚洲各邻邦的关系

一、与高丽、日本的关系

【高丽】 10世纪30年代，高丽先后逼降新罗，征服百济。朝鲜半岛遂全部纳入高丽国的统治之下。高丽国在数百年中基本上独立地行使着国家主权。不过，其历朝国王，往往还在名义上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

从王建到王治五朝高丽王，先后受唐、后晋、后周以及北宋政权的册封，被授以“玄菟州都督、大义军使（宋太宗时改大顺军使），封高丽国王”的名号。宋与高丽间通使，多以登州为出入海口。自992年起，辽朝开始出兵入侵高丽。高丽欲与宋朝联军抵拒契丹。但这时宋廷已决意放弃收复幽云十六州的计划，因此以“北鄙甫宁，不可轻动干戈，为国生事”为辞，仅“赐诏慰抚”，不肯出兵^②。此后高丽被迫与辽朝时战时和，周旋达二十余年。在此期间，宋对高丽的宗主权很快丧失；997年，王治死，弟王诵即位为高丽国王，即已受辽朝册立。不过宋与高丽的通使关系仍未完全断绝。1020年，高丽抵抗辽朝的斗争完全失败。高丽国王以降表进奉辽廷。次年，高丽即遣使至宋，告以与辽朝修好之事。1031年初，高丽王派遣的一个293人的庞大使团入朝宋

^① 参见劳弗：《六十年一轮的藏历之使用》，载《通报》1913年第569至596页；韩儒林：《中国西北民族纪年杂谈》，载南京大学学报专辑《文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6期（1982年）。

^② 《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

廷。此后，高丽约有40余年与北宋不通使节。^①

宋神宗时，福建沿海官员密奉旨令通过高丽商人与高丽王朝联络。高丽王遂重新遣使通宋。为了避开辽朝耳目，宋廷应高丽之请，将高丽使臣入海口岸由登州改为明州（今宁波）。不久又在明州造两艘大船，号称“神舟”，专用于出使高丽。自此迄于北宋末，高丽虽奉辽朝正朔，但仍与宋通使不绝。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出使高丽的徐竟，曾受高丽政府的隆重接待，归国后，写有《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它是研究中朝关系的重要文献。

南宋初叶，高丽曾对宋廷有通好之意。由于高丽与金朝接壤，南宋朝廷深恐与高丽交往会被金朝利用而不利于国防，所以婉言相拒。自是南宋与高丽遂不复保持邦交关系。不过两国之间的民间交往并没有因而中断。

【日本】自9世纪40和50年代，日本逐渐改变通过遣唐使等方式对中国开展大规模邦交活动的做法，从80年代起更全面推行锁国政策。此后，日本有很长时期不再遣使来华，只是间或有僧人访问中国。《文献通考》说，日本在“大中（847—860）、光启（885—888）、龙德（921—922）、及周广顺中（952）皆尝遣僧至中国。”^②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宋代。

984年，日本僧人裔然与徒弟五人浮海至宋献《日本年代纪》等书。宋太祖召见了裔然。裔然归国时，携御赐《大藏经》等物，并复遣弟子奉表来谢^③。11世纪上半叶，明州官府上奏朝廷，有日本国太宰府遣人贡方物而不持本国表，被宋廷拒绝。11世纪下

^① 此据《宋史·高丽传》。另据《宋会要》7855页“蕃夷”七之三二，此次通贡在熙宁四年（1071年），惟据《宋会要辑稿》引《玉海》，高丽于此（熙宁三年）已有贡使至宋。

^② 《文献通考》卷三二四，《四裔考》一。

^③ 【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254—288页。

半叶，又有日本泛海客商持太宰府牒来宋通贡，由于不合乎贡礼程式，明州官府经朝廷同意后，以本州名义，自行移牒，并将贡品的物价付给这个客商，遣之东归。此后宋与日本一直没有建立正式的邦交关系。

二、与东南亚诸国的交往

【安南】 安南一名虽始于唐代后期改交州总管府为安南总管府之时。但是历五代至宋初，该地区一般仍以交趾或交州名之。宋太祖立国的时候，交趾之地的土豪们互相争夺，丁部领征服十二使君，据有交趾。他先自称“万胜王”，后称帝，国号大瞿越。其子丁琏在位时，闻宋拓境至岭南，平南汉，遂遣使上表内附，受宋制封为交趾郡王。

丁琏死后，弟琰幼，嗣立；大将黎桓专断国政，竟至于将丁琰举族禁锢。宋太宗闻之大怒，遣水陆两路兵侵交趾。宋军为黎桓设计击败，被迫退兵。宋太宗杀领兵诸将，但是也只好接受黎桓的朝贡献纳，封黎桓为交趾郡王。黎氏政权传三世，共三十年，因苛虐枉法，不得人心，被权臣李公蕴推翻。公蕴遣使至宋入贡。宋真宗说：“黎桓不义而得，公蕴尤而效之，甚可恶也”。但最终仍“用桓故事”，以交趾郡王封之。^①李氏政权期间，改国号大瞿越为大越。南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进封交趾郡王李天祚为安南国王。以安南为国名即自此时始。

黎、李二氏统治期间，安南虽与宋通使不绝，但是仍经常侵扰宋朝边地。宋神宗时，王安石以交趾新败于占城，准备进军南征。安南风闻此事，分兵三道先寇宋境。宋军出击，追至富良江

^① 《宋史》卷四八八《交趾传》。

边，因安南请和退师。这一战仅调用民夫就达87万人，可见规模之大。^①

李氏传八世。13世纪20年代，因为没有男嗣，政权为其女婿陈氏所据有。在宋灭亡前，两国间仍始终保持着通使关系。

【占城】 宋朝建国第一年，占城即遣使通贡，所上表章书于贝多叶^②。至10世纪之末，因受交趾黎氏侵逼，将国都南移到佛逝（今越南平定省归仁）。占城希图依靠宋朝调停，抑制安南侵寇其地。但宋朝为西北边患牵制，无力南顾，所以仅只宣谕二国“保国睦邻”“令各守境”而已，并没有采取具体的行动。神宗元丰年间，宋廷因“占城与交趾为仇国”，下令其起居及宴享时听其使臣互相回避。^③

自12世纪上半叶起，占城与真腊之间发生长期战争，双方都使用象阵交战，胜负不决。至70年代，有宋人因浮海失风信飘泊到占城，建议占城军乘马骑射作战。占城航海到宋，买战马数十匹，战大捷。次年再至宋朝买马，宋朝实行马禁，占城所遣人求马不得，大掠宋朝边境而归。在这以后，占城与真腊之战日益激烈，13世纪前期，它完全被真腊政权统治近二十年。所以，直至宋亡，占城与宋的通使交往也就很少了。

占城属国宾童龙（今越南南部平顺省藩朗），10世纪末也曾遣使至宋通好。

【真腊、罗斛】 10至13世纪之初，是真腊历史上一个极其繁盛的时期，都吴哥。在吴哥大寺的建造者、吴哥时期最强大的国王苏利耶跋摩第二（suryavarman II，1113—1150）时代，

① 据越南汉文史籍记载，此战胜方为交趾。

② 《宋会要辑稿》7840页引《玉海》。《宋史》《占城传》将此事载录于次年。

③ 《宋会要辑稿》7857页“蕃夷七之35”。

真腊与宋互通邦交。南宋绍兴年间，真腊曾向宋廷进驯象。13世纪初，真腊属国真里富（在曼谷湾以东尖竹汶一带）也曾向宋朝贡象。

绍兴年间与真腊一同入贡的，还有罗斛使臣。罗斛位于湄南河流域，故地为今泰国华富里一带，是孟族人建立的国家，大约建于10至11世纪。据《宋会要》载：“政和五年（1115年）八月八日，礼部言……已差人前至罗斛、占城国说谕招纳”。是两国间首次交往。后其国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来贡驯象。

【三佛齐】 9世纪下半叶，爪哇山帝（sailendra）王室成员夺得三佛齐的统治权，继七八世纪的室利佛逝之后，在这里第二次建立起一个南海大国。三佛齐国都，先在苏门答腊岛上的巴邻旁（今巨港），大约在11世纪后期迁往末罗瑜（即苏岛）中部詹卑河畔的詹卑城。在11世纪前叶，苏门答腊全岛，马来半岛南部诸小国，甚至印度半岛南端的细兰（锡兰今名斯里兰卡）、注辇都成为三佛齐的属国。据宋代史料，其国王自称“霞迟苏勿吒蒲迷”，即Haji Sumu trabhūmi的音写，译言苏门答腊地之王。^①

宋朝建国第一年，就有三佛齐使臣前来通贡。从此，两国之间一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交往。宋代三佛齐仍是东南亚佛教基地之一。11世纪初，三佛齐新建佛寺祝宋天子寿，宋廷赐“承天万寿”的匾额，并铸钟以赐。不少三佛齐使臣被赐予宋朝的官号。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三佛齐又遣使贡方物。此后，两国的邦交活动，文献缺载。

【阁婆】 阁婆今译爪哇。宋朝建立前不久，爪哇政权统治

^① 见费弼：《苏门答刺岛名之最古记录》，冯承钧汉译，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二编，第105—109页。

的中心地区已从东爪哇迁至中爪哇。^①《诸蕃志》“阁婆国”条说它又名“莆家龙”，即今中爪哇北岸之北加浪岸（Pekalongan），说明中爪哇这座对外贸易中心城市具有重要地位。宋代阁婆国，以北加浪岸为中心，并包括了爪哇岛西部及其东部的部分地区，其势力范围与13世纪初兴起的杜马班朝相仿佛。

淳化三年（992年），阁婆首次遣使通宋。使臣是以往来于宋与南海之间的中国大舶商毛旭为向导来到中国的。南宋初，又封阁婆王为“琳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阁婆国王”。

阁婆有邻国名婆罗门。这个婆罗门国，应在爪哇岛东端苏腊巴亚海峡沿岸、马都拉岛及其邻近地区。婆罗门即brāhmana的音译，此指婆罗门教信徒众多的国家，非指印度。13世纪末兴起的爪哇麻喏巴歇王朝，即以此为其统治中心地区；麻喏巴歇朝正以婆罗门教为国教。1109年，婆罗门国亦遣使通宋。宋廷诏接待礼仪同于交趾。

【勃泥、蒲端】 勃泥国在加里曼丹岛西岸。10世纪70年代，有舶商自宋航阁婆，途中遇风船破，泊于勃泥。勃泥国王即造船令该舶商导引，至宋通贡。勃泥王与宋相约，每年修贡；因恐使船被风吹到占城界，所以要求宋廷谕占城勿留勃泥王船只。

蒲端岛（Butuan）在今菲律宾群岛南端民答那峨岛南岸的海湾中。宋以前，蒲端岛未与中国通使，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遣使至宋，献红鹦鹉等方物。以后又多次派遣使节与宋通好。曾献一名黑肤卷发的马来族“昆仑奴”。宋朝皇帝悯其背井去乡，诏使还国。蒲端使臣特别喜欢宋朝的旗帜、铠甲，还购买各种物品及金银，带回岛国。

【蒲甘】 缅甸政权蒲甘王朝真正的建立者是阿奴律陀

^① 参见兹尔：《东南亚史》上册，1982年北京版，第100—104页。

(1044—1077年在位)。在他手里，蒲甘从一个村落聚居点发展成为几乎据有今缅甸全境的大国的都城。下缅甸得楞族（猛语民族）区域也都被括入蒲甘版图。1106年，蒲甘使臣取道大理，随大理使臣一同到宋朝通好，并向宋廷求佛经。宋廷以接待大食、交趾使臣同等礼仪待之。南宋时蒲甘也与中国有通使关系。

三、与南亚和西亚国家的关系

【注犂】 注犂国在印度半岛东岸即科罗曼德耳海岸地区，兴起于9世纪。1015年，首次遣52人的使团携重礼至宋。据使者说，注犂国王“既闻商船，且曰：‘十年来海无风涛。古老传云，如此则中国有圣人’”^①。所以遣使通好。使团很可能是在舶商导引下来华的。在这前后，注犂不仅据有整个南印度，其势力北面到达孟加拉地区。1025年，注犂出动海军进攻三佛齐，获三佛齐王，并且攻掠了马来半岛的若干城邦小国，在此之后相当一段时间，注犂的势力超过三佛齐而称霸南海。^② 北宋一朝，注犂数次遣使通宋。1077年，注犂使臣入宋，“请用夷礼以申问慕之心。乃奉银盘于殿，跪撒珠于御榻下而退。”^③

【天竺】 宋代亦称印度。北宋之初，后汉时入印度的僧人道圆回到中原，宋太祖即召问所历风俗、山川、道里等。982年，益州僧光远从天竺回国，带来某天竺王表章一通，说“近闻支那国内有大明王，至圣至明，威力自在。……蒙赐金刚吉祥无畏座释迦圣象袈裟一事，已披挂供养。……今以释加舍利附光远上

① 《文献通考》卷三三二，《四裔考·注犂》。

② 霍尔：《东南亚史》上册，汉译本，第92—93页。

③ 《宋会要辑稿》7852页，蕃夷七之25。据马端临记载，这种礼仪为“撒殿”。

进”^①，表文说明光远西游，是同时带有宋廷的外交使命的。993年，有东印度王子至宋通贡。

天竺之法，国王死，太子袭位，其余诸子都出家为僧，而且不准留居于本国。宋太祖时，有天竺王子随中国僧东来，馆于汴京相国寺，宋人争相施财。后因遭妒嫉，离开相国寺他去，不知所往。在宋朝，不时有僧至中国献梵经，佛骨等。

【大食】 这时指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哈里发（宋代译为河黎佛）朝；不过，奉哈里发为教主的诸多穆斯林地方王朝，也往往被冠以大食之名。968年，哈里发朝首次遣使通宋，“自是供奉、商船往来不已”^②。除政府的使臣外，到宋廷贡献方物还有诸多穆斯林地区的商人。1008年，大食舶商向宋廷献玉圭，长一尺二寸，据说已传五世，“长者传云，谨守此，俟中国圣君行封禅礼而驰贡之。”^③这一类贡献自然是直接地出自商业目的。

【层檀】 1071年大食层檀国使臣至宋。据宋代史料记其四至之地，它应当是波斯塞尔柱突厥算端王朝。当时塞尔柱算端已被哈里发授予“众异密之异密”（Amiral-umarā，宋代译作亚美罗亚眉兰）。层檀即算端（Sultan）一名之异译^④。

【“拂菻”】 据宋代史籍，1081年，“拂菻”遣使由陆路东行通宋。十年后（1091），“拂菻”使臣又两至中国。马端临已注意到，宋代的“拂菻”与隋唐时代的拂菻所指可能不一。它们似乎不是指拜占庭朝的东罗马帝国，而应当是指据有其东部疆域即小亚地区的塞尔柱突厥王朝，罗姆算端国。

① 《宋史》卷四九〇《天竺传》。参阅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6册（北京1979年），第349至354页。

② 《宋会要辑稿》7841页蕃夷七之8。

③ 《宋会要辑稿》7848页蕃夷七之17。

④ 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北京1977年），第256—260页。

第三节 辽、金与高丽、日本、波斯、大食的关系

一、辽、金与高丽的关系

【辽与高丽的关系】 王建建立高丽国的前两年，即916年，在中国北方大地上，一个新的政权——契丹国，后改称辽——已经出现。高丽建国后很快向辽朝派出使臣“进贡”。在此同时，契丹势力迅猛向外扩展，926年，灭渤海国，一些渤海人不断进入高丽境内，特别是934年原渤海国世子大光显率众数万投奔，受到欢迎，并赐以王姓。从此辽与高丽绝交，因当时忙于对北宋用兵，未能兴兵问“罪”。辽至圣宗时，国力达到鼎盛状态，积极准备讨伐高丽。993年，辽朝派东京留守萧恒德进兵伐高丽，攻占蓬山郡，高丽请和。辽册封高丽成宗王治为“高丽国王”，“诏取女真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之”^①，又“以萧恒德女许嫁”。看来辽朝的这次军事行动，只是要高丽归附，并不是要灭掉高丽国。从此，高丽对辽朝贡不绝。1010年，高丽西京留守康肇杀死穆宗王诵，未经辽朝同意，“擅立诵从兄询”，辽圣宗率大军40万，前往问罪。高丽集结30万军队迎战，经过多次激战，最后失败。康肇被擒，王询弃城出走，辽军焚开京西还。1013年辽朝派耶律资忠去高丽，索要兴化、通州等六城，高丽拒绝。次年，资忠又出使，被扣押。从此辽朝对高丽连年用兵，虽有小胜，但不能降服。1018年，辽朝派出东平郡王萧排押率10万大兵伐高丽，遭到高丽大将姜邯赞组织的20万军队反击，大败而归。辽朝不

^① 《辽史》卷一三《圣宗本纪四》。

甘心失败，调集军队，组织更大规模的讨伐。1020年高丽显宗王询遣使请和，送还扣押使臣。高丽国王“称藩纳贡”，直至辽亡。

【金与高丽的关系】 1116年，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正式称帝、建国号大金，高丽派使臣来庆贺金军的胜利，“且请保州（今朝鲜新义州）。”金太祖说：“尔自取之。”但高丽并不放心，又派蒲马来“请保州”，金太祖正式诏谕高丽国王：“保州近尔边境，听尔自取。”1126年，金灭辽的第二年，高丽国王王楷遣使奉表称藩，金太宗“优诏答之，仍以保州地赐”^①，确定了两国的宗藩关系，从此，几乎每年高丽都要向金派出使臣“贺正旦”和祝贺皇帝生辰，金朝也常派使臣慰抚高丽，祝贺国王生辰，但对高丽内部事务很少干预。高丽国王新立，通常是通过册封的形式，得到金朝的承认。1175年高丽西京留守赵位宠叛乱，遣使金朝，愿以慈悲岭以西，鸭绿江以东地区归附金朝。金世宗下诏不许，支持高丽国王王皓平叛，稳定了朝鲜半岛的局势，金与高丽的这种比较和谐的关系，一直维持到13世纪初蒙古兴起，金朝衰微。

二、辽朝与日本的关系

辽朝建立不久，925年日本国派使来贡，以后长期没有往来。1091年日本国派郑元、郑心和僧人明范^②等28人到辽朝进贡。次年日本国又遣使进贡。辽朝一直未向日本派使臣回访。

关于金朝与日本政府之间的关系，史无记载。

^① 《金史》卷六〇《交聘表上》。

^② 此据日本古籍《百练抄》，《辽史》作“应范”，可能为避穆宗讳而改。见中华书局点校本《辽史》卷二五校勘记。

三、辽朝与波斯、大食的交往

《辽史》记载，923年（辽太祖天赞二年）波斯国来贡。这个波斯国应是萨曼王朝，为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人所建，当时统治着呼罗珊和河中广大地区。辽朝未派使回访，此后波斯国也未再“来贡”。

924年（天赞三年），大食国派使来辽朝“进贡”。这时大食国在阿拔斯王朝统治下，哈里发为穆克塔迪尔（908—932年在位）。1020年，正当辽朝鼎盛时期，“大食国王遣使为其子册哥请婚，进象及方物”。次年“大食国复遣使请婚”^①。辽圣宗把皇族胡思里的女儿可老封为公主，嫁给了大食哈里发卡迪尔之子册哥。

第四节 喀喇汗王朝与中亚诸王朝的和战

一、与萨曼王朝的关系

【与萨曼王朝的战争】 840年，在喀喇汗王朝创建的这一年，萨曼王朝趁突厥语部族内部王朝更替的时机，越过锡尔河，占领了白水城(Isfijab)。893年萨曼王朝又攻占怛罗斯，在这次战争中喀喇汗王朝有一万名战士被杀，一万五千人被俘，其中包括该城统治者奥古尔恰克的妻子。奥古尔恰克迁往喀什噶尔，继续同萨曼王朝作战，出兵袭扰其边境，喀喇汗王朝接受伊斯兰教以后，同萨曼王朝的关系一度缓和，在同和田李氏王朝的斗争中，还得到了

^① 《辽史》卷七〇《属国表》。

河中地区“圣战者”们的支援。

【归并河中地区^①】 到10世纪末，喀喇汗王朝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国势空前强盛，已不满足对东方“异教”的“圣战”，开始觊觎同教的“天堂”——富饶的河中地区。当时统治这一地区的萨曼王朝，已被宫廷斗争，地方长官叛乱弄得疲惫不堪，人民群众普遍不满。990年喀喇汗王朝博格拉汗哈桑进占白水城，接着又向河中地区进兵。萨曼王努赫二世企图动员全国武装力量抵抗同样信奉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但将军们不支持他，有的甚至同博格拉汗私订条约，出卖河中地区。努赫二世从首都不花拉出走，而博格拉汗长驱直入，被萨曼王朝的将军迎进王宫。但博格拉汗不适于当地气候，迫使他放弃不花拉，博格拉汗在返回巴拉沙衮的途中病死。

努赫二世返回不花拉，下令处死博格拉汗立的傀儡国王阿即斯(努赫二世的弟弟)恢复了统治。但在他死后，因王位争夺，国王、宰相迭更，萨曼朝的政局更加不稳。999年春天，哥疾宁(伽兹尼)统治者马赫穆德趁机占领了萨曼王朝在阿姆河以南的全部领土。于是喀喇汗王朝决心结束萨曼王朝在河中地区的统治，伊利克(意为“王”)纳赛尔于999年10月，率军开进不花拉，把萨曼王朝的末代国王阿卜都尔·马利克及王族其他成员押往乌兹干，萨曼王朝亡。

二、与哥疾宁王朝的和战

【哥疾宁王朝的兴起】 马赫穆德原是萨曼王朝在哥疾宁的总督，但是从他的父亲担任这一职务时就表现出严重的独立倾向。999年，马赫穆德趁机占领呼罗珊。当喀喇汗王朝占领萨曼王朝

^① 河中地区，阿刺伯语意为“河外之地”，包括今苏联乌兹别克、南哈萨克、塔吉克和吉尔吉斯的一部分土地。

的首都不花拉时，他也隆重地登上王位，自称算端^①。报达的哈里发承认了他的政权，并送来了封诰、王冠和荣誉称号。这大大加强了马赫穆德在中亚的政治地位。

【与哥疾宁王朝的战和】 在清除萨曼王朝残余势力时期，喀喇汗王朝同哥疾宁王朝建立了外交关系。马赫穆德向乌兹干派出使团，纳赛尔友好地接见了使团。马赫穆德娶纳赛尔之女为王后，双方承认以阿姆河为界。但是，在喀喇汗王朝镇压了萨曼王朝残余势力，稳定了它在河中地区的统治之后，情况即发生变化。1006年伊利克纳赛尔趁马赫穆德又去印度进行“圣战”的时机，分兵两路进入哥疾宁王朝的领地。进攻你沙不耳和巴里黑。马赫穆德闻讯赶紧回兵抵挡。几经战斗后，伊利克纳赛尔被迫退回阿姆河以北。但伊利克纳赛尔不甘失败，组织了更大规模的进攻。1008年1月4日双方在巴里黑附近沙尔希桥会战，马赫穆德投入500头大象，喀喇汗王朝军队不善于同它们战斗，结果惨败，大批战士逃渡时又淹死在阿姆河中。从此，喀喇汗王朝停止了向呼罗珊方面的扩展。以后喀喇汗王朝内部发生矛盾，1025年，马赫穆德趁机率军队渡过阿姆河进军河中地区，喀喇汗王朝的首领卡迪尔汗玉素甫从汗国东部率军进入河中地区。他们决定用武力从阿里特勒手中夺取河中地区，把它交给卡迪尔汗的次子亚干特勒。为了维系这种同盟，双方决定结为姻亲，他们的儿子互娶对方公主。然而，这些决定并未执行，因为算端马赫穆德不愿看到卡迪尔汗成为统一的喀喇汗国的大汗。他只帮助卡迪尔汗战胜了托干汗，取得在巴拉沙衮的统治，而阿姆河以北的一部分地区，包括忒耳迷，也正式并入哥疾宁王朝的版图。

马斯乌德取代弟弟登上哥疾宁的王位后，于1031年向喀喇汗

^① 算端(Sultan)，阿刺伯语“国王”之意。一译苏丹，原指道德或宗教权威人士；后指政治权力，成为穆斯林统治者的称号。

王朝派出使团,通知马斯乌德即位和他对友谊的保证,并为他和他的儿子求婚。1034年马斯乌德的未婚妻沙可敦到达哥疾宁,受到特别隆重的欢迎。而卡迪尔汗的继位者阿尔斯兰苏来曼,也想借用哥疾宁王朝的势力从阿里特勒手中夺取河中地区,但始终未能得手。

三、与塞尔柱王朝的关系

【与塞尔柱王朝争夺河中】 11世纪30年代塞尔柱人进入呼罗珊,从1035年起同哥疾宁王朝展开斗争,节节胜利。1040年,哥疾宁王朝在丹德干附近会战中打败,彻底结束了它在呼罗珊的统治。从此,塞尔柱人东征西讨,建成一个强大的塞尔柱帝国。富庶的河中地区,当然也成为塞尔柱王朝并吞的对象。1064年,塞尔柱王朝占领了阿姆河以北原属哥疾宁王朝的土地。1072年秋天,塞尔柱算端阿尔普阿尔斯兰率领20万大军进攻河中地区,但是因阿尔普阿尔斯兰遇刺身亡而中止。西部喀喇汗王朝纳赛尔汗趁机收复了忒耳迷,并渡过阿姆河占领巴里黑,索取大批赎城财物后,返回河中地区。

【沦为塞尔柱王朝的附庸】 1089年,西部喀喇汗王朝同宗教首领发生矛盾,后者向塞尔柱算端马利克沙呼吁出兵解救“受难者”。马利克沙率大军进入河中地区,占领撒马尔罕,俘虏了喀喇汗的可汗阿赫马德,并继续东进,一直打到乌兹干。马利克沙召东部喀喇汗王朝哈桑汗来会,哈桑汗表示归顺塞尔柱王朝,用马利克沙的名义冲制钱币,并在集体祈祷时向他提名祝祷(虎图拜)。马利克沙在撒马尔罕留下自己的总督后,班师返回呼罗珊,但当马利克沙离开河中后,这里马上发生骚乱,于是他第二次率军进入河中地区。在把骚乱平定后,他考虑到喀喇汗王朝在当地人民中的威望,

恢复了阿赫马德的汗位，作为塞尔柱王朝的藩臣统治这一地区。从此，西部喀喇汗王朝的大汗的废立，完全控制在塞尔柱王朝之手。

四、与花拉子模的关系

【与马蒙王朝的关系】 喀喇汗王朝在自己存在的二百多年间先后与花拉子模的两个王朝有过关系^①。955年，马蒙王朝取代阿弗利吉王朝在花拉子模的统治，名义上奉萨曼王朝为宗主。999年，随着萨曼王朝为喀喇汗王朝所取代，花拉子模也归属喀喇汗王朝。1066年，喀喇汗王朝伊利克纳赛尔派兵攻占哥疾宁王朝的你沙不耳时，花拉子模沙阿里也率兵参加，后来，他们受到哥疾宁王朝军队的有力反击。哥疾宁打退喀喇汗王朝的进犯后，于1014年对花拉子模提出领土要求，1017年出兵灭掉马蒙王朝，派出总督直接管理这一地区。

【与花拉子模突厥王朝的关系】 1041年，塞尔柱王朝取代哥疾宁王朝在花拉子模的统治，仍派总督管理。1077年，塞尔柱王朝任命阿努失特勤为花拉子模总督，他的子孙世袭这一职务，并戴有“沙”^②的称号。阿即思统治时期，花拉子模有很强的独立性，仅在名义上是塞尔柱王朝的藩属。伊斯兰历534年(1139—40年)，花拉子模军队曾一度进入河中地区，攻破不花拉，杀死喀喇汗王朝在该城的总督。1141年，花拉子模成为西辽的附庸，仍对河中地区抱有野心。1158年，西部喀喇汗王朝大汗杀死了葛罗禄的大首领比古汗，比古汗的儿子们和一些葛罗禄人逃往花拉子模。花拉子模

^① 鲍斯涅德，《伊斯兰诸王朝》(爱丁堡，1980年)第107—109页。

^② “沙”，意“国王”，波斯、阿富汗、中亚和南亚有些国家的统治者使用过这一称号。

沙支持这些外逃者，鼓动和配合他们出兵河中。西部喀喇汗王朝一方面组织部民撤退，一方面向西辽王朝求救。西辽王朝命令东部喀喇汗王朝伊利克阿赫马德率一万骑兵支援。双方隔粟特河(泽拉夫珊河)对垒，经宗教界人士调停，订立和约；喀喇汗王朝恢复葛罗禄军官们的职务，花拉子模撤军。

【花拉子模归并西部喀喇汗国】 1206年，不花拉人民起义，占领该城。花拉子模沙摩诃末乘机率领大军进入河中地区，残酷镇压了这次起义，并同西部喀喇汗王朝大汗奥斯曼结成“同盟”，共同反对西辽王朝。但他们的联军很快被西辽王朝打败，摩诃末逃回花拉子模，奥斯曼又转到西辽王朝方面，并向菊儿汗的女儿求婚，遭拒绝，再次转向花拉子模。1210年摩诃末在奥斯曼隆重欢迎下率军进入撒马尔罕。奥斯曼表示愿意奉摩诃末为宗主，以他的名义虎图拜，并娶了摩诃末的女儿汗苏丹。奥斯曼因不满于花拉子模总督的有力控制之下，他把这种不满发泄在花拉子模公主身上，以示反抗。1211年，撒马尔罕爆发了反对新压迫者的起义，摩诃末立即组织军队围攻撒马尔罕。奥斯曼无力抵抗，开城投降。摩诃末根据女儿的要求，把奥斯曼处死，西部喀喇汗王朝灭亡。

第五节 西辽王朝与中亚诸王朝的关系

一、与塞尔柱王朝会战，归并河中

【向西扩展，占领忽毡】 1137年，西辽王朝又开始第二阶段的对外扩张。它首先进入费尔干地区，然后西进至忽毡(今译和毡)。在这里，西辽军队击败喀喇汗王朝军队的抵抗，马赫穆德汗逃回撒马尔罕。马赫穆德汗向自己的宗主塞尔柱算端桑扎尔派出使臣求救。但是西辽军队并没有乘胜前进，而是停下来巩固新占领

的地区统治，等待更好的战机。

【与塞尔柱王朝会战】 1141年，西部喀喇汗王朝与葛罗禄军事首领又发生冲突。马赫穆德汗向桑扎尔求援，葛罗禄人也向耶律大石求援。桑扎尔集中了10万多骑兵，其中包括呼罗珊、西吉斯坦、哥疾宁、马赞兰德(朮拶答而)、古儿等地区 and 属国的军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河中地区。耶律大石写信给桑扎尔，为葛罗禄人说情，请他原谅他们。桑扎尔不但不接受说情，反而写信要耶律大石接受伊斯兰教，否则就要军事解决，并极力炫耀自己的武力。1141年9月9日，两军在撒马尔罕北的卡特万草原交战，结果桑扎尔的军队惨败，死亡三万人^①，连桑扎尔的妻子也被俘，桑扎尔带着马赫穆德汗仓皇逃奔忒耳迷，渡河回到呼罗珊。从此塞尔柱王朝的势力退出河中地区。耶律大石领兵进入撒马尔罕。他同对待东部喀喇汗王朝一样，让西部喀喇汗王朝作为附庸继续统治这一地区。封马赫穆德的弟弟伊卜拉欣为桃花石汗，并留下一名沙黑纳(Shahan, 监临官)，监督其统治。

二、与古儿王朝的战争

【古儿王朝的对外扩展，西辽与古儿的战争】 10和11世纪之交，在古儿(今阿富汗中部地区)的一个伊朗语部族建立古儿王朝。随着塞尔柱王朝的衰微，古儿王朝向外扩展，进入呼罗珊。同时西辽王朝趁机越过阿姆河，于1165年占领巴里黑及其周围地区，与古儿王朝对峙。1196年，花拉子模沙特克什对西亚展开战争，打败哈里发的军队，要哈里发以他的名义虎图拜。哈里发向古儿王朝派出使臣，要他们出兵花拉子模，逼使特克什撤军。特克什从报达

^① 关于卡特万会战桑扎尔军队死亡人数，史籍记载不一，此用巴尔托尔德的说法，见《巴尔托尔德文集》第一卷，第389页。

附近撤军，并向自己的宗主西辽菊儿汗求援。菊儿汗派塔阳古率领军队在这年春末渡过阿姆河，进攻古儿王朝的军队，结果惨败，死12000人，失去了阿姆河以南地区。

【支持花拉子模，战败古儿王朝】 摩诃末继位成为花拉子模沙后，继续同古儿王朝争夺呼罗珊。1204年古儿军队打进花拉子模，摩诃末下令决堤淹没道路，阻止古儿军队前进，同时向西辽王朝派出使臣求救。西辽王朝派军队渡过阿姆河，古儿王朝军队从花拉子模撤军。两军在俺都淮沙漠附近相遇，古儿军队大败，国王什哈布丁逃进沙漠，被西辽军队团团围困，被迫接受和约。从此花拉子模在呼罗珊占了上风。花拉子模沙向整个呼罗珊进军，不久他攻占了被古儿王朝控制的巴里黑，强渡阿姆河，夺下忒耳迷。他为麻痹和讨好菊儿汗，又把忒耳迷转交给西辽王朝。

三、与花拉子模的关系

【降服花拉子模】 1141年卡特万会战后，耶律大石派大将额儿布思进攻花拉子模。额尔布思大肆屠杀平民，洗劫村庄，迫使花拉子模沙阿即思投降。花拉子模每年向西辽王朝交纳3万金狄那尔及其他贡品，作为西辽王朝的附庸国。

花拉子模沙伊勒阿儿斯兰统治时期，多次干预西部喀喇汗王朝的内部事务。1170年，西辽王朝讨伐花拉子模，花拉子模军队被击溃。不久，伊勒阿儿斯兰去世，花拉子模王室为争夺沙位发生内争。长子特克什投奔西辽，“许下所有花拉子模的金银财宝”，并保证“每年入贡”。西辽王朝派一支军队护送特克什回到花拉子模，登上“沙的宝座”^①。但是西辽王朝经常派使臣到花拉子模，征索不

^① 《世界征服者史》上，何高济汉译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1页。

已，作威作福，这使特克什不能容忍。特克什处死了一个出使的契丹贵人。因此双方关系恶化。西辽王朝想在花拉子模培植一个驯从的附庸王朝，便利用特克什的弟弟算端沙来投并派驸马率一支大军护送他回国。西辽军进入花拉子模境内，特克什决堤放水，道路淹没，西辽军队不能前进。驸马又见花拉子模百姓并不拥护算端沙，便决定撤军。特克什尽管同西辽王朝关系紧张，但表面上仍是菊儿汗的藩臣，所以花拉子模在同古儿王朝的斗争中，一直得到西辽军队的支援。

【花拉子模独立，怛逻斯河会战】 摩诃末继位后，花拉子模势力进一步加强，越来越不甘心于附庸地位。他有两三年没有给西辽王朝进贡。同时从1206年起花拉子模多次进入河中地区，归并了西辽的附庸西部喀喇汗王朝。1210年，摩诃末下令把西辽王朝的催贡使投入河中淹死，正式宣布独立，同西部喀喇汗王朝一起进军怛逻斯。摩诃末与乃蛮屈出律商定共同消灭西辽，瓜分其领土，再次出兵西辽，但遭失败。1211年，屈出律乘菊儿汗外出狩猎，用伏兵擒获，取代西辽王朝的统治。摩诃末率军前来分享果实，遭屈出律反击。于是摩诃末下令把察赤、可伞、白水城、麻耳亦囊等城的居民内迁，并把这些城市毁掉，开始了中亚城市文明遭受摧残的时代。

第七章 元代对外关系的高度发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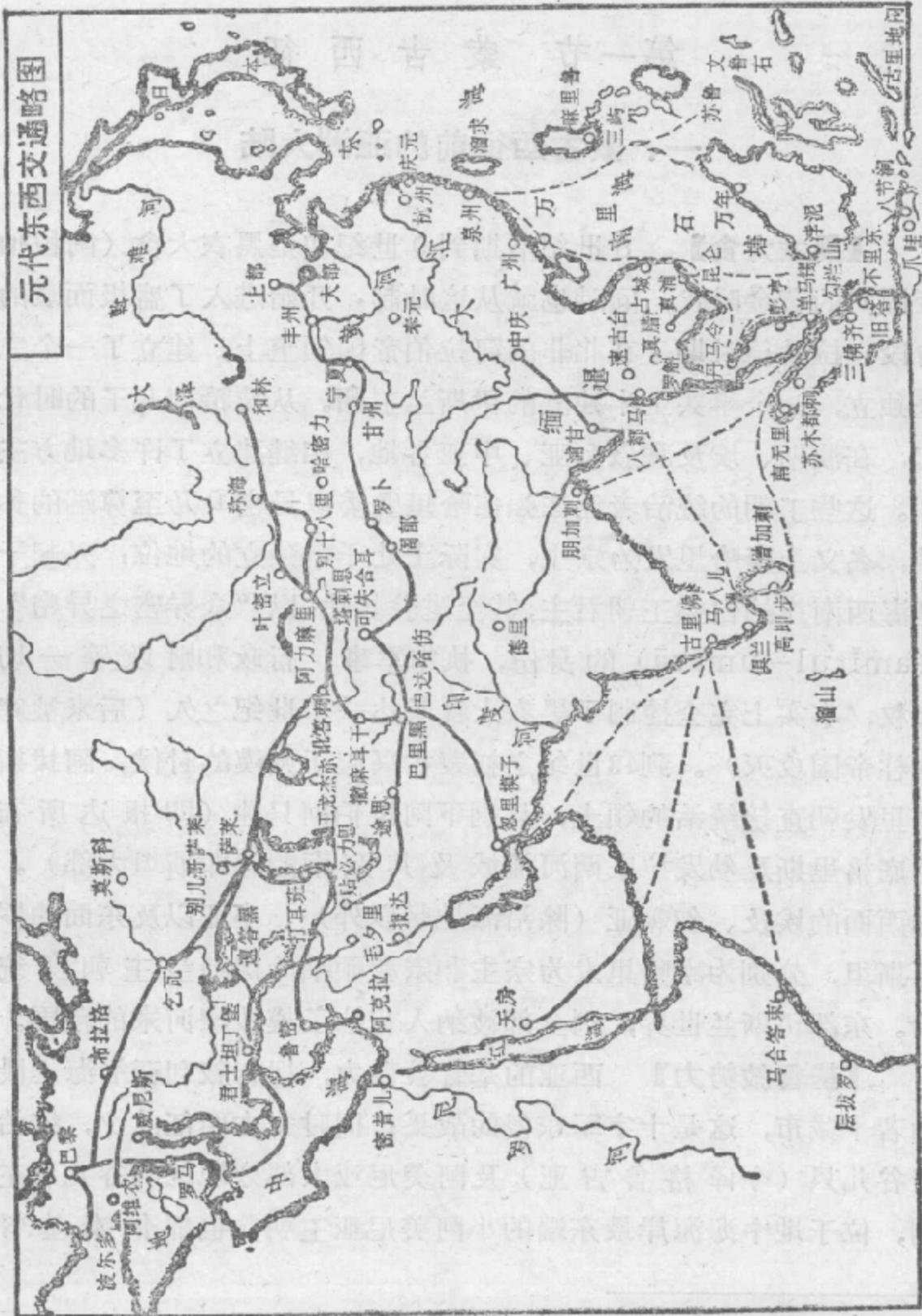
1206年，成吉思汗在漠北创建大蒙古国(Yeke Mongghol-ulus)。经过60年的征讨经营，到他的孙子忽必烈时，终于吞灭南宋，统一了全部中国版图。忽必烈汗之前，共有四汗在位，习惯上称为前四汗时期或蒙古国时期，当时的立国重心还在漠北草原；从忽必烈汗起，或称元朝时期，统治重心移至漠南的农业地区。

前四汗时期，蒙古国对中亚、西亚和东欧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征服和军事统治，到忽必烈朝时，这些地区已先后成为蒙古宗王的领地，而元王朝由于控制着漠北“祖宗之地”，因而得以始终保持中央兀鲁思(qolulus)①亦即宗主的地位。在这样的宗藩关系下，元与波斯伊利汗国和以南俄草原为中心地区的钦察汗国之间，维持着相当长期的和平交往。另一方面，为“招谕”东亚和东南亚各国，13世纪上半叶，元朝在这个地区却多次用兵。到13世纪末忽必烈去世后，才逐步罢征。

元朝对外关系的高度发达，表现为如下特征。一、由于获得了空前的统一，古代中国的对外关系在元朝形成了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的辐射状体系；二、古代中国与欧洲直接交往的范围，在元代有了明显的扩大；三、由于有特殊的宗藩关系，中国与波斯和欧亚草原之间的往来，比过去大大加强了；四、中亚和西亚各族人口，在元代广泛移居中央王朝首都及个别城市以外的各个地区，这种现象过去还不曾出现过，它是促使中外各族文化在元时期交相辉映的一个重要因素。

① 兀鲁思为蒙古语，意为“人众”、“国家”。元朝的各大封国也称兀鲁思。

元代东西交通略图



第一节 蒙古西征

一、蒙古西征前的亚洲大陆

【黑衣大食】 8世纪后期到9世纪初是黑衣大食（阿拉伯帝国）的黄金时代，同时也就从这时起，开始进入了盛极而衰的阶段。拉希德时期，在北非的阿拉伯帝国领土上，建立了一个完全独立，一个事实上半独立的伊斯兰王朝。从拉希德儿子的时代起，在波斯、埃及和叙利亚、中亚各地，相继建立了许多地方王朝。这些王朝的统治者往往强使哈里发委以异密^①乃至算端的称号，名义上奉哈里发为宗主，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的地位；兴起于里海西南岸的白益王朝君主，甚至进驻报达，以“众异密之异密”（amirul—umarā）的身份，执掌军事、行政和财政等一切大权，事实上完全控制了黑衣大食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后来被塞尔柱帝国攻灭）。到13世纪之初蒙古兴起于朔漠的时候，阿拔斯哈里发朝直接统治的领土，只剩下阿拉伯阿只迷（即报达所在的底格里斯及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及其东南的忽即斯坦大部）。它西面的埃及、叙利亚（除沿海地带以外）、小亚以及东面的罗耳斯坦，分别为奉哈里发为宗主和宗教领袖的伊斯兰王朝所统治。东部伊斯兰世界，则全部被纳入花拉子模沙摩诃末的范围。

【基督教势力】 西亚的基督教势力，据有叙利亚沿海地段的若干城市，这是十字军东侵的战果；同时蒙古西征前夕，统治着谷儿只（今译格鲁吉亚）及阿美尼亚大部分地区的谷儿只王朝，位于地中海海岸最东端的小阿美尼亚王朝，也都信奉基督

^① 异密是指“作了各地区长官（哈乞木）者”。

教。

【印度】 12世纪80年代，哥疾宁王朝对印度的统治完全结束。这就使古儿朝在印度方面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前者的势力在此之前已经从西北方向伸入这个国家。到13世纪之初，古儿王朝相继征服北印度的相当部分地区，分别将申河（印度河）中游至旁遮普、德里、孟加拉等地交给出身于古儿王室突厥族奴隶的大将管领。1211年，古儿朝任命的德里统治者去世，统治权力遂为其女婿所夺。正是在后者手中，使伊斯兰势力对北印度的控制取得了一种确定的形式；同时，也使德里政权完全割断了与取代古儿王朝的花拉子模的臣属关系，从而在北印度建立了一个直接受哈里发册封的独立的伊斯兰王朝，即德里算端王朝。

【康里及其西邻】 咸海、里海以北的草原地区，西至内陆欧、亚界河乌拉尔河，是突厥语族的康里部游牧之地。在东面，该部游牧部众一直散布到碎叶河（楚河）以北的草原上。蒙古兴起之时，康里部与花拉子模之间联系很密切，后者的军队中有五至六万康里士兵。

康里以西，从乌拉尔河西至德涅伯河的南俄草原，为另一突厥语民族即钦察人的游牧部族国家所据。钦察部从10世纪中叶前后据有其地，从这时起即以波洛维赤（половеч）之名散见于俄罗斯史料中。12世纪后期，钦察军队已经从伊斯兰世界学会了使用投射火炮。钦察人主要信仰伊斯兰教。

【花拉子模】 12至13世纪之际，伊斯兰世界里势力最为强盛的政权就是花拉子模。1200年，摩诃末继位为花拉子模沙，在前人已取得伊拉克阿只迷和西部呼罗珊的基础上，又征服巴里黑和也里，遂将全部呼罗珊并入花拉子模版图。此后十余年间，他又相继兼并河中，古儿王朝、哥疾宁王朝及西亚部分地区。这时候，花拉子模国土西临波斯湾，东抵锡尔河右岸，河中撒马尔罕

也成为它的新国都。

正当摩诃末陶醉于本王朝日丽中天的声势之时，传来了蒙古攻占金朝首都中都（今北京，事在1215年）的消息，摩诃末为打探蒙古实力，派遣了一个使团谨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友好地接待了这个使团，遣使回访花拉子模，并且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商队去花拉子模贸易。1218年，商队在花拉子模的边境城市讹答拉，被守军截留，随即根据摩诃末的命令，商人被杀，货物被没收。成吉思汗获悉这个消息，再次派出使臣至花拉子模交涉。结果为首的使臣被摩诃末处死，其余二人被剃去胡须后遣回蒙古。

漠北高原的游牧部落，原有在武功强盛时向西扩张、势力衰微时举部西徙的传统。摩诃末的狂妄举动更加刺激起成吉思汗西进的意图。从此，蒙古向西进行征服的活动，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其间总共有三次规模很大的西征，即成吉思汗西征，拔都西征和旭烈兀西征。

二、成吉思汗西征

【征服河中】 与花拉子模残杀蒙古商队和使臣同年，篡夺西辽政权的乃蛮王子屈出律被成吉思汗进征的军队击杀。西辽被置于蒙古统治之下。西攻花拉子模的道路遂完全打通。

1219年春，成吉思汗在漠北举行忽里台（qoriltai）^①，商定西征大计。除留在漠南继续经略中原地区的一部分军队以外，蒙古主力及各归附地区的军队共十余万，在成吉思汗亲自统率下西进。

这年夏天，成吉思汗屯兵也儿的石河（额尔齐斯河）。入秋

^① 忽里台，蒙古语“聚会”之意。是蒙古高级贵族决定汗位继承、征伐、领地分配等国家大事的大会。

即移师西指，抵达讹答拉城。成吉思汗留二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围攻该城，遣长子术赤往北扫荡锡尔河下游，又遣别部溯锡尔河南进，他自己与幼子拖雷率领主力径渡锡尔河，西逼不花拉城。

花拉子模的军队，当时约有40万之众。可是摩诃末采取分兵守城的战略；他自己则退至阿姆河以南布防，以便不利时能随时向西或向南逃窜。这种做法不但使蒙古兵力在任何一个作战地区都不至于处于悬殊太大的劣势，而且摩诃末临战之际离开新都西撤，致使花拉子模军心动摇，丧失斗志。

1220年春，成吉思汗大军兵临不花拉（布哈拉）。不花拉城不战即降。成吉思汗驱其居民出城，纵兵劫掠后，放火烧城，除砖石结构的伊斯兰大寺院和若干宫殿外，不花拉全城被夷为平地。蒙古军进围撒马尔罕。察合台和窝阔台在攻克讹答拉后，率军至撒马尔罕城下与成吉思汗会合。在这里，成吉思汗获悉摩诃末移驻阿姆河南，即派大将哲别和速不台率领精锐渡河追击。摩诃末增派到撒马尔罕的援军不敢与蒙古军遭遇，所以，根本没有实施增援计划。被围不出五日，撒马尔罕守军及城民就决定向蒙古款服。城内3万康里降卒被悉数屠杀。是年秋，成吉思汗命令察合台和窝阔台分军北上，以攻取花拉子模旧都玉龙杰赤，并命令术赤一军从锡尔河下游移师与察合台、窝阔台会合。他自己与拖雷分兵，越过阿姆河，往攻呼罗珊地区。

【进兵呼罗珊和哥疾宁】 1221年春，拖雷进围呼罗珊西部的马鲁（今译谋夫）。马鲁守军稍事抵抗后即向拖雷纳款输诚。拖雷先接受他们投降，接着将全城兵民驱赶出城，除400名工匠外，共有17万市民遭到屠戮。毁灭这座城市的暴行持续了15天，马鲁全城被夷平，蒙古军从这里西趋你沙不耳。攻克该城后，拖雷再次下令进行戮城。你沙不耳区内的许多城市也受到拖雷军队

的肆意蹂躏。

成吉思汗本人在阿姆河北岸驻冬，1221年开春后始渡河进攻巴里黑，城降；遂于春末移攻塔里寒（在今阿富汗木儿加布河上游之北）。他在这里遇到强硬的抵抗，只好召拖雷回师助攻。拖雷在回师东进途中，又攻克也里（今译赫拉特）及也里地区诸城。是年秋，蒙古军克塔里寒，由此南下哥疾宁，追击转战到该地区的花拉子模王子札兰丁。札兰丁闻讯，退至申河流域。成吉思汗轻取哥疾宁城，追札兰丁至申河（今印度河）。札兰丁泅河入印度。1222年初，成吉思汗遣军入印度搜寻札兰丁，未果，遂于同年夏退出印度。

【哲别远征】 奉命追踪摩诃末的大将哲别，1220年春率军渡阿姆河西趋。他们遵从成吉思汗的训令，沿途不事攻坚，惟以尾随摩诃末为务。蒙古军由东向西穿越呼罗珊，追摩诃末至里海南岸，又南折进入伊拉克阿只迷境，复至里海之南。摩诃末走投无路，躲到靠近里海南岸的一个岛上，在1220年底前后病死该岛。次年春夏之际，花拉子模旧都玉龙杰赤经过长期固守，终于被窝阔台和察合台合军攻陷。花拉子模王朝复亡在即。以后纵有札兰丁发起的短暂的复国运动，终究未能挽回败局。

摩诃末遁入里海之后，哲别军队继续反复抄掠伊拉克阿只迷北部及里海西南岸诸地区。1222年，又取道太和岭（高加索山）与里海的隘口打耳班进入钦察之地，击败钦察部，即在该地驻冬。次年，与钦察结姻的俄罗斯王公约集俄罗斯诸公国军队出兵钦察草原。蒙古军与亚速海及顿河流域的斯拉夫族“流浪人”相联合，在亚速海北岸迦尔卡河大战俄罗斯、钦察联军；联军在人数上超过蒙古远征部队，但都受各自的王公遥制，缺乏统一指挥，因此大败于蒙古军。蒙古军乘势北进，焚掉俄罗斯南境诸城，也在北距乞瓦（今译基辅）不远处沿德涅伯河南下，扫荡克

里米亚半岛。1223年底，这支蒙古军取道黑海、里海北部草原东归。哲别本人死于东归途中。

【成吉思汗班师】 1222年春夏，成吉思汗于兴都库什山南申河流域，等候进入印度追捕摩诃末的军队归来，同时“因讨近敌，悉平之”^①。他曾欲取道印度、吐蕃班师，为此遣使至德里王朝，结果未详；又由于山路难行，遂处死全部俘虏，从申河边启程，循原道东返。1224年驻夏也儿的石河，次年春天回到蒙古本部^②。

成吉思汗的西征以及蒙古后来的军事征服，给中亚流域文化带来极大的破坏。很多城市在经受洗劫的上百年后，仍未能恢复蒙古侵入以前的繁华程度。

三、拔都西征

【窝阔台时期的波斯】 成吉思汗大军撤离波斯、呼罗珊等地后，札兰丁又西渡申河，取道波斯西南进入伊拉克阿只迷，东征西讨，企图重振花拉子模王朝。波斯西部一度被他重新控制。

成吉思汗死于1227年。1229年，三子窝阔台继位为大汗，随即遣大将领军进征札兰丁。1230年冬，蒙古军进至札兰丁统治地区。

札兰丁在蒙古军追袭紧逼之下惊慌失措，无法组织有力地抵抗，竟想远奔小亚，占领罗姆王朝以抵拒蒙古。他在途中再次遭到蒙古军袭击，最后只身逃入库尔德地区的山岭里，被山中土著

① 《圣武亲征录》。

② 关于成吉思汗西征的比较详细而准确的概述，见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英译本第四版，第404—453页；又参韩儒林主编：《元朝史》（1986，北京）上册，第137—155页。

杀死，时在1231年。札兰丁余部四处逃散。花拉子模王朝灭亡。

窝阔台在位期间，蒙古攻灭金朝（1234年），南面拓疆至淮河。灭金次年，蒙古决定再度在西南用兵，由成吉思汗家族各支宗王的长子统领所部，进征南俄草原的不里阿耳、钦察及俄罗斯诸公国。术赤（这时已去世）之子拔都以长支宗王身份统率西征全军^①。因此这次西征以拔都西征或“长子西征”著称于历史。

【灭不里阿耳国】 1236年，蒙古诸王按约定各领所部参加西征。拔都所继承的术赤封地，这时候在咸海以北，从也儿的石河西至乌拉尔河的草原上，最靠近此次远征的对象。他在前一年已先行率军西进，与后至之师约定在不里阿耳边地会合。

蒙古军深入不里阿耳国境。不里阿耳的两个部落降而复叛。蒙古军遂攻入其首府不里阿耳城，先纵兵劫掠，而后放火烧城，不里阿耳亡^②。

【征服钦察】 征服钦察人的军事行动，主要是在蒙哥率领之下实施的。1236年底，蒙哥军临伏尔加河下游。该地的钦察首领八赤蛮以丛深林密为屏障，负险自固，抵拒蒙古军。蒙哥以战船行于伏尔加河，两岸分配骑兵，水陆并进，搜捕八赤蛮。八赤蛮被迫退至里海中的岛上。蒙古军追至海边，乘水浅可涉，上岛擒杀八赤蛮。时在1237年春。

八赤蛮的被歼灭，使钦察诸部军心涣散。因此，蒙哥没有再遇到太大的抵抗，便降服了东部钦察各部落。

【征服俄罗斯各公国】 在俄罗斯民族国家发展历史上，从东斯拉夫人进入乌克兰地区（6至8世纪）直到蒙古入侵，这个

① 拔都本人是术赤次子，不是长子。

② 根据考古材料，不里阿耳城似在此后不久又曾再度繁盛起来。该城遗址出土的大量碑铭，也恰好都是蒙古时期的。该城在后来被废弃，其时间和原因不得而知。参见《伊斯兰大百科全书》第一卷（莱顿1979），第1304—1308页“不里阿耳”条。

时期被称为基辅罗斯时期。9至11世纪，基辅大公曾经统治了俄罗斯的相当部分地区。不过到了蒙古入侵的时候，基辅公国业已瓦解成为许多各自为政的小公国。王公们之间争权夺利，以邻为壑。这是蒙古军队能在俄罗斯境内纵横驰突，对诸公国实行各个击破的一个重要原因。

1237年秋，蒙古军越过伏尔加河，首先征服莫尔多瓦地方，由莫尔多瓦人引导，抵临也烈赞（今译梁赞）国境。克之。为惩戒俄罗斯王公，使其不敢再举兵抵抗，蒙古军血洗也烈赞全城，自此北渡伏尔加河支流奥卡河，陷科罗木纳，侵入弗拉基米尔大公国境内。蒙古军先分兵攻克大公首府弗拉基米尔城四周的诸城市（包括当时尚不甚重要的莫斯科城在内），然后合围其首府。1238年2月，陷弗拉基米尔城，弗拉基米尔大公也烈（Cranduke Yuvy of Vladinir）战死。蒙古军北趋诺夫哥罗德公国，适逢解冻季节，进军不便，故回兵南向，抄掠俄罗斯南部，进征钦察西境诸部。

1239年冬，蒙古大军再渡伏尔加河攻略俄罗斯南部，进围乞瓦（基辅）。次年秋，拔都亲自率军至乞瓦城下，经过激烈的攻坚战，克之。复进取位于俄罗斯西境的伽里赤公国，其兵锋西抵孛烈儿（波兰）境内。越冬以后，蒙古大军遂从俄罗斯境西侵，进至孛烈儿和马札儿（匈牙利）。

俄罗斯的大量城市在蒙古西征时期被完全摧毁。基辅、契尔尼哥夫等城在此后好几个世纪当中失去了它们从前所曾有过的这种重要性。死于战祸和被虏掠为奴的人口，至少不下于俄罗斯人口的10%。很多手工行业在俄罗斯衰落甚至完全消失达一百年乃至数百年之久。

【兵侵孛烈儿、马札儿】 1241年春，拔都主力分兵侵入马札儿，别遣一军攻略它北面的孛烈儿。蒙古军分两路扫荡东、西部

孛烈儿诸城，在孛烈儿西部属国昔烈西亚的城市里格尼茨（位于奥德河西岸）会师，与孛烈儿军、日耳曼十字军和条顿骑士团会战。孛烈儿军大败。蒙古军从该地南下入马札儿境，与主力会合。

马札儿的国土，当时北据今斯洛伐克，南至亚德里亚海，国内诸侯林立，互不统属。蒙古军与马札儿军会战于其首府佩斯城下，马札儿军被击溃，蒙古军进据佩斯城。是年夏，秋，蒙古军屯兵秃纳河（多瑙河）以东，分兵四出抄掠。年底，拔都又越秃纳河西进。这时他获悉窝阔台汗去世，遂领军东还，于1243年初回到伏尔加河下游营地。

四、旭烈兀西征

【平灭木刺夷】 1251年，拖雷长子蒙哥即位，成为蒙古国的第四代大汗。蒙古又开始向南和向西的军事进征。南攻大理和南宋的战事，先后由忽必烈及蒙哥本人主持。西征木刺夷和黑衣大食之行，则委命于蒙哥的另一个弟弟旭烈兀。

阿拉伯语木刺夷（mulahidah《元史》作“末来”，“没里奚”。译言“迷途者”，异端）是指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一支。此派据有里海西南岸地区及忽即斯坦的若干山地，据险设堡，企图通过极凶残的暗杀来实现其教义。自12世纪中叶起，他们一反伊斯兰教的严厉规定，在斋日饮酒嬉乐，所以被其他伊斯兰教信徒目为木刺夷。

1252年春，蒙哥即派出一支军队进讨木刺夷。至秋，复命旭烈兀西征。

1253年秋末，旭烈兀率军从漠北军营出发。他一路行猎宴饮，至1255年秋天才抵达撒马儿罕，次年初渡阿姆河西趋。此时

的木刺夷教主鲁克奴丁已下令所部恢复正教仪规。他遣使向蒙古求降；1256年，经一再延宕，他终于赴蒙古军营款诚。旭烈兀利用鲁克奴丁谕降各处山堡后，把他遣往蒙哥汗处，同时尽杀俘获及归降的木刺夷徒众。蒙哥拒绝接见鲁克奴丁，后来在遣回波斯路上为押送军杀死。

【灭黑衣大食】 1257年春季至秋季，旭烈兀驻军伊拉克阿只迷北部，作进征报达之准备。冬天，分兵侵入阿拔斯哈里发直属领地。次年春季大军合围报达城；哈里发谟斯塔辛遣使求降，被旭烈兀拒绝，继续攻城数日，哈里发亲率三子及诸达官贵人出城投降。蒙古军入城，大事劫掠后放火烧城，伊斯兰居民被屠杀达80万人。城中尸臭熏天，以至旭烈兀不得不移驻城外。

蒙古军中的伊斯兰信徒（可能主要是术赤后王及其军将）反对杀害哈里发，他们宣称：“假如旭烈兀执意让哈里发鲜血溅地，他和他的军队将会被地震所吞没”^①。旭烈兀担心让谟斯塔辛活着，会成为催发穆斯林教徒叛乱以复活阿拔斯王朝的起因，所以用厚毯裹哈里发，命人以足践之（一说驱马践之）至死。历时600余年的阿拉伯帝国至此灭亡。

【大马士革得而复失】 哈里发朝灭亡后，叙利亚算端慑于蒙古兵威，遣使至旭烈兀大帐请降，旭烈兀无意纳降，以傲词回报叙利亚算端，逼其决战。1259年秋，蒙古大军入叙利亚境。1260年2月，陷阿勒颇城。算端闻及，即从大马士革出奔，大马士革不战而降。惟内城负固抵拒，至4月始被攻占。

占领大马士革后不久，旭烈兀获悉蒙哥汗死于征宋前线，即率军从该城东返，留下一部分兵力继续征服叙利亚及巴勒斯坦未降服之地。

^① 术扎尼：《亚洲诸穆斯林王朝通史》，雷弗提英译本（伦敦，1881），第1252页。

1260年秋，埃及玛木鲁克朝出兵巴勒斯坦，与蒙古留驻军会战。蒙古军大败。大马士革、阿勒颇等城尽为埃及军队克复，叙利亚全境重新为埃及所控制。

第二节 元朝与钦察汗国、伊利汗国的关系

一、与钦察汗国的关系

【钦察汗国的独立】 蒙古国把征取的 人民和土地，都视为成吉思汗家族的共有财产，在宗族各支间实行分封。这样，在大汗所领有的“中央兀鲁思”外，还产生了各支宗王的兀鲁思。其中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兀鲁思距离大汗统治中心最为遥远。因此也最早表现出从中央兀鲁思分立出来的独立倾向。

成吉思汗西征前调整诸王分地时，术赤受封地区，大体在也儿的石河以西，南至阿姆河下游的花拉子模本部，其西则“向那个方向尽鞑鞑马蹄所至之地”^①。术赤随成吉思汗西征东返之后，即长期驻牧于自己领地（当时其领地以乌拉尔河为西界），拒绝到汗庭谨见他的父亲。在他儿子拔都期间，蒙古向西拓境至俄罗斯，于是将其驻牧地西移伏尔加河下游，在伏尔加河注入里海处附近营建萨莱城作为政治统治中心（别儿哥时又另建新都，亦名萨莱，或称别儿哥萨莱）。

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去世后，“拔都居尊于诸孙，在他们中间据有十分荣耀高贵的地位”^②；在各支兀鲁思中，他的领地最为广袤；术赤和拖雷两人的妻子又是亲胞妹，所以拔都竭力支持

①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汉译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版，第450页。

② 《成吉思汗的继承人》，波伊尔英译本（纽约，1971），第107页。

拖雷的儿子蒙哥从窝阔台手中夺得大汗的位子。蒙哥时期，拔都领地的独立倾向有了进一步加强，这给当时东游的欧洲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后者看来，蒙古国分为东西两大部分，其居民分别是“蒙哥的子民”和“拔都的子民”^①。

但是，直到13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术赤后王领地仍是大汗版图的一部分。拔都死后，在决定由谁来继承拔都位子的问题上，蒙哥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他的括户命令，在中原地区与俄罗斯也一样得到推行。^②60年代初术赤后王所发行的钱币，尚仍铸有大汗的名字^③。

60年代初，成吉思汗家族各友间爆发了两场大规模内战。在蒙古本部和中原地区爆发了忽必烈与其幼弟争位的战争；旭烈兀与术赤后王之间为争夺外高加索地区也大打出手。两大内讧标志着蒙古国的瓦解^④。与此同时，蒙哥时代受到严峻弹压的窝阔台、察合台两系后王势力，乘上述政治危机急剧发展起来，从而割断了大汗与术赤后王领地的直接联系。术赤后王领地的独立化的过程至是完成，它与大汗之间只保留着纯属名义上的藩属关系。

拔都及其后继者统治中心地区是南俄草原，当时这里是钦察部居地，阿拉伯人称之为 Deshti-kipchak，译言钦察草原，所以术赤后王领地被称为钦察汗国。而所谓金帐汗国 (Золотая Орда, 译言金帐)，则是俄罗斯史料对术赤后王政权的称呼。

①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耿昇、何高济汉译本（北京，1985），第247页。

② 参见爱尔森：《蒙古在俄罗斯的括户行动》载《哈佛乌克兰研究》卷1（1981.3），第32—53页。

③ 出现在已发现的钱币上的大汗名字是与忽必烈争夺汗位的拖雷幼子阿里不哥。此后，忽必烈及其后元朝大汗的名字绝不再见于钦察汗国的钱币。参见斯普勒：《金帐汗国·蒙古人在俄罗斯》（威斯巴登，1965）第252页。

④ 杰克逊：《蒙古帝国的瓦解》载《中亚杂志》卷22（1978）。

【钦察诸汗与忽必烈朝的疏远】 拔都去世后，弟弟别儿哥觊觎钦察汗位。蒙哥则欲将汗位保留在拔都后人手中，因此别儿哥取得汗位后与蒙哥之间不甚和睦。蒙哥死后，忽必烈为与幼弟争位，以阿姆河以西地区统治权来换取旭烈兀对他的支持；而别儿哥恰曾站在阿里不哥一边，接着又为领土争端与旭烈兀相敌对。由于这些原因，别儿哥及其后继者对忽必烈朝采取十分冷淡的态度，对大汗号令虚予委蛇。当忽必烈的西北驻军发动叛乱，将镇守漠北的太子械送钦察汗国时，钦察汗忙哥帖木儿拘留太子竟达十余年。穆斯林史料提到别儿哥以后两个钦察汗的继位，曾是忽必烈的册封；但其事不见于汉文史籍，至为可疑。

【钦察汗重新“附顺”元朝】 14世纪初(元成宗时期)，钦察汗国与窝阔台，察合台后王发生领土争端。钦察宗王曾想与元朝军队东西夹攻叛王。不久，元军重创叛王，迫使他们向元朝请和。这次著名的约和，使元朝与西方的陆路交通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脱脱汗为此专门召集俄罗斯诸王公，向他们宣布这件大事。自此，钦察汗国与元朝之间的往来又变得比较经常化了。元武宗时，脱脱被册封为“宁肃王”。元顺帝时，朝廷置总管府专掌术赤后王在元朝境内封地的岁入。

钦察汗国对外关系的重点，是在它南面和西面的政权。因此它与元王朝的交往，总的说来不如元与伊利汗国的关系那样密切。但是在此之前，中国和南俄草原之间，大体上只靠着中间商人的过境贸易发生联系。元与钦察汗国之间在宗藩关系下直接交通，大大促进了两地经济文化的联系和交流。

二、与伊利汗国的关系

【伊利汗国的形成】 蒙古国时期，波斯、呼罗珊之地，最

初与河中及畏吾儿地区属于同一个军事——行政区，蒙哥时在阿姆河以西之地另立“行尚书省”，直接受制于大汗，是当时大蒙古国建立在征服地区的三大行省之一。蒙哥遣旭烈兀西征时，曾这样训令他“你完成了这些大事后，就返回本土来吧”。^①波斯、呼罗珊本来并不是旭烈兀的封地，他只是远征该地区的各支蒙古军队的统帅。

1260年，旭烈兀在叙利亚前线获悉蒙哥去世，随即启程东返。他没有回到漠北，而是留在波斯观望忽必烈兄弟争位的形势，以谋求自己的利益。为了争取旭烈兀的支持，忽必烈遣使向他宣布，将阿姆河以西地区全部交给他统治。旭烈兀立即在当地召集大会，向诸王公布了这项训令，并用弓弦勒死从征军中不愿服从的术赤后王，对术赤远征军进行大屠戮。忽必烈争位战争结束后，又遣使正式委命旭烈兀为所统治地区的君主。

旭烈兀对蒙哥自称“汗”，到忽必烈时始自称伊利汗(Ilqan，译言藩属的汗)，该称号为旭烈兀的好几代继承者们所袭用。伊利汗国首都先在桃里寺(今译大不里士)，后来迁至逊丹尼亚。

【元与伊利汗政府的外交关系】 伊利汗国是与元朝的外交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二者之间的藩属关系也十分紧密。伊利汗位的继承，往往要经由元朝大汗的确认。旭烈兀死后，其子阿八哈受大臣推戴继位，五年后获得忽必烈的确认，阿八哈为此重新举行即位典礼。另一位伊利汗阿鲁浑，也为等待大汗的册封使而将正式即位典礼推迟了两年。阿鲁浑之位由乞合都继承。虽然从元朝去的孛罗丞相这时还在波斯，乞合都仍然盼望着专门的元朝册命使去参加他的即位仪式。

元朝大汗确认伊利汗统治地位的方式之一，是向他们颁授玉

^① 拉施特：《史集》汉译本第三卷（商务，1986）31页。按“大事”指降服木剌夷、哈里发朝的任务。

玺。汉文不行于其国境内，但伊利汗却将汉文印玺作为王权的一种象征，加盖在他们写给欧洲君主的国书及其宣敕之上。已发现的汉文玉玺共 3 枚，其印文分别为“辅国安民之宝”、“王府定国理民之宝”，“真命皇帝和顺万夷之宝”。至少有五位伊利汗在其文书上使用这些印信^①。

前期伊利汗的钱币上，多冲制有大汗的称号，或用波斯文，或用蒙文。自合赞汗(1295—1304)时，取消了伊利汗这一自称，并且去掉了钱币上最伟大的“合汗”(Qā'ān al-a'zam)这一铭文，改为“长生天气力里”。合赞汗信奉伊斯兰教，所以他还在部分钱币上冲制出“最伟大的算端，合赞算端马哈麻”的字样。不过，合赞汗这种带有独立倾向的态度，并没有完全改变元与伊利汗国之间的宗藩关系。他本人及其后继者都继续使用着元朝颁赐的汉文印信。

除了汗位继承，伊利汗对某些重大问题的处理，也不时向元朝政府报告。元朝法律文书中援引了伊利汗旭烈兀以及阿八哈处罚违背蒙古律令的穆斯林教徒的事例。

来往于双方的使臣，经常长期居留彼国，为对方的君主服务。灭宋统帅伯颜，就是被忽必烈留在元朝的旭烈兀的使臣。李罗丞相在忽必烈时被遣往波斯，在那里历事五汗，直到去世。在他去世那年，元仁宗还遣使赐给他一颗金印。使者中途为察合台后王所阻，不克成行。大汗有时还以元朝官号加封伊利汗的重臣。阿鲁浑的亲信不花被大汗授予丞相的称号；不赛因汗“言其臣有功，请官之”，泰定帝遂授出班以“开府仪同三司翊国公”之衔^②，穆斯林史料中则以“众异密之异密”(amir ul-umar-

^① 参见田津波、柯立甫：《梵蒂冈密档中的三件蒙古文书》载《哈佛亚洲研究》卷15(1952)。

^②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

ā')来翻译这个称号。

旭烈兀家族对其中原分地的权利，也一直受到元政府的承认。成宗时又专置一个正三品的总管府，“掌哈赞大王位下事”。武宗时省并衙门，“以哈儿班筌大王（按即伊利汗完者都）远镇一隅，别无官属，存设不废”^①。

两国之间还通过联姻来加强和平交往。忽必烈时，将阔阔真公主嫁到伊利汗国。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是随阔阔真公主及伊利汗奉迎使一起，由海道西返的。元仁宗时，以1500骑护行，由陆路嫁宗女至伊利汗，中途为察合台后王所截留。

带着各种任务往返两国的使臣为数极多。这就必然地大大增加了元与伊利汗国之间的互相了解和经济文化的交流^②。

三、与察合台后王的关系

分封在元朝西北边地的察合台、窝阔台两系宗王，其势力在忽必烈初期急剧膨胀起来，长期与元庭相抗争。这两系诸王的领地，同位于东北地区的许多诸王分地一样，属于元朝版图的一部分。

元成宗朝与西北诸王约和后不久，察合台、窝阔台后王之间维持了几十年的同盟关系很快破裂。在元朝军队支持下，察合台后王重创窝阔台后王势力。窝阔台系彻底衰落下去，其领地大部分为察合台后王所并吞。这时期的察合台领地，东括畏兀儿地区，西据河中而抵临阿姆河，南面占领阿姆河上游及哥疾宁等地。

元仁宗时，元朝与察合台汗后王因牧地之争重新开战。察合

^① 《元史》卷八五《百官志》。

^② 参见斯普勒，《蒙古人在伊朗》（柏林，1955），第265—271页。

台后王也先不花战败，大片牧地为元军占领。正当这时，也先不花获悉，伊利汗军队因降附他们的察合台宗王所请，东渡阿姆河入察合台汗势力范围。他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倾全部兵力侵入呼罗珊，企图以此弥补被元军击败所遭受的损失。呼罗珊守军一败涂地。但由于元军深入察合台领地，也先不花被迫退出呼罗珊东撤。

也先不花西征失败后第二年，察合台系宗王牙撒兀儿因宗室内讧，率部投奔伊利汗完者都。完者都命牙撒兀儿节制呼罗珊诸将，守卫阿姆河。牙撒兀儿羽翼丰满后，遂乘完者都去世，新汗年幼，在呼罗珊发动叛乱。1320年，伊利汗联合察合台后王的军队，击败牙撒兀儿。至此，元廷、伊利汗与察合台后王之间，又重新开始了和平时期。

第三节 与亚洲及非洲各国的关系

一、与高丽、日本的政治关系

【高丽】 1218年，蒙古军队追契丹余部，首次进入高丽，此后遂不断进征其地。高丽为抵制蒙古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国中成年男子，几乎大部分被杀或被掠走。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刚即位，高丽国王王暉去世。元朝政府将在中国充当质子的高丽王族王僎送回国去即位。宣布撤还兵戎，对高丽过去的反抗“一切勿问”，^①但要求高丽王室履行将朝廷从江华岛迁回王京（今开城）的诺言。接着，元政府不断命令高丽签军、造船、备供征粮，引起高丽朝野的不满。1269年，高丽朝臣废元朝所立高丽国

^① 《元史》卷208《高丽传》。

王，另拥新君。元军大兵压境。高丽西京（今平壤）及西北地区六十余城降元（后来被归还高丽）。原国王在元朝支持下复位。抗元军队退入江华岛，被击溃，入耽罗。元军进而攻入耽罗，迫耽罗国降附。后来因高丽要求，复将耽罗归隶高丽。此后元与高丽之间没有再发生战争。

忽必烈为征日本，1283年，在高丽设“征东行中书省”。该行省的名义，与元朝国内各行省性质不同。高丽国王王䄔就是行省丞相，与蒙古军将阿塔海共领行省事。高丽国王在其境内，拥有自行设置官府、考试取士、征收赋税、施行号令的权力，基本上独立地行使着国家主权。

不过，作为元朝的“属国”，高丽还时常受到元朝的压迫和榨取。元政府为笼络南宋降军，遣使到高丽为他们“求娶妻室”。元使偕同高丽官员“穷搜闾井独女、逆贼之妻、僧人之女”。临行之日，“哭声震天，观者莫不悽唏”。^①为远征日本，元政府迫使高丽出兵卒、水手、战船和征粮，更是高丽百姓沉重的负担。

【日本】 从1266年起，忽必烈开始不断遣使日本，企图“招谕”该国向元朝表示归附。八年之间，元使七至日本。日本天皇曾命朝臣拟就答元国书，但因镰仓幕府力主不予回牒的强硬态度而没有送达元廷。1274年，元军从高丽渡海侵日，遇日军抵抗不能深入，又因遇飓风，战舰多触礁摧毁，被迫班师。因是年为龟山天皇文永十一年，所以日本历史上称是役为“文永之役”。

次年，忽必烈又遣使日本、幕府欲使元廷“永绝窥觐”，^②杀元使，仍不予回牒；同时严边海守戍以备蒙古，并且还制定了一个

^① 《高丽史》卷二七，《元宗世家》3。

^② 《北条九代纪》转引自中村荣孝：《文永、弘安两役中的日本、高丽、元朝关系》。

“征伐异国”的计划，在国内限日登记大小船舶、水手舵手、出征将士的年龄、武器等，严令“若及遁避者，可被行重科”。此后数年内日本军不断骚扰高丽乃至元朝边境，即与这个“征伐异国”的计划有关。

1281年，元军再次征日。东路军从高丽渡海，江南军从庆元（今宁波）起航，两军期于日本壹岐岛会师，总兵力达14万，共有战舰4400艘，“隋唐以来，出师之盛，未之见也”。^①江南军失期迟至。大部元军进屯鹰岛，未经大战，即遇飓风，元军“缚舰为城”，联结一起，因为“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②东征将帅弃十余万士卒于岛上，择坚好船只率先遁走。日军乘势进攻，尽杀蒙古、高丽、北方汉人军卒，虜南宋降服军士为奴。只有一小部分溃军逃回国内。日本史称是役为“弘安之役”。

这次大败后，忽必烈又曾几次造船签军，准备侵日，终因朝野一致反对，没有真正实施。日、元之间也始终没有正式建立关系。

二、与南海诸国的通使和战争

【安南】 13世纪50年代，忽必烈平云南后，蒙古军水陆并进，侵入安南。安南王陈师御敌，象骑为蒙古军所射，惊奔反蹂，军大溃。安南王从京城升龙（今河内）避入海岛。不久，蒙古军因炎热撤兵。安南随即遣使通贡。

忽必烈即位后，以入朝、纳质、括户、签军、输赋、置官监临六事责安南王。安南王不甘蒙古凌轹，抗命不从，并以巧辞自

^① 王恽：《泛海小录》，《秋涧集》卷四十。

^② 苏天爵：《赠长葛县君张氏墓志铭》，《滋溪文稿》卷二一。

辩，与元廷周旋。使节往返十余年，安南仍不肯就范。元廷想在安南建省，就便控制真腊、占城、云南、暹、缅诸地，遂于1284年（至元二十一年）以假道往征占城之名进军安南境。安南起兵抵抗。安南国王再次尽空京师，走避山林。元军擒获流亡安南的南宋朝臣400余人。在占城的元军正打算在这时撤兵北归，遂与入侵安南的元军配合作战。元军追捕安南王未果，虽然常有小仗获胜，但困于地势，无法施展骑兵优势，而且也找不到安南主力一决胜负，因此逐渐陷入被动。至夏末，元军被迫撤兵。安南军乘势追击，元军力战出境。

1287年（至元二十四年），元军又出兵安南。安南王复弃城遁。不久，因朝野反对，元廷被迫下诏止军。但到1288年正月，元军再次分道由水陆侵入安南。安南王复走入海。安南军队仍采用坚壁空城、以逸待劳的战略。春末，元军因运粮船失期不至，惟恐粮尽师老，只好退兵，受到安南军队的堵击，被迫改道撤回。安南王遣使求和，“进金人代己罪”。^①忽必烈在位末年，又准备第三次入侵安南，但还没有出兵他就死了。成宗即位，诏罢征。后两国间一直通使往来。元朝也不再提出要安南王入朝以及置官钤压等事了。

【占城】元初，占城仍是安南属国。元朝灭宋后，遣使告谕占城。占城国王纳贡归降。1282年（至元十九年）底，因占城王子截留元朝海道使臣，唆都率元军由海道往征其地。占城军在国都以西筑木城抗元军，1283年（至元二十年）正月十五日，元军攻入木城，占城国王兵败退入山中。又借安南、真腊、阇婆等国兵与元军交战，诱其深入，从旁出截归路，元军死战得脱。以后元军虽屡有小胜，但作战逾年，仍未结束战局。元廷于1285年（至元二十二

^① 《元史》卷二〇九《安南传》。

年)三月发兵增援,未及抵达,唆都已率军撤向安南。元后至之师匆匆谕降占城国王后退兵。

在这以后,占城经常同时向元朝和安南入贡,并且试图依仗元王朝阻遏安南侵吞其国土。14世纪20年代,占城击败安南进征之师,遂停止向安南纳贡,但仍与元通贡。

【真腊】 元朝在占城退兵次年(1285年),占城入贡。随占城使者一同入贡的,还有其南邻真腊的使臣。1292年,元朝遣使随同出征爪哇的军队招谕占城及真腊。但此次使节,迟迟没有回国报命。因此,元成宗即位后,因前使被拘执不还,乃又遣使臣前往招谕。随行人员中有周达观。1296年春自明州出海,至秋始抵其国。周达观在真腊留居一年,返国后著《真腊风土记》,是研究吴哥时代柬埔寨社会文化的重要史料。^①当时,真腊国势开始下衰,国内有些地方因与暹罗人交战而成旷地。

真腊亦名柬埔寨,该名称很早就见于当地碑铭中。到元代,汉文史籍中也出现干不昔、甘不察等译名。终元之世,真腊时有人贡。元朝皇帝出行,用象“以导大驾,以驾巨辇”,^②所以元政府一再向东南亚国家索贡驯象。真腊同安南、占城一样,也经常向元廷进贡驯象。

【暹、罗斛】 11世纪后期,散布在澜沧江、湄公河下游直到萨尔温江上游之间的暹人(属泰语族,亦称泰族人),乘真腊在该地区势力衰微,逐渐建立起一些独立的小邦国。1238年,湄南河上游诸河地区的暹人,攻克真腊西北首府速古台(Sukhothai在今永河流域宋家洛附近),建立了一个暹人国家,称为速古台王朝。经过大约半个世纪,速古台王朝东面据有今老挝大部,西面与缅甸之南的白古接界,南面或曾控制湄南河下游的罗斛,乃

^① 《真腊风土记校注》(北京,1981)(夏鼎)《校注者序言》。

^② 《元史》卷七九,《舆服志》2。

至马来半岛北部原属三佛齐势力范围内的一些小国。1292年，暹国使者持金册（国书）至广东通聘。次年，忽必烈遣使赴暹。从此两国间通使不绝。中文史料记元成宗初暹国国王名敦木丁，当即 ka-morntengaan 之译音，译言国王。据暹史，13世纪70年代至14世纪初期，是速古台王朝第三代国王坤拉玛甘王(khun Ramakham heng, 又译拉玛甘亨)在位期间；据载，他曾先后两次亲朝中国。在第二次来中国时，带回去一些陶瓷工匠，在速古台及其他城市建立了陶瓷工场。

孟族人的政权罗斛与元建立联系，略早于暹国。14世纪中叶，一个出身于泰族首领家族的孟族君主的女婿控制了暹国大部。他迫使处于衰落中的速古台政权臣服，承认他的宗室地位。这个强大的新国家不久即移都阿瑜陀耶(Ayuthaya, 译言大城)。明代史料即把这个新国家称为暹罗。

【麻里予儿】 麻里予儿(Malayur)是马来(Malay)一名所出之 Malāyu 的另一种形式。不过，在十三、十四世纪，它仍不指今马来亚，而指苏门答腊岛中部詹卑河流域为中心的马来人的明囊伽宝王朝；苏门答腊岛和马来半岛上的各小邦国（包括位于苏岛西北部的“苏木都刺”国在内），都是它的属国。当时的汉族一般仍旧以三佛齐称之。蒙古人则以其族属名称称它为麻里予儿，木刺由，或以其国都詹卑名之，元代汉文史料音译为占八国、蘸八国。13世纪下半叶，暹国势力南进，争夺原来在麻里予儿控制下的马来半岛。两国间时有战争。

麻里予儿在13世纪后半叶已向元朝遣使归诚。它或曾求助元政府调停其与暹国的关系。所以1295年元成宗诏令暹国“勿伤麻里予儿”。①

① 《元史》卷二一〇《暹国传》。

【爪哇】 13世纪20年代，爪哇政权易手，新王朝史称新柯沙里王朝（Singasari）。13世纪下半叶，新柯沙里王朝先后向马拉都、巴厘等邻近岛国，乃至麻里予儿地区扩张势力，力图建立抵御蒙古势力南进的联盟，^①与此同时，爪哇曾先后两次遣使入元。爪哇国王对元政府一再强令他入朝十分反感，遂于1289年将元朝派去的使节黥面遣归。忽必烈于是下令“征讨”。

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冬，元军由史弼等率领自泉州出海，次年春至爪哇。这时爪哇新柯沙里国正与葛郎交战，国王被杀。国王女婿土罕必阁耶伪降元军，邀元军助击敌兵。元军分三道助土罕必阁耶败敌，敌军被杀五千人，挤跌入河淹死者数万人，出降。土罕必阁耶见乱平，倒戈进攻元军，迫使元军撤兵。

土罕必阁耶建麻喏巴歇（Madjapahit）王朝，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土罕必阁耶即遣使与元朝重修和好，从此两国间时有使节往返。

三、与缅甸和印度的关系

【缅甸】 元朝“招谕”海外列国之时，缅甸的蒲甘王朝（Pagav, 1044—1287年）已十分衰弱。13世纪70年代前期，元朝两次遣使至缅甸。前一次的使节未受缅王亲见即被遣返，缅王派了一个大臣同行，到大都对元王朝表示亲善并朝拜佛牙；后一次使节违返缅甸习俗，缅王不顾臣下劝谏，执意处死元使及其全部随从。1277年（至元十四年），缅王又出兵侵攻云南边地归附元廷的金齿部落。元云南行省驻军出击缅甸，大破缅甸象队，进至江头城后撤兵。

^① 霍尔：《东南亚史》上册，汉译本，第106—113页。

1283年（至元二十年），元朝再攻缅甸。缅王从都城蒲甘出奔，并于1285年遣使向元军求和，获准后决定重返蒲甘。1287年，他在返回蒲甘途中被儿子毒杀。缅甸陷入内乱。元军复侵入缅甸，丧师七千，克蒲甘。统一的蒲甘王朝崩溃。掸族势力急剧扩大。从这时起直到13世纪末，诸多自立一方的掸邦先后降附元朝。

蒲甘王朝瓦解后，其王族继续据有蒲甘城及其周围地区；成宗前期，复封其后人为缅国王，定岁贡方物。1298年（大德二年），缅甸北部掸族部长阿散哥也攻克蒲甘，杀蒲甘王族。1300年，元军再入缅甸，阿散哥也趁元军不服湿热，以重贿使其撤兵，随后入朝纳贡。元朝承认了他们对缅甸的统治权。终元之世，缅甸贡使不绝。阿散哥也兄弟及其后人统治上缅甸国家达两世纪之久。

【元与印度的通使】 宋元时代的印度半岛南端，“惟马八儿与俱蓝足以纲领诸国”。^① 当时半岛南端的东岸地区即称马八儿，其西岸地区则称马拉八儿。俱蓝就是马拉八儿地区的一个小国。1279年（至元十六年），马八儿即遣使通贡。因“俱蓝诸国未下”，同年底，元廷派杨廷璧浮海招俱蓝。俱蓝国王遂向元廷进回回字降表。此后，杨廷璧又连续三次出使俱蓝，先后敦使马八儿，马拉八儿及南海地区近十个国家与元朝通使聘问。

北印度德里王朝与元朝之间也有通使关系。据丹吉尔港（在今摩洛哥）出生的旅行家伊本拔都他的游记，元朝后期，曾遣使至印度，赠德里算端男女奴婢百人，锦綉、麝香、宝剑等礼物，要求德里算端同意在印度某地重建一所为算端军队所平毁的佛寺，以便元朝臣民前往朝拜。德里算端备重礼遣使回访元朝，据

^① 《元史》卷二一〇《马八儿等国传》。

拔都他记载当时他正在德里游历，被算端任命为使团首领。据载，当时中印间交通皆由中国海船承担，大船称舰、中船称舟、小船称客舡。最大的船有3至12帆，载客千名。不过拔都他在途中流连数年，到达中国后，似乎没有北上大都。

【德里王朝与察合台后王的战争】 13世纪末，据有河中的察合台后王为抗衡大汗和伊利汗的联盟，竭力将其势力从阿姆河上游地区向南伸入哥疾宁及印度之地。在13世纪末到14世纪初的近十年中，德里王朝与侵入其国境的察合台后王军队进行了很多次战争。察合台后王不止一次进逼德里。不过这些战争都以蒙古军的失败而告终。到1310年前后，察合台系诸王间先因汗位继承纠纷爆发内乱，接着又与元朝和伊利汗国发生战争，于是基本停止南侵德里王朝的军事活动。

四、与非洲国家的交往

【密昔儿】 元时北非最强大的国家是埃及马木路克王朝，元人称为密昔儿。13世纪中，蒙古与密昔儿军交战失败。此后不断与伊利汗国发生冲突。马木路克统治者利用钦察汗与伊利汗之间的矛盾，与钦察汗国结盟，阻止了伊利汗的扩张。马木路克王朝大臣乌马里著《眼历诸国行记》为研究蒙古史和元史的珍贵史料。

【吊吉而】 1300年，吊吉而使节到中国通好。它应当就是今北非摩洛哥首都丹吉尔。阿拉伯人称北非为马格里布(al-Maglib, 译言西方)，元代史料中音译为默伽腊国。吊吉而遣使之后，元政府即派出四起使节去那里采办异物，各供给三年的途中饮食所需。

【马合答束】 14世纪初年，元朝还派使臣去马合答束采买狮、豹等异兽珍奇。木合答束即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按元政

府规定，对到那里去的使臣，发给二年的途中饮食所需。

第四节 与欧洲基督教世界的联系

一、蒙古国时期西欧教士的东行

【普兰诺·卡尔毕尼出使贵由汗庭】 13世纪前半叶，蒙古的两次西征使欧洲深为震惊。第二次西征的蒙古主力由于窝阔台汗的去世遽然东返，但是西欧仍在胆颤心惊地等待蒙古狂飚的袭临。1243年，英诺森四世就任教皇，即宣布准备对蒙古入侵军进行“圣战”，1245年，又决定派遣传教士作为教皇使节前往蒙古地区，说服蒙古大汗与基督教世界结盟，同时秘密地搜集有关蒙古的种种情报。

1245年，英诺森教皇同时派出了两个使团。其中一个前往蒙古驻波斯的军队统帅，关于这个使团的活动没有留下确切的记载。另一个由意大利圣方济各派教士普兰诺·卡尔毕尼（又译柏朗嘉宾）（Jean de Plau Carpin, 1182—1252）率领，于1245年4月从里昂出发，经由乞瓦（即基辅），到达伏尔加河畔拔都的营帐，而后由拔都遣军护送，于1246年7月到达漠北，正好赶上窝阔台之子贵由即大汗位的典礼。

贵由汗在继位为大汗后接见了卡尔毕尼，将蒙古写给教皇的国书交给他带回。据卡尔毕尼说，原信是用蒙古文写的，由贵由汗的大臣当场通过翻译逐字逐句地向他们作解释，让他们用拉丁文记录下来。贵由汗了解到教皇能在国内找到懂波斯文的人，于是，又将原国书写成波斯文，以便让教皇能够直接解读它。这封国书，实际上仍是一份谕降书。卡尔毕尼于1247年秋天回到里昂，将贵由汗的信函呈递教皇。此后，卡尔毕尼写了一部《蒙古

行纪》，记载他出使蒙古的所见所闻。

贵由汗致教皇的波斯文国书原件已在梵蒂冈教皇档案中发现。国书上盖有畏兀儿字母的蒙文方印。^①印文为“长生天气力里，大蒙古国大汗之旨：已服未服的百姓每根底，圣旨所至，敬之惧之”。

1247年，英诺森教皇又向蒙古军驻波斯的统帅派出一个使团。这次通使同样没有获得有意义的外交成果。使团的成员之一西蒙留下了有关这次出使的若干记载。

【鲁布鲁克访问蒙哥汗庭】 1248年，率十字军出征埃及的法王路易九世在塞浦路斯驻地遇到一位由驻波斯的蒙古军统帅派遣的使者，称大汗保护基督徒，并将帮助他们反对伊斯兰教徒。路易九世即于次年遣教士安德烈·隆如美(Andvede lonjaned)携重礼出使蒙古大汗宫廷。隆如美到达东方时，贵由汗已死，摄政皇后接见了使团，让他们带回去一封十分傲慢无礼的回信。因此，当路易九世派圣芳济各会教士鲁布鲁克(Guillaume de Rabruguis约1215—1270)再赴蒙古汗廷时，他决定让他以传教士的身份，而不再作为法王的正式使臣行事。

1253年(元宪宗三年)夏，鲁布鲁克从君士坦丁堡出发，经过拔都营幕地，于年底抵达漠北，请许在蒙古境内传教。鲁布鲁克先后在蒙哥汗驻冬地以及蒙古国都城和林(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居留共半年多，直到1254年8月才启程西返。他携回的蒙哥汗致法王国书，同样是一封谕降书。

^① 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用畏兀儿(今译维吾尔)字母记蒙古语，是为“畏兀儿字蒙文”。忽必烈时代又根据藏文字母创制八思巴字母，用以记蒙古语或拼写汉语，是为“八思巴字蒙文”或“八思巴字汉文”。元亡后，八思巴字母被废弃。蒙古族通用以畏兀儿字拼写的蒙文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现在通用以斯拉夫字母拼写的蒙文)。又因为维吾尔族在伊斯兰化以后，已放弃自己原来使用的字母，改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维语。所以现在一般地把蒙古族使用的畏兀儿字母径直称为蒙古字母。

鲁布鲁克也留下来一部《东行记》。它与卡尔毕尼的书一样，是研究13世纪蒙古历史的重要资料。^①

二、马可波罗在中国

【尼哥罗兄弟的中国之行】 13世纪60年代初，威尼斯商人尼哥罗兄弟到黑海沿岸经商，从那里辗转到河中，后来随旭烈兀派往元朝的使臣一起到上都。经忽必烈接见后，尼哥罗兄弟受命充副使，随元朝使臣一起出使罗马教廷。1269年，尼哥罗兄弟完成使命后返回威尼斯。

【马可波罗来华】 1271年（至元二年），尼哥罗兄弟携尼哥罗子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谒见新任教皇格利高里十世，经教皇同意，回元朝复命。他们取道伊利汗国，循阿姆河上游逾帕米尔，由塔里木盆地南缘进入河西走廊，于1275年夏天到达忽必烈汗的驻夏地上都（在今内蒙古多伦西北）。

【留居中国17年】 元代汉文史料没有留下有关马可波罗在中国活动的直接记载。据马可波罗本人记述，他在中国期间，曾受忽必烈汗委派出使占城、印度，还到过云南及江南各地，游历了许多地方。他经行所至，基本上沿着元代驿道的路线走向。1291年春，他与出嫁到伊利汗国的阔阔真公主及伊利汗的奉迎使一起，从泉州由海道西返。^②

① 这两部行记，现在有两种汉译本，即吕甫、周良育译：《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1983）和耿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记，鲁布鲁克东行记》（1985，中华）可参见。

② 元代汉文史料和波斯文史料中留下了阔阔真公主及伊利汗奉迎使的记载。参见杨志玖：《关于马可波罗来华的一段汉文的史料》载《文史杂志》1981年；柯立甫：《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汉文史料和到达波斯的波斯文史料》载《哈佛亚洲研究》卷三十六（1976年）。

1295年，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次年参加威尼斯与热那亚之战被热那亚军队俘虏，在狱中口述游历东方各国的经历，由别人记录整理成书，书名为《马可波罗世界志》。这本书在此后数百年间，对欧洲人了解中国和东方其他国家，起了很大的影响。^①

三、列班扫马出使欧洲

【西行朝圣】 忽必烈中期，定居大都的一个畏兀儿族聂思脱里教徒的儿子列班扫马 (Rabban Sauma) 修士，与另一位同族的聂思脱里修士麻忽思 (Margos) 一起，不顾家人劝阻，执意去耶路撒冷朝圣。他们跟随一个商队取道河西走廊，沿塔里木南缘西行，经过窝阔台后王领地进入呼罗珊，至伊拉克阿只迷。在那里他们遇见了聂思脱里教报达大主教，获得他的允准，参观了报达，又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居留过一段时间。后来，受报达大主教之命，出使伊利汗阿八哈 (旭烈兀子)，求封报达大主教为“东方总主教”。完成使命后，他们从伊利汗廷西北行，企图由海道前往耶路撒冷，因为道路不安全，仍没有成功，于是只好返回报达。

报达大主教决定将他们遣回元朝主持聂思脱里教会。麻忽思受命为“契丹及蛮子(分别指北部中国及南宋旧有疆域)教区”主教，称雅卜阿罗诃，列班扫马受命为巡视总监。二人启程重返中国。但因忽必烈正在与察合台后王和窝阔台后王交战，道路不通，他们又回到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暂居。

【西欧之行】 不久，报达大主教去世。报达聂思脱里教界因

^① 关于马可波罗行纪，国内已有多种汉译本。不过对学术研究来说，最有价值的，是穆勒和伯希和的英译本 (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tr, by A.C. Moule & P.Pelliot, London, 1938)。

为麻忽思“在族属和语言方面都与蒙古人系统较近，他们将会通过他而获得俾益”，^①因此选麻忽思为新任东方总主教，尽管他不懂叙利亚文。是为雅卜罗诃三世总主教。麻忽思的职位，经过了伊利汗阿鲁浑的认可。

这时候，阿鲁浑正想侵入叙利亚、巴勒斯坦，夺取耶路撒冷，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想联络西欧各国，造成东西夹攻之势。在雅卜阿罗诃推荐下，列班扫马携带阿鲁浑致罗马教皇及西欧各国君主的国书、雅卜阿罗诃三世致罗马教皇书以及大量贵重礼物，出发西使。他循传统商路从报达北行，到黑海，船行至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受到东罗马皇帝的盛情款待。再由地中海航至意大利，因原任教皇已死，在等候选任新教皇，又先后访问法王腓力四世，英王爱德华一世，复回罗马受新任教皇尼古拉四世的接见。西欧君主们和罗马教皇都企图利用蒙古军力挽回十字军东征的一再失败，征服穆斯林“异教徒”，重新占领耶路撒冷圣地，因此都热情接待列班扫马，并给他丰厚的馈赠。

列班扫马出使西欧是有史以来中国人历访欧洲诸国的第一次。促进了教皇和西欧君主们派遣教士和使节来到中国传教和聘问的活动。

四、天主教士的东来

【孟特哥维诺】 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接见了列班扫马后，深信蒙古诸汗尊信基督教，于是又派遣了孟特·哥维诺（Monte Corvino）到东方传教。1289年，孟特哥维诺从罗马出发，先至伊利汗国，再从该国著名海港忽鲁模子（在波斯湾口）海行，于

^① 把儿赫不列思：《叙利亚编年史》，转引自《忽必烈汗的僧人》（伦敦，1928年）按此书即叙利亚文的《雅卜阿罗诃三世传》英译本，导论第59页。

1291年(至元二十九年)到达中国,获准留居大都进行传教活动。根据孟特哥维诺写回本国的信,他在大都先后兴建两座天主教堂,学会了“鞑靼人”的语言,用蒙文翻译了新约和赞美祈颂诗等,总共有6000人经他受洗而成为天主教徒。移居大都地区的大量原先信奉希腊正教的中亚移民,也在他影响之下皈依天主教。孟特哥维诺的传教活动,主要在元廷上层中进行;他自己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被元廷当作罗马教皇的使臣来看待的。后来,罗马教皇任命他为大都暨东方总主教,又派了7名副主教来中国协助孟特哥维诺,其中有3人抵达中国。除大都以外,这些天主教士还活动于泉州、扬州等地。孟特哥维诺是我国第一个天主教区的创始人,也是以教会正式使节名义来华的第一人,他死于1328年。

【鄂多力克】 14世纪前期(约1314或1316年),意大利教士鄂多力克(Odorico约1265—1331)从东罗马经伊利汗国,海行至印度、南海诸国。1321年抵临广州,游历东南沿海、华北以及中国西部,有行纪传世。他与马可波罗、伊本拔都他、尼哥拉康梯合称中世纪四大旅行家。

【马黎诺里】 元朝后期,顺帝选择到达中国的欧洲人充任使节派往罗马教廷。皈依天主教的中亚移民也同时上书教皇,请求他派遣新任主教来接替死去已久的孟特哥维诺。教皇隆重地接待了元朝的使团,并委任意大利人马黎诺里(Marignolli)为特使,率团回访中国。马黎诺里于1338年末出发,经由欧亚大草原,陆行到中国。教皇使团于1342年抵上都,在献给元顺帝的礼物中,有一匹骏马,全身黑,后二蹄白。元廷命朝臣作图赋诗,称“天马”,引为盛事。马黎诺里在大都留居三、四年,由泉州取海道回欧洲复命。据马黎诺里记载,元顺帝要求罗马教皇尽快派遣一位主教到中国来。不久之后,元朝爆发了农民起义,这种联系也就随之中断了。

第八章 宋元时期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

与前代相比，宋元时期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特征。

首先，在整个宋元时期，西北陆路以及东南海道这两条中外交通线始终并存。但是，陆路交通的重要作用及其繁荣程度逐渐地有所降低，而海路交通的地位和规模则在前代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

其次，宋元两朝，市舶司收入已构成国家财政岁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出于此种目的，宋朝政府（尤其是南宋政府）竭力招徕外商，鼓励对外贸易。宋高宗曾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①元朝亦倚市舶之利为“军国之所资”。^②对外贸易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有利于中外经济的交流。

再次，宋元时期是中国技术西传、西域各种宗教、理论及自然科学频频传入中国的时代，在这个双向交流的过程中，长期羁居他国的侨民群落以及阿拉伯文化这样两种因素，始终起着相当重要的中介作用。

^① 《宋会要辑稿》. 3375页“职官”四四之21，清顾炎武甚至说，南宋时，“经费困乏，切倚办海舶”。见《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二〇“海外诸番”。

^② 《元史》卷一六九《贾普刺传》。

第一节 中外贸易的发展

一、北宋、喀喇汗朝及元朝与西部各国的 陆上贸易

【北宋与西方的陆路贸易】 对位于北宋西方的各国来说，其与北宋之间的陆路贸易的形式之一是以“朝贡”换取“回赐”。^①从大食和拂菻的使臣都曾取道陆路通宋的记载看来，波斯、阿拉伯及其以西地区的民间商团，或许也有从陆路到达北宋进行贸易活动的，在11世纪前叶以前尤其如此。不过当时东西方之间在这条线上的商业交往，主要仍通过喀喇汗王朝商队的中介而得以实现。自11世纪后半期起，喀喇汗朝统治下于阗地区的商队“远不逾一、二岁，近则岁再至。”其中一些商人冒充“人贡”使臣，但“有所持，无表章”，“来辄群负，私与宋朝商贾牟利，不售，则归诸外府，待善价”。^②

从西方输入宋朝的商品大致有三类：织造品，如五色杂花番锦、西锦、胡锦、花蕊布等；香药，如乳香、白龙脑、膻肭脐、牛香、眼药；珠宝玩好，如珊瑚、翡翠、象牙、琥珀、犀角、珍禽异兽。从宋朝输出的商品包括金银器物、茶、丝绸、铜钱等。由于铜钱大量外流，宋廷在1088年“诏河、岷、兰州沿边，今后蕃客入汉贩卖回日，许所经城寨搜检，不得带钱入蕃。若在汉界，从

^① 1063年喀喇汗朝于阗王遣使人贡，使臣嫌宋朝对于阗所献方物的“赐直”甚少，拒绝接受，并请还已献单峰驼。宋廷“以远人特别赐钱五千贯，以羸驼还之，而与其已赐之直”。见《宋史》卷四九〇《于阗传》。宋与喀喇汗之间的交往虽然不属于中外关系的范畴，但这个例子可以一般地反映出，所谓“朝贡”，很大程度上，其实只是一种贸易手段。

^② 《宋史》卷四九〇《于阗传》。

其便”。^①不过此种禁令仍无法阻止巨款帛币的不断外溢。

【喀喇汗朝与邻国的贸易往来】 关于喀喇汗王朝同周边诸国的贸易往来，史籍记载甚少。《治国策》提到哥疾宁王朝的一个女间谍，为了打入喀喇汗王朝的宫廷，扮成一个富商的遗孀，先到喀什噶尔购买了一批“契丹”和“秦”（辽朝和宋朝）出产的商品，“如精雅的器物、丝绸、年轻的女奴、贵重衣料等，同商人们一起前往撒马尔罕”。^②喀喇汗王朝时代写成的长诗《福乐智慧》中说到，有一些从事国际贸易的大商人，“为谋生，他们周游世界。……他们从东到西经商，给你运来你需要的物品。世界上无数珠宝和珍品，都可以在他们那里找到。”诗歌的作者劝国王“好好款待他们，你的名声也会传四方”。^③从考古资料，特别是古钱资料来看，当时国际贸易相当发展。在喀喇汗王朝境内，不仅发现了大量宋朝的钱币，而且也发现了大量的哥疾宁王朝、塞尔柱王朝和花拉子模沙的钱币。黄金作为交换手段大量投入市场，也反映了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交易的出现。

【元朝同西方的陆上经济交流】 河中以及西域其他地区的穆斯林商人，很早就同蒙古统治者保持着接触。蒙元时期，他们在大汗庇护下从事国际贸易；有些还从宗王贵戚那儿领取本钱，进行长途贩运，为蒙古贵族经营生息。同钦察汗国、伊利汗国之间的陆路贸易，当然也是他们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有不少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商人乃至欧洲商人经由传统的陆上商道来中国贸易。

大约1340年左右，佛罗伦萨一家公司的代理商帕戈洛蒂写了一本《通商指南》。书中记载了从境内（在亚速海最东端）穿越

① 《宋会要辑稿》6514页，“刑法”二之37。

② 《Siasat—Nama，十一世纪尼札姆论治国之书》（莫斯科）82页。

③ 《福乐智慧》，耿世民、魏莘一汉译本199—200页。

钦察汗国、察合台后王封地，经过河西走廊进入中国内地的行程。帕戈洛蒂说：在行经草原地区时，须及时置备充分的面粉和咸鱼，以便能走完标志着从一个地区进入另一个地区的两个“首要城站”之间的路程。至于其他的東西，尤其是肉，在途中各处都可以买到。他还写道：“根据走过这条商道的商人们说，从塔纳到中国的道路，无论白天还是夜间，都极为安全”。^①在钦察汗国首都，有不少中国商品出售。匈牙利、意大利商人在这里就能买到中国的丝绸。

二、宋元与西方国家的海路贸易

【宋元政府对海路贸易的重视】 西北陆路在宋元时期虽然一直在使用，但由于宋代地方割据政权和元西北叛王的阻梗，陆路交通已远不如昔日之盛，海上贸易的重要性就显得越来越突出。中国的桑蚕丝绸技术经历了几个世纪的不断西传，中亚、西亚及西欧都已种桑养蚕，丝织技术也发展起来，胡锦还作为贡品向中国输出。因此，在中国丝绸继续作为大宗出口商品的同时，瓷器的外销量也急剧增长。瓷器体重质脆，靠驮畜长途贩运，不仅载量有限，而且易于损碎，远不及海船载运方便和安全。这一点也促进了海路贸易的发达。

对进行海路贸易的商舶征收的赋税，在唐代后期和五代十国时的东南沿海国家，已经成为一宗很可观的财源。宋朝政府对于外贸收入更为重视。宋初曾采取“榷货”政策（政府专买专卖政策），以期垄断对外贸易。（后来禁榷货物的范围逐渐缩小）。987年，宋廷遣内侍八人，携带金帛敕书，分四路到南海各地“博

^① 玉尔：《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伦敦，1896年）292页。帕戈洛蒂接着提到，在汗位虚悬期间，在这条路上就会时常发生劫杀行商财物的事情。

买”香药异物，招徕各国。以政府名义到外国购买货物，在这之前尚属少见，它必然对吸引番舶来华经商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宋政府还对长住东南沿海城市的番商示以“宠绥”，通过他们“招谕”更多的外商前来贸易。元朝灭宋次年（1277年），即在东南沿海建立海外贸易的管理机构市舶司，翌年又命令专任官员通过番舶招谕南海各国，并且宣布“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①政府还组织“官本船”出海牟利。海路贸易在元代，即是追求“国家声教绥怀，无远不及”^②的政治目标的一种手段，同时由于“市舶司的勾当，曷是国家大得济的勾当有”，^③对这项大宗经济效益也十分重视。

【管理机构】 宋代管理市舶事务即海外贸易的机构是提举市舶司或市舶提举司，简称市舶司。宋代中叶以前，市舶使多由地方官或转运使兼任。自北宋后期起始置专官。市舶司的主要职责，是办理中国舶商的出海许可书，检查中、外商船的进出口货物，防止违禁商品的出入，征收关税，购买政府需要的部分商品，称为官市或博买（这主要是在宋代），负责外国船舶和商人的管理。关税形式主要是按定额抽成的实物税，称为抽分或抽解。抽分比率按“粗色”货物（即一般货物）和“细色”货物（即贵重商品）两类而高低不同。细色货物的抽分率较高。元代除抽分之外，又另征舶税，以船货的1/30为率。

北宋先在广州、杭州、明州置市舶司，称为“三司”，后来又增设泉州、密州市舶司和秀州华亭（今上海松江）市舶务，镇江、平江（今苏州）税务监也受命兼理市舶事。南宋时，始终置司于广州、泉州，两浙地区市舶司下有六个市舶务，包括临安、

① 《元史》卷一〇《世祖本纪》。

② 《经世大典序录·市舶》，《国朝文类》卷四。

③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8，“市舶则法二十三条”。

明州温州、江阴和秀州的华亭与青龙镇（今上海青浦东北），元一代始终设置司的城市有泉州、庆元（今浙江宁波）和广州三地。

宋代海外贸易最为发达的城市仍为广州。清《粤海关志》引北宋毕仲衍《中书备对》关于1077年对外贸易的统计数，三司所收乳香共354,449斤，其中由明州收进者4,739斤，杭州所收637斤，其余全部由广州所收。《粤海关志》说“是虽三处置司，实只广州最盛也”。南宋时候，泉州的海外贸易很快发展起来，到宋元之际，遂超过广州，至是迄于元末，它始终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商埠。

【海上商业交往的范围】 宋元时期先后与中国发生海上贸易的南部及西南部国家，包括南中国海、印度洋的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湾，非洲东岸的沿海及海岛诸国。元代已经将上述海域划分为东、西洋，二者以马六甲海峡东端为界限，并且还进一步将东西洋划成大、小东洋，大、小西洋等海域。^①

宋赵汝适记南海“蕃国”及其物产，范围远及东非。他记载的有些国家和地区，未见与中国有通使关系，但是却通过商人往来其间，发生直接的民间贸易关系，如印度半岛西南端的马拉八儿之地和麻逸国都属于这种情况。^②也有一些被赵汝适载录的地区或国家，可能在宋代没有与中国发生直接贸易关系，其商品和有关消息，通过中介贸易商人而抵达中国。当时南海中的三佛齐，是一个著名的国际商品中转地。“其国据诸番来往之要津，遂截断诸国之物，聚于其国，以俟蕃舶贸易耳”。^③“大食边海等处”则经

① 苏继庠：《岛夷志略校释》（中华，1981年）载张翥序，《大德南海志》（残本）卷。

② 《诸蕃志》卷上，“南毗国、故临国”、“麻逸国”。按南毗、故临都在马拉八儿地区，麻逸即菲律宾民都洛岛。

③ 《诸蕃志》卷下，“脑子”。

常垄断与东非沿岸的贸易，转贩东运。交趾商人也时常经营“贩卖外国物”的中介贸易。所以，赵汝适所载录的那些国家，不一定都在宋代与中国发展了直接贸易关系。尤其是关于宋代中国与非洲的直接经济交往，目前尚无史料可加以确认。

元代中国的直接通商范围，在宋代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扩大。元代中后叶，江西人汪大渊先后两次附舶出洋。归国后写成《岛夷志略》一书，记“其身所游览，耳目亲见”共99条，节录前人旧记异闻一条^①。据此，中国舶商已直航非洲东岸的层拔罗（今桑给巴尔及其邻近地区），这与元朝与非洲东岸国家通使的事实恰相契合。汪大渊所随行的中国商人，还到过阿拉伯半岛的天房（麦加），以及两河流域北部的马阿斯离（今译摩苏尔）等地。

西航行商的中国商船，比阿拉伯船只为大、小者有百余乘员，大者数百至上千人。宋时中国商船西行，相当一部分以马拉八儿海岸为终点，从该地再换用阿拉伯“小舟”继续西航。^②据阿拉伯舆地著作记载，阿拉伯半岛沿岸有中国船只不易通过的礁滩两处，就是因为中国船舶船身大吃水深。阿拉伯舶商东来经商，也往往在马拉八儿改易中国大舟继续航行。元代似未见有关易舟的材料。中国船只多直航波斯湾口的忽里模子（今译霍木兹），也有更往西直航红海湾乃至北非、东非的。

当时海船必须乘信风东、西行。一般在冬天借东北季风出洋西南行，借夏天的季风至中国。

从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纺织品、瓷器、陶器、金属及金属制品、日用杂品和茶、酒、粮食、盐等农副产品；从各国输入的，主要是珍宝异物、布匹、香料、药物等等。

^① 《岛夷志略后序》。

^② 《岭外代答》卷3，《航海外夷》。

与陆上贸易的情况一样，海道“朝贡”对“入贡”一方来说，实际上也是一种贸易形式。包括伊利汗国的“朝贡”也带有贸易性质，有时一年中它的朝贡使臣竟多达五次^①。对宋元政府来说，为维持“上朝”的体面，往往要向入贡国家颁赐超过贡品价值的“回赐”，这成为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所以，南宋初期曾以“敦尚俭约，例罢诸方贡献”为辞，诏令边城对“入贡”使臣“宛转谕还”，其所携贡品就近发市舶司依条例抽买。^②对于民营的蕃舶来中国经商，情况当然就不一样了，这是宋元政府都竭力予以招徕的。^③

三、与日本、高丽的商业往来

【两宋与日本的贸易】 894年，日本天皇下令停派遣唐使，中日两国邦交断绝。从醍醐天皇在位期间（898年至930年）起，日本实行锁国政策，禁止本国商船出洋。因此，北宋时期，只有中国商船航日。据日本学者统计，北宋160余年间，共有70多次北宋商船到达日本的记载。^④中国商船一般自明州起航，在日本九州的博多登陆。对于宋朝的商船到日本贸易，日本限制极严，规定来航时间至少要间隔二年。宋船到达博多后，先要报关，交验宋朝市舶司的公文及商品清单。经朝廷审核批准后，宋商被安置在大宰府的鸿胪馆。日本唐物交易使前来检查商品，收购政府所需要的物品，而后其余商品才允许同民间进行贸易。中

① 韩儒林：《元朝史》下册398页。

② 《宋会要辑稿》7864页至7865页，“蕃夷”七之49至“蕃夷”七之52。

③ 关于宋元时期的海上贸易，可参阅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1981年。

④ 藤家礼之助：《日中交流二千年》，张俊彦，卞立强汉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版，第119页。

国出口的商品有绫、锦等丝织品，沉香、丁香、麝香等香料，紫檀、白檀、甘竹、吴竹等竹木及鸚鵡、孔雀等，还有宋代印刷的各种书籍。宋朝从日本运回的商品有砂金、珍珠、水银、泥金画、屏风等工艺品，而尤以硫黄为大宗。

北宋、南宋之际，与日本贸易中止了数十年。随着日本镰仓幕府的执政以及南宋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中日民间贸易比北宋时期更为活跃。不仅有大批宋人商船来到日本，日本商船也经常到中国和高丽贸易。到达中国的日本商船有时一年多达40至50艘。^①这个时期的中日商品交流，除与北宋相同的那些外，日本输出品中的优质木材，中国输出品中的铜钱都占有突出地位。尽管南宋政府“鉴于钱荒”三令五申，禁止铜钱外流，^②日本政府也不止一次禁止在国内行用宋钱，但由于日本民间流通的需要，双方的禁令都未能明显致效。

【日、元间的商业交往】 元朝前期，中国与日本政府处于战争状态，但两国之间仍时有民间商业交往。1277年，日本商舶到中国以黄金易铜钱，元朝政府特命许之。1278年，元廷又诏令“沿海官司通日本国人市舶”。^③两国战争结束后，尤其是14世纪以后，贸易往来呈现出很活跃的局面，甚至镰仓幕府也参与了对元贸易。元代中日商船往来，有记载的即达40余次，实际远不至此数。日本还招聘中国雕刻工匠以发展印刷业。

从南宋到元代，来航的日本船员与中国口岸官员及沿海百姓发生武装冲突，在中国沿海地区焚烧杀掠的事件逐渐增多。元朝政府开始在江南沿海重视防备“倭寇”的问题。

【辽、金与高丽的贸易】 10至13世纪先后在北中国建立的

① 陈高华、吴森：《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第38页。

② 铜钱外流的去向，包括金朝、“塞外及南番诸国”，不仅仅是日本。

③ 《元史》卷一〇，《世祖纪》。

辽、金两朝，都在政治上与高丽构成宗藩关系。但除“人贡”和“回赐”的记载外，它们之间的有关贸易关系，尤其是民间贸易关系，几乎全无记载。从《高丽史》透露的一些消息来看，金和高丽两国都禁止在边境上互市。1185年，高丽王虽知“禁两国互市”，还是接受了与金接界的军事将领用布换来的“契丹丝”500束，供宫廷享用。1216年，高丽商人不顾禁令，卖谷米给金人。边境上“潜隐互市不绝”、“争射厚利”。^①可见两国之间的民间贸易并没有完全断绝。

【宋与高丽的贸易往来】 高丽对宋的通使关系，除在11世纪中叶曾中断过40余年外，一直持续不断。这种通使关系，除了政治目的，也具有贸易的性质。高丽“贡”品有金银器物、铜器、人参、香油、青鼠布、硫黄等，宋朝的回赠主要是绢丝、银器、书籍。高丽使臣还经常就回赠物品的种类向宋代提出很具体的要求。

两国民间贸易相当发达。据《高丽史》载，1012年至1192年间，宋商船航高丽共有117次，其中77次有具体人数，总数为4500余人。^②商船先由登州放洋，11世纪70年代起一般改从明州起航。高丽商船也不时到宋朝贸易，经常因遇风险，得到宋朝很好的关照。由于宋钱大量流入高丽，所以宋政府曾下令禁商人持铜钱入高丽。

【元与高丽的贸易】 忽必烈初期，元曾与高丽开榷场互市，但不到两个月，又被元政府取消。以后，两国间由于战争中断关系。13世纪后期，元与高丽的关系逐渐好转。中国商船经常来往高丽，或经高丽往日本贸易。高丽为了应付对元廷的“朝觐、

^① 《高丽史》卷二二，《高宗世家》一。

^② 朴真爽：《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页。

馈遗、国聘等事，家抽户歛，征科万端”。^①看来高丽对元朝的“朝贡”，并没有获得如同一般人贡国那样的商业利益，而是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

第二节 禅宗、儒学及中国制度文化的 向外传播

一、对高丽的影响

朝鲜半岛北部，历史上一度属于中国版图，或为中国属国，因而半岛曾长期处于汉文化圈的范围之内。高丽建国之后，各种制度设施多仿效中原王朝。本节所述，以宋元时代儒学及部分仪文制度对高丽的影响为限。

【官制】 高丽国初建时，“三省、六尚书、九寺、六卫，略仿唐制”^②；到成宗（982年即位）又作调整，各项制度渐臻完备，其受宋制影响不是太明显。到13世纪，高丽曾仿元朝设置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政府机构，被元朝皇帝视为僭越，遂改为金议府、密直司、监察司等，

元代高丽国王的宿卫部队中，有一支以充作人质的贵族子弟组成的宿直军，称为忽赤（蒙古语 qurchi，译言弓手）。忽赤军被分为四番，轮流值宿，每番三昼夜。这套制度即仿效元朝的“四怯薛”制而来。

高丽建国30年后开始实行科举制度，主要取唐制加以损益，但显然也逐渐受到宋代科举制的影响。如考试时糊名的作法系来源于宋制；高丽朝官在讨论科试制度的改革时，亦曾引证宋儒范

① 《高丽史》卷七八《食货》一。聘是携带礼品朝会的意思。

② 《高丽史》卷七六《百官》一。

仲淹等人的主张。到了元代，高丽科举制度又采纳元制，确定了乡试、会试、殿试以为常试。

【其他仪文法度】 12世纪初，高丽政府援引“西北二朝（按指辽、宋两朝）行之已久”为例，宣布鼓铸之法，“以兴使钱之利”。有关上述问题的另一道诏文写道：“文物法度，则舍中国何以哉”？^①

高丽向元朝称臣之后，在正式场合多著蒙古衣冠。朝中自宰相至下僚，“无不开剃”，即按蒙古习俗“剃顶至额，方其形，留发其中”。最初宫禁中学馆的生徒未剃发，后来也都被迫开剃。直到14世纪80年代末，高丽“始革胡服，依大明制”。^②

宋元时代传入高丽的汉文书籍为数极大，有很多精通汉文的高丽学者或僧人往来于两国之间，也有不少中国人随商舶到高丽，被留在那里做官。元朝中叶，禅位的高丽王王璋，曾尚公主，与元室结为“甥舅之好”，长期寄居大都，又出游江南，与当时一批著名的文人学士有广泛的交往。

二、禅宗东传日本

【南宋时代】 禅宗到南宋时期已在中国发展成熟。日本僧人到中国学习禅宗者超过百人，其中最著名的有荣西和道元，后来分别成为禅宗临济宗和曹洞宗在日本的始祖。一些中国的禅宗高僧也到日本传教，以道隆、祖元最为著名，分别是建长寺和圆觉寺的始祖，深受日本人民崇敬。

宋代中日两国在建筑、印刷、绘画、书法、文学、医学、饮茶等方面，也都有广泛的交流。

① 《高丽史》卷七九《食货》二。

② 《高丽史》卷七二《与服》。

【元代】 由于日本禅宗的发展，元带来华的日本僧人数量激增。仅史籍上留下名字的就有220人之多。他们一般游历江南的禅宗寺院，有时在一个寺院参禅的日本僧人竟达32人。这些僧人多倾慕中国诗文、绘画。日僧邵元，所撰碑文，华瞻流畅，扩大了两国间文化交流的范围。

对日本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元朝僧人一山一宁。他于1299年奉元成宗之命召日本政府入贡，从此留居日本二十年，最后死在那里。一山一宁在京都、镰仓传教，以自己的高风硕德，博学多才，受到朝野的尊信。死后封为国师。由于他的活动，以京都为中心的“朝廷禅”发展起来，取代了以镰仓为中心的“武家禅”的统治地位。一山一宁对儒、道、百家和理学都有很深的研究，他的日本弟子虎关师鍊在他的启发和指导下，成为日本最早研究程、朱理学的学者。理学和禅宗学说融为一体，对日本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对交趾的影响

1007年，交趾黎氏王朝“定文武官制，一遵于宋”。^①交趾国制度自身有很多特点，但根据上引安南汉文史料，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宋制的影响，当是事实。大乘佛教的许多经典也在黎氏王朝时期从中国传来交趾。李氏政权到陈氏王朝时期，安南史料称“太平日久重儒风”。^②这种风气，同宋朝标榜养士重儒的国策，不是没有关系的。

1058年，交趾使臣从宋朝南归后对国王说：“臣到宋国，见庭中有铜匱以受四方之章疏”。交趾国也采纳了这种接受举报和

^① 《越史略》卷上。

^② 《安南志略》卷二〇《图志歌》。

建议的办法，“置案于朝廷，……旬月之间，书疏填满”。^①

四、蒙元制度文化的西传

【对伊利汗国的影响】 伊利汗朝对波斯地区的统治，曾一度中断了当地政治制度的传统。随着蒙古人完成对这一地区从军事征服到政权巩固的过渡需要，尤其是随着伊利汗朝统治者皈依伊斯兰教，当地传统的行政和宗教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又逐渐得到恢复；与此同时，伊利汗朝制度中仍有很多方面始终保留着蒙元制度文化的影响，并且还通过伊利汗政权传给了它的后继王朝。

为保持立国于波斯的强大武力后盾，在军事方面，伊利汗朝实行蒙古的十进位千户、百户制度，来组织和调度军队。为保障军队的供给，伊利汗国将蒙古原有的对各级将领分配、授予军事统领权的莎余儿合勒（Soyurqal）制度，与波斯地区流行的伊克塔（iqta'）制度相结合，形成一种特别的军赋给养制度。抽发军事贵族子弟分番入值的制度即蒙古“怯薛”制^②，也一直被保留下来。与大部分蒙古人原先所信奉的原始宗教即珊蛮教有关的那些宫廷仪典法度，在伊利汗王室改信伊斯兰教后可能逐渐废止。但蒙古“国俗”并没有完全改变。例如集中波斯地区的诸族各支宗王以及其他贵族商定国家大事，并且进行大规模赏赐和宴乐的“大聚会”（忽里台，quriltai），在伊利汗国的历史记载中时有所见。

伊利汗乞合都（1291—1295年在位），曾仿效元朝，在全国发行纸币，并严禁使用原有金属通货以强制推行新币。纸币为长

① 《越史略》卷下。

② 怯薛突厥—蒙古语，即“宿卫”，指蒙古、元朝禁卫军。由那颜子弟担任，分四番入值，护卫皇帝，又称四怯薛。

方形，上面印有汉字和阿拉伯文的《古兰经》经文“除真主外别无神明，穆罕默德是真主使徒”。纸币上还印有下列语句：“伊斯兰教历693年（公元1294年），世界的君主发行此种吉祥的钞票（chāo）。任何涂改或损毁纸币者，全家处死，财产充公”。^①由于人们的强烈反对，纸币仅两个月便完全失败，被迫废止。这时进入波斯语的汉语“钞”（chāo）字却一直保留至今，译言纸币。

蒙古的驿站制度，包括置站、驿马、牌符凭验等一整套完整的设施，也被引入伊利汗国。

伊利汗朝时期，有不少中国学者访问波斯，并长期留居在那里，把有关中国历史和制度文物的知识直接传播到波斯。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化，对伊朗的纺织品、陶器、小彩画，以及以莲花、凤凰等物为主的图像和方形“库法”字体的出现，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对钦察汗国的影响】 钦察汗国的制度设施，最初同大汗统治地区的制度设置几乎完全一样。到了月即别汗（1313—1341年在位）时代，钦察汗家族改奉伊斯兰教，遂部分地采纳穆斯林世界中最为庞杂的官僚体制即波斯的“底万”（dīwān，译言政府各部）组织来实施政治统治。但蒙古旧制在许多方面仍继续保留下来。划分为左右翼的千户、百户军事制度，东西横亘钦察汗国全境的驿站及其管理制度，由札鲁忽赤（jaruqochi，译言断事官）执掌国法的制度（14世纪以后与执掌伊斯兰法律的法官“哈的”并行设置），都继续是钦察汗国的主要制度设施。蒙古宫廷的有些仪典照旧举行。15世纪初叶的一位日耳曼游历家记述他目睹的一次推选钦察汗位的忽里台大会说：“当他们选出国王后，

^① 布朗：《鞑靼统治时期的波斯文学史》，伦敦，1920年，第37至38页。

拥之坐于白毯上，将他高高抛抬三次。而后举着他绕行帐幕，置之于王座上，将一把宝剑放在他手中。然后他必须按旧俗宣誓”。^①

由于钦察汗统治着当时的俄罗斯各公国，蒙古制度甚至还被引进了这些公国。除诺夫哥罗德地区以及受免税优惠的教会地产上的人口之外，全部俄罗斯人口都按万户、千户、百户和十户的编制划分，据此征发相应的兵丁和军赋。向被统治的农耕定居地区派遣达鲁花赤^② (daruqači)的制度，也在13世纪的俄罗斯各公国实行过。不过使用了这个官职的相应突厥语名称，即八思哈 (basqaq)。

钦察汗国的蒙古人本身受南俄草原人数众多的突厥语游牧民影响而逐渐突厥化，这种融合的结果产生了所谓：“鞑靼人”。到15世纪中叶，“鞑靼语”成为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二世宫廷中的时髦语言。瓦西里被他的政敌指控为偏爱“鞑靼人”和他们的语言。^③ 钦察汗国期间，不少蒙古语辞进入俄语，一直使用到今天。

第三节 西方宗教在中国的传播

一、伊斯兰教的传人及其影响

【传人喀喇汗朝】 大约在9至10世纪之交，伊斯兰教的苏

① 弗奈德斯基及卡尔鲍维奇：《俄国史》卷三，《蒙古人与俄国》，（伦敦），1953年，第210页。

② 蒙语“镇守者”为所在地方、军队和官衙的最大监治长官，掌握最后裁定的权力。

③ 弗奈德斯基及卡尔鲍维奇：《俄国史》卷三，《蒙古人与俄国》（伦敦，1953年），第387页。

菲派教士进入中亚地区的突厥语部族中从事传教活动。喀喇汗朝萨图克·博格拉汗在儿时已接受伊斯兰教，他登上汗位后开始在全国推行这一宗教。他儿子木萨继位后，于960年定伊斯兰教为国教，有二十万帐突厥语部族皈依伊斯兰教，喀喇汗王朝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伊斯兰突厥王朝，从此开始了突厥族各部落的伊斯兰化。喀什噶尔成为喀喇汗王朝的宗教文化中心。喀喇汗王朝通过“圣战”归并和田后，伊斯兰教取代了这一地区的佛教。11世纪中期，穆斯林世界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哈里发承认喀喇汗王朝统治者为正统的教徒，并赐予荣誉称号。喀喇汗王朝冲制的钱币上也以哈里发作为最高宗主。随着宗教的传播，阿拉伯—波斯文化在突厥语部族中传播日广，并同他们固有的文化相互渗透和融合，在喀喇汗王朝境内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伊斯兰—突厥文化。在突厥世界占有崇高地位的两部著作：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和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典》，就是这种新文化的代表。它们奠定了今天世界上突厥语各民族绚丽多彩的文化的文化的基础。

【西辽时期的伊斯兰教】 在喀喇汗王朝统治时期，伊斯兰教虽定为国教，但边远的游牧部族并未接受伊斯兰教。西辽在中亚建国后，伊斯兰教失去独尊的地位，各种宗教都在居民中争取信徒。伊斯兰教中的有识之士看到了各种宗教间这种“和平竞争”局面的严重性，积极主张通过改革伊斯兰教，增强同异教竞争的力量。这种改革派的代表人物，是苏菲派晒赫阿赫马德·亚塞维。他用明白易懂的突厥语写诗，宣传自己的教义。亚塞维教义的核心有两点：一是禁欲，反对奢侈享乐，提倡艰苦简朴。这种主张很易于平民接受，用以反对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二是恭顺，即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恭顺听命”。这种主张统治阶级易于接受，用以要求平民俯首听命，任其剥削。亚塞维又大大简化

宗教仪式，并吸收了一些当地宗教的神名和仪式。这样，他的教义和仪式很快被广大游牧部族所接受，形成一个新的教派——亚塞维派。12世纪末，中亚大部分地区的突厥部族基本上实现了伊斯兰化。

【宋元时代的伊斯兰教和回回人】 宋代中国的伊斯兰教信徒，几乎完全是留居东南沿海广州、泉州、扬州等港口的“蕃客”，或者唐代入华的“蕃客”后人。在蒙元时代，上述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局面大为改观。蒙古军西征时从中亚俘获的工匠、平民，先后从西域签发的军队，大批地进入中原汉地和南方，其中很多是伊斯兰教徒；还有一些人仕元朝的官员与来华经商的穆斯林，也来到大都及各地。他们同早在唐宋时期来到中国定居下来的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大食人的后裔一起，形成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当时称之为“回回”，是今日回族的先民。回回构成元代“色目人”的主体，在政治地位上高于汉人和南人，不少人在中央或地方政府担任要职，也有不少人经商谋取厚利，“不复回首故国”。元朝初年户口统计时，仅中都（后改称大都）一地回回就有三千户左右；更多的回回散布在中国各地，故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① 元朝在中央专设回回哈的司，^② 依据伊斯兰法掌管本教门的宗教活动、户婚、钱粮等词讼。各地也设置相应的机构，专管回回事务。元代伊斯兰教虽已传播到中国各地，但基本上还是在回回内部以及部分蒙古族信徒中流行。忽必烈的孙子安西王阿难答奉从伊斯兰教后，用教会手段使所属15万军队中的大多数人都成为穆斯林。这是元代伊斯兰教的一大盛事。

伊斯兰教徒在元代进入中国的路线，分陆路和海路两道。河中及呼罗珊东部的回回人，多取道陆路来华，往往也比较集中地

① 《明史》卷三三二《撒马尔罕传》。

② “哈的”，阿拉伯语意为“法官”。

居住在华北各地。呼罗珊西部以及更西地区，或者从那里辗转东南亚的回回人，坐船来中国更为方便，分布在泉州、扬州、广州等地的穆斯林商人大多来自这些地方。元代北方伊斯兰教的文献、文物中留下的波斯文化的明显痕迹，同南方伊斯兰教文物中的阿拉伯文化痕迹，或许正反映了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的某些地区性差异。

二、基督教及其它宗教的传播

【基督教再次传入中国内地】 最初传入中亚和中国的基督教，是被正统派视为异端的聂思脱里教派，汉文史料称之为景教。唐武宗于845年下令取缔景教，这以后，在内地很少再见它的活动；但是在西北地区仍有不少部族信奉景教。西辽在中亚建国后，对各种宗教实行开放政策，景教也获得较大发展。总主教伊尔亚三世在喀什噶尔建立了聂思脱里总教区，包括七河地区在内。

元代早期称聂思脱里教徒为迭屑，后来更为普通的叫法则为也里可温。这一教派的主要传播地区有唐古特和汪古居地等，在大都和江南一些地区也有它的信徒。元朝中央设有崇福司，专管也里可温教门的事务；全国各地设有也里可温掌教司，一时曾达到72所。这一时期，罗马教皇也派出大主教孟特哥维诺来中国传教。经过孟特哥维诺的活动，天主教在大都传播开，先后约有6000人受洗礼，并建立了几个教堂，还向泉州派出主教，主持那里的教务。但是天主教派一直受到聂思脱里派的排挤，两派斗争相当激烈。据孟特哥维诺自己说，他已将《新约全书》和《诗篇集》全部译成蒙古语，“并已叫人用美丽的字体缮写出来”。^①

^① (英)道森：《出使蒙古记》，吕浦汉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265页。

不过基督教经典的蒙文译本，似乎没有得到广泛的流传。

【犹太教的东传】 犹太人进入中国内地的时间，有周、汉、唐诸说。据穆斯林史料记载，唐代广州已确有犹太人。但是犹太教作为一个社团出现，其信奉者在中国内地定居下来，却是宋代的事。开封是当时犹太人聚居的地方，当时称犹太教为“一赐乐业教”。^① 开封的犹太清真寺建立于金代（1163年）。

西辽王朝在中亚建国后，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大批犹太人移居西辽帝国境内。在花拉子模的首府玉龙杰赤，有8000犹太人居住；在西部喀喇汗王朝的首府撒马尔罕有较大的犹太教社团；一些边远城市也有犹太教社团在活动。

元代称犹太教和犹太人为术忽、术忽歹。这时候，由于东西交通的开拓，又有一些犹太人移居中国。从河中等地东来的犹太人，自然走陆路较为近便。更西面的犹太人要远赴中国，也有可能循海路而来。除了开封以外，还有一部分犹太人定居在大都和沿海地区。

【宋元摩尼教的活动】 摩尼教在唐代即已传入中国，当时其信奉者多为胡人或回鹘人，在汉人中并未得到传播。843年唐武宗取缔摩尼教后，长期未见到关于这一教派活动的记载。入宋以后，摩尼教又活跃起来，且多在沿海地区。因此，一些学者认为，这时的摩尼教乃是从海上再次传入中国内地的。但是经过林悟殊深入研究，证明它“由唐代北方流行的摩尼教一脉相传下来”。^② 843年后，少数摩尼教徒转入地下，继续从事宗教活动，从此在中国民间传播开来，经过一百多年，其势大炽。宋代摩尼教称为“明教”，它已相当汉化。教义上更多的接受了道教的教义，所以摩尼教的经典一再被当作道教经典，进入钦定的《道

① 此为希伯来语，yisrael 的音译，现在的通译则作以色列。

② 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中华书局，1987版，第122页。

藏》。从活动上讲，它主要在汉人中，特别是在江南农民中，所以常常同农民起义连结在一起。摩尼教在宋代屡遭政府禁止，但到元代它仍流行于东南沿海一带，在两浙、福建很有力量。

【中外佛教的交流】 宋代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佛教交流仍史不绝书。不少印度僧人持梵文经典前来中国，也有不少中国僧人不远万里去印度求法。中国印制的佛经，还因日本、高丽私人或政府的请求，被赠送给这些国度。

第四节 科学技术的交流

一、中国科学技术的外传

【印刷术】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到宋元时期，中国已出现铜版印刷、木活字印刷和双色套印法。纸牌的雕版印刷14世纪下半叶从波斯阿拉伯地区传到西欧；到15世纪中叶欧洲才开始以雕版印刷书籍。学者们一般都同意波斯地区以雕版印刷纸牌，应当是受宋元时期中国印刷术西传的影响。14世纪前期，合赞汗的一位“桂冠诗人”、河中人巴那卡梯在《智慧花园，伟人历史及宗谱之书》一书中，带着赞美的口气，详细地介绍了中国雕版印刷书籍的过程。他的叙述，证明这时候波斯地区开始了解中国书籍印刷的有关知识。

雕版印刷术东传高丽，并在那里成为大规模应用的一种技术，是在11世纪初期。

【火药和管形火器】 采用火药的燃烧性和爆炸性投掷火器（“火炮”和“铁火炮”，即用抛石机掷出的火药盛器），以及燃烧性和爆炸性的管形火器，在宋代中国都已用于实战。在元朝后期，在中国又出现了金属管火器。

火药最主要的成分之一是硝。西部穆斯林世界较早已用硝入药，并用它作为烧炼玻璃的原料之一。从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以“中国盐” (namak-i chīnī)、 “中国雪” (talj sīnī) 为硝的别名，或可推知它最初是从中国传到上述地区的。13世纪下半叶，西亚地区已知道用硝配制火药。成书于本时期中的哈桑蓝末 (Al-Hassan al-Rammōh) 的一部兵书，提到了用硝 (bārūd) 配制火药 (dawā') 的几种方子。这些方子中提到的成分有“中国铁”、“契丹花”等等，证明配制方法是从中国传去的。大约14世纪前期以后，在阿拉伯语中，用指火药主要成分硝的名词 bārūd，方才转而指称火药本身。

火药传入穆斯林世界的具体途径不很清楚。13世纪中，蒙古宗王旭烈兀西征时，从中原征发了一批 naft andāz 一同征进。andāz 是投掷手的意思。naft 一词在当时波斯语中有硝、液态的“希腊火” (不含硝)、火药等多种词意。旭烈兀带到西域去的 andāz 所投掷的，也许就是宋代兵书中记载的一种注有火药并盛有“猛火油”的火罐。14世纪前期，埃及历史家乌玛利也提到过一种注有硝 (bārūd) 和石脑油的投掷火器，它同前述火罐似乎颇为类似。从这些线索推断，火药西传或与旭烈兀西征有关。西欧人关于火药的知识，则是通过穆斯林世界的中介而获得的。^①

管形火器在上述哈桑蓝末书中亦已见著录，称为箴德发 (midfa')。西欧管火器的使用，始于14世纪30年代或略早。穆斯林世界的箴德发，应该源于中国的“火筒”；而西欧的管火器又当源于箴德发。

俄国人使用火药和管火器，始于14世纪后期，他们很可能不

^① 见冯家昇：《火药的由来及其传入欧洲的经过》，载《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和科学技术人物论集》（北京，1957）；《伊斯兰百科全书》新版卷一（莱顿，1979年），“火药” (Bārūd) 条。

是通过蒙古人，而是通过不里阿耳人从穆斯林世界，以及通过波希米亚从欧洲学得火药和火器使用的。^①

【罗盘针】 中国很早就发现了磁石的指南性，并根据这个原理制造陆用指南仪。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一书，记载了以人工传磁方法制成的四种指南针。北宋末的史料中首次出现在南海航行中用指南针导向的记录。“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②用于舟师的指南针，可能以水浮指南针为多，装置于子午盘或罗盘中，形成所谓“针盘”或罗盘针。罗盘全周360度，分为24等分（24向标识用于陆上指南仪不会晚于汉代）；后来再以两“正针”间夹缝等分，共48向。在现存史料中，航海使用罗盘针位（“针位”）的记载，首见于元代周达观《真腊风土记》。但中国在航海实际中使用针盘指示的针位导航，显然还要早得多。

穆斯林文献中出现关于罗盘使用的确切记载，始于13世纪初叶。而欧洲文献记载罗盘还略早一些，在12世纪末。13世纪初期西方人自己承认，他们使用的罗盘，最早是由中国人发明，经过阿拉伯中介传入西欧，^③不过欧洲罗盘不用水浮法，而且最初一直采取32位的定向标识。

【药物】 中国药材大量输入阿拉伯各国。牛黄约在12世纪以前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各国。中国医药很早传入越南，宋时中国人去越南卖药或越南人来中国买药的很多。宋末，元军南下，陈圣宗遣陶世光至龙州即以买药为名，打探元军情况。^④越南的使君子、麒麟竭、藿香等于宋时传入中国，丰富了我国的药物。

① 见弗奈德斯基、卡尔鲍维奇上引书383页—384页。

② 朱彧：《萍洲可谈》卷二。

③ 见程溯络：《中国古代指南针的发明及其与航海的关系》，载《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和科学技术人物论集》。

④ 《大越史记》陈圣宗纪卷五。

波斯市场上的中国药材价格昂贵。伊利汗合赞时期，根据中国药材识别西亚的同类植物，由此发掘出部分新的西亚草药。^①孙思邈的《千金方》也在元代流入波斯，并被译成波斯文。

【天文历算】 宋元时代中国的天文推步之术，其精确程度超过西域的一些计算方法。旭烈兀西征随行人员中，包括“屠密迟”（译音）等中国天文历算家。伊朗著名天文学家纳速拉丁·途昔编写《伊利汗天文表》(al-Zīj-iĪkhānī)时，曾向他学习中国推步之术。

【棉纺技术】 宋元时代东传技术中，除印刷术以外，最重要的当推元代传入高丽的棉纺技术。其具体时间，诸说不一，一般以为《高丽史》的记载较为可靠。据《高丽史》，1364年至1365年间，高丽使臣文益渐从元朝将棉花种籽携带回国，交给他舅舅郑天益试种。以后郑天益又在元朝一名蒋姓僧人（一说为印度僧人弘愿）帮助下，制成“取子车”（轧花机）与“縑丝车”（纺纱机）。高丽的棉植业和棉纺业由此迅速发展起来。

二、西方科学技术的东传

786至809年，在位的阿拔斯哈里发拉希德，在报达建立了一个以希腊语文献为主的图书馆“智慧宝库”。在他儿子马蒙（813—833年在位）时代，又建天文台于报达，并将“智慧宝库”扩充为一个希腊文书籍的专业翻译机构“智慧之馆”。从9世纪起，从大量的翻译活动着手，开拓了以哲学、逻辑、医学、数学、天文学、炼金术等外来学术为主的阿拉伯文化的繁荣时期。在这个时代，古希腊一大批学术著作被译为阿拉伯文，同时

^① 拉施特：《史集》汉译本卷三（商务，1986），第355—356页。

也造就出为数众多的波斯阿拉伯大学者。伊利汗朝对波斯阿拉伯地区的统治，为上述文化传入中国开辟了一条很便利的渠道。由此传到中国的科学技术，有经过阿拉伯波斯译介或已经阿拉伯波斯化的天文学、数学、医学知识以及部分其他技术。

【天文历算】 1267年，应忽必烈之召到达中国的伊利汗国蔑拉合天文台的天文学家札马鲁丁向元廷献“西域仪象”七种。《元史·天文志》载录了它们的波斯语名称及形制用法。包括赤道式浑天仪（“咱秃哈刺吉”，*Dhātu al-halaq-i*，译言“多环仪”）、天球仪（“苦来亦撒麻”，*kura-i samā'*）、地球仪（“苦来亦阿儿子”，*kura-i ard*）等。^① 札马鲁丁和其他几名穆斯林天文学家，后来又在元朝的“回回司天台”任职。

札马鲁丁在献仪象同时，又上“万年历”。在这前后，使用的金代重修“大明历”，因为“岁久渐疎”，与天象脱节，引起元廷很多议论。但札马鲁丁进献这份回回历法后，大明历似乎仍在用，直到郭守敬等人编成的“授时历”颁行后，大明历才正式废止。万年历或许只在短期内行用过，或者只在回回人范围内颁授使用。元廷后来亦曾逐年推算另造回回历，颁赐给河西等地的穆斯林信徒使用。

【数学】 欧几里得、阿基米德、阿波多尼等古希腊数学家的著作，这一时期都被译为阿拉伯文。在元代，古希腊数学著作以及其他一些穆斯林和欧洲数学家的作品，往往以回回文本传入中国。元秘书监收藏的《兀忽列的四肇算法段数十五部》，即欧几里得的几何学著作。阿拉伯文 *kitāb uqlīdis fī al-Hisābī*，译言“欧几里得算学之书”。兀忽列的即欧几里得异译，四肇即〔Hi〕*sābī* 音译，译言算学。秘书监藏书中还包括其他一些回

^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汉译本，第四卷，第二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475至479页。

回文的数学著作。另外，郭守敬或许已经开始应用三角学方法，这也应当同札马鲁丁等回回学者的影响有关。^①

1956年冬，在西安市郊元安西王府旧址出土五块铁板，上有使用阿拉伯数码刻画的六行纵横图，是当时穆斯林信徒镇魔避邪的用物。^②可见阿拉伯数字在元代也已传入中国。

【医药、回回炮术及其他】 随着大批西域人进入中国，回回医药也传播开来。元朝设广惠司、回回药物院等机构，管回回医药。秘书监藏书中有《忒毕医经十三部》，是一部回回医学著作。忒毕即 Tibb 音译，译言医学。阿拉伯地区的药物输入中国，数量很多，大食使臣向宋赠送的方物中，香药的比重很大。阿维森纳发明丸衣的方法，也很快传入我国。阿拉伯医学家拜塔尔的一部名著《简救法》，元代或已译为汉文，就是明初刻本《回回药方》。元代皇室食谱《饮膳政要》中，也记有很多回回食物、药物和方剂。还有不少回回人散居民间行医卖药。回回医学在当时社会中经常被视为“奇术”。

在火药与用硝的火器传入西域的同时，穆斯林的巨型抛石机即回回炮也传入中国。忽必烈为进攻南宋，专门从伊利汗国召回回回炮手军匠来华。他们制造的回回炮，提高了元军在攻坚战中的摧毁力。灭宋以后，元朝专设回回炮手军匠万户府，使不致失散民间。

大量回回下层工匠、平民长期移居中国，带来了西域各行业的工艺技术。嵌以金、银丝的回回织锦缎（“纳失失”）一直是元代的一种高级消费品。波斯的“舍里必”（果汁）也成为元朝上层社会十分喜欢的饮料。

^① 见李约瑟上引书卷三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234—235、329页。

^② 杜石然：《试论宋元时期中国伊斯兰教国家间的数学交流》载《宋元数学史论文集》（1966年）。

第九章 明代对外关系

明初的对外政策具有两重性。一方面，遣使四出，广加招徕，力图与周边各国建立起正常友好关系。朱元璋吸取了元朝征讨日本和爪哇失败的教训，将朝鲜、日本、安南、真腊、暹罗、占城、爪哇等15国列为不征之国，谆谆告诫后世子孙不可“贪一时之战功，而无故兴兵”。^①这对发展中外友好睦邻关系起了良好的作用。另一方面，明王朝推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禁止私人出海贸易，也不准外国商人来中国经商，从而严重限制了中外交往的发展。与宋元相比，明王朝显得较为保守和内向。永乐时一方面继续实行海禁，另一方面对海外朝贡国家实行较为开放的政策，并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达到了朝贡贸易的鼎盛。这是亚非友好关系史上光辉的一页。郑和下西洋实际上是宋元时期航海事业大发展的余绪，或说是回光返照，不久即销声匿迹。

因有所谓倭寇问题，中日关系一直不谐。嘉靖时引起全国震动的“倭患”问题，与明前期在中国沿海进行骚扰和抢劫的真倭不同，这时以违禁私出的中国海商居绝大多数，真倭是少数，它明显带有反海禁的性质。隆庆帝接受了“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的经验教训，一即位就宣布“准贩东西二洋”。自此以后，私人海外贸易才得到较快的发展。

明中期以后，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殖民者陆续来到中国沿海。这既是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的直接接触，也是发展阶段不同的两种社会制度的交锋。它给中国带来了机会，也蕴藏着危

^① 《皇明祖训·箴戒篇》。

机。面对着世界急剧变化的新形势和新格局，中国封建统治者却因循守旧，虚骄自大，顽固拒绝新事物和新思想，从而埋下了导致中国落后挨打的病根。

第一节 对外政策及明初与帖木儿帝国的关系

一、明初的睦邻政策

明朝建立后，除了对蒙元残余势力积极防御不时发生战事以外，对周围国家都奉行睦邻友好政策。朱元璋吸取了元朝海外用兵失败的教训，屡次申谕不可轻易海外用兵。他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①因此以和睦相处为上策。

朱元璋一登上皇位，就立即向周围各国遣使通好。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就派汉阳府知府易济出使安南，又遣行人杨载等人往谕日本、占城、朝鲜诸国。以后每年都有数起使臣出使邻国，外国使团也不断来中国朝贡。这正如《明实录》所载：“洪武初，海外诸番与中国往来，使臣不绝”。^②

周围各国相互间发生战争，明廷多次遣使斡旋，劝其息兵和友好相处。例如洪武二年，占城使臣“言安南以兵侵犯”，朱元璋便“遣使往观其事，谕以畏天守分之道。……二国之君，宜听朕言，各遵其道，以安其分。……诏至，两国皆听命罢兵”。^③这对稳定和发展各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① 《皇明祖训·箴戒篇》。

②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五十四。

③ 《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七。

朱元璋还以“祖训”的形式，将朝鲜、日本、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爪哇、溢亨、白花、三佛齐、浣泥等国列为不征之国。朱元璋说：“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之战功，而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①这种政策显然有利于中国和亚非各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表面看来，明王朝与周围各国的关系是一种宗藩关系。周围各国要向明王朝“称藩纳贡”，受中国册封，并由中国赐与印玺、大统历等。实际上，这种宗藩关系只是维系中国和周围各国友好关系的一种形式，并不具有统治和被统治的实质性内容。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文明发展程度较高的统一大国，历来以“天朝上国”自居。周围各国文明发展程度较低，受中国影响较深，力量也无法与中国相比，所以便自称藩属。它们向中国“朝贡”，中国奉行“厚往薄来”的政策，赏赐之物比它们所贡纳的要多出许多。在这种所谓“朝贡贸易”中，周围各国受惠很大，所以来“贡”十分踊跃，致使中国“岁时颁赐，库藏为虚”。^②明王朝不胜其浩繁，便一再对来“贡”的时间、船只、人数严加限制，但各国却不愿遵守，经常提前来“贡”，人员和船只逾数。明王朝为了维护宗主国的尊严，显示中国的富有和宽宏，不惜在经济上作些牺牲。

二、海禁政策的确立及其演变

【明初实行海禁的原因】 所谓海禁政策，就是禁止私人出国贸易的政策。从社会经济原因来看，明初社会经济虽然得到恢复和发展，但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的成分非

^① 《皇明祖训·箴戒篇》。

^② 《明史·西域传》四。

常微弱，因而没有强烈的对外贸易要求。这是潜在的因素。导致明王朝实行海禁的直接原因是当时的政治形势。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为了防备张士诚、方国珍的海上残余势力卷土重来。张、方二人原来都是盐商，以在海上贩盐为业。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他们主要活动在江浙一带，部从都达数十万众，并一度与朱元璋相抗衡。张、方两个集团被朱元璋陆续攻灭以后，其部下大都逃亡海上。明朝建立后，他们继续与朱明王朝为敌，给明王朝造成很大的威胁。他们在广阔海域上，“交舶万艘，常候风潮、毒机矢以待”。^①时刻准备卷土重来。他们不仅在南洋一带建立了许多据点，而且和国内外的反明势力相联络，共谋反明。他们“东借日本诸岛悍夷以为爪牙，而西南接交趾、占城、阁婆、暹罗为逋藪，……而又内结山寇，以为腹心之患”。^②这不能不使明王朝十分警惕。

第二个原因是倭寇问题。元朝时，倭寇就不断到中国沿海骚扰。入明以后，为祸更烈。他们在中国沿海“时出剽掠，扰濒海之民”。^③在1369年（洪武二年）四月，倭寇“数侵掠苏州、崇明，杀略居民，劫夺货财，沿海之地皆患之”。1380年（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发。朱元璋认为，胡惟庸欲借日本之助达到篡逆的目的，所以“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④1419年（永乐十七年），总兵刘荣在辽东望海埚取得了剿倭的大胜利。从此以后，倭寇对中国沿海的骚扰有所减轻，但始终未能消除。这成了明王朝推行海禁的重要原因之一。朱元璋曾明白地说：“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⑤海上的这种严峻形势是明代

① 章潢：《图书编》卷三十五。

② 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三十。

③ 《明史纪事本末·沿海倭乱》。

④ 《明史·日本传》。

⑤ 《明太祖实录》卷七十。

实行海禁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原因。

【海禁的实施】 明廷屡次发布禁令，严禁人民私自出海贸易，“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① 这类的禁令每过二三年就要重申一次。为了从根本上取缔“番货”在中国的市场，还禁止国内人民使用外国物品。例如，当时香木多来自海外，为防止混杂，连两广自产的香木也不准到外地出售。为了防止人民以下海捕鱼为名，私自出海贸易，甚至连沿海人民以渔为业的活动也被禁止。例如，1384年（洪武十七年），朱元璋派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禁民入海捕渔”。^②

海禁政策还被载于《大明律》中。“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物货船车并入官。……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③ 明王朝还以法律的形式鼓励告发，告获者可得到赏银二十两。

明廷允许进行一定数量的朝贡贸易，并设立了专门管理朝贡贸易的机构——市舶司。这是一个由官方严格控制的贸易孔道，它实际上是海禁政策的一部分。这正如《明史·食货志》所说，明廷设立市舶司掌管朝贡贸易，其目的是“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衅隙也”。其中，“通夷情”是最主要的，因它关系到明王朝的安危。“夷情”既明，就能更好地控制国内海商，海禁政策也就能更好地实施了。

明廷还时而在沿海地区征船户为军。1371年（洪武四年）十二月，在方国珍原辖的温州、台州和庆元（今宁波）等地，将“尝充船户者，凡一十一万一千七百余入，隶各卫为军”。^④ 在广东沿海，聚居着一些以船为家、以渔为业的蛋户。朱元璋怕这些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二。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五十九。

③ 《大明律附例》卷十五。

④ 《明史纪事本末·沿海倭乱》。

人私自通番，又难于管理，便下令将广东蛋户万余人征为水军。为了控制沿海地区的通海骨干分子，明政府时而在沿海地区“按籍抽兵”，亦称为“垛集”。汤和曾在浙东四丁抽一，一次即垛得近6万人。这对私人出海贸易来说，无疑起到一种釜底抽薪的作用。

明廷在沿海还广置卫所，派驻重兵，严行稽查，并不断地派军政大员到沿海督修城堡。1384年（洪武十七年），汤和巡视沿海，督修山东和江浙沿海城堡59处。1387年（洪武二十年），江夏侯周德兴在福建沿海督修城堡16处，并增置巡检司45处。这类的工作在以后也屡有兴筑。这都是实施海禁的强有力的措施。

【永乐年间对海外朝贡国家实行较为开放的政策】 朱元璋确立的海禁政策，在建文时期得到严格的执行。明成祖通过靖难之役夺得帝位后，海禁政策仍在实行。明成祖即位之初，两次发布“遵洪武事例禁治”的诏令，以示遵守祖训。但自1405年（永乐三年）以后，为了招徕海外诸国，不断发布有利于发展中外交往的申谕，对海外朝贡国家实行较为开放的政策。

明成祖即位两个月后就宣称，外国贡使除朝贡外，“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① 1403年（永乐元年）又恢复了被朱元璋罢去的浙、闽、粤三地的市舶司。这年九月，日本使团在宁波私自出售兵器，违背了明廷禁令，地方官准备“籍封送京师”，明成祖明确地说：“勿拘法禁，以失朝廷宽大之意”，^② 未予惩治。外国使团以私物与百姓互市，明成祖也给予免税优惠。因此，外国贡使及随贡使来华的商人便越来越多。外国使团中本来就夹杂着一些商人，这时更有一些私商冒充贡使，借“朝贡”之名以得到贸易的机会。

^① 《明成祖实录》卷十二上。

^② 《明成祖实录》卷二十二。

永乐年间还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使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的友谊和交往得到较快的发展。洪武末年，朱元璋“以海外诸夷多诈，绝其往来，唯琉球、真腊、暹罗许入贡”。^①而到永乐五年，即有9个国家和地区的贡使来华。永乐十四年冬，就有19个国家和地区的贡使来中国。永乐末年，“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②

永乐时，海禁政策虽然并未废除，但是由于郑和下西洋的刺激，私人海外贸易也活跃起来。只是因为这时期的朝贡贸易特别发达，私人海外贸易相形见绌而居于次要地位。^③

【隆庆部分开放海禁】 明朝中期，地方官对海禁的执行上已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正德、嘉靖年间，海禁时松时紧。嘉靖时，中国海商集团和倭寇相联络，发生了旷日持久的所谓“倭寇之乱”。隆庆帝即位后，接受前期的教训，部分地开放海禁，准许海商在福建漳州海澄的月港出海贸易。据《东西洋考》卷七载：“隆庆改元（1567年），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

这与永乐年间对海外朝贡国家的弛禁不一样，它是对私人海外贸易一次真正有意义的开放。它标志着，在明王朝建国二百年之后，中国海商才得到公开出海贸易的机会。明王朝的海禁政策至此基本瓦解。

当然，隆庆以后的私人海外贸易仍受到一些限制。例如，私人的船需先到官府登记，取得“由引”即许可证以后才能出海。准许出海的数量也有一定的限制。有些物品，例如硝黄、铜、铁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一。

② 《明史·成祖本纪》。

③ 参见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

等物，都属于违禁物品，皆不准越海私贩。另外，因有所谓倭寇问题，中国海商的船只不得前往日本。“准贩”的东洋主要指吕宋等地，日本是不包括在内的。

隆庆开放是中国海商长期反海禁斗争的结果。从此以后，私人海外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受其推动和影响，中国国内的商品经济也有了明显的进步。尤其是万历年间，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它也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滋生和成长。

三、明初与帖木儿帝国的关系

【帖木儿帝国的兴起】 13世纪时，随着蒙古人征服区域的扩大，除元帝国为宗主国外，另外还有窝阔台、察合台、伊利和钦察四个汗国。后来，封地较小的窝阔台并入察合台。14世纪初，察合台分裂为东、西二部。东察合台控制今中国新疆一带，西察合台占据阿姆河和锡尔河一带，相互间不断发生战争。1370年，帖木儿夺得西察合台的统治权，成为西察合台的君主。帖木儿以成吉思汗的继承人自居。他积极向外扩张，不久即占领了旧察合台全境。接着，他又征服了波斯、花刺子模等地。后来，他又攻入伊拉克、俄罗斯等地，并打败了钦察汗国，攻入印度，对德里大加焚掠。他还攻入土耳其，俘获了土耳其的苏丹。帖木儿以撒马尔罕（Samarhand，今苏联乌孜别克的撒马尔罕州首府）为首都，建起了一个盛极一时的大帝国。

【向明王朝“纳贡称臣”】 帖木儿在对外扩张期间，起初主要是指向北边的钦察汗国和西边的伊利汗国，而对东边刚建立起来的明帝国却“纳贡称臣”。洪武中期，朱元璋屡次遣使西域等地，劝谕招徕，但各地的君长很少有来贡的。1387年（洪武二

十年)九月,帖木儿遣使哈非思来朝,贡马15匹,骆驼两头。朱元璋赐宴款待其使臣,并赐其白银十八锭。自此以后,帖木儿每年都遣使贡马、驼和其他方物。1394年(洪武二十七年),帖木儿遣使贡马二百,并献上热情洋溢的表文。表文中颂扬朱元璋“圣德宽大,超越万古。……又承敕书恩抚劳问,使站驿相通,道路无壅,远国之人咸得其济”。朱元璋非常高兴,第二年遣傅安为使臣,“赉玺书、币帛报之”。^①帖木儿的使臣每年都来,有时一年两次,贡马上千匹。帖木儿帝国与明帝国的关系一度相当友善。除了官方的朝贡贸易以外,民间的贸易和交往也频繁起来。帖木儿帝国境内的百姓往往自己赶着马到甘肃一带进行贸易。

【帖木儿称兵东犯】 帖木儿连年用兵,节节胜利,便渐渐骄横起来。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当傅安等人到达撒马尔罕时,竟被帖木儿扣留。帖木儿在征服了土耳其等地以后,认为已无后顾之忧,便准备对明朝用兵。永乐帝即位之初,曾遣使往谕,并责备帖木儿不来中国朝贡之过。帖木儿声称,他要亲自去中国,并要中国皇帝向他朝贡。他羡慕成吉思汗的功业,对明王朝取代元朝的统治啾恨不忘,想重新建立一个象昔日那样的蒙元大帝国。1404年(永乐二年),帖木儿经过一番准备后,率领数十万军队东来攻明。明王朝闻讯后,敕谕甘肃总兵官宋晟准备迎战。撒马尔罕距中国路途遥远,到处是大山和沙漠,水草缺乏,帖木儿军中战马死的很多,帖木儿本人也病死途中,对中国的远征也只好作罢。

【重归于好】 帖木儿死后,因其长子早逝,便由其孙哈里继汗位。哈里不想和明朝交恶,就在1407年(永乐五年)派使臣送傅安等人回国,恢复和明朝的友好关系。明成祖对其使臣盛情

^① 《明史·西域传》四《撒马尔罕传》。

款待，赏赉甚厚，并派使臣往祭故王帖木儿，又赐新王哈里以银币。“自后，或比年，或间一岁，或三岁，辄入贡”。^①例如，永乐十二年，明成祖命吏部员外郎陈诚同宦官李达出使帖木儿帝国，次年，哈里“遣使随李达、陈诚等入贡”。一直到万历时，其贡使往来不断。

自哈里与明朝恢复两国关系后，双方的贸易往来亦日益发展。很多当地的商人冒充贡使来中国朝贡，借以得到互市的机会。

帖木儿生前曾分封其第四子沙哈鲁领有撒马尔罕西南的哈烈（今阿富汗西北境赫拉特）一带。帖木儿死后，哈里和其叔沙哈鲁为争夺汗位争战不休。明成祖遣使劝解，要他们不要“搆兵相仇”。明成祖通过使臣劝告道：“一家之亲，恩爱相厚，足制外侮。亲者尚尔乖戾，疏者安得协和。自今宜休兵息民，保全骨肉，共享太平之福”。^②双方因战争都精疲力尽，经明成祖的斡旋，遂停止战争。这显示了明王朝对帖木儿帝国的友好态度。自此以后，哈烈和西域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也不断到明朝来朝贡。终明之世，明朝和西部一些国家和地区一直维系着和平友好的关系。

【陈诚出使】 1396年（洪武二十九年），陈诚^③奉命出使“西域”，但未出今新疆境。次年（洪武三十年），他和吕让一起出使安南。永乐时遣使四出，东南海路最出名的是郑和，西北陆路最出名的就是陈诚。

永乐年间，陈诚先后三次奉命出使中亚一带。1413年（永乐十一年）十月，永乐帝首次命他出使“西域”。第二年春天出

① 《明史·西域传》四《撒马尔罕传》。

② 《明史·西域传》四《哈烈传》。

③ 陈诚，江西吉水县人，洪武二十七年举进士，授行人。

发，次年十一月回国，前后约两年时间。这次使团正使是宦官李达，陈诚为副使。陈诚一行访问了撒马尔罕、哈烈、达失干（今苏联境内塔什干）等地。每到一地，他们首先交上“玺书”（相当于今国书），接着献给当地国王文绮、纱罗、布帛等物。陈诚一行回国时，撒马尔罕遣使随同来中国朝贡。1416年（永乐十四年），使臣回国，永乐帝遣陈诚随行，即陈诚第二次出使。陈诚的副手是宦官鲁安。陈诚一行到哈烈后，受到国王沙哈鲁和他儿子的盛情款待。陈诚将永乐皇帝的一封信交给沙哈鲁，并将沙哈鲁赠给中国的一匹白马的绘画交给了他。沙哈鲁深受感动，遣使护送陈诚回国。因陈诚的外交活动取得了圆满的成功，陈诚被提升为广东布政使。1420年（永乐十八年），陈诚第三次奉命出使中亚，进一步促进了中亚各国和中国的和平友好关系。这次出使回国后，陈诚被升为都转运使。

陈诚在第一次出使时，将行程和沿途所见所闻笔之于书，写成《使西域记》一卷。此书成为研究中亚历史地理的宝贵资料。书中所记“凡十七国”，除了撒马尔罕、哈烈、达失干等地以外，大都在我国今新疆境内，有些地名至今难以详考。

陈诚是我国历史上出色的使者。他三次出使中亚，加深了中亚各国与中国的友谊，促进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为中亚各国与中国的长期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郑和下西洋

一、郑和下西洋的背景和目的

【历史背景】 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空前的壮举。第一次出航就有宝船62艘，水手、卫兵、工匠、医生、翻译等共

27,800人。人数之多、规模之大、航海技术之高超，都是空前未有的。明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国造船和航海技术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基本的前提条件。此外，直接导致郑和下西洋的背景因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明成祖通过“靖难之役”夺得皇位后，急需收拾民心。从传统上来看，明成祖通过兵变来夺取皇位是一种“篡逆”行为，其合法性受到广泛的攻击和怀疑。著名文臣方孝孺宁被诛杀“十族”，也不为他起草登极诏，就是一个明证。明成祖在大肆诛杀建文旧臣外，迫切需要提高个人声望。他派郑和出使西洋，“颁正朔”，广加招徕，以使周围各国“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①这种“万邦臣服”、“祯祥毕集”的盛况，可以大大提高皇帝的声望，树立自己“代天行命”的天子形象。

第二，建文皇帝生死不明，需要严加防范。燕王军队攻下都城南京后，“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②建文皇帝是死于火中，还是故意放了一把火，乘机逃了出去，至今仍是一个谜。这就给明成祖埋下了一个祸根。倘若建文帝仍活在世上，他就是一面很神圣的旗帜，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这对明成祖来说，无疑是一颗定时炸弹。为此，明成祖派心腹胡濙在全国“隐察建文帝安在”。同时，“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③在郑和使团中，有大批锦衣卫官校随从，其主要作用就是侦缉建文帝。在元末明初，被朱元璋击溃的敌对势力有很多逃亡到南洋一带。在“靖难之役”中，建文旧部也多以这一带为避难之所。明成祖需要通过郑和下西洋，了解这一带国

① 费信：《星槎胜览》序。

② 《明史·恭闵帝本纪》。

③ 《明史》卷一百六十九《胡濙传》。

家的人心向背，以防止建文残余势力的死灰复燃。

第三，明成祖在屡次对北边用兵的同时，希望有一个安定的南方。有明一代，始终存在着所谓“北虏南倭”的压力，这深刻地影响了明王朝的内外政策。明初倭寇即不断在东南沿海骚扰，另有不可忽视的从国内逃往海上的敌对势力。但对明王朝来说，明初最主要威胁来自蒙元残余势力。蒙元势力虽为明军所逐，北走沙漠，但仍有一支相当强的军事力量，正所谓“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①明太祖朱元璋即屡次遣将北征，明成祖即位前也多次与蒙元势力交锋。他即位后常驻北京，摆出与蒙元势力战斗的姿态。在这种情况下，明成祖不愿南方多事，以避免同时南北受敌。郑和下西洋，正是为了贯彻他的这种战略意图。郑和出身伊斯兰教世家，又信佛教。东南亚各国人民多信佛教，伊斯兰教徒也很多，阿拉伯一带更是伊斯兰教的世界。郑和出使这些地区，特别有利于发展与这些地区国家间的友好关系。

永乐年间是对外交往的高涨时期。这时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使者，例如，李达、陈诚多次出使西域各地，侯显多次出使尼八刺（尼泊尔）、榜葛刺（孟加拉国）和沼纳朴儿（印度中部）等地。史称侯显“五使绝域，劳绩与郑和亚”。^②郑和是这些使臣中最杰出的一个。

【下西洋的目的】 郑和下西洋的实质是“敦睦邦交”的友好外交活动，除了有顺便侦缉建文皇帝的用意以外，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发展和“西洋”一带的友好关系。

郑和每到一地，首先向当地国王开读中国皇帝的诏谕，宣扬中国皇帝皇恩浩荡，以邀其到中国朝贡。诏谕中说：“尔等祇顺天

① 《明史纪事本末·故元遗兵》。

② 《明史》卷三百四《侯显传》。

道，恪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摠诚来朝，咸赐皆赏。”^①接着对国王、王妃以至臣下进行一番赏赐，赐物主要是金银和文绮彩绢等。国王自然也有一番奉献，不少国家还遣使随郑和来中国“朝贡”。官方的活动结束之后，郑和使团就与当地百姓进行一些货物交易。这些活动都是在十分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在永乐十四年御制《南京弘仁普济天妃宫碑》中，明成祖称下西洋的目的是：“……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郑和在他所立的《天妃灵应之纪》碑中，称他出使的目的是“宣德化而柔远人”。

郑和使团虽然在海外进行了一些物品交换活动，但下西洋的宗旨并不是为了发展海外贸易。中国封建皇帝历来重政治而轻经济，明成祖本人也不主张发展海外贸易。这些物品交换活动只是附带进行的，通过交易换取一些宫廷需用之物，且可以补充一些船队浩繁的开支，属于情理中事。就这种海外贸易活动的实质而言，它只是一种发展与这些国家友好关系的手段。所换回来的多是犀角、珊瑚、珍珠等奇珍异宝供宫廷使用，而非一般民用之物。这和一般的海外贸易活动显然是大异其趣的。

在郑和使团中，军士占了绝大多数，但没有军事掠夺的目的。因当时海盗甚多，郑和需要武装自卫。当然其中也有“昭示恩威”，以使诸国常怀“敬畏之心”的目的。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郑和在海外并未侵占一寸土地，也未在海外驻一兵一卒。即在贸易中，他也从未恃强巧取豪夺，强买强卖。郑和在旧港和锡兰两次用兵，都是因对方要抢劫郑和的船队，属于自卫性质。郑和所到各处，当地人民多立庙纪念，其遗迹至今历历可寻。这表

^① 李士厚：《郑和家谱考释》，云南崇文印书馆1937年版。

明，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发展和亚非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①

二、郑和下西洋的经过

郑和本姓马，小字三保，祖居云南昆阳州（云南晋宁），世奉伊斯兰教。其祖父和父亲都曾去天方（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圣，被称为“哈只”，意即巡礼人（朝圣者）。明初，朱元璋派兵攻灭了云南的梁王政权，郑和被阉割入宫，拨入燕王府听用。

“靖难之役”中，从燕王起兵多有战功，明成祖赐他姓郑，提为内官监太监。

从1405—1433年（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远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岸，成为闻名世界的一件盛事。

所谓“西洋”，初无严格界说，大体指今南海和印度洋及其沿岸国家和地区。明人张燮在《东西洋考》中说：“文莱，即婆罗国，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②东、西洋大体以今加里曼丹岛为界。明中期以后，随着西方殖民者陆续东来，习称葡萄牙人在印度的殖民地果阿（Goa）为小西洋，而称欧洲大陆为大西洋。只是到清代，随着地理概念的明确，大西洋作为四大洋之一，才专指一确定的水域，而“西洋”一语则几乎成了欧洲的代称。

^①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史学界长期以来意见不一。有的认为主要是为了发展海外贸易，有的认为主要是出自政治考虑。可参考《郑和下西洋论文集》，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张燮：《东西洋考》卷五，《明史》卷三百二十三亦沿用此说。关于“西洋”与“东洋”的分界，在明代和清初的载籍中记载不一。有的谓爪哇岛和加里曼丹岛南部属于西洋，有的谓属于东洋。近人则称当时的“西洋”即指今印度洋一带（如冯承钧先生，见《瀛涯胜览注》序）。但从郑和“下西洋”所经历的国家 and 地区来看，《东西洋考》所记基本可信。

郑和下西洋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二、三次为前期，足迹仅限于东南亚和南亚一带，都是行至印度半岛南端的古里返航。第四、五、六次为后期，航程远及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岸。第七次下西洋是在停航了十年之后于宣德六年才出使的，已如强弩之末，可看作下西洋的尾声。^①

今将郑和历次出使的往返时间及所经主要国家和地区列表见287页。

【郑和下西洋前期】 郑和第一次受命出使是在1405年（永乐三年）六月，有宝船62艘，船长44丈，宽18丈，率士卒共27,800多人。从苏州刘家港出发，出长江口泛海至福建，由五虎门候季风南下占城。郑和离开中国是在冬季，因当时所用帆船须顺风行驶。冬春间为东北信风期，夏秋间为东南信风期，故郑和历次出航都在冬春季，回航都在夏秋季。

郑和大船队由占城南下爪哇，分船队到真腊、暹罗等地。大船队由爪哇经旧港、阿鲁到满刺加，在满刺加会齐后出马六甲海峡西行，经锡兰到达印度半岛的南端，古里（今印度卡里卡特）是终点站。郑和前三次出使都是从这里返航。

在前三次出使期间，郑和两次用兵，都属于自卫性质。一次是擒获旧港头目陈祖义。旧港即今印度尼西亚巨港，原名三佛齐，为交通要道。元末明初时，中国人来此居住者很多。广东潮州人陈祖义亦在这时携全家逃来此地。他纠集了一帮海盗，自封为酋长，劫掠往来商船，致使商旅不通。永乐五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回航经过此地，遣人谕。陈祖义诈降，暗中邀击郑和的船队。郑和得到施进卿禀告，早做了准备，将陈祖义擒获，带回中国处死。

^① 可参考[法]伯希、和著、冯承钧译：《郑和下西洋考》。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

序次	出国时间	归国时间	所经主要国家和地区
一、	永乐三年冬（1405年冬）	永乐五年九月（1407年10月）	古城、暹罗、旧港、满刺加、苏门答刺、爪哇、锡兰、古里
二、	永乐五年冬（1407年冬）	永乐七年夏末（1409年夏末）	占城、暹罗、渤泥、爪哇、满刺加、锡兰、加异勒、柯枝、古里
三、	永乐七年冬（1409年冬）	永乐九年六月（1411年7月）	占城、暹罗、爪哇、满刺加、阿鲁、苏门答腊、锡兰、小葛兰、柯枝、阿拔、把丹、甘把里、溜山、古里
四、	永乐十一年冬（1413年冬）	永乐十三年七月（1415年8月）	占城、爪哇、满刺加、苏门答刺、锡兰、柯枝、溜山、古里、阿鲁、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木骨都束、麻林、天方
五、	永乐十五年冬（1417年冬）	永乐十七年7月（1419年8月）	占城、爪哇、满刺加、锡兰、柯枝、古里、阿丹、彭亨、刺撒、木骨都束、麻林、卜刺哇、忽鲁谟斯、苏禄、沙里湾泥
六、	永乐十九年冬（1421年冬）	永乐二十年八月（1422年9月）	占城、暹罗、满刺加、榜葛刺、锡兰、溜山、古里、阿丹、祖法儿、刺撒、柯枝、木骨都束、卜刺哇
七、	宣德六年十二月（1432年1月）	宣德八年七月（1433年8月）	占城、满刺加、苏门答腊、暹罗、锡兰、溜山、小葛兰、加异勒、柯枝、古里、忽鲁谟斯、祖法儿、刺撒、阿丹、木骨都束、竹步、天方

第二次用兵是在锡兰（斯里兰卡）。在第三次下西洋回航途中，锡兰王亚烈苦奈儿邀劫郑和，被郑和擒获，带回中国，后又将他放回。从此以后，海道通行无阻。

郑和在海外并不轻易用兵。例如，1406年（永乐四年）六月

郑和至爪哇，其部下入市，被西王误杀170人。时爪哇东王和西王正在进行战争，郑和知道自己的部下是被误杀，虽极度悲痛，但并未用兵，只是禀告明成祖，令爪哇西王输黄金6万两以赎。后来仅输了一万两，余数被免掉。爪哇西王十分感激，以后年年入贡。

郑和在满刺加建立了官仓。满刺加即马六甲，地处南洋和印度洋的要冲，和中国的关系十分友好，郑和便选择这里为中转站。一应钱粮都在这里贮存，各分艘船队也都在这里取齐，然后等候信风一起启航。

古里是“西洋大国”。郑和代表明成祖封古里国王，并予印诰、文绮等物。为纪念此事，还在古里立石勒碑。锡兰（斯里兰卡）人民崇信佛教。郑和布施给锡兰山佛寺金银、绉丝等物，并立碑勒文。此碑现存科伦坡博物馆，系用汉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所刻，成为中斯友好的历史见证。

暹罗曾扣留占城的使者不还。苏门答腊和满刺加亦控暹罗强夺中国所赐予的印诰。郑和在第二次出使时亲到暹罗切责，劝其“奉天循理，保境睦邻，庶共享太平之福”。^①暹罗随即送还占城使者，交还印诰。郑和使团在海外多次排解各国间的纠纷，对发展各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起到良好的作用。

【郑和下西洋后期】 经过前三次出使，海道既已畅通无阻，郑和又积累了更为丰富的航海经验。为了和更远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友好关系，郑和便受命远航阿拉伯和东非一带。

1412年（永乐十年）十一月，郑和奉命作第四次远航。经过一番准备，于第二年冬季离国，到1415年（永乐十三年）七月返回，大约在海外经历了1年又8个月左右的时间。

^① 《明史》卷三百二十四《暹罗传》。

为了能顺利完成向更远的地区出使的使命，郑和作了认真周密的准备。他亲自到西安大清真寺聘请通晓阿拉伯语的掌教哈三同行，充当翻译。据嘉靖二年所立《重修清净寺碑记》载：“永乐十一年四月，太监郑和奉敕差往西域天方国，道出陕西，求所以通译国语、可佐信使者，乃得本寺掌教哈三焉。”这段碑文非常重要，它表明，永乐十一年四月郑和尚在国内，其出航当在这年冬季。同时表明，这次出使已不仅仅限于东南亚和南亚等地，而主要是出使“西域天方”。郑和作为一个世奉伊斯兰教家庭出身的使者，对天方是颇为憧憬的，决不会轻易放过这个去天方朝圣的机会。也就是说，郑和在第四次下西洋时即到了伊斯兰教圣地麦加，从而和阿拉伯世界建立起了密切友好的关系。^①接着，郑和在1417年（永乐十五年）冬进行了第五次出使，于永乐十七年七月回国。第六次出使任务比较单纯，仅是为了送十六国的使臣回国，所以时间也较短，1421年（永乐十九年）冬出航，于第二年八月回国。

郑和使团在第四次出使时到了波斯湾口的忽鲁谟斯（今属伊朗），接着又到了阿拉伯半岛南端的刺撒、阿丹（亚丁），又到了红海东岸的圣地天方（麦加）。同时，郑和使团还沿非洲东海岸南下，依次到了木骨都束、卜刺哇（今属索马里）、麻林（今肯尼亚马林迪）等地。郑和庞大的船队横渡浩瀚的印度洋，到这些国家访问，如没有相当高的航海技术是无法想象的。这些国家大都派出使团，随郑和来中国朝贡。木骨都束在1416—1423年（永乐十四年至二十一年）间，曾四次派使者来中国访问。1417年（永乐十五年）“木骨都束进花福鹿并狮子”。^②花福鹿即斑马，当时被视为珍稀动物。有人将斑马画了下来，名为《福鹿

^① 参见晁中辰：《郑和赴麦加考》，载《阿拉伯世界》1990年第8期。

^② 钱谷：《吴郡文粹续集》第二十八卷《道观》。

图》，收在宣德年间编的《异物图志》中。卜刺哇使者也来中国四次，每次都与木骨都束使者同行。1417年，卜刺哇使者访问中国时，送来千里骆驼和鸵鸡（鸵鸟）等动物。麻林国于1415、1416、1420年三次派使者前来中国，“永乐十三年遣使贡麒麟”。麒麟即长颈鹿，受到明成祖珍视。当礼物送到时，“帝御奉天门受之，百僚稽首称贺”。^①这次麻林向明廷进献麒麟，一时成为颇为轰动的盛事。特别是在第五次来华时，麻林国王哇来顿本亲自带领使臣来中国，不幸国王“至福州卒”。永乐帝诏谥“康靖”，敕葬闽县“令有司岁时祭之。”^②米昔儿（埃及）的使者也曾两次来中国，一次在永乐年间，一次在正统六年（1441年）。永乐中，米昔儿使节到来后“既宴，命五日一给酒馔、果饵，所经地皆置宴。”^③说明明朝对来自东非和北非的使者是极为重视的。

郑和在第四次出使回航时，经苏门答腊。伪王苏干刺“怒使臣赐不及己，领兵数万，邀杀官军”。^④郑和协同前王之子，一起将苏干刺擒获处死。至此，在苏门答腊因争王位而进行了数年的内战遂告结束。

郑和使团还曾到榜葛刺（今孟加拉国）访问，受到十分新奇而隆重的欢迎。郑和的分船队也曾到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苏禄王随后亲自来中国朝贡。

【郑和下西洋的尾声】 因下西洋开支浩繁，屡屡遭到臣下的反对。明成祖一死，继位的仁宗便听从了夏原吉的建议，“罢西洋取宝船”，一停就是十年。1430年（宣德五年）六月，明宣

① 《明史》卷三百二十六《外国》七。

②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九。

③ 《明史》卷三百三十二《西域传》四。

④ 《明成祖实录》卷一百八十六。

宗“以践祚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于是便命郑和组织第七次出使。

郑和船队于1431年（宣德六年）十二月九日离开中国，到1433年（宣德八年）七月六日回京，前后历时1年又7个月，“凡所历忽鲁谟斯、锡兰山、古里、满刺加、柯枝、卜刺哇、木骨都束、喃啉利、苏门答刺、刺撒、溜山、阿鲁、甘把里、阿丹、佐法儿、竹步、加异勒等二十国及旧港宣慰司，其君长皆赐采币有差。”^①这次共历经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鉴于前六次下西洋都平安无事，所以郑和也按照海上习俗，对天妃海神进行奉祀。宣德六年春，郑和在下西洋的出发地太仓刘家港的天妃宫立《通番事迹记》碑，历记以前数次下西洋始末，其碑文成为极其珍贵的史料。宣德六年冬，郑和在福建长乐县天妃宫亦立碑勒铭，这就是有名的《天妃灵应之纪》碑，其铭文内容和刘家港碑文大体相同。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分艘船队在古里正遇上天方有船到古里。太监洪保就挑选了七个人，“赍带麝香、瓷器等物，附本国船只到彼，往回一年。”^②天方亦派使臣随中国船队来中国。

郑和从忽鲁谟斯回航至古里时，病死当地。其遗体由随船官兵运回国内，葬于南京牛首山下，至今此墓犹存。郑和在亚非关系史上的卓越贡献永远为后人所怀念。^③

三、郑和下西洋的成就和影响

【亚非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加强】 经郑和前后七次下西洋，

① 《明宣宗实录》卷六十七。

② 马欢：《瀛涯胜览·天方国》。

③ 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第3编第13章《郑和之下西洋》。

将中国和亚非国家间的友好关系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高度。这突出地表现在三方面：使节往来频繁，级别提高和往来范围的扩大。

在郑和下西洋期间，中外使节往来之频繁，为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所仅见。洪武末年，只有周围少数几个国家来中国“朝贡”。这种冷落景象在建文年间没什么改变。郑和下西洋时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郑和第一次下西洋于永乐五年回国，“是年，琉球、中山、山南、婆罗、日本、别失八里、阿鲁、撒马尔罕、苏门答刺、满刺加、小葛兰人贡。”^①除少数几个国家外，大多数国家使节的来访都与郑和的出使有关。许多外国使节就搭乘郑和的船只来中国。例如，永乐十七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回国时，就带回了十七个国家和地区贡使。永乐二十一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国时，随郑和来中国“朝贡”的共“十六国，遣使千二百人贡方物至京。”^②这在中国和亚非国家的关系史上，不能不说是极大的盛事。

再一个重要标志是来访的级别提高。在郑和下西洋期间，除一些王子、王妃外，共有四个国家的国王八次来华访问。这是以前历朝历代所不曾见过的。1411年（永乐九年），满刺加王拜里迷苏刺“率妻子陪臣五百四十余人来朝”，受到明王朝热烈而隆重的欢迎。1419年（永乐十七年），继位的新王又率领妻子和陪臣来中国谢恩。其子继位后，于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和1433年（宣德八年）又两次来华。从永乐九年到宣德八年的22年间，满刺加王三人四次来华，这种友好的关系确是中外关系史上并不多见的盛事。

二是苏禄。1417年（永乐十五年），苏禄东王、西王和峒王同时来朝。他们“各率其属及随从头目凡三百四十余人，奉金缕

^① 《明史·成祖本纪》。

^② 《明成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七。

表来朝贡，且献珍珠、宝石、玳瑁等物。”^①在他们回国途经德州时，东王巴都葛叭哈刺因病去世，即葬在德州。东王眷属和陪臣守灵者，大都长期住在中国，其子孙长期享受“廩粮”、“布钞”等，受到诸多优待。苏禄王墓成了中菲友好的历史见证。

三是浔泥（今加里曼丹岛）。1408年（永乐六年）八月，“浔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率其妃及弟妹男女并陪臣来朝。”十月，国王因病死于会同馆。明成祖为此“辍朝三日”，命厚葬于安德门外，并“命有司岁于春秋用少牢祭之。”^②永乐十年，袭封的国王遐旺带领母亲和妻子再次来朝。明成祖对他的馈赠十分优厚。

四是古麻刺朗（即麻刺，今属菲律宾）。1420年（永乐十八年）十月，国王干刺义亦敦奔，率妻子陪臣来朝，第二年至福建，国王因病而死。明成祖闻讯非常悲痛，“命有司治坟墓，葬以王礼。”^③

第三个方面的标志是往来范围扩大。洪武时期，官方交往范围没有越过印度半岛南端。由于郑和下西洋的推动，中国与海外的交往范围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即在东南亚一带，以前未来中国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亦来中国访问。例如上文提到的有国王来访的四个国家中，仅浔泥在洪武时与中国有官方往来，其他三个国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了郑和下西洋的推动。郑和下西洋使东南亚和东印度洋一带与中国发生交往的国家数目大为增加。同时，郑和自第四次出使开始，越过印度半岛南端，到了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岸，从而使不少过去从未有过官方往来的国家也派使臣来中国，使我国和这些亚非国家建立起友好的关系。

【亚非人民友好相处的榜样】 郑和下西洋为以后亚非国家

① 《明成祖实录》卷一百七。

② 《明成祖实录》卷五十九。

③ 《明成祖实录》卷一百二十。

间的交往确立了不成文的准则，对后世影响深远。

首先，礼尚往来，不以强凌弱。中国国力强，经济、文化发展程度高，但郑和在海外却从未仰仗“天朝威力”进行恫吓、勒索或抢劫。郑和每到一地，都向当地国王颁赠丰厚的礼物，遵守当地的风俗。郑和虽领有近三万人的武装船队，却从不轻易用兵。如在爪哇，其部下被误杀170人，也未以武力相报复。郑和在旧港和锡兰的两次用兵都属于自卫性质。郑和在海外未抢掠任何财富，未侵占一寸土地，更未在海外驻一兵一卒。这与半个世纪后东来的西方殖民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次，友好相处，不损人利己。无论郑和在海外还是招徕各国贡使来中国，中国都奉行一种“厚往薄来”的政策，即不计外国贡纳多寡，回赠却十分优厚。“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私货来，皆倍偿其价。”^①在当时，从来没有那一个国家因弱小和贫穷而受卑视。广结友谊，不做损人利己的事，对于发展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有着积极的作用。

最后，互相帮助，排解纠纷。国家之间的纠纷和事端，一要靠当事国本着友好的精神冷静对待，二要靠其他国家善意斡旋，居间调处。郑和在海外做了许多排解其他国家之间纠纷的工作。例如，暹罗与满刺加、占城、苏门答腊等国家多次发生纠纷，甚至以兵戎相见。郑和从中斡旋，晓以大义，使它们重归于好。这种活动对维护各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起了重要的作用。

【促进亚非国家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人民对世界航海事业的巨大贡献。郑和航海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达·伽马发现新航路早半个世纪以上。它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文化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①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暹罗”。

郑和船队不仅带有大量的丝绸、瓷器、茶叶，而且还载有许多金银、铁器、农具等，换回的大都是各国的土特产。这些交易活动都是在公平、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有的国家担心郑和的船队以后不再前往，便要求留下郑和船队的几个人作为人质。受郑和下西洋的影响，各国贡使频频来华。他们在中国都进行了相当数量的物品交换活动。

中国铜钱在东南亚一带广为流通。例如在爪哇，“行市交易用中国铜钱并布帛之类。”^①一些国家也采用了中国的度量衡，例如苏门答腊，“国中一应买卖交易，皆以十六两为一斤。”^②在满刺加建造的一些房子所用的砖瓦，是由郑和的船队从中国运去的。在暹罗、满刺加所建的一些宝塔和寺庙，所用的琉璃瓦都是由郑和提供的。郑和还从海外带回了一些烧制玻璃的技术工人，这一些，不只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是一种文化交流。

在跟随郑和下西洋的人中，马欢著有《瀛涯胜览》，费信著有《星槎胜览》，巩珍著有《西洋番国志》。这三部书记载了所到各国的概况，增进了中国人民对这些国家生产、生活和风俗习惯的了解。在郑和所到各国，留下了许多纪念郑和航海的文物和古迹。例如，在爪哇有三宝瓏、三宝洞、三宝公庙等，在泰国有三宝寺，在斯里兰卡等地还留有郑和所立的石碑。这些，都是中国和亚非各国传统友谊的象征。

由于郑和下西洋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私人的海外贸易，沿海人民“往往私造海舟，假朝廷干办为名，擅自下番。”^③其他国家的一些商人也冒充贡使，来中国进行商品交换活动。在这期间，中国人民前往南洋一带定居的越来越多，他们起到了先

① 巩珍：《西洋番国志·爪哇国》。

② 马欢：《瀛涯胜览·苏门答腊国》。

③ 《明宣宗实录》卷一百三。

进文明和技术传播者的作用。

遗憾的是，受历史的局限，郑和下西洋不以发展海外贸易为目的，缺少持久的经济动力。相反，郑和在海外换回的大都是供宫廷观赏的“奢靡之物”，耗费巨大，给明王朝造成巨大的负担。因此，它未能象哥伦布、达·伽马等人的航海那样导致地理大发现的后果，而是戛然而止。从此以后，中国的海外活动便日甚一日地落后于西方，中国也日渐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

第三节 明代与安南和东亚诸国的关系

一、与安南的关系

【与安南的友好交往】 在明代，越南分北、南两部分。北部称安南，亦称交趾，南部称占城。自秦汉至唐末，中国封建王朝一直在今越南北部设置郡县，如同内地。唐朝末年，安南脱离中国独立，但直到19世纪下半叶沦为法国殖民地以前，除1407年至1427年间曾一度内属为郡县外，安南一直和中国保持着藩属关系。

据《明实录》记载，1368年（洪武元年）十二月，朱元璋“遣知府易济颁诏于安南”，即建立了两国间的宗藩关系。第二年六月，安南国王陈日烜遣使“朝贡方物，因请封爵。”朱元璋遂“封日烜为安南国王，赐以驼纽涂金银印。”^① 据不完全统计，有明一代，明朝遣往安南的使团有30多次，安南遣使来中国有100多次。

安南使节频繁来中国，既是为了加强两国间的政治关系，亦

^① 《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二。

是为了进行经济交流。中国奉行“厚往薄来”的政策，外国贡使
在朝贡中获利甚多。因此，安南使节频频来贡。明王朝只要求安
南三年一贡，“且定使者勿过三四人，贡物无厚。”但安南却经常
提前遣使来华，且规模也很大。不仅贡纳一些土特产品，而且还
进献大象等珍禽异兽。1388年（洪武二十一年），“帝以其频频，
且贡物侈，命仍三岁一贡，勿进犀象。”^①除了官方进行的朝贡
贸易活动外，在边境地区，两国人民还经常以土特产品自相交
易，互通有无。因安南贡使多从陆上来贡，他们“多携私物”，沿
途与中国百姓贸易，亦属司空见惯。这种私下进行的贸易活动更
加密切了两国间的经济生活。

【明成祖对安南的征服】 1406年（永乐四年）七月，明成
祖发动了征服安南的战争。在古代，封建王朝之间发生战争时有
所见，原因十分复杂。明成祖发动这场战争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三
个方面。

首先，这是明王朝为行使宗主国的权力而进行的。明朝建立
之初，安南国王为陈氏。洪武末年，安南国相黎季犛（胡季犛）
擅权，擅自废立国王，但仍奉陈氏为国王。朱元璋曾为此“却其
贡”，后来因“不欲劳师远征，乃纳之。”^②建文元年，黎季犛
“大杀陈氏宗族而自立”，随即“自称太上皇，传位（黎）瑄。”
永乐元年，黎瑄“自署权理安南国事，遣使奉表朝贡”，并言陈
氏后嗣已绝，自己是陈氏外甥，请求明朝封他为安南国王。黎瑄
受封不久，老挝送逃难在外的陈天平到南京。陈天平乃前安南国
王陈日烺之弟。永乐三年，明成祖遣使敕责黎瑄，责其篡逆之
罪。黎瑄遂遣使“入朝谢罪”，并且“请迎（陈）天平归，奉为
主。”第二年，明成祖派黄中，吕毅领兵5000护送陈天平回国。黎

①② 《明史·安南传》。

查却设“伏兵邀杀天平，（黄）中等败还。”不仅陈天平被杀，而且明军损失也很惨重。明成祖闻讯大怒，“决意讨之。”^①

其次，安南数次侵犯我国广西、云南边境地区，这也是导致这场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洪武中期，安南即数次侵犯思明府（今广西宁明县）。朱元璋以安南“生隙构患，欺诳中国之罪”，^②拒安南贡使不纳。洪武末年“交人（安南）侵迫益甚。”^③朱元璋不愿劳师远征，仅予敕责，未予征讨。永乐二年四月，思明府知府黄广成奏言，“迩岁安南屡兴兵侵夺”，^④且攻占了边境不少村寨。明成祖谕令安南归还所侵占地，不听。明成祖派兵护送陈天平回安南复位，其中亦有索还被侵土地的用意。结果明军被邀击败还，明成祖遂决心大举进兵。

最后，安南数次侵犯邻国，邻国常来中国控安南横暴，亦是促成这次用兵的原因之一。洪武初年，安南数次恃强侵犯占城。朱元璋遣使“谕令罢兵，两国皆奉诏。”洪武十年，安南对占城大举用兵，遭到占城顽强的抵抗，致使安南王战死。永乐初年，安南又不断侵犯占城，“占城诉安南侵掠”，明廷谕令二国罢兵修好。安南“阳言奉命，侵略如故”，并侵夺明廷赐予占城的赐物。明成祖对安南“遣官切责。”^⑤在这种作法屡不见效时，便促成明成祖决心对安南进行武力征讨。

1406年（永乐四年）七月，明成祖命成国公朱能为征夷将军，率兵讨伐安南。朱能至龙州病死，副将军张辅代将其军。明廷传檄安南，历数黎氏父子二十大罪，并表明，这次出兵意在恢

① 《明史·安南传》。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七。

③ 《明太祖实录》卷二四八。

④ 《明太祖实录》卷二八。

⑤ 《明史·安南传》。

复陈氏子孙的王位。第二年五月，明军尽平安南。诏求陈氏子孙不得，于是便改安南为交趾，设立郡县，命尚书黄福兼掌交趾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二司事，下设15府，分辖36州，181县。另设有5州、分辖29县，直隶布政司。

【黎利领导的反明独立战争】 明成祖改安南为郡县以后，安南人“数相惊恐”，尤其是宦官马骥以采办为名，到安南大肆搜刮珍宝，致使“人情骚动”，激起了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巡检官黎利乘机起事反明，明军极力镇压。洪熙时明军将领不和，屡次失败。宣德帝即位后，下令停止在安南采办，想借以安抚民心，但亦不见效，反明独立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后来，黎利谎称在老挝访得陈氏之后陈嵩。宣德帝“心知其诈，欲藉此息兵”，遂弃交趾，于1427年（宣德二年）将明军撤回。接着，黎利谎言陈嵩物故，并请明廷对他册封。明廷遂命黎利“权署安南国事。”不久，黎利即正式称王，向明廷朝贡不绝。1436年（正统元年），明英宗正式册封黎利之子黎麟为安南国王。两国之间又恢复了正常的友好关系。^①

终明一世，除永乐四年至宣德二年的二十余年以外，中国和安南之间一直保持着睦邻友好关系。两国间发生战争是短时间的，是支流；两国间友好相处是长期的，是主流。

二、与朝鲜和琉球的关系

【朝鲜】 明初朝鲜称高丽，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始更名为朝鲜。中朝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在明代得到进一步发展。

洪武元年，朱元璋遣使赐玺书，从而确立起两国间的宗藩关

^①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系。自此以后，朝鲜一般一年两次遣使来贡，多时达四、五次。明廷对朝鲜来使的礼遇也十分优渥，“他国不敢望也。”^①在洪武、永乐年间，有数名朝鲜妇女被册立为嫔妃。朝鲜还经常将逃到朝鲜的倭寇送来中国。1592年（万历二十年），日本“关白”（丞相）丰臣秀吉发动了侵朝战争，战火几乎烧到鸭绿江边。明朝两次出兵援朝，将日本侵略者彻底赶出朝鲜，在中朝友好关系史上谱写出了新篇章。

【琉球】 琉球（今日本冲绳）在明代以前与中国交往甚少，在明代和中国建立起非常密切的关系。当时琉球由中山王，山南王和山北王分治，以中山王势力最强。1372年（洪武五年），朱元璋遣使赴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其弟随明朝使臣来华。朱元璋赐予“大统历”和绢帛等物。两国间的宗藩关系自此确立后，使臣往来不断。朱元璋还特地赐予“闽中舟工36户，以便贡使往来。”^②后来，山南和山北都被中山王所并，“一岁常再贡三贡。天朝虽厌其繁，不能却也。”后虽限定二年一贡，但一直未能遵行。正德初年刘瑾擅权，特许其一年一贡。嘉靖二年又改为二年一贡。终明之世，贡使来华不绝，一直到南明时，琉球还曾向唐王政权朝贡。嘉靖时，在中国沿海被驱逐的倭寇往往败退到琉球。琉球派兵邀击，将俘获的倭寇和被裹挟的中国百姓送回中国。

三、与日本的关系

【中日两国的友好交往】 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唯元代对日本大举征讨，因遭暴风全军覆没，故终元之世不

^① 《明史·朝鲜传》。

^② 《明史·琉球传》。

通中国。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为修复两国间传统的友好关系，于1369年（洪武二年）遣行人杨载出使日本。日本对新建立的明王朝闻所未闻，且鉴于元朝对日本的入侵，故多存疑虑，日本王良怀拒绝奉命。洪武三年再遣赵秩赴日，详细解释了明王朝的睦邻政策。良怀知道了明朝与蒙元不同，遂于第二年遣使来华，奉表称臣。两国间的邦交关系从此得以恢复，友好往来日益密切。朱元璋还以“祖训”的形式将日本定为十五个不征国之一。

自元代起日本海盗即不断到中国沿海抢劫，明初亦然。中日两国间的邦交关系恢复以后，日本就不断地将这些海盗送回中国，听由中国惩治。1371年（洪武四年）日使第一次来华时，即送回被倭寇掳掠的中国人口70余口。1045年（永乐三年），日本捕获来中国沿海抢劫的海盗头目20人，将他们送往中国。明廷又将这些人交还日本，听他们自行处治。日本使臣到宁波后，将这些海盗头目尽“蒸杀之”。^①

1380年（洪武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谋叛伏诛。后来，朱元璋了解到胡惟庸曾“欲藉日本为助”，故“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②自此以后，终洪武之世日本贡使未通中国。明成祖即位后，即遣使往日本，日本亦遣使来华。明成祖定日本十年一贡，人不过200，船只两艘，为方便其来贡，还特地赐船两只。但日本为了借朝贡之机进行物品交换，对这种限制一直不肯遵守，往往提前来贡，人和船都超过规定数目，并且携带的私物也特别多。宣德初年改为人不过300，舟不过三艘。即使这样，仍不能满足日本的需要，借各种理由提前来贡。嘉靖十八年，再次申谕贡期为十年，人不过百，舟不过三。但因远道航海来贡，虽不按期，亦不忍拒绝，所以还是照常给予赏赐。

【明初的倭寇问题】 所谓“倭寇”，即指到中国沿海进行

^{①②} 《明史·日本传》。

武装走私和抢劫的日本海寇。终明之世，一直存在倭寇问题，尤其是嘉靖时，“倭患”成为举国震动的大事。但明前期和嘉靖时期的倭寇问题有着不同的特点，性质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自14世纪初叶起，日本进入南北朝的分裂时期。在封建诸侯的割据争战中，一些失败了的封建主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来中国沿海，或武装走私，或伺机抢劫，给我沿海人民造成很大危害。这种倭寇问题在元末即已出现，入明以后为祸更烈。

明朝初年，北自辽东，南至浙江、福建，在漫长的沿海地区，倭寇时行侵扰，“濒海郡邑多被害”。^①朱元璋于洪武初年遣使往谕时，严责日本为寇问题。诏书中称：“宜朝则来庭，不则修兵自固。倘必为寇盗，即命将徂征耳”。^②但因日本内战不休，对这些海寇难以约束，故虽时而将一些倭寇头目送往中国惩治，也不断将被倭寇掠去的中国人口送回，但倭寇问题一直未能消除。1417年（永乐十五年），倭寇数十人被明军捕获，送往京师。不少大臣请求将这些倭寇全部杀掉。明成祖说：“威之以刑，不若怀之以德”，并遣使送还日本，“令悔罪自新”。但这种怀柔政策亦不能奏效，倭寇仍不断到中国沿海抢劫。为此，明廷不断派大员到沿海巡视，督修城堡，剿捕倭寇。

1419年（永乐十七年）六月，倭寇分乘30多艘船侵犯辽东，登岸后直奔望海埚。这里是沿海要塞，总兵官刘荣在此修筑了一些御倭工事。这次大举来犯，刘荣及早得到报告，遂“依山设伏，别遣将断其归路，以步卒迎战”。明军佯败，将倭寇引入埋伏圈中。明军伏兵大起，鸣炮奋击，从早晨一直酣战到傍晚，倭寇大败，全数被歼，“斩首千余级，生擒百三十人。”^③这是明

①③ 《明史》卷一五五《刘荣传》。

② 《明史·日本传》。

朝前期抗倭的第一次大胜利。倭寇受此沉重打击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敢大举来犯。

【嘉靖时的“倭患”】 到嘉靖时，所谓“倭寇之患”愈演愈烈。嘉靖时倭患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即倭寇与中国违禁私出的海商相结合，力量显得特别浩大，对明王朝所构成的威胁也显得特别严重。^①

自正德以后，明王朝的海禁政策有所松弛，私人海外贸易较前有了明显发展。嘉靖时，这种趋势发生了逆转。1523年（嘉靖二年），在宁波发生了两伙日本贡使互争真伪的“争贡之役”。日本贡使宗设一伙“所过焚掠”，追宋素卿一伙至绍兴，并俘获了明军的指挥官袁珪。都指挥刘锦亦战死在海上。嘉靖帝闻讯大怒，听从了夏言的建议，认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②海禁顿时显得格外严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海商便和倭寇相勾结，一方面进行一定的贸易活动，一方面时而到中国沿海抢劫他们所需要的物品。

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明廷派朱纨巡抚浙江，兼提督福建军务。朱纨到任后雷厉风行，“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但在江浙官僚的攻击下，朱纨被迫于嘉靖二十九年自杀。自此，“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③海商势力迅速发展，并渐渐形成了以王直为首的海商集团。中国海商集团和倭寇有多种联系，所以明朝笼统地称为“倭寇”。

嘉靖时期的所谓“倭寇之乱”，绝大多数是中国海商，真倭是少数。《明史·日本传》说：“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参加过抗倭的郑晓说：“大抵贼中皆华人，倭奴直十分之

① 参见林仁川著：《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

② 《明史记事本末·沿海倭乱》。

③ 《明史》卷二百五《朱纨传》。

一二。”^① 中国海商集团一是需要和日本人通商，二是故意用一些日本人吓唬明军。日人“轻生敢斗”，明军特别害怕倭寇。中国海商集团甚至让部下冒充日本武士，以便于在中国沿海抢劫。

这种联合反明的斗争，使明王朝受到沉重打击。自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倭寇进犯台州等地区起，“七八年间，所破城十余，……官军吏民战及俘死者不下数十万”。^② 为了镇压倭寇，明王朝几乎倾注了全国的兵力和物力。明王朝因“帑藏空虚”，不得不在江南实行“提编”，即所谓加派。全国各地精兵良将都被调往东南沿海。戚继光即被从山东调去，他组建的“戚家军”，在这场所谓“抗倭”战争中卓有战功。直到嘉靖末年，这场祸乱才算基本被平息下去。^③

【万历年间的援朝抗倭】 16世纪末期，日本的新军阀丰臣秀吉陆续削平了其他封建诸侯，统一了日本，称为关白（即丞相）。这时，日本的封建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商业发展迅速。丰臣秀吉为了满足国内封建主和商人的贪欲，也为了转移国内的视线，于1592年（万历二十年）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并打算以朝鲜为跳板，进而侵略中国和控制南洋。如果说以前的倭患是少数日本武士、商人的抢劫行为的话，那么，现在则是由统一的日本政府发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了。

日、朝隔海相望，人民之间“往来互市，通婚姻”，久无战事。朝鲜承平日久，兵不习战。日军十多万在釜山登陆，朝鲜军队望风披靡。日军迅速占领了王京（汉城），攻陷开城，进逼平壤。朝鲜王李昫仓皇逃离王京，奔赴平壤，接着又逃往中国境

① 郑晓：《皇明四夷考》。

② 王世贞：《倭志》。

③ 对嘉靖年间“倭寇”性质问题论说不一，可参见袁琦焯著：《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李光壁著：《明代御倭战争》。

内。日军攻占了平壤，朝鲜大部分土地沦陷。朝鲜向明王朝告急，请求出兵援助。明廷以朝鲜“为我藩篱，必争之地”，决定出兵援朝。^①

1592年（万历二十年）七月，明军在史儒率领下援救平壤，明军失败，史儒战死。副总兵祖承训率明军三千渡过鸭绿江往援，结果全军覆没，祖承训仅以身免。明廷大为震动，决定以宋应昌为经略，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大举援朝。第二年一月，明军在朝鲜军队配合下，大败日军。日军先锋小西行长慌忙率残部南逃。中朝军队乘胜南下，相继收复了开城，汉城等地。日军伤亡惨重，退守釜山。中朝军队几乎光复了朝鲜全境。

在这种十分有利的形势下，明朝兵部尚书石星却力主与日和谈罢兵。丰臣秀吉亦假意求和，而暗中却加紧准备，企图卷土重来。宋应昌知道丰臣秀吉诡诈难信，力主乘胜将日军全部赶出朝鲜，否则，日军“觐我罢兵，突入再犯，朝鲜不支，前功尽弃。”^②这时以石星为首的主和派得势，仅许留下少量军队帮助朝鲜防守，大军撤回国内。

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二月，丰臣秀吉调集14万大军再次侵朝。明廷派兵部尚书邢玠率军往援，在朝鲜军队的密切配合下，连败日军。第二年丰臣秀吉死去，日军人心动摇。这年年底，中朝军队在朝鲜南海海面与日军大战，将日军几乎全部歼灭。在这次战斗中，朝鲜水军将领李舜臣和中国年逾古稀的老将邓子龙都壮烈牺牲，写下了两国关系史上光辉的一页。

日本发动的这次侵朝战争最终以失败告终。在这场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中，朝鲜军民坚持抗战，作出了重大的牺牲。这次战争的胜利主要应归功于朝鲜军民的英勇抵抗。同时，明军两次出兵

①② 《明史纪事本末·援朝鲜》。

援助，对夺取战争的胜利也起了重大作用。^①

第四节 明中期以后与西方的关系

一、明中朝以后世界形势的变化

【新航路的开辟】 自15世纪末至16世纪，西欧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在中国，此时正值明中期以后，资本主义萌芽也开始滋生。欧洲各国为了积累资本，迫切要求发展海外贸易，东方世界成了重要目标。欧洲各国早已知道，中国是个极其富饶的东方大国。中国盛产丝绸和瓷器，经营这些物品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同时，南洋一带盛产香料，也是欧洲人生活所必需。以前，这些物品主要经阿拉伯人之手转运欧洲。欧洲国家如能直接来东方贸易，则可以免掉阿拉伯人攫取的中间利润，这对欧洲各国发展海外贸易来说，是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欧洲各国便竭力探寻通往东方的海上通道。

当时，欧洲已广为流传地球是圆形的说法。欧洲的一些水手坚信，由欧洲西海岸一直往西行驶，便可到达中国或南洋群岛。于是，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便兴起了大航海的高潮。1492年，哥伦布奉西班牙国王之命，携带着致中国皇帝的国书，一直往西行驶，到了美洲，他误认为是到了印度。1497年，达·伽马从葡萄牙里斯本出发，于第二年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西海岸，开辟了通往东方的新航路。葡萄牙人接着便来到南洋群岛一带，继之首先和中国发生了关系。西班牙人和荷兰人紧随其后，亦纷纷来到

^① 参见周一良著：《明代援朝抗倭战争》。

东方。

【殖民者东来】 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方国家到东方来，首先是与阿拉伯人竞争，贩卖香料和丝绸。葡、西等国要发展对东方的贸易，必须要从阿拉伯人手中夺过来贸易之权。当时，西欧国家利用其军事实力，很快便确立起在印度洋和南洋一带的海上优势。

接着就是西欧各国彼此之间在东方的争夺。葡萄牙人最先来到东方，先是占领了印度的果阿，以此为基地，继续往南洋一带拓展。接着又侵占了被称为香料岛的摩鹿加岛（Moluccas，今印度尼西亚的马鲁古群岛），并于1511年（正德六年）攻占了满刺加（马来亚）。葡萄牙人几乎垄断了香料贸易。

西班牙见葡人贩卖香料获利极大，亦积极向东方发展。麦哲伦航海使西班牙人对东方已有初步了解。为争夺香料贸易的权利，西班牙派武装商船队东来，与葡萄牙争夺摩鹿加岛。1529年（嘉靖八年），两国缔结条约，葡萄牙人以35万得克为报偿，使西班牙将摩鹿加岛让与葡萄牙。此后，西班牙人专注于征服吕宋（今菲律宾）。1571年（隆庆五年），西班牙人最终以武力压服了吕宋人民的反抗，遂以马尼拉为首府，在吕宋建立起殖民统治。在此后的330多年间，吕宋成为西班牙人在南洋一带进行殖民活动的基地。

继葡、西两国之后，接踵而至的是荷兰。16世纪末，荷兰殖民者侵入爪哇，并将葡萄牙人的势力从摩鹿加岛排挤出去。葡人向吕宋的西班牙人求援。西班牙人认为这是夺占香料岛的良机，西班牙驻吕宋总督亲自率军往援，并征用在吕宋的华人数百名随征。西人待华人苛暴，以潘和五为首的华人在途中发动起义，杀死西班牙总督，使这次远征不果而还。摩鹿加岛落入荷兰人之手。荷兰人便以巴达维亚（Bactria，今雅加达）为首府，在印

尼建立起殖民统治。这样，南洋一带的局势就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在这一带的传统势力丧失殆尽，并开始直接与欧洲殖民者打交道。^①

二、与葡萄牙的关系

【初通中国】 1511年（正德六年），葡萄牙占领满刺加以后，已无后顾之忧，遂积极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这年，葡萄牙总督派佐治·阿尔伐立斯（Gorge Alvares）来到广州东莞县的屯门岛。佐治·阿尔伐立斯留居该岛时，染疾身死并葬于此地。屯门岛成了葡萄牙人初至中国的屯驻之地。

1516年（正德十一年）及1517年（正德十二年），葡萄牙驻满刺加总督两次派遣安特拉德（Fernās Peres de Andrade）来华，第二次并以皮莱资（Thomē Pivez）为大使，先至屯门岛，继到广州。葡人有海船两艘，并以火者亚三为舌人（即翻译），称佛郎机国向中国进贡，请准许入城。广州地方官以佛郎机素不通中国，拒绝了他们入城的请求。他们强行将船驶入中国内河，并举炮为礼，“铙炮之声，震动城廓。”^②葡使进入广州后，因《大明会典》中没有佛郎机之名，不是朝贡国，广州总督陈金不敢擅自作主，便奏请明廷定夺。葡使留居广州怀远驿二年多，1520年（正德十五年初）得允准后方送葡使进京。皮莱资先到南京，觐见了南巡的明武宗。待武宗返驾，葡使已先期到达北京。葡使要求获得与中国通商的权利，始终未被允许。武宗死后，世宗继

^① 参见张维华著：《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和《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方豪著《中西交通史》第3编第16章《明代中叶欧人之东来》。

^② 《明武宗实录》卷一百九十四。

位。时广州地方官屡奏葡人不法。葡人不仅“占据屯门海澳”。^①而且“剽劫行旅”，“掠卖良民”。^②有些大臣请求杀掉葡使，明世宗不许，仅命葡使回广州听候处置。皮莱资被系于广州监狱，于1524年（嘉靖三年）五月死于广州。

舌人火者亚三通过贿赂权臣江彬，在南京时即得侍武宗左右，常教武宗学习外国语以为戏。后随武宗入京，侍宠骄横，常轻侮朝官。嘉靖帝即位，火者亚三和江彬一起被处死。

【中葡冲突】 葡人来中国，主要目的是要发展和中国贸易。对于葡人来说，发展海外贸易是发展资本主义的迫切需要。中国的情形则相反，仍是一个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大国，资本主义萌芽极为微弱，没有发展海外贸易的强烈要求。明王朝一直推行海禁政策，只有朝贡才允许附带进行少量的物品交换，对私人海外贸易一概禁止。中、葡之间的这种矛盾，就决定了冲突势所难免。另外，葡人拥有先进的枪炮，面对尚处于冷兵器时代的中国，早存轻侮之心，敢于横行抢劫，公然侵占中国领土。这就决定了中葡冲突必不可免了。

1521年（正德十六年），以御史邱道隆、何鳌力奏，明廷下令将占据屯门（今广东深圳蛇口）的葡人驱除。明军在汪镠带领下，进占屯门。葡人寡不敌众，战死甚多，有些被明军俘虏。从暹罗等地驶往中国的葡萄牙船只也多被捕获。葡人知道已无法固守，其余部在夜间遁去。嘉靖元年（1522年），明廷“敕责佛郎机，令还其（满刺加）故土”，^③但没有结果。

1523年（嘉靖二年）初，葡萄牙船只5艘来广州，请求通商，遭到拒绝。葡人遂转攻广东新会县西草湾，想重新建立据点。备倭指挥柯荣率众迎击，俘虏葡人42人，斩首35级，缴获船

① 《广州府志》卷三十八。

②③ 《明史·佛郎机传》。

只两艘，并夺回被葡人掠去的中国男女十多人。其余三艘葡船仓皇逃去。

这两次中葡冲突，对中国产生了两个明显的影响。其一，佛郎机铳传入中国，并开始用于防务。汪鋐从屯门驱除葡人，即缴获了一些葡人的枪炮。“官军得其炮，即名为佛郎机”。^①汪鋐上疏明廷，极陈此兵器猛烈异常，请求大力仿制，用于边防。当时，明廷北边常有蒙古各部来犯，边事危急。明廷便听从了汪鋐所奏，且提升汪鋐为右都御史，督办此事，以便在边防上广加使用。

其二，由于中葡在广东两次发生冲突，明廷不准葡人前来贸易，并对南海其他国家来广州的贸易活动，也一概加以拒绝。这使得商业一度颇为繁盛的广州，顿时显得格外萧条，且严重影响到广东的地方财政收入。因这里海禁顿严，沿海商民便千方百计地北去闽、浙等地。葡人在广东不能得逞，也转向闽、浙沿海一带。中葡之间遂在闽、浙一带又发生了新的冲突。

嘉靖中期，以许栋为首的海商集团盘踞宁波附近的双屿港，进行走私贸易。葡萄牙人和许栋相勾结，在双屿建立据点，一边进行贸易，一边“每每肆行劫掠”。^②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浙江巡抚朱纨派都指挥卢镗率兵进攻双屿，葡人全被驱逐，许栋也逃去。他们在双屿的房屋建筑也全部被铲除。

葡萄牙人随后又转移到福建沿海的浯屿（今金门）和月港，和那里的中国走私商人相结合，一边进行走私、贸易，一边进行海盗式的抢掠。1549年（嘉靖二十八年），朱纨亲自和福建巡海道副使柯乔率兵进击，葡人的船只从浯屿仓皇逃往诏安。明军截于走马溪，大获全胜。由于中国军民的英勇抗击，葡萄牙在广东、

^① 《明史·佛郎机传》。

^② 俞大猷：《正气堂集》卷七。

浙江和福建沿海的侵略据点都先后被拔除。

【侵占澳门】 葡萄牙海盗商人虽一再被明军所驱逐，但在中国沿海占据一个通商据点的念头始终没有放弃。位于珠江口边的澳门成了他们觊觎的目标。

澳门原属香山县，故又称香山澳。因澳门有南北二湾，规圆如镜，故又称濠镜。在葡商定居澳门以前，曾一度以澳门西南的浪白澳为停泊地，与中国海商进行贸易。但那里交通不便，不是适宜通商之处。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葡商通过向海道副使汪柏行贿，托言货船遇到大风浪，打湿了货物，请求在澳门晾晒。阴谋得逞后，便打算长久居留下去。他们在澳门修筑房屋，扩充居地，建造炮台，并设官治理。

1564年（嘉靖四十三年），驻柘林的明军在谭允传率领下发动兵变，一时威胁到广州。俞大猷令澳门的葡人协助进剿。“功成重赏其夷目，贡事已明谕其决不许”。^①葡人助剿有功，但始终未得到朝贡国的地位。自此以后，葡人在澳门愈加骄横。因此，明朝一些大臣屡次请求将葡人驱除，明廷则一味姑息。

万历年间，荷兰人也来到中国。他们十分羡慕澳门在对华贸易中的有利地位，数次要夺归己有，均被葡人击走。葡人为了在此固守，遂修筑城墙，设置堡垒。这引起了明朝政府的警惕，便建造关门，增调军队，设官镇守。明廷认为葡人在澳门便于稽察，如驱赶到外洋，他们心怀异志，可能为害更大。尽管不断有人奏请驱除，明廷却始终未予实行。后来，海道副使俞安性与葡人约定，严禁五事：禁止交接倭寇，禁买人口，禁兵船编餉，禁接买私货，禁擅自兴作，并立碑勒铭。

明朝末年，葡人视澳门犹如海外殖民地，极力要获得自治

^① 俞大猷：《正气堂集》，《集兵船以攻叛兵》。

权。在万历年间，葡萄牙人设立澳门行政会议。1580年（万历八年），葡、西合并以后，便仿照国内各城市的自治制度，在澳门组成元老院，为处理政事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国政府对澳门事务虽不过分干涉，但葡人始终未取得完全的自治权。葡人在澳门居住，每年需向中国交纳地租二万两银子。另外，葡萄牙人的船只到澳门，需向中国地方官府交纳船税，船税数额以货物多少来定。至于司法大权，更是掌握在中国之手。例如，1608年（万历三十六年），香山知县蔡继善曾亲自往澳门，将一个带头闹事的“夷目”缚至堂下，“痛笞之”。^①使一场风波得以平息。

三、与西班牙的关系

西班牙人紧随葡人之后来到中国沿海。1571年（隆庆五年），西班牙人以武力降服了吕宋岛上各土酋势力，便以吕宋为基地，与中国进行交往。吕宋土地辽阔，资源丰富，且有金矿，比较容易开发。西班牙人少，当地土人不习耕作，故极力招徕华人。明朝后期，中国沿海人民前往吕宋垦殖、采矿或从事其他手工业生产，人数越来越多。

1574年（万历二年），中国海盗头目林凤率众南下吕宋，与西班牙人发生武装冲突。福建巡抚刘尧诲为彻底剿除林凤，派把总王望高率领战船两艘前往吕宋，约西班牙人出兵夹击。林凤势不可支，遁海逃去。

当时，明王朝对海外情势所知甚少，海禁政策一直未彻底废除。对林凤这样的走私贸易集团，不仅不许其在中国沿海屯留，而且勾结西班牙殖民者，联合进剿他们。吕宋原是中国藩

^① 《澳门纪略·官守编》。

属，一直向中国朝贡。西班牙人侵占了吕宋，明王朝亦听之任之。林凤进攻吕宋的西班牙殖民者，明政府反而和西班牙殖民者一起围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南洋一带的势力只能日渐衰微。

1575年（万历三年），西班牙人以剿除林凤有功，派教士罗达（Martin Rada）和马尔丁（Geromins Martin）率军士多人，带着国书和方物，随同王望高前来中国，意在获得与中国通商和传教的权力。罗达等人先到厦门，继至同安，后经漳州到福州，谒见巡抚刘尧诲。刘尧诲奏报明廷，以能慕义远来，准其朝贡。但对于通商、传教的要求，则一概予以拒绝。罗达等以所请不得允许，未有收获，便取道厦门返回吕宋。

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八月，西班牙船只由吕宋径至澳门，以求通商。广东地方官认为这属于“越境违例”，准备以武力驱逐。澳门葡人也拒绝西班牙船只进入。西班牙船只移泊虎跳门（位中山县西南海口）。他们仿效葡人旧日在澳门所为，擅自在这里建屋居住。海道副使章邦翰率领明军赶到，严令撤离。西班牙人被迫从这里撤走。章邦翰将他们建造房屋全部烧毁。

西班牙人在广东寻求通商特权的努力屡遭失败，再加上为了与荷兰人相对抗，便极力要在台湾建立据点。1626年（天启六年），西班牙武装船队进入台湾北部，并陆续占领了鸡笼（基隆）和淡水，修筑房屋，建造城堡，准备长期固守。这里一度成为西班牙开展与中国贸易的重要场所。这就自然和荷兰人发生了冲突。荷兰人进入台湾比西班牙人为早，他们在这里与中国海商进行贸易，获利很大，故对西班牙人的进入极为仇视。1642年（崇祯十五年），荷兰人将西班牙人赶出了台湾，夺占了鸡笼和淡水。西班牙人想在中国沿海占领一个据点的努力再一次遭到失败。

四、与荷兰的关系

【早期交往】 荷兰，明代史籍称之为红毛夷或红毛番。它来东方较葡、西二国要晚。当它占领爪哇以后，也想来中国进行直接贸易。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荷兰武装商船队到达澳门海面，请求准予贸易，自称“不敢为寇，欲通贡而已”。^①葡萄牙人严加戒备，不许登陆。明朝驻广东税使为平息争端，召荷人首领入城游览。荷人在澳门一个月，毫无所获，怏怏而去。这是荷兰与中国第一次正式发生关系。

1603年（万历三十一年），荷兰军舰驶抵澳门，劫夺葡萄牙一艘商船，截获生丝甚多。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荷兰军队再次来到澳门，想以武力把澳门夺归己有。两国在澳门激烈争夺，终因葡人防守坚固，荷人只好无功而还。此后，荷兰人又多次进犯澳门，均未得逞。

【侵占澎湖】 荷兰人在广东一无所获，便想在福建沿海夺占一个通商据点。澎湖离福建很近，又是海上交通要道，福建商人南去吕宋，葡人东贩日本，大都要从澎湖经过。荷兰人打算扼此咽喉水域，阻绝别国商船往来，独占与中国的贸易之利。

荷兰人侵占澎湖，前后有两次。第一次在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八月，荷兰军舰驶抵澎湖，如入无人之境。他们伐木建房，想长期占领此地。福建地方官遣人往谕，令其撤离。荷人向福建税使高案行贿，迁延不去。当时，福建沿海的一些私商也纷纷前往澎湖，与荷人进行贸易。明朝的一些官员力请发兵剿除。总兵施德政派兵严守要塞，派材官沈有容率兵往谕，令荷人迅速撤

^① 张燮：《东西洋考》卷六。

离。税使高案也不敢贸然请求开市。荷人见此情势，知道不会有所收获，并且缺少补给，只得撤离。这次占领澎湖，前后约五个月。

第二次侵占澎湖始于1622年（天启二年）。当时，荷兰派遣雷伊尔斯苏恩（Kornelis Rayerszon）率领舰船来华，其目的是夺占澳门或澎湖。因在澳门无机可乘，便驶往澎湖。荷兰人首先进攻六敖，被明朝守军击沉一艘军舰，俘斩十多人。荷兰退到晋屿（金门）。晋屿距中左所（厦门）甚近，那里又是商业重镇，荷兰人便向中左所发起猛攻。总兵徐一名冒死督战，荷兰人败退遁逸。接着，荷兰人又陆续进犯古浪屿，海澄等地，皆未得逞。荷兰人因武力不能奏效，便遣人谒见福建巡抚商周祚，请予开市通商，遭断然拒绝，并令其迅速撤回。荷兰人只得撤回澎湖固守。

当荷兰人往福建濒海地区进犯时，还留人在澎湖修筑城堡，以便固守。荷兰殖民者掳掠我国沿海居民一千多人为其运石筑城。他们以这里为据点，时常内犯，劫掠过往商船，并和一些海寇相勾结，互相接济。

1623年（天启三年）五月，雷伊尔斯苏恩再次遣人到厦门，致书当地中国守臣，要求准予通商，被严辞拒绝。雷伊尔斯苏恩遂亲自到厦门，继到漳州，谒见中国守臣，力请准予通商。中国守臣置酒款待，但不许通商，令其速回。中国守臣还派千总陈士英偕同荷人到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以向荷兰总督说明不准通商和不能在中国久留之意。

这时，南居益代替商周祚为福建巡抚，力主将荷人驱除。陈士英从巴达维亚回来后说，荷兰人正调集船只，驶往澎湖，强要通商。南居益知道荷兰人决不肯自行撤离，遂上疏请求发兵围剿，对这些殖民者，“必不可以理论。为今日计，非用兵不

可。”^①1624年（天启四年）二月，南居益遣将夺占了镇海港。南居益见荷兰人仍无退意，便令漳州和泉州发兵接应，调大兵围击。荷兰人虽武器精良，但终因寡不敌众，且补给困难，感到难以固守，遂遣使请求缓攻，等运米上船后，愿毁城撤退。明军以穷寇勿追，答应了荷人的请求。这年八月，荷兰人退走台湾。

【侵占台湾】 1624年（天启四年），荷兰殖民者占领了台湾南部。其实，在1622年雷伊尔斯苏恩东来时，即曾在台湾停泊。从澎湖退守台湾后，便打算进行长久经营。他们在台湾建造城堡，加强防务，并建学校，设医院，招民屯垦，还派遣许多传教士赴内地传教，进行多方面的殖民经营。他们以台湾为基地，与中国、日本进行贸易，这里的商业也日渐繁盛。

荷兰人为巩固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大力修建城堡。他们陆续修建了安平城（又名台湾城，荷名热兰遮城）、赤嵌城（今台南市，荷名普罗文查）、屯驻重兵，加强防守。1626年（天启六年），西班牙为了与荷兰人相抗衡，侵占了台湾北部的鸡笼（基隆）和淡水。1642年（崇禎十五年）荷兰人驱逐了西班牙人，将台湾全部占为己有。荷兰人对鸡笼和淡水二城加以扩建，使其成为台湾北部的重镇。

荷兰殖民者占领台湾后，仍不断到东南沿海一带侵扰。1630年（崇禎三年）和1633年（崇禎六年），荷兰人两次进犯厦门，“为郑芝龙击破，不敢窥内地者数年”。^②1639年（崇禎十二年），荷兰殖民者再次内犯，亦被郑芝龙击破。荷兰殖民者仰仗船坚炮利，在万历、天启、崇禎三朝，屡次内犯，给我国沿海人民造成了极大危害。中国军民武器不精，但在抵御殖民者的战争中表现出了高度的勇敢精神。

①② 《明史·和兰传》。

第十章 清代对外关系的扩大和变化

1644年，满洲贵族由东北入关，从此开始了清王朝对中国268年的统治。清朝统治时期，是中外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本章主要叙述转折前（即1840年前）清朝与外国的关系。

鸦片战争前清朝对外关系，与前代相比较，已有明显的扩大和变化。具体表现在：一、交往范围包括有亚洲、欧洲和美洲的许多国家；二、中外交往，特别是中外贸易在中国比较集中于北京与少数几个沿海城市。三、中国与传统的亚非国家关系在西方国家冲击下逐渐削弱。四、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逐渐成为中外关系的主要内容。特别是18世纪后，中英关系逐渐在中外关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五、封建中国逐渐地、越来越深地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漩涡，而清王朝却依然搬用传统的朝贡外交模式来对待新兴的西方国家，从而使自己在对外交往中日益被动。

第一节 清朝与周边邻国的关系

一、清朝与东亚诸国的关系

【入关前的后金政权与朝鲜】 朝鲜李氏王朝与明朝一直有着传统的亲密关系，因而在对待兴起于东北地区的后金政权态度上，李氏朝鲜一开始就采取了与中国明朝政府保持一致的立场。1620年，朝鲜国王李珣派兵协助明军攻后金，未胜而败。努尔哈赤为了争取朝鲜，即通过遣回朝鲜降将带给李珣一封信，内说：“昔日国遭倭难，明以兵救尔，故尔国亦以兵助明，非与我怨也。今

所擒将吏以王之故，悉释还国，去就之机，王审其所择焉。”^①但朝鲜国王并未给予理睬，仍多次配合明军对后金采取军事进攻。皇太极继位后，为了解除后金政权的后顾之忧，1627年，派遣阿敏等人率军3万征朝鲜，朝军大败。迫于大兵压境，朝鲜国王李倬只好与后金结盟。但围绕着对明朝的关系，朝鲜李氏王朝与后金政权一直出现摩擦，甚至朝鲜方面还继续配合明军对后金进行军事讨伐。1636年（后金改国号为清），皇太极率大军亲征朝鲜，朝鲜京都汉城失守。李倬在存亡之际，迫于无奈，接受清军条件投降，停用明朝年号，断绝与明朝的一切交往，并奉清朝为宗主。

【清与朝鲜友好关系的发展】 清军入关，定都北京，朝鲜国王立即派遣使臣庆贺。此后，双方使节每年往来不断，特别是朝鲜方面，每年除有贺冬至、贺正朔、贺圣节、纳岁币的四次固定朝贡使节外，还有多种不定期使节来清，从而促进了清朝与朝鲜李氏王朝之间关系的发展。康熙时期，双方还派遣官员会勘鸭绿江与图们江之间的边界。清朝对于越境的朝鲜人员，也给予从宽处理。双方对于海上遇风飘流者都积极救助，并且出资护送回归本国。在对待早期西方殖民国家的态度上，清廷与李氏王朝也完全一致。1832年，清廷积极支持朝鲜对英国采取拒绝通商的政策。清政府对于朝鲜国来华的朝贡贸易活动，也沿袭明王朝的办法，给予了特别的时间优待。“顺治初年定，凡外国贡使来京，颁赏后，在会同馆开市，或三日，或五日，惟朝鲜琉球不拘期限”。^②另外，双方商民还可以在中江（位今辽宁安东县与朝鲜义州间的鸭绿江上的江心岛）、庆源和会宁（今朝鲜咸镜北道）边境城市进行自由的民间贸易。17世纪末，朝鲜国内连岁荒歉，民

^① 《清史稿》卷五二六《朝鲜传》。

^②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五一〇。

食艰难，清廷闻讯后，康熙帝即令从奉天大量调运贮积粮食输往中江，同时准许中国商人运米粮入朝鲜。1698年，清廷还特遣户部侍郎陶岱负责由海道运粮三万石接济朝鲜。有清一代中朝两国学者的往来也一直不断。

【清与琉球的友好关系】^① 自明初以来，琉球与中国一直关系密切。1646年，琉球使节来到江宁，被经略洪承畴送往京师，受到顺治帝的接见。从此，琉球使节与清廷往来不断。清廷特别规定，琉球国使节在京所进行的朝贡贸易活动，同朝鲜一样，也不受时间限制，而且琉球商船所带货物，一律免税。1662年，清廷派遣兵科副礼官张学礼为正使出使琉球。此后，每逢琉球新王继位，都有清朝使节前往册封与庆贺。清廷还在琉球招收官宦子弟就读清朝国子监，并给予特别照顾。琉球方面也先后建立文庙与明伦堂，以此作为本国学生学习中国文化典籍的专门场所。现存由琉球王府编纂的《历代宝案》，系琉球历代外交文件的汇编，共分三集，合计249册。文件中涉及的对外交往史料，十分之九为与中国明清两代的交往。上始明代永乐年间，下迄清代同治六年（1867），它是一部宝贵的中琉关系史料。清代后期，日本加强了对琉球的控制与侵略。至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将其改置冲绳县。腐朽的晚清政府再也无力保护琉球免遭日本吞并。

【清朝与日本】^② 清朝定都北京不久，就有遇风飘流东北的日本商人15人被送到北京，清廷厚加款待，次年（1645）遣送回国。由于德川幕府锁国，中日两国政府没有正式关系。但民间往来，尤其以中国商船为纽带的中日经济交流始终没有间断。即

^① 参阅〔日〕野口铁郎：《中国和琉球》，日本开明书院1977年版；《清史稿》卷五二六《琉球传》。

^② 参阅〔日〕大庭修：《江户时代的日中秘话》，日本东方书店1980年版。

便清朝海禁期间，每年平均也有三十余艘船只往来于两国之间。清朝开禁后，清政府出于铸币原料铜的不足，采取了允许商民赴日采买洋铜的政策。清朝输往日本的主要商品是生丝、绸缎、砂糖和书籍，以此换取日本的金、银、铜。而日本幕府鉴于金、银、铜的大量外流，先后采取了规定贸易额、船只以及发放信牌等措施，以限制清朝商船赴日贸易的规模。另外，日本幕府还在长崎港设置“风说役”，以从中国商人处搜集清朝情况。而在清政府方面，对日本情况却不甚关心和了解。

二、清越和战^①

【清前期与安南的关系】 自16世纪初，安南黎氏王朝陷入内乱，被分裂为两个对立的封建集团。北方郑松集团控制了黎氏王朝朝政。阮潢集团则控制了南方。为了对付南方阮氏集团，郑氏集团急欲结好清廷。1660年（顺治十七年），黎朝派使节朝贡清朝，清廷随即同意册封黎维祺为安南国王。但实权操在大将郑氏手中，即所谓“黎氏为皇，郑氏执政”。早在顺治初年，清廷就曾授予割据安南高平一带的莫敬宇（即清史稿中的莫元清）为安南都统使。1667年，黎朝郑祚派大军进攻高平，消灭了莫氏军队，莫敬宇逃到中国云南，请求清廷援助。清廷出面谋和，劝黎朝将高平一带仍交莫氏统治，各守其土。1677年，清廷平吴三桂叛乱，也致书安南黎朝，希望得到黎朝协助。郑氏遂利用此机，将吴三桂叛乱与莫氏联系起来，完全消灭了高平的莫氏势力。自后，清朝与安南黎朝保持了密切的宗藩关系。1725年，雍正帝对

^① 关于清朝与越南关系，参阅〔法〕德微理亚：《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的中越关系》，巴黎1880年版；山本达郎：《越南中国关系史》，日本山川出版社，1975年版；《清史稿》卷五二七《越南传》。

于安南侵占原属中国云南的领土，竟以“安南入我朝以来，累世恭顺，不宜与争尺寸之地”为词，未予交涉追究，认可了安南人非法占领的中国领土。

【乾隆安南之役】^① 1771年，在阮氏（即阮潢后代）控制的安南南方归仁，爆发了以阮岳、阮惠、阮侣三兄弟为首的西山农民起义，西山农民军在击溃南方阮氏势力后，又北上消灭了郑氏集团，控制了黎朝朝政。国王黎维祁出逃，求援于清朝。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清廷命两广总督孙士毅率军分三路进军安南。清军于11月出镇南关，12月17日（阴历十一月二十日）攻占安南都城昇龙（今河内），黎维祁被扶为安南王，阮惠等领导的西山军则南退义安重新聚结反抗力量。1789年元月底，正当清军欢度春节之时，西山军突袭昇龙，清军猝不及防，死伤大半，提督许世亨战死，孙士毅弃城逃入镇南关。阮惠于胜利之后也惧怕清廷再次兴兵复仇，主动叩关谢罪乞降，改名阮光平，并保证在安南建立一庙，祭奠战死的中国官兵。清廷于丧师后迫于无奈，只好封阮光平为安南王。1790年，阮光平又使其甥范公治冒顶自己到热河山庄朝谒乾隆帝，^②以骗取清廷信任。但暗中却派遣十二名提督统领一百多艘船只出海，招诱海盗，抢掠中国广东、福建、浙江沿海，以此补充国库空虚。^③

【阮氏越南与清朝的关系】^④ 原来割据于安南南方的阮氏集团，到17世纪末，完全吞并了南方的占城国。1702年，阮福遇派遣使节来中国，请求清廷册封，遭清政府拒绝，于是自称为王。

① 参阅〔日〕铃木中正：《乾隆安南远征考》，《东洋学报》1967年第2号；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第七章《西山阮氏之崛起与安南之役》，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31—415页。

② 《大南实录》正编列传初集卷三〇《阮文惠传》。

③ 《清史稿》卷五二七《越南》。

④ 参阅 D. G. E. 霍尔《东南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不久，阮氏的归仁西山庄园爆发了阮岳三兄弟领导的农民起义，他们摧毁了阮氏在南方的统治。逃到海岛上的阮氏家族成员阮福映，急忙请求法国东印度公司援助，并借兵暹罗，乘西山军北上，东山再起，于1802年击败西山军，建立了阮氏政权，年号嘉隆。同年底，阮福映遣使清朝，并请以南越为国名。清廷以南越所包甚广，未予同意。次年，改安南为越南国^①，清政府命广西按察使齐布森出使越南，往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并且规定：越南国朝贡时间仍如安南旧例，二年一贡，四年遣使来朝一次。其往来路线，取陆路广西凭祥的镇南关。从此，清朝与越南阮氏往来不断。但阮福映与法国伯多禄开始订立的条约，后来却被法国借履约之名，出兵侵占越南，使清朝在南部又面临着法国侵略势力的挑战。

三、清朝与其它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清缅和战】^② 1659年（顺治十六年），南明永历帝迫于清兵追击，逃往缅甸，获缅王平达格力准而居于实皆。清军要求引渡永历，平达格力未应。1661年，平达格力弟莽白通过政变夺得王位，随即将永历帝拘送清军。但不久吴三桂在云南发动了三藩叛乱，阻隔了清廷与缅甸东吁王朝的外交联系。1752年，缅甸的孟族起义军推翻了东吁王朝，但不久缅甸的木疏土司雍籍牙（Aungzeya）迅速兴兵击溃孟族大军，建立贡榜王朝（1752—

^① 据另外材料记载，越南两字取自越裳和安南。

^② 参阅《清史稿》卷五二八《缅甸传》；王婆楞：《中缅关系史》，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日〕铃木中正：《清缅关系（1766—1790）》载《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一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第六章《阿隆丕耶王朝的建立与缅甸之役》，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69—329页。

1885)。为了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緬王孟駁（Mangra）凭借武力到中国所辖的孟连、耿马二土司领地勒取贡赋。次年又派兵侵略中国车里城（今景洪）。清廷先后派云贵总督刘藻、杨应琚收复失地，双方互有胜负。1767年（乾隆三十二年），清廷再任明瑞为总督以清军二万余人分兵两路，明瑞自率主力直征緬都阿瓦。但另一路清军却攻不下老官屯緬军小寨，受阻回国。次年正月緬军再度绕到清军背后，给孤军深入的清军以重创，明瑞自杀。1769年，清政府遂派大学士傅恒经略攻緬军事。傅恒分兵三路合力并进，督师入緬。緬王孟駁惧而求和。时清军也多染瘴疠，不堪再战。双方遂在老官屯议和，各自交还被扣留的对方人员，緬甸派使节朝贡清王朝，保证永不犯境。但签约后双方并未认真执行。此后，在两国边界地区土司活动下，① 1790年，清廷遣使赴緬册封孟云（Bodawpaya）为緬甸国王，緬王也派出使节出访清廷。自此，清緬关系正常化。清朝也开放中緬边境贸易，并出面调停緬甸与暹罗之战，劝告双方和平相处。

【清朝与南掌的往来】② 南掌，我国史籍也称“澜沧”、“纛掌”，老挝语意为产象之地。1353年，开始成为老挝史上的第一个独立和统一的国家。

1690年，南掌国王苏里旺萨去世，随即出现争夺王位继承权斗争。1707年，苏里亚旺萨孙子基萨腊和英塔松兄弟在琅勃拉邦建立小王国，与夺得万象政权的叔父赛翁公分庭抗礼。清王朝仍以“南掌”称呼琅勃拉邦王国。琅勃拉邦王国由于面临南部的万

① 清代有关史料记载1788、1790两年緬王遣使朝贡，据铃木中正考证，分别为耿马土司与緬甸八莫领主所为。见前引《清緬关系（1766—1790）》。

② 参阅《清史稿》卷五二八《南掌传》。（泰）琅赛：《老挝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象政权以及缅甸的威胁，英塔松便寻求与清朝建立关系，以便得到中国的支持。1729年（雍正七年），英塔松（中国史书称“岛孙”）的使节经云南普洱府向清廷朝贡，受到雍正帝的嘉奖，并准予南掌国五年一贡。乾隆时又改为十年一贡，且规定：对于南掌使节在中国往返途中，由政府派武官伴行保护。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琅勃拉邦王国沦为暹罗属国。1791年，琅勃拉邦王国又遭万象王昭南的干预，琅勃拉邦王阿努鲁被迫逃往曼谷。不久，在清朝的帮助下，他又回到琅勃拉邦进行统治。直到其子曼塔图腊（中国史书称“召蟒塔度腊”）统治时，仍与清廷往来密切，清廷还对其颁发了敕印和诰命。其时，老挝的社会经济还十分落后，一些华人在此传授了制酒、养蚕、织丝之法，促进了该地区的社会发展。1893年，琅勃拉邦沦为法国“保护国”。

【清暹友好关系的发展】^① 在东南亚地区，清朝与暹罗两国关系密切。1652年（顺治九年），暹罗首先派来外交使节朝贡清廷。自是以后，有清一代暹罗使节来华计40余次，其中以康熙、乾隆、嘉庆三朝最为频繁。清政府对于暹罗外交使团给予友好接待，“贡使所带货物，听随便贸易，免其征税”。^② 1767年（乾隆三十二年），缅甸军队攻破暹罗国都阿瑜陀耶（大城），大城王朝灭亡。清朝曾考虑派兵帮助暹罗驱逐缅军。这时，大城王朝的达府太守（侯）披耶·达信（中国史书称为郑昭，其父为经商暹罗的中国广东人）立即组织暹罗人民奋起抗缅，终于击退缅军，重新统一暹罗，被拥立为王，建都吞武里，史称吞武里王朝。达信称王后，于1768年派遣陈美到广东，向清朝求封他为暹罗国王。但清政府认为他是乘机篡位，予以拒绝。然而达信继续

^① 参阅《清史稿》卷五二八《暹罗传》，陈序经：《暹罗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

^② 《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九七。

向清廷表示诚意，遣返流落暹罗的征缅清兵，帮助流移暹罗的中国人民返回家乡，并多次自告奋勇地要求配合清朝共同制服缅甸。清廷遂于1777年承认达信建立的王朝，准许暹罗使节朝贡。1782年，达信为部将却克里（中国史书称郑华）所杀，由却克里建立曼谷王朝，一直以郑昭后裔名义与清朝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1823年（道光三年），清政府还向拉玛二世（中国史书称郑佛）赠送“永奠海邦”的匾额。

【清与苏禄的交往】^① 继明代以后，清朝与苏禄国仍然保持着密切的外交关系。1726年（雍正四年），浙闽总督疏报苏禄国王派遣的外交使节已抵闽界，雍正帝立即命令，“沿途地方官护送照看，应用夫马、食物，著从厚支給，以示朕加惠远人之至意”。^② 从此到1762年的30余年间，苏禄国先后十次遣使访问。清廷对于苏禄国的朝贡使节“所带土产、货物、听该夷照例贸易，免征关税”，^③ 给予了极其优惠的待遇。双方政府对于海上遇险的对方船只，多次组织援救。1733年（雍正十一年），清政府对于明代来华病逝于中国的苏禄东王坟墓，还特别拨银祭祀，并督责地方进行维修保护。1747年，苏禄商人与吕宋商人出现纠纷，苏禄国王特求清廷制裁吕宋，乾隆帝则表示：“只可听其自行办理，未便有所袒护。以后如遇如此事情，惟有晓以大义，俾知中国体制，不敢分外干求。”^④ 1754年，苏禄国王苏老丹嘛喊味麻安柔律嘛表请以苏禄国土地、丁户编入中国版籍。乾隆帝婉言谢绝，表明清朝政府与海外各国和平相处，毫无扩张疆土的意图。1851年，西班牙侵占和乐（Jolo）岛，清朝与苏禄王国的交往

① 参阅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菲律宾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② 《清世宗实录》卷四九。

③ 《清高宗实录》卷四五七。

④ 《清高宗实录》卷二〇〇。

遂中断。

四、清朝与南亚、中亚和西亚邻国的关系

【清兵反击廓尔喀】^① 廓尔喀，本是尼泊尔加德满都以西的一个小村落。1559年，德拉夫亚·沙阿在此建立了一个很小的廓尔喀王国。以后这个王国逐渐强盛起来，到第十代君主普里特维时，领兵东征西讨，统一了尼泊尔全境，称廓尔喀王朝。1731年（雍正九年），廓尔喀曾通使清朝。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廓尔喀以西藏地方政府征收过境商税过重为词，派兵进犯西藏。清政府派巴忠率兵援藏，但巴忠私许廓尔喀岁币，调停贿和，按兵不战。次年，廓尔喀以履约为由再度兴兵，大掠札什伦布。清廷派两广总督福康安率兵迎击。1792年，清军收复西藏失地，并进入廓尔喀境内，转征700余里，六战皆捷，直抵其都阳布。时英国也在其南部以援助为名，兵逼其境。廓尔喀被迫向清朝求和，福康安遂接受停战，班师回藏。1793年，廓尔喀派遣使节噶箕第乌达特塔巴等赴京。自后，廓尔喀使节往来不断。1840年，英国在广东沿海侵犯中国，廓尔喀国王闻讯后，即派特使向清廷驻藏大臣建议愿与中国配合，进攻英国属地披楞。但腐朽而昏聩的清朝官员却并不知披楞为英属印度，竟以“蛮触相攻，天朝向不过问”为词而拒绝了之。

【清与浩罕关系的变化】 浩罕，又作霍罕、敖罕，为18世纪乌兹别克人在中亚费尔干盆地建立的封建汗国，都城浩罕。安集延、玛尔噶朗、那木干是浩罕的主要城市。1759年（乾隆二十四

^① 参阅〔清〕魏源《圣武记》卷五《乾隆征廓尔喀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第八章《边界商务纠纷与廓尔喀之役》，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17—491页。

年），清军在追击新疆叛匪大小和卓过程中，与浩罕汗额尔德尼直接发生联系。额尔德尼主动以外藩附属于清朝，从此向清廷朝贡往来不绝，浩罕的“一切事务俱遵驻扎喀什噶尔、叶尔羌大臣节制”。而浩罕也因与清朝建立朝贡关系而垄断了中国茶叶、大黄西运的过境贸易。19世纪初，浩罕汗阿利姆（中国史书称“爱里木”）统治时期，急剧向外扩张，在中亚，连年与布哈拉^①汗国战争，在西部，积极支持大和卓之孙张格尔窜扰中国新疆，而表面上却装模作样地向清朝表示“恭顺”。在张格尔骚扰中国一再受挫后，1826年，浩罕汗迈玛底里便公开派军队直接参加张格尔的入侵，先后攻陷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儿、和田四城，清廷大震，遂大举调兵新疆，迎击张格尔——浩罕联军。1828年清军擒获张格尔后，清廷任命那彦成为钦差大臣处理新疆以及浩罕事务。那彦成决定对浩罕采取孤立制裁的强硬措施，但不久即被道光帝所否决。清廷对浩罕的侵略行径一味退让，而浩罕却继续蚕食中国领土。在北部，侵入伊塞克湖谷地后继续进犯楚河与伊犁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在天山中部，又窜犯至纳林河中上游。自称“天朝上国”的清朝，对于浩罕已无可奈何。后来，沙皇俄国趁浩罕向外征战之际，兴兵浩罕。1876年浩罕被沙俄吞并，置费尔干省。

【清朝与阿富汗地区的联系】 阿富汗地处印度、中国、中亚、西亚交通要道的交叉点上，早在汉代，中国与阿富汗地区就有直接交往。清初，阿富汗仍处于各部落割据状态，且受伊朗萨非王朝的控制。1747年（乾隆十二年），阿富汗人阿赫马德趁萨非王朝衰落，联合各部落赶走伊朗人，建立阿勃达利王朝，从而奠定了阿富汗国家的基础。但各部落小邦仍未完全统一。1759

^① 布哈拉汗国是16世纪初乌兹别克人在中亚建立的封建国家，首都布哈拉，1868年沦为沙俄“保护国”，1920年成立布哈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24年并入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

年，阿富汗北部的巴达克山部闻知清军在中亚追击中国叛首大小和卓，即主动向清军输送军需物资，并擒获大小和卓送至清军。在巴达克山东面的博罗尔部，也在同年派遣使节朝贡清朝。1764年，清叶尔羌都统新柱调解了巴达克山部和博罗尔部之间的纠纷，博罗尔酋长“以所宝匕首”赠给清廷。1826年，喀布尔邦的多斯特·穆罕默德汗领兵又统一了阿富汗。但重新统一不久，侵入印度的英国为了在中亚与俄国争夺殖民利益，企图控制阿富汗，但未如愿。1838年，英军挑起了第一次英阿战争，不果。1878年，英军又挑起第二次英阿战争，占领阿富汗，使清朝与阿富汗的交往中断，并且在西部使清朝又面临到英国的侵略势力。

第二节 鸦片战争前的中俄关系

马克思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指出：沙皇俄国的对外扩张政策在彼得大帝以前属于“地域性蚕食体制”，彼得及其继承人推行的则是“世界性侵略体制”。马克思的精辟论断，为我们研究中俄关系史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一、清初中俄冲突

【中俄两国的早期交往】^① 16世纪以后，俄国逐渐形成为中央集权国家。1547年，伊凡四世加冕称沙皇，俄国开始对外扩张。16世纪下半叶，俄国侵入西伯利亚，渐与中国接壤，中俄交往日益增多。

1618年，俄国东进至鄂毕河流域，为了了解鄂毕河上游及中国

^①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96—127页。第24号至30号文件。

情况，俄国托博尔斯克（Тобольск）军政长官库拉金（Куракий, И. С）公爵首次遣使来华。该使团由两名哥萨克组成：一为伊瓦什科·佩特林；一为昂德鲁什卡·蒙多夫。他们取道托木斯克（Томск），途经乌布萨泊，过蒙古地区，入长城，于同年九月到达北京。明廷因他们未携国书和贡品，因此不能朝见皇帝。他们只得携带明廷赏赐的礼物及万历帝给沙皇的国书，于1619年回到托木斯克。佩特林回国后作有《中国和蒙古见闻记》，详细记载了沿西北陆路万里来华的沿途见闻，山川地理，物产民风，城市交通，商业贸易。由于当时人们对北亚及中国了解甚少，该见闻记以亲身经历首次详细介绍这些地区，引起西方人士的广泛重视，不久即被译成多种文字发表。《中国和蒙古见闻记》至今仍被做为史料引用。

【顺治年间沙俄侵入黑龙江地区】 沙皇俄国自16世纪下半叶向西伯利亚扩张，依靠哥萨克为主力，用步步为营建立寨堡的方法，驍驍东下。1619年建叶尼塞斯克（Енисейск），1632年在勒拿河畔建雅库次克（Якутск），至顺治年间，俄国势力已抵东北亚。以雅库次克为据点，哥萨克南侵黑龙江流域，与驻地清军发生几次武力冲突。

1643年，波雅科夫率领132名侵略军首次窜到黑龙江流域“探险”，在松花江与乌苏里江之间受到当地居民的袭击，仅数人逃回。在1645年、1649年和1652年，哥萨克又先后侵入黑龙江地区烧杀掳掠，当地达斡尔、索伦等部奋起抵抗。1652年（顺治九年），哈巴罗夫（Хабаров, Е. П.）率军在黑龙江下游宏加力河口乌札拉村一带侵扰，清廷派遣“驻防宁古塔章京海塞遣捕牲翼长希福等率兵往黑龙江，与罗刹战，败绩。”^① 1654年（顺治十一

^① 《清世祖实录》卷六八。

年)，斯捷潘诺夫（Степано,О）一伙在松花江口掠夺，清廷命固山额真“明安达哩自京师统兵往征罗刹，败敌于黑龙江。”^① 1655年（顺治十二年），清廷再派明安达哩率万人大军围困斯捷潘诺夫占据的呼玛尔斯克，“攻其城，颇有斩获，旋以饷匱班师。”^② 1658年（顺治十五年）七月，“镇守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等疏报，击败罗刹兵，获其人口甲仗等物。”^③ 斯捷潘诺夫即在这次战斗中丧命。1660年（顺治十七年），镇守宁古塔总管巴海率军在伯力北面的古法坛村与帕什科夫一伙相遇，大败侵略军，经过几次战斗，基本清除了侵入黑龙江地区的俄军。

【清初二次来华使节】 西伯利亚中、北部的冻土地带，是珍贵的毛皮兽如紫貂、银鼠、玄狐、银狐、海狸、水獭、白貂等的主要产地。俄国自占领这一地区后，迫使当地居民用毛皮纳贡，转而对外推销，毛皮贸易成为俄国国库收入重要来源。

当顺治年间哥萨克以武力侵扰黑龙江地区时，俄国两次派遣使节来华，目的是刺探中国情况，以便建立通商关系。1654年2月（顺治十一年），巴依科夫（Байков,Ф.И.）奉命出使中国。沙皇明确指示他调查中国的经济、军事、商业、人口、城市、信仰、产品、税收、农作物、交通等各方面的情况^④。1656年3月巴依科夫到达北京。清廷依例令他行叩跪礼，并由大臣转呈俄国国书，巴依科夫拒不执行，同年9月被清廷遣回^⑤。1658年3月（顺治十五年），俄国再派佩尔菲利（Перфильев,И.）和阿布

① 《八旗通志·明安达哩传》。

② 《平定罗刹方略》。

③ 《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九。

④ 《十七世纪中俄关系》第一卷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17—237页第70、71号文件。

⑤ 《十七世纪中俄关系》第一卷，第二册，第243—278页，第74号文件，巴依科夫《出使报告》。

林 (Аблий, С.) 来华, 他们于1660年到北京, 仍然是在觐见礼仪上与清廷发生争执, 最后亦未完成外交使命而返。两次俄国使节的外交任务虽然都未完成, 但他们在来华过程中都作了大量的调查工作, 为随后俄国制定对华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康熙初年的中俄外交关系】 康熙初年, 尼布楚境内尚存涅尔琴斯克、伊尔根斯克和车勒姆宾斯克三座俄国堡寨, 驻有几十人。1665年, 切尔尼果夫斯基 (Черниговский, Н.Р.) 率领俄国人重占被清军收复的雅克萨, 在原哈巴罗夫建立的阿尔巴津的废墟上筑起“阿尔巴津城堡”。1667年, 达斡尔族一个酋长根忒木尔叛逃俄境, 为俄方收容, 拒不交还。这些事件使中俄关系更加紧张。此时俄国国内有斯杰潘·拉辛领导的农民起义, 对外与波兰连年用兵, 国力空虚。同时, 由于英荷战争的影响, 俄国在欧洲的毛皮市场缩小, 急需开辟中国市场。所以, 在康熙初年, 俄国三次派遣使节来华。

1658年作为沙皇的专使, 阿布林使团经西伯利亚来华, 来时带有沙皇国书及毛皮货物, 获利一倍以上。1668年, 阿布林再次奉命率商务使团来华, 带有更多的毛皮货物, 1672年回国, 获利三倍多。

自根忒木尔叛逃后, 清廷数次派人致书俄方, 要求俄国归还根忒木尔, 停止侵扰活动, 并建议俄国派人前来会谈, 解决争端。俄国乃乘机于1670年夏派米洛瓦诺夫 (Милованови, М.) 率十人使团来京, 其主要目的是要求中国准许俄国来华贸易。由于俄国人拒不交还根忒木尔, 此次使团无结果而返。

1675年3月, 为打通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俄国又派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斯帕法里 (即尼果赖) (Спафарий, Н.Г.) 率160人使团来华。清廷特派礼部侍郎马喇前去迎接。1676年3月12日, 双方在嫩江会谈, 会谈中就递交国书的方式、黑龙江地区

的冲突等发生争执。5月底使团到京，斯帕法里向清廷提出释放战俘、自由贸易等十二项要求；清廷则提出遣还根忒木尔、俄使遵从中国习俗及维护边界和平作为答复俄方要求的先决条件。由于俄方无诚意执行中方的要求，此次出使仍无结果。

【雅克萨之战】 俄军占雅克萨后，进而向黑龙江上游侵扰，烽烟连年不息。康熙平定三藩及收回台湾后，决心在黑龙江地区彻底清剿俄军，用兵目标则选中居水陆要冲的俄军侵略据点雅克萨。

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借到盛京谒陵之机，亲到抚顺、兴京、哈达城、吉林、松花江等地视察，并派郎谈等人以捕鹿为名，到雅克萨附近侦察地形和水陆交通情况。最后决定用兵路线为自宁古塔直驱瑗琿或额苏里，由此溯流而上，直扑雅克萨。作战计划确定后，康熙即遣将调师，筑城设守，准备粮饷军器，制造船舰。十二月，命户部尚书伊桑阿赴宁古塔督修战舰。1683年开辟漕运路线，使京师的粮食沿运河直达天津，自天津入海直达辽河口，溯辽河而上，历伊通河、松花江等，直达黑龙江北部边防。又通陆上交通，在吉林至瑗琿间增设新驿站，使瑗琿与京师之间可通达军情。为便于军事指挥，康熙于同年九月增设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康熙还先后调遣了福建藤牌兵420名、内地汉军、各省熟习火器的士卒、京师禁旅等几千人参战，再加上东北驻军，共有近万人的大军。

军事调动完毕，康熙再谕俄军，争取和平解决，俄军不听，于是清廷大军在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六月包围了雅克萨。激战三天，清军大胜，收回雅克萨。战斗结束后，清军释放了俄国战俘700多名，焚毁俄国人的木城，未加设防就班师了。清军撤退后17天，俄国人卷土重来，再占雅克萨。清廷直到半年后才闻讯，立即调派遣回的军队，于1686年七月重新包围雅克萨，因俄



军已做充分准备，清军久攻不下，于是长期围困雅克萨。

【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缔结】 此时，俄国派使臣到北京，要求解除雅克萨之围，进行边界谈判。清军乃于1686年十月主动撤离雅克萨，作谈判准备。

1686年一月，俄国组成以费·阿·戈洛文(Головин, Ф. А.)为全权大臣的谈判使团，负责进行边界谈判。使团人员加随行军队共约2000余人。1687年11月，戈洛文率队到达色楞格扎营，派人到北京送信。1688年4月清廷由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等组成中国谈判使团。使团行前，康熙明确指示交涉重点：一是疆界的划定；一是索还逃人根忒木尔。关于划定疆界，指出：“尼布潮（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①戈洛文在出使过程中曾三次收到俄国训令，指示其划分边界的原则为：一、以雅克萨为界；二、放弃雅克萨，保留尼布楚；三、迫不得已可以退出尼布楚。因此此次谈判争执的重点，是以雅克萨还是以尼布楚划界问题。

1688年五月三十日，中国使团出发赴色楞格，七月下旬行至克鲁伦河附近，遇噶尔丹部叛乱，道路受阻，返回北京，重定谈判时间、地点。1689年八月，中俄在尼布楚正式举行会谈。戈洛文是外交谈判老手，在任何细小问题上都讨价还价，中国使团则一再忍让。八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双方就中俄冲突展开激烈的争端。当开始谈判如何划分边界时，由于双方态度都很强硬，致使谈判陷入僵局。随后经传教士从中周旋，中方让步答应放弃尼布楚。九月七日中俄正式签订《尼布楚条约》，确定两国在黑龙江地区以额尔必齐河、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为界。《尼布楚条约》是中俄在平等基础上签订的一个条约。此观

^① 《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五，第15页。

点直至20世纪60年代还为苏联历史界所公认。^①

【义杰斯使华】 在签订尼布楚条约时，戈洛文按照俄国政府的指示，曾提出把允许通商写进条约，经中方同意，从而满足了俄国多年的愿望。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俄商蜂涌来华贸易。1692年3月，义杰斯（ИдесИ.）率领400人的使团离开莫斯科（使团中包括一个商队），次年11月到京。清廷因其国书将中国皇帝尊号置于俄皇之下，不予接受，但仍给义杰斯以礼遇，并准其在京贸易。对于所要交涉的外交事项，则均予回绝。义杰斯此次从事商务活动，获纯利二倍多。沙皇政府和巨商大贾在厚利诱惑下，纷纷组成商队来华。由于成份复杂，人数众多，沿途常有不法行径，故清廷于“（康熙）三十二年议准：俄罗斯国贸易人不得过二百名，隔三年来京一次，在路自备马驼盘费，一应货物不令纳税，犯禁之物不准交易。到京时安置俄罗斯馆，不支廩给。定限八十日起程。”^②实际上使俄商在京贸易更加合法化，此后中俄贸易有很大发展。

【准部叛乱与中俄关系】 清初，散居中国北疆的蒙古各部，与俄国领土相接，沙俄一直试图用威逼利诱的方法控制这一地区，中俄关系因此受到重大影响。蒙古各部主要分成三部分，即漠南内喀尔喀蒙古各部，漠北外喀尔喀蒙古三大汗：札萨克图汗、土谢图汗和车臣汗以及漠西厄鲁特蒙古四部：准噶尔部、和硕特部、土尔扈特部和杜尔伯特部。各部都曾为反抗沙俄而进行斗争，而准部却在沙俄支持下于康熙年间发生叛乱。

1688年春，准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的第五子噶尔丹在沙俄支持下发动叛乱，率军越过杭爱山，大举进犯喀尔喀。戈洛文则自

^① 谢宾科夫：《十七世纪的俄中关系》，莫斯科，1960年，第208页。

^② 《大清会典》卷七四六。

北率俄军向喀尔喀进攻，形成夹击之势，漠北蒙古地区顿时大乱。此后，清廷用了近十年时间才彻底平定这次叛乱。在叛乱过程中，戈洛文的使节基比列夫(Кибирев Г.)曾长期在噶尔丹营中活动，只是由于新签“尼布楚条约”，俄国才未敢派兵支援噶尔丹。噶尔丹之乱平定后，其侄策旺阿拉布坦得沙俄支持，又于1715年侵扰哈密，1716年攻陷西藏。清廷派大军才平定这次叛乱。

两次准部之乱对中俄关系影响甚大。清廷深知沙俄对蒙古地区的野心，所以当噶尔丹开始叛乱，索额图转赴尼布楚谈判时，康熙指示他“不惜放弃尼布楚，尽快缔结中俄条约，以收牵制俄国之效，这一目的也确实部分地达到了。”

二、清中叶的中俄关系

【土尔扈特西迁与图理琛出使】 土尔扈特为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驻牧在今新疆西北塔尔巴哈台一带地方。明崇祯年间，土尔扈特首领和鄂尔勒克因与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发生冲突，于1628年率所部五万余帐（约20余万人）西迁，到伏尔加河下游驻牧。

土尔扈特西迁后，与祖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仅仍至西藏熬茶，还时常派使节来京朝贡。1709年，土部首领阿玉奇汗又派使萨木坦“达京师表贡方物”。为表示对土尔扈特部的关怀，康熙派内阁传读图理琛等组成使团，前往探视。图理琛一行于1712年夏离京，经色楞格、叶尼塞斯克、托波尔斯克、喀山等地而到阿玉奇汗驻地，受到土尔扈特人热烈而隆重的接待。图理琛于1715年4月回到北京，著有《异域录》一书，备述道里山川，民风物产，以及出使经过，沿途见闻，有重要史料价值，流传很

广。

【伊兹玛依洛夫出使中国】 《尼布楚条约》签定后，俄国商队大量来华，皮货源源运到中国。康熙末年，俄国还违反规定增加来华次数和人数，迫使中国采取对策。加以此时俄国仍不答复划定蒙古地区中俄边界的要求，一再隐匿中国逃人，不断蚕食中国领土，于是清廷在1718年暂停贸易。

俄华贸易僵局一出现，俄国即派遣伊兹玛依洛夫（Измайлов Л.）率使团来华交涉。1720年11月，使团到达北京，受到清廷的礼遇，康熙多次召见伊兹玛依洛夫，明确表示希望保持和平的愿望。伊兹玛依洛夫在京谈判三个多月，由于中方提出的交还越境边民、划定蒙古地区中俄边界、停止强占中国领土等问题不得解决，清廷也拒绝了他缔结自由贸易条约等要求。但清廷在向俄国提出一切具体要求后，恢复了俄商来华贸易，并准许伊兹玛依洛夫的助手郎克（Ланг, Л.）留居北京处理商务。

【中俄《恰克图条约》】 郎克在京期间，俄国加紧与策旺阿拉布坦交往，清廷非常气愤，遂于1722年4月驱逐库伦俄商，停止中俄贸易，7月驱逐郎克及俄国商队，中俄关系再度恶化。同年年终，康熙去世，彼得一世决定接受中国建议，派使来华进行边界会谈。但使节尚未派出，彼得于1725年去世，其妻叶卡捷琳娜一世继位后，乃派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Савва Лукич-Владиславич）为特命全权大使出使中国。

1725年10月，萨瓦率领一个成员达1600多人阵容强大组织严密的使团衔命东来。次年11月到京，历时半年。双方进行了第一轮边界谈判。中国方面由吏部尚书察毕那、理藩院尚书特古忒、兵部侍郎图理琛三人为交涉代表。双方经过激烈争论，达成初步协议十条，唯划界问题留待勘查后决定。

清政府向无在北京与外国使臣签订条约的旧例，因而商定俄

使前往色楞格斯克附近的布拉河畔定约。1727年6月，清廷派隆科多、策凌、四格、图理琛等人参加谈判订约。谈判中以隆科多为首的中国代表态度强硬，萨瓦则强词夺理，并收买蒙奸噶尔丹以窃取中方情报，还向中国代表施加军事压力。会谈两个月，毫无进展。8月底，清廷谈判的中坚隆科多突然获罪，被拘押送回北京，清廷改派克什图接替工作，谈判局面急转直下，完全以俄方的划界方案达成协议。8月31日，双方签定划定中俄中段边界的初步协定《布连斯奇条约》。在此基础上又签定了《阿巴哈依图界约》和《色楞额界约》。在具体划界中，由于中国大臣不熟悉勘测工作，又使俄国获得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土地。这三个界约签订后，中俄于同年11月2日签订总条约——《恰克图界约》。

《恰克图界约》的签订，使俄国获得很多利益：划分了中俄中段边界，使中国大片领土划归俄国；北京贸易依旧进行，再在边地恰克图和尼布楚附近开辟二贸易市场；准许俄国教士、学生来华；准许在北京建一所俄国教堂，等等。当然，该条约的签订对于遏制沙俄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也有一定作用。

【中国使团两次赴俄】 雍正年间，清廷曾两次派遣外交使团赴俄，“往贺俄皇继位”，以示维护两国和平愿望。

自《恰克图界约》签定后，中俄冲突趋于和缓，清廷转而彻底平定准噶尔部做准备，而派遣使团的另一重要目的，就是联合土尔扈特，缓和对俄关系，以孤立、打击准噶尔部策旺阿拉布坦之子噶尔丹策零。第一个赴俄使团由两部分组成：一支由侍郎托时等组成，前往莫斯科；一支由副都统满泰、布达西等组成，赴土尔扈特处。赴俄京的使团于1731年1月20日到莫斯科，2月6日，女皇安娜·伊万诺夫娜接见中国使臣。随后中俄双方进行了多次会谈，分别就俄商队来华、准噶尔蒙古等问题达成协议。赴土尔扈特的使臣也一起去了莫斯科，经俄国同意后，在俄使陪

同下，于6月初，使团通过伏尔加河草地到达策楞敦多布汗驻地，受到土尔扈特人隆重款待。第一个中国使团于1732年8月返回北京。

由于这一时期俄国沙皇更替频繁，第一个使团尚未返回，清廷就于1731年又派出了第二个赴俄使团。该使团仍由两部分组成，由内阁学士德新等20人组成的第一队，前去祝贺俄皇继位；由内阁学士班第等率另一队去土尔扈特处。但此次赴土尔扈特的使臣因俄方反对未能成行，在恰克图等待三年之后返回。

【土尔扈特回归祖国】 土尔扈特西迁后始终保持着政治、宗教各方面的独立性。尽管沙俄一直试图吞并控制这一部族，土尔扈特人对此做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对土尔扈特人来说，东归祖国一直是他们向往的出路。1761年，敦罗卜喇什可汗去世，其子渥巴锡继位，沙俄趁他尚未成年，强行将土尔扈特纳入俄国控制之下，并大量征调土尔扈特人参加俄土战争。1768—1769年土尔扈特人“死伤已七、八万人”，俄国也遭巨大损失，为扭转战局，“复征兵于土尔扈特”，^①命令“十六岁以上者尽行出兵”。^②为避免部族灭绝的危险，渥巴锡决计东返。为了消除俄国人的怀疑，渥巴锡亲自带军上战场，参加俄土战争。1770年秋，渥巴锡自战场回来，立即制订了率领全体部众回国的计划。

按计划渥巴锡要率伏尔加河两岸的土尔扈特人一同返国。但因那年冬天天暖，河不结冰，而俄国人已经生疑，渥巴锡只得不得河北岸的1.3万多户渡河，在1771年1月5日率领河南岸的3.3万多户，16.9万多人出发。沙皇闻讯大怒，派重兵追击堵截，渥巴锡亲率精锐浴血奋战，且战且行，过峡谷，渡隘口，摧毁哥萨克防线，跨150俄里的黄水草滩，越无滴水寸草的千里戈壁，克服

^①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三十八《土尔扈特归附始末》。

^② 椿园：《西域总志》卷二《土尔扈特投诚纪略》。

难以想象的困难，至6月6日到达伊犁河畔。这时土尔扈特部只剩下了1.5万余户，7万余人，且“形容枯瘠，冻馁交迫，其幼孩有无一丝寸缕者”，^①乾隆帝得悉土尔扈特部万里来归，立即派参赞大臣舒赫德驰往伊犁，负责主持安置事宜。又自新疆、甘肃、陕西、宁夏、内蒙等地调入马、牛、羊、米、麦、茶、羊裘、毡房、棉布、棉花等大批生活用品以救济土尔扈特人。随后在避暑山庄召见渥巴锡等土尔扈特首领，分别晋封爵位，作了妥善安排。乾隆又亲撰碑文，树立《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块石碑，以纪念这一爱国壮举。

土尔扈特部东返曾一度使中俄关系紧张，俄国致函清廷，要求交还土尔扈特人，并以武力相威胁。对此，清廷一面据理驳斥，一面强硬地表示：“或以兵戈，或守和好，我天朝惟视尔之自取而已。”^②俄国无奈，只得作罢。

三、中俄贸易关系

【中俄贸易的发展】 中俄之间的贸易关系，大致随中俄交往而产生。《尼布楚条约》订立后，俄商来华者渐多，有些则身兼外交、经商两大任务。1690年5月，格里戈里·隆沙科夫因外交使命来京，同时带有毛皮60车。1691年又有两次俄商至京贸易，获利丰厚。俄国政府不愿利归私家，自1697年后逐渐由俄国政府垄断对华贸易，派遣国家商队来华贸易。

自1697年，梁古索夫（Лянгусов.С.Я.）率领第一支俄国商队来华贸易，带来价值31300卢布的皮货，换回价值65000卢布的中国货物。至1722年，俄国先后派出14支国家商队到京贸

^① 《清高宗实录》卷八八九。

^② 《清高宗实录》卷九一四。

易。由于大量毛皮倾销中国，到后几次商队来华时，毛皮价格下降很多，北京市场已呈衰落现象。清廷曾建议减少来华次数，俄国不同意。加以俄国经常在蒙古北部和西北边疆制造事端，企图肢解中国，清廷被迫在1722年宣布停止中俄贸易。

中俄贸易除在北京进行外，在边境地区也时有俄商转贩。边地贸易在俄国境内以色楞格和尼布楚最重要，在中国境内则以蒙古的库伦、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及额尔古纳河沿岸为重要。

【《恰克图条约》签订后的中俄贸易】 自《恰克图条约》订结后，中俄贸易分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北京贸易继续存在，俄国又先后6次派遣商队来京。但是由于边地贸易兴起，北京贸易呈现衰落状态。另一方面，恰克图贸易市场日趋繁荣，形成商业上另一中心，这是中俄贸易关系的重要转变时期。

《恰克图条约》订结后，俄国莫洛科夫商队在1727年来京，交易总额近1000万法郎。1731、1736年，俄国又两度派郎克率商队来华。随后菲尔索夫商队于1741年来华，列勃拉托夫斯基商队于1745年来华，符拉迪金商队于1754年来华。第6支商队回国后，俄国再未派国家商队来京贸易。6次国家商队前后不足30年，终止的主要原因是北京市场饱和，贸易冷落所致。

恰克图居中俄交通要冲，自雍正五年辟为市场后，原在库伦进行的中俄贸易迅速移往此地，中国商人也纷纷前去贸易。清廷在此设有“监视贸易司官”，以管理中国贸易商人，处理贸易纠纷。自北京中俄贸易衰落后，恰克图成为中俄主要贸易地。

【乾隆中三次停市】 中俄贸易利在俄国，中国徒增迎送安置之劳。况且外藩市易，中国一向视为额外恩惠，在双方发生矛盾或办理外交感觉棘手时，常以停止市易相威胁。

《恰克图条约》基本上划定了两国边界，但局部冲突仍时有发生。俄国仍与准部勾连，违约蚕食中国领土，边界纠纷不得解

决。加之俄国在边界设置木桩侵占中国领土，在恰克图私增货物税，清廷遂在1764年停市。^①停市后两国关系一度紧张，但因双方都在用兵，只有用谈判解决争端。1768年，克罗波托夫（Кропотов）使团来华，双方缔结通商章程，并修改了《恰克图条约》第十条，俄方又拆除了木桩。鉴于矛盾得到解决，清廷乃于1768年开放恰克图市易。

恢复市易后，边境案件仍不断发生，1779年，俄国不按条约规定引渡逃人，惩治罪犯，于是清廷第二次停止恰克图市易。此次停市时间很短，至1780年1月就又开市了。

1784年，又发生库伦商人靳明被劫案，俄方不依条约处理罪犯，且态度顽横，于是清廷在1785年再停恰克图市易，直至1792年。

恰克图贸易，平均每年达800余万卢布。停市以后直接影响其国库收入。为了恢复贸易，俄国一度试图以武力解决，终因俄土、俄瑞战争的爆发而未实现。结果由清廷派松筠、普福等与俄方会商，签订规约五条，制定了详细的约束章程，随后开市。

1792年签订的《恰克图市约》，使俄国在对华贸易上取得西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有利地位。

四、中俄宗教、文化关系

【东正教会的建立】 俄国东正教在华史，可追溯到1665年，当切尔尼果夫斯基修建“阿尔巴津城堡”时，其同伙中有一名东正教士建了一座“基督复活教堂”。1671年，又建起一座“仁慈救世主”修道院。但这些建筑不久就被清除了。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月折档》，引自贾文华：《中俄早期贸易中的几个问题》，《求是学刊》1987年第8期。

雅克萨之战期间，清廷“总得罗刹近百人”，他们被编成镶黄旗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住北京城东北隅胡家圈胡同，享受与旗人同等待遇，并允许信仰自由。为便于他们做礼拜，康熙特须赐一座小庙，由马·列昂节夫（Леонтьев, М.）神父主持教务，中国人称之为“罗刹庙”。1695年，俄国送来教会证书，正式命名为“圣尼古拉”教堂（即俄罗斯“北馆”），这是北京的第一座东正教堂。

《恰克图条约》缔结后，根据条约第五条规定，清廷于1728年又为俄国东正教会在东江米巷（今东交民巷）建了另一座“奉献节”教堂（即俄罗斯“南馆”），作为俄国教会人员和留学生的驻地。俄国东正教会基本上是以这两处教堂为基地而进行活动的。

【俄国传教士团来华】 自北京东正教堂建立后，俄国政府千方百计与其加强联系，并多次向清廷提出派遣教士的要求，均未获准。康熙时期来华的商队，一般都有东正教士随行，以加强与北京东正教徒的联系。

在图理琛使团出使土尔扈特期间，俄国又借机提出准许俄国教士来华的要求，康熙破例允准，并指示图理琛等把俄国政府组成的“北京传教士团”带回北京。1715年5月，俄国来华的第一个东正教传教士团抵达北京，大大加强了北京东正教的力量。

《恰克图条约》第五条有“现在住京喇嘛（神父）一人，复议补遣三人”。根据这一规定，俄国又于1729年派遣第二个传教士团到达北京。此后，或因传教士死亡，或因传教士被清廷驱逐，北京东正教堂需要人主持教务，俄国又分别在1735年至1840年间10次派传教士团来华，主持领导北京东正教会的工作。

按《恰克图条约》规定仅准“补遣三人”，为此清廷曾不止一次拒绝俄国续派传教士来京，并申明“条约中并没有规定由别

人来补他们的遗缺”，^①因而每一届传教士团来华，都要得到清廷特别允准。

【清代俄国留学生】 《尼布楚条约》订结后，俄国要求派人来京学习满、汉、蒙语言，康熙允其所请，在北京玉河桥西设立俄罗斯馆，让俄国商人、学生居住。

俄国正式定期派遣留学生来京，始于《恰克图条约》订结时。萨瓦来华带有四名留学生同行，条约缔结后则正式承认了“留京学习语言之四名学生及两名较年长者”在京学习的权利。例受国子监选汉满助教各一，任俄罗斯馆教授。以后学成的留学生回国，俄国又一再派遣留学生随传教士团来华，有时获清廷允准，得以来京学习，有时则不获批准。如此自18世纪初至鸦片战争，累计来华的俄国留学生也有几十人。

俄国留学生享受清廷给予的生活费用，有时也为理藩院做些翻译工作。留学生学成回国后大多受到重用，他们都在中俄交往中发挥重要作用。另外，正是在这些留学生中，产生了俄国最初的东方学家和汉学家。诚然他们研究中国的目的是为俄国政治外交服务，但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

【东正教会在中国的活动】 在京俄国东正教的活动与来华欧洲天主教会有所不同。首先，来华东正教传教士个人素质较差，在京期间主要为来华的俄国人服务，满足他们的宗教需要，发展中国教徒很少。

另外，东正教会的政治色彩浓厚，历届传教士团都由俄国政府派遣，经费由政府供给，俄国政府要向他们颁发训令，在华期间的一切活动均听命于俄国政府的指挥。

东正教会在华期间为俄国政府服务，完成了不少政治、外交

^① 《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俄）尼古拉·班蒂什—卡斯基编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94页。

任务。东正教会要管理俄国留学生，监督他们学习，并把学习情况向俄国政府汇报。东正教会要为俄国商队来华贸易服务，为商队搜集经济情报，联系有关事宜，解决商队遇到的某些困难，甚至帮助进行贸易等。东正教会与留学生一起，还要为俄国政府完成一些秘密使命，如搜集情报等。有时东正教会还要代表俄国政府，向理藩院交涉某些事情。就东正教会本身来讲，他们也从事一些经济活动，如放高利贷，从中牟利，以补经费的不足。

第三节 清朝与西方国家的关系^①

一、清朝与荷兰关系

【郑成功收复台湾】^② 1642年，荷兰独霸台湾后，仍不断侵扰大陆沿海。1646年，清军南下福建，郑成功背父抗清。1659年，在北伐清军失败后，郑成功退据福建厦门。因厦门狭小，郑成功决定收复台湾作为抗清基地，并解除荷兰殖民者在东面的威胁。1661年4月21日，郑成功率军25000名自金门岛出发。4月29日，郑军出其不意地进鹿耳门，在禾寮登陆，进攻荷军据点赤嵌城（荷名普罗文查，今台南市），并断绝城中水源，迫使该城荷兰守军投降。随即郑成功又移师台湾城（荷名热兰遮城，今台南市安平镇）。荷军急忙遣使请求以纳银来换取郑军撤退，郑成功致书荷兰总督揆一（Frederick Coyett），严正指出：“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踞，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③但

^① 参阅：肖致治，杨卫东：《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

^② 参阅厦门大学：《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③ 连横：《台湾通史》卷一。

荷军顽抗待援，拒不投降。8月，十艘荷兰救援兵船从巴达维亚赶到台湾，被郑军击败逃逸。城内荷军长期被围，粮尽药缺。揆一走投无路，遂于1662年2月1日签约投降。10日，揆一率残部退出台湾。郑成功收复台湾，是中国人民反对西方殖民侵略斗争的第一次伟大胜利。它解除了台湾人民遭受荷兰殖民统治的痛苦，保全了中国领土完整。

【清荷关系】 清朝建立后，荷兰人便积极寻求与清政府建立联系。1653年(顺治十年)，荷兰的巴达维亚殖民政府派遣斯克德来广州，请求通商，广东巡抚立即上报清廷。1655年，荷兰使节哥页(Peter de Goyer)与开泽(Jacob de Keyzer)再来广东，即被护送进京。经交涉，顺治帝决定允许与荷兰通商，八年一期，人员不得逾百人。但不久清朝宣布禁海政策，而荷兰人又与郑成功集团对抗，实际并未通商。郑成功收复台湾后，荷兰东印度公司曾于1662、1663、1664年三次派遣博尔特率领十余艘武装舰队，打着帮助清政府平剿“海逆”(即台湾郑氏集团)与“朝贡”的招牌，前来中国福建与台湾沿海，企图重新占领台湾，并谋取在中国的贸易特权，但未能如愿。^①1664年荷使范胡伦(Pieter Van Houtorn)再次入京，目的仍在争取扩大商务利益，然而也没有取得进展。直到1686年荷使入京交涉后，清廷才同意将通商时间放宽到五年一次。此后荷兰商人又得到清廷的许多优待。1729年，荷兰人于广州设立商馆。1736年，乾隆帝又免除荷兰人货物进口附加税。1762年，清廷又准许荷兰商船可运输中国土丝出口。但是，清廷的优待并不能满足荷兰通商要求。179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便借庆贺乾隆帝御极六十周年之机，派使节铁俊甫(Isaac Titsingh)和文谱兰(A. E. Van Braam)

^① 胡又环：《康熙初年荷兰舰队来华目的》，《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来华，清廷除热情接待外，还是未允许扩大荷兰在华商务利益。

二、清朝与英国关系

【中英早期接触】 英国人与中国的接触，早在13世纪蒙古西征军中就曾有英人担任翻译和信使。^① 16世纪后，英国人也企图由海路通航中国。1582年、1596年，伊丽莎白女王还两次委派英国商人到中国，并且带交她致中国皇帝的信，结果未达目的。因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已从两个方向分别垄断了东西海上交通航线，而英国人在打开“北半球航道”到中国的尝试中也未能成功。17世纪30年代，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统治已经巩固，构成对葡萄牙的果阿至澳门之间海上运输的威胁。1635年，葡萄牙果阿总督请求英国人替葡运货至澳门。1636年，又有约翰·威德尔（John Weddell）率领的英国舰队，在国王查理一世的支持下，向中国航行。1637年6月，这支英国船队抵达澳门附近的黄坑岛。不久又驶往广州，在虎门与明朝军队冲突。随后，威德尔派人与广东地方政府谈判，表示愿与中国通商。由于葡萄牙人从中作梗，中英之间的第一次官方接触并未取得结果。至此，在大约一个半世纪中，英国人曾几十次地作了打入中国的各种尝试。虽然这一次正式接触也失败，但威德尔却建议英国政府夺取海南岛作为英国对华贸易的基地。^②

【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国】^③ 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自始就获得了对东印度贸易的独占权。而在早期中英关系

①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卷第3页。

② 张轶东：《中英两国最早的接触》，《历史研究》1958年第5期。

③ 参阅〔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英国牛津大学1926年版。

上，它也是英国对华贸易、外交的实际代表者。自163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替葡萄牙运送货物到澳门后，1664和1673年，东印度公司曾两次直接派船到澳门，但都遭到葡萄牙人与清朝广东地方政府的阻难，失败而去。于是，他们便到台湾试探。1670年，两艘英船到达台湾后，即与郑经订了一个二十条协议。英国东印度公司被准许在台湾通商。1672年，在台湾设立商馆，并曾在郑经占据闽南期间开商馆于厦门。不久，清军平定台湾，该公司在台湾及厦门所设的商馆均被关闭。清朝开放海禁后，英船更积极地在中国粤、闽、浙沿海活动。17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喀恰浦为第一任监督，设监督公署于定海。同时，英王又任命他为总领事。但他认为定海不如广州与厦门，乃于1702年离开定海。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正式在广州设立商馆。此后，这个公司驻广州办事处特别委员会便成为执行中英贸易与外交的专门机构。而这个特别委员会的主席，即被中国所称的“大班”，还是广州外国商界代言人。1757年，东印度公司鉴于广州方面对外商限制很严格，规礼又很重，准备派员到浙江宁波开辟贸易。而清政府却在这年宣布洋船只准在广州一地进行贸易，严格禁止洋船再到其他海港。但禁令尚未到达英方，东印度公司已派通事洪任辉试航宁波。1759年，洪任辉（James Flint）到达宁波后，被浙江地方官拒绝。洪氏便继续北上，由海道直抵天津，并通过天津地方官呈书乾隆帝，状告广州行商与地方政府。乾隆帝即特派钦差前往广州会同总督李侍尧查办。洪任辉回广州后，清政府以“勾串内地奸民”罪将洪氏押往澳门圈禁三年。同时两广总督李侍尧又制订《防范外夷规条》，从而加强了对外商的限制。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又多次派员就对华贸易进行交涉，但清政府的限制并未放弃。然而，英国东印度公司仍然从对华贸易中获取了巨额利润，直到1833年该公司对华贸易独占权被取消为止。

【马嘎尔尼使华】^① 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在英国展开之后，对于海外市场的需求更为迫切。英国政府鉴于英国在华商业利益重大，企图谋求与清朝的外交关系，于是决定派遣使团赴北京，东印度公司也乐意为使团提供全部费用。1787年，英国政府任命国会议员喀塞卡特（Charles Cathcart）为大使使华。使团目的除力图消除清朝政府对英国的疑虑外，努力扩大英国在华通商特权，建议两国互派常驻使节。因喀塞卡特病死途中，使团只好折回。1792年，英国政府又选派曾任英国外交官与殖民地行政长官的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率团使华。为了避免使团的商业色彩，英政府特备英王乔治三世祝贺乾隆帝83岁寿辰的贺函一封。并特地选备价值15610英镑的礼物，以争取中国朝廷对使团的重视。还选择包括科学技术人员在内的使团成员，并以装有64门火炮的兵舰作为大使座舰，以显示英国的财富与威力。同时又通过东印度公司事先通知中国政府。1793年8月，使团一行在大沽登岸，清直隶总督梁肯堂专程赴津迎接。9月，乾隆帝在热河避暑山庄接见了马嘎尔尼一行，英使团也参加了乾隆帝83岁生日的庆典。清朝官员原以为英国使团是来进贡与祝寿，但马嘎尔尼返回北京后，则向清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主要内容为：一、请中国允许英商在北京设立商馆；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处贸易。二、请于舟山附近小岛和广州附近划一地方供英商居留、储货之用。三、请减轻和优待英船入港商税。上述要求均遭清廷拒绝，清政府只向马嘎尔尼颁发了乾隆帝给英王的三道敕谕。乾隆帝在敕谕中指出，“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地森然，即岛屿沙州，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况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货物者，亦不仅尔英吉利一国，若别国纷纷效尤，恳请赏给地方，居

^① 参阅〔英〕马嘎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中华书局1917年版；〔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住买卖之人，岂能各应所求？且天朝亦无此体制，此事尤不便准行。”^① 交涉未果，马嘎尔尼一行只好由广州取船快快回国。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英国政府又派遣阿美士德（William Amherst）为首的使团来华，目的仍在于扩大英国在华商务。但此行仍毫无结果，仅带回一道嘉庆皇帝致英王的敕谕。

【澳门事件】^② 葡萄牙人窃据中国澳门，英国殖民侵略者十分眼红。早在178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大班就曾建议英印殖民政府夺取澳门。1802年，英印殖民政府担心侵入葡萄牙的法国占取澳门，妨碍英国在中国的商务，派兵船6艘到达伶仃洋海面，准备占领澳门，被清政府严词遣回。1807年，拿破仑又出兵占领葡萄牙，英国又担心法国侵占澳门。1808年，英印总督又遣兵东来。9月21日，英兵擅自在澳门登陆。两广总督吴熊光未及派兵驱逐，企图和谈劝离。但英兵以保护为词，迁延不去。10月5日，吴熊光下令停止英国贸易。但英兵却乘虚驶进虎门，停泊黄埔，并增兵遣舰，共达13艘760余名。迫不得已，吴熊光只好上奏朝廷。嘉庆帝严谕吴熊光统兵剿击。吴熊光遂调集清军2600名，前往黄埔和澳门。至此，英军指挥度路利（W. O. Drury）表示撤军。1809年3月，英军全部撤离澳门。澳门事件后，清廷将吴熊光革职查办。新任两广总督百龄立即亲赴澳门，调查此事。英国大班刺佛（J. W. Roberts）亲自出具禀结，对英军自行登岸表示道歉，并保证英国兵船不再来粤，清政府遂允许英国商船继续在广东贸易。英国殖民侵略者虽然在澳门事件中失败，但却继续从事破坏中国主权的活动。英国来华商人先后制造多起杀害华人血案，英国大班却拒不交出凶犯，破坏中国的

^① 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三，（美）A·W·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见《清代西人见闻录》。

^② 参阅故宫博物院：《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六册，1932年。

治外法权。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又专门派遣“阿美士德号”（Amherst）沿中国海岸北上，沿途调查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测量中国港湾河道深浅，绘制成详细的航海图，为日后的侵略活动进行准备。

三、清朝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

【法国与清朝关系】^① 中国与法国的关系始于耶稣会传教士。第一个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于1611年到达中国。17世纪60年代，法国国内建立起中国传教会，它的目的既要向中国输送传教士，又要在中国建立布教和贸易关系。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又派包括白晋（Joachim Bouvet）和张诚（Joannes Franciscus Gerbillon）在内的五个耶稣会士来华，他们带着路易十四给康熙的信。1697年，白晋回国，自称康熙帝要求与法国通商，竭力促使法国来华通商。于是法国东印度公司乃派“安菲特立特”（女海神之意）号首航中国。1698年11月，船抵广州，从中国运回大量丝绸瓷器。1701年，该船又作第二次来华航行。与此同时，1700年，法国又组成“中国公司”，以推行对华贸易。此后这个公司与“东印度公司”合并。1728年，法国在广州设立商馆。1776年，法国设领事于广州，傅格林（Vauauelin）被任命为第一任领事。18世纪末，法国国内革命兴起，使它在鸦片战争前对华外交与贸易一直没有取得显著进展。

【早期中德关系】^② 如同早期中法关系一样，中德关系也开始于耶稣会传教士。最早来华的德国耶稣会士有汤若望（Joa-

① 参阅束世数：《中法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

② 参阅〔德〕施丢克尔著，乔松译：《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三联书店1963年版。

nes Adam Schall Von Bell) 等人。汤若望于1619年到达中国澳门,以后便由此经粤、赣等地来到北京,被明廷授命修正历法和监制大炮,后又任清朝钦天监监正。在中德经济关系方面,由于在1871年以前,德国还处于邦国林立状态,对华贸易额极其有限。德国的对华贸易可追溯到1716年。该年,德国的俄斯德顿会社商船开始了印度洋贸易,其船队还到达中国广东南海海面,但遭到荷兰、英国的排挤而未果。直到1752年,德国各邦中力量最大的普鲁士王国,由其国王腓特烈二世特准设立的“普鲁士王家艾姆敦对华亚洲贸易公司”开始派船开展对华贸易。“普鲁士国王”号(King Von Preussen)从广州运回大量瓷器、茶叶、生丝和丝织品。它不但成为德国来华的第一船,而且开通了由艾姆敦到广州的中德两国间的海上直接联系。在以后的五年间,“普鲁士王家艾姆敦对华亚洲贸易公司”的船只曾十数次来广州,使艾姆敦成为德国的中国物品专卖市场,吸引了汉堡、不来梅、法兰克福、科隆等地商人。七年战争(1756—1763年)后,虽然该公司不能直接从中国运货至艾姆敦,而必须经过英国卸货,但该公司仍积极参加对华贸易。1787年,普鲁士国王还任命英商皮尔为驻广州的普鲁士王国领事。与海路贸易的同时,18世纪下半叶,普鲁士还通过俄国由陆路开展对华贸易,不久由于沙俄征收过境税,迫使普鲁士商人于1822年放弃了陆路贸易。

【早期中美关系】^① 1873年4月美国取得独立后,波士顿商人曾于当年集资装备“哈里特号”商船,但该船行至好望角因英船阻挠而中途折返。次年2月,纽约和费城商人又集资装备“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8月抵达广州,从此开始了中美之间的直接关系。1786年,美国政府以山茂召(Samuel Shaw)为

^① 参阅〔美〕翰德烈著,陈郁译:《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汪熙主编:《中美关系史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驻广州的第一任领事。在对待中国的外交方针上，美国政府要求美商在中国避免公开敌对行动。1821年，美国一水手扔罐砸死一中国船妇，在广州官员要求下，美国船长只好交出该水手，并按中国法律处死。因此，早期中美关系发展稳定，美国的对华贸易也发展迅速，很快后来居上。1795年以后，美国从广州出入的船只已仅次于英国而领先于其他西方国家。1820年至1830年间，美国商人于广州陆续建立了6个商馆。但19世纪30年代后，随着美国国力增强，美国政府开始支持美国商人对中国市场的突破，并采取了紧跟英国侵略中国步骤的政策。

【清朝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① 入清以后，葡萄牙与西班牙两国的海上殖民势力已经衰落，但仍然不断有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船只来广州贸易。葡萄牙并继续占据中国澳门，以此开展对华贸易。此外，西方的意大利、比利时、丹麦、瑞典、墨西哥也先后来广州与中国通商。意大利并于1670年向清朝派来使节。丹麦在当时称为噠国，广东人则称为黄旗国。1731年，丹麦设立商馆于广州。第二年，瑞典的东印度公司也于广州设立商馆。清代称瑞典为瑞国，广东人又称蓝旗国。瑞典东印度公司一直以对华贸易为主要业务。自1731年至该公司被解散的1806年的共75年间，该公司先后组织了132次的来华航行。另外，17世纪，波兰国王约翰三世为了对付俄国和土耳其，曾通过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意大利传教士闵明我与中国皇帝联系，但由于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这一活动没有成功。

【清政府对澳门的管理】^② 入清以后，澳门仍隶属香山县，处在清政府的法律政令管束之下。葡萄牙人仍向香山县完纳地租。1647年（顺治四年），清政府在此设置前山寨，立参将

^① 参阅〔清〕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光绪十七年（1891）刊本。

^② 参阅介子：《葡萄牙侵占澳门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府，专门戍守澳门。1730年（雍正八年），又因澳门距香山县城遥远，遂在前山寨专门设立县丞署，就近管理澳门民政事务。随着澳门人口增加，清政府为了加强对澳门的管理，1734年（乾隆九年），又专设海防同知。统管海防和澳门事务。印光任被任命为第一任海防同知。赴任后，他立即制订并颁布《管理澳夷章程》七条，规定澳门洋船进口与内地商民入澳制度。^①鉴于在澳中外居民互相斗殴杀伤案件的多次发生，1749年，清澳门同知张汝霖和香山知县暴煜共同制订《善后事宜》十二条，分别得到广东督府的批准和葡印果阿总督的赞同，在澳门立石刊刻。《善后事宜》除明确规定在澳门发生的犯罪案件一律按清朝法律治罪外，还规定在澳门严禁夷人出澳入内、賒物收贷、私擅凌虐、擅兴土木、贩卖人口、窝藏罪犯、设教从教，违者按律治罪，或者驱逐出澳。它重申了中国政府对澳门的主权，使清朝对澳门的管理进一步加强。1808年英国兵船围占澳门事件（见前专目）发生后，次年新任两广总督百龄和巡抚韩崙立即就防范外国兵船入澳门制订了《民夷交易章程》，规定外国货船所带护货兵船不许擅入中国各海口；而外国货船进口，预先也要报请澳门同知给予印照，中国守口兵船验照放行。这个章程得到清廷批准。另外粤海关部还派员在澳门港口征收商税。鸦片战争前，澳门在清朝政府监督管理下，成为西方各国到广州进行贸易的基地。

四、朝贡体制与中西关系

【朝贡制度的外交模式】 中国封建王朝处理对外关系的传统模式是朝贡制度。这种制度，产生于先秦时代。在先秦典籍

^①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上《形勢篇》、《官守篇》。

中，“朝”是指臣下觐见君主，“贡”则是下人献纳物品给主人，从而“朝贡”制度就成为天子与诸侯之间隶属关系的模式。秦汉以后，中原的封建王朝又把它作为“羁縻”周边地区少数民族政权的一种制度。出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观念和现实中中华文明发展的水平，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对于外国使节的来华，也一概视作“朝贡”。从而“朝贡”制度又成为古代中外交往的基本模式。明清时期，朝贡制度比以前朝代更趋完备和严格，模式也更为僵化。这两代王朝不但对外国朝贡时间、人员、路线等作了极为详尽的硬性规定，而且还规定了一整套繁琐的朝贡礼仪程序，包括来华后进入宾馆的礼仪到上朝时的服饰，动作、站立位置、进退路线等等。因此，外国使节来华，首先都被安排学习中国的各种“朝贡”礼仪，以表示接受中国的优越文化。而以朝贡为媒介所形成的宗藩关系，则表示着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这种宗藩关系，尽管表面上是一种以小事大的不平等关系，但作为宗主国的中国封建王朝，却以一种“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不治主义态度对待外国，原则上并不干涉藩属国的内政。这与近代表面上平等，实质上却是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这种朝贡外交关系，对于外国使团来说，除了在中国的往返途中衣食住行免费且以优厚招待外，还可得到中国朝廷的优厚“赏赐”，从而给自己带来特别的经济利益。因此，外国方面总是力图突破朝贡的时间限制。而在明清王朝的统治者看来，这种朝贡关系不但可以体现“天朝至尊”的观念，而且还可“羁縻”外国，以怀柔远人来消除外部势力的冲击。但实际上，这种外交模式，并不能适应自16世纪世界局势变化后的中国对外关系需要。

【明清王朝对西方知识的缺乏】 明清王朝的统治者们，不但自己一直以“天朝”自大的态度看待世界，对世界不求了解，

而且对于中国百姓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一直采取禁止或消极态度。在他们看来，外国人不管来自何处，都是夷狄，“夷狄非有诗书之教，礼仪之习，好则人，怒则兽，其习气素然”。^①甚至对于西方传教士们所介绍的域外世界知识，也依然漠视。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依然停留在华夷之辨的框架中，从而造成对西方国家知识孤陋寡闻的状况。

当时，很多中国封建官员还不知道来中国“朝贡”的西方国家具体位置。乾隆时名士杨复吉，就曾把加里曼丹岛和菲律宾群岛当作南北美洲；甚至道光皇帝也不知道英国在什么地方，与中国有无旱路相通。对于西方国家来中国，不少人认为，“番人性嗜乳酪，胶结肠腹，惟大黄茶叶，荡涤精神，”如果数月不食，就“有瞽目肠塞之患。”^②他们既不关心西方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状况，更缺乏对西方国家外交手段和殖民主义侵略本质的认识。1834年，广州的清朝要员们还上书认为，英国“除炮火以外，一无长技”^③；甚至林则徐开始也相信英国兵腿足不能屈伸，上了岸就不能打仗。在重大的外交决策中，清朝统治者也不重视社会上有关外部世界的信息，往往“外知而内不知，下知而上不知”。^④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中国知识界对于西方国家的记载，不但零星简略，而且多属传闻转抄之作，缺乏具体和认真的研究。

【清朝对西方的反应】 自16世纪，明清王朝方面一直虚幻地把来到中国的西方殖民国家商人认为是西方国家派来的朝贡使节。因此，他们把葡萄牙、荷兰、英国都看作是如同周边邻国一

① 明宣宗《驭夷篇》，载《明宣宗宣德实录》卷三八。

② 《道光筹办夷务始末》卷二。

③ 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16页。

④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三十五。

样的朝贡国。然而，西欧各国自15世纪后，已开始孕育形成他们自己的近代外交制度。这种外交制度以国家主权平等观念为基础，主张通过国际法原则处理相互关系。尽管这种外交关系在表面上是平等的，但实质上却是一种强国控制弱国的不平等关系。最初，来到中国的葡萄牙、荷兰等国，由于其势力不足与中国相抗衡，都不曾与明清政府认真谋求国家地位平等的近代外交关系。到18世纪后，通过工业革命迅速发展壮大的英国，不但要在中国争取地位平等的外交关系，而且还处心积虑地要在中国扩充市场。可是，中国清朝的封建统治者们并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对外方略，仍以传统的朝贡外交模式来处理已变化了的中西关系，从而使自己在与西方国家外交活动中日益被动和孤立。英国人要通交，清朝政府仍把通交与通商混为一体，让广州行商受理一切外贸和外交事务；英国人要谋求国家主权地位平等，清朝政府则坚持天朝体制，致使跪拜礼仪成为外交死结；对于英国要求扩大通商贸易，清朝政府则认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①却看不到通过国际贸易可以发展本国经济，促使中国富强；对于英国人的为非作歹，一些清朝要员却期待以儒家道德规范进行教诲，“以情理之真诚，化犬羊之桀骜”；而当西方殖民者寻衅闹事时，清朝政府照例又是颁布一道禁令，既拿不出更有效的制裁办法，也没有认真区别所有商人，更不会利用西方各国之间矛盾来施展自己的外交策略，从而使西方国家在对华侵略的问题上，态度和行动一致起来。统治者甚至对于中国百姓也为渊驱鱼，造成“我之人可为夷用，夷之人我不得而

^① 清朝政府曾先后于1744年（乾隆九年）、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1809年（嘉庆十四年）、1831年（道光十一年）、1835年（道光十五年）颁布有关管理外商办法。

用之。我之虚实，夷人尽知，夷人之虚实，我不得而知之”^①的严重局势。对于一心要打通中国市场的英国人，一些官员还以为是“倾心向化”，为此清朝政府曾不吝接待。如马嘎尔尼使团来华，据当时英人估计，清朝所花招待费，不下17万英镑。另外材料也说清政府支付的供膳费每日为五千两，全部耗费约计白银85万两左右。^②同时，为了让英国“贡使”看到中国“民物康阜，景象恬熙”，而“知感知畏”，乾隆帝还特地安排马嘎尔尼一行从内陆至广州。但马嘎尔尼却在这次中国旅行中看穿了清朝内部的积弱。马克思对此曾经评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③

第四节 西方传教士在华的传教活动

一、16世纪耶稣会士来华

【耶稣会士来中国】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之后，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仅有的几个旧教国家与罗马教会形成旧教同盟，并于1540年成立了耶稣会，进行反宗教改革活动，以恢复、振兴罗马教廷的势力。但是当时欧洲大陆已无旧教发展的余地。为了扩大罗马教会势力，耶稣会于是努力向海外发展。大批耶稣会士跟

① 佚名：《英吉利前说》。

② 据王曾才：《马嘎尔尼使团评述》，载《中英外交史论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17—40页。

③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页。

随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早期殖民者奔向世界各地，从瑞典到刚果，从秘鲁到中国，到处都有他们的足迹。

耶稣会士来华始于1552年。当时葡萄牙已控制整个东南亚，其势力远达东亚地区。在中国，它与明廷发生几次武力冲突之后，又私自占用了澳门西南的上川岛作为临时贸易据点。明廷则严格限制葡萄牙人进入中国。1552年初，耶稣会传教士圣方济·沙勿略（Francis Xavier）首次自日本来到上川岛，打算寻找机会潜入广东传教，但是始终找不到机会，最后终于死在岛上。三年以后，耶稣会印度省省长巴拉多设法进入广东，逗留一月后返回。他可算是第一个到达中国内地的西方传教士。1557年葡萄牙人侵踞澳门后，耶稣会士随之而来，于1562年开始在澳门建教堂传教。

在随后的二十余年间，耶稣会士仅能在澳门一地传教。于是，他们与其他天主教会派经过多方努力，先后计有32位耶稣会士，22位方济各会士，2位奥古斯丁会士及10位多明我会士设法进入内地传教，结果都失败了。他们即使到了广州，也不能长期居留。于是传教士们“一致认为中国是无孔可入的”。^①

【耶稣会决心改变传统传教政策】 耶稣会在澳门传教期间，执行的是当时通行的传教政策，凡是领洗入教的中国人，都要改为葡萄牙籍，在姓名、服装、风俗上也都要按照葡、西的习惯加以改变。这种政策带有明显的强制性。经二十余年不能进入中国内地的失败之后，传教士们逐渐认识到，为了进入中国传教，必须改变传教政策。

1578年7月，耶稣会远东视察员范里安（Valignani Alexandre）来澳门视察工作，他经过一年的认真了解，分析了

^① 罗光：《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台）徽祥出版社，1967年第10页。

传教士不能进入中国的原因，认为关键在于要根据中国情况制订新的传教政策。为了“把天国的福音传播到中国”，他提出不但可以让信教的中国人仍维持原样，而且来华传教士都要“中国化”，特别是要学习汉语，他的观点促使随后来华的耶稣会士改变了在华传教的政策和方式。

为了试用新方法，范礼安安排耶稣会士罗明坚自印度来到澳门学习汉语，等待机会进入内地，从此耶稣会的传教活动进入新阶段。

【罗明坚到肇庆传教】 罗明坚 (Micheal Ruggieri)，1543年生于意大利的那不勒斯，1578年9月到印度果阿传教，1579年7月来澳门。经过一年多的学习汉语，于1580年12月开始到广州活动。以后他又先后四次到广州作短期停留。由于他会说汉语，举止文雅有礼，以中国习惯向中国官吏行叩跪礼，又向中国地方官送礼，因此得到礼遇，还被破格允准住进暹罗馆。他用送礼等方法得到肇庆府总督陈瑞的批准，在答应改换中国服装，做中国皇帝的子民的前提下，可以到肇庆府长期居住传教。对此，罗明坚完全接受。1583年2月，罗明坚等传教士秃头剃须，改穿中国僧服，在肇庆城外江边，建起中国内地第一所天主教堂，新的传教政策获得了成功。

传教士进入中国的问题解决后，自1583年至1588年，罗明坚、利玛窦等一直在肇庆传教。然而他们的传教事业发展很缓慢，到1586年，他们只发展了40名教徒。事实证明，传教士进入中国只是第一步，如何使中国人信奉这一外来宗教，则是更重要也是更难解决的问题。1588年，罗明坚因公务回欧洲，继续寻找在华传教新方法的任务就落在了利玛窦的肩上。

【利玛窦的知识传教法】 耶稣会士利玛窦 (Matteo Ricci) 是一个人文学者、地理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工程学

家。他在1577年25岁时到果阿传教，1582年接范礼安命令来澳门协助罗明坚传教。他随罗明坚一直参加了肇庆的传教工作，1588年后则接替罗明坚主持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他通过长期观察认为，“不可能直接了当地改变这个国家的信仰。中国人是如此深信他们比蛮夷优越，以至首先应当使他们改变轻视欧洲的态度”。^①为此，他主张“应当让中国看到西方科学所取得的成就”。^②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他在肇庆时就专心于绘制地图，制造天文仪器等工作，以至于引起罗明坚的不满，攻击他“在中国地理学问题上卖弄自己的才华”。

1589年，利玛窦移居韶州，开始使用知识传教法。在此结识了儒生瞿太素，并翻译欧几里德《几何学》。从此便奠定了他“合儒”、“补儒”和“超儒”的传教政策。他接受瞿太素的建议，儒冠儒服，以学者面目宣传西方科学知识，博得一部分封建士大夫的好感，并极力打入宫廷。1601年初，利玛窦到北京，得到万历帝的赏识，赐留居北京传教。此后直到1610年利玛窦去世，未再离开北京。知识传教法成功了。^③

利玛窦在华28年，结交达官贵人朝廷命官数百人，先后撰写、翻译天文、数学、地理、思想、语言、美术、音乐等方面著作19种，为西方科学的东传做出了贡献。

二、天主教在华传教的兴盛时期

【耶稣会士在北京传教】 由于利玛窦的努力，1600年后耶稣会开始在中国的核心地区——北京传教。传教士们口说汉语，

^{①②} 《南怀仁书信集》序言。

^③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本，中华书局，1983年，第652—653、679—680页，附录《1978年法文版序言》。

身着儒服，每人还有中国名字，出入宫院贵族之家，谈史论世，展示奇器新说，博得中国上层人士的好感和支持。到1610年时，中国内地已有2500个天主教徒，21位耶稣会士（其中8位是中国人）。^①

利玛窦死后，龙华民（Nicholas Longobardi）接替他领导中国的传教事业，耶稣会在北京发展起来，不仅教徒人数大增，而且开始为明廷服务。明末，历法亟待修订，利玛窦生前曾数次请求罗马教廷派遣具有数学、天文才能的耶稣会士来华。1611年，明廷首次敕令传教士修正历法，翻译欧洲天文学书籍，由熊三拔（Sabbathinus de Ursis）承担这一工作，后因钦天监官员的阻拦而中止。1613年，耶稣会士金尼阁回欧洲，再向教廷提出派遣天文学家的要求，于是教廷乃派两位优秀数学家、天文学家邓玉函（Joannes Terrenz）和汤若望来华。1629年，耶稣会士再次奉命修历，由邓玉函负责。不久邓玉函去世，由汤若望和罗雅谷接替。经几年努力，在1634年修成新历，并编译天文、数学书籍137本。这一时期有20位耶稣会士分别在明廷各部供职。

传教士供职朝廷是为了巩固其在中国的地位，发展传教事业，到1642年，耶稣会的足迹已遍及除云、贵以外的中国各省，发展教徒150000人，其中有10名太监，50名宫廷妇女，140名皇室成员。利玛窦也被教会尊称为中国教务的创始人。

【汤若望的传教活动】 汤若望是继利玛窦之后，17世纪上半叶在华最有名的耶稣会士。汤若望1591年生于德国科隆，1611年加入耶稣会。他精通天文、历法、兵器制造等，1622年随金尼阁来华，去西安传教。1630年（崇祯三年），因邓玉函去世，奉命

^①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177页。

入京修历。当时罗雅谷已先一年进修历局，于是他与罗同时供职修历局，负责修改历法，制造天文仪器，推演算术，翻译西书。崇祯五年进历书30卷，七年进61卷，八年进《七政行道历》，并主辑崇祯《新法算书》一百卷，还制成日晷、星晷、望远镜等天文仪器。1643年（崇祯十三年），因战事紧急，他奉命督造战炮，立有功劳。十五年再铸洋炮，谕令将造法传授“兵杖局”，监造“无间大将军”五百门。汤若望还与焦勳合译了《火攻挈要》，详述各种火器的制造法及使用法。

入清后，汤若望深得顺治帝宠用，1644年（顺治元年）被授以钦天监监正的职位。顺治不时驾幸其寓所，称他为“玛法”（满语“亲爱的神父”）。顺治七年赐汤若望宣武门内天主堂旁空地一方，重建新堂。顺治十年赐号“通玄教师”，^①十四年赐御书堂额“通玄佳境”，并制《天主堂碑记》。顺治死后，汤若望因杨光先事件被捕入狱，议决凌迟处死，忽因北京地震而赦免。1666年病死北京。数年后康熙追复官职。汤若望是明末清初中国耶稣会教区的主持人。

汤若望在华四十余年，前后掌钦天监监正约二十年，译、著天文、数学等书籍二十余种。由于汤若望等传教士在清入关后很快转而为清廷服务，并利用在清廷的地位，为扩大传教活动服务，使教徒人数大增，他试图说服顺治皈依天主，终因顺治早亡而未实现。

【杨光先事件】 传教士自从进入中国传教，虽然作了适应中国习俗的改变，仍然发生了不少中国人排斥天主教的事件。明末最大的一次教案为1616年徐如珂、沈灌发动的南京教案。清初最大的一次教案为1664年杨光先所发动。

^① 《清史稿》卷二七二《汤若望传》。

早在1660年，徽州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就曾上书指控传教士，未准。1664年，他又以汤若望等传教士阴谋不轨上告礼部，并著《西法十谬》、《选择议》等攻击西方历法。摄政大臣据此颁令，取缔天主教，废除《时宪历》，仍用大统历及回历。汤若望被解除职务、与利类思(L. Buglio)、安文思(G. Magalhaens)、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等耶稣会士一起被捕入狱。随后汤被判死刑，因地震得免。

复用大统、回历后，杨光先任钦天监监正。其实杨光先并不懂历法，他的立场是：“(西法)即使准矣，而大清卧榻之内，岂惯谋夺人国之西洋人鼾睡地耶也？”他的主张是“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①1668年，康熙亲自处理此案，他命杨光先与南怀仁同时当众测试天象，南怀仁无误，杨光先则误差不断，于是康熙废大统、回历，复用《时宪历》。杨光先被革职，南怀仁接替钦天监工作，康熙重新起用传教士，汤若望追封复职，补行葬礼。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也恢复起来。

【南怀仁与康熙】 汤若望死后，由南怀仁接理耶稣会在华传教事务。南怀仁1623年生于比利时的匹萨姆，1641年进设在比利时的耶稣会学院学习。以后他在鲁汶学习二年，接着在科尔特莱和布鲁塞尔摄政五年。他也是一位出色的科学家。1658年与柏应理(P. Couplet)、殷铎泽(P. Intorcetta)、陆安德(G. Lobelli)等耶稣会士自里斯本来到澳门，第二年进入中国内地，被派往西安府当传教士。1660年到北京，任汤若望助理，参与纂修历书。杨光先事件中他为传教士辩护起了很大作用。1669年康熙命他接任汤若望的工作为钦天监监副，1674年升为监正，并奉旨制造天文仪器多种。吴三桂反清后，他奉命督制西洋大炮，

^① 杨光先：《不得已》卷下，南京国学图书馆新印本。

1680年制成神武炮大、小320具。1682年进职右侍郎。1688年，南怀仁死于北京，康熙赐葬地，葬礼隆重，并赐谥“勤敏”。

南怀仁为清廷服务27年，深得康熙赏识，死前官阶为二品工部右侍郎。在处理杨光先事件中，康熙接触到了先进的西学，震动很大。以后他除下令钦天监官员必须学习西方历法才能升用外，自己更对西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召南怀仁入宫进讲，坚持跟传教士学习了几十年，每天学习三、四个小时^①。先后学习了西方数学、测量、地理、医学、音乐、拉丁文等各方面的课程。由于南怀仁与康熙关系密切，使耶稣会的传教事业有了可靠的保障，这一时期耶稣会发展教徒约24万余人，平均每年有30多名传教士在中国各地活动。

【法国耶稣会士来华】 最早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是金尼阁，他在1611年来中国，1628年卒于杭州。以后，路易十四为了发展法国在东方的势力以抗葡萄牙，于1685年首次正式派遣法国耶稣会士第一流的科学家张诚、白晋、李明(Le Comte Louis Daniel)、洪若翰(Fonteney Jeandle)、刘应(Visdelou Claudus)五人来华。他们之来，一为传教；二是要进行学术研究，研究有关中国的地理、历史、生物、医学、文物制度、风土人情、工艺美术等，并定期向国内送交研究报告，以备法国制订东方政策参考。

五名法国耶稣会士于1688年到中国，因南怀仁去世前已向康熙推荐，因而受到康熙的重视，张诚和白晋奉旨留北京服务，其他三人派往各省传教。张诚和白晋接替南怀仁做了康熙的老师，他们把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的几何学译成满文向康熙进讲，并先后向康熙讲授了测量学、静力学、天文学、数学、医学、解剖学等

^① 南怀仁：《鞑鞑旅行记》，见《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1985年版。

课程，还在宫中设置实验室，以研究化学和制药。张诚和白晋深得康熙重用，张诚曾参加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工作，白晋则于1697年奉康熙之命回国，以招聘更多博学的传教士来华。1699年，白晋带领第二批十名兼科学家的法国耶稣会士来华。到1773年止，先后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将近有一百人。

【各省教会的建立】 到1700年，中国境内已有30万耶稣会发展的天主教徒，他们除在北京外，还分布各省，如江南、河南、湖广都设有耶稣会的教务中心。传教士郭居静（Cattaneo Lazare）在徐光启的帮助下设立了上海教务中心。到17世纪末，上海地区已设立大小教堂135座，教徒人数达2万人。山西和陕西地区由传教士方德望发展传教事业，该地区也成为耶稣会传教中心之一。

除耶稣会外，这一时期其他会派也纷纷在各省传教。西班牙籍方济各会神父于1632年到福建传教。1650年，该会神父克里敦到山东济南传教，到1700年该会在山东各地已发展教徒6900名。方济各会还分别在广东东部、江西、江浙、南京、安庆等地开辟传教基地。

多明我会于1587年到澳门建立传教基地。1632年到福建，与方济各会在福建分地传教。1707年，罗马教廷把福建传教权全部授于多明我会。

巴黎外方传教会于1683年来华。1684年到厦门、福州传教。随后在四川、云南、贵州建立传教区。

遣使会由罗马教廷传信部（又称海外传教部）派遣，于17世纪末叶来华传教，在北京建有教区。四川也是其传教的中心地区之一。1773年，教皇解散耶稣会后，由遣使会接替了耶稣会在华的传教工作，遣使会成为天主教在华的重要会派之一。

以上会派的传教情况远不能与耶稣会相比，不论是传教

士活动的地区，还是教会发展教徒的人数，耶稣会都占绝对优势。

三、礼仪之争

【礼仪之争产生的背景】 正当天主教会传教事业在中国兴盛发展的时候，来华传教士之间出现了礼仪之争。这场争论长达百余年，康熙也曾参与其中，与教皇直接较量。争论的结局则直接导致了中国实行禁教政策。

引起礼仪之争的直接原因是利玛窦在中国实行福音化方法。利玛窦为了吸引中国人信仰天主教，除进行知识传教并竭力融合中西文化外，还准许中国教徒继续敬天祀孔。有些传教士认为这已属天主教所禁止的异端之列，所以起而攻击。然而大多数在华耶稣会士根据自己的观察认识到，中国礼仪并非拜偶像，禁止中国礼仪也会影响传教事业，所以极力为中国礼仪辩护。^①这就构成了对立的两方，两方之间长期争论不休。

其实，礼仪之争长期延续还有更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具体来说就是各国传教士对于在华传教权的争夺。自从“宗教改革”之后，传教士的活动就由本国政府领导，以殖民扩张为目的。所以在殖民争夺的同时，也存在欧洲各国争夺传教权的斗争。自葡萄牙人来到亚洲后，葡属耶稣会在1585年从教皇那里获得在中国及日本的传教权，1632年后，西属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来华，为争夺传教地与葡属耶稣会发生矛盾。1622年罗马教廷设立传信部，负责海外殖民地的传教事业，并直接派传教士来华传教，这也与葡萄牙发生矛盾。以后法属耶稣会，巴黎外方传教会

^① 参阅《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0—105页。

等来华，同样出现争夺传教权的斗争。这些斗争的重要表现形式就是礼仪之争。

另外，西方天主教文化很难简单地移植到具有高度发达传统文化的中国来，礼仪之争也是中西文化间的一场冲突。

【关于中国礼仪的前期争论】 礼仪之争自1611年开始，至1723年止。而最后则拖至罗马教廷传信部决定收回以往禁令的1939年方告结束。一百余年的争论大致可划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可算是前期争论。

礼仪之争最初是在耶稣会内部出现的，主要争论译名问题。1611年龙华民接替利玛窦的工作，他不同意把造物主译成汉语为“天”、“上帝”、“天主”等，于是向耶稣会中国日本省省长上书，从而正式挑起礼仪之争。在华耶稣会士们经数次开会讨论，大多数支持利玛窦的作法，少数人赞成龙华民的意见。争论二十余年之后，到1633年在华耶稣会作出决定，沿用利玛窦的作法，允许自由采用译名，允许中国教徒保留传统礼仪。此时耶稣会已设立中国省，中国省省长下令焚毁龙华民所写的攻击利玛窦的文章，第一阶段争论到此结束。

【其他会派参加争论】 耶稣会内部的争论刚告结束，其他会派又粉墨登场。1633年，西属多明我会的黎玉范和方济各会的利安当到福建传教，攻击耶稣会允许教徒保留中国敬天、祀孔、祭祖的礼仪，从而使争论进入第二阶段。

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首先在福建禁止中国礼仪，中国教徒群起反对。1643年，多明我会上书教廷传信部，询问中国礼仪问题，并说明中国礼仪是异端宗教典礼。教皇英诺森十世根据多明我会提供的材料，在1645年颁布禁令，禁止中国礼仪。在华耶稣会士得知消息后，派代表卫匡国（Martinus Martini）等回罗马，申辩本会观点，并提供祀孔、祭祖是社会礼仪，不是宗教

迷信的材料。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在听取耶稣会的意见后，于1656年又颁布一道法令，规定“如祀孔和祭祖的礼仪，真象卫匡国所说，属于社会礼仪，教皇准许中国教徒可以举行”。^①多明我会提出反对，质问教皇这一法令是否否定了前一禁令。于是圣职部在1669年又下部令，“声明上述两项部令同时有效，后者并不废除前者。按照实地情形看，事件和哪项部令中所说的相合，即执行该项部令”。^②

由于传教士们对这三项部令不知适从，随后二十余年间，在华传教士各按自己的需要来理解、执行教皇部令，传教局面一片混乱。1676年来华传教士纳瓦雷特在欧洲出版《中国历史及宗教风俗概观》一书，把礼仪之争的情况介绍给了欧洲全社会，从而使这场争论波及到社会各个阶层，争论的范围扩大了。

【康熙与罗马皇帝的较量】 1693年，巴黎外方传教会士颜珣 (Maigrot Charles) 到福建传教，他坚决反对中国礼仪，并再次把中国礼仪问题提交教皇仲裁。礼仪之争第三阶段开始。

听说颜珣派使回罗马，耶稣会士也赶紧行动。在耶稣会士的请求下，康熙于1698年作了中国礼仪不是宗教迷信的批示，耶稣会士如获至宝，火速送往罗马。1700年，克里门特十一世继任教皇，决心彻底解决礼仪之争。经过几年研究，于1704年再下禁令，并派遣教皇特使图诺 (Tournon, Charles Thomas Maillard de) 来华执行。

康熙对传教士中的这场争论本不感兴趣，他有既定原则，一是保护为中国工作的耶稣会士，二是维护中国的传统礼仪。1705年，图诺来到中国，康熙多次召见，优礼相待，并向他阐明中国人不能放弃传统的礼仪，如果有人反对礼仪，传教士就很难再留

^{①②}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台）光启出版社1961年版，第85页、第92页。

在中国。然而图诺是为执行禁令而来，1707年，他不顾康熙的一再警告，终于在南京公布了教皇禁令。康熙闻讯大怒，一面下令在中国的传教士一律领票传教，并要声明遵守利玛窦的成规；一面派人把图诺押解澳门。以后，图诺在澳门长期关押，直到171年病逝。

图诺出使给传教士在华活动带来了危机，为了挽救传教局面，教皇决定再派特使来华疏通。1720年，特使卡洛来华，带有“八项准许事项”，对中国人供牌位、祭亡人等礼仪作了某些让步。康熙先后召见卡洛十余次，对他反复阐明中国礼仪的性质，以及自己的态度。无奈卡洛仍是为禁令而来，康熙再劝说也无济于事，只好于1721年放他回国。

【礼仪之争的结束】 卡洛离华前在澳门发表公函，宣布“他本人不能更动教皇禁约上的一字一文。也不能暂时停止禁约在中国的效力”。^①这是对康熙的挑战。对于这一挑战的回答则是中国自1723年开始全面禁教。礼仪之争就此告一段落。然而，问题并未结束，1742年7月5日，教皇本笃十四世宣布八项准许事项作废，把禁止中国礼仪作为入教的第一要求，实行更严厉的禁令。

事隔190余年之后，罗马教廷传信部在1939年12月8日颁布部令，收回了以往的所有禁令，禁止随便讨论礼仪之争。礼仪之争经过长期较量，最后以罗马教廷的让步而告结束。

【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礼仪之争直接导致了康、雍朝的禁教。然而，礼仪之争的影响远不止此，它客观上还对中西文化交流产生过重要影响。它加速了中国思想文化的西传。由于争论的需要，争论双方争相翻译中国经籍，介绍中国情况。如传教士

^①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使》（台）光启出版社1961年版，第180页。

们在这一时期把中国的四书五经等古典经籍以多种译本介绍给西方。而当时欧洲正孕育着启蒙运动，中国思想文化对启蒙运动产生过重要影响。

礼仪之争的实际意义，还在于它捍卫了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独立。康熙用传统的中国文化对抗天主教文化，用高超的政治外交手段与罗马教皇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一斗争表现出中国人民对待任何形式的外来侵略的正义立场，中国人也有保留自己传统文化及独立创造自己历史的权利。

另外，康熙与教皇的政治外交斗争还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他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斗争策略上晓之以理，绳之以法，既不盲目“排外”与“闭关自守”，也不拜倒在西洋人的脚下，较好地掌握住了外交上的主动。

四、传教活动的衰落时期

【雍正禁教】 由于教皇禁令激怒了康熙，康熙生前就决心禁教了，他曾在卡洛呈上的教皇禁约上批示说：“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①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康熙末年虽然传教士要领票传教，不领票者被驱逐出境，传教士的活动也受到限制，但并未实行严厉的禁教。

雍正继位后，浙闽总督觉罗满保飞章上奏，请严行禁教。加之当时康熙第九子允禩在康熙末年谋立之事发，牵扯到了传教士，于是雍正严行禁教。各省天主教堂一时拆除很多。传教士除供职钦天监的20余人外，其他50余人均被驱往澳门。中国人也被严格禁止信仰天主教。^①

^① 陈垣：《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

但是，雍正禁教后，天主教并未根绝，秘密天主堂仍散布全国各地。广州一城就有15座，教徒近二万人，加之清王朝一直未间断任用有科技水平的传教士，所以传教士的活动实际未断。乾隆朝一面不断重申禁教令，一面仍然引用传教士。当时出了两个比较有名的传教士，一是蒋友仁（Benoist, Michel），一是画家郎世宁（Castiglione, Joseph）。乾隆曾令蒋友仁在圆明园中修喷水池，又命他把大清一统地图制成铜版印刷。画家郎世宁则长期在清廷画院供职，成为揉合中外绘画艺术名噪一时的画家。其代表作是与他人合作的“乾隆武功图”多幅。此外在钦天监等部门，也一直有传教士工作。

【教皇解散耶稣会】 正当中国严行禁教的时候，由于耶稣会在欧洲树敌过多，罗马教廷终于在1773年解散了耶稣会。解散令于1775年送达中国，规定除供职清廷的耶稣会士不准擅离职守外，其他传教士均可自由回国。耶稣会在华的传教工作由法国遣使会接替。遣使会于1783年正式受命，立即派遣罗广祥（Rauk, Nicolas Joseph）吉德明（Ghislain, Jean Joseph）、巴茂正（Paris, Charles）等神父来华接替耶稣会士的工作。耶稣会在华的传教事业就这样结束了。直到19世纪初教廷恢复了耶稣会之后，1844年，耶稣会士又再次来华。

【明清传教士活动的作用和影响】 明清二朝，西方传教士大量来华传教，形成中外关系史上文化交流的高潮时期。传教士来华是为了传教。明清以降天主教逐渐传入中国，不少地区甚至流行很广，天主教成为居佛教、伊斯兰教之后在中国流行的第三大宗教。在传教的同时，传教士们把西方科学介绍到中国，虽然介绍来的不一定是当时西方最先进的知识，但这些知识在中国也

① 宋君荣：《有关雍正与天主教的几封信》，见《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

发挥了重要作用。耶稣会士为中国造就了一批科技人才。在西学的影响下，我国一些学者开始整理中国古代科技遗产；随着西方某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利器的输入，出现了议办“洋务”的端倪。同时传教士又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开西方汉学的先河，也使中国思想在西方产生一定影响。就实际活动来看，这一时期来华的传教士虽然也有复杂的背景，但与近代来华传教士相比，还有比较明显的区别，其侵略性质表现得还不甚突出。这是由当时东西方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的。

第十一章 华侨——中外友谊的桥梁

华侨是指居住在国外并从事一定谋生活动的中国公民。这种谋生活动既可以是体力方面的，也可以是脑力方面的。因此，外交官、留学生和出国旅游者虽在国外，但都不算华侨。华侨是一个历史范畴，其产生、发展以至最终消亡，有一个历史过程。

华侨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的优秀分子。他们以大无畏的冒险精神和艰苦卓绝的创造力，为侨居地的开发和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身在海外，心怀桑梓，在沟通和发展中外友好交往中有着特殊的业绩，因而被称为中外友谊的桥梁。

第一节 华侨出国历史概观

一、明代以前的海外移民

【一个久远的历史现象】 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和周围国家人民有着不断的接触和交往。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种接触和交往便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这样，人民到其它国家居住的情况也就越来越多。因此，尽管“华侨”这个字眼在清末才正式出现，但中国人侨居国外这种现象却十分久远。

据史籍记载，周武王灭商后，曾将纣王的叔父箕子封于朝鲜。据传，殷商遗民不愿臣服周王，很多人便漂洋过海，迁移到美洲居住，称为“殷人东渡”。秦朝建立后，秦始皇派徐福及童男童女数千人求长生不老药，有人考证徐福到日本后住了下来。自张

贯通西域后，“丝绸之路”畅通，中国商人陆续有人移居到中亚和西亚一带。据苏联亚美尼亚加盟共和国史学家的记载，在公元前一世纪即陆续有中国人移居该地，其后裔多为巨族，不少人在该国担任要职。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不少中国人为避战乱而移居日本，其中很多人是王室后裔。这些人都和当地日本人民同化，史称“归化人”。^①

当然，直到唐代以前，这种向海外移民的现象都是个别的和少量的，并且都同化于当地民族，因而不称他们为华侨。但这表明，中国人移居海外，和海外各国人民时而移居中国一样，都是一个很久远的历史现象。

【唐代的海外华侨】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盛期，经济繁荣，疆域辽阔，中外交通空前发达，侨居国外的中国人迅速增加。因此，史学界一般把唐代作为华侨正式形成时期。

“华侨”这个概念最早使用于清末。《清实录·德宗本纪》载，1893年（光绪十九年）“除华侨海禁”，成为华侨史上一个重大事件。1904年（光绪三十年），清外务省在一份奏请设立领事的奏折中说，设领“经费支出无多，在华侨受益什大”。此乃官方文件使用“华侨”概念之始。1900年清政府始订《国籍条例》，“华侨”才具有了国籍上的含义。但在华侨史上，学术界仍用华侨这个概念来说明历史上同样的历史现象，并以唐代作为华侨史的开端。现在，居住在国外并保留着中国国籍的中国人才称作华侨，加入当地国籍者则称为海外华人。

由于西北陆路畅通无阻，商旅不绝于道，前往中亚一带居住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例如《通典》的作者杜佑的侄子杜环曾随唐

^① 参见张声振：《两晋南北朝时期移居日本的汉族“归化人”及其贡献》，载《华侨史研究论集》，吴泽主编，1984年版。

大将高仙芝西征，为大食所败，他和许多被俘的唐官兵一起，在中亚一带长期住了下来。据他著的《经行记》一书中记载，当时在大食就有很多中国的工匠和艺人。据《通典》“怛逻斯城”（前苏联境内江布尔）条载：“此国商胡杂居，有小城三百，本华人，为突厥所掠，群保此，尚华语”。这里“有小城三百”，一城至少当有上百人，甚至数百人，那么，这里当有华侨至少数万人之多。怛逻斯城正是高仙芝被大食战败的地方，为杜环亲自所见，当为可信。正是在唐代，中国工匠将造纸工艺经中亚传到了西方。

东南海上交通虽然晚于西北陆路交通，但唐代通过海路移居南洋一带的华侨更为普遍。随着南洋一带华侨的增多，影响越来越大，致使海外诸国称南洋华侨为“唐人”，华侨聚居区称为“唐人街”，华侨回国称“回唐山”。这类称呼一直沿用至今。这正如宋人朱彧在《萍洲可谈》中所说：“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明清时期，海外诸国亦习称华侨为“唐人”。“唐人者，诸蕃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①

据印度尼西亚史书记载，924年（后唐同光二年），中国的一艘大沙船在爪哇海边沉没，其船客便在爪哇定居了下来，并受到当地人民良好的款待。这是有明文记录的一次航海事故。很显然，在此之前，因航海事故而移居南洋一带的华侨已很常见。唐末黄巢起义时，农民军曾南下广州，很多中国人为避乱而移居到南洋一带。在苏门答腊岛上，当时就有很多中国人为避乱而在这里垦殖。

唐代中日交往十分频繁，庞大的遣唐使团不断来华，回国时

^① 《明史·真腊传》。

唐王朝都派人相送，有时多至数十人。有些人就在日本长期住了下来，不少人还在日本政府中担任官职。隋唐两朝都曾派大军征讨朝鲜，不少人流落朝鲜，有些人还从朝鲜到了日本。后来随着中朝交往的发展，中国人移居到朝鲜的也时有所见。

唐代的华侨不仅人数明显增多，而且分布也相当广泛。

【宋元时期华侨的增多】 宋代只获得局部统一，北边陆上对外交通阻塞，故极力发展东南海上交通。宋元两朝的海外贸易都非常发达，中国商民不断流寓海外，成为华侨。象苏门答腊、爪哇等地，因海上往来方便，所以寓居该地的华侨越来越多。

宋朝灭亡后，许多宋朝官兵流落到东南亚各地，并长期居住下来。例如南宋左丞相陈宜中即逃至占城，乞师复宋。占城以国小势弱，没有答应。陈宜中后移至暹罗（今泰国），并死在该地。为躲避蒙元的屠戮，“诸文武臣流寓海外，或仕占城，或婿交趾，或别流远国”。^①有的人则到了日本。广东人李竹隐（即李用）“浮海至日本，以诗书教授，日本人多被其化，称曰夫子”。^②

在元代，除了因海外贸易的繁盛而不断有人定居国外以外，元王朝的不断对外征讨是华侨大量增加的重要动因。元王朝三次出兵征讨越南，二次征讨缅甸，还曾派史弼率军二万远征爪哇等地。元军在征爪哇沿途虽打了一些胜仗，但在爪哇却遭到溃败。在战争中因军事挫折而流落各地者甚多。据汪大渊《岛夷志略》载，元军征爪哇时，有元军病卒一百多人留居勾栏山中，与当地土人混居。元时，华侨的足迹已遍布南洋各地。^③

① 郑思肖：《心史·大义略叙》。

② 屈大均：《广东新语》。

③ 参见李长傅著：《中国殖民史》、《南洋华侨史》，刘继宣、束世澂著：《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姚楠著：《中南半岛华侨史纲》。

二、明代海禁开放前的华侨

【明初南洋一带华侨的增加】 明朝初年，移居南洋一带的华侨迅速增加，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张士诚、方国珍的残余势力流落到南洋一带；二是因为海禁严厉，私自出海的商民留居南洋不归。

张士诚、方国珍原来都是盐商，以在海上贩盐为业。元末农民大起义中，他们各自雄据一方，部从都达数十万众。他们的根据地在江浙沿海一带，其部下也多是沿海人民，熟悉海上形势。当张、方集团被朱元璋陆续攻灭后，其部下多逃亡海上，继续与朱明王朝为敌。这种反明活动一再失败，其余部就散居南洋各地，成为华侨。他们有的到了日本，大多数是“借交趾、占城、暹罗、暹罗为逋藪……”。^①明成祖即位后，闻知逃居东南海上的中国人很多，便特地发了一道诏令：“中国人逃匿在彼者，咸赦前过，俾复本业”，^②但收效甚微。

明初厉行海禁，严禁私人出海贸易。这是对宋元以来海外贸易持续发展的反动，遭到沿海人民的强烈反对。沿海人民以海为生，或渔或商，久成习惯。实行海禁，无疑等于断绝了他们的生路。他们“不肯束手困穷，于是所在联结为寇，溃裂以出”。^③为了逃避明王朝的惩罚，他们便滞留海外不归，从而成为华侨。例如著名的旧港（即三佛齐，在苏门答腊岛上）华侨首领梁道明，就是因私自出海贸易而移居旧港的。“初，南海梁道明贸易于爪

① 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三十。

② 《明成祖实录》卷十二上。

③ 《东西洋考》卷七。

哇国，久而情熟，携家住居，积有年岁，闽广军民奔乡里为商从之者至数千人”。^①梁道明俨然为旧港一方首领，曾率领旧港人民与爪哇相抗，击退了爪哇的侵扰。旧港的另一个头目陈祖义也是在明初去旧港的，因在海上为盗，永乐五年被郑和擒获杀掉。

明初移居爪哇的华侨更多。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记道：“其间多有中国广东及漳、泉人留居该地”。因华侨渐多，聚居成村落。一处称“新村”的地方，“原系沙滩之地，盖因中国之人来此创居，遂名新村。至今村主广东人也，约有千余家”。可见这已是一个不小的华侨聚居村镇。

【郑和下西洋后的华侨出国】 郑和七次下西洋，规模庞大，每次出航都达二三万人之多。在此期间，郑和的部从中有些人即因各种事故留居在南洋一带。例如在婆罗州的文莱，华侨越来越多，并出现了大的华侨首领，“或言郑和使婆罗，有闽人从之，因留居其地，其后人竟据其国而王之”。^②这类人数自然有限。主要是经过郑和大规模出使以后，一则提高了南洋诸岛上华侨的地位，二是使明代的海禁变得较为松弛，使私自出海的人越来越多，滞留南洋诸岛的华侨也自然越来越多。这正如顾炎武所说：“永乐间，……以小民衣食所赖，遂稍宽禁”。^③“宽禁”的结果自然是私人出海的增加。但是，这仅仅是对私人出海的宽容，并不是解除海禁，出海仍属于非法。因此，一些人出海后便在海外长期住了下来。郑和下西洋后的华侨出国虽未形成高潮，但华侨出国的数量却有明显的增加。

【明中期南洋华侨的激增】 明朝中期，尤其是正德、嘉靖年间，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大的海商集团的出现，移居南洋一

① 《殊域周咨录》卷八，“爪哇”。

② 《明史·婆罗传》。

③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浙江”下。

带的华侨急剧增加。

在正德、嘉靖年间，海禁政策虽未废除，但在具体执行上却时松时紧。正德时较为松弛，嘉靖初却严厉起来。自朱纨被迫自杀后，“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海禁又大为松弛。在这种情况下，私人海上贸易势力有了迅速的发展。面对明王朝不时的剿捕，他们由原来的“各自买卖”，变为“成群结党”，组成团伙，结伴而行，并渐渐组成了大的海商集团。嘉靖中期，许栋和陈思盼两大集团分据双屿港和横港，在当时势力最大。嘉靖二十七年，朱纨派卢镗攻破双屿港，许栋逃去，其部众被杀很多，有些人则逃到了其它海岛。后来，王直成了东南海上最大的海商头目。1556年（嘉靖三十五年）三月，王直派徐海“拥众十余万寇松江、嘉兴诸郡”。^①这是武装海商集团对明王朝海禁政策的公然反抗。明王朝不惜血本，从全国抽调兵力进行镇压，终于将这些海商集团镇压了下去。在这个过程中，有大批的沿海人民因私自出海不敢回乡，或因被明军击溃而流寓到南洋诸岛。

另一方面，自正德以后，西方殖民者陆续来到南洋一带和中国沿海。葡萄牙人最先来到东方。西方殖民者迫切希望得到中国丝绸、瓷器等物品，这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海商冒险私出。其中有些人长期不归，成为华侨。同时，殖民者为了经营夺取的殖民地，需要大量熟练的劳动力，便在中国沿海掠卖人口。明中期以后，沿海群众不断有人无缘无故地失踪，就是因为殖民者“拐掠城市之男妇人口”的结果。这与西方殖民者在非洲掠卖黑奴具有同样的性质，只是规模较小。

因此，在这期间流寓南洋一带的华侨迅速增加。例如在淳泥，“华人多流寓其地。嘉靖末，闽、粤海寇遗孽遁逃至此，积二千

^① 范表：《海寇议后》。

余人”。^①

【隆庆开放前华侨的特点】。按照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在鸦片战争以前，华侨史上可分为两个时期：自唐代至明代隆庆开放前为第一个时期，开放后为第二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封建经济高涨的时期，也是经济重心逐渐转向长江流域、海上丝绸之路取代陆上丝绸之路的时期。在华侨史上，这是华侨出现并开始立足海外的时期，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从华侨出国原因来看，经济原因是经常的，主要的；因国内政治动乱出国是暂时的，次要的。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东南沿海地区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商品经济比较繁荣。再加上中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历来比较发达，这就为海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有些人就滞留国外，成为最初的华侨。

国内政治动乱也是华侨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唐朝末年的农民大起义，宋末元初为躲避蒙元的杀戮，元、明之际张士诚、方国珍的残余势力，都曾是中国入移居海外的动因。但这种原因是短暂的和局部的。动乱过后，一旦局势得到稳定，有些人则又回到国内。因此，由于国内政治动乱而出现的华侨比起经济原因来，它居于次要地位。

其次，这时期的华侨主要聚居在东南亚一带。与中国相比，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显得非常落后，中国的铁器、铜器、陶器、铜钱和其它许多手工业品，都深受东南亚各地人民的欢迎。东南亚一带地广人稀，需要开发。中国闽、粤地区人多地少，从事海上经商的人多。闽、粤与东南亚地区邻近，交通方便，就不

^① 《明史·许泥传》，另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三编第十五章：《明代中叶之中西交通与华侨之拓殖》。

断有人移居到东南亚一带。在这个时期，虽然也有些中国人移居到中亚一带，也可能有人被西方殖民者掠卖到亚洲以外的地方，但人数很少。

再其次，从这个时期华侨的人数来说，数目不多，而且主要居住在交通方便的口岸。直到隆庆开放前，海外华侨总数约十万左右，人数较少。这是因为，中国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还没有出现深刻的危机。同时，封建统治者又限制人民移居海外，中国人民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十分牢固，儒家思想提倡“父母在，不远游”，这都影响了中国人民向海外的迁移。再者，从东南亚当时的情况来看，经济十分落后，因而对华侨缺少强烈的吸引力。

最后，华侨大都聚居一处，初步形成独特的华侨社区。例如苏门答腊的旧港和爪哇的新村，那里的华侨保持着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在这些华侨社区内，可以由华侨自行推举首领，实行自治。例如旧港的梁道明和施进卿，都是当时的华侨首领。这时只有少数华侨散居杂处于当地人民中间。因为当时妇女出国者很少，所以华侨多和当地妇女结婚，开始了互相融合的进程。当时的华侨社区虽然很少，规模也不大，但它却为东南亚华侨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①

三、隆庆开放至鸦片战争前的华侨

【隆庆开放后华侨的激增】 隆庆元年（1567年）解除海禁后，长期被压抑的私人海外贸易热流顿时倾泻而出，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这为海外华侨的增加提供了较多的机会。

^① 参见陈碧笙：《关于华侨史分期的几个问题》，载《华侨史研究论集》。

例如吕宋（今菲律宾），因地近中国，中国商民前往贸易者急剧增加。隆庆五年（1571年），西班牙殖民者占据了马尼拉，即以吕宋的名义与中国贸易。在此之前，西班牙早已侵占了美洲的墨西哥和秘鲁等地。那里盛产白银，西班牙人即将那里的白银大量地运往吕宋，在吕宋换取中国的丝、瓷等商品。中国商人纷纷前往，获利极丰。菲律宾群岛上的猫里务成了重要的交易场所，致使当时有谚语说，“若要富，需往猫里务”。西班牙殖民者为了开发吕宋，起初对华侨也抱欢迎态度。因此，移居到吕宋的华侨便越来越多。“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①吕宋的“洞内”成了华侨的聚居区。

隆庆开放后，明王朝仍禁止中国商人前往日本。但因去日贸易比前往吕宋贸易的利润高，所以很多海商出海后先往南行驶，走远以后，即掉头驶往日本。日本的长崎成了中日贸易的主要场所。1570年，日本把长崎辟为对外商港，很多中国人就在那里长期住了下来。虽然在隆庆开放前即不断有人移居长崎，但人数不多，只是到隆庆开放后才急剧增加。嘉靖“三十六年，至长崎明商不上三十人，今不及十年，且二三千人矣。合诸岛计之，约有二三万人”。^②这种增长速度是十分惊人的。例如，郑芝龙和郑成功父子即长期在日本居住，郑成功的母亲即是日本人。

入清以后，清王朝为禁止人民和海外抗清势力相联系，实行“迁海”，强迫濒海人民内迁30里至50里。以后，又长期实行闭关政策，对私自出海的商民进行严惩。这反而促使私自出海的商民下决心在海外定居下来。因此，清前期移居海外的华侨仍有增无减。

【抗清势力余部散居海外各地】 1644年满清入关后，南明

^① 《明史·吕宋传》。

^② 朱国祜：《涌幢小品》卷三十。

先后经历了福王、唐王和桂王几个政权，与清军对抗。这些南明政权都先后被清军攻灭，其余部不少人流寓到国外。南明政权被清军消灭后，人民群众的抗清斗争仍此起彼伏。这些抗清斗争最后都陷于失败，有些人就逃到海外居住。

桂王是南明政权最后一个皇帝。他被清军所逐，逃到缅甸，有大批军政人员随从。后吴三桂入缅，将桂王擒杀。桂王部下有很多人即在缅甸住了下来。这些人的后裔渐成一族，为纪念桂王，便自称桂家。乾隆年间，桂家人宫里雁和吴尚贤都是缅甸银矿厂主，聚众数万人，颇有声望。在清前期，华侨的足迹已遍及缅甸各地。

弘光元年（1645年），张煌言起兵抗清，奉鲁王监国，据守浙东和沿海一带。后与郑成功合兵进攻南京，失败后将部下解散，很多人也流寓到了海外。

郑成功以金门、厦门为根据地，经常出击江浙和广东沿海地区。后来在大陆上失败，即于1661年进兵台湾，于第二年驱逐了荷兰殖民者。郑氏政权在经营台湾时，与南洋诸国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在郑成功率众抗清和以后经营台湾的过程中，都不断有人散居到南洋各地。

在清入关后的数十年间，各地人民的反清活动连绵不断。这些抗清斗争最后都归于失败，其余部为逃避清廷的迫害，或不愿服从清廷的剃发令，不少人即流寓到越南、暹罗、真腊、印度尼西亚、日本等地，成为华侨。例如朱舜水即逃居日本，在日本传授“王学”，对日本学术颇有影响。

抗清势力逃居越南的人最多。例如原明朝将领总兵杨彦迪、陈上川等，曾率领明军3000多人，战船50多艘逃居越南南部，在嘉定一带屯垦，并对阮氏政权颇有助力。广东人鄢玖也率领明军余部数百人在河仙一带垦殖。在南越，中国明朝遗民聚居的村社

称为“明乡”。逃居这里的明朝遗民多和当地妇女结婚，所生混血儿被称为“明乡人”，也就是华裔。“明乡”或谓“明香”，有维持明朝香火、纪念明朝的含义。明乡人与中国迁入的华侨在待遇上有别。明乡人属于越南编民，可免除兵役和徭役，赋税比华侨为轻，比越南土著为重。明乡人还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补用官场，而华侨则没有这种资格。

【西方殖民者在中国掠卖华工】 华工大规模出国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在此之前，西方殖民者已不断在中国沿海掠卖华工。

继葡萄牙人之后，西班牙和荷兰等殖民者陆续来到东方，积极抢占殖民地。殖民者为了开发殖民地供其掠夺，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吃苦耐劳的中国人就成了这些殖民者掳掠的对象。

殖民者使用欺诈和暴力手段，在我国沿海掳掠人口，然后运往各殖民地，当作奴隶进行贩卖。荷兰驻爪哇总督向本国政府建议，应派军舰“往中国海岸，尽量捕其男女幼童以归”。1619年，荷兰人在海上劫夺了从华南驶来的五艘船，强迫2000名乘客定居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①中国史书称“红毛夷”（指荷兰）“好食小儿”，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人民对殖民者的痛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殖民者在中国沿海掳掠人口的史实。

1785年英国人夺占庇能（檳榔屿），该处总督通过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代表招募华工，尤其欢迎中国工匠，用公司的船运往庇能。到1800年时，庇能已出现转卖华工的市场。当时，一个立有一年契约的华工可值西班牙银洋30元。后来，为了避免与清政府发生纠葛，便让华工在澳门集中，用葡萄牙的船只运出。此后，即不断有成批的华工被偷运出国，多时一次即达上千人。这

^① 李长傅：《中国殖民史》。

些华工被用来采矿或开辟山林，从事各种繁重的劳动。

在鸦片战争以前，澳门是向国外偷运华工的中心。除了其它殖民国家利用澳门的有利条件外，葡萄牙人自己也不断进行这种罪恶活动。例如在1810年，葡萄牙曾将数百名中国种茶工人运到巴西，试图把中国的茶树移植到美洲。

这种在中国沿海掠卖华工的现象，在当时被称为“卖猪仔”。据成书于鸦片战争前的《粤游小志》记载：“东省……有诱愚民而贩卖出洋者，谓之卖猪仔”。这在当时属于非法，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但数量已不是很少。在鸦片战争前，通过“卖猪仔”而出国的华人已不限于在东南亚地区，而是远至世界各地。例如，当拿破仑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的时候，岛上就有英国人运去的中国劳工。

【隆庆开放至鸦片战争前华侨的特点】 从隆庆开放到鸦片战争的近三百年间，中国社会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矛盾更趋激化。从世界范围看，这是西方殖民者积极向亚洲进行扩张的时期。在华侨史上，这是华侨大量增加和社会经济基础逐渐确立的时期。这个时期华侨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华侨人数显著增加，分布范围更加广泛。

隆庆开放后，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相率进入东南亚一带，出现了华侨史上第一次移民高潮。17世纪前后，仅居住在吕宋马尼拉的华侨即达二三万人。18世纪末期，住在荷兰统治下的巴达维亚的华侨约有10万人。19世纪初期住在暹罗的华侨约有44万人。至鸦片战争前，居住在东南亚一带的华侨在100万以上。

华侨先是居住在重要港口和交通要道，这时更向周围的小城镇、农村、矿山发展，建立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华人社区。在这些遍及东南亚的华人社区内，保持着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后来还办起华人学校，出版中文刊物。

这时华侨的足迹已越出亚洲，远及欧洲和美洲。1810年，即有数百名中国种茶工人去巴西。据美国官方移民记录，从1820年至1840年间，来自中国的移民共有11人。至于夏威夷，18世纪末即有华人移居该地。由于西方殖民者在中国掠卖人口，也有少数华人被运往西欧。至于在俄国境内，17、18世纪时即不断有中国商人前往莫斯科一带经商，并有少数人在那里长期居住。

其次，华侨中间开始分化。他们中绝大多数是自食其力的劳动群众，从事手工业、零售商业、种植蔬菜和采矿、冶炼等，大都是小本经营，获利不多。但有些侨领或宗族领袖利用特权剥削侨胞，发财致富，成为腰缠万贯的商业巨子。

有些华侨领袖还成了当地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成员。华侨有时结成集团，在当地政府权力所不及的地方开矿或垦荒，待卓有成效后，即被当地政府划入版图。这些华侨领袖即被任命为甲必丹或高级官员，因而出现了新的阶级分化。例如广东雷州人郑致，康熙初年到越南的河仙，率众开发，并修筑城堡，服物制度都仿效明制。1715年，他被越南阮氏政权授以总兵职，封玖玉侯，其子孙还相继袭职。1766年，缅甸侵略暹罗，并攻克大城，国王被杀。广东潮州人郑镛在暹罗生的儿子郑昭，率领暹罗人民驱逐了缅甸军，恢复了国土，建立了吞武里王朝。郑昭的事迹至今为泰国人民所传颂。

再其次，在这个时期，华侨多次遭受殖民者屠杀，华侨也多次进行武装反抗。

西方殖民者对待华侨有种矛盾心理。一方面，殖民者需利用华侨，以开发当地资源，供殖民者剥削。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华侨和当地人民联合起来，反抗其殖民统治。因此，他们便千方百计限制华侨，剥夺其合法权利。尤其恶毒的是，殖民者恶意挑拨当地人民和华侨的关系，煽动排华，制造流血事件，以达到分

而治之的目的。他们还一再策划制造屠杀华侨的事件。例如在吕宋，1603年，西班牙殖民者对马尼拉地区的华侨大肆屠杀，仅这一次即杀死华侨20000多人。1639年11月开始，先是在林噶荫湾，继而漫延至马尼拉，前后历时四个月，杀华侨22000人。清朝前期，西班牙殖民者于1662、1686、1762年又数次屠杀华侨。在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爪哇大肆屠杀华侨，华侨的鲜血染红了河水，史称“红溪惨案”。面对殖民者的血腥迫害，华侨也多次进行武装反抗，但因组织不善，武器不精，最后都归于失败。

最后，华侨大都是自食其力的和平移民，没有政治目的，没有夺人之国的政治野心。这时期的华侨都是违禁出国的，中国统治者视他们是“化外弃民”。他们没有本国政府的支持，只能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自食其力。他们与遍布世界的殖民者不同，殖民者是在本国政府的支持下，亦商亦盗，以夺取财富和侵占殖民地为目的。他们是侵略者，与当地人民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华侨则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互相学习，胼手胝足，为当地的开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①

四、明清统治者对华侨的态度

【明代封建统治者对华侨的态度】 明中期以前，因旅居海外的华侨很少，所以并未引起封建统治者特别的注意。明中期以后，海外华侨迅速增加，统治者才开始注意华侨问题。

明王朝虽然于隆庆元年开放海禁，但反对中国商民移居海外。对那些在海外久居不回的华侨，明朝统治者则认为是不服天朝教化的“弃民”，对他们抱放弃的态度。1593年（万历二十一

^① 参见王绵长：《论华侨与殖民者的界限和区别》，载《华侨论文集》第1辑，广东华侨历史学会编，1982年版。

年），西班牙人为征摩鹿加香料岛，征吕宋华侨潘和五等250人助战。他们因不堪虐待，在海上发动起义，杀死了西班牙总督。明政府却将逃回国内的郭惟太等30多人逮系监狱。潘和五等人则滞留越南，不敢回国。当时的福建巡抚许孚远疏称：“我民往贩吕宋，中多无赖之徒，因而流落彼地……”。^①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明朝统治者对华侨根本不加保护。

1603年（万历三十一年），西班牙殖民者在吕宋惨杀华侨20000多人。面对海外同胞被血腥屠杀，明王朝的态度却十分冷淡。西班牙人“虑中国兴师问罪，入广东香山澳侦探，中国乃寂然”。^②当西班牙人将此事通知明政府后，明政府仅仅是让福建巡抚徐学聚“移檄吕宋，数以擅杀罪，令送死者妻子归，竟不能讨也”。^③这仅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作用。它充分说明了明王朝对华侨抱放弃的态度。正因如此，西班牙殖民者才敢于数次屠杀我华侨。

【清代统治者对华侨的态度】 清王朝建立后，对华侨抱敌视态度。其华侨政策可用三句话来概括：一是不准出国；二是出了国就不准回来；三是回来的要处以死刑。这种政策一直维持到第二次鸦片战争。

清王朝敌视华侨，其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清王朝是以满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在清初遭到汉民族的强烈反抗。这种抗清斗争尽管遭到失败，但散居海外的抗清势力久久不能剿除。清政府把海外华侨看作是对自己统治的潜在威胁，尤其害怕大陆人民和海外抗清势力相联络，共谋反清，故多方严加防范。第二，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是清王朝的经济基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虽已出现，但很微弱，而且发展极为缓慢。在这种历史条件

① 张燮：《东西洋考》卷五。

② 何乔远：《名山藏》。

③ 《明史·吕宋传》。

下，重本抑末仍是清王朝的根本国策。而很多华侨是去海外经商，这在统治者看来，实属不安本分之人。这正象雍正皇帝所说：“朕思此等贸易外洋者，多不安分之人。……其人甘心流于外方，无可惋惜，朕意应不令其复回内地”。^①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清王朝建立之初即严禁人民移居国外。这种禁令还载之于《大清律》中：“凡官员兵民私自出海贸易，凡迁移海岛居住耕种者，俱以通贼论，处斩。”^②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统一台湾后，开放海禁，但对华侨仍抱敌视态度。外国商船离开中国时，“不得夹带华人，违者治罪。”^③清政府还曾要外国将当地华侨送回中国，由中国处死。但除了安南送回几个华侨外，几乎没有什么反应。后来，康熙皇帝令海外华侨三年内返回原籍，免于治罪，也收效甚微。雍正时，对贸易海外而不能按期回国者，则不准其回国。乾隆时对华侨回国的政策有所缓和，但敌视华侨的态度并没有根本改变。

1740年，在爪哇发生了“红溪惨案”，近万名华侨被荷兰殖民者残杀。对此，清廷却认为“……汉商本皆违禁，久居其地，自弃化外，名虽汉人，实与彼地番种无别，揆之国体，实无大伤”。^④在清朝统治者看来，华侨是“自弃化外”的莠民，自然谈不上保护了。

第二节 华侨对侨居地的贡献

在鸦片战争前，华侨主要聚居在南洋一带。在其它地区虽然

①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8辑，第836—838页。

② 《大清律例全集》卷二十。

③ 印光任：《澳门纪略》卷上。

④ 蔡新：《缉裔文集》卷四。

也有华侨，但人数甚少。华侨对开发南洋的贡献最为突出，也最有代表性。人们习称：“没有华侨，就没有今天的南洋”。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①

一、华侨在经济上的贡献

【农业】 在东南亚一带，随着华侨人数的增加，从事农业的华侨越来越多。起初，那里的绝大部分土地都未开发，到处是荒山野岭，湖泊沼泽，瘴疔横行，蛇兽出没。华侨以传统的坚韧和勤劳，披荆斩棘，将荒原变成沃野，使野兽盘踞之地到处布满了村镇，并日趋繁荣。

例如越南，因毗邻中国，不断有中国侨民前往，从事垦殖，使大片荒地变为千里沃野。尤其是在明末清初，陆续有一些大的移民集团进入越南，基本上都从事垦殖，对越南农业的发展作出了莫大的贡献。明将龙门总兵杨彦迪进入越南后，被割据南越的阮氏政权安排在东浦（即嘉定）一带。当时这里人烟稀少，遍地荆棘。中国人民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发展交通，使这一带成了肥沃富饶的地区。

郑玖率领南明余部到了真腊，真腊王让他去开发河仙。经过郑玖等人流血流汗的开发，这里很快繁荣起来，变成“帆樯连络”、“户口稠密”的地方。后来，河仙被越南阮氏政权纳入版图，并以郑玖为河仙镇总兵。郑玖死后，阮氏政权为表彰他的开发守土之功，追赠他为“开镇上柱国大将军武毅公”，并让他的儿子郑天赐继袭父职。河仙原来只是一个小渔村，后来变成了南圻的一

^① 参见（英）巴索著，（台）郭洲章译，《东南亚之华侨》。书中主要写东南亚华侨近代的活动，对古代有所追述。对华侨在东南亚的贡献记载甚详。

个重镇，这和华侨的开发是密不可分的。^①

在马来半岛，在英国殖民者来此以前，华侨即对这一带进行了长期的开发。英国在这里建起殖民地后，极力鼓励中国侨民前往垦殖，使大片荒野变成沃土。例如槟榔屿，原来是一个荒岛，经华侨辛勤开发，日渐富庶，成为著名的闹市。马来半岛上的耕地，大部也是由华侨所开发。

在加里曼丹岛北部的文莱，明朝中叶即有不少华侨前往种植胡椒。在缅甸的萨尔温江两岸，不断有华侨前往垦殖，使大片荒地种上了五谷，建起了许多村镇。

在爪哇岛上，明初由数千华侨聚居的新村原是一片沙滩，由于华侨的开发，渐成为重要的商港，奠定了雅加达城的基础。华侨后来向郊区移居，从事农业的越来越多。吕宋岛在明朝初年还基本上是一块处女地。由于华侨的长期开发，奠定了当地农业的基础。菲律宾至今还流传着元代华侨林旺教当地人开辟梯田的传说。

华侨中有的从事农耕，有的从事畜牧和渔业。他们不仅种植五谷，还种植蔬菜，培植果园，象嫁接、植棉和种菜的技术，都由华侨传入当地。华侨还将中国的水牛大量地引入当地，中国水牛成为当地的主要畜力。在印度尼西亚，当地种稻和种茶的技术，亦由华侨传授。华侨还大量从事经济作物的种植，例如胡椒、棉花、烟草等等。另外，柑桔和黄梨也由中国传入东南亚一带，丰富了当地的经济生活。

【工矿业】 中国素有发达的手工业，各种手工业工匠陆续进入东南亚一带，为当地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例如在泰国，元代时就有许多中国工匠移居当地。华侨工匠

^① 参见徐善福：《十七—十九世纪的越南南方华侨》，载《华侨论文集》。

制做的各类手工业产品深受当地人民的欢迎。尤其是铁匠，他们制做的各种铁制农具对当地农业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在吕宋华侨中也有各种手工工匠。西班牙占据吕宋后，面对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便极力鼓励中国工匠前往吕宋，以生产各种中国传统的手工业产品，借以减少对中国商品的依赖。因此，各种手工工匠大量进入吕宋。这正如顾炎武所记：“我人百工技艺有挟一器以往者，虽徒手，无不得食，民争趋之”。^①铁匠、木匠、银匠、锁匠、染匠、织工、刺绣工、石匠、砖匠、泥水匠、理发匠、糖果匠等，应有尽有。明朝后期，马尼拉的小手工业者几乎全是华侨。西班牙殖民者和当地土人所使用的手工业品，几乎全部由华侨供给。在其他东南亚国家，也都有很多华侨手工业者。他们为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东南亚一带矿产资源丰富，华侨中从事采矿业的也很多。马来亚锡矿丰富，在英国人来此之前，即有不少华侨在那里开采。英国人占据马来亚后，千方百计地招徕华侨前往开发。1828年，仅在双溪乌绒的华侨矿工就约有1000人，分成九个公司采锡。

在沙撈越，有很多华侨从事采金业。他们以巴島地方为中心，组成“金山”公司。鸦片战后以前，华侨在这里已有相当的势力。自1830年后，原先在荷属西婆罗的广东客籍矿工，不少人又陆续迁往沙撈越的石隆门一带，在那里开采金矿。

泰国西海岸普吉岛锡矿丰富，明朝中期即有不少华侨在那里开采。直到现在，当地的采锡矿工仍大都是华侨的后裔。在其它地方从事采矿业的华侨也很多。例如在缅甸，清初仅开采银矿的华侨即有10000多人。

在西加里曼丹的坤甸一带（今属印度尼西亚），1777年以罗

①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

罗芳伯为首建立了“兰芳公司”。罗芳伯是广东梅县人，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出国，先到了坤甸的东万津，在华侨中威信甚高。为了自卫，便联系当地华侨组成了兰芳公司。公司的组织渐渐扩大，以坤甸为公司总厅。罗芳伯被公推为大唐客长，称为“兰芳大统制”。公司实际上是一个生产和自卫的组织。他们除开荒种植外，还从事采矿，主要是采金。

兰芳公司并没有反客为主、夺人之国的意思。所谓“公司”，是“公司其事”之意，是自己管理自己的自治组织，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公司需要向当地政府纳税，罗芳伯自称“大唐客长”，意即客居其地的华侨领袖。经公司的辛勤开发，坤甸一带日益富庶。这个公司直到1884年才被荷兰殖民者消灭，并入荷属东印度的版图。

【商业】 华侨中有很多人从事商业活动。起初，他们都是小本经营，有的开杂货店，开餐馆，有的担挑沿街叫卖，并收购当地土特产。后来渐渐出现了一些富有的侨商。他们对当地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促进了当地和中国的经济交流，丰富了当地的经济生活。

中国各种各样的传统手工业产品深受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欢迎。华侨将中国的手工业产品贩卖到各侨居地，又将当地土产运往中国或其他地方，起到了官府难以起到的作用。

例如在吕宋，当西班牙人来到以后，当地生产一度受到很大的破坏，日用品十分缺乏。西班牙人十分欢迎中国商贾前往贩运。中国商人在马尼拉城外建起了很多商店和栈房，供销售和贮存商品。从中国运来的商品有两类，一类是奢侈品，例如各种丝织品、精制的瓷器和陶器、麝香等。这类物品大都被西班牙殖民者运往美洲和西欧。另一类是生活必需品，例如各种棉织品和衣

服、家用陶器、铁锅、针线、各种家具、粮食和食品，另外还有纸张和墨汁。这些物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地人民的需要，丰富了他们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华侨零售商人深入到乡下，向当地人民销售中国物品，也出售当地产品，同时还收购当地的土特产。他们薄利多销，还给予当地人赊欠的方便，和当地人民的关系非常融洽。华侨的商业活动，推进了当地的城乡交流，丰富了内地和边远地区人民的生活，促进了当地生产的发展。与此同时，吕宋的檀香木、肉桂、石蜡、番布等，也不断输入中国，使两国间的经济交流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①

其次，华侨的商业活动，活跃了当地的城乡经济，促进了当地工商业的发展。

例如在泰国，很多华侨参加经营航运业，使泰国的航运业得到迅速发展。1679年，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驻泰国代表的报告，当时泰国的商运船只几乎全部由华侨建造和经营。17世纪至19世纪中期，泰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到空前的规模，多为华侨协助的结果。泰国国王深知华侨的重要性，为了振兴国内产业，特许一些华侨官员可以自由出入宫廷。1724年，泰国来中国“朝贡”的96人全部是华侨。

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侨，也都起了相似的作用。象马来亚和马尼拉等地，在鸦片战争前都达到相当的繁荣，这和华侨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最后，华侨在海外开发港口，使其成为繁荣的商业都会。这对繁荣当地经济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例如，明代嘉靖年间武装海商首领林道乾，为明军所逐，率众侨居大泥（泰国南部的北大年）。经过多年开发，使那里日渐

^① 参见黄滋生：《十六—十八世纪华侨在菲律宾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载《华侨论文集》。

繁荣，遂称之为道乾港。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原来只是一个荒凉的渔村。明初即不断有华侨到此定居，渐渐成为一个商港。荷兰人占领爪哇后，又极力吸引华侨前往，使这里得到进一步开发，并向郊区发展，使这里日趋繁荣，渐渐成了东南亚一个大的商业都会。清朝初年，杨彦迪、陈上川率领抗清余部进入越南南部，寓居嘉定地区。这里原来人烟稀少，遍野荒凉，经过华侨和当地人民的艰苦开发，逐渐使这里成为一个新的国际贸易商港。西贡（今胡志明市）后来被称为“远东明珠”，这是和华侨打下的坚实基础分不开的。其他象马尼拉、槟榔屿、新加坡等地的早期开发，都凝聚了华侨大量的血汗。这些港口和商业中心的发展，对当地经济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华侨在文化上的贡献

【先进技术的传播】 无论在农业还是在手工业方面，中国人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着较高的技术。随着华侨大量进入东南亚一带，中国的先进技术在这一带得到广泛的传播。

在东南亚一带，中国先进的生产工具，如犁、水车、水磨等，在这里得到广泛的使用，这大都是由华侨引入的。华侨中的手工工匠把榨蔗、制糖、冶铁和其他金属、陶器的制作技术传授给当地人民，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生产的发展。中医中药很早就泰国广泛流行，对当地人民的健康事业有很大贡献。

在菲律宾，华侨不仅把中国的农业工具和生产技术带入当地，而且还把嫁接技术、改良果树的方法，亦传授给了当地人民。菲律宾的制糖和酿酒技术也是受了中国的影响。中国的麻织方法、纺织、造纸和印刷技术都在当地传播开来。华侨还在那里建造了一些教堂和寺院，从而使菲律宾人民也学到了中国的建筑

技术。

中国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先进技术在东南亚一带的传播，加深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传统的友谊，密切了华侨和当地人民的关系，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学术文化的传播】 随着华侨在东南亚地区的广泛分布，中国的风俗习尚、文物制度对当地的影响越来越大。象越南、泰国、缅甸这些近邻国家，其衣食住行、生产、生活各方面都明显带有中国影响的痕迹。

在越南，自古就有中国人不断移入，因而受中国的影响也非常大。越南的士大夫大都通晓汉文，他们也都尊奉孔子和孟子，读四书五经。越南人民的衣服、饮食、宗教信仰以及岁时节日、婚丧仪式，大都和中国的相同或类似。清初，旅居南越的华侨还设立学社，教育子弟，传播中国文化。象明末著名的知识分子湛若水、朱舜水等人，都曾侨居越南，传播儒家学说。朱舜水还曾六次赴日本，寓居日本二十多年，传播阳明学说，对日本文化影响很大。

菲律宾的贵族穿黄色衣服，丧服用白色，穆斯林妇女穿宽大的裤子，都是受华侨的影响所致。另外，菲律宾人民尊敬老人、尊崇祖先和青年的婚姻安排，也都受到中国的影响。

元朝时，孔子的后裔孔昭扈从大长公主下嫁高丽，他的身份是翰林学士，也在朝鲜定居下来。在他居住地仿照曲阜修建了阙里祠，其后裔有多人官至显宦。大儒朱熹的曾孙朱赞也赴朝鲜不归。他们在朝鲜宣讲儒学，对当地的文化影响甚大。在南朝鲜，孔昭的后裔至今仍为大族。在其他东南亚和东亚国家，华侨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于日本，既不断有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也不断有中国人移居日本，致使日本的思想文字、风俗习尚和建筑样式等，都明显带有中国影响的痕迹。

三、华侨和当地人民一起抗击西方殖民者的斗争

自16世纪开始，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地区陆续沦为殖民地。西方殖民者残酷地掠夺和压迫当地人民，华侨也不断受到排挤和迫害。因此，华侨和当地人民一起，不断掀起反抗西方殖民者的斗争。在当地争取民族独立、挣脱殖民枷锁的斗争中，华侨始终站在当地人民一边，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林凤和吕宋人民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斗争】 林凤是广东潮州人，自嘉靖末至万历初活动于东南海上，亦商亦盗。隆庆时，他已拥众五六百人。万历初年，他希望得到明政府的招抚，未得允许，于是便流劫闽粤沿海一带。明廷命广东提督殷正茂和福建巡抚刘尧海克期剿除。林凤屡为所败，难以存身，便于1574年（万历二年）率众去吕宋。当时，林凤有兵士4000人，妇女1500人，舟船62艘，其势颇盛。

西班牙殖民者对吕宋人民的压迫十分苛暴，吕宋人民久已积怨在胸。西班牙驻马尼拉总督拉维萨里斯（Lavezaris）对土人特别暴虐。他曾逮系两个土人头目为人质，以要挟土人向西班牙人供应食物。在林凤未入吕宋时，这两个土人头目已被殖民者杀掉。现闻林凤率兵来攻，当地土人也纷纷起事，袭击殖民者。他们还到教堂中聚议，杀牛羊起誓，定要配合林凤驱逐西班牙人。

在吕宋人民和当地华侨的支持和配合下，林凤很快进驻马尼拉湾。林凤派数百名士卒乘小船由马尼拉南登陆，迅速逼近马尼拉城下。西班牙人凭借精良的武器据城力守，林凤军仓促未能攻下，只得引军返回船上。西班牙人趁机日夜赶筑工事，修城墙、挖壕堑，防务益形坚固。

林凤经过筹划，分兵三路进攻马尼拉，并亲自督阵指挥。因

西班牙人戮力死守，林凤久攻不下，只得引兵退回。这时，马尼拉周围的土人和华侨聚众万余人到处举事，他们遇见西班牙人就杀，不分士兵、商人还是传教士，一时给西班牙人造成很大的威胁。但由于林凤撤兵，且武器不精，遂很快被西班牙人镇压了下去。

林凤败退到马尼拉北的冯嘉施兰（Pangasinan），其地北临林葛荫湾（Lingayen），也是海上防守重地。林凤在这里修筑堡垒，准备长期固守。西班牙殖民者从各地调集军队，合力进剿。两军相持四个多月，林凤终因武器简陋，补给不继，士卒伤亡众多，遂率领余部遁去。他自知难容于明廷，军事上又连受挫折，便遣散余部，自己也逃到外地，不知所终。林凤的斗争沉重打击了西班牙殖民者在吕宋的统治，鼓舞了当地人民反殖民统治的信心和勇气。

【潘和五起义】 潘和五是旅居吕宋的华侨。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他率领华侨在海上发动起义，杀死了西班牙驻吕宋总督。事情的起因是西班牙殖民者役使华侨远征摩鹿加岛。

摩鹿加岛（Moluccas，今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古称美洛居，亦作米六合，以盛产香料闻名，故又称香料岛。最初被葡萄牙人占领，后来荷兰与葡人争夺香料产地，荷人将葡人驱逐，占据了该岛。当时，葡萄牙和西班牙已经合并，葡人遂向吕宋西班牙人乞援。西班牙新任驻吕宋总督达斯麻雷那斯（Don Gomes Peres das Marinas）企图以此为借口，将摩鹿加岛置于西班牙人的控制之下。达斯麻雷那斯遂遣战舰百余艘，载西班牙军士700人，士兵铳手400人，弓箭枪手1000人，组成远征军。另外，西班牙人又在吕宋征发华人250人随征。在这些人当中，高肖为把总，潘和五为哨兵。

西班牙人视华侨士兵如奴仆，稍有懈怠，即遭鞭笞，甚至被

刺死。潘和五暗中鼓动大家说：“叛死，釜死，等死耳，否亦且战死，曷若刺杀此酋以救死。胜利扬帆归，不胜而见缚，死未晚也”。^①大家认为潘和五说得有理，遂推潘和五为首领，于半夜举事，杀死了西班牙总督达斯麻雷那斯，还杀死了许多西班牙士兵。西班牙人仓卒不知所措，纷纷跳海逃生，许多人淹死海中。潘和五等人驾船离去，失路到了安南。其货财都被安南王籍没，大部分人留在安南不归，只有郭惟太等32人附他舟回到国内。

事件发生后，西班牙总督之子路易斯（Don Zouis Peres das marinas）遣僧来中国诉冤，请归还战船和财货，杀潘和五等人以偿命。福建巡抚许孚远奏闻于朝，明廷下令将郭惟太等32人逮系于狱，将西班牙僧人以礼遣回。因潘和五留安南未返，只得作罢。

【对吕宋华侨的第一次大屠杀和华侨的英勇反抗】 西班牙殖民者为了得到中国的商品，促进吕宋的繁荣，便千方百计地吸引华侨前往吕宋。他们特地在马尼拉附近为中国商人建立了一个丝绸市场，即华侨所说的“洞内”。不少华侨即在洞内长期住了下来，很快达到万余人。他们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引起了殖民者的疑惧。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西班牙殖民当局突然下令驱逐大量华侨出境，只留下三四千他们认为十分需要的华侨。从此开始了有计划的排华。

1603年（万历三十一年），西班牙殖民者对吕宋华侨进行了第一次有计划的大屠杀，死难华侨达25000人。这次事件的导火线是所谓“采金案”。1602年（万历三十年），自称“善望气”的张巖奏言，谓吕宋有机易山，山上有金豆自生，如派人采取，每年可得金10万两，银30万两。此时，万历皇帝求银若渴，遂命

^① 《明史·吕宋传》。

海澄县丞王时和偕张崐往吕宋勘查。因事属虚枉，当然只能无功而返。

西班牙人因此事而怀疑中国有异谋，认为所谓采金，不过是借口侦察而已。自此谣言四起，或谓中国不久将派兵夺占吕宋。西班牙殖民者加紧整修武备，严加防卫。他们怀疑华侨将为内应，故对华侨防范更严。他们将华侨家中的铁器全部收缴，并扬言，如中国派兵来犯，就先把你们全部杀掉，华侨因而惊恐不安。西班牙人鉴于以前潘和五起义的教训，又命令居住在城内的华侨全部移居到城外，这更使华侨感到大祸将临。为了不束手待毙，华侨在城外便设防自卫。西班牙人认定华侨要大举反叛，便先下手为强，派军队前往攻杀。华侨奋起反抗，群集攻城，因武器简陋，死伤甚众。但华侨人数众多，所以一时对西班牙人造成很大的威胁。第二天，退休总督路易斯率兵反攻，华侨抵挡不住，退回筑堡自守。殖民者稍事整顿，便又大举来攻。华侨补给缺乏，武器不精，又因多是商人，不习攻战，组织得也不好，面对武器精良的殖民军队，显然处于劣势。防线很快被攻破，突围逃走。西班牙军队穷追不舍，滥加杀戮，前后约有 25000 名华侨被杀死，其中以福建漳、泉人为多。

在这第一次大屠杀过后，西班牙人深怕中国兴师问罪，便移书福建巡抚徐学聚，“言华人将谋乱，不得已先之”。^①还假惺惺地表示，让死者家人去领回死者妻子及遗物，万历皇帝闻讯后，命将张崐“梟首传示海上”，命徐学聚移檄吕宋，“数以擅杀罪，令送死者妻子归，竟不能讨也”。^②明王朝视海外华侨如弃民，认为华侨都是不服教化的奸商无赖，虽暴尸海外，不足惋惜，而不认为是国家的耻辱，因而终未兴师问罪。

①② 《明史·吕宋传》。

明王朝的这种态度，助长了殖民者的气焰，致使以后多次屠杀我华侨。

【明清之际西班牙殖民者对吕宋华侨的多次屠杀】 第一次大屠杀后，中国商人一时视吕宋为畏途，不敢前往贸易，中断了西班牙人所需中国货物的供应。于是，西班牙人又多方美言相劝，希望中国商人前往通商。时间一久，又往者如故，居住吕宋的华侨又众多如初。西班牙人见华侨人数日多，难于统治，便针对吕宋华侨制定了三条禁令：第一，中国船只离开吕宋时，必须将随船来的中国人全部载回，不得在吕宋任意居留。第二，在马尼拉城内，指定三个地方允许华商居住，不得随意迁移。第三，华商不能随意在内地往来，如没有殖民当局的凭照，不能到离城二英里以外的地方。这种禁令起初较为严厉，后来渐渐变得宽疏，故流寓吕宋的华侨越来越多。西班牙人为了加以限制，便向华侨课以特别的重税。这自然引起华侨的不满，摩擦时有发生。1639年（崇祯十二年）底，西班牙殖民者又一次对华侨大肆屠杀。这次屠杀历时4个月，华侨被杀者22000人，与第一次相差无几。当时明王朝正值多事之秋，濒临灭亡，对这次屠杀竟毫无反应。

入清以后，西班牙殖民者又多次屠杀吕宋华侨。

第一次发生在1662年（康熙元年），即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郑成功派一个意大利传教士去吕宋，劝西班牙人继续奉明王朝正朔，向台湾郑氏政权纳贡。吕宋华侨闻知郑成功收复台湾，甚受鼓舞。这时，又恰巧有吕宋华侨与台湾居民通信，殖民者便怀疑华侨将起而暴动，遂决计大举屠杀。他们在布置就绪后，即无理拘捕两名华侨船主。华侨起而相争，并打死一名西班牙人。于是，殖民者使用火炮狂轰华侨居住区，华侨死伤无数。他们有的逃往台湾，有的逃往深山，另有八九千人顽强抵抗，终因力量悬殊，被杀者过半。郑成功闻知此事，极为愤怒，准备兴师问

罪，但因疾病缠身，不久死去，故未能如愿。

第二次发生在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当时清政府已统一台湾，并设置府县，在台湾、澎湖增置守兵。这使得吕宋殖民当局疑惧增加，担心华侨与中国政府里应外合，遂再一次大肆屠杀我华侨。

第三次发生在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当时英国人已退出马尼拉。西班牙人回来后，说华侨曾帮助过英国人，有倒西班牙之意，遂下令绞死岛上所有的华侨。这次屠杀延续了二年之久，约6000名华侨死于非命。

清政府根本不以海外骨肉为念，坐视同胞无辜受戮，不闻不问，实令人痛惜。

【荷兰殖民者对华侨的严酷统治】 1619年，荷兰殖民者以武力从英国人手中夺取了雅加达，改名为巴达维亚(Batavia)。在荷兰殖民者占领之初，这里只是一个港口小镇，人口不到2000人，其中约有300多华侨。城四周都是些荒芜的沼泽。荷兰殖民者为了把这里建成殖民统治中心，便千方百计引诱或劫掠华侨前去定居。他们经常到中国沿海掳掠男人、妇女和儿童，遇有机会就在海上劫掠中国海船，将这些中国人押往巴达维亚。他们还引诱其他东南亚国家的中国商人，大量地发给他们通行证，劝他们到巴达维亚经商和定居，并给予种种“优待”。华侨的大量到来和辛勤劳动，使巴达维亚迅速繁荣起来。到18世纪初，巴达维亚已成为拥有十多万人口的城市，其中华侨有15000多人。如果加上郊区的华侨，在巴达维亚地区共有华侨60000多人。

荷兰人对华侨采用“以华制华”的方法，建立起“侨长”制度。1719年，荷殖民当局任命苏鸣岗为华侨“大头目”，1725

① 参见张维华著：《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

年改称“甲必丹”（Captain），即首领之意，1732年则正式将“甲必丹”定为官名。为了对华侨进行更严密的统治，在“甲必丹”下又设“雷珍兰”，在雷珍兰之下又设相当于区长的“甲首”或“域孤”的官职，在甲必丹之上又设了“玛腰”，以对华侨实行层层统治和剥削。

随着华侨的增加，荷人觉得华侨威胁了他们的利益，便对华侨进行各种各样的限制和迫害。新侨进入巴达维亚，如未得到殖民当局批准，则要坐牢半年并罚苦役。来往大船载100人，小船载60人，且需交2500盾和1250盾作抵押。华商上岸住宿要经批准和登记，水手一律不准上岸。水手失踪者要重罚船主。殖民者为转移当地人民的仇恨情绪，还经常煽动当地人与华侨发生摩擦，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殖民者为了破坏华侨的团结，还将华侨分为内外两个区域居住。城内居住的是富侨和旧住户，城外居住的是农民和其他贫民。

1727年，殖民当局实行身份证制度。身份证有效期为六个月，纳费五盾，如到期不补领新证，则以违法和逃匿论，就要被关入监狱。负责办理身份证的官员可以随意捕人。他们利用职权勒索财物，侮辱妇女。被捕的华侨只有出钱赎身，否则就要流放到锡兰（斯里兰卡）的种植园去做苦工，或者处死。

殖民当局向当地人民和华侨征收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征税招人承办，承办人仗势勒索，人民不胜其繁苛，因而不断引起反抗。这引起了殖民当局的恐慌，便用严刑酷法来镇压。有时甚至使用剥皮的酷刑，在执行时还故意让人观看，借以恐吓人民。

1740年7月，殖民当局作出决议，凡属可疑的华侨，不管有无身份证，一律逮捕，再行审查。很多华侨被押往锡兰做苦工。殖民当局还故意惨杀华侨，有时成批的华侨被活活投入大海，葬身鱼腹。

【红溪惨案】 殖民者的苛暴引起了华侨极大的愤怒。他们深感“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作难而反，庶几死中求生。”于是便纷纷往市郊集结，约有数千人。大家推举黄班为首领，组成了抗荷武装。他们计划兵分三路，一路攻打荷兰炮台，一路攻打荷兰兵营，第三路由黄班亲自率领，由东门直捣总督府。1740年9月下旬，抗荷活动开始暴露，殖民者采取了一系列镇压和防范措施：严禁华侨出城，只能闭门守户，以防互相串通，并逐家搜缴可作为武器的利器。同时调集兵力，对抗荷武装进行疯狂镇压。华侨抗荷武装因武器简陋，力量悬殊，各路进攻都遭到失败，经三昼夜战斗，死伤惨重。黄班只好带领余部，转移到爪哇岛东部，继续进行斗争。

10月9日晚，殖民者倾巢出动，借口搜查私藏军火，对城内华侨逐户劫掠和屠杀，连妇女儿童和卧病在床者都不能幸免。暴徒们还到处放火，数百家华侨商店和房屋顿成灰烬。殖民者还煽动当地土人向华侨攻击，并明码标价，按杀华侨的人头数行赏。这次大屠杀持续了一个多月。仅10月9日至12日的三天中，城内华侨被杀近万人，六七百户华侨房屋被烧毁。华侨的鲜血染红了溪水，所以史称“红溪惨案”。至于抢劫的华侨财产，更是不计其数。^①

红溪惨案发生后，爪哇各地华侨继续进行反荷斗争。爪哇当地人民也举起了反荷大旗，与华侨并肩作战，并一度包围了三宝瓏。荷兰殖民者用先进的枪炮进行疯狂的镇压。在这次反荷斗争中，华侨前后被杀的不下30000人。

惨案发生后，荷兰殖民者担心清政府兴师问罪和禁止通商，便遣使来华说项。乾隆帝却说：“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

^① 参见朱杰勤：《1740年印度尼西亚华侨反抗荷兰殖民者的斗争》，载《历史教学》1962年11期。

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云。”^① 腐败的清政府眼见数万同胞无辜受戮，却不管不问，使得广大侨胞备尝了“海外孤儿”之苦。

这次反荷斗争加深了华侨和当地人民的战斗情谊，成为中国和印尼人民友好关系史上光辉的一页。它沉重打击了荷兰殖民者，使其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修改其殖民政策和措施。在此后印尼人民的反荷斗争中，都有华侨参加。

^① 李长傅：《中国殖民史》第四章。

第十二章 明清时期中外文化交流

明清时期，随着中外交往面的扩大，中外文化交流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化不但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继续广为传播，而且还开始成为欧洲士人的理想寄托，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从中国文化中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的和物质的世界。中国文化对于外国的社会发展进程产生着积极的历史影响。然而在文化交流的另一端，外国文化却不易得到中国社会的科学认识和充分吸收。尤其是通过耶稣会士布道传来的西方文化，常常遭到一些中国士大夫的排斥和反对。历史表明，闭关主义严重束缚了人们对域外世界的正确认识，它严重抗拒着人们对外国文化的积极探求与学习，而作为西学东渐的主要文化载体的耶稣会士，也无法担任在中国社会内部传播外来文化的主角。于是，西学东渐的文化交流使命留给了中国后来的知识分子。

第一节 明清时期中国与亚洲国家的文化交流^①

一、科学技术的交流

【农业技术】 明清时期，我国农业技术，如施肥、灌溉、

^① 参阅周一良：《中朝人民的友谊关系与文化交流》，开明书店1951年版。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陈修和：《中越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北京大学：《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史论丛》，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深耕等方法仍然对东南亚和东亚地区有着广泛影响。明代，中国烧草施肥方法传入暹罗。1488年，朝鲜崔溥从中国绍兴学得制造水车方法后，回国后随即仿造。到18世纪时，水车已在朝鲜大量推广。而水车对安南农业灌溉也起了很大作用。中国一些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如铁犁、水牛、水磨、水车还相继传入菲律宾。

这时期，农作物也大量相互传播。棉花自1364年由中国人传入朝鲜后，到15世纪，棉花已逐渐普及到整个朝鲜半岛，朝鲜并开始向日本输出棉布。这时期，先后有六十余种中国农作物传入菲律宾，包括各种蔬菜和水果，极大地丰富了菲律宾人民的生活。中国的蚕豆、荔枝、柿子、红枣、芹菜、韭菜、油菜、枇杷、梅等蔬菜果木传入缅甸后，缅甸人民专门在这些菜果名称前冠上“德由”（意为中国）。与此同时，一些拉美地区农作物也多经东南亚地区传入我国，并且又经我国传播到朝鲜、尼泊尔等地（如烟草、马铃薯）。

中国农业备荒书籍在海外也倍受关注。明朝朱橚《救荒本草》在明末清初传入日本后，即受到日本知识界及德川幕府的重视，并于1716、1788、1842年先后多次刊版。在其影响下，日本也出现了一些类似的著作。如佐佐木朴庵《救荒植物数十种》、《救荒略》，松田勤《备荒草木图》，馆饥《荒年食粮志》，混沌舍《备荒图谱》等书。

【手工业技术】 明清时期中国丝织业技术在亚洲各国仍然有着很大影响。安南的顺化、广南等地，就有不少人专门师从中国织匠学习绢布绫罗等织造技术；而缅甸阿摩罗补罗所生产名贵丝绸——“仑德耶”的技术也传自中国。日本天正年间（1573—1591），明朝织匠至堺市，传授织造纹纱、约纱类的技术，一时产品在日本大受欢迎。不久，这种技术传至京都，从而奠定了日

本西阵机织业隆盛的基础。^①中国制瓷技术也为亚洲各国所关注。日本、东南亚以及波斯等地，都有中国瓷匠前去传授制瓷技术。越南的北宁和藩朗、泰国的曼谷等地的陶瓷产品，曾表现出浓厚的中国江西瓷器的技术风格。另外，中国的制糖、造船、矿冶、酿酒等技术在东南亚以及南亚地区也有普遍影响。

中国和周边邻国生产技艺的相互交流，推动了手工业技术的不断提高。朝鲜在中国木活字传入后，技人又创造出金属活字。15世纪后也被中国印刷界所采用。朝鲜、安南（越南）还不断派人来明朝和清朝学习常用麻纸、奏本纸制作方法以及印刷术。明朝堆红堆黑技术传入日本后，日本漆工用这种技术仿制了许多漆器；而明代工匠也从日本漆匠那里学来制作色彩鲜艳的“倭漆器”以及泥金技法。尼泊尔的金、银、铜器制造雕刻工艺，也一直为中国藏地人民所称道和学习。清代康乾时期，有不少尼泊尔技人在西藏以此技艺谋生，被藏人称为“泊榜人”。

明朝学者宋应星编写的《天工开物》，是一部全面系统地总结我国古代工农业生产技术的百科全书。在国内因不被重视而很快失传，但传至日本后，却先后于1771年和文政年间（1818—1829）两次翻刻印行，成为日本国民风行的技术教科书。

【医学交流】 明清时期，中国医学对于周邻各国仍有很大影响。15世纪日本的著名医师竹田昌庆、田三代喜都曾亲自来中国学习金元四大家中的李杲和朱丹溪学说。后来，曲直濂道三也来中国学宗朱李，回国后编著医书《启迪集》八卷，被誉为日本近代医学的鼻祖。日本著名针灸师金持重弘在中国则专门学习研究宋代王维德的针灸学。17世纪后，朝鲜也经常选派医生随朝贡使团向我国太医院医生互相问难。这时期，我国的一些著名医生也前

^① （日本）横井时冬，《日本工业史》第118页。

往海外，把中国医学知识介绍给外国同行，并在海外行医服务。明末流亡日本的中国僧人独立性易（杭州人，原名戴笠，字曼公），曾传授医术给日本池田正直等人，使池田氏以痘科在日本大显身手。至宽政(1789—1800)年间幕府设立痘科医官时，遂任命正直之孙瑞仙充任此职，于是种痘法便流行于日本。清初侨居于长崎的浙江金华人陈明德，擅长小儿科，因受长崎人挽留，改名颖川入德，行医于长崎，并著有《心医录》在日本流行。越南人对于在其民间行医的中国医师，则专称为“东医”。另外，也有一些海外名医来华传授医术。1407年（明永乐五年），明成祖还特此下诏敦聘安南名医来华。

中国医药书籍也为外国所慕求。明清时期，朝鲜、安南、日本等国不断派人到中国搜求中国医书。朝鲜李世宗为了普及中医知识，还曾专门下令刊行各种中国医书，以此发展本国医学。1445年，金礼蒙等人编成《医方类聚》，其中收引不少已在我国亡佚的医籍。1613年，许浚奉命编成《东医宝鉴》，参考中国医书83种，朝鲜医书3种，不久就传入我国，并先后于1766、1796年在广东和江宁刻版。日本也于1645年翻刻了巢元方《诸病源候论》，1663年翻刻了陈实功《外科正宗》等书。18世纪越南黎有卓在采用我国内经理论和中医处方基础上，著成《海上医宗心领》，被越南人民敬奉为“医圣”。日本对中国药物学著作也极为重视。1606年，林道春自长崎得到李时珍《本草纲目》，德川幕府便于1638年翻刻出版。以后不但多次重印，而且一些研究《本草纲目》的日本学者专著也相继问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中国药物学的本草研究，传入日本后，却变成博物学而日渐发达起来。

这时期，我国仍从东南亚等地广泛进口犀角、没药、葶苈、大风子、槟榔、丁香、安息香、血竭、芦荟等药材，从而丰富了

中药宝库。而我国大黄等药材，也为外国医药界所慕求。

【天文数学】 明朝初年，仿元朝办法设置回回司天监，^①并聘用撒马尔罕人马沙亦黑等人翻译波斯天文历法书籍，定名为《明译天文书》，在中国介绍了波斯天文历法理论。^②而明清两代政府也把颁送中国历法看作是向海外朝贡国家宣敷文教的一项重要措施，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天文学的对外影响。日本保井算哲曾根据中国《授时历》，结合日本实际，编造出日本第一部历法《贞享历》，于1684年被幕府所采用。明清之际，中国天文学开始受到欧洲天文学影响后，一些近邻国家也非常关注。朝鲜李孝宗在金堉的建议下，于1653年向清朝派遣留学生，专门研究清朝新历。日本学界在得到来华传教士所编有关汉译西方天文学书籍（如《天主实义》、《数学精蕴》）和中国士大夫所著天文数学书籍（如《历算全书》、《天经或问》）后，即迅速翻译出版。越南阮朝初年，因沿用明朝大统历，已不能准确预测天象，1810年派遣阮有慎来华学习清朝历法，回国后结合本国情况新编成《协经历》。

数学方面，元代朱世杰《算学启蒙》和明代程大位《算法统宗》，在明代传入朝鲜后，又经朝鲜传入日本，促进了日本数学的发展。江户初年，毛利重在研究中国有关珠算用法著作后，于京都开设“算学道场”，介绍中国珠算技法，使算盘在日本开始流行。

二、学术交流及其影响

【朱舜水与日本学术】 明清时代，日本学术仍然受到中国

① 《明史》卷三十一。

② 《明史》卷三十七。

学术的强烈影响。室町幕府和德川幕府时期，朱熹思想在日本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自16世纪初，王阳明的学说也传入日本。17世纪，阳明学开始在日本兴起，虽然幕府极力排斥和禁止，但阳明学说却以别开生面的思想，在日本孕育了不少杰出人才，后来不少阳明学者成了倒幕活动的领导者和骨干。

日本“水户学派”对于倒幕运动也有积极的影响。该学派滥觞于中国学者朱舜水。朱舜水，字之瑜（1600—1682）浙江余姚人，明亡后，曾数次前往日本乞师抗清。1659年定居日本，在长崎讲学。1665年，应水户侯德川光圀聘请，到水户讲学，促成水户学派形成。他特别强调大义名分思想，倡导读史。在朱舜水影响下，光圀开史馆，修《大日本史》，以南朝为正统，否定了武家操纵的北朝正统地位，直接表现了朱舜水倡导的尊王贱霸的史学笔法。朱门弟子也大多从事经史著述。

江户中期，清朝考据学风开始影响日本，顾炎武，阎若璩，钱大昕等人著作成为日本学术界爱读之书，自太田锦成（1765—1825）首开考证学风后，考证学派在日本日益兴盛。日本史学家辻善之助指出，日本“今日史学的隆盛，乃奠基于考证学风之上。明治史界所以有接受德国历史学风的预条事件，实不能忘记清朝考据学的培育之功”^①。

【中朝学术交流的繁荣】 15世纪，朝鲜李世宗和郑麟趾、申叔舟、成三问等学者通过对朝鲜语音韵的深入研究，并在广泛吸收中国《洪武正韵》等音韵学成果基础上，于1444年公布了他们创制的《训民正音》，从而在朝鲜结束了语言与文字（原用汉字）不统一的现象。朝鲜有了自己民族文字后，中朝两国学术交流仍然繁荣。早在李朝初年，郑梦周出使明朝回国后，就系统介

^① 辻善之助：《日交文化的交流》第209页。

绍了程朱学说。16世纪，终于在朝鲜形成了理学的黄金时代。17世纪后，中朝两国学者接触更加频繁。特别是朝鲜学者，通过参加李朝政府组织的朝贡使团入清，一面搜购中国书籍，一面与中国学者结交。洪大容（1731—1783）、朴趾源（1737—1805）、朴齐家（1750—1805）等人自清朝回国后，积极主张学习清朝的先进技术和文化成就，反对程朱理学，形成朝鲜“实学”派。

朝鲜李朝时期（1392—1910），在中国史学影响下，史学极其繁荣。中国各种史体，在朝鲜都已产生，纪传体有郑麟趾《高丽史》；编年体有徐居正《东国通鉴》；纪事本末体有李肯翊《燃藜室记述》；而效法中国实录体的《李朝实录》，包括自太祖至哲宗25王470年间的历年记录，共计1893卷。它不仅丰富了朝鲜史学宝库，也为研究中朝两国往来与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在史学风格上，朝鲜也深受清朝考据学风的影响。另外，一些中国学者对朝鲜学术也特别关注。清朝学者刘燕庭，在朝鲜学者赵云石帮助下，著《海东金石苑》等书，对朝鲜金石学研究做出了卓著成绩。

【越南学术的中国影响】 14至19世纪，越南学术仍受中国影响。越南黎朝、阮朝时期，继续实行崇儒政策。黎太宗时，开始释奠祭孔。到黎圣宗时，进一步规定实行每年春秋两祭。阮朝时，又改立神主，停用“文宣王”称号，仍照中国尊称为“至圣先师孔子”。同时，黎阮两朝又于京城设立国子监，置五经博士，奖励经学，并实行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使儒学、经学学者辈出。如黎贵惇，著《易经层说》、《春秋略论》等书，被誉为黎朝四大名儒之一。黎朝的史学，由于受中国《春秋》、《通鉴》、《纲目》等史书的强烈影响，一些史家积极宣扬大义名分，注重内外褒贬，以此昂扬民族精神。到阮朝时，又决定象中国一样编修《实录》。

【四夷馆与《华夷译语》】 明清两代，都曾设立四夷馆，作为外事翻译机构培养外语翻译人才。四夷馆一般隶于翰林院，内有西天、回回、缅甸、八百、暹罗等馆。明朝人还根据四夷馆材料，编辑成《华夷译语》，是我国最早的汉语外语字典，《华夷译语》包括近二十种语文，除我国周边少数民族译语外，主要有缅甸译语、暹罗译语、八百译语、安南译语、占城译语、满刺加译语、西天译语、回回译语（波斯）、朝鲜译语、日本译语、琉球译语等。它为中外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工具。

【中国书籍的对外交流】 明清时期，中国书籍大量流向海外国家。明清政府历来把赠送图书作为向海外国家弘扬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手段。而周边国家更是积极吸收中国文明成果，除往来使节携带中国书籍出境外，一些商人也大量经销中国书籍到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等地。尤其在日本，当时中国出版的多数书籍版种都很快流入其境。种类繁多的汉文书籍，深受日本朝野欢迎。在朝鲜，中国书籍也普遍为学者所注重。17、18世纪，大量汉译西学著作开始流入朝鲜和日本等国。在流入朝鲜的六十余种西学书中，包括有科学、伦理、地理、宗教等方面书籍。这些汉译西书，给朝鲜、日本学者以新奇和巨大的冲击，从此，他们借助汉译西书，开始了对西方学术文化的研究。

三、文学艺术交流及其影响

【明清小说在亚洲】 明清时期是我国古典小说发展的极盛阶段，产生了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许多不朽名著。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很快被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翻译成自己的文字，成为这些异邦人民的精神食粮。象《三国演义》这部脍炙人

口的长篇历史小说，在海外，1692年有日文本；1703年朝鲜刊行摘译本，1774年又修订重刊；1802年有泰文译本；以后又相继有马来文本、爪哇文本、柬埔寨文本等。越南由于通行汉字，原版本便直接广泛流传。这部小说以它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深深吸引了亚洲读者，以致海外妇孺皆知。在泰国，社会上层看《三国》书，平民百姓看《三国》戏，曼谷王朝拉玛二世在其所写的《卡维》中说：“自历沙场经百战，艰难险阻化为夷，雕虫小技不汉畏，能征善战晓《三国》。”《水浒传》传入海外后也不断再版。日本自冈岛冠山译出《忠义水浒传》后，不久便有《本朝水浒传》、《日本水浒传》、《依波吕水浒传》、《女水浒传》、《倾城水浒传》、《俊杰水浒传》、《水浒太平记》等模仿之作相继问世。

一些海外国家还根据明清小说题材情节，改编成符合本国背景和语言的作品，从而丰富了自己国家的文学宝库。如《金瓶梅》在日本被改编成《双草纸》；《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在朝鲜被改编成《御伽婢子》，而在越南则分别改编成《传奇漫录》和《传奇新谱》。清代言情小说《金云翘传》经越南阮攸（1765—1820）用喃文民族诗歌形式移植过去后，成为越南杰出的古典文学名著^①。

【日、朝、越汉文学创作的繁荣】 14至19世纪，日本、朝鲜、越南在长期吸收中国文化基础上，汉文学创作非常繁荣。明初，日本的“五山文学”^①仍然活跃于文坛。受到明太祖接见的来华日僧绝海中津，在回答熊野徐福古祠时曾赋诗告诉明太祖：“熊野峰前徐福祠，满山药草雨余肥，只今海上波涛稳，万里好风须早归。”他的诗文集《蕉坚稿》，极受明朝学者称誉。16世纪中期来华的五山文学晚期作家策彦周良，也常用汉诗和明朝文人相唱

^① “五山文学”指13世纪兴起的以京都和镰仓的五山十刹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日本汉文学。

和。其中一首道：“莫道江南隔海东，相亲千里亦同风。从今若许忘形友，语纵不通心可通。”淋漓表达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到江户时代（1603—1868），日本汉文学创作已从禅宗僧侣扩大到社会上武士以及商人地主阶层，创作题材也从禅僧山林生活扩大到日本特有景色和广阔的社会生活，从而进入到日本汉文学创作的辉煌时代。

朝鲜自《训民正音》创制后，不少学者仍然以汉字进行写作。在钱汉山《列朝诗集》和朱竹垞《明诗综》中，就收有朝鲜诗人五十余家的作品。而且，朝鲜诗人对我国诗词评论欣赏能力很高。朝鲜来清使臣徐良崎在阅读清初词人纳兰《侧帽词》后，欣然而题：“使车昨渡海东边，携得新诗二妙传，谁料晓风残月后，而今重见柳屯田”。

越南自14世纪至19世纪期间，也产生出不少汉文诗文集。黎圣宗（1460—1496）在位时，曾自称骚坛元帅，与文臣申仁忠、杜润等28人用诗歌互相唱和，时称骚坛二十八宿。其中最著名作品为汉诗《琼苑九歌》，收有他们创作的汉诗数百篇。阮朝时，越南汉文学创作依然繁荣。同治年间，两使越南的徐延旭曾无限感慨：“予游诸夷中，有摛文而宗淮南者，有称诗而薄少陵者，有黜元白而诮长吉者，有读古今而鉴鉴者。呼呜！礼失而求诸夷矣！”^①

【戏剧】 随着明清小说在海外的广泛流传，不少国家将中国小说改编成戏剧在舞台上演出。在泰国，就有《献帝出游》、《吕布除董卓》、《周瑜决策取荆州》、《周瑜吐血》、《孙夫人》、《貂蝉诱董卓》等剧目相继问世。在爪哇，为迎合观众的爱好，有人还根据中国故事编成皮影戏。约至17世纪中叶，越南、

^① 徐延旭：《越南辑略》卷二。

柬埔寨、泰国以及印尼诸岛都已有上演中国戏的剧院。伍子胥、蔣相如、关云长、曹孟德、宋江、李逵、张生、红娘、孙悟空、猪八戒都是东南亚人民所熟悉的艺术形象。甚至关羽还被他们作为“关圣帝君”奉祭寺庙，而曹操则成为他们生活中奸诈阴险的代名词。一些中国戏班也到海外演出。1685年11月，中国广东戏班、漳州戏班就曾出现于暹罗舞台上。另外，一些国家艺人还把中国小说改编成说唱材料到各处演唱。如在朝鲜，18世纪就有许多江湖艺人用清唱的民族艺术形式说唱中国故事。而在爪哇，这种说唱活动不但在公共场所极为普遍，一些说书人甚至还走村串户，在私人家庭中表演。

【音乐】 明清时期，中国音乐对于东亚与东南亚各国仍有直接影响。安南黎太宗（1433—1442）制定的御用音乐，就是根据明朝乐器，用大鼓、编磬、编钟、琴瑟、笙箫、管箫、柷敔、埙篪作为堂上之乐，以方响、箜篌、琵琶、管笛作为堂下音乐。清初，中国僧人心越兴侑（浙江金华人）入日时，把操琴技术传授给杉浦琴川等人，使久已在日本失传的琴法又兴盛起来。尤其是琉球国，自1372年（明洪武五年）开始与中国明、清两代王朝频繁往来后，其音乐也受到中国音乐文化的深刻影响。在乐器方面，从中国传到琉球的有三弦、月琴、琵琶、七弦琴、扬琴、笛、京胡、二胡、提箏、拍板、铜锣、唢呐等；在乐谱方面，琉球的“工工四”记谱法也来源于中国的“工尺谱”；在音阶方面，人们认为琉球的三类音阶中，就有两类与中国传统音乐的音阶相接近；在曲目方面，一些琉球曲目也与中国某些曲目相似，如琉球的《安波节》即与中国泉州的《长工歌》的音阶以至具体旋律基本一致。^①同时，一些外国音乐也传至中国。明代，来自

^① 王燮华：《中国音乐文化对日本冲绳音乐文化的影响及其特点》，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129页。

波斯、阿拉伯、土耳其等地的唢呐传入中国，成为中国军乐和民间婚丧事中的“主角”。朝鲜、安南、廓尔喀的舞蹈曾是清廷宴会必不可少的舞乐。缅甸在清代也再次来华献乐。这次由缅甸传入的音乐分粗细两种，粗乐有乐器接内搭兜呼（长鼓）、稽湾斜枯（八面铜锣）、聂兜姜（唢呐）、聂聂兜姜（唢呐）、结莽聂兜布（铙）；细乐有乐器巴打拉（琴）、蚌扎（鼓）、总稿机（琴）、密穹总（琴）、得约总（琴）、不垒（竹笛）、接足（碰钟）。东邻日本的歌舞音乐也传至中国，被收进清代曹寅编写的《太平乐史》中。

【书法、绘画】 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使团曾向国内介绍东南亚动物画，甚至还把东南亚、南亚的宗教画带回南京，张挂于静海寺。明清两代中国书法绘画对外也有直接影响。在1430年创作的一幅伊朗名画中，描写了伊朗王子胡马与中国公主胡美音相聚的故事，这幅画既有明代绘画的技巧，又有伊朗绘画的温雅。^① 在16世纪的阿塞拜疆地区，苏丹·穆罕默德·台不里斯、米而萨·阿里、阿加·米勒卡等小型彩画家的作品中，主题是中国的岩石、云彩、人物、衣服，反映出中国与阿塞拜疆在艺术方面的联系。^② 日本绘画界十分关注中国书法、绘画的进展。日本画家雪舟等扬（1420—1506），曾于1467年来明朝，拜当时中国名画家李在等人为师，学习设色、破墨之法。1469年回国后，创造出的一系列反映日本民族风格的水墨山水画。他的名作有天桥立图、山水长卷、秋冬山水图和破墨山水图等。清初，一些中国画家流亡日本，在日本传授中国书法和绘画技法，使文征明笔法和西洋写生画很快出现于日本书画坛。日本兴起的浮世绘版画作品，也

① 朱杰勤：《中国和伊朗历史上的友好关系》，《历史研究》1978年第7期。

② 撰寇瑟：《中世纪时期阿塞拜疆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关系》，《历史研究》1958年第2期。

很快传入中国。明后期，一些流入菲律宾的中国民间画家，曾用中国绘画风格创制不少基督教圣徒肖象油画以装饰菲律宾教堂。我国清朝异军突起的篆刻书法，还使一些酷爱中国艺术的朝鲜学者频频来访。

四、社会生活

【日本禅宗与隐元隆崎】 明初，中日两国佛教僧侣往来仍然不断。尤其是日本禅宗僧人，为了亲自体验中国的丛林生活，观赏中国的壮丽山川，钻研中国佛家的禅学，不断来明朝求法。明末清初，一些中国僧侣也因避乱而移居日本，给予日本禅宗以至社会生活以很大影响。1620年，明僧真圆在长崎开创兴福寺（一名南京寺）；1628年，明僧觉海入长崎创办福济寺（一名漳州寺）；1629年，明僧超元也在长崎开办崇福寺（一名福州寺），它们合称为长崎三大寺。1654年，福建黄檗山万福寺高僧隐元隆崎（1592—1673），在应长崎兴福寺住持逸然邀请后，率弟子东渡日本，在长崎各寺开法。1658年，隐元到江户拜见德川四代将军家纲，被赐地于东京近郊宇治。隐元遂就地建立佛寺，仍称黄檗山万福寺，从而开创了日本禅宗中的黄檗宗。隐元入日本说法，一时各宗高僧和朝野士人相继趋其门下，使已经衰落的日本禅宗，又恢复了生机，人才辈出，宗风大振。隐元及其弟子还把明代佛教建筑、雕塑、绘画、书法等艺术以及万历版《大藏经》传至日本，给日本佛教文化以新的刺激。1673年4月2日，日本天皇特赐隐元“大光普照国师”称号。

【服装与饮食】 明清时期，不但中国棉布风行于东南亚各地，而且中国服装在南洋各国也很有影响。明清两代政府曾将中国冠带袍服赠送于琉球、占城、渤泥、暹罗、爪哇、满刺加等国

王公贵族，以致东南亚的一些地区，形成了黄色服装为贵族专用的习俗，而平民百姓服装则专用蓝色。随着中国人出海谋生的增多，中国的长袖短上衣、宽松长裤，各种礼帽、雨伞、拖鞋、折扇，也逐渐在东南亚社会流行。15世纪，朝鲜的马尾裙在北京也曾风行一时。最初，马尾裙只为京城贵族子弟和歌妓所服用，但后来京城内的武将和朝臣也纷纷效法。京城内并出现专门生产马尾裙的工场。到15世纪末才为朝廷所禁止。

这时期，中国和东南亚等国在饮食方面也曾相互影响。

明初随郑和下西洋的船员，曾在东南亚海岛向当地人民学习采集燕窝，充作食用，以后食用燕窝的风气在中国逐渐盛行。明朝后期，还从东南亚等地传入美洲作物如辣椒、马铃薯、花生、玉米、番薯、番茄、菜豆、向日葵等，极大丰富了我国人民的食物构成。明代中国的菜肴点心如馄饨、春饼、豆干、豆豉、豆腐、杂碎也传入东南亚和日本，并被当地人民所采用。特别是中国瓷器曾普遍更新了东南亚一些地区的饮食器具。另外，中国的度量衡器也传至东南亚一些国家，为当地人民生活中的产品交换提供了标准量具。

【宫室建筑】 中国的宫室寺院建筑风格对亚洲一些国家有着直接的影响。在皇宫建筑方面，越南顺化的阮朝宫苑和缅甸曼德勒都城（瓦城）的宫廷，不但有中国匠人直接参加设计施工，而且他们都明显地表现了中国北京故宫的建筑艺术风格。在民间建筑方面，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砖瓦石砌房屋建筑技术和风格在菲律宾影响尤深；中国的“百叶窗”也广泛用于缅甸民间住宅，它既宜通风透光，又可防风蔽日，深受缅甸人民所喜爱。在佛教建筑方面，明清之际流寓日本的中国僧侣，在日本主持设计施工了不少佛教寺院。这些建筑物，一改原来日本佛教寺院的那种色彩淡雅、格调朴素的南宋风格，而表现了明代建筑物色彩艳

丽的新鲜意趣。安置于这些新寺院内的佛像，也完全出自中国雕匠之手，鲜明地体现了明代雕塑艺术风格，日本雕工从此也竞相效法。在尼泊尔15至18世纪兴建的一些寺庙中的宝塔式建筑，也类似中国古塔的建筑风格。

第二节 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①

一、17、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

【中国文化大量西传】 自16世纪葡萄牙人来到中国东南沿海，中、欧之间的文化交流就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中国与欧洲之间沿着东南亚海路，各国殖民商人、天主教各会传教士以及来华游客不断增加。通过这些媒介，中国物品、思想大量传向西方。

中国物品西传的历史，早在思想西传之前就开始了。16世纪以后，大量的中国丝绸、茶、瓷器等物品源源运往西欧。这一时期由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加强，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如使用扇子，轿子，折伞，糊墙纸，乃至服装等都传向了西方，丰富了欧洲人的生活。

16世纪以后，中国思想开始传向西方，这一传播过程是通过许多中介来完成的。首先，来华传教士大量的译著和有关中国的著述，特别是耶稣会士定期汇报工作的《书简》，是直接介绍中国思想的最主要的材料，如著名的《耶稣会士书简集》。很多传

^① 参见许明龙：《中国古代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世界历史》1983年第1期。

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日）榎一雄：《西欧文明与东亚细亚》，《东西文明的交流（5）》，日本东京平凡社1980年版。

教士翻译过中国经籍，象殷铎泽译《中庸》、《大学》、《论语》，柏应理作《西文四书直解》。卫方济译《四书》、《考经》、《幼学》，白晋著《易经大意》，宋君荣译（Antonius Gaubil）《书经》，刘应（Claudus de Visdelou）译《易经概说》、《礼记》等。特别是18世纪，欧洲出现耶稣会士编辑的多达十五卷的巨著《关于中国人的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等等的回忆录》。除来华传教士外，这一时期来华的各国商人和使节所写的各种游记及报告，也是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况且，17世纪之后，欧洲出现了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汉学家，如德国的缪勒、法国皇家学院教授戴培洛等，他们的著述在介绍中国思想文化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欧洲出现“中国热”】 随着欧洲人对古老而又神秘的中国了解的增加，欧洲出现了一股巨大狂热，这股狂热在18世纪中叶达到了最高潮。

对中国事物的狂热波及西欧各国，特别是法、德、英等国，也波及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当时欧洲贵族盛行收集中国艺术品，尤其是瓷器、漆器，在王宫中辟有“中国室”。贵族之家则以使用、收藏中国瓷器为时髦。法国人对中国事物的兴趣更大，路易十四曾身着中国服装出席大典，法国宫廷举行穿中国服饰的化装舞会，还举行中国式的庆祝典礼。中国的花灯、烟火也受到欧洲人的喜爱。人们也学会荡起了中国人的秋千。中国的折扇已成为宫廷贵妇手中的必备之物。皮影戏由欧洲上流社会走向街头，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中国风筝在16世纪传到意大利，很快又传到其他国家。中国轿子在17世纪也受到欧洲人的欢迎……。

中国器物的西传促进了欧洲瓷器、漆器工业的建立。早在16世纪意大利人就试图仿制中国瓷器，未果。1709年，德国人弗兰

德克·布特格 (F·Böttger) 终于制出了第一件供应市场的著名瓷器，从此瓷器工业在各国建立起来。漆器工业也基本在这一时期建立。

【洛可可艺术】 “中国热”对于欧洲的绘画、建筑、园艺、家具、瓷器、漆器的生产都产生过重大影响。欧洲艺术史上，17世纪、18世纪出现了一个独特的艺术风格——洛可可艺术，其特点是变化多端，生动活泼，采用中国柔和飘逸之曲线及椭圆形的细巧花纹。人们把这个时期称为“洛可可”时期。

“洛可可” (Rococo) 时期，欧洲出现了大量仿制中国器物的制品，如漆有中国花鸟图案的家具，在车、轿、手杖等物品上，也漆上中国图样。当时欧洲还盛行用中国风格的花鸟画做室内装饰，房间内使用各种颜色、花样的中国式壁纸，还有中国风格的版画。中国风景画也对欧洲绘画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的刺绣品、棉织品艺术风格，也在欧洲风行一时。

【中国园林之风行】 在洛可可时期，欧洲人对中国的园林建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各国争相仿造，蔚然成风。1747年，传教士巴德尼 (Attiret, Jean Denis, 即王致诚) 作《北京附近的皇室园亭》，以圆明园为例，把中国优于欧洲的园林艺术介绍到了西方。大约十年以后，英国园艺家威廉·查伯尔士 (William Chambers) 在华学习中国的园林艺术，于1772年著《东方园林论》，极力赞美中国园林建筑以艺术模仿自然，园景千变万化的优点。

查伯尔士为英国肯特公爵建起欧洲第一个中国式花园别墅——逖园 (Kew Garden)，内有假山、瀑布、曲径、丛林，还有一座九层宝塔，均依中国样式建成。一时成为法、德、荷等国争相模仿的典型。随后，法国风行“中英法式园林”，并出现了卡牟、培兰革、奥古斯丁、累那等长于模仿中国园林的建筑

师。德国则在1773年派园艺师塞开尔赴英学习中国园林的建筑方法。翁则尔著有《中国园林论》。卡塞尔伯爵则建成了一个中国村，称为“木兰村（Moulang）”，村旁小溪，名葫江，村中设施，悉仿中国。在仿造中国园林的同时，欧洲各国在这一时期还分别仿造了其他中国形式的建筑。

二、中国思想对西方的影响

1. “百科全书派”宣传中国思想

18世纪以后，法国出现了启蒙运动，这一运动是在法国封建专制制度陷入深刻危机、近代自然科学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其思想渊源则要追溯到英、法两国历史上的进步思想。同时，中国思想文化也对启蒙运动产生过不可忽视的作用。

【“百科全书派”宣传中国思想】 18世纪启蒙运动中，法国一部分启蒙思想家形成一个政治派别，因其主要成员负责编纂《百科全书》（全称为《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或工艺详解辞典》，共35卷，1751—1780年出版）工作，因此被称为“百科全书派”。该派主要成员有：《百科全书》主编狄德罗、副主编达尔贝兰、撰稿人伏尔泰、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卢梭等。他们的哲学观点不尽相同，政治主张也不完全一致，但在崇拜理性，坚决反对教会和经院哲学，以及反对封建等级制度方面完全一致，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广泛宣传这些思想，所以在法国风靡一时，影响很大。

“百科全书派”的多数成员都是耶稣会士，因此他们与中国思想文化接触较广泛。许多成员都认真阅读过《耶稣会士书简集》，以及翻译的中国经籍，他们在《百科全书》以及其他著作

中介绍中国，赞美中国。如，狄德罗在《百科全书字典》中国部分就曾写道：“中国民族很能同心协力，他们历史的悠久，精神、艺术、学问、政治、哲学各方面，不仅压倒所有其他亚洲民族，据一部分学者的意见，他们所有的优点甚至可以和欧洲最开明的民族竞争。”由于《百科全书》在当时的法国流行很广，通过该书把中国思想介绍到了法国社会各阶层。“百科全书派”在赞美、介绍中国的同时，自己也受到中国思想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在政治、哲学思想方面，他们所提倡的唯物论、无神论、自然主义（即理性），以及政治主张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中国思想的某些影响。

【霍尔巴赫论“德治”】 霍尔巴赫 (Holbach) 是百科全书派的主要成员，他在1770年发表《自然之体系、物理世界及精神世界之法则》一书，轰动法国。全书提倡理性，反对神学，批判传统教会道德，宣传唯物主义。就政治观点而言，霍尔巴赫虽然攻击封建制度，但不反对君主制，幻想着由开明的哲学家国王来治国；极力赞美中国的道德原则、政治体系，认为以儒家之道来治国，就可以达到以上目的。他提出“以德治国”的主张，写作了《德治或以道德为基础政府》一书。他心目中以德治国的典范就是中国。他说：“在中国，法律充满智慧。理性对于君主的权力产生了不可思议的效果。”又说：“中国可算是世界上唯一把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历史悠久的帝国无疑告诉人们，国家的繁荣需依靠道德。”在1773年出版的《社会体系》一书中，许多地方谈到了中国，甚至提出“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霍尔巴赫等人的这种政治主张直接影响到法国大革命，在雅各宾派领导人罗伯斯庇尔起草的1793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六条中说：“自由是属于所有的人做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之事的权利；其原则为自然，其规则为正义，其保障为法律；其道德

界限则在下述格言之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①

【孟德斯鸠与《论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Monte Souieu)是法国最重要的启蒙学者之一，杰出的思想家、法学家，资产阶级国家和法学理论的奠基者。他的代表作为《论法的精神》(《法意》)，在理论上提出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学说，成为法国大革命的理论武器。

象其他启蒙学者一样，孟德斯鸠也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作过比较充分的研究，认真吸取了中国政治制度、伦理道德和社会风俗中一切有积极意义的东西，作为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思想材料。特别是他接受了借用于中国哲学的理性观，把它作为整个国家和立法的哲学基础。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对于理与法的解释，与宋明理学中天理的意义很接近，都是指万物自然的法则。

孟德斯鸠与其他学者不同，在注意吸收中国文化精华的同时，还能揭露中国社会的弊病。他指出中国文化的优点是：重农政策，遇灾害有蠲免，崇尚节俭，以及中国的礼制、孝道、伦理道德等。缺点则有：专制政治，奢侈腐化，朝代更替频繁，风俗之弊等方面。

【伏尔泰对中国的极端赞美】 伏尔泰(Vol Taire)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18世纪法国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伏尔泰对于中国文化极端赞扬，不论是中国的哲学、道德、政治还是科学，他都视为尽善尽美。伏尔泰极端崇拜孔子，认为孔子比基督还伟大，因为孔子从不以神或预言者自命，他不讲神秘，只谈道德，不将真理与迷信混同，而基督教则是虚伪的，迷信的，只给人类带来不幸。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

^① 《法国宪法集》，巴黎，1970年版，第80页。

人”，基督从未说过类似的话。基督不过禁人行恶，孔子则更劝人行善。孔子要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伏尔泰认为西方民族的任何格言、教理都不能与此纯粹的道德相比。^①孔子常讲仁义，伏尔泰认为如果人们都能照此去做，地球上就没有什么斗争了。因为他崇拜孔子，在自己的图书室里挂起孔子像，朝夕礼拜，并称孔子为“天下唯一的师表”。

伏尔泰佩服中国历史的悠久，文化的发达，尤其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感兴趣，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由哲学家国王治理的国家。他认为中国不是专制政治，中国行政组织分工完备，官吏考试选拔，设有谏议制度，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国家组织。中国的法律也充满“仁爱”，对任何人都要经政府审判后处死。为了大力提倡中国的政治制度，伏尔泰曾游说欧洲各国君主，要他们学乾隆的榜样。伏尔泰作有两本专论中国思想文化的著作，一本是《礼俗论》，一本是《中国孤儿》剧本，书中对于中国作了理想化的赞美。

伏尔泰以反教会神学著称，崇尚自然神论，幻想建立一种“理性宗教”。在他心目中，这种理性宗教的楷模则是中国儒教。正是在伏尔泰等学者的影响下，中国成为启蒙运动中欧洲人心目中的理想国家。

2. 中国经济思想与重农学派

【重农学派的基本政策】 重农学派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是启蒙运动在政治经济学上的表现，代表人物是魁奈和杜尔阁。重农学派的基本主张是自然法、租税法 and 重农政策。可以从重农学派的基本理论中看出，中国思想给予重农学

^① 参见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79页。

派以巨大的影响。

重农学派的思想基础是自然法。他们认为，政府如果是开明的，就必须依从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法则，他们把这些法则称为“自然秩序”或“自然法”。自然法超越一切社会现象而永久存在，自然法则为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自然法来源于何处呢？象启蒙思想家的理性观一样，与中国思想有联系，魁奈认为就是中国的天理天则，即中国先哲所谓的“道”。^①

在自然法的基础上，他们认为自然秩序的基本原则是，任何国家的全部财富，如国家的岁入，人民的衣食，归根到底都是来自该国家的土地。因此，唯一真正公平的税收形式是根据土地的生产能力征收一种单一的土地税，即由土地所有者负担全部租税。一切加在普通人身上的苛捐杂税都应蠲免。这种单一税学说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影响下提出的。魁奈曾深入研究中国的税制，特别推崇《周礼》均田贡赋之税，认为按照田产多寡、肥瘠征收单一的土地税最为合理，“应该让地主纳粮而耕者免税，中国历来税制就有这些优点”。单一税的提出使全部赋税都转到地租上，换句话说，土地所有权部分地被没收了——这正是法国革命制定的法律打算实施的办法，也是李嘉图学派充分发展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终结论。

既然“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②重农学派认为农业生产是唯一的生产性劳动，而制造业和商业则是第二位的活动，因为它们不增加财富，不是生产活动。为此，国家应该重视农业，应该特别鼓励所有能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活动。重视农业的主张与中国长期以来所实行的“重本抑末”政策很相似。不同之处在

^① 老子的“道”，荀子的“天行有常”。

^② 魁奈：《农业国经济统治的一般准则》，《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33页。

于，重农学派主张对商业采取放任主义，任其自由发展，不用政府专门支持。

【魁奈——欧洲的孔子】 法郎士·魁奈(F. Quesnay)是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马克思称他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始祖”。中国对于重农学派的重大影响，可以从魁奈身上看出。

魁奈极端崇拜中国文化，他在广泛研究各种有关中国的著作之后，于1767年发表《中国专制政治论》一书，全面论述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阐发了他“开明的专制政治”的思想。由第八章开始，魁奈一系列举出二十四条理由，建议欧洲各国向中国学习。书中同时还提出了重农学派的基本观点，并以中国为例，说明世界上确实存在着一直实行这些政策的国家，而中国政体的悠久，就是实行这些政策的结果。他在书中不仅一再指出中国的重农主义，而且下结论说，自然法是中国伦理道德、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础。在魁奈的其他经济学著作中，也可以看出所受中国思想的影响。魁奈特别欣赏中国皇帝春天举行耕藉田的仪式。当1768年魁奈的影响达到顶点时，路易十五的儿子在法国宫廷中举行了这一仪式，以证明政府重视农业。第二年，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也举行了这一仪式。此外，重农学派在教育理论中也受到中国影响，他们主张仿效中国实行文官制。

魁奈特别崇拜孔子，自信是孔子学说的继承人，常引《论语》中“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来自勉。又认为中国哲学胜过希腊，一部《论语》可胜希腊七贤。^①由于魁奈极力赞美中国，又极端推崇孔子，于是被尊称为“欧洲的孔子”。

【杜尔阁的经济改革】 安·罗伯特·雅克·杜尔阁(Anne

^① 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94页。

Robert Jacques Turgot)是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著名政治家，后期重农主义的杰出代表。杜尔阁发展了魁奈的重农主义体系，他把行政工作和经济学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在他管辖的行政范围之内，宣传和实践重农主义。1774年路易十六即位，杜尔阁出任法国财政大臣。在他任职期间，他认真地试图把重农学派的学说付诸实践，大力推行改革。如几次颁布限制封建特权、破除封建制度障碍的法令，取消对国内谷物贸易的限制，建立谷物贸易自由，减少输入城市的粮食税，并把这种税转派到封建特权者身上。他实行以赋税代替徭役，向贵族地主阶级征收道路税等等。然而，重农学说虽对中国这样的农业经济非常合适，但对法国却不适用，因为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开始在法国形成。所以杜尔阁在改革中遇到强大的阻力，两年后他就被迫辞职了。由于进行了这场著称史册的流产改革，马克思称杜尔阁是“法国革命的先导”。

杜尔阁的代表作是1766年发表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该书类似简明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系统阐述了重农主义学说。

中国经济思想对于西方的影响是巨大的。重农学说在实际应用中虽然失败了，但它直接影响到后来的经济理论，如亚当·斯密《原富》一书中，就有许多理论来自重农学派，书中还引用了不少中国的材料。

3. 中国哲学思想在西方

【孔子与儒教】 在西方影响最大的中国哲学思想是孔子与儒家思想。特别是在法国启蒙运动与德国哲学革命中，儒家思想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法国，主要是百科全书派，从中国孔子和儒教的政治思想与伦理道德中，分离出了唯物论和无神论成分

并加以接受，经过与其他西方思想混合融汇之后，逐渐形成了反对封建主义和宗教神学的理性观，成为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中的哲学思想基础。

在德国，古典哲学家们从孔子和儒家思想中吸收的是辩证法思想。德国接触中国哲学思想始自莱布尼茨，他不仅极端赞美中国，而且从中国哲学中吸收了朴素辩证法因素。沃尔弗是继莱布尼茨之后，用德语在德国大学中宣讲孔子思想的哲学家。1721年他在哈尔大学讲演《中国的实践哲学》，对欧洲学者了解孔子哲学起了很大作用。为了这次讲演他被学校驱逐。沃尔弗之后是舒尔兹和康德。德国哲学革命自康德开始，中经费希特和谢林，在哲学领域掀起一场反宗教神学，推崇理性的革命，最后形成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我们虽然很难说这场革命与中国哲学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每个德国哲学家都曾认真地研究中国及中国哲学却是毫无疑问的。在康德的《永远平和论》中，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都有关于中国的论述，他们都研究过孔子及儒家思想。

18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已落后于欧洲，孔子思想又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何以得到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如此推崇？这一方面是因为从意识形态的历史发展方面看，新的社会总是要从旧的社会批判继承和发展改造许多属于人类文明的精神财富的东西，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也不例外。另一方面他们所推崇的是高度理想化了的孔子思想，是根据资产阶级反封建需要而加工改造过的孔子思想。他们把孔子做为天国和圣人来称颂，是利用这一种思想来针砭时弊，寄托理想，抨击封建制度。

【莱布尼茨与易经】 莱布尼茨(Leibniz1646—1716)是受中国哲学思想影响最大的德国哲学家。他自1676年开始研究孔子及中国思想，以后又与回欧洲的传教士白晋结交，通信达六年之

久。他通过自己直接间接对中国的了解，于1697年出版《中国近事》一书，热情赞美中国，“我们从前谁也不曾想到，在这世界上，有凌驾于我们之上的民族存在，但事实上，我们发现了中华民族。”

莱布尼茨所受中国思想的影响，为学者所公认，在他的自然法、单子论等观点中都可看到这种影响。而最使莱布尼茨感兴趣的，是中国的易经及六十四卦图。莱布尼茨是微积分和二进位制数学的创始人，二进位制数学是今天巨型计算机的最合适的体系。莱布尼茨在1679年写了介绍二进位数学的论文，1701年首次写信给白晋介绍它，并附送了0至32的数表。白晋对《易经》颇有研究，立即发现该数表与易经六十四卦图配列相同，于是写信给莱布尼茨，指出数表从32以下还可引申下去，同时附寄了《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经莱布尼茨对卦的数学配列顺序详加研究，果然发现它与二进制数学完全相同。这使他的二进制数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在1703年发表他的新发现。中国的六十四卦图进一步完善了二进制数学，莱布尼茨对此曾赞叹不已，认为“这其间一定有天意”，易经是三千年前出现的，其中已预示了二进制数学的道理。莱布尼茨受易经的影响很大，不论是他的自然神学，还是单子论观点，都受到易经的影响。^①

【崇尚老子哲学的托尔斯泰】 当中国思想大量西传时，老子学说也被介绍到了西方，只是由于当时孔子及儒家思想已经征服了欧洲思想界，老子学说只得屈居后位。

老子哲学对于俄国伟大文学家托尔斯泰（Толстой, Л.Н. 1828—1910）影响巨大，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十年间。他曾

^① 参见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第69—73页。

系统研究中国思想文化，而老子一直是“古代圣贤中他最喜爱的一位哲学家”。他喜欢老子骑青牛的画像，他的“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理论，就是受到老子哲学的影响。而托尔斯泰的这一理论又影响到甘地，甘地提出的“政治上消极抵抗”的理论，对后世影响很大。托尔斯泰尽力宣传中国思想，他和他的追随者一起，写了9本介绍中国的小册子和文章，其中大部分由托尔斯泰自己的印刷厂出廉价版，每本只卖几分钱，以便在广大俄国人民中宣传中国思想。

三、中国文官制及文学对西方的影响

【西方各国争相建立文官制】 流行于许多西方国家的现代文官制，也是中国贡献给西方的最有价值的思想之一。约在公元前165年的西汉时期，中国就开始了通过考试录用官吏的制度，以后，历代不仅保留了这一制度，且在隋唐以后发展为科举考试。这在世界各国古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7世纪，中国文官制被介绍到西方，伏尔泰、魁奈等启蒙思想家立即对它产生浓厚的兴趣，西方思想家认为文官制有两个主要优点：一，是它公开举行，除极少数外，所有社会成员都可参加，这就使它成了近代以前世界上选拔官吏最开明的方法；二，它保证了由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在政府中任职。对于西方世袭的贵族制来说，这两大优点就足够了，因此启蒙思想家们极力呼吁建立文官制。

1791年法国是西方最早建立文官制的国家，然而十年后就衰落了，至19世纪40年代又重新建立起来。英国文官制最初由东印度公司建立。180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应该公司驻广州商栈人员的建议，在伦敦郊外建立学院以训练公司雇员。以后许多英国人

建议政府实行文官制。1847年，曾在英国驻华外交机构服务多年的托马斯·泰勒·梅多斯（T. T. Meadows）出版了《中国政府与人民杂谈》一书，敦促政府建立文官制。1853年，英国政府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此事，结果英国在1855年创立了文官制。美国文官制则于1883年被美国国会通过。随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文官制。

【中国文学对西方的影响】 文学是思想文化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当中国思想在西方倍受宠爱的時候，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渐渐在西方文学中显露出来。

中国最早传向西方的文学故事是来源于我国唐代文学家段成式《酉阳杂俎》一书中的“灰姑娘”的故事，以后这个故事传到法国，1544年里昂出版了第一个欧洲版本。由此，该故事又传到其他国家。目前，人们已经收集到约350个与“灰姑娘”类似的其他故事，它们几乎来自欧洲的每个国家，如英国的《玫瑰花与水晶鞋》，也来自近东、印度支那、非洲和美洲。

1755年，伏尔泰曾根据中国《赵氏孤儿》剧本改写成《中国孤儿》，借以揭示中国道德之人生观，在欧洲影响很大。《赵氏孤儿》剧本在1741年被译成英语，1748年译成意大利语，德国伟大诗人歌德则以该剧本为蓝本，创作了一部未完成的悲剧《埃尔佩诺》（1783年）。这一时期欧洲还出现了其他几部与中国有关的剧本和歌剧，如德国伟大诗人席勒所写的《杜兰朵》剧本，由德国作曲家韦伯配乐；由著名歌剧作曲家普契尼创作的歌剧《蝴蝶夫人》等。

在17、18世纪的英、法文学中，出现了不少仿中国风格或以中国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如所谓的“中国人的信札”，就是假想一个中国人在欧洲旅行，写信给国内友人介绍欧洲情况的一种文学形式。其他还有以中国风格写作的诗歌、长篇小说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16至18世纪，欧洲学术思想确是接受了中国之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由于欧洲人不满本身的环境，在耶稣会士的努力下，寻找其改善与模仿的榜样，才接受了中国的影响。因此，他们将中国理想化，把他们自己的认识借中国相类似的情况予以表达，致使他们所描绘的理想中国失去其真相。当欧洲人更多地了解中国以后，他们的中国观便又出现新的变化，并开始批评中国。①

第三节 西学东渐及其影响

一、西方天文、历法知识的东传

明末清初的一百余年间，是我国第二次与外国大规模的思想文化接触相交流时期。这时期，天主教传教士除译著有关天主教教义的书籍外，还广泛介绍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其中，以天文、历算之学对中国的影响最大，它直接导致了中国历法史上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大改革——废除大统历，颁布时宪历。②

【传教士介绍西方天文、历法】 明代历法，兼用大统、回回历。明兴之初，太史院刘基上《大统历》，盖袭郭守敬之旧法。洪武元年，改太史院为司天监，又置回回司天监，旁采回历计算之法。洪武十七年，元统在授时历基础上删定而成大统历，但仍不能准确预测天象，谬误时有发生。景泰元年正月辛卯卯正三刻月食，监官误推辰初初刻；成化十五年十一月戊戌望月食，监官推验又误，于是改历之议起，为礼部所阻。正德、嘉靖，隆庆年间不断有人倡议改历，都未能实行。万历年间，大统历误差

① 王澐：《明清之际中学之西渐》，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② 参见胡继勤：《时间和历法》，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5—37页。

越来越大，推测天象连连失误。万历三十八年十一月壬寅朔日食，钦天监推算之分秒与实际亏圆情况均不合，职方郎范守己上疏说：“自万历元年至今日食已十余次，其差或一二刻以至四刻”，说明大统历急需修订。恰在此时，传教士介绍来先进的西方天文历法，于是有不少朝臣建议吸收西方传教士修订历法。

自从明代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最先介绍西方科学的是利玛窦。他在传教期间也注意到了中国急需改革历法，就广泛向中国官吏、学者介绍西方天文历法的先进。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他进京贡方物，在其奏疏中还向万历帝推荐西方天文历法，并自荐为中国改历，未能实现。利玛窦在李之藻等中国学者的帮助下，先后译著西方历算书籍多种，如《浑盖通宪图说》（1607年刊于北京）、《圜容较义》（1614年刊于北京）、以及《乾坤体义》，三书都为《四库全书》著录。利玛窦是把西方天文历法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

在利玛窦等人的影响下，随后来华的耶稣会士大多通晓西方天文历法，如庞迪我(Jacques de Pantoga)、熊三拔、龙华民、邓玉函等人。他们来华后或与中国人讲论，或著书立说，一时在中国士大夫中造成很大影响。恰在这时改历之议又起，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十一月壬寅朔日食，监推分秒及亏圆之候不合，于是“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归化人庞迪我、熊三拔等深明历法，其所携历书，有中国载籍所未及者，当令译上，以资采择’。”^①礼部也疏举邢云露、范守己、徐光启、李之藻等大臣与传教士共译西法，以资参订，获准。此为采用西方历法的第一个步骤。

【明廷设历局修历】 万历年间任用传教士译西洋历法，因

^① 《明史》卷三二六《意大利亚传》。

庶务因循，成果不大。李之藻建议开局取西方历法之议也未能实现。当时朝臣对于任用传教士取西法有不同意见，坚决主张使用西法的主要是徐光启、李之藻二人。

1629年(崇祯二年)五月乙酉朔又日食，监官据大统、回回历推算不验，徐光启以西方历法推算准确无误，于是礼部奏请开历局修历，由徐光启督领一切，李之藻辅助，获准。经过一番准备，西方历局(简称西局)于崇祯二年九月开始工作。西局设在宣武门内旧创首善书院，除徐光启、李之藻外，吸收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进局工作。崇祯三年五月邓玉函卒，又征传教士汤若望、罗雅谷(Jacobues Rho)入局译书、演算，督修历法。同年十一月，李之藻卒，徐光启独自主持历局。经过“西臣与在局人员日算夜测”，徐光启也“一面撰述修润，一面测算缮写。……但讨论润色，原拟多用人员，今止臣一人，每卷必须七八易稿”，西局工作成绩很大。1631年(崇祯四年)正月第一次进呈所纂历书二十四卷；同年八月徐光启第二次进呈历书二十卷及星图一摺；1632年(崇祯五年)四月徐光启第三次进历书三十卷。

1633年(崇祯六年)，徐光启病重，推荐金声继理西局。金声不就，改由山东参政李天经代替。光启卒，李天经继掌历局，直至明亡。西局设立前后达14年，经中西人士共同努力，成就可观。除徐光启三次进历书七十四卷一摺外，李天经又先后进历书六十一卷，此后天经续有所进。这些历书崇祯皇帝赐名为《崇祯历书》。入清后，汤若望又增加《历法西传》一卷，《新法历引》一卷，书中加了哥白尼、第谷、刻卜耳、伽利略的学说，康熙改名为《西洋历法新书》。明季改历工作已基本完成，先后对这一工作做出贡献的传教士有：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以上这段改历工作，可视为西方天文历法传入中国时期，采用则在入清以后。

【传教士供职钦天监】 清军入北京时，传教士仍留在北京。1644年(顺治元年)六月，汤若望向顺治帝进呈浑天星球一架，地平日晷、远窥镜各一具，舆地屏图一幅。八月朔，日食，汤若望以西法测验准确无误，大统、回历则有误差。顺治帝批准使用汤若望进呈的新历书，即《崇祯历书》，并于历书外题《依西洋新法》五字，改名为《时宪历》，二年八月颁行天下。十一月，顺治帝又命汤若望掌钦天监印信，任命为监正，开传教士供职钦天监的先河。钦天监与历局合而为一，自此西方历法得以在中国实行。此后，汤若望等传教士继续翻译西方天文历书，制造天文测绘仪器，与西方学术界保持密切联系，对西方历算之学东渐做出了很大贡献。

1669年，比利时人南怀仁入钦天监任监副，1674年升为监正。1688年南怀仁死，由闵明我(Grimaldi, Philippe Marie)顶补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传教士徐日升、安多、苏霖、白晋、张诚备历政顾问，同在钦天监。1698年，巴多明入钦天监。1716年，戴进贤(Ignatius Kögler)奉诏进京，佐理历政，1724年，补授监正。以后，徐懋德、刘松岭、安国宁、高慎思、汤士选、索德超、李拱辰、福事高、高守谦等先后入钦天监供职。1822年，毕学源(Gojetanus Pires)在钦天监助理历务，后任监副，至1838年止。自明末清初至1838年，除少数时间间断外，钦天监内一直有传教士任职，而且有不少传教士承担过钦天监的领导工作。^①

【天文仪器的制造】 言天文历法，离不开观测天象，所以天文仪器的制造至关重要。西方天文仪器的传入始自利玛窦。他在华传教期间制成浑仪、天球、地球、日晷等多种精于中国的天

^① 参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二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663页。

文仪器。传教士传入中国的最重要的天文仪器是望远镜。利玛窦有“千里镜”，为欧洲旧式望远镜。1610年，伽利略在威尼斯改良完成第一架新式望远镜。1622年汤若望来华，带来了这种新式望远镜，并撰《远镜说》加以介绍。崇祯二年开设西局，徐光启请造西方天文仪器中，就有望远镜三架。崇祯四年冬十月日食时，徐光启已用望远镜观测。同年望远镜传到福建三山、桃源、清漳等地，并由山东传到朝鲜，以后又传到日本。中国自制的第一架望远镜于1634年（崇祯七年）完成，取名“窥箒”。徐光启请造的其它天文仪器有“象限大仪六，纪限大仪三，平悬浑仪三，交食仪一，列宿经纬天球一，万国经纬地球一，平面日晷三，转盘星晷三，候时钟三，”均依西法制造。崇祯十年，又造了一座星球。十二年，又造黄赤经纬全仪。入清后，汤若望献日晷等仪器备宫中之用。以后南怀仁又于1673年（康熙十二年）制成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仪、地平纬仪、纪限仪、天体仪，并绘图解说，名《新制灵台仪象志》。^①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纪理安又制象限仪，把元明以来的旧仪熔毁改铸，仅留下了明仿元制的浑仪、简仪、天体仪三件，这是保留下来的明代以前依中国方法制造的仅有的三件天文仪器。

【传教士对于中国天文学的贡献】 为了能在中国立足传教，传教士以天文历法作进身之阶，经过一代代人的不断努力，逐渐改变了中国天文历法的落后面貌。传教士在西方天文学东传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中国对于天体的认识，古有盖天、浑天之说，对于地球、天体的形状及运动形式，直至明代也未有精确的认识。利玛窦来华后，撰写《天主实义》、《乾坤体义》等书，李之藻说：“其言

^① 《清史稿》卷二七二《南怀仁传》。

天文历数，有我中国昔贤谈所未及者。”^①他在书中介绍的是由古代天文学家托勒密创立的“地球中心说”，及其“九重天”说。由于“地心说”与上帝“创世说”联在一起，该理论成为天主教会不可动摇的教条。然而，真理之光是挡不住的，继哥白尼之后，布鲁诺、伽利略、刻卜耳等天文学家先后论证哥白尼理论的正确性，并进一步提出行星运行轨道椭圆形等行星运动三大定律，近代天文学理论逐步确立。汤若望来华后，与徐光启、李之藻等合作编成的《西洋历法新书》受到学界重视，“言历者莫不举为俎豆。”^②

传教士在华期间还更新了中国的天文仪器；与中国天文学家一起编撰了一大批天文历法书籍；培养了一批中国应用西法的天文学家，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贡献。

二、数学、地理学知识东传

【传教士对西方数学东传的贡献】 来华传教士大多精通西方数学，数学是西学东渐的另一重要学科。

利玛窦数学造诣较深，是介绍西方数学的第一个传教士。在他所作的《乾坤体义》下卷中，有不少数学内容，此为西方数学入中国之始。介绍到中国的第一本数学著作是《几何原本》。利玛窦到北京后，由他口授，徐光启笔译，共同把这本书的前六卷译为中文。被梁启超誉为“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③以后在1857年，李善兰与伟烈亚力据英译本续成后九卷。除《几何原本》外，利玛窦与徐光启还共同翻译了《测量法义》、《勾

① 《清译西洋历法等书疏》，《增订徐文定公集》卷六。

② 《清史稿》二九三卷《畴人传（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标点本。

③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3页。

股义》与李之藻共译了《圆容较义》、《同文算指》等书，涉及几何学、三角学、算术学方面的内容。

继利玛窦之后，其他传教士也不断介绍西方数学。罗雅谷在崇祯四年第二次进呈的《崇祯历书》中，有《测量全义》十卷，系与徐光启所共撰，该书引进了平面三角与球面三角的计算。他还作《筹算》一卷，载《西洋新法历书》中，又作《比例规解》一卷，1630年印，是伽利略1612年著作的译本。徐光启在崇祯四年第一次进呈的历书中，有《割圆八线表》六卷、《大测》（邓玉函作）二卷，前者介绍平面三角，后者介绍弧三角，该书部分内容引自托勒密的《数学大辑》。1631年瞿式毅与艾儒略共译了《几何要法》四卷。汤若望作了《共译各国八线表》六卷，还作《筹算指》一卷，载《西洋新法历书》中。1653年传教士穆尼阁居住南京，首先把西方的对数表传授给薛凤祚，薛据此作《天步真原》一书以传世。白晋、张诚译《几何原本》，载《数理精蕴》中，该书是巴累提斯《实用几何学》的译本，与利玛窦所译《几何原本》不同。康熙年间传教士在内庭讲学，开始输入西方的代数学，当时称为“西洋借根法”或“阿尔热巴拉”（音译）。在《数理精蕴》中介绍了二次方程式的计算。1701年传教士杜德美来华，传入了西方的割圆九术。另外，在许多天文历法书籍中，也有不少西方数学知识的介绍。经过传教士的传译，西方几何学、三角学、算术、对数、代数等数学知识逐渐传至中土，奠定了近代中国数学的基础。

【西方地理知识东传】 西方地理知识的东传始自利玛窦绘制《山海輿地图》。利玛窦在肇庆传教期间，应按察司副使山阴王泮的建议，把西文世界地图重新摹绘，并附上汉文注释，以说明地球大势，把世界分为五大洲：1. 亚细亚洲；2. 欧罗巴洲；3. 利米亚洲（非洲）；4. 亚墨利加洲；5. 墨瓦腊泥加洲（南

极)。此图绘好后，由王泮在1584年于肇庆刊印，一时流行很广。《续罪言》说：“西人东来，地球图出。夫然后五大洲之土地，数十国之名号，粲然而纷呈。”^①利玛窦进京贡方物，内有《万国图志》一册，惜未流传下来。利玛窦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地球为圆形，地球有南北二极，以及赤道、经纬度、五大洲等地理知识，这些虽不能说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地理知识，但已使中国人惊叹不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看法，在中国地理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继利玛窦之后，庞迪我曾奉万历帝之命翻译欧洲地图，并依据自己的知识附以图说，惜未完成。1623年，艾儒略（Julius Aleni）根据利、庞旧稿加以增补，完成《职方外纪》六卷，《外纪》前冠《万国全图》，其后分叙五洲各国，较详尽地记载了当时各国风土地理知识，虽然不少内容不一定准确，但堪称当时一本较完备的世界地理书，在中国影响较大。^②

康熙初年，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等传教士撰写了《西方要纪》一书，分20条，专记西洋国土、风俗、人物、土产及海程远近，可补利玛窦《全图》及艾儒略《外纪》的不足。

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在实地精密测量的基础上，综合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于1654年（顺治十一年）在奥格斯堡出版《新世界图》和《中华帝国图》；翌年又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中国新地图册》内有地图17幅，并附文字说明。一时被认为是关于中国地理学方面最完全、准确的著作，被德国学者称为西方“研究中国地理学之父。”卫的学生南怀仁在1672年刊印《坤輿图说》，1674年又刊印《坤輿全图》数幅。后者又增绘了澳大利亚洲。

^① 《皇朝经世文三编》四九卷。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一地理类外纪。

【西方测绘学的传人】 16世纪时，欧洲人绘制地图已使用经纬度线方法进行测量。利玛窦精于此法，他来华后每至一地就测定该地的经纬线度数，以后又依据这些测绘数字绘制地图，这可视为西方测绘学传入中国之始，也开了中国以科学方法绘制地图的先河。

利玛窦之后来华的传教士，特别是供职钦天监的传教士，大多精于测绘学，逐渐把西方测绘学传到中国，并向康熙皇帝传授了测绘法。康熙皇帝在中俄《尼布楚条约》订立后，深感缺乏中国东北满洲地区的地理知识，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乃命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等传教士与中国学者何国栋、明安图等组成测绘队，跋山涉水，走遍各省，费时十载（1708—1718年），使用经纬度绘图法等先进技术，绘制成《康熙皇舆全图》，成为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更好、更精确。^①

三、西方物理、机械、兵器的传人

【《远西奇器图说》】 西方物理学在明末开始传入中国。1626年（天启六年）汤若望著《远镜图说》，介绍望远镜的制法及其原理，如凸镜凹镜的配合；光线折射反射原理，西方光学开始传入中国。

1627年（天启七年），邓玉函与儒生王徵共译《远西奇器图说》三卷，王徵又自撰《诸器图说》一卷。这两本书虽然重点论述各种机械的制造方法，但很重视机械原理的介绍，诸如重心、比重原理、杠杆原理、滑轮轮轴原理、斜面原理等，属于今天物

^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五卷地学、地理学和制图学，第235页。

理力学的范畴。因此术能以小力运大力，所以称之为重学；又因此种方法能施之实用，故又称为力艺学，即今日的实用物理学。此书的后一部分，有对于西方农机方面的专门介绍。我国学者阮元赞扬此书说：“其制器之巧实为甲于古今。”^①

【西方水利学的传入】 对中国农业最有影响的是西方水利学的传入。利玛窦来华后，即有志于介绍西方水利学，惜未完成。以后熊三拔与徐光启合译《泰西水法》一书，在1612年（万历四十年）刊印。

《泰西水法》共六卷，为记述西方取水蓄水方法的专著。前五卷讲述水力知识，第六卷介绍水利器械的构造、图式和原理，如抽水机、蓄水机等。《四库全书总目》中说：“西洋之学，以测量步算为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于民用。”^②徐光启著《农政全书》，改造了利用水利的先进农业灌溉器械，创制出“龙尾车”、“玉衡车”。

【西方钟表制造术的传入】 明清之际，随着欧洲殖民者和传教士来华，钟表也传入中国。钟表最先随葡萄牙人传入澳门，以作报时之用。1582年，罗明坚把一座带车轮的大自鸣钟送给总督，使钟表传入中国内地。第二年，他又把自鸣钟的24小时改为12个时辰，把阿拉伯数字改为中国字，每日分100段，每段分100分，以适应中国人的习惯。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利玛窦进京朝觐，进贡物中有大小自鸣钟二具。以后用传教士治历，设西局引用西法，钟表成为测时的必需品，钟表传入更多。钟表作为一种奢侈品，传入后深受皇室贵族的喜爱，康熙皇帝《庭训格言》有一条说：“顺治十年间，世祖皇帝得一小自鸣钟，以验时刻，不离左右。其后，又得自鸣钟稍大者，遂效彼为之，虽仿佛其规模

① 《四库全书·奇器图说提要》。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〇二农家类。

而成在内之轮环，然而上劲之法条，未得其法，故不得其准也。”由此知清初曾一度仿制钟表。钟表在清代一直未在民间流传开来，这一方面是因数量少，另一方面也因清廷禁止民间使用此物。乾隆时，圆明园中设有钟房，任用传教士造钟表。《红楼梦》中也多次提到自鸣钟，可见当时在达官贵人府中，钟表的使用已很普遍了。

【“佛郎机”传入中国】 中国人发明的火药传到西方后，迅速被应用于军事，出现了火枪火炮。西方火器传入始于明军与葡萄牙人之间的新会西草湾战事，战斗中明军获其炮，取名佛郎机。因为炮术与边防关系很大，明廷在嘉靖年间一度仿制，但未能精用。以后欧洲人来华日众，火器始渐流行，传入的火器种类很多，如红夷炮，系得自荷兰人，入清后改为红衣炮。由葡萄牙人传入的火器则称佛郎机。利玛窦来华后，在翻译《几何原本》时曾间接介绍西方火器与军事学。徐光启跟他学西学，从中也了解了火器的制法。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因辽事紧急，徐光启受命练兵，有意购西炮，募炮手以佐教演。1620年，李之藻门人张焘赴澳门，买得大铁铳四门，并带来四名炮手，此为明末第一次购募葡炮葡兵。1622年（天启二年）外患日亟，徐光启上练兵制器之疏，“力请多铸西洋火炮，以资城守，帝善其言。”^①于是明廷令传教士罗如望、阳玛诺、龙华民等制造铳炮。

崇祯晚年，国事日急，为支持残局，明廷把希望寄托在西洋火器上。1636年，在皇宫旁设立一所铸炮厂，汤若望制成战炮20门。又令再铸500门。汤若望奉命把用法传授兵仗局内监，并编纂《火药城守》等书进呈。在明末，汤若望是唯一精于西洋炮术的传教士，以后降清，又把炮术传于清人。

^① 《明史》卷二五一《徐光启传》。

【《火攻挈要》与《神威图说》】 明清之际因时局所迫，不仅出现了一个制造西方火炮的高潮，各地都仿造了一批火炮，而且刊印了一批介绍西方火器的书籍，其中介绍最详细的，是由汤若望口授、焦勳笔译的《火攻挈要》（又称《火攻揭要》、《则克录》）一书。该书成于1643年（崇祯十六年），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专论制造火器的方法，如造铳、造弹、造铳车、狼机、鸟枪、火箭、喷筒、火罐、地雷等各种方法，并连带述及制造尺寸、比例、起重、运输、引重的机器，配料、造料、化铜的方法。中卷包括制造、贮藏火药的方法，以及试放新铳、装置、运输以及使用火器的基本原理。下卷有西铳的攻法，铸铳应注意的事项，以及守城、海战、炮战等内容。另外，书前还有《火攻挈要诸器图》40幅。

入清以后，以西法造炮最著名者是南怀仁。1674年（康熙十三年），吴三桂叛乱，清廷为征讨叛军，急需火炮，特命南怀仁铸造。南怀仁自康熙十三年至十五年，共制大小炮120位；十九年又造320位；继又造神威炮240位。配布陕西、湖广、江西等省使用。南怀仁还著有《神威图说》一书，附图44幅记载铸造火炮的技术。康熙皇帝以新炮较前铸造精坚，加赐南怀仁以工部右侍郎职衔。

四、西方生物、医学、建筑、绘画、音乐、 语言、哲学思想的东传

【生物学著作的翻译与研究】 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时期，西方生物学知识也被介绍到中国。1678年（康熙十七年），葡萄牙人进贡非洲狮子，传教士利类思撰写《狮子说》一卷，并附图，同年在北京刊印，以介绍“从古中华罕见之兽”的形体、

性情、生活习惯及治病等知识。第二年，利类思又奉康熙之命著《进呈鹰说》，对鹰作了详细介绍。以上两书都译自欧洲16世纪生物学家亚特洛望地的《生物学》。1613年艾儒略撰写的《职方外纪》中也介绍了许多鲜为中国人知的动植物。

由于明清之际西方近代科学蓬勃兴起，许多来华传教士还是欧洲各学术团体的成员，他们在中国还兼有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波兰籍传教士卜弥格(Boym Michel)曾研究中国植物，以拉丁文著《中华植物》一书，1656年在维也纳出版，介绍中国名花约20种，珍奇动物若干，并附图23幅。1655年卫匡国在海牙刊印《中国新图》，介绍中国各省的草木，特别介绍了人参。1696年，李明作《中国新回忆录》，介绍中国植茶及种烟法。18世纪巴黎科学院的通讯员汤执中(Pierred Incarville)在华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先后写成《植物志》、《中国游记》、《北京植物及其他生物学遗物索引》、《中国漆考》、《中国之美术工艺及园艺》等书，曾寄回欧洲四千多方动、植物图版，采集研究了北京附近260种植物，把大量植物标本运回欧洲，还把中国植物传到欧洲。

【西医、西药的传入】 西方医药学在明末传入中国。最先传入的是西方解剖学。在利玛窦、龙华民、卫匡国、艾儒略、汤若望、高一志、傅汎际等人的著作中，都有涉及人体结构的内容，大致介绍人的骨骼、神经、血液循环、感官、内脏及其功能等。利玛窦在《西国记法：原本篇》中说：“记舍之室在脑囊，盖颅囟后枕骨下，为记舍之室。”纠正了中国人认为记忆在心的传统观念。而最精于生理学的传教士是邓玉函，著有《泰西人身说概》二卷，是西方解剖学传入中国之始。1618年，熊三拔著《药露说》一卷，使西方制药学传入中国。康熙皇帝崇尚西学，加之传教士曾三次为康熙皇帝治好病，（一次疟疾；一次心悸症；一

次上唇生瘤），西医西药受到康熙皇帝的偏爱，遂任传教士罗德先为太医院御医，并在宫中设制西药实验室。西方传入中国的药理学知识很多，有石类、水类（包括油类）、木类、草类、兽类、虫类等几大类。制药法则有蒸馏法等。医疗方面涉及亦广，如头痛、呕吐、胃下垂、脏躁、脱肛、痔疮、目黄（实际是肝炎）、耳聋等。因当时还未发现疟原虫，把疟疾视为邪气作祟，已知用奎宁（金鸡纳）治疗疟疾。也知用眼镜治疗远视、近视。外科方面有外损伤、冻疮、梅毒。另外有妇科、小儿科疾病。西方医药知识的传入，丰富了中国医药学。

【西方建筑形式传入中国】西方建筑是随着传教士定居中国而传入的，最先传入地为澳门。自葡萄牙人侵入澳门后，几十年间先后在此建立起几座教堂：圣母望德堂、圣劳楞佐堂、圣安多尼堂、圣保禄堂、圣奥斯丁堂、玫瑰堂。这些教堂均依西洋形式建立，《澳门纪略》卷下“澳蕃篇”称其：“多楼居，楼三层，依山高下，方者、圆者、三角者、六角者、八角者、肖诸花果状者；其覆俱为螺旋形，以巧丽相尚。”1583年，罗明坚、利玛窦等传教士到肇庆传教，同年在肇庆江边建立一座西洋教堂，引得人们从四方来参观，以至“道途为塞，摩肩接踵，好不热闹。”^①以后传教士进入各地传教，每至一地，必先依西洋形式建立教堂，久而久之，西方建筑形式也就传入了中国。依西洋形式建筑教堂最多的地区有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杭州、台湾等地。

集西方建筑学之大成者还是由传教士设计的圆明园中的西式建筑。在“泽兰堂”的北面，也就是长春园的最北部，建有西洋楼，实际是一组西式宫殿建筑，占地一百多亩。内有谐奇趣、蓄

① 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第248页。

水楼、花园门、养雀笼、方外观、竹亭、海晏堂、远瀛观、大水法、观水法、线法山等，成为我国古代最大、最典型的中西建筑的综合体。参加西洋楼建筑、设计、施工的传教士有郎世宁、蒋友仁、王致诚、马国贤、艾启蒙、潘廷璋等。工程自1745年动工，至1759年完工。

【西方绘画艺术的传入】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艺术大师辈出，使西方绘画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16世纪以来，随着传教士的脚步，西方以宗教题材为主的绘画源源流入中国，交流了中西方之间的绘画艺术。

利玛窦是首先介绍西方绘画的人，他携来的天主圣母像，以与中国绝然不同的绘画风格吸引了中国学者的注意。“画以铜板为帧，而涂五采于上，其貌如生。身与臂手，俨然隐起帧上，脸之凹凸处，正视与生人不殊。”^①这种运用透视与阴影来表现立体感的方法，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其他传教士中有艾儒略、汤若望、罗如望等人也是西画的传播者。

西画传入的另一重要时期在康、乾二朝，宫中悬挂西洋画，并有南怀仁、马国贤等传教士作西洋画。特别是乾隆时期，设于宫中的画院内有传教士供职，如郎世宁、王致诚、安德义、潘廷璋等。郎世宁供职内廷很久，与传教士们共同绘制了著名的乾隆战功图多幅。郎世宁曾以善绘著称一时，“凡名马、珍禽、奇花、异草，辄命图之，无不奕奕如生，设色奇丽，非秉贞等所及。”^②

【西乐传入中国】 西方音乐乐器传入中国始自葡萄牙人侵入澳门。西乐传入内地并发生重要影响则始自利玛窦进京贡方物。利玛窦的贡品中有西洋乐器雅琴一具，神宗很喜爱，因命内廷乐

^①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六《利玛窦》。

^② 《清史稿》《艺术篇：唐岱传》。

工四人，跟随庞迪我学抚琴，并问西来曲意，利玛窦于是翻译《西琴曲意》八章献上。此后，西方音乐乐器因为教堂的需要不断传入。汤若望见崇祯皇帝喜欢西乐，撰书解释西洋乐器，还为他制了一具用水力推动的乐器。明代在各省传教的教士也多携有西洋乐器。

入清以后，西乐逐渐普及开来。康熙皇帝曾随传教士研究西乐，并任用传教士作宫廷乐师，以制造乐器演奏西乐。当时宫中首席西乐师是徐日升，其他还有南光国、巴多明等人。康熙皇帝还曾命德理格教授皇子西方乐理。康熙朝编纂了《律吕正义》，其中续编卷一全论西洋乐理，由徐日升、德理格协助编撰。解释五线谱的编写及用法，称为“五线界声”。

【语言学的交流】 汉语之字为表意字体，每字一音，没有注音方法。中国采用注音符号始自耶稣会士东来，传教士为了便于学习汉语，就在中国字旁加注罗马字母拼音，见了拼音便能读出汉字。首创此法的是利玛窦。

1605年，利玛窦著《西字奇迹》一卷，以拉丁字母注汉字。此书一出，使中国人很感惊奇，多有仿效者。但是，这种注法只解决了便于读说汉语的问题，并没有深入研究中国的音韵学。1625年，耶稣会士金尼阁又撰《西儒耳目资》三卷，该书对中国文字的读音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按发音分类，分为自鸣、同鸣、不鸣三类，再以拉丁字母表示出来，从而基本解决了音韵学上用拉丁注音的问题。金尼阁并创作了《万国音韵活图》、《中原音韵活图》、《音韵经纬总局》、《音韵经纬全局》、《四品切法》、《列音韵谱》等。对后世影响很大。

其他传教士对汉语汉字也作了不少研究，如，鲁德昭在天启年间刊印《字考》，柏应理作有《文字考》，恩理格作有《文字考》。卫匡国写《中国文法》一书，为欧洲学者掌握汉语提供很

大方便。

【西方哲学思想的传入】 西方哲学之传入中国，始于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冯承钧译赖学之《入华耶稣会士列传·高一志传》称高一志著有《斐录汇答》二卷，盖“斐录”者，乃西语哲学之音译。高一志又撰《空际格致》一书，西法以火、气、水、土为宇宙四大元素，反对中国五行兼用金木之说，高一志循希腊哲学思想，以畅其说。高一志（Alphonse Valignoni），原名王丰肃，意大利耶稣会士，万历年间在南京传教，后因罪押解广州，改名高一志，潜赴山西绛州、蒲州等地传教。生平著述甚多，尤精于哲学，当其东来之先，曾在米兰教授哲学三年，来华后乃将西方哲学思想介绍于中国。

继高一志之后而介绍西方哲学者为傅汎际（Franciscus Furtado），傅氏与李之藻共译《名理探》一书，该书原为葡萄牙高因勃耳大学教本，以诠释亚里斯多德之论理学。论理学重在穷理，而穷理有两大方法，即归纳法与演绎法，为该书反复详加论述，希腊之求知方法为研究科学应有之步骤，而当时中国学人崇尚理学，重自觉、重顿悟，颇具宗教风味。李之藻、李天经之辈以提倡西方科学自命，故有利用希腊哲学以矫时弊之意。《名理探》全书当有三十卷，崇祯年间已刻者十卷。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南怀仁译《穷理学》六十卷进呈，即《名理探》之续书。南氏在奏摺中介绍说：“《穷理学》为百学之宗，订非之磨勘，试真之砧石，万艺之司衡，灵界之日光，明悟之眼目，义理之启钥，为诸学之首需者也。”

明清之际传教士翻译介绍之西方哲学著作，还有傅汎际、李之藻同译的《亚里斯多德论天》四卷；毕方济口授、徐光启笔录《灵言蠡勺》；利玛窦诠释著《记法》；艾儒略译、朱时亨校刊《性学摘述》以及依据中世纪神学大师托马斯·阿奎那斯《神学

大全》节译之《超性学要》等，对于我国儒家唯心主义哲学具有重大影响。另外有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刻利玛窦述、汪汝淳校之《二十五言》及1645年（顺治二年）刻艾儒略撰《五十言余》都是翻译的西方格言集。

综观这一时期的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可以看出一种带根本性的不同，即当时的西学东渐是由欧洲人主动传入中国，故其所输入的西学，虽大多限于科学知识，但由欧洲人自己输入，对其知识曲解和误解的可能性不大。而中学之西渐，由于传播者并非中国人，大多是欧洲天主教士，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并不深入，加以因其他因素的夹杂，致使中学西渐有的变形，有的被曲解，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在其文化西传中未能自觉地争取主动，将本身的优点充分显示出来。由此也使我们隐约看出，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势必将居劣势之地位。

第十三章 明清时期中外经济交流

第一节 中外经济交流状况

明清时期，中外经济交流更加发展。从陆路到海路，中国不但与传统的亚非国家和地区有经济联系，而且与欧洲，美洲大陆也有直接的经济往来。从此开始了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相互作用与影响的历史进程。在西方，中国商品震动了“价格革命”冲击下的欧洲；在东方，中华民族的文明成果促进了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繁荣。而在中外经济交流空前发展的景况中，中华民族正遭到海外世界的巨大挑战。

一、中外交通路线的变化与发展

【中国对外贸易港口的变化】 明清时期，我国东海沿岸的一些著名海外贸易港口日益衰落。明清两代，虽然先后在太仓、宁波、云台山等地设立市舶司或海关机构负责管理海外贸易事务，但由于“海禁”政策与严格限期的“朝贡贸易”制度的实施，港口贸易量极小，不久又关闭。而杭州，温州以及位于黄海的登州，密州等宋元时期的海交港口，明清时期已完全封闭。浙江双屿港，这个兴起于16世纪初的中外商人走私港口，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被明朝军队填塞。位于东海与南海之间的福建诸港，也先后中衰。明初，泉州港被定为主持琉球“朝贡贸易”事务的专港。1472年（成化八年），泉州港所负事务移至福州，泉州港被关闭。后福州港也于1580年（万历八年）关闭。位于福建漳州

的月港（今龙海县海澄）在16世纪异军突起，成为明后期我国商民出海贸易的专门港口，但到17世纪初，由于封建官府摧残与荷兰殖民者破坏，也日益衰落。1633年（崇祯六年），月港即被关闭。至清代，月港外围的厦门港开始兴起。

这个时期，南海港口的广州在明清两代的外贸政策作用下，获得了特殊发展的机会。明代，广州港成为除了日本、琉球以外的其他海外国家来华朝贡的专门港口。至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后，又成为我国海外贸易的唯一港口。外国商人除来此与中国商人直接进行贸易外，甚至还在广州设立商行。位于广州外围的澳门，由于葡萄牙人占据，也发展成为一个东方海上贸易中心。

明清时期，北京是外国“朝贡”商人来华贸易的主要城市之一。另外，中国陆地上的一些边境城市，如凤凰城、买卖城（恰克图附近）、凉州、喀什噶尔、腾越等也是明清政府与周边邻国的通商口岸。

【太平洋航线的发展】 我国与太平洋诸国海上交通线在明清时期有新的变化与发展。在中日交通方面，明中叶，日本堺市商人为了避免大内氏的袭击，便避开由濑户内海经博多的传统日中交通路线，开辟了从堺市出发，经四国岛南部至坊津，横渡东海至宁波的航线。至明后期，我国商人又将福建至琉球航线延伸至日本。这条航线一般由月港起航，横渡台湾海峡，经台湾岛东北海域的钓鱼岛、赤尾屿而抵琉球群岛，然后由那坝赴日本长崎等地。与此同时，我国出海商人还开辟了一条与菲律宾直接交通的新航线。这条航线由福建月港横渡台湾海峡，从台湾最南端的沙马头澳（即今猫鼻角），穿过巴士海峡、巴林塘海峡和巴布延海峡，到达吕宋岛北部的大港（即今阿帕里港），由吕宋岛西海岸驶至密雁港（今维甘）、吕宋港（今马尼拉），或再由此前往民都洛岛、巴拉望岛、棉兰老岛、苏禄群岛等地。这条新航线取

代了隋唐以来从泉州经占城、渤泥至菲律宾的南海航路，缩短了中国至菲律宾的航程。

16世纪，还形成了一条与中菲交通路线相连接的太平洋航线。初，西班牙人在征服菲岛过程中，开辟了一条由美洲至菲岛的中太平洋航线。即沿墨西哥西岸南行，到北纬十度和十一度之间的海域，借东风径直西行，经马里亚纳群岛（关岛）续航至菲岛。1565年，西班牙人又开辟了一条由菲岛返回墨西哥的航线。这条航线从菲岛进入太平洋，乘西南季候风北行，到日本列岛附近的北纬三十八度至四十二度之间的海域，利用由日本列岛向东流向北美海岸的“黑潮”，横渡太平洋，再顺北美西海岸乘西北风和北风南行，到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这是一条北太平洋的航线。这样，墨菲之间往来路线的开通以及与中菲航线的连接，开始了中国与拉丁美洲的经济联系。拉美人民高兴地称由马尼拉驶往阿尔普尔科的大帆船为“中国之船”（*nuos de China*）。

【印度洋航线的扩伸】 明代，我国人民以交趾、占城、柬埔寨、暹罗以西至今马来半岛、苏门答刺、爪哇、小巽他群岛以至于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广大海域和地区为西洋。明代永乐、宣德时期的郑和下西洋，使这条唐宋以来的南海印度洋航道更加繁荣和丰富。明人编辑的《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蕃图》（即《郑和航海图》），是现存我国关于这条航线最早的海图。它分别绘明了这条航线上所经过的亚非国家的方位、航道、远近、航向乃至礁石和浅滩，成为我国关于南海印度洋海上交通空前详尽的地理图籍。在它所记载的许多具体航线中，从锡兰经马累岛到达索马里的航线^①，还是我国史籍中关于横渡印度洋到

^① 《郑和航海图》内云：自锡兰“别罗里用庚酉针四十五更收官屿，自官屿溜用庚酉针一百五十更收木骨都。”按：别罗里即今锡兰 BelliGamme（贝里甘麦），官屿即今马尔代夫之 Male（马累），木骨都，又作木骨都束，为今索马里的 Magadishu（摩加迪沙）。

达东非的最早记载。它对加强亚非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积极影响。到15世纪末，葡萄牙国王若奥二世又积极组织力量，寻求由西非通往中国的道路。1498年，葡萄牙人终于成功地沿着非洲西部沿海，绕过好望角，按郑和的东非航线，渡过印度洋而到达印度的卡利库特（即《明史》中的“古里”），再前往中国东南沿海，从此开辟了由澳门——印度果阿——里斯本的海上航线。中国与欧洲的交通，直接通过南海——印度洋——大西洋联系起来。

【陆上交通线的变化】 元朝被推翻后，由中国经中亚往欧洲的陆上交通线也被阻断。1369年，中亚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被其臣帖木儿（1336—1405）所推翻。帖木儿成为撒马尔罕的统治者后，立即四处征战，阻塞了传统的经中亚至欧洲的中国陆上对外交通线。沙·鲁克继其父位后，与中国有了往来，但陆上对外交通仍局限于中亚地区。及至清代，这条传统丝绸之路也在浩罕国的控制之下。西部对外交通仍局限于中亚和西亚地区，主要路线有南、北、中三条：南线由喀什噶尔、叶尔羌越帕米尔，至巴达克山部再越兴都库什山到达喀布尔；北线则由伊犁沿伊犁河前往中亚；中线则由喀什噶尔经安集延往浩罕、塔什干、撒马尔罕等地^①。另外在西藏也形成了三条与尼泊尔交往路线。这三条路线分别由东藏、中藏、西北藏至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清代，在我国北方还兴起一条陆上对欧交通路线，当时人们称它为口外之路。所谓口，是以张家口为东口，归化城（今呼和浩特）为西口。由此穿越戈壁大沙漠到库伦（今乌兰巴托），再至恰克图，通过伊尔库次克穿越西伯利亚通往欧洲腹地，人们又称它为茶叶之路。它是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后在清代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

^① 据《清史稿》卷五二九。

这条商路一直由沙俄所控制。

二、中外经济交流的曲折发展

【“朝贡贸易”的衰落】 明前期以及清朝初年，都把对外贸易严格限制于“朝贡贸易”的范围内。这种贸易关系，是周边以及海外国家在政治上承认中国为天朝上国，接受中国外交礼仪条件下被明清两代朝廷所允许的相互贸易，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但外国商人一旦被允许来华，就可以获取特别高的贸易利润。明清两代王朝为了表现“天朝”博大怀远的胸怀，对这种贸易的进出口货物一律免去了关税，同时还由政府出面对进口货物实行高价收买。明初，与中国进行“朝贡贸易”的国家达六十余国，其中主要有朝鲜、日本、大琉球、小琉球、安南、占城、真腊、暹罗、苏禄、爪哇、满刺加、渤泥、古里等国，而最远处的“朝贡”国则有刺撒（今哈萨）、祖法尔（今佐法尔）、阿丹（今亚丁）、天方（今麦加）和木骨都束（今摩加迪沙）等阿拉伯以及东非沿岸国家。但明中期以后，随着国力的衰退与“朝贡贸易”给明王朝带来的财政负担增加，以及中国商民出海贸易的冲击，明王朝不得不放开对海外“朝贡”贸易的限制。而西方殖民主义者东来后，又四处侵占亚非国家领土，从而直接瓦解了明朝与亚非国家的“朝贡贸易”关系。至清初，与中国保持“朝贡贸易”的国家大量减少，只局限于朝鲜、安南、暹罗、琉球等几个邻近的国家之间。至1685年清朝在广州等地开放外国来华贸易后，“朝贡贸易”完全衰落。

【西方对华贸易的扩大】 欧洲等西方国家的海上对华贸易，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贸易量还极为有限。因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初次出现在中国沿海一带时，是群攻

致为利而不择手段的人。”^①明清两代的中国政府都不得不予以严格限制和防范。1685年，清朝开放广州等港作为中外通商口岸后，西方诸国的对华贸易才得以发展。据统计，从1685年到1757年的72年中，到中国贸易的欧美各国商船有312艘。^②1575年，清政府宣布关闭浙江等三海关对西方贸易而仅保留广东一关后，西方各国来中国的商船却仍然增加。从1758年到1838年到粤海关贸易的外国商船共达5107艘，平均每年有63.8艘，其中大多为西方商船。^③随着西方来华贸易船只的不断增多，西方对华贸易额也迅速上升。1764年，欧美诸国对华海上贸易总值（进口值与出口值之和）为白银5545847两，到1805年时，已达到23517102两。四十年间增长了3.2倍。^④至鸦片战争前，西方国家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丹麦、瑞典、普鲁士、意大利、美国、秘鲁、墨西哥、智利等国家来中国贸易，在陆上，还有俄国与中国进行贸易。18世纪，英国对华贸易发展极为迅速，并执西方对华贸易牛耳。1764年，英国对华贸易总值为2905697两，占欧美诸国海上对华贸易总值的52.4%。至1805年，则达到18874732两。约占82.3%。^⑤嘉庆时，粤海关每年统计关税120多万两，其中英国船只缴纳的就占90余万两，“实属各国税银之七八”。^⑥美国也后来居上。1784年刚刚开始的中美贸易，仅占西方对华贸易总值的0.6%。但其很快就超过法、荷、葡等国，从1791年到1841年的50年中，美国对华贸易额增长达六倍之多，^⑦仅次于英国，居西方对华贸易第二位。在鸦片战争前的中西贸易活

① (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41页。

②③ 据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

④⑤ 据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4—5页。

⑥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卷六。

⑦ 杜勒斯：《旧时中国贸易》，纽约1930年版，第114页。

动中，西方诸国都表现了偏重中国物品的倾向，使中国常常处于贸易的出超地位，因此西方国家便千方百计地寻求改变他们对华贸易的入超位置。

【中国商民出海贸易的艰辛发展】 中国商民的出海贸易，入明伊始就遭到严格禁止的命运，但东南沿海地区商民冒禁出海仍然不断。明中期以后，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生产力提高和商品经济发展，中国商民出海走私贸易迅速扩大，并且酿成嘉靖“倭患”事件。1567年，刚刚登基的隆庆帝，不得不允许福建地方政府在海澄月港开放海禁，允许中国商民出海。但清朝统治建立后，为了对付据守台湾的郑成功反清势力，自1655年始先后五次颁布禁海令，并三次下达“迁海”令，残酷禁止中国商民出海。清统一台湾后，1684年，清政府便正式宣布解除海禁，允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但不久康熙帝担心中国商民结集南洋形成反清隐患，便于1717年又宣布禁止中国商船前往南洋吕宋、噶喇巴等处。1727年，在沿海地方官员的奏请下，清廷才撤销南洋禁令。从此，中国商民的出海贸易才得以正常进行。

明清时期，中国商船比较集中地活动于东起日本、琉球，中经菲律宾群岛，南至南洋群岛的广大太平洋地区。早在明初，马六甲海峡水域就有不少中国商船活动。至明中期，很多中国海商冒禁来往于日本——中国东南沿海——中南半岛——南洋各岛之间。明朝开禁后，中国商民船只大规模进入日本以及东南亚市场。在1623年前后，赴日本的中国商船每年大约有30至40艘，1629年左右上升为60至70艘，到1631年则达70至80艘，1641年甚至高达97艘。^① 明清之际，前往日本长崎的中国商船仍是不断。

^① 博克塞：《澳门大帆船（1556—1640）》，里斯本1959年版，第4，14，108，117，126页。

岩生成一：《关于近世日中贸易量的考察》，《史学杂志》1953年62卷11期。

即使在清朝实行海禁的1655至1684年的30年间，开到长崎的中国商船仍达1099艘，平均每年有36.6艘。^① 清廷开禁后，赴日的中国商船又迅速上升到每年一百余艘，直至日本政府限制后才有所下降。^② 在马尼拉，进港的外国商船也大多是中国商船。仅1599至1612年的14年间，就共有401艘中国商船驶抵马尼拉，每年平均达28.6艘。^③ 据英国东印度公司公共事务特别委员会的报告，19世纪初，中国商民出海商船每年不下222艘，而且更多的小帆船并未计算在内，总吨位已超过8万吨以上。^④ 另外，还有一些中国海商，越过太平洋前往美洲和欧洲经商。^⑤ 中国海商所进行的帆船贸易，不但促进了西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也支持了澳门、马尼拉、巴达维亚、阿卡普尔科、孟买、伦敦等港口为中心的国际贸易网络的运行，为世界市场的萌芽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三、中外贸易管理体制的变化

【明代市舶司制度的变化】 自唐宋元以来，在沿海主要通商口岸设立的用来管理海外贸易事务的市舶司，至明初，它的职能发生了重要变化。明太祖设置市舶司的目的，完全在于“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用以消其衅隙也。”^⑥ 这种“通夷

① 据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27、628、639、640页数字统计。

② 按日本德川幕府的限制开始于贞享二年（1685），规定与清贸易银额为6000贯。1688年后，又对船只进行限制，多时为80艘，少时只允许10艘。

③ 张钊：《论中国与拉丁美洲早期贸易的盛衰（1571—1815）》，《太平洋》1987年第1期。

④ 据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第一册60—61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⑤ 拉克：《亚洲对欧洲发展的影响》第2卷，芝加哥，1970年版，第742页。

⑥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

情”，并不在于发展海外贸易，而在于通过严格限定的“朝贡贸易”达到政治上的怀柔远人，借以抗拒外来势力的冲击；而所谓“抑奸商”，则是通过市舶司机构来严格禁止中国商民的出海贸易。因此，明代的市舶司，不仅拒绝外国民间商人的来华贸易，而且严禁中国商民的出海贸易，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极端的片面性，失去了宋元时期的经济意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王朝通过市舶司机构对“朝贡贸易”的免税政策和高价收买措施，反而成为明王朝的财政负担。正德年间（1506—1521），迫于财政压力，明政府不得不改变措施，开始对外国进口货物实行抽分，扩大外国对华贸易的范围，并且减少政府专买，允许外国商人在市舶司港口直接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因而相应地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但市舶司的职能也随之发生分解。^①明政府为了加强对中外商人贸易活动的管理，专门组织了一些官方牙行；而市舶司机构仅仅保持了执行征收关税的职责，从而奠定了清代海关与行商的职能基础。

【明后期漳州督饷馆】 1567年（隆庆元年），明政府局部开放“海禁”，准许中国商民从福建漳州出海贸易，并于海澄月港设立“洋市”。为了管理中国商民出海贸易，1572年，明福建地方政府决定由漳州海防馆负责。万历年间改称督饷馆。督饷馆主要办理中国商民出海手续，发给出海商船的商引（即出海贸易凭证），并对出海商船征收引税。东西洋船每引税银3两，后增至6两，船引开始限定为88引，后扩大到110引。对于回港的商船，督饷馆还要分别征收水饷、陆饷。水饷出于船商，根据船的大小征收。陆饷出于经销进口货物的铺商，根据具体货物征收。除此之外，对于从吕宋回国的商船，由于西班牙人以银换取

^① 陈尚胜：《论明代市舶司制度的演变》，《文史哲》1986年第2期。

中国货物，中国商船回程时多带银钱，很少运载货物，督饷馆专门征收加增饷。开始每船追征150两，后改为120两。漳州督饷馆实行征收银两的办法，是我国海外贸易史上关税管理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不但有利于政府财政，也有利于银币流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代海关】 清朝于开放“海禁”的第二年，即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在江南云台山、浙江宁波、福建漳州、广东广州设立四个海关，^①负责管理海外贸易事务。这是中国历史上正式建立海关的开始，它不但管理原来明代由市舶司主持的外国对华贸易事务，也包括在明后期由漳州督饷馆负责的对中国商民出海贸易的管理。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宣布将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的西方国家对华贸易事务集中于粤海关，中国商民仍可由原来四个海关出海贸易。海关设监督一人，江、浙、闽三海关由该地区巡抚或将军兼任，粤海关设专职监督，由满族官吏出任。海关主要职责是征收进出口关税。海关税分“货税”和“船钞”两部分。货税即商税，分进口和出口两类，根据货物价格和性质征收，税率平均为4%左右，远低于当时欧洲税率。船钞按船的大小等级征收，税率也很低，约千分之二左右^②。除正税外，海关还有许多陋规和勒索。这种管理上的混乱，曾引起西方商人的不满与攻击。海关还管理洋行商人，负责执行对外贸易的禁令，即限制或禁止有关军需物资（如武器、铁器）和粮食的出口；负责防范和限制外国商人在华活动。但在狡猾的西方商人和腐朽的清朝官吏的共同破坏下，很多禁令成为一纸空文，得不到认真执行。

【清代行商制度】 清政府开放海外贸易后，即规定来华的

^① 据李士桢《抚粤政略》卷一记：江海关驻松江，福建关驻泉州。

^② 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

外国商人不得与中国商人发生任何直接的买卖关系，而必须通过行商开展商务活动。行商也称“洋商”，在广州俗称“十三行”。^①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洋行商人为了避免互相竞争，订立行规，组织成垄断性的“公行”。后来为便于管理，又在行商中指定一家为“总商”。并且规定，充当行商必须由政府批准，还必须由其他行商保举，也不允许行商自由辞退。行商的主要职能是：代收代纳外商进出口关税，评定价格，承销一切外商进口货物，代购所有外商回国物资。并具体监督外商在华的一切活动，代替政府向外国商人传达政令，办理一切交涉事宜。另外还经理中国商船的出海贸易，由其办理保结手续。因此，行商实际上具有经营海外贸易与经办外交事务的双重职能。他们虽然完全把持了对外贸易事务，但在中国政府官吏勒索与外商高利贷贷款和破坏的情况下，时有倒闭。鸦片战争后，行商的特权被取消。

【京师会同馆】 明清时期，都曾在京师设立会同馆，作为接待外国以及国内少数民族朝贡使节的专门机构，始为兵部统辖，后改由礼部管理。另外还设立四夷馆（清代改称四译馆），作为外事翻译的专门机构，隶翰林院管辖。会同馆除负责外国朝贡使节的衣食住行外，还是外国朝贡商人在京师进行贸易的场所。外国朝贡商人一般都可在会同馆开市三天或五天，中国政府还要派官员负责监督市场，禁止中国商人賒购货物，保护外国朝贡商人的正常贸易，也禁止私下贸易和买卖违禁货物，主要为军需物资）。因此，会同馆为外国朝贡商人在京师贸易提供了特别

^① 据徐新吾、张简考证，十三行的名称是由十三家夷馆（外商居停之所）而来的，但到十三家夷馆进行商务的洋行却不一定是十三家，时多时少。故十三行只是对所有经过政府特许经营海外贸易的行商的概称。见《“十三行”名称由来考》，《学术月刊》1981年第8期。

的方便。另外，清代又曾于京师设立俄罗斯馆，专门主持俄国的在京贸易，隶理藩院管辖。规定三年一期，每期以80日为限。但到1755年（乾隆二十年）后，中俄贸易集中于边境，京师的贸易活动停止。明清两代政府对于外国商人在京师的贸易活动也严格限制，除“朝贡贸易”外，一般外贸活动都集中于边境或南方沿海城市。从而限制了明清时期京师在中外经济交流中的作用。

第二节 明清时期中外经济交流的影响

一、中国物品对外国的影响

【丝绸】 明清时期，我国丝织技术有了显著提高，创造了一些新的丝绸品种，如漳绒、天鹅绒、宁绸、茧绸、府绸等，它为对外贸易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明代，前期的丝绸出口主要通过朝贡外交活动赏赐输出。郑和下西洋，就曾将中国丝绸作为礼品赠与东南亚和印度洋各国。到后期，中国海商积极把中国丝绸运往东南亚各地，使得西班牙人如愿以偿地把中国丝绸从马尼拉市场运往美洲、欧洲等地。另外，清代行商也积极经营丝绸出口。《广州竹枝词》中有一首诗说：“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①。不过，清代中国丝绸出口由输出丝绸织品改为出口生丝为主。仅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对英国东印度公司出口的生丝，出口价值每年均在20万两到50万两白银之间。^②大量中国生丝输出，促进了日本、欧洲、美洲的一些地方丝织业的发展。在墨西哥一地，17世纪30年

^① 屈大钧：《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

^② 据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14页。

代就已有 14000 人专门利用中国生丝进行加工制造。^① 中国丝绸外销，也极大地丰富和美化了海外人民生活。在拉丁美洲的广大地方，中国丝绸织品不但是一些市民服装与斗篷的衣料，而且也成了僧侣的法衣和教堂的装饰品。

【陶瓷】 本世纪以来，在世界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东起邻国朝鲜、日本，南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以及西部的印度、阿拉伯地区，非洲东部海岸，西西里岛以至西班牙，都出土了大量中国陶瓷。上自唐三彩，下迄清代彩瓷。特别是明代陶瓷，各个时期各种类型瓷器在海外都有发现，范围广泛，数量惊人。有的国外学者甚至将这条连接东亚、西亚与地中海世界的东西贸易海上运输线称作“陶瓷之路”。作为陶瓷故乡的中国，景德镇已是这个时期的制瓷业中心，其产品远销世界各地。另外，福建德化窑和广东石湾窑也以陶瓷产品外销而名扬海外。据估计，明清之际仅运入巴达维亚（雅加达）的中国瓷器每年就达 15 万件。^② 而同期西方人采购贩运中国陶瓷的据点还有澳门和马尼拉等港。

我国陶瓷对于国外社会生活有着广泛的作用。首先它作为坚致美观和耐酸耐碱而又便于洗涤等优良品质的新颖饮食器具，普遍地更新了许多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日常生活用具，极大地改善了他们的传统饮食习惯。在东南亚的一些土著民族中，中国陶瓷代替了常用食器——植物叶；在欧洲，也取代了传统的金属和木质食具。其次，东南亚地区的一些部族还把中国陶瓷视作财产的象征，成为人们衡量贫富、社会地位以及声望的重要标准，并作为殉葬品以至葬具。甚至它还进入一些地区的宗教生活。它不仅是宗

^① 布莱尔与罗伯逊：《菲律宾群岛 1493—1898》第 27 卷，第 119 页。

^② 陈万里：《宋末——清初中国对外贸易史中的瓷器》，《文物》1963 年第 1 期。

教寺庙建筑上的美丽装饰品,而且也是一些宗教徒的生活必需品。明代大量生产的青花和五彩军持^①,就专供伊斯兰教徒净手、朝觐之用。在欧洲,它还直接促进了洛可可装饰艺术的发展,给海外人民的精神生活带来了美好的艺术享受^②。大量中国陶瓷外销,也推动了一些海外地区陶瓷制造业的建立和发展。朝鲜李朝时期,曾从明朝大量进口青料烧制青花瓷器;而在日本、东南亚以及西亚的波斯等地,也都有中国瓷匠在此传授制瓷技术;欧洲的一些国家也先后建窑烧瓷,甚至还模仿中国陶瓷的色彩花纹。

【棉布】 16世纪,中国棉布已外销东南亚等地区。至17世纪,由澳门开出的葡萄牙商船经常运载中国棉布经销日本长崎以及南洋地区。在18世纪的中俄贸易中,被称为 Kitaika(中国之意)的棉布一直居对俄出口首位。与此同时,中国棉布还远销英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欧洲国家和美洲大陆。从1786到1833年的不足50年间,仅由海上出口的中国棉布累计达4400万匹,平均每年出口90余万匹。其中1798年达210余万匹,1819年更创330余万匹的记录^③。

明清时期,中国手工生产的棉布在海外世界风行一时。它不但是东南亚地区人民的日常衣料;而且在北美大陆,由于中国棉布经久耐穿,一直为当地印第安人和黑人所喜爱;在欧洲,它不仅是俄国居民不可缺少的必需品,还是19世纪初英国绅士时髦服装和法国市民流行长裤的热门用料。中国棉布能够畅销海外,关键还在于质优价廉。17世纪初,中国棉布在生产地每匹售价不过白银0.28两,而在日本则高达0.5—0.54两。^④而中国布匹的质量,

① 军持,梵语,意为净瓶或澡罐。

② 洛可可艺术见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第21—27页《罗柯柯艺术》。

③④ 参据汪敬虞:《从棉纺织品的贸易看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

直到19世纪初，无论色泽还是质地都仍然优于同期英国制品，使英国棉布一直难以在中国市场立足。

【茶叶】 茶是我国人民贡献给人类的一种“人人服之，永永不厌”的良好饮料。我国茶叶以及植茶方法虽然至迟在唐代已经传到国外，但作为一种普及全球的中国饮料大量外销，则开始于明清之际。虽然明前期有一些中国海商将茶叶销售于东南亚地区，但数量极少。16世纪后，葡萄牙人，荷兰人开始将中国茶叶输往欧洲。及至清代，英国、西班牙、俄国、法国、美国等国也纷纷参加中国茶叶贸易。茶叶外销以海路为主，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茶叶贸易中占重要地位。18世纪70年代，由英国东印度公司运输的茶叶占广州全部外销茶叶的1/3，到80年代增至54%，90年代增加到74%，19世纪头十年则达到80%。^① 茶叶贸易给该公司带来一直高于百分之百的利润，并使英国财政部获得了占全国税收十分之一的茶叶税，还使英格兰成为世界茶叶贸易中心，由此刺激了英国航海业的发展。^②

茶叶作为一种温和而无害的兴奋剂，逐渐成为世界上流行的嗜好饮料，成为社会普通消费品，给人民的生活、劳动提供了很大帮助。在英国工业革命那段紧张日子里，“如果没有茶叶，工厂工人的粗劣饮食就不可能使他们顶着活干下去。”^③ 随着中国茶叶大量外销，18世纪初，荷兰人多次将中国茶籽试种于爪哇，但未成功。18世纪后期，英国人则在印度试种茶树。此后，植茶业便在世界上一一些国家传播开来。

【中国物品与世界市场】 除上述几种物品外，明清时期中国出口的主要物品还有食糖、大黄等药材、漆器、铁铜器、笔墨

^{①②} 据〔印〕谭中：《英国——中国——印度三角贸易》，《中外关系史译丛》第2辑。

^③ 威廉森：《英国扩张简史》，伦敦1958年版，第38页。

纸张、农具以及各类折扇、折伞等手工艺品。中国物品质优价廉，受到海外国家普遍欢迎。如在菲律宾，中国铁钉的售价仅为西班牙的1/4，以致西班牙的秘鲁总督曾专门派船到菲岛收购中国铜、铁产品。^①中国食糖更是海外市场的抢手货。荷兰东印度公司曾将中国砂糖大量转售于波斯、欧洲各国，该公司董事会甚至指示，只要中国砂糖能如数供应，就不要采办孟加拉糖、万丹糖和暹罗糖。明清之际，中国糖运往日本市场平均每年在169万斤左右。十分有趣的是，古时候中国人从印度人那里学会了制造红糖，到17世纪中国却成功地制造出白糖，并在清代大量出口印度，印度方言中还称白糖为“中国糖”。^②

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许多重大的地理发现，沟通了亚、非、欧、美各洲之间的海上经济联系，使各地市场逐步扩大为世界市场。而中国物品大量出现于东南亚等海外市场，则为世界市场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充实的物质基础。以沟通拉丁美洲的菲律宾马尼拉市场为例，在马尼拉海关征收的中国货物进口税与马尼拉海关总收入的两个变量之间，其相关程度为零点九四。^③这种极高的相关程度，说明中国商品对马尼拉市场的繁荣具有关键性作用。正象1595—1596年在任的菲岛都督莫尔加（Morga）所承认：“如果没有中菲之间的贸易，菲岛则无法维持”。^④而连接欧洲的巴达维亚市场，在17、18世纪的两百年间，“实际上主要依靠每年随东北季风开来的中国船队，由他们所带来的并为印尼市

① 布莱尔与罗伯逊：《菲律宾群岛》，第18卷，第176页。

② 据〔印〕译中，前引文。

③ 据张韬：《论中国与拉丁美洲早期贸易的盛衰》，《太平洋》1987年第1期。按：据统计学的一般解释，0—0.3为相关程度低，0.3—0.5为相关程度普通，0.5—0.7为相关程度显著，0.7—0.9为相关程度高，0.9—1则为相关程度极高。

④ 引自沙丁、杨典求：《中国和拉丁美洲的早期贸易关系》，《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

场急需的各类商品。”^①而在欧洲市场，由于16世纪“价格革命”的冲击，物价昂贵，货物空匮。正是中国物品的大量流入，缓和了贵金属相对过剩与生活品相对短缺的不平衡状态。

早期西方国家利用中国物品在世界市场不同地区的差价而进行的长途贩运贸易，从中获取高额利润，成为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而美国也出于对中国财富的探求，成为促使其领土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的原因之一。^②

二、海外作物的输入及其影响

【粮食作物：玉米与番薯^③】 玉米和番薯原产于中、南美洲的墨西哥、秘鲁和哥伦比亚等地。欧洲人发现新大陆后，这两种粮食作物先后被传入世界各地。玉米传入我国的时间大约在明嘉靖年间（1522—1566）。其传入途径有三：通过海路传入我国东南沿海各省；经波斯、中亚传入我国西北；由印度、缅甸传入我国云南地区。番薯传入我国的时间稍晚，大约在明代万历时期（1573—1620）。它的传入途径：一由安南传入广东，二由吕宋传入福建。番薯的传播速度很快，明后期数十年间，南方的闽、广、浙等地广为种植。到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5），除边疆地区外，各省都普遍种植，成为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之一。与番薯相比较，玉米在中国传播却曲折而缓慢得多。明朝末年，玉米的种植区已经有云南、广西、广东、福建、甘肃、陕西、河

① 布鲁斯：《荷属东印度公司时代的中国与巴达维亚贸易》1979年版，第195页。

② 卡尔宾特：《早期中国贸易》，纽约1976年版，第195页。

③ 番薯，亦称甘薯、山芋、红薯、红苕、白薯、地瓜，块根含有大量淀粉，可作粮食食用。

南、京师、南京、浙江等地区。到清初，虽然全国各地都有种植，大致北方不如南方，南方又集中于山区。由于大批流民进山垦种玉米，嘉庆时期（1796—1820），清政府开始采取封山禁种的措施。直到道光时期（1821—1850），玉米才得到比较广泛传播，遍及于我国大多数州县，也成为我国的一种主要粮食作物。

玉米和番薯的传播，对中国粮食生产发生了较大影响。这两种作物皆能耐旱，不择沃土，贫瘠的沙地和山场生地都能适应，并且高产。既可充裕民食，又扩大了耕地面积，使农民可以腾出更多土地，省出更多肥料与劳力去发展经济作物。而且这两种作物，既可为粮，又可充作手工业原料。它们的传播，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还增强了劳动人民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正如一首诗歌所写的：“如何偶灾祲，流离祸尤酷，……其时有此薯，万或免颠覆。救荒宁在多，但今无窘蹙。年岁或不登，薯可补其缩。”^①

【经济作物：烟草与花生】 烟草原产于美洲中部，随着16世纪航海事业的发展，烟草和吸烟的嗜好逐渐传遍世界各地。大约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烟草自吕宋传入我国台湾、福建等地。由于葡萄牙文称烟草为“Tobaco”，西班牙文称“Tabacg”，最初我国也按其音译称为“淡芭菴”、“担不归”、“打姆巴古”等。明末以后，烟草逐渐由沿海地区向内地和北方传播。由于烟草具有药用功能，人们多用它避瘴气，祛寒湿，这对它的传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吸烟最初只在上层社会流行，作为高雅的朋友应酬之举和饭饱之余的闲窗情趣。不久，便扩大到民间。乾嘉之际，吸烟习成风气。^②从而促进了烟草种植业的扩

^① 陈世元：《金薯传习录》卷下。

^② 嘉庆年间的包世臣说：“数十年前，吃烟者十人而二、三，今则山隅海澨，男女大小，莫不吃烟”（《安吴四种》卷二六）。

大。

烟草生产的商品性很强。很多农民因为种植烟草收入比粮食高，便改种烟草。清代遂形成了一些比较集中的产烟区，如福建蒲城、湖南衡州、云南曲靖、山东青州、兖州、江西广信、宁都等地都是远近闻名的产烟区。同时，“烟坊”也随之兴起，制烟业成为一种新兴的手工业。到17世纪末，我国烟草开始大宗出口俄国，并强烈地冲击了英国烟草在俄国的市场。^①

花生也于16世纪传入中国东南沿海，^②它原产南美洲的巴西。因为它“引蔓开花，花落即生”，明人称为落花生，此外又称为地豆、番豆、地蚕、长生果、相思果等。清代，花生也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广东沿海农民专门种花生用海船运往中原地区销售。^③而且，人们还以花生榨油，“自闽及越无不食落花生油，且膏之为灯，供夜作。”^④由于它耐水淹，宜沙地，日渐传播到长江、黄河及北方沿河沙土地区。

【果菜作物：马铃薯、辣椒、番茄等】 明后期，从海外传入我国的果菜作物主要有马铃薯、辣椒、番茄、番木瓜等。马铃薯，原生在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热带高原和智利北部等地，大约明末，马铃薯传入中国台湾和东南沿海的一些地区。^⑤由于马铃薯味淡，长期不为人所欢迎。清前期，只是在一些高寒山区或贫瘠土壤地区，人们种它以作辅粮。乾嘉以后，种植渐多。由于它产量高，便于贮藏，开始成为人们冬季的主要菜食之一。辣椒原产于墨西哥，大约于16世纪传入我国，人们称它为

① 加斯东加恩：《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07页。

② 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载《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文集》。

③④ 檀萃：《滇海虞衡志》卷十。

⑤ 威廉·甘佩尔：《荷兰统治下的台湾》，1903年伦敦版，第254页。

“番椒”。^① 由于其味浓辣，在我国特别是长江以南地区传播很快，成为我国人民生活中一种重要的辛香调味料。番茄原产于美洲热带地区。大约万历时期（1573—1620）传入我国。因来自西番，人们多称西番柿^②，又称六月柿、喜报三元、洋柿、小金瓜。与其它作物相比较，番茄在我国传播十分缓慢，长期停留在观赏植物阶段。另外，美洲热带地区的番木瓜也传入我国广东、广西、台湾、云南等热带地区。除鲜食外，人们还用作蔬菜和药物。豌豆也被引进中国，闽南方言称它为“荷兰豆”。这些作物的引进，不但增加了我国的蔬菜种类，扩大了我国人民的夏冬菜食结构，而且也丰富了我国菜肴风味。

三、海外贸易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海外物品与中国社会生活】 明清时期，从海外各国输入中国的商品种类和数量相当丰富。包括各种香料、药材、胡椒、大米、棉花、棉布、海味品（如海参、海带等），各种矿产品（如铜、锡、铁、硫磺），各种手工业品（如玻璃器皿、自鸣钟、军刀等）、皮货、白银等。胡椒自明初以来一直大量进口，并曾作为军士和官员的部分折俸。据统计，明朝在1637至1644的最后年间，自爪哇输入的胡椒每年就达800吨至1200吨左右。^③ 而至鸦片战争前夕，胡椒的进口也在每年10000担左右的水平。^④

① 辣椒在我国又称“海椒藤”、“辣茄”、“胡地椒”、“海椒”、“辣子”、“大胡辣”、“辣角”等。

② 按：王祿：《农书》茄子篇中虽录有番茄，但那只是茄子的一个品种，而不是番茄属的番茄。

③ 鲍乐史：《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中国对巴达维亚的贸易》，《南洋史料译丛》1984年第4期。

④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第295页。

它成为我国人民生活中一种重要调料。而从东南亚等进口的各种香料药材，一直广泛地用于中国医药处方中，成为医治一些病症的良药。明后期，东南亚等地的一些手工业品也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如哑齐的天鹅绒，暹罗的兜罗绒、西洋布等。不过，东南亚地区的农产品，特别是大米，对中国社会生活起着更积极作用。尤其清朝康乾时期，由于东南沿海的闽、粤、浙等省产粮自给不足，乃大量进口洋米。仅乾隆七年，广东出洋商船就带回洋米23 000余石，而福建商船带回洋米达42 900余石。^①这些洋米来自暹罗、柬埔寨、安南、柔佛等地。它不但缓解了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民食不足，改善了人民生活，而且稳定了粮价市场，对安定社会秩序起了积极作用。

【白银的输入及其影响】 “自16世纪至19世纪，在这将近三百年的中西交往中，最显著的事实是西方人希求东方的货物，而又提供不出多少商品来交换。”^②为了平衡贸易收支，他们不得不以硬通货——白银输入中国。据统计，仅1570年至1760年间的西属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白银就达175 227,840库平两。^③18世纪后期占中外贸易主导地位的英国，从1760至1824年的65年间，东印度公司为采购中国货物而输入的白银，平均每年达516 700余两。^④其中最高年份甚至接近150万两。美国从1788到1840的50余年间，向中国输入的白银也达10 212万余元。甚至《望厦条约》签订后的1845年，美国还向中国输入白银77万余元。^⑤鸦片

① 李鹏年：《略论乾隆年间从暹罗运米进口》，《历史档案》1985年第3期。

② 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1页。

③ 钱江：《1570—1780年西属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南洋问题》1985年第3期。

④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第一册，第276页。

⑤ 汪熙、邹明德：《鸦片战争前的中美贸易》，载《中美关系史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116页资料统计。

战争前，已有多种外国银钱流入国内。其中主要为铸造于墨西哥镌有西班牙国王肖像的西班牙银元（即本洋）。大量外国白银的输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时中国社会商品经济与货币经济的发展，缓解了国内银荒危机，增加了国家贵金属的储备量，并为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转化与封建赋役制度的彻底改革奠定了基础。但是，大量外币的流入，在明清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限度内，面临着日益滋生的人口，又引起中国物价的猛烈上涨。18世纪，中国物价约上涨了四倍多。从而又冲击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关税收入与政府财政】 明清时期海外贸易的关税收入，曾是政府的一笔重要财源。明后期的漳州督饷馆，隆庆年间税饷每年为3 000两左右，到1613年（万历四十一年）达到35 000余两，即增加了十倍多。而同年福建全省税银为5万余两，漳州的地方关税收入就占70%以上。明人周启元说：“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① 在广东，明后期市舶司征收的舶税，每年约4万余两。^② 清代四海关的关税收入，从康熙到乾隆时期基本表现为不断增长的趋势。粤海关最为突出。1730年，关税收入为28万余两，到1750年，则上升到54万余两。在1788至1797年十年间，关税收入共计1 025万余两，平均每年达100余万两。到1828至1837年间，平均每年则达到156万余两。就是说，从1730至1830的一百年间，粤海关的关税收入增加了4.6倍。^③ 这些关税收入，除了交纳地方政府财库用作地方财政开支外，还被用作军饷、采办各种贡品的“备贡银”等等。它对明清两代政府的财政特别是当时的军事开支提供了重要来源。

【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成分的出现】 明清时期的海外贸

① 张燮：《东西洋考》序。

② 陈尚胜：《论明代市舶司制度的演变》，《文史哲》1986年第2期。

③ 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

易，也刺激了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成分的出现。在农业方面，一些地区农民专门根据海外市场的需求来安排生产。如海南岛“诸州县亦皆以槟榔为业，岁售于东西两粤者十之三，于交趾扶南十之七”。^①他们根据不同的市场需要，对槟榔作不同的加工。果品的出口，也促使“广州诸大县村落中，往往弃肥田以为基，以树果木。”^②在福建，“甘蔗干小而长，居民磨以煮糖，泛海售。”^③广东等地也专门生产“洋糖，供海外销售。”^④在台湾，人们也是“植蔗为糖，岁产二三十万，商舶购之，以贸日本、吕宋诸国。”^⑤

海外贸易也刺激了东南沿海地区一些手工业规模的扩大。有一首歌谣说嘉兴濮院镇的丝绸业，“绸市原称永乐乡，万家烟火尽机坊，自从番使通商后，日下镞来百万装。”^⑥还有一些精明的业主根据海外市场需求的具体信息专门进行织造。据利玛窦观察，中国人“用丝掺以棉织成一种大马士革式的料子，并且他们模仿欧洲产品，现在又织一种全丝的料子。他们的其它纺织品也在欧找到一个现成的市场。”^⑦“中国人巧妙地仿照最受欢迎的西班牙款式，以致他们的产品和安达卢西亚的五彩缤纷的衣服完全一样。”^⑧我国景德镇的陶瓷生产，也可以专门根据外商的要求进行设计与生产。在该地生产的一些瓷器，“贩去与西人载市，式多

①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五槟榔。

②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二。

③ 陈懋仁：《泉南杂志》。

④ 李调元：《粤东笔记》卷十四。

⑤ 郁永河：《采硫日记》卷下。

⑥ 《濮院所闻记》，引自蒋兆成《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乡镇经济试探》，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

⑦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14页。

⑧ 舒尔兹：《马尼拉大帆船》，纽约1959年版，第72页。

奇巧，岁无定样。”^①而清代广东石湾窑，则常将景德镇白瓷进行再加工，专供出口。另外，在广州等地，还兴起了专供外贸出口的制茶业和织布业。特别是织布业，它所需要的原料也主要依靠从印度等地的棉花。大约每年进口513 000担，经过广州地区作坊纺织成棉布，又外销海外世界。^②因此，鸦片战争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些作坊，已开始把目光投向世界市场。

四、鸦片战争对中外关系的影响

【鸦片贸易与走私】 16世纪后，在中外经济交流活动中，由于西欧等海外国家对中国物品强烈需求的刺激和中国外贸体制的不畅通，走私贸易日渐活跃。后来，以英国为主的西方国家，为了改变他们在对华贸易中的不利地位，便把鸦片走私贸易作为扭转对华贸易逆差的法宝。

鸦片（希腊文 ὄπιον，英文 opium），又称阿片，亦称阿芙蓉（阿拉伯文 Afyûn），明代曾作为药材进口。但17世纪后，一些人开始从吸食烟草发展到吸食鸦片，使鸦片输入开始增加。最先输入鸦片的西方国家为葡萄牙与荷兰，数量不多。1727年，英国开始向中国输入200箱鸦片。此后，随着英国对印度鸦片产地的占领，他们便把鸦片对华贸易急剧扩大。1795至1800年间，由英国商人从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为12 261箱，到1831至1840年间则高达243 548箱。就是说，30年间，英国的对华鸦片输入扩大了近20倍。而且，从1831到1840年的10年间印度鸦片输华的数

① 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二。

② 彭泽益：《鸦片战争前广州新兴的轻纺工业》，《历史研究》1983年第8期。

量，赶得上过去整个一个世纪的出口数量。^①美国是鸦片贸易的第二号贩子。1826年以前，在美国对华输出贸易总值中，鸦片约占10%，到1828年，则迅速上升为30.92%。^②此外，沙俄等国家也加入了鸦片对华贸易行列。

罪恶的鸦片贸易理所当然的遭到清朝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反对。1729年（雍正七年），清政府第一次公布了对吸食鸦片的禁令。自1796年后，清政府又多次宣布禁止鸦片进口。于是，英美等国鸦片贩子们便千方百计地进行鸦片走私贸易。一些腐朽的清朝官员对于政府的禁令也置若罔闻，只要自己得到贿赂，对鸦片便不加过问，甚至还为其掩护。尽管清政府加强禁烟措施，但是外国烟贩便在离广州四十里外的伶仃洋面上与中国走私商人勾结。他们甚至还备有武装快艇，公开对抗清朝巡海人员，肆无忌惮地私贩鸦片。

【鸦片贸易对中外的不同影响】 鸦片贸易对于贸易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极不相同的影响。

首先，鸦片贸易使英国的印度殖民政府财源大增。有力地支持了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以孟加拉政府的鸦片税收入为例，1792年，鸦片税收入占孟加拉岁收入的5.2%，1812年上升到7%，1815年升为7.5%，1822年达到10%，在1842年竟达到20%。^③对此，英国人承认：“这笔出口生意，对于我们印度殖民地利益太优厚了，不能轻易放弃。”^④

其次，鸦片贸易使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在中国推销鸦片的私商

① 谭中：《英国—中国—印度三角贸易1771—1840》，《中外关系史译丛》第2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② 汪熙、邹明德：《鸦片战争之前的中美贸易》，《中美关系史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③ （印）谭中：《英国—中国—印度三角贸易1771—1840》，见前引。

④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

们也大发横财。如1817年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拍卖的孟加拉鸦片，每箱卖1785卢比，而其成本仅220卢比。获利达8倍以上。除去上缴英印殖民政府的鸦片税收外，大约仍能获利4倍左右。而英国商人将鸦片运至中国，每箱也赚得893卢比，获利为50%左右。

然而，鸦片贸易却给中国制造了恶劣的经济影响和严重的社会危害。由于鸦片贸易只准在现金范围内交易，随着鸦片贸易总值的增加，白银外流日趋严重。据统计分析，从1800至1839年的鸦片战争前40年间，中国白银因鸦片贸易外流约六亿两之多。^①大量白银外流，直接引起银贵钱贱。劳动人民以出卖自己的产品换得一点铜钱，却因向政府以钱折银交纳赋税而负担日益加重。同时，它也加剧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鸦片贸易还严重损坏了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其结果，正如林则徐所指出的，“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②

总之，鸦片贸易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外贸易关系。印度鸦片输给中国，中国把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商品输往海外，加速了中国财富向英国的流动，从而使中国对外贸易完全服务于英国的殖民事业。

【鸦片战争与中外关系的改变】 1838年（道光十八年）十二月，道光帝派遣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往广东查禁鸦片。次年三月，林则徐到达广州，立即雷厉风行地开展禁烟运动，并通告外国鸦片贩子限期交出鸦片。六月，林则徐将收缴的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但英国人并不甘心。英国驻广州商务监督义律立即报告英政府，要求政府出军干涉。十月，英内阁正式决定出兵中国。1840年六月，英国远征军到达中国广东海面，

① 刘鉴唐：《鸦片战争前四十年间鸦片输入与白银外流数字的考察》，《南开史学》1984第1期。

② 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卷五。

向中国挑起了战争。道光帝在关键时又改变对英态度，将林则徐革职。从此，英军侵略气焰更加嚣张，清朝对英交涉事务在一些昏朽的官员主持下日渐被动，军事上也无认真准备，一再失利。1842年，清朝和谈代表只好接受了英国方面要求，签订了割地赔款的中英《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的失败，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英国通过武力敲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对外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从一个独立国家逐步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被破坏。清政府所经办的外交活动，也变成逐渐适应与满足外国列强侵略需要的过程，从割地赔款到外国列强在通商口岸获取领事裁判权等特权；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到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内地自由游历；从契约华工出国到外国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而中国人民在与外国人民进行和平友好交往的同时，更肩负着反对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重任。诚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一百年来，中国的斗争，从鸦片战争反对英国侵略起，后来有太平天国的战争，有甲午战争，有戊戌维新，有义和团运动，有辛亥革命，有五四运动，有北伐战争，有红军战争，这些虽然情形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反对外敌，或改革现状的。”^①也正是从鸦片战争之日起，一批批知识分子，抛弃了“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向中国以外的世界睁开了双眼。他们在思考，在探索：怎样来抗拒外国侵略势力的冲击，迎接域外世界的挑战？怎样使中国早日富强，改变这不平等的中外关系？

① 《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27—528页。

附录 主要参考书目

一、古代史籍

- 山海经（战国）佚名 袁珂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史记（西汉）司马迁 中华书局1959年版
汉书（东汉）班固 中华书局1962年版
三国志（西晋）陈寿 中华书局1959年版
华阳国志（东晋）常璩 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法显传（东晋）释法显 章巽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后汉书（南朝·宋）范曄 中华书局1965年版
宋书（南朝·齐）沈约 中华书局1974年版
水经注（北魏）酈道元 杨守敬注疏 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南齐书（梁）肖子显 中华书局1972年版
洛阳伽蓝记（北魏）杨衒之 范祥雍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魏书（北齐）魏收 中华书局1974年版
梁书（唐）姚思廉等 中华书局1973年版
陈书（唐）姚思廉等 中华书局1972年版
北齐书（唐）李百药 中华书局1972年版
周书（隋）令狐德棻等 中华书局1971年版
隋书（唐）魏征等 中华书局1973年版
大唐西域记（唐）释玄奘 季羨林、张广达、朱杰勤等校注 中华书局1985年版
晋书（唐）房玄龄等 中华书局1974年版
释迦方志（唐）释道宣 范祥雍点校 中华书局1983年版
南史（唐）李延寿 中华书局1975年版
北史（唐）李延寿 中华书局1974年版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唐）释慧立撰 彦惊笺补 孙毓棠、谢方点校
 中华书局1983年版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唐）释义净 王邦维校注 中华书局1988年版
 南海寄归内法传（唐）释义净 大正大藏经本
 往五天竺国传（朝）释慧超 《敦煌遗书》本
 初学记（唐）徐坚等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经行记（唐）杜环 张一纯笺注 中华书局1963年版
 唐大和上东征传（日）真人元开 汪向荣校注 中华书局1979年版
 通典（唐）杜佑 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一切经音义（唐）释慧琳 大正大藏经本
 元和郡县图志（唐）李吉甫 中华书局1983年版
 酉阳杂俎（唐）段成式 《学津讨原》本
 酉阳杂俎续集（唐）段成式 《学津讨原》本
 唐国史补（唐）李肇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蛮书（唐）樊绰 向达校注 中华书局1962年版
 北户录（唐）段公路 《十万卷楼丛书》本
 岭表录异（唐）刘恂 鲁迅校勘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旧唐书（后晋）刘昫等 中华书局1975年版
 唐会要（北宋）王溥 中华书局1955年版
 五代会要（北宋）王溥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旧五代史（北宋）薛居正等 中华书局1976年版
 太平广记（北宋）李昉等 中华书局1961年版
 太平御览（北宋）李昉等 中华书局1960年版
 宋高僧传（北宋）释赞宁 大正大藏经本
 太平寰宇记（北宋）乐史 乾隆五十八年刻本
 事类赋（北宋）吴淑 绍兴十六年刻本
 册府元龟（北宋）王钦若等 中华书局1960年版
 武经总要（北宋）曾公亮等 中华书局1959年版
 新唐书（北宋）欧阳修等 中华书局1975年版

新五代史（北宋）欧阳修 中华书局1974年版
 元丰九域志（北宋）王存等 中华书局1984年版
 文昌杂录（北宋）庞元英 《学津讨原》本
 梦溪笔谈（北宋）沈括 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
 香谱（北宋）洪刍 《学津讨原》本
 輿地产记（北宋）欧阳忞 嘉庆十七年刻本
 萍洲可谈（北宋）朱彧 《守山阁丛书》本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北宋）徐兢 《丛书集成初编》本
 攻媿集（宋）楼钥 《四部丛刊》本
 历代地理指掌图（宋）撰者不详 明刻本
 石林燕语（南宋）叶梦得 中华书局1984年版
 能改斋漫录（南宋）吴曾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通志（南宋）郑樵 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桂海虞衡志（南宋）范成大 齐治本校补 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
 吴船录（南宋）范成大 《知不足斋丛书》本
 岭外代答（南宋）周去非 《知不足斋丛书》本
 清波别志（南宋）周煇 《知不足斋丛书》本
 云麓漫钞（南宋）赵彦卫 《涉闻梓旧》本
 程史（南宋）岳珂 中华书局1981年版
 西汉会要（南宋）徐天麟 中华书局1955年版
 东汉会要（南宋）徐天麟 中华书局1955年版
 輿地纪胜（南宋）王象之 清抄本
 方輿胜览（南宋）祝穆 咸淳三年刻本
 诸蕃志（南宋）赵汝适 冯承钧校注 中华书局1956年版
 事林广记（南宋）陈元靓 中华书局1963年版
 玉海（南宋）王应麟 至元六年刻元明递修本
 梦梁录（南宋）吴自牧 《学津讨原》本
 西游录（元）耶律楚材 向达校注 中华书局1981年版
 长春真人西游记（元）李志常 王国维校注本

西使记（元）刘郁 《学海类编》本
 天南行记（元）徐明善 《说郭》宛委山堂本
 癸辛杂识续集（元）周密 《津逮秘书》本
 文献通考（元）马端临 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真腊风土记（元）周达观 夏鼎校注 中华书局1981年版
 元一统志（元）虞应龙等 中华书局1966年校辑本
 南海志（元）陈大震 吕桂孙 元大德刻本
 元朝征缅录（元）佚名 《守山阁丛书》本
 招捕总录（元）佚名 《守山阁丛书》本
 元经世大典地图（元）虞集等 《海国图志》道光二十七年本刊印
 安南志略（越）黎崱 上海乐善堂刊本
 辽史（元）脱脱等 中华书局1974年版
 金史（元）脱脱等 中华书局1975年版
 宋史（元）脱脱等 中华书局1977年版
 岛夷志略（元）汪大渊 苏继庠校释 中华书局1981年版
 异域志（元）周致中 陆峻岭校注 中华书局1981年版
 元史（明）宋濂等 中华书局1976年版
 渤泥入贡记（明）宋濂 《明经世文编》本
 百夷传（明）钱古训 江应樑校注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使缅录（明）张洪 《棣香斋丛书》本
 交趾总志（明）永乐年间官撰 法国远东学院1932年《安南志原》
 本
 使琉球录（明）陈侃 《丛书集成初编》本
 安南奔守本末（明）佚名 陶风堂1937年校补本
 平定交南录（明）邱濬 《岭南遗书》本
 安南传（明）王世贞 《纪录汇编》本
 安南图志（明）邓钟 《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本
 南诏野史（明）仇辂原集 杨慎编辑 乾隆四十年胡氏订正本
 瀛涯胜览（明）马欢 冯承钧校注 中华书局1955年版

- 星槎胜览 (明) 费信 冯承钧校注 中华书局1954年版
- 西洋番国志 (明) 巩珍 向达校注 中华书局1961年版
- 郑和航海图 (明) 佚名 向达注释 中华书局1961年版
- 西域行程记 (明) 陈诚 李暹等 《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本
- 西域番国志 (明) 陈诚 李暹等 《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本
- 明史 (清) 张廷玉等 中华书局 1974年版
- 大明一统志 (明) 李贤等 嘉靖三十八年刻本
- 寰宇通志 (明) 陈循等 《玄览堂丛书续集》本
- 明实录 (明) 官撰 南京国学图书馆本
- 皇明象胥录 (明) 茅瑞征 《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本
- 皇明世法录 (明) 陈仁锡 明刊本
- 皇明四夷考 (明) 郑晓 《吾学编》本
- 四夷考 (明) 叶向高 万历刊本
- 四夷广记 (明) 慎懋赏 《玄览堂丛书续集》本
- 四夷考经国雄略 (明) 郑大郁 明三槐堂刻本
- 西南夷风土记 (明) 《学海类编》本
- 东夷图说 (明) 蔡汝贤 万历刻本
- 日本考 (明) 李言恭 郝杰 汪向荣 严大中校注 中华书局1983年版
- 日本一鉴 (明) 郑舜功 旧钞本
- 日本图纂 (明) 郑若曾 《郑开阳杂著》本
- 朝鲜图说 (明) 郑若曾 《郑开阳杂著》本
- 琉球图说 (明) 郑若曾 《郑开阳杂著》本
- 安南图说 (明) 郑若曾 《郑开阳杂著》本
- 岭海舆图 (明) 姚虞 《守山阁丛书》本
- 皇舆考 (明) 张天复 《玄览堂丛书》本
- 皇明鸿猷录 (明) 高岱 嘉靖刻本
- 殊域周咨录 (明) 严从简 故宫博物院1930年刊本
- 西洋朝贡典录 (明) 黄省曾 谢方校注 中华书局1982年版

- 咸宾录（明）罗曰褫 余思黎点校 中华书局1982年版
 荒徼通考（明）佚名 《玄览堂丛书续集》本
 东西洋考（明）张燮 谢方点校 中华书局1981年版
 前闻记（明）祝元明 《纪录汇编》本
 野记（明）祝元明 同治十三年刻本
 华夷风土记（明）胡文焕 《崑斋丛书》本
 武备志（明）茅元仪 道光刊本
 名山藏（明）何乔远 崇禎十三年序刊本
 明会典（明）申时行等 《国学基本丛书》本
 裔乘（明）杨一葵 万历刻本
 岭南琐记（明）魏潜 《祝云乙编》本
 群书集事渊海（明）佚名 明弘治十八年重修本
 永乐大典（明）解缙等 中华书局1959—1960年辑本
 海语（明）黄衷 《宝颜堂秘籍》本
 坤輿万国全图（意）利玛窦 禹贡学社1936年刊行本
 广輿图（元）朱思本原作（明）罗洪先增订 嘉庆四年刻本
 方輿胜略（明）程百二等 万历三十八年刻本
 三才图会（明）王圻 万历刻本
 顺风相送（明）佚名 向达校注 中华书局1961年《两种海道针经》
 本
 指南正法（清）佚名 向达校注 中华书局1961年《两种海道针经》
 本
 清季外交史料（嘉庆朝）（六册）故宫博物院1932年版
 清季外交史料（道光朝）（十册）故宫博物院1933年版
 天下郡国利病书（清）顾炎武 清抄本
 读史方輿纪要（清）顾祖禹 中华书局1955年版
 读史方輿纪要·輿图要览（清）顾祖禹 中华书局1955年版
 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清）陈梦雷 蒋廷锡 中华书局影印本
 续通典（清）纪昀等 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续通志（清）纪昀等 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续文献通考（清）纪昀等 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清朝通典（清）官撰 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清朝通志（清）官撰 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清朝文献通考（清）官撰 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大清一统志（清）和珅等 道光二十九年刊本
 异域录（清）图理琛 《丛书集成初编》本
 海国闻见录（清）陈伦炯 李长傅校注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海录注（清）谢清高口述 杨炳南笔受 冯承钧校注 中华书局1955
 年版
 清朝柔远记（清）王之春 赵春晨点校 中华书局1989年版
 南洋事宜论（清）蓝鼎元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南洋蠡测（清）颜斯综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吕宋纪略（清）黄可垂 《海外番夷录》本
 吕宋纪略（清）叶羌鏞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苏禄纪略（清）叶羌鏞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征缅纪略（清）王昶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缅事迹略（清）师范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缅甸琐记（清）傅显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征缅纪闻（清）王昶 《春融堂杂记八种》本
 从征缅甸日记（清）周裕 《惜月山房汇钞》本
 安南纪游（清）潘鼎珪 《龙威秘书》本
 海外纪事（清）大汕广翁 《笔记小说大观》本
 海上纪略（清）郁永河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海岛逸志（清）王大海 嘉庆十一年刻本
 琉球国志略（清）周煌 《丛书集成初编》本
 噶刺吧纪略（清）程逊我 《逊敏堂丛书》本
 噶刺吧纪略拾遗（清）程逊我 《逊敏堂丛书》本
 中山传信录（清）徐葆光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滇系（清）师范 光绪十三年云南通志局刻本
 广东新语（清）屈大均 中华书局1974年版
 粤海关志（清）梁廷枏 道光刊本
 肇域志（清）顾炎武 清抄本
 如梦录（清）佚名 孔宪易校注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嘉庆重修一统志（清）穆彰阿等 《四部丛刊续编》本
 圣武记（清）魏源 中华书局1984年版
 海国图志（清）魏源 古微堂刊本
 外国竹枝词（清）尤侗 《昭代丛书》本
 八紘译史（清）陆次云《龙威秘书》本
 译史纪余（清）陆次云 《龙威秘书》本
 八紘荒史（清）陆次云 《龙威秘书》本
 坤輿全图（比）南怀仁 天津工商大学图书馆1925年印本
 坤輿图说（比）南怀仁 《指海》本
 乾隆内府輿图（清）官绘 故宫博物院1932年版
 皇清职贡图（清）傅恒等 乾隆刻本
 澳门纪略（清）印光任 张汝霖 光绪庚辰刊本
 朔方备乘（清）何秋涛 光绪七年刊本
 清朝续文献通考 刘锦藻 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清史稿 赵尔巽 中华书局1976—1978年版
 掌故丛编(10册) 故宫博物院1928—1929年版
 史料旬刊(40册) 故宫博物院1930—1931年版
 文献丛编(46册) 故宫博物院1930—1942年版

二、近人著述

中西交通史 向达著 中华书局1934年版
 中西交通史(上、下) 方豪著 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77年版
 中外交通史 陈佳荣著 香港学津出版社1987年版
 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一至三辑) 中外关系史学会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5—1991年版

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一至五辑) 中外关系史学会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1989年版

中外关系史译丛 朱杰勤译 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

中外关系史论文集 朱杰勤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中外史地考证 岑仲勉著 中华书局1962年版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六册) 张星烺 中华书局1976年版

中西文化交通小史 刘伯骥著 正中书局1953年版

中西文化交流史 沈福纬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中外文化交流史 周一良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 沈光耀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对外贸易史简论 李康华等 对外贸易出版社1981年版

唐宋贸易港研究 桑原隲藏著 杨练译 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唐宋元时代中西通商史 桑原隲藏著 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

陶瓷之路 三上次男著 胡德芬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交流 朱培初 轻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

亚洲各国古代史(上册) 周一良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

中国与亚洲各国和平友好的历史 周一良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中国和亚洲各国友好关系史论丛 史学双周刊社编 三联书店1957年版

亚洲各国史 朱杰勤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史论丛 北京大学历史系、东语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中亚古国史 麦高文著 中华书局1958年版

中亚史(第一卷) 王治来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中国伊朗编 劳费尔著 林筠因译 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中国人对非洲的发现(荷) 戴闻达著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中非交通史初探 张铁生著 三联书店1965年版

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 马文宽 孟凡人 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 沙丁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扶桑国新证 朱谦之 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中国人发现美洲 卫聚贤 台北石室出版公司1975年版
 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谜 罗荣渠 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早期中美关系史 赖德烈著 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华人发现美洲考 徐松石 东南亚研究所1981年版
 中国人发现澳洲 卫聚贤 香港说文社1960年版
 西域地名 冯承钧原编 陆峻岭增订 中华书局1980年版
 两汉与西域关系史 安作璋编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 贺昌群 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向达著 三联书店1957年版
 西域之佛教 羽溪了谛著 贺昌群译 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
 西域佛教史 王辅仁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西域文化史 羽田亨著 耿世民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西汉与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陈竺同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丝绸之路 布尔努瓦著 耿昇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 常任侠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西域研究 藤田丰八著 杨练译 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西突厥史料 沙畹著 冯承钧译 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 岑仲勉撰 中华书局1958年版
 突厥集史(上、下) 岑仲勉撰 中华书局1958年版
 突厥人和突厥汗国 马长寿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突厥史 林干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中国丝绸西传史 姚宝猷著 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
 中国经营西域史 曾问吾著 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中国文明的起源 夏鼐著 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 瓦西里耶夫 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中国殖民史 李长傅 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 刘健宜 束世澂 国立编译馆1934年版

中国南洋交通史 冯承钧著 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古代南洋史地丛考 姚楠、许钰 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南洋与中国 陈序经 岭南大学1948年版
南洋文献叙录长编 许云樵 南洋大学研究院1959年版
南洋华侨通史 温雄飞 东方印书馆1929年版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10辑)陈翰笙主编 中华书局1980—1985年版
十七世纪南洋群岛航海记两种 法兰克·透威恩尔 商务印书馆1958
年版
中国航海史(古代) 彭德清主编 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
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 章巽著 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古代南海地名汇释 陈佳棠、谢方、陆峻岭著 中华书局1986年版
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 冯承钧著 中华书局1957年版
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九编) 冯承钧译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
1956—1962年版
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证 希格勒著 冯承钧译 商务印书馆1928年
版
交广印度两道考 伯希和著 冯承钧译 中华书局1955年版
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 藤田丰八著 何继民译 商务印书馆1936年
版
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 费琅著 冯承钧译 中华书局1957年版
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 陈高华 吴泰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明代海外贸易简论 张维华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明代海外贸易史 李金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1990年版
明末清初私人海外贸易 林仁川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郑和评传 徐玉虎 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8年版
郑和 朱侠著 三联书店1956年版
郑和下西洋 张维华等 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
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中) 郑鹤声等 齐鲁书社1980、1983年版
郑和研究资料选编 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

论郑和下西洋 郑一均 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
 郑和家世资料 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
 郑和下西洋论文集(I) 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
 郑和下西洋考 伯希和著 冯承钧译 中华书局1955年版
 郑和航路考 周钰森 台北海运出版社1959年版
 唐代西域人华化考 桑原隲藏著 何健民译 中华书局1939年版
 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 谢海平 台湾世界书局1970年版
 元西域人华化考 陈新会撰 台湾世界书局1970年版
 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 张维华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中国之旅行家 沙畹著 冯承钧译 台湾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张骞西征考 桑原隲藏著 杨练译 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法显传考证 足立喜六著 何建民译 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蒲寿庚研究 罗香林 香港中国学社1959年版
 蒲寿庚考 桑原隲藏著 陈裕菁译 中华书局1929年版
 广东十三行考 梁嘉彬 国立编译馆1937年版
 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 张政烺著 开明书店1951年版
 朝鲜通史 林泰辅著 陈清泉译 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朝鲜通史(上)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贺剑城译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吴晗编 中华书局1980年版
 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 朴真奭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中朝人民的友谊关系与文化交流 周一良 开明书店1951年版
 中朝关系史论文集 杨昭全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中韩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台北1983年
 朱明与李氏朝鲜 王仪 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
 日中文化交流史 木宫泰彦著 胡锡年译 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日中交流二千年 藤家礼之助著 张俊彦、卞立强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中国日本交通史 王辑五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 中日民族文化交流史 宋越伦著 台北中正书局1983年版
- 中日文化交流史论 梁容若著 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实藤惠秀著 谭汝谦、林启修译 三联书店1983年版
- 中日关系史(Ⅰ) 张声振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 隋唐中日关系史 余又荪著 台北商务印书馆
- 宋元中日关系史 余又荪著 台北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 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 汪向荣 夏应元编 中华书局1984年版
- 中日关系史文献论考 汪向荣 岳麓书社1985年版
- 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文集 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东南亚与华人 王赓武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版
- 东南亚史 霍尔著 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 东南亚文化交通史 邱新民 新加坡亚州研究会、文学书屋1984年版
- 东南亚古代史地丛考 邱新民 新加坡南洋学会1969年版
- 明实录中之东南亚史料 赵令扬等编 香港学津出版社1968年版
- 17—19世纪中国帆船在东南亚 田汝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 秦代初平南越考 鄂卢梭著 冯承钧译 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
- 越南历代疆域 陶维英著 戴可来译 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 安南通史 岩村成久著 许云樵译 星洲世界书局1957年版
- 占婆史 马司帛络著 冯承钧译 中华书局1956年版
- 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 越南中国关系史年表 山本达郎著 云南东南亚研究所1983年版
- 暹罗古代史 共丕耶达玛差拉查奴帕著 王文申译 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 暹罗与中国 陈序经著 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
- 中国与暹罗 嵇翥青著 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
- 暹罗王郑昭传 朗蒂吉怀根著 许云樵译 中华书局1955年版
- 泰国史 中山大学东南亚史研究所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缅甸史 波巴信著 陈炎译 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 缅甸史 哈威著 姚楠译 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 缅甸史 貌丁昂著 贺圣达译 云南东南亚历史研究所1983年版
- 猛族诸国初考 陈序经著
- 中缅关系史纲要 王婆楞 正中书局1945年版
- 中印缅道交通史 夏光南 中华书局1948年版
- 扶南史初探 陈序经著
- 中国古籍中的柬埔寨史料 陈显泗等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中国古籍中有关老挝资料汇编 景振国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年
版
- 马来亚史 温斯泰德著 姚楠译 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
- 马来亚史(上) 许云樵 新加坡青年书局1961年版
- 马来纪年 许云樵译 新加坡南洋报社1954年版
- 马来亚华侨史纲要 姚楠 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
- 马六甲史 张礼千 新加坡1941年版
- 檳榔屿志略 姚楠、张礼千 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 中菲关系史 刘兰田 正中书局1962年版
- 中菲关系史论丛 吴景宏 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年版
- 中国古籍中有关菲律宾资料汇编 黄重言等 中华书局1979年版
- 印度尼西亚史 萨努西·巴尼著 吴世璜译 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 印度尼西亚史 郑学稼著 台北1976年版
- 中南半岛华侨史纲要 姚楠 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
- 东南亚华侨史 朱杰勤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 印度尼西亚华侨史 温广益等 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
- 苏门答刺古国考 费琅著 冯承钧译 中华书局1955年版
- 东印度航海记 威·伊·邦特库著 姚楠译 中华书局1982年版
- 高级印度史 马宗达著 张澍霖等译 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 印度通史 辛哈·班纳吉著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 季羨林 三联书店1983年版

- 中印历代关系史略 许崇灏 独山出版社1942年版
- 阿拉伯通史 希提著 马坚译 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 中国阿拉伯海上交通史 桑原隲藏著 冯攸译 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 中国伊斯兰史存稿 白寿彝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中国伊斯兰史纲要 白寿彝 文通书局1946年版
- 伊斯兰教在中国 甘肃民族研究所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选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伊本·白图泰游记 马金鹏译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中国印度见闻录 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 中华书局1983年版
- 世界征服者史 志费尼著 何高济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 史集 拉施特著 余大均、周建奇译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 柏朗嘉宾蒙古行记 耿昇译 中华书局1985年版
- 鲁布鲁克东行记 何高济译 中华书局1985年版
- 海屯行记 何高济译 中华书局1981年版
- 马哥孛罗游记 张星烺译 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 马可波罗行记 冯承钧译 中华书局1954年版
- 马可波罗游记 陈开俊 戴树英译 福建科技出版社1981年版
- 鄂多兰克东游录 何高济译 中华书局1981年版
- 出使蒙古记 遆森编 吕浦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 沙哈鲁遣使中国记 火者·盖耶速丁著 何高济译 中华书局1981年版
- 克拉维约东使记 杨兆钧译 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 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记 博克舍 中华书局1990年版
- 英使访华录 爱尼斯·安德逊 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斯当东 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 乾隆英使觐见记 马戛尔尼 中华书局1973年版
- 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 江文汉 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
- 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版
- 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 张维华著 齐鲁书社1987年版

- 明清之际中学之西渐 王漪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 西力东渐史 冯承钧著 新民印书馆1945年版
- 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 江文汉著 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
- 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 潘光旦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年版
- 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 阿克·穆尔著 郝镇华译 中华书局 1984年版
-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 徐宗泽 上海圣教杂志社1938年版
- 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 裴化行著 商务印书馆 1936年版
-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三册) 方豪著 中华书局1988年版
- 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 罗光著 台湾征祥出版社1967年版
- 教廷与中国使节史 罗光著 台湾光启出版社1961年版
-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 费赖之著 冯承钧译 上海土山湾出版社 1932—1934年版
- 利玛窦中国札记 何高济译 中华书局1983年版
- 张诚日记(1689.6.13—1690.5.3) 陈霞飞译 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 清代西人见闻录 杜文凯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 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 加恩 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 早期中俄关系史(1689—1730) 葛斯顿·加恩著 耿昇译 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 十七世纪中俄关系 前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 商务印书馆 1978年版
- 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 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 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书局1981年版
-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 故宫历史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 中华书局1979年版
- 俄国使团使华笔记(1692—1695) 伊兹勃兰特·伊台斯等编 商务

印书馆1980年版

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 本史编写组编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 王立人译 商务印书馆
1973年版

沙俄侵华史(四卷) 近代史研究所 人民出版社1976—1989年版

汉魏西晋南北朝佛教史 汤用彤著 中华书局1983年版

隋唐佛教 汤用彤著 中华书局1982年版

东方佛教文化 罗照辉 江亦丽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印度佛教史概说 杨曾文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历代求法翻经录 冯承钧 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

日本佛教史纲 村上专精著 杨曾文译 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摩尼教及其东渐 林悟殊 中华书局1987年版

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 卡特著 吴泽炎译 商务印书馆
1957年版

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 张秀民著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火药的发明和西传 冯家昇著 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 朱谦之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 利奇温著 朱杰勤译 商务印书
馆1962年版

大秦国全录 夏德著 朱杰勤译 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中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关系 齐思和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陈垣史学论著选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晚学斋论文集 张维华撰 齐鲁书社1986年版

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 格林堡 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 佐佐木正哉编 台湾文海出版社1977年
版

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 肖致治 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中英外交史论集 王曾才 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

中美关系史论丛 汪熙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中法外交关系史考 张雁深 长沙史哲研究社1950年版
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 施丢克尔 三联书店1963年版
中德关系史文丛 赵振玖主编 中国建设出版社1987年版
葡萄牙侵占澳门史料 介子 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中葡外交史 周景濂 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